[陈淮系列讲座之一]

大道至简

陈淮 著

讲给EMBA的经济学

第一讲 历史的回顾与总结 第二讲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第三讲 中国就业战略
第四讲 中国结构战略 第五讲 中国资源战略 第六讲 中国区域战略
第七讲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第八讲 经济体制改革

A Scholar's Talk on Economics and China

中国发展出版社

大道至简

A Scholar's Talk on Economics and China

陈淮观点

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我认为邓小平实在是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他用了两句最朴实无华、最通俗易懂的话，就把人们争论了上百年的很尖锐、很深刻的问题给总结了。我们就要循着这样一条思路向前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学。也许我们现在的回答还不完整，但这个思路不能变。什么思路呢？一是老百姓过好日子，二是市场经济。

"管理股"的出现意味着管理要素所有者的利益不再表现为工资，而是表现为利润。

垄断是市场经济的大敌，是一种腐败，是一种市场暴力。垄断导致技术停滞与制度腐败。垄断没有什么"好"、"坏"之分。

美国《财富》杂志关于世界500强的排行榜中，中国的企业有12家榜上有名。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已经拥有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下这个判断恐怕还为时过早。因为世界500强中的其他488家之所以大，都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是市场力量导致的资源集中。唯有中国这12家并未经过市场的充分竞争"洗礼"。不论资产规模大、还是销售额大，都还只是人为合并的结果。

"全面小康"是一个具有极高政治智慧的提法。这个目标首先坚定地回答了来自"左"的诘难，坚决地否定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思潮。这个目标也同时坚定地堵死了右的政治倾向。我们要的是"全面的小康"，绝对不是两极分化的社会，绝对不是一小部分人占有社会绝大部分财富，而大多数人一无所有的社会。

ISBN 7-80087-702-7

9 787800 877025 >

ISBN 7-80087-702-7/F·437

定价：45.00元

[陈淮系列讲座之一]

F
C447
F122.8

讲给EMBA的经济学

A Scholar's Talk on Economics and China

陈淮 著

A1110310

大道至简

厦门大学图书馆藏书

中国发展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道至简——讲给 EMBA 的经济学 / 陈淮著.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1

ISBN 7－80087－702－7

Ⅰ.大...　Ⅱ.陈...　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中国　Ⅳ.F123.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6424 号

书　　名：大道至简——讲给 EMBA 的经济学
著作责任者：陈淮　著
出 版 发 行：中国发展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16 号 8 层　100037）
标 准 书 号：ISBN 7－80087－702－7 / F·437
经　销　者：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北京新华印刷厂
开　　本：670×990mm　1/16
印　　张：27.75
字　　数：454 千字
版　　次：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8000 册
定　　价：45.00 元

联 系 电 话：（010）68990630　68990692
购 书 热 线：（010）68990682　68990686
网　　址：http://www.develpress.com.cn
电 子 邮 件：fazhan@drc.gov.cn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本社图书若有缺页、倒页，请向发行部调换

序说

课程目标与要求

KECHENGMUBIAOYUYAOQIU

同学们好。受上海交大的委托，很高兴有机会与 EMBA 的学员们一起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这门课进行学习与交流。

这是一门很具挑战性的课程。对老师和学员来说，都具有很大的挑战性。在我之前，为上海交大 EMBA 班讲授这门课程的是董辅礽教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这门课和其他课不一样。讲计算机的老师不论讲法怎么不一样，重点怎么不一样，讲完了，都是计算机的同一个硬件或软件。讲高等数学的老师可能各有风格，但 11 个积分公式肯定都一样。教外语的教授可能用不同的教材，但无论用哪一种教材，都不可能把语法的“现在进行时”改成“过去将来时”。而这门课的特点是，讲授的老师之间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讲课风格上可能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别。因为没有一个现成的体系，没有一个定格的范围。哪些内容是这个领域的，哪些内容不是这个领域的？这是需要我们大家在教学相长中共同探索的。

我知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这门课在所有的高校，包括最著名的重点高校，像清华、北大、人大，都是最难讲的一门课。这门课的难度在哪儿呢？难在要么失于老套，脱离实践太远，枯涩无味；要么一大堆数字、现象的罗列，缺乏深入的归纳和总结，缺乏对本质的认识。在很多高校里，老师讲完这门课后，能够让学员给打个“及格”的分数，那已经就是很不错的了。

讲好这门课的难度非常大，一方面是因为理论在不断的升华与深入，另一方面是因为实践也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人们面临很多思考，这些思考从不同的角度产生出不同的看法、归纳出不同和结论。人们很难在同一个问题上“九九归一”地实现殊途同归，让它达到一个共识。

我所在的单位是一个研究机构，并不承担教学任务。此前我也并未讲过这门课。但交大让我来尝试一下，我愿意面对这个挑战。我所讲的没有现成的教科书。连一页书面材料也没有。但这不等于

说这门课将流于一个演讲报告的水平。这是一门系统化的 EMBA 课程。我知道上海交大的声誉，我会十分爱护这个声誉。我自己要求这门课所要达到的水平是："理论的深层次，实践的最前沿"。当然，因为是尝试，因为水平与学识限制，难免有不尽人意之处，我会尽力而为，也希望大家共同合作。

听我讲课有个特点，比较轻松，但也比较艰难。轻松在于可能不会太枯燥。我听说有些大学的老师讲这门课时让人昏昏欲睡或是太过艰涩。我想我尽力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另一方面，恐怕也不能轻易地把大家给放过去。我们将有八个单元的讲授，一个单元一个主题，每一个单元都有四十分钟到一个小时左右的讨论。每一个单元我都要求大家尽量地提问。我将当场和大家双向交流。如果你精神不集中，只是做一个 Receiver，一个接收器的话，那你恐怕很难提出问题。还不止于此。按照学校的要求，这门课程是学分课，考试课程，要有成绩。因此最后还要要求你们每人都要写出一篇三千字以上的 Paper，就是课程总结。这个三千字的总结就是考试。这个总结并非一定是你得有多么深刻的体会。如果你认为老师讲的有三点不对，你把它提出来，也行。你有四点心得归纳出来，也行。你觉得所讲授的内容中有一个问题你特别有感触，根据你自己的实践有一些启发性的想法，也行。只要围绕这门课的主题就行。

先自报一下家门。京剧里的文官武将出场都得先自报一下资历，叫做开场白。免得同学们质疑，莫非是个人就敢给 EMBA 上课，就敢登上海交大的讲堂？

一方面，我是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班出身，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研究生读的是工业经济。实实在在地本科、硕士、博士读了十年。中间不掺水。另一方面，对外国的经济学我也并不陌生。美国、日本我都留过学，多少都有所了解。不管是西洋的、东洋的，相应的理论也有一定的参悟。在我们国家过去一段的发展实践中，我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对我国实践发展的情况也有一点了解和体会，并会和大家一并交流。

真正在课堂上所讲的，我不提倡大家把我说的都记下来。我讲课没有书面的本本，绝对不照本宣科。我有一个经验，把老师说的都记下来是一个坏习惯。我的课以听为主，以想为主。我相信一个好的老师，如果不先把信息装在自己脑子里，他就不能把知识充分地装到学员的脑子里。

我上大学的时候是77级，恢复高考以后的第一年。那时候没有这么好的条件，没有这么好的教室，即使在美国留学时，那时教室也没这么好。我们上大学时，那课桌和小学、初中的差不多。和我坐在一起的是一个女同学，如同那首歌里唱的“同桌的你”，长得挺漂亮。每天上课，她埋头苦干，一个劲儿记笔记，一学期都不抬头看我一眼，特让我失望。期末时我问她，你都记了些什么，让我参考参考行不行？拿过来一看，那小字又工整又纤秀，老师讲的，记得滴水不漏。甚至比老师讲的多几个字：括弧，咳嗽一声，括弧完。

四天上、下午连续听课，我知道这是一个很累人的活儿。我希望我们有一个轻松的开头。但轻松并不是说就能放低要求，我说过我希望这八个单元要触及到理论的深层次、实践的最前沿，需要涉及到的问题是非常之多的。但我们只有八个单元的时间。真正要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讲充分，恐怕需要列出二三十个专题。这一点都不难。例如，像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为什么我们会面临这样的挑战？理论和实践都迫切需要回答。再比如，党的“十六大”前后，很多媒体讨论“弱势群体”的问题。什么是“弱势群体”？工人、农民是否已经成为了“弱势群体”？这个问题在理论与实践上也迫切需要回答。怎样实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是不是一个需要迫切回答的问题？资本市场发育，是不是大家共同关注的焦点？类似的问题，列二三十个不成问题。但时间有限，我们只能择其要。就是课程计划中列出的八个专题，与大家交流。当然我会尽可能把有关的信息加入到相关专题中。

我的开场白稍微长了点，而且我们今天的内容还是非常多，时间非常紧。但是我还是愿意一开始就和大家有个交代。特别说明，希望讨论时，大家能踊跃提问。我们双向交流。

我这人有个特点，不怕挑战。你有什么尖锐的问题，尽管问。如果大家对我讲课不满意，无论是讲课的内容还是理论的深度，还是进度的把握，可以向班主任老师反映，或直接向我提出来。如果大家说，这个老师讲课不成，没达到我们的要求，那我自动下课。

以上我很诚恳地把应该交代的向大家交代了一下。印在课程表上的英文题目我建议改一下。原文是 Socialist Economic Theory and Practice。我建议改成 Socialist Economics: Theory and Practice。把 Economic 改成 Economics，在后面加个冒号，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与实践”，这才更加贴切。

陈淮简介

陈淮，男，1952年生，1987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博士学位，1993年获研究员职称，为国家级有特殊贡献专家，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研究所副所长，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曾于1987—1989年在日本东海大学作访问学者，1992—1993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作客座研究员，出版有《工业化——中国面临的挑战》、《日本产业政策研究》、《对话"十五"——中国中长期发展战略再审视》、《走过世纪之交：战略与政策研究》、《热点随想》等专著十余部，公开发表论文数百篇，主要研究领域：工业化理论、产业结构理论、区域经济理论、人口就业理论等，曾获国家发展奖一、二等奖（集体），国家教委优秀著作奖（个人），辽宁省社会科学一等奖（个人），近期主持有《跨世纪战略发展过程中的中国经济结构研究》、《过剩经济：形势与对策》、《重要基础产业的资产重组研究》、《中国国有投资公司在发展与改革过程中的战略定位》、《保障国家石油安全的战略思路》等重大课题研究。

大道至简

A Scholar's Talk on Economics and China

陈淮自述

我是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班出身，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研究生读的是工业经济，实实在在地本科、硕士、博士读了10年，中间不掺水。同时，对外国的经济学我也并不陌生，美国、日本都留过学，多少都有所了解。不管是西洋的、东洋的，相应的理论也有一定的参悟。在我们国家过去一段的发展实践中，我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对我国实践发展的情况也有一点了解和体会。

责任编辑：尚元经　李莉
责任印制：韩　锐
封面设计：

目　录

序　说　课程目标与要求 …… 1

【0-1-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这门课具有很大的挑战性。其特点是，讲授的老师之间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讲课风格上可能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别。因为没有一个现成的体系，没有一个定格的范围。哪些内容是这个领域的，哪些内容不是这个领域的？

【0-1-2】人们面临很多思考，这些思考从不同的角度产生出不同的看法、归纳出不同的结论。我所讲的没有现成的教科书。连一页书面材料也没有。但这不等于说这门课将流于一个演讲报告的水平。我自己要求这门课所要达到的水平是："理论的深层次，实践的最前沿"。

第一讲　历史的回顾与总结 …… 1

一、经济学的回顾与总结 …… 4

【1-1-1】所有近、现代经济学理论，我们所要讨论的实践中所面临的经济发展难题，都是和工业化这个进程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工业化，我们用不着讨论失业、下岗、城市化、资源、可持续发展、基础设施、外来竞争、市场游戏规则、知识产权、WTO、政府公共职能等等一切问题；不必讨论为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总量与结构问题、宏观调控与微观主体问题；以及人类苦苦思索而不得的种种难题。/4

【1-1-2】机器带来了生产率的成倍增长。面对仿佛在一夜之间从天而降的财富，在快乐、幻想与野心交织的社会背景下，从工业化初期开始，人们就致力于思考、分析这些财富的本质、

HAN78/04

财富的来源、财富的去向、财富的分配等问题，由此就诞生了我们称之为经济学的学问。/5

【1－1－3】无需讳言，我们现在还有太多的客观规律没有认识。别说机器最终将导致什么样的生产力，通货膨胀、通货紧缩这样一个在发达国家过去一百余年中不断往复、出现过多次，甚至导致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么一个矛盾，我们至今还处在一个初级的认识水平上。从2002年到2003年，关于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该不该淡出的问题，不是在媒体上时见尖锐的争论吗？/6

【1－1－4】经济学是一门既简单又深奥的学科。近、现代经济学，不论它叫做环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所有经济学研究的内容都不外乎两个方面：资源的优化组合、优化配置问题和社会利益关系的协调问题。/8

【1－1－5】现在很时髦的一个词叫做“制度安排”。其实所有制度安排的本质都不过是规范化的社会利益关系协调方式。人们找到一种能够使社会群体之间利益关系趋于协调的方式，然后就把它固化下来，形成社会共同的约定；并且把这个约定上升到规范的形式，这就叫做制度安排。/10

【1－1－6】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来没说过暴力革命，从来没说过“一大二公”，从来没说过只有一个利益主体。尽管讲过消灭剥削者，让大多数人掌握财富。这种平等观，就叫做社会主义的平等观，叫做社会主义思想。在后来的实践发展中，资本主义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资本家努力让人们挣更多的钱。就是在这样的挑战性问题面前，经济学，包括社会主义经济学就有了发展。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我们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社会主义不再是消灭有产者，而是要让大多数人都有产。这就是辩证法。/12

【1－1－7】1929年，一场以全球性过剩为特征的大危机猝不及防地降临于世界，社会矛盾一下激化了。由此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人们认识到，如果供求之间的失衡程度严重到市场不能自动调节的地步时，得有一个外在力量来干预一下。这个外

在力量就是政府。政府应当如何来调整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平衡关系呢？由此就诞生了宏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认为，政府的任务就应当是在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15

【1－1－8】微观经济学专门研究企业内部的资源如何实现最优化的组合。要素之间可以互相替代，究竟用人还是用机器？要说服消费者，并且还要战胜竞争对手，要想多卖就必须卖得便宜。什么样的规模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呢？什么情况下才能够实现一个最好的组合呢？微观经济学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可以定量化分析的方法。/17

【1－1－9】邓小平同志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我认为邓小平实在是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他用了两句最朴实无华、最通俗易懂的话，就把人们争论了上百年的很尖锐、很深刻的问题给总结了。我们就要循着这样一条思路向前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学。也许我们现在的回答还不完整，但这个思路不能变。什么思路呢？一是老百姓过好日子，二是市场经济。/20

二、管理学的回顾与总结 …… 22

【1－2－1】在工业化阶段，人类实际面临着这样的悖论。想不想提高生产率，想不想要更多的福利？想要。想要就得付出代价。非人化就是代价。很多人以为市场经济下的资源配置机制就是自由竞争。其实不是。即或是完全的市场经济下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资源配置机制。在工厂围墙外是自由竞争，在工厂围墙内只有指挥与服从。否定人性的流水线理论和实践是谁发明和实施的呢？正是美国人。人性的最终回归一直要到生产力发展到人类能够控制的程度，才能够彻底解决。/22

【1－2－2】“管理股”的出现意味着管理要素所有者的利益不再表现为工资，而是表现为利润。管理要素的资本化使管理者的利益和出资人利益进一步密切地结合到了一块儿，管理理念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我们今天的改革中面临的高管人员融资持股、管理者持股等，很可能是一种符合客观规律的趋势。同样地，技术股也被称为技术要素的资本化。/28

【1-2-3】当代经济学与管理学都承认，参与微观经济活动的最基本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土地、技术与管理五个方面。这个“五要素”的认识变化并非仅仅存在于西方的经济理论中，而且已经实际地深入到了我们当前的发展与改革进程中。党的“十六大”报告已经明确无误地接受了管理、技术资本化的认识，提出要“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要“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29

三、我国实践的回顾与总结 …… 30

【1-3-1】中国近代工业从一开始就是以“官商合办”为基本形式的，企业从一开始就绕过了市场，绕过了竞争。这个先天不足，对我们后来的体制形成有着非常深厚的影响。迄今这个非市场化起源的影子还时有所见。/30

【1-3-2】建国前夕，人们迫切希望近百年来未能成功的工业化梦想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迅速变为现实。这种急于求成的情绪给以后经济建设的失误埋下了伏笔。毛泽东的一段话集中地代表了这种乐观看法和美好愿望。他说：“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很可能是相当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34

【1-3-3】50年代末的“大跃进”；60年代在“要准备打仗”的形势估计下实行“靠山，分散，进洞”的方针；70年代末错误地估计中国的资源前景，提出要“搞十来个大庆，十来个鞍钢”等曾反复地把国民经济推到崩溃的边缘。“左”指导思想、无视客观规律的盲目蛮干和原有的不合理体制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惨痛的教训。/36

【1-3-4】在过去20余年中，我们创造了很多值得认真总结的成功经验。例如特区经济、乡镇企业、浦东开发、恶性通货膨胀后的“软着陆”、非公经济的大发展等。但我们也有很多值得汲取的教训。例如在资源产业搞“国家、集体、个人一块上”的“有水快流”，市场化进程中的“拨改贷”尝试等。还有一些举措有成功也有不足。例如区域间的“梯度发展战略”、存在不规范问题的股票市场等。还有些问题，例如“下岗分流”、“积

极财政政策”、“国企三年脱困”等，可能还需要实践的进一步发展的才能做出确切的评价。/39

四、提问与讨论…… 41

第二讲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49

一、什么是市场经济 …… 52

【2－1－1】市场经济就是按等价原则进行交换的经济。市场经济下的交换是“亲兄弟明算账”的交换。交易双方必须计较多少，必须维护自己的利益。交换中这个“必须维护自己的利益”的行为非常重要。可以说，这是市场经济一切规律的根本出发点。在所有经济学中都存在一个无需证明的假定前提。这个假定前提就是，人都是趋利避害的。/53

【2－1－2】等价交换只能在供求双方平等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任何道德、法律或行政权力方面的不平等都会使等价交换的原则扭曲，都会导致市场经济关系紊乱。用理论化的语言说就是，市场交易规则中不能有任何的超经济强制。/54

【2－1－3】市场经济秩序出现普遍性混乱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社会中有一部分人唯利是图或法制、道德操守低下。如果在实际经济运行中，当人们发现，破坏制度总是可以比遵守制度获得更大的收益，那么这个社会的经济秩序一定会趋于紊乱。因为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从遵守制度转向破坏制度。/60

【2－1－4】信用这种资源不是和“大公无私”联系在一起，而是和财富、产权的多元化归属联系在一起的，是和保护多元化的社会利益联系在一起的。不讲信用就侵犯了别人的所有权。在计划经济、“一大二公”的体制下，几乎所有的财富、所有的资源都是国家的，无所谓产权，也就无所谓信用。/62

二、中国为什么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68

【2－2－1】我们的改革，最初并不是因为谁先知先觉地知道中国得走市场经济之路，中国还得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还得和国

际经济接轨。最初没人知道。70年代末，就是因为农民吃不上饭了，要饿死人了，才有了把土地分给农民的改革。但在这个“单干”中，分散决策、承认个别利益、独立承担风险、生产者自由处置产品、价格随行就市等市场经济的几乎所有内容都已经包括在内了。/68

【2-2-2】公有制只是一种资源要素的所有制形式。我们没必要把公有制“神话”。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国民经济系统，其所能支配的资源总是有限的。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国民福利增加来说，究竟是这些资源写在谁的名下更重要，还是提高这些有限资源的利用效率更重要？市场经济是个优胜劣汰的经济。谁可以实现的资源利用效率最高，谁就应成为资源的支配者。/72

【2-2-3】千千万万的“老板”出资办企业本来是为自己谋取利益的，但要为自己谋取利益就得满足市场的需求，从而最终为全社会谋取了利益。“看不见的手”就是指导致这种主观与客观矛盾现象的市场机制。“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大家”是市场经济的大道理。没有这个道理，我们就不会有市场经济中的活力和优胜劣汰。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概括说，市场经济就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大家”的经济。/80

【2-2-4】在真正的市场经济下，国民经济只区分为“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所有以赢利为目的的经济活动都归入“私人部门”，不论出资人是私人还是政府。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下，“公”和“私”的区别只和职能联系，并不和所有制联系。/80

三、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矛盾 …… 84

【2-3-1】我们的改革面临的大量问题，背后隐藏的是如何处理好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如何协调和这个矛盾的问题。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问题，民航、电力、电信以及铁路等行业的资产重组问题，国企职工身份转换问题，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问题、整顿与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问题，以致我国“入世”后面临的挑战问题等，无一不涉及到市场与政府之间的这一矛盾。/85

【2-3-2】垄断是市场经济的大敌，是一种腐败，是一种市场暴力。垄断导致技术停滞与制度腐败。垄断没有什么“好”、“坏”之分。当生产力发展在客观上导致一定的垄断时，我们的选择不是维护垄断，而是寻求新的竞争机制，在更高层次上发展竞争。/89

【2-3-3】价格竞争没有什么不好。人们普遍关心价格，企业普遍学会用价格和社会对话，这是一种历史进步，是市场经济制度发展的表现嘛。市场经济的最大特点就是把交易过程中的一切条件都换算为单一的货币单位。拿价格说话，这种尺度的单一性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在这个“拿价格说话”的过程中，有限的资源就被配置到了那些“优”的生产者手中。/92

【2-3-4】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最大区别，就在于用什么办法实现资源集中。用革命的方式、剥夺的方式就是计划经济。弄清楚这一点并非无关紧要。党的“十六大”报告说：人们的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要受到保护。为什么？没有这个保护、这个制度，我们就没有了市场经济。/95

四、提问与讨论 …… 98

第三讲 中国就业战略 …… 107

一、中国城镇就业形势远未缓解 …… 110

【3-1-1】在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种种重大难题中，不论以怎样的顺序排序，就业都应当排在第一位。现在很多企业，不论民营还是国有，都在门口或者工作地挂一幅标语，“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这幅标语不仅是对职工的警示，也是对政府的警示。我们的国家最大的难题就是“找工作”。/110

【3-1-2】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公认的最勤奋的民族。在我们这个民族的传统理念中，大多数老百姓是宁愿要一份工作而不愿意靠社会救济金活着的。这种理念在我们中国老百姓的心中是根深蒂固的。/112

【3－1－3】一方面下岗职工总数明显减少，另一方面城镇的社会登记失业率明显上升。截至2002年末的统计，有410万累计未安置的下岗职工，有770万城镇登记失业人口。两项合计约为1180万人。如果考虑到未登记的，可能要达2000万人以上。/113

【3－1－4】在过去几年中，我们的就业岗位增长速度是不慢的。1999年城镇就业人员总数新增796万人，2000年新增739万人，2001年新增789万人，2002年新增930万人。温总理说2003年政府目标是新增800万个就业岗位，这个目标实际上和过去我们每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员的平均数大概持平。/117

【3－1－5】在过去3年中，国有经济系统每年的就业总人数一直以每年以400万－500万的规模在减少。2000年时国有单位就业人数是8102万人，2001年减少到7640万人，2002年减少到7163万人。另外还有，城镇集体单位的就业人员总数也以每年200余万人的速度减少。2000年、2001年和2002年城镇集体单位就业人员总数分别是1499万人、1291万人和1122万人。这个趋势在今后一个不短的时期内还会持续下去。/118

【3－1－6】即使把下岗和一般失业人员都包括进去，我们的实际失业率也仍在可承受的范围内。2002年末时的城镇实际失业率不过5.71%。但最尖锐的矛盾不在“面”上，而在“点”上。在一些国企特别集中的老工业基地、过度依靠单一产业的资源型城市上。那里的实际失业率可能高达20%。在这样的地区，失业引起的社会矛盾极其尖锐。/121

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出正在加速 …… 123

【3－2－1】在整个“九五”计划期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一年比一年低。1996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是8.99%，2000年时这个指标下降到2.11%。“十五”期间的2001年和2002年，这种状况有所改善。这两年农民纯收入的增长速度分别是4.20%和4.76%。但这也只是恢复到1997年到1998年的增长水平。温总理着重指出，“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问题，第一是农业发展滞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这已经成为制约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因素”。/123

【3－2－2】启动农村市场和提高农民收入的主意特别简单。就四个字，“减少农民”。局限在农村、农业这个领域里，我们不可能根本解决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问题。农业技术进步所能导致的产出增长和生产率提高总是不断趋近于一个极限。农产品的需求有自然限度。这些特点决定，农民的增收就不可能依靠本产业的规模扩张来实现。这一点，不仅已经为经济学的理论所证明，而且也为各国的发展实践所普遍证明。/126

【3－2－3】生产率是社会走向富裕的物质基础。不断提高生产率，人们分享到的社会福利才能增加。一个农民种一亩地能打500斤粮食，两个农民种一亩地能打600斤。两个农民种一亩地的结果是生产率大幅度降低，农民的收入不可能有效增长。/128

【3－2－4】如果把我国的农业生产率提高到国际先进水平，需要多少农民就够了呢？不超过4000万人就够了。有学者说，中国的自然禀赋条件较差。考虑到这一层，6000万人也足够了。我们现在的农村劳动力有多少呢？2002年末的数字，我国乡村就业人总数为4.90亿人！/130

三、对就业岗位的竞争已经发展为国际化的竞争 … 133

【3－3－1】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左右周期内，即使世界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国际贸易总量不断扩张，世界范围内的就业岗位也几乎不能增长。哪个国家要想增加就业，就得争取把有限的存量岗位更多转移到本国国内来。在过去一段时期内，在我国面临的国际经贸争端中，贸易顺、逆差已经不是引起争端的最主要原因了。最主要原因是对“饭碗”的竞争。/133

【3－3－2】在当前的经济全球化竞争中，什么资源最稀缺？不是资本，不是技术，而是就业岗位。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内在含义之一，就在于中国正在参与到对全球有限就业岗位的竞争中去，让更多的就业岗位配置到中国来，流动到中国来，转移到中国来。/136

四、提问与讨论 …… 139

第四讲 中国结构战略 …… 149

一、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 152

【4-1-1】结构理论认为，过剩危机、萧条等都是结构性比例关系失调的结果；认为国民经济的规模扩张不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经济规模扩大，社会享受的福利资源不一定会增多；还认为，不断优化结构，人类才能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协调，才能实现人类经济系统与自然界之间关系的协调。/152

【4-1-2】计划经济造成的恶果不仅是短缺和比例失调，还有一个经济发展失去方向的大问题。80年代初期理论界讨论“生产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生产本身还是为了人民过好日子。现在看来连小孩子都懂的问题，那时要全国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们一本正经地去讨论才能弄明白。为什么呢？因为在传统理论中，为了发展生产而发展生产，为了发展生产而按比例，研究了半天，把人自己这个主体都给研究没了。/154

【4-1-3】了解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有两个方面认识不可缺少。一个是产业结构演变规律，另一个是产业政策。前一个是对客观趋势的总结，后一个是在认识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对经济发展过程的主动干预。要把握中国的结构战略，首先需要知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是怎样的；其次还要知道，对这样一个客观演进过程，人能在哪些方面发挥主观能动性。/156

【4-1-4】很多发达国家的省能结构、清洁型结构是建立在损人利己的基础上的，是靠把污染产业转移到别的国家来实现的。日本专门从中国买一次性筷子。由此带来，日本人用的一次性筷子砍的都是中国的树。我国铁合金生产发展很快，而且产品大部分还能出口。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刻意把铁合金这种高耗能、高污染的产品生产转移给了中国。/162

二、我国产业结构战略调整的主要方向 …… 164

【4-2-1】新型工业化道路“新”在何处？一是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二是要能够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减轻对自然资源

的依赖。三是要能够充分发挥我国的人力资源优势。四是要能够满足从生产扩张推动经济增长到需求扩大拉动经济增长这样一个转变的要求。五是要提高各种资源的配置效率。其中重点是要实现顺畅的产业退出。在一定意义上说，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主题就是新型的结构战略。/165

【4－2－2】从1998年到2002年，我们的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年均增长速度是12.4%。这个时期的工资增长速度也是从1979年以来各时期中最快的。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在2003年第一季度末时已经接近10万亿。和供大于求形势出现之前的1997年相比，翻了一番还多。也就是说，有支付能力的社会购买力是存在的。问题出在结构上。老百姓想买的没生产出来，市场上卖的老百姓不想买。这是我们面临的根本性问题。/166

【4－2－3】即使在市场“疲软”最严重的时候，餐饮业的增长始终没有“疲软”。从中我们受到一个启发。这个启发就是，在中国老百姓的收入中，已经可以有更多的部分用于购买劳务性产品了。人们为什么旅游？可以有很多答案，例如为了开阔眼界，为了联络亲情，为了锻炼身体，为了享受闲暇，为了调整身心等等。但是钱花给谁了呢？主要花在了为人们提供食、住、行方面服务的劳务产品上了。/168

【4－2－4】没有饮食文化传统的美国人现在跑到最有饮食文化传统的中国来开餐馆了。他们的诀窍何在？中国没汽车文化，但有儿童文化呀。麦当劳、肯德基就把自己社会文化的立足点转移到了儿童文化上，把他们的产品改造成了“儿童食品”。店堂摆放、家具、色彩都是适应儿童心理的，店员都戴着卡通形象的纸帽子。就连厕所都有专门给小孩子撒尿用的矮的小便池。就这么一招，就把中国的儿童给征服了。能把生意做到这样的文化精深之处，没有深厚的管理基础是不可能的。/171

【4－2－5】中国人有一句老话，“一分钱一分货”。外国人为什么把用得好好的“二手设备”卖给你呢？因为这个设备的技术寿命、市场寿命已经完结了。尽管自然寿命还没完结，但用这个设备造出来的产品一定在市场上没有竞争力。我国现在的钢产量是世界第一。但这么大的钢产量中，真正采用高端技术生

产的所占比重很小。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产业技术构成的低度化。/175

【4-2-6】美国《财富》杂志关于世界500强的排行榜中，中国的企业有12家榜上有名。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已经拥有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下这个判断恐怕还为时过早。因为世界500强中的其他488家之所以大，都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是市场力量导致的资源集中。唯有中国这12家并未经过市场的充分竞争"洗礼"。不论资产规模大，还是销售额大，都还只是人为合并的结果。/178

三、产业政策与资源优化配置 …… 181

【4-3-1】产业政策是市场经济下政府干预供给领域中资源配置的中、长期政策。这里面有几个关键词。一个是供给领域，不是宏观调控领域，不是收入分配领域。再一个是政府干预，不是政府包办，政府包办就成了计划经济了。第三个是中长期，不是一两年。产业政策主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促进重要战略产业的发展，二是协调国内外的产业竞争关系，三是推动产业结构的适时升级。/181

【4-3-2】产业政策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战略重点产业选择。战略重点产业不是仅仅按照重要程度来选的。如果有更多的资本在逐利动机驱动下涌入这个产业，这个产业就没必要当做"幼稚产业"来加以政策扶持。/184

【4-3-3】在一个供大于求的领域中，在市场机制、自发竞争不能导致一个良性结果时，就需要政府政策的介入。一个简单办法就是政府收购过剩生产能力。政府帮助私人资本、市场化的投资力量从过剩领域退出，全社会的总投资规模并不会减少。这比政府直接投资要好得多。因为市场化投资力量可以大大增加经济的竞争活力。/186

四、提问与讨论 …… 190

第五讲　中国资源战略 …… 201

一、我国自然矿产资源的基本状况 …… 204

【5－1－1】我国国民经济的战略发展有个心腹大患。这个心腹大患就是，我们所面临的资源约束比任何一个大国在工业化过程中所受到的约束都要大得多。从目前的勘探结果看，一个基本结论是，我国支持工业化的45种主要矿产品中有25种是严重短缺的。/204

【5－1－2】未来我们要用只能增长30%左右的能源来支持国民经济增长300%。在我国的一次能源构成中，煤炭占将近70%。在国际经验中，还没有一个大国是以煤为主力能源完成工业化的先例。别以为我们的煤很多。我国的人均煤炭资源占有量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略多，55%左右；只相当于美国的1/10。/209

【5－1－3】我们的石油资源人均储量是2.6吨，世界平均水平是23.5吨，美国是13.1吨；我国天然气资源的人均可采储量是1074立方米，世界平均水平是24796立方米，美国是16843立方米。也就是说，我国的人均石油资源占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1%左右；我国天然气资源的人均储量也只是世界平均水平4%左右。/210

【5－1－4】保守估计，到2010年时中国的石油需求量将达到3.2亿到3.5亿吨。也就是说，8到10年左右的周期内我国的石油需求中将有一半以上依靠进口才能满足。更远一些，2020年时中国的石油需要量可能要达4.5亿到5亿吨。那时我们每年至少要进口3亿吨石油。/212

二、世界石油市场上的基本竞争格局 …… 214

【5－2－1】一个相当明确的基本判断是，世界有油卖，中国有钱买。目前全世界的石油生产能力大约为33亿至34亿吨。即或考虑到中国以及整个亚洲的石油需求增长，世界石油生产能力仍是能够满足供应并且有余的。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世界石油市场供给增长的因素要明显多于需求增长的因素。/214

【5－2－2】现在我国有32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其实这意味着人家从我们这儿拉走了价值3200多亿美元的实物资源，然后给我们打了一张欠条。对国民经济发展真正有意义的不是欠条，

不是债权，而是实物资源。保险柜里锁着很多欠条，对发展我们的国民经济，提高我们的国民福利水平并没有什么直接的作用。/218

【5-2-3】过去几年中世界石油市场是被人操纵的。被什么人操纵呢？一个叫国际垄断资本，另一个大的国际资本集团是国际投机资本。过去几年来，国际油价巨幅波动的实质是什么呢？就是西方大国在力图利用市场化手段争夺资源控制权。/220

【5-2-4】威胁我国石油安全的首要因素不是战争，不是短缺，而是价格风险。国际油价的巨幅波动不仅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大的利益流失，而且已经给我国国民经济的稳定运行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在过去几年中，我们为扩大内需和维持经济增长速度付出了极大的政策代价。但这个政策代价在很大程度上被油价的反复波动抵消了。/223

【5-2-5】中国在伊拉克战争上的立场是什么样的？一条是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和发展，另一条是有利于中国的根本利益。什么是中国自己的根本利益呢？不管伊拉克的问题用什么样的办法解决，只要能尽快解除对伊拉克的封锁，让更多的伊拉克石油卖到国际市场中去，让国际油市的供给大规模增加，这就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224

三、中国能源及石油安全的战略设想 …… 227

【5-3-1】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历史留下了一个很大的技术遗憾。什么遗憾呢？就是电力和汽车这两样工业化的典型产品在技术上未能结合到一块儿。因为在他们的工业化过程中，油气资源没有成为机动车发展的“硬”约束条件。现在轮到中国人要开汽车、坐汽车了。但实现这样一个追求，注定我们得解决一个天大的难题，这就是能源问题。/227

【5-3-2】在未来20年甚至更长一些的周期内，我国的核电站应当保持一个不断递增的开工建设规模。这不仅是改善我国能源结构的需要，而且是改善我国在国际石油市场上谈判地位的需要。/232

【5-3-3】不论国民经济对石油的需求多么紧迫，我们也必须

建立自己的资源储备，封存一部分资源。煤炭、石油、天然气等石化能源的稀缺程度肯定会越来越高。稀缺程度不断提高，这些资源的市场价值就会越来越高。我们的眼光要长远，要顾及长远利益，这是尊重客观规律的一个选择。/233

【5－3－4】石油战略储备是一种政府行为，是政府出钱、财政出钱建立的储备，是一种应对重大国际政治、军事危机的政府储备。这个储备不是为应对国际市场油价波动风险建立的。石油石化企业不能指望依靠这种政府储备去调剂市场供求。实际上，石油战略储备是一种防御性的威慑力量。就像核武器，可能一辈子都不扔，但不能没有。/234

【5－3－5】我们也可以给石油安全买保险。到哪里去买呢？到国际石油期货市场去买。在期货市场上，一方面我们可以采取防守型的套期保值，锁定成本、规避风险。国际油价涨也好跌也好，我们的国民经济运行成本是一定的。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采取进攻型的不断高抛低吸，通过扩大交易量摊低成本和影响价格。/236

四、提问与讨论 …… 239

第六讲　中国区域战略 …… 249

一、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沿革 …… 252

【6－1－1】我国的区域战略，最生动、最富于变化，也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可以这样说，我们今天的发展成就，相当多是和区域战略的成功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比如特区经济的发展、沿海对外开放、上海浦东开发等。但相当多迄今存在的重大难题也和区域战略的不完善密切相关。比如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发展滞后、东西部发展差距拉大等。/252

【6－1－2】“梯度发展战略”突破了我国过去片面强调“均衡布局”的传统布局模式，使客观规律与实事求是成为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首要出发点。后来的经济发展证明，“七五”期间东部优先发展的战略为我们抓住了一个很重要的战略机会。没有当初沿海地区艰难起步的“三来一补”，我们今天根本就不会有机

会讨论“中国能否成为世界制造中心”这样的问题。/255

【6－1－3】积极财政政策和西部大开发的实施让西部地区获得了新的发展机会。我们到西部省区看看，那里的机场、高速公路、农村电网等设施相当多都是在“九五”期间兴建或者完善起来的。我国在90年代初期才有的第一条高速公路。现在西北、西南很多省区的高速公路的水平一点都不弱于东部。/258

二、当前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特点 …… 260

【6－2－1】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兴地富民”的关键是要有一个良性的区域产业结构。解决增长问题也好，解决地方财政增收问题也好，解决就业问题也好，解决城市化问题也好，不论本地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区域结构调整是一个核心。结构调整已经成为了各地战略选择中的共识。/261

【6－2－2】区域经济发展上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涌现出了一批经济发展异常迅速的所谓“副省级”城市。这个现象的出现并非是政策、战略有意为之，而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结果。“副省级”城市这个现象意味着我国区域经济中新的经济增长点和产业聚集核心正在形成。/263

【6－2－3】我们要努力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让西部人民看到一个变化。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一个相对明确的时间概念，叫做“争取十年内取得突破性进展”。在西部大开发中要逐步建立长期稳定的西部开发资金渠道，引导外资和国内资本参与西部开发；并且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在改革开放中走出一条加快发展的新路。/266

【6－2－4】在过去很长时期内，很多省、市的发展战略经常是只考虑我有什么优势。谁都说，要把自己建成“辐射”周边多少省、市、县的经济中心。这种战略看起来雄心、决心很大，但往往不切合实际，也不符合客观规律。市场经济就是分工经济。分工越发展，相互之间获取比较利益的程度就越大。近年来，我们很多地区都在实践中渐渐悟出了这个道理。我们生活中“珠三角”、“长三角”的说法，其实反映的都是区域性分工协作关系的形成。/272

【6－2－5】凭东北的资源和国民财富存量，摆脱困境、实现经济发展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东北的存量资源为什么不活跃？关键是被旧体制形成的一些经济关系束缚住了。理顺这些经济关系，资源就会在“看不见的手”的推动下流动起来，活跃起来。区域产业结构就会自动出现良性化的调整。市场化的力量、非公经济、中小企业就会自发地成长起来。被束缚的资源不能释放出来，新的体制力量就没有生长的余地。/276

三、城市化战略与城市经济再认识 …… 280

【6－3－1】在我国建国以来的发展过程中，在发展战略问题上，城市化战略是一个最摇摆不定的战略，也是教训最多的战略。一方面，我们在城市化上有很多不足；但另一方面，我们的很多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也来源于城市化。特区经济的始端就是建造了深圳这座现代化的城市。浦东开发也极大地带动了上海、华东、长江中下游以至全国经济的发展。我们今天之所以有机会讨论“珠三角”和“长三角”的优劣比较问题，应当说是得益于这两个城市的发展。/281

【6－3－2】关键问题并不在于是否有官员想往自己脸上“贴金”，而在于中国的城市应不应当推进城市面貌改造。城市改造得漂亮一点，通行效率高一点，环境美化一点，这是谁的福利增加了呢？是社会公众的福利增加了。让人民热爱自己的城市，为自己的城市感到骄傲，安居乐业于自己的城市，这有什么不好呢？我们迫切需要向现代化、国际化靠拢的城市。还用“先治坡、后治窝”的眼光、观念看待现在的城市化进程已经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了。/284

【6－3－3】城市功能分区就是城市的空间布局按照功能划分为若干区域。从我国目前的发展趋势看，新型政务区、商贸流通区、商务中心区、旅游区、居民居住小区等分区特征已经在各地的城市建设中明显显现出来。城市功能分区，城市的交通基础设施才能最经济地优化配置，城市的资源才能得到最优化的利用。/288

【6－3－4】在现代社会经济系统中，没有大中城市的分工组织作用，人们主观想象中的“城镇化”根本就不可能出现。在经

济全球化和中国入世的推动下，各地都需要有自己的能够直接与国际社会接轨的现代化“窗口”城市。大中型中心城市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配置重心。大城市结构调整和存量资源优化重组的要求要远比农村社区的城镇化改造更为迫切。/291

四、提问与讨论 …… 295

第七讲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 307

一、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小康” …… 310

【7－1－1】“全面小康”是一个具有极高政治智慧的提法，这个目标首先坚定地回答了来自“左”的诘难，坚决地否定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思潮。这个目标也同时坚定地堵死了右的政治倾向。我们要的是“全面的小康”，绝对不是两极分化的社会，绝对不是一小部分人占有社会绝大部分财富，而大多数人一无所有的社会。/310

【7－1－2】我国的确还存在着一个总数量不算小的未吃饱饭的人群。但我们让13亿人都吃饱饭的物质基础是已经实实在在地具备了。在前一个战略发展过程中，满足全社会实现温饱的供给能力我们的确是充分地具备了。/312

【7－1－3】经济学早就证明，人在基本的生存需要满足之后，还会有安全的需要、实现抱负的需要、为社会所承认的需要、享受的需要等很多层次。这些都属于发展的需要。发展的需要既有社会属性的需要，也有自然属性的需要。/319

【7－1－4】没有足够大的市场，没有足够快的需求增长，我们的国民经济“翻两番”目标就不可能实现。在既有的消费结构下，扩大内需的余地是极其有限的。一个明确的判断是，要形成支持我国20年经济增长的需求、市场，关键是要启动和扩张人们的发展需要。持续和不断扩大的需求潜力蕴藏于人们的发展需要之中。/320

二、全面小康社会是个什么样的社会 …… 323

【7-2-1】在我们今后的战略发展过程中，社会收入水平还会不断提高，人们在收入之外所享受的社会福利也会不断增加。但这已经不是评价社会富裕程度的最重要指标了。最重要的评价指标将是私人财富的累积程度。全面小康社会将是一个绝大多数人都有“产”的社会。/323

【7-2-2】什么叫资产呢？能够带来收益的财富才是资产。我们要想持续地扩大内需、扩张消费，就必须加快社会的私人财富累积速度。人们的“家底”越厚实，未来消费需求扩张的潜力就越大。人们谋求以钱生钱，在经济学上管这种现象叫做“私人财富的资本化”。“家庭财产普遍增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私人资产加速累积。/325

【7-2-3】大多数人都有“产”了，我们当然不能以人们有财产还是没有财产、财产的多少来区别人们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大多数人都有机会获取非劳动收入了，人们合法的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当然都应当受到保护；大多数人都有资产了，按照要素分配就是一项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分配方式。/326

【7-2-4】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个极为重要的论断，就是社会的经济关系总是在物质资料再生产过程中被同时地再生产出来的。大多数人有产，那么大多数人不断富裕的经济关系就将自动地被再生产出来。造就这样一个社会基础，我们才能真正实现繁荣昌盛和长治久安。/327

三、“全面小康”中“全面”的内涵何在 …… 329

【7-3-1】中国是一个大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工业化起步的时间还不长。由此造成，在我们目前的国民经济中还存在着诸多的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产业发展不平衡、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存在不平衡等。/329

【7-3-2】我们的工业化真正起步才不过20多年，在一个较快的发展区间内，当然就容易发生不断扩大的不平衡。这很符合规律。小孩子在十三四岁到十七八岁的长大过程中就经常是不平衡的。比如他的体力和他的身高不相称，生理成熟程度和心

理成熟程度不相称，肌肉和骨骼的发育不相称等。我们的国民经济就处在这样一个快速“长大”的过程中。/331

【7-3-3】缩小发展不平衡的差距，可以说是“全面小康”最重要的内涵之一。但要消除这些不平衡，可能需要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这远不是20年的发展周期能够办到的事。在未来20年左右的周期内，我们所能做到的，仍只能是使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逐步得到扭转。我们一定要对这样一个发展过程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有充分的估计。/332

四、提问与讨论 …… 335

第八讲　经济体制改革 …… 353

一、经济体制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 …… 356

【8-1-1】政府该干什么的问题直接涉及到政府的权力和利益。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要求，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就经济职能说，政府应当主要做好四件事。这四件事，一是建立公共财政框架，二是调控经济运行，三是维护经济运行秩序，四是承担转轨成本与完善社保体系。/356

【8-1-2】建立公共财政的制度框架，这其中的改革体现在哪里了呢？体现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建立公共财政的制度框架，就意味着政府不再以投资和形成国有产权为自己的基本职能。这项改革的推进是我们在深层次上与计划经济告别，与市场经济接轨的一个里程碑。/358

【8-1-3】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没有改革的具体思路。有些问题我们已经想得比较明白了，既知道如何改，也知道改革的方向是什么。但我们面临一个在过去一段时期中人们有意无意地回避，而且至今也没完全找到好办法的一个难题，这就是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转轨成本问题。/363

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 …… 366

【8-2-1】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最大变化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国有经济的基本存在形式将从“国有企业”转变为

"国有资本"。就经营性领域来说，意味着国有资产的基本形态将从实物形态转变为价值形态。/366

【8-2-2】在我们的传统理论、传统观念中，"国有"是和"资本"相对立的概念。资本是和私有制、和剥削相联系的概念，国有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国有经济所获取的收益仍然是归全社会劳动者所有的财富。国有经济的基本存在形式怎么能是"资本"呢？这个认识已经过时。因为国有资本同样是公有制经济的具体实现形式。/368

【8-2-3】市场经济发达与成熟的根本标志是产权作为交易对象加入到交换过程中来，即产权的市场化。产权的市场化才能使市场经济原则真正贯彻到社会经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唯有在产权高度市场化的条件下，资本与投资领域才能充分地实现相互优化选择或重组。/371

【8-2-4】在这样的改革方向上，新的人权、事权、资产权"三统一"，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应当管什么呢？最重要的，是把管理的落脚点从"管企业"上转到"管资产"上来。不在于管多少家企业，而在于管多少资产。不在于怎么搞好企业，而在于怎么配置好资产。/372

三、现代企业制度与法人治理结构 …… 377

【8-3-1】出资人是企业的主人，出资人的利益是企业第一位的利益。出资人的利益、职工利益、政府利益、银行利益、上下游利益，还有其他一些相关的外部利益，这些利益都是企业利益构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们得从这样一个利益构成中明确一条，谁的利益是第一位的。/377

【8-3-2】劳动者的确是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的主人。但是应当强调的是，不能把一个局部的劳动者群体说成是归全社会劳动者共同所有的国有资产的主人。不能要求归全社会劳动者共同所有的资产为一个局部劳动者的利益服务。那不是在维护国有资产，那是在损害、侵蚀国有资产。/381

【8-3-3】由于不同出资人的利益获取方式不一样，他们对企业的关心程度也不一样。怎么协调这个复杂的利益关系呢？就

要通过现代企业制度、法人治理结构来建立一个相互制衡的出资人关系。迄今我们在独立董事制度上赋予独立董事的职能，已经明显体现出这种努力。/382

【8-3-4】以董事长为首的董事会负责的是产权市场的竞争，而以总经理为首的经营班子面对的是产品市场的竞争。谁才有权力讨论产权方面的问题呢？股东会和股东会选出的董事会。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企业需要不断地调整自己的产权构成。/386

四、提问与讨论 …… 388

附　录　听陈淮博士谈向温家宝总理汇报 …… 398

后　记 …… 405

第1讲

历史的回顾与总结

LISHIDEHUIGUYUZONGJIE

我们书归正传。

我们还得从比较长的一个时期说起，很久很久以前。长到什么时候？长到“一千零一夜”。我们在座的学员，既然已经在读EMBA，我想都已经读过不少书，历经世事久矣。不管在商界还是各个方面，都已经摸爬滚打很多年。可能大家都对阿拉伯国家古老的“一千零一夜”故事耳熟能详。“一千零一夜”是一个古老的民间传说与文学的综合。其中有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有一个渔民从海里打上来一个瓶子。打开瓶子以后，从瓶子里出来一个魔鬼。这个魔鬼是很久很久以前被所罗门神镇在瓶子里的。魔鬼出来以后对渔民说：“我要杀了你，把你吃了。”渔民对他说：“是我把你从魔瓶里放出来，把你从所罗门手里救出来，你为什么反而要杀死我呢？”魔鬼说：“在我被关进瓶子的第一个五百年中，我发誓谁要救了我，我满足他一切愿望；在第二个五百年中，我发誓谁要救了我，我让他终身幸福；在第三个五百年中，我发誓谁要救了我，我就要把他杀死。你恰好在第三个五百年救了我，我就要把你杀死。”

当然，大家都熟知结尾，渔民用他的智慧，把魔鬼重新装回了瓶里。

200余年前，人类用自己的手从瓶子里放出来一个魔鬼。人类亲手放出的这个魔鬼叫做机器。

今天，我们这门课所要讨论的问题就是：人类在自己的理论和实践发展中能否最终把魔鬼重新装回瓶子。

1. 经济学的回顾与总结

☆ 我们所说的所有近、现代经济学理论，以及我们所要讨论的实践中所面临的经济发展难题，都是和工业化这个进程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 所有经济学研究的内容都不外乎两个方面：资源的优化组合、优化配置问题和社会利益关系的协调问题。

☆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创造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而且是制度研究的大家。

☆ 宏观经济学是专门研究市场经济下政府如何调整总量关系，也就是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平衡关系的学问。

☆ 增减税、发政府债、扩张或紧缩财政预算等就是财政政策，升降利率、扩张或紧缩货币发行、调整中央银行的准备金率等都是货币政策。

☆ 和宏观经济学对称的学问是微观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

☆ 经济学究竟有没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分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将贯穿我们这门课的始终。

【1－1－1】所有近、现代经济学理论，我们所要讨论的实践中所面临的经济发展难题，都是和工业化这个进程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工业化，我们用不着讨论失业、下岗、城市化、资源、可持续发展、基础设施、外来竞争、市场游戏规则、知识产权、WTO、政府公共职能等等一切问题；不必讨论为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总量与结构问题、宏观调控与微观主体问题；以及人类苦苦思索而不得其解的种种难题。

人类用机器生产的过程就是工业化的过程。以18世纪的英国产业革命为始端，人类开始大规模地制造机器。从此，“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业文明时代进入了工业文明时代。人类在18世纪60年代发明了纺织机；在18世纪80年代发明了蒸汽机；电力在19世纪30年代开始成为普遍应用的能源动力形

式。由此揭开了世界的工业化进程。

这样一个发展过程迄今并未完结。例如在90年代中后期的亚洲，东南亚的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南亚的印度，以及中国，都出现了一股新的电力建设高潮。实际上在过去一段时期内，在中国、印度、巴西等很多新兴国家中，钢铁、汽车等产业的发展都出现了新的一轮扩张态势。这个高潮，我们称之为第二次工业革命。

由此就引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话题。

我们所说的所有近、现代经济学理论，以及我们所要讨论的实践中所面临的经济发展难题，都是和工业化这个进程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工业化，我们用不着讨论失业、下岗、城市化、资源、可持续发展、基础设施、外来竞争、市场游戏规则、知识产权、WTO、政府公共职能等等一切问题。我们要讨论的，最多就像“杨乃武与小白菜”这样的冤案而已。最多就是拿一两银子买一条鱼吃这样的简单商品交换而已。我们不必讨论分工条件下的社会共同约定，以及这些约定下的种种矛盾；不必讨论为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总量与结构问题、宏观调控与微观主体问题；以及人类苦苦思索而不得的种种难题。

什么是工业化？工业化就是人用机器取代手工劳动的过程。工业化的定义很简单，并不复杂。工业化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就是大规模提高生产率。

那么，人们凭什么使生产力得以大规模提高呢？凭借的是一种工具。这种工具叫做机器。机器就是系统的工具。

我们不妨把工业化过程称为第二次“从猿到人”的发展过程。

【1－1－2】机器带来了生产率的成倍增长。面对仿佛在一夜之间从天而降的财富，在快乐、幻想与野心交织的社会背景下，从工业化初期开始，人们就致力于思考、分析这些财富的本质、财富的来源、财富的去向、财富的分配等问题，由此就诞生了我们称之为经济学的学问。

进化论已经证明，会用工具，并且是主动地制造和运用工具，是猿演变、进化为人类的关键。而运用系统的工具，是使人类从农业文明时代进入工业文明时代的关键。组合的工具、系统的工具就是机器。

人造出了机器。而机器带来了生产率的成倍增长，也造福于人类。人手的产物给人类带来了过去几千年向神、向上帝所企求的一切。同样的土地，同样的资源，同样的气候条件，同样的人口，为什么社会享受的福利水平会

大大提高？面对仿佛在一夜之间从天而降的财富，面对社会经济日新月异的发展及前所未有的技术创新，人们欣喜若狂，人们目瞪口呆，人们顶礼膜拜，人们憎恶诅咒，人们醉生梦死，人们踌躇满志。

就在这种快乐、幻想与野心交织的社会背景下，从工业化初期开始，人们就致力于思考、分析这些财富的本质、财富的来源、财富的去向、财富的分配等问题，由此就诞生了我们称之为经济学的学问。

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学呢？最早的经济学主要研究财富的本质及来源。由此就分为了两支。一支认为，财富是资本，或者说是物化的资本，也就是机器带来的。没有机器能有财富的大规模增加么？另一支认为，财富说到底是人创造的，是劳动创造的。没有人和人的劳动能造出机器么？这后一种就叫做“劳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最早起源。这个社会主义经济学以后又发展为对计划经济的设想，对公有制的设想，对按劳分配的设想。这是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实际上到今天，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已经大大向前发展了。我们所要研究的是在充分总结前人理论思考与实践经验基础上的、在我国改革开放实践中得到进一步深化的社会主义经济学。

实际上，社会主义与非社会主义的区分并非是经济学的唯一，或者说最重要的分类。今天我们所要研究的还有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管理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增长经济学以及最新的“转轨”经济学等。还有其他。我们还有机会慢慢地和大家一一的触及。

【1－1－3】无需讳言，我们现在还有太多的客观规律没有认识。别说机器最终将导致什么样的生产力，通货膨胀、通货紧缩这样一个在发达国家过去一百余年中不断往复、出现过多次，甚至导致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么一个矛盾，我们至今还处在一个初级的认识水平上。从 2002 年到 2003 年，关于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该不该淡出的问题，不是在媒体上时见尖锐的争论吗？

工业化给人类带来了发展，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很多前所未有的灾难。人学会了用机器，人类从此有了更大程度的分化、阶级对垒，以致到最后人们不得不试图用暴力革命的形式来推翻资本的统治。本来造福于人类，使人们吃得更好、穿得更好、过得更舒服的科学技术发展以及它的物化形式——机器，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呢？

一方面，人们在摆脱自然的束缚以及对自然的依赖。比如说，过去人们

要从北京到上海，那可费劲了，得走好几个月；快马加鞭，也得好几天。现在好，飞机只要一个小时四十分钟。但在摆脱自然束缚的同时，人们正在越来越多地陷人社会属性的束缚。你必须遵守太多的制度。过马路不走人行道，出交通事故你要负责任。开车不看红绿灯，警察拦着你就罚款。人们约定了种种束缚你的制度，你还必须服从。人们本来想有更大程度的自由。结果呢？工厂制度下的机器生产得三班倒。一家人中的两口子常年不见面，两人得互相留条。那也没有办法，人们必须服从机器的节奏，全世界的人都得按照机器的节奏运行。机器成为了人的统治者，人手的产物成为了人的统治者。

还不仅如此。一方面，机器使我们改造自然的力量大大增强。人类在大江大河上修起了大坝，把亿万年奔腾的大河拦起来蓄洪发电，调节水量，发展农业、渔业、航运等。但是后来发现，大坝修起来以后，下游严重沙化，自然生态链条被割断，由此造成了人类自身生存环境的严重恶化。人类的科学进步导致了很多自然生态的变异。昨天晚上，中央电视台播出，专家指出，SARS，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非典型性肺炎，到现在我们并不知道它是什么引起的。卫生部的官员明确说，在以往所知道的一切流行病的特征中，我们没找到与 SARS 病毒相同的。一个院士也明确地说，人们认为中西医结合疗效好，这只是一个说法。在减轻病人的症状上，中药有一定的作用。比如说头疼得不得了，给他吃副中药，头不那么疼了。症状上有疗效。但对治疗这个病本身，还没有证据证明它有效。如果大家细心去想，这些内容中有很多重要的信息。为什么这种病以前没有，现在有了？是工业文明、人类发展的又一个恶果吗？我们还不知道。现在人们的住房条件都改善了，装修水平也越来越高。大理石铺地板，挺豪华的，超五星级。结果住进去结婚后不生孩子，或者生下来也是残疾。一检查才发现大理石有放射性。原来所有的天然大理石都有放射性，只是多和少的区别。

科学进步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挑战。我们面对的工业化，就如同“一千零一夜”故事中所描述的，我们的手放出了一个魔鬼。我们现在正进行着一场征服与被征服的斗争。这场斗争至今还没有结束，如今这场斗争的发展方向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发展成为人们对技术、对生产力、对科学技术进步的一种“拜物教”观念。人手自己创造出来的，人自己征服不了它了，怕它了。最后说“你厉害，我服你。”这不是开玩笑。这种想法、这种社会观念相当普遍。这是一个从工业化诞生以来始终延绵不绝的认识。比如说，在早期的经济学中，人们认为财富从哪里来？就是机器带来的。人们相信机器可以凭空带来社会财富。物带来了物，和人没关系。这就是“拜物教”观念。在现代社会的文

化思潮中，哲学、经济学的各种流派非常活跃。但我们看到，包括在最发达的美国，好莱坞给我们拍的电影中，最受欢迎的是各种“星球大战”的“科幻”片。数字技术、智能模拟技术，最高的科技成就等变成了拯救人类的、人自身以外的一种异化力量。在这些影片中，人类已经自己救不了自己了，人间社会太黑暗了，充满了罪恶。怎么办？我们得靠有一天一个善意的机器人回来拯救人类。人开始崇拜自己的产物，人脑或人手的产物。问题还不在于好莱坞愿意拍，而在于很多人愿意看，愿意信。“拜物教”已经到了这种程度。这是一个极端，一个方向。

另一个方向是，坚信人类一定能够在工业化和此后的发展中不断地回归为把握自己命运的主人。无需讳言，我们现在还有太多的客观规律没有认识。别说机器最终将导致什么样的生产力，通货膨胀、通货紧缩这样一个在发达国家过去一百余年中不断往复、出现过多次，甚至导致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么一个矛盾，我们至今还处在一个初级的认识水平上。从 2002 年到 2003 年，关于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该不该淡出的问题，不是在媒体上时见尖锐争论吗？就像人类医学发展到可以换心、可以换血，可以造器官，但对流感这样一个没人能逃避的病，我们还远没有破解其秘密一样。但尽管如此，至少我们应该有一个信念：人类一定能够认识客观规律。人类的文明进步就是一个对客观规律从不认识到认识的发展过程，不断地接近客观规律的过程。我们没必要把一些我们不能够认识的现象神化为一种异己的外在力量。

【1-1-4】经济学是一门既简单又深奥的学科。近、现代经济学，不论它叫做环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所有经济学研究的内容都不外乎两个方面：资源的优化组合、优化配置问题和社会利益关系的协调问题。

我们今天这门课程所要解决的，就是想给大家解析一下历史的、现在的、未来的，从中国到外国的，从微观到宏观的经济领域里所发生的这些事，对这些矛盾冲突有一个大的框架式的描述。听完这门课，我希望你们觉得心里多少有点透亮，觉得这些事原来事出有因，有缘可循，原来都有个因果关系。原来奇怪的不奇怪了；原来觉得迷茫的地方，现在心里头有个基本估计、判断。我想这门课就达到了基本的目的。

我们刚才提到的，人类在工业化进程中遇到了种种挑战。这些挑战在发达国家走到后工业化阶段也仍然存在。在人们称之为 post - industrialization 的时代，或者说信息化时代，社会也没有摆脱掉这些基本的变异。

在工业化过程中，人们不再是凭借单个的、简单的、局部的力量来和机器对抗，而开始借助理性的工具，从大量现象中总结归纳那些普遍性难题，并且力图从中找出规律。人们学会了用抽象的、理性的办法来对待这些矛盾。

怎样把具有共性的东西总结归纳出来？怎样才能使人类走出虚幻的神化误区而走向科学？怎样才能把感性的认识上升到理性的认识？人们造就了一门学问。这门学问叫做经济学。在这门学问中，有了关于制度安排方面的一些差异和争论，就是我们所说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以及关于社会财富的分配、社会利益安排方面的社会主义与非社会主义的说法；以及如何实现优化的资源配置种种流派学说。

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多少人读过经济学，或者类似经济学的专业，或者虽然没学过但是对此感兴趣。不管你学过还是没学过经济学，谁能简明扼要的说一说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

经济学是一门既简单又深奥的学科。近、现代经济学，不论它叫做环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所有经济学研究的内容都不外乎两个方面：资源的优化组合、优化配置问题和社会利益关系的协调问题。

一个方面是资源的优化组合与优化配置。

我们是用计划的办法来实现社会资源在产业中的配置，还是用市场竞争、分散决策的办法来分配资源？这是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在企业中，是多用人，还是多用设备，什么样的比例关系可以使企业的成本最低、产出最大？在市场中，应当用什么样的办法和我的对手竞争？是把它吃掉最好，还是多占一点市场份额成本最低？这些问题都和资源的最优组合、最优配置联系在一块。

注意，经济学不研究赚钱。不是听了经济学以后，就能够成为一个高明的商人，在商战中无往而不胜，在股市上买什么股票什么股票涨，和人谈判就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那肯定办不到。经济学不研究这些。经济学首先研究的一条是有限的资源，特别是稀缺的资源的最优组合与最优配置。经济学研究的资源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源，着重研究的是稀缺资源的优化组合与配置的问题。

第二个方面是社会利益关系的协调问题。

人类社会中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利益群体。利益关系协调就是不让这些矛盾群体打起来，让他们的利益矛盾得到解决。

在我们的传统理论中，一种经济学认识是，最好的办法是让全社会只有一个利益。如果有别的利益产生，那就用征服的办法，用专政的办法来解决。

没有了利益区别，也就建立了一个大家都公平的社会，也就不用协调利益矛盾了。这就是“一大二公”的想法。不论对错，这是一个关于利益关系的经济学认识。在我们改革开放的今天，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以及其他形式的利益主体之间都存在着利益关系。可以说我们在改革中碰到的所有问题，没有一个不是和社会利益矛盾及其协调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1－1－5】现在很时髦的一个词叫做“制度安排”。其实所有制度安排的本质都不过是规范化的社会利益关系协调方式。人们找到一种能够使社会群体之间利益关系趋于协调的方式，然后就把它固化下来，形成社会共同的约定；并且把这个约定上升到规范的形式，这就叫做制度安排。

在上一届中央政府，2001年和2002年的一项重点工作是整顿市场经济秩序。2001年国务院专门发了一个关于整顿市场经济秩序的文件。在这个文件酝酿过程中，李岚清副总理曾召集了一个小型的研讨会。在这个会上我提出，我们市场秩序混乱的表现之一是假冒伪劣盛行。人们认为这很简单，政府直接严打就行。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很应当。市场经济应当是一个诚信的经济，应当是企业的竞争力不断提高、消费者利益得到保护的经济。大家对此都没有异议。但我们在深层次讨论的时候，就得考虑一个问题，中国的假冒伪劣为什么盛行？这可能有一百个理由。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城乡发展的严重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民就用造假冒伪劣的办法来反抗城市，用这个非正当的办法来分享城市经济发展的好处。就是说，假冒伪劣的背后是城乡矛盾的激化。简单的严打不能治本。北京周围有“浙江村”、“福建村”、“河南村”什么的，很多假冒伪劣产品出自于此。其他城市也有类似的情况。打击首恶可以，但打击面宽了，只会使城乡之间的利益矛盾进一步激化。闹不好会引起更尖锐的对抗。我们只是以这样一个例子说明，在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背后，都有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及其协调问题。

现在很时髦的一个词叫做“制度安排”。其实所有制度安排的本质都不过是规范化的社会利益关系协调方式。人们找到一种能够使社会群体之间利益关系趋于协调的方式，然后就把它固化下来，形成社会共同的约定；并且把这个约定上升到规范的形式，这就叫做制度安排。市场经济下等价交换，就是制度安排。这是在无数次的交换中形成的社会共同约定。劳动力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和社会所需要的就业岗位结合起来，这是一种制度安排，是人们的共同约定。所有的制度安排，政府该管什么与不该管什么，企业该怎样竞争，

成本该怎么计算，我们该怎样发展市场经济等，实际上背后都是协调某种利益与另一种利益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协调是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之一。

所有的经济学说到底，就是这两条。资源的优化组合与优化配置，社会利益关系的协调。我读了各种各样的经济学书，确实发现有的学者、博士在用谁都听不懂的话去诠释那些谁都懂的道理。其实用不着故弄玄虚。那么多门类，说到底就这么两条。

但要想把这两条弄明白，还真不容易。人类用了近200年时间，也还没有完全闹清楚。大家知道最近一些年有个词叫“新经济”。“新经济”不是一门新的经济学，而是美国经济发展中出现了一个现象，传统的宏观经济学中作为经典结论的“菲利普斯曲线”不能解释，经济学家们就把这种传统理论不能解释的现象姑且叫做“新经济”。就像医学家不能解释SARS病毒导致的肺部感染，就姑且把它叫做“非典型肺炎”一样。

大家可能听说过有个古典经济学。这个学派可以称为是近、现代经济学的开山鼻祖。这个学派是最早把工业化阶段普遍的经济现象加以总结归纳的，因而人们就称之为古典经济学。在此之前，对经济现象的解释都是零散的、个别的，未能把经济现象加以系统化的归纳。

从古典经济学起，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及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时代的经济学都在研究什么呢？它们也没有逃出上述的两个方面。只不过它们侧重于解释这么一个问题：在当时世界工业革命的初、中期，人们在努力地思考，为什么同样的土地，同样的资源，同样的气候条件，同样的人口，社会享受的福利资源会比农业社会多得多呢？财富为什么会比男耕女织的时代多得多呢？财富从哪里来的？谁创造出的？在这个争论中，古典经济学就从直觉、从逻辑意义上提出了最初的劳动价值论。说到底，一切财富的增值都是人创造出来的。没有人，机器、资本什么也造不出来。但古典经济学并没有解释财富的增值、壮大的本质，没有解释人与机器是如何结合到一块的。不过它最早提出了劳动价值论。这已经足以使之不朽了。

当然，古典经济学的贡献不只于此，它还提出了最初的世界贸易分工理论。打个比方，原来一个人又种田又织布。后来，他跟其他人商量，有人专耕田，有人专织布。这样，大家付出的还是那么多，但吃的、穿的反而更多了。这是为什么？是分工带来的。地域之间、国家之间、社会各个层面之间应该有一个分工。特别是，古典经济学还提出了一个我们今天的报纸上还经常说到，但常被错误引用的理论，比较优势理论。这也是古典经济学的贡献。“比较优势”不是说我哪里比别人强。有些媒体把中国劳动力比别国便宜称为我们的比较优势，这种理解不正确。比较优势的意思是，我什么都不如你，

你什么都比我强，是不是我们就不能分工了呢？那不一定。如果在食品方面弱国的差距比在钢铁方面的差距小，弱国可以专门生产食品，而强国负责生产钢铁。两国都可以在分工中受益。这好比一家两口子，男主人干什么都比女主人强，他出去干活挣的钱比女主人多，做饭也比女主人做得香。是不是做饭、挣钱都得男主人去干？不是，因为做饭方面差距小，这时就可以说，女主人在做饭上有比较优势。对弱势一方来说，在差距最小的那个分工领域拥有比较优势。在这个家庭中，可以由女主人做饭。也许饭不是很香，但男主人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挣更多的钱。家庭整体就受益了。用经济学的话说，男女主人这两个资源就得到了合理的配置。这就是“比较优势理论”。

[1-1-6]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来没说过暴力革命，从来没说过“一大二公”，从来没说过只有一个利益主体。尽管讲过消灭剥削者，让大多数人掌握财富。这种平等观，就叫做社会主义的平等观，叫做社会主义思想。在后来的实践发展中，资本主义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资本家努力让人们挣更多的钱。就是在这样的挑战性问题面前，经济学，包括社会主义经济学就有了发展。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我们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社会主义不再是消灭有产者，而是要让大多数人都有产。这就是辩证法。

古典经济学的贡献还有很多，我们不再去综述。在其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一步回答了与他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们的争论：到底是谁在机器文明下，把那么多的福利，那么多农业社会没有的财富带给了社会？和马克思同时代的人说，这是资本带来的，简单。因为钱生钱。马克思认为，这从哲学和逻辑上都说不通。钱是物，物怎么能生物呢？难道像我国维吾尔族民间故事里阿凡提的大锅能生小锅？这是一个很荒谬的说法，竟然被人们写入教科书，成为一种经济学理论。马克思认为，是人的活劳动创造了价值；是人的有意识、有理性的参与以及这种参与与自然资源的结合，才使社会财富有了新的源泉。自然资源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由此就创造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

当前，有些学者企图轻率地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经济学史上的地位，这是很荒谬的。例如，现在很多人喜欢说“制度安排”，给人一种印象，好像制度安排是一个新发现，好像唯此才是经济学研究的前沿。其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正是制度研究的大家。马克思经典著作叫做《资本论》。《资本论》三卷中处处讲的都是制度安排。比如说，劳动力转化为商品，资本的循环、周转与补偿，利息对利润的分割，级差地租等等。我这里只给大家简单

举例说明一下。

例如，在农业文明时代，人们种地时的产出和投入很容易比较。下了多少本钱，投入了多少肥料、工时；到年底时一共打了多少庄稼，一比一算就很清楚地可以看出这一年挣了多少。但到了机器文明时代看不清楚了。为什么呢？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机器不是一年就能用完的。钢铁厂、化工厂的设备、运输车辆起初投入很大，但可能能用二十年、三十年。那么当年的成本怎么算呢？怎么知道当年赚没赚钱呢？大家就有了一个制度安排。通过市场竞争的发展，社会就有了一个共同约定。这个约定叫做折旧。把固定资产的投入分摊到若干年的成本中。多摊少摊都不行。摊多了要么产品没竞争力，要么可能偷逃税；摊少了要么对竞争对手不公平，要么自己的再生产没法维持。大家共同约定，比如都按照三十年分摊设备成本。这就是折旧。折旧这种社会共同约定就是制度安排。折旧有很深厚的哲学道理。它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及与马克思同时代的人研究出来的，是一种制度安排。折旧这个任何企业管理者都知道的观念原来是一种社会共同约定。这就是经济学。我们今天讲的制度经济学其实并不新鲜，一百多年前人们就对制度安排有了论述。

再比如，土地的市场价格并不跟它的面积或者肥力完全吻合。在座的有没有房地产业的老板？房地产业的广告喜欢说自己的项目“升值潜力无限”。房子有越住越新的吗？不可能呀。不能越住越新怎么能够“升值潜力无限”呢？但人们从生活实践中知道，越住越旧的房子也确实有可能升值。譬如城市轻轨修到了这个小区的门口，这个小区的房子就升值了。这个道理何在？因为有“级差地租”的存在。级差地租从哪儿来？从社会的共同约定中来。社会公认在地铁站口的小区方便，于是就有更多的人想住在这里。这个小区的房子就变得稀缺了。供不应求怎么办？谁出价高卖给谁。这是社会共同约定的游戏规则。稀缺了，房子的市场价值就提高了。如此简单。生活常识中人人都懂的东西，要从理论上解释清楚并非那么容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此有清晰的回答。这就是级差地租理论。这个理论讲什么？讲的就是制度安排。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贡献还在于，它提出了一种研究方法，一种看待经济现象的思维角度。这就是辩证法。马克思说，资本家之所以拿出资本，就是想把它投入到经济活动中去带来增值，带来利润。办企业本质上就是为了获取利润。但千千万万的企业家们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导致了一个后果。大家都想比别人多挣钱，结果大家都少挣了钱。因为每个企业都为了多挣钱，不断发展技术，采用更先进的设备，产出更多的产品，就导致了供与

求的问题。供大于求，就得降价，而成本不变，所以利润率就下降。这个规律就是“平均利润率规律”和“利润率下降规律”。人们反复地打破平衡，创造出新的不平衡。这个规律与自然界的一些规律太像了。这就叫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讲的就是辩证法。迄今为止，实践反复证明他说的这个辩证法是对的。我们多年来以粮为纲，始终解决不了吃饭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不提以粮为纲了，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粮食过剩。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诞生于西方工业化的过程中，从观察工业化时代的现象入手，在理性归纳和总结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由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不可能不打上时代的烙印。马克思那个时代没有手机、没有信息化，也不懂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界之间关系等。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必然有它的局限性。

例如，马克思认为，只有土地是有限的，不能无限扩充；而矿产资源是无限多的，人们获取矿产资源的主要“瓶颈”只是资本积累、积聚的程度；只要有了充足的资本，总能采到矿产资源。但现在我们知道，即使有再多的钱，矿产资源也快挖不到了。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严重地摆在我们面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认为，空气和水是无需耗费资本的。但现在我们知道，原来空气和水也不是可以无限获得的，空气和水都不能白用。10年前，没人预计到矿泉水会卖得这么火，但现在矿泉水、纯净水卖得比牛奶还贵。说不定在“矿泉水”之后还得生产“矿泉气”。工业用水同样如此。以后我们还会接触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再比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广告纯粹是一种资本家的虚费行为，是一种制度缺陷。在计划经济年代，中国没广告，政府安排如何生产，如何消费，不必要做广告。现在我们知道了，广告业属于信息产业。没有信息的充分传播，就不能实现资源的充分优化配置。人的认识不断在深化，人也在不断突破自己原有认识的局限性。

不过有一点需要澄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来没说过暴力革命，从来没说过“一大二公”，从来没说过只有一个利益主体。尽管讲过消灭剥削者，让大多数人掌握财富。在马克思所观察的那个社会，大多数人是无产者，是劳动力，另一小部分人占有了绝大多数社会财富。马克思认为，这种现象不合理，应该由全社会成员公平地占有财富和生产资料。这种平等观，就叫做社会主义的平等观，叫做社会主义思想。这个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里贯穿始终。但是，在后来的实践发展中，资本主义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工业化在发达国家并非单纯表现为一方面是一无所有的积累，另一方面是资本的累积。20世纪前半期，经济学理论和资本家的实践都发现，如果不让大多数的

老百姓有更多的钱、更多的闲暇、更多的工资，生产的东西就会卖不出去。工业化造就了一个新的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持因素已经不是如何造出更好、更大的机器来，而是如何创造出更大的市场需求来。战后的一段时间，发达国家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主要视点就是，如何培育市场、造就市场、占领市场。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资本家努力让人们挣更多的钱。就是在这样的挑战性问题面前，经济学，包括社会主义经济学就有了发展。人们老说"三资企业"工资高。为什么？难道"三资企业"的老板就愿意给员工多发钱？不是。给员工多发钱才能给企业多赚钱。我们很多"国企"实行低工资。莫非低工资就是没剥削，高工资就是有剥削？我们这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的课所要回答的，就包括这样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有了很大的突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我们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了要按照劳动、资本、技术、管理要素的贡献分配；提出不以人们有资产还是没有资产来划分政治立场、政治态度，判断人们的先进与落后。什么是"全面的小康社会"？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大多数老百姓都有产的社会。闹了半天，社会主义不再是消灭有产者，而是要让大多数人都有产。这就是辩证法。这个问题我们以后还有一个专题要专门涉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历史结论可能会为新的实践所突破，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辩证法思想仍是我们回答现实问题的钥匙。

我们今天并不是单给大家讲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因为要讲，即使八个单元的时间全用上也不够。下面我们还回到最初的故事中来，看一看人类是怎样努力把魔鬼装回瓶子的。

前面说到，经济学主要研究两个问题，资源的优化组合、优化配置和社会利益关系的协调。机器的普遍运用、工业化导致了社会普遍分工。分工就要优化组合资源；分工就使社会利益关系复杂化，就需要协调。那么经济学解决了这两个问题没有呢？

【1－1－7】1929年，一场以全球性过剩为特征的大危机猝不及防地降临于世界，社会矛盾一下激化了。由此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人们认识到，如果供求之间的失衡程度严重到市场不能自动调节的地步时，得有一个外在力量来干预一下。这个外在力量就是政府。政府应当如何来调整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平衡关系呢？由此就诞生了宏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认为，政府的任务就应当是在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在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中，宏观经济学的诞生具有里程碑意义。

这里先解释一下“宏观”这个词儿。很多人以为，只要涉及到国民经济整体的事就叫宏观。其实不是。区域、结构、社会保障、资源保护、环境建设都涉及到全局，但都不是宏观经济问题。在经济学中，宏观专指总量关系。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是总量平衡问题。

什么叫总量关系呢？就是总供给跟总需求之间的平衡关系。人们早就发现，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是最基本的矛盾。但在工业化诞生以后的很长时间内，人们认为市场自发的力量足以自行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很长时间”有多长呢？有一百多年。一百多年中，也不是没人认识到供和求之间的矛盾会发展到激化的程度。计划经济的思想之所以诞生，就是因为注意到了这种矛盾激化的可能性。但是计划经济的思想遭到了同时代人的嘲笑。人们认为这是“杞人忧天”。东西多了，卖不出去了，生产者赚不到钱，不是就会自行缩减生产了吗？哪里用得着社会去事先、理性的控制呢？但是，客观规律很快就报复了人们的轻视、轻率。机器生产、工业化进程以全球性过剩危机的形式向人们展示了其力量。

大家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如何打起来的吗？20世纪之初，工业化给全球经济，特别是给那些最先使用机器的国家带来了一片繁荣。全世界都进入了一个不断膨胀的投资高潮。大家都以为财富就在眼前。但就在人们对未来充满极度乐观的氛围中，1929年，一场以全球性过剩为特征的大危机猝不及防地降临于世界。从1929到1933年间，全世界的发达国家都陷人了严重的萧条。一时间，过剩、供大于求导致了无数企业破产。在此基础上，社会矛盾一下激化了。原来在繁荣掩盖下的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宗教之间的矛盾一下子爆发了，由此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人们在总结这一惨痛教训的基础上认识到，市场机制原来并非总是万能的。由此人们想到，在供求之间的失衡程度严重到市场不能自动调节的地步时，得有一个外在力量来干预一下，别等酿成大祸再出来收拾。这个外在力量就是政府。政府应当如何来调整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平衡关系呢？由此就诞生了宏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这门学问是专门研究市场经济下政府如何调整总量关系，也就是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平衡关系的学问。宏观经济学不是自由竞争下的理论，是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但不是计划经济下的政府干预理论，而是市场经济下的政府干预理论。政府不干预别的，只干预总量关系下的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关系。这门学问就叫做宏观经济学。也由此生出，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平衡形势才叫宏观经济形势，我们所熟悉的“通货膨胀”、“通货紧缩”指的就是这种形势。调整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关系的

政策才叫宏观经济政策。我们所熟悉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就是这种宏观调控政策。

宏观经济学发现了一个基本规律。每当人们对未来预期充满信心并且过度乐观时，尽管投资高涨，就业率也在上升，但通货膨胀的危险可能正在悄然而至。因为人们都对未来充满希望，都在以币求货，不办工厂也要买房子。因为人们相信，今天的房价一定比明天便宜。全社会的人都努力以币求货，价格就会膨胀，货币就会贬值。这就是通货膨胀。假如有一天，人们都对未来充满悲观的预期，人人都心灰意懒，忐忑不安，全社会的人都在努力地以货求币，那物价就会紧缩，货币就会升值。这就是通货紧缩。日本过去的11年里，有9年多的时间是零利率，借钱不要利息，但不要利息也没人借。为什么呢？因为今天贷款投资，明天实物资产就贬值。通货紧缩时人们对前途没信心，投资也就相应紧缩，从而失业率也就上升。宏观经济学说什么呢？说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总是一个此长彼消的“跷跷板”关系，政府的任务就应当是在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通货膨胀率太高了，物价飞涨，社会不能忍受，老百姓抱怨了，政府得想办法压低一点通货膨胀率。通货膨胀率下来了，经济疲软了，失业率又上升了，社会又可能出现新的危机了，政府就需要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手段，刺激经济，提高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促进经济的景气膨胀。

宏观经济学说复杂也复杂，教科书有无数个版本；说简单也简单，讲的就是政府干预经济，而且就是干预总量关系这件事。宏观经济学认为，政府不用管别的，连结构也不要管，就管好总量平衡，具体说就是调整好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平衡关系，别让哪头太高就行。2000年5月美国的纳斯达克指数涨到了5400点，格林斯潘所做的事就是让美联储不断升息，收紧经济；美国“9·11事件”后就是让美联储不断降息，刺激经济。他就是在干这件事。我国过去几年中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等也是在干这件事。

那什么是财政政策、什么是货币政策呢？增减税、发政府债、扩张或紧缩财政预算等就是财政政策，升降利率、扩张或紧缩货币发行、调整中央银行的准备金率等都是货币政策。

【1－1－8】微观经济学专门研究企业内部的资源如何实现最优化的组合。要素之间可以互相替代，究竟用人还是用机器？要说服消费者，并且还要战胜竞争对手，要想多卖就必须卖得便宜。什么样的规模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呢？什么情况下才能够实现一个最好的组合呢？微观经济学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可以定量化分析的方法。

和宏观经济学对称的学问是微观经济学，专门研究企业内部的资源如何实现最优化的组合。比如投资1000万，建成一条生产线，不管生产鞋子还是空调，各种生产要素之间有个替代关系。可以用人，也可以用机器；可以用人工控制，也可以采用智能模拟控制；可以用监工监视，也可以用录像机监视工人干活。例如前不久互联网上报道，广州的一个不良老板居然在女厕所里都装上了摄像机，被人给发现了。要素之间可以互相替代，那么究竟用10个人还是9个人，用人还是用机器？微观经济学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可以定量化分析的方法。例如边际收益分析方法。比如说，多用1个人，需要多付20元工资，但这20元可以带来1元的利润增长；后来又增加一个人，又多花20块，又带来0.8元利润增长；再继续增加1个工人，又带来0.5元利润增长。假定原来的平均水平是人均创0.5元利润，当增加到第六个人的时候，带来0.5元利润；第七个人时，只能增加0.45元的利润，则不应当再雇佣第七个人。因为增加这个人会把平均利润水平拉低。这就叫“边际收益分析方法”。这个方法寻求企业中最优化的规模和最优化的要素组合。

不仅有观察企业的内部资源如何优化的方法，还有把企业外部的市场因素结合起来寻求最优化的方法。例如“量、本、利分析方法”。这个“量、本、利”指的是产量、成本、利润。企业要想多赚钱，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多生产。但生产得多了就得降价。便宜才能卖出更多的东西。市场经济有个客观规律：价格低就卖得多，价格高就卖得少。如果用坐标图来表示，以销售量作为一条横轴，价格作为一条纵轴的话，则价格越高，销售量越小；价格越低，销售量越大，由此形成为一条由左上角向右下角倾斜的曲线。这条曲线叫做需求曲线，或者叫价格—销售量曲线。这条曲线表达了一个市场定价的普遍规律。要说服消费者，并且还要战胜竞争对手，要想多卖就必须卖得便宜。但价格低了，单位产品的利润就小了。什么样的规模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呢？什么情况下才能够实现一个最好的组合呢？这就要用到“量、本、利分析方法”。

宏观经济学还有一门对称的学问，叫产业经济学，专门研究产业发展和产业间的构成关系问题。产业间的构成关系也与工业化过程密切相连。因为产业间的构成关系问题，说到底就是分工问题，就是资源在各领域中的优化配置问题，就是社会各局部环节的供求平衡问题。宏观经济学研究总量，产业经济学研究结构。

宏观经济学是美国人发明的。美国人认为，市场经济下不用研究结构与产业的问题。那些问题留给市场的自发力量，留给竞争去解决就行了。政府只要关注总量平衡关系就足够了。

产业经济学是日本人发明的。日本人认为，要是照美国人设计的模式发展，日本永远也不可能赶超美国。因为美欧国家把最挣钱的行当都给占了，给日本剩下的都是那些不挣钱的产业了。那怎么办？非得在自己的产业发展和产业构成上另谋他途才行。“不怕千招儿会，就怕一招儿绝”。日本就得培育出自己的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产业，还得占领国际市场上最有利的分工领域。由此，以产业政策为核心的产业经济学就诞生了。

产业经济学不仅研究产业及产业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研究政府如何在市场经济下保护、扶持产业，实现经济赶超。我们前一段常听说的产业培育、产业保护、产业政策、产业结构升级等名词概念都是出自产业经济学。日本在战后发展成为了世界一流的经济强国，产业经济学的理论指导功不可没。

美国一向不承认自己有产业政策。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作客座研究员时，美国教授说你干嘛来了？我说我来研究美国产业政策。美国教授说那你现在就可以回去了，产业政策是日本人编出来的鬼话，美国没这项政策。但事实上美国不但有产业政策，而且这方面政策还有越来越厉害的趋势。大家知道，中美关于中国“入世”时的双边谈判中讨价还价最厉害的就是农产品问题，那个讨价还价就是美国为自己的农业寻求更大市场的政策。2002 年美国实施了一个“201 条款”，对进口钢材加征特别关税。“201 条款”是什么？是赤裸裸的产业保护政策。2001 年 5 月，美国的布什总统上台就宣布了一个“New Energy Plan”，就是所谓“新能源计划”。这也是产业政策。关于产业经济学，我们在后面的结构战略专题中还要专门涉及。

人们在追求资源优化配置、优化组合的过程中越来越多地运用了定量化的方法。这种定量化的方法也延伸到了结构研究中，由此就诞生了投入产出经济学，又叫投入产出法。

投入产出法是前苏联一个叫列昂节夫的经济学家发明的，还因此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投入产出分析方法是把各产业，例如钢铁、煤炭、石油、化工、纺织、机械等等产业之间的相互消耗关系列成一个矩阵，用行列式的办法，找出它们之间相互依存的数量联系。然后根据这个依存关系，既可以计算出资源的最优化方案，例如有限的矿产、土地、劳动力资源下怎样配置才能实现国民经济的总产出最大；也可以模拟预测未来经济发展的前景，例如特定投资、进口等增长情况下国民经济可实现的增长速度等。

投入产出法有两个最基本的概念，一个叫直接消耗系数，另一个叫间接消耗系数。直接消耗系数写作 a_{ij}，它表示国民经济中第 j 个产业每增加一个单位产出量所引起的对第 i 个产业的直接需求增长情况。例如每增加一吨钢可能得多消耗多少度电。间接消耗系数写作 b_{ij}，它表示国民经济中第 j 个产

业每增加一个单位产出量所引起的对第i个产业的间接需求增长情况。例如，炼钢不仅直接消耗电，还得消耗焦炭、生铁等，而生产焦炭、生铁又得消耗电。生产焦炭、生铁等所消耗的电力就是炼钢的间接消耗。每多炼一吨钢所要消耗的电力还得考虑间接消耗。直接消耗加间接消耗就是炼钢的完全消耗。把所有的消耗系数按一定规则排列起来，就可以得到一张非常有价值的表。这就是国民经济投入产出表。例如我们可以据此推算出，如果钢产量下年增加1千万吨，将会引起多大的能源需求。投入产出法以后成为世界各国分析资源如何利用，如何使有限的资本得到最大的产出的重要方法。

随着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化，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的分支也越来越多。例如，在和自然界的关系方面有了环境经济学，专门研究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和自然界之间关系的协调问题。在社会经济关系的规范化方面有了制度经济学，以及经济法学。制度经济学专门研究制度安排。比如我们当前面临的市场经济秩序问题，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关系问题，资本市场的规范运行问题等。什么样的公司可以进入股票市场融资？应该有个规矩，有个社会共同认可的标准。不管什么公司，都只能有一个标准，就是是否符合市场经济下的社会共同约定，也就是是否符合上市的标准。这个标准不应当按照民企还是国企的所有制性质来决定。这就是制度安排。股票期权激励制度也是一种制度安排。此外，还有专门研究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规律以及经济周期的增长经济学，有专门研究发展中国家推进工业化和实现经济赶超的发展经济学。近年来还出现了一个新领域，叫做“转轨经济学”，专门研究计划体制下的国民经济如何向市场经济转变。

【1-1-9】邓小平同志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我认为邓小平实在是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他用了两句最朴实无华、最通俗易懂的话，就把人们争论了上百年的很尖锐、很深刻的问题给总结了。我们就要循着这样一条思路向前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学。也许我们现在的回答还不完整，但这个思路不能变。什么思路呢？一是老百姓过好日子，二是市场经济。

在经济学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人类不再只依靠个人力量、分散的力量来与自然力抗衡，也不再依靠感性的认识、局部的经验通过“试错”的方式来寻找发展之路。人们逐步学会了利用理性的、积极的、有组织的力量，社会的力量、技术的力量来顺应规律。由此人类正在获得越来越大的自由。但另一方面，对规律的探索又导致了人们在意识形态上的严重冲突。在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就有了两个曾经尖锐对立的归类。一个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

义，一个叫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这个对立甚至导致了国家、民族之间的对抗，导致了冷战，导致了很长时间内世界的不安定。这里我们不去回溯这个过程。

同学们肯定会问道，我们这门课叫做“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那么什么叫“社会主义”呢？经济学究竟有没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分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将贯穿我们这门课的始终。这里我们只提出邓小平同志的两句话。一句话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另一句话是“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在一定意义上说，我认为邓小平实在是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他用了两句最朴实无华、最通俗易懂的话，就把人们争论了上百年的很尖锐、很深刻的问题给总结了。他揭去了人类上百年争论的一个标签，提出一个新的思路。谁规定了非此即彼的楚河汉界？没有。人类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没有止境。我们就要循着这样一条思路向前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学。也许我们现在的回答还不完整，但这个思路不能变。什么思路呢？一是老百姓过好日子，二是市场经济。

2. 管理学的回顾与总结

☆ 科学管理理论一方面极大地提高了人和机器的配合与协调程度，但另一方面又存在着“拿人不当人”的重大缺陷。

☆ 50年代后期管理革命的最大贡献在于把系统化、最优化的思想运用到了管理中。

☆ 管理与技术要素的资本化出现以后，企业支配权的构成、影响企业行为的企业利益构成都发生了明显变化。

☆ 如果说，新形势下我们的改革中有什么创新，这种对管理要素、技术要素资本化趋势的认同就是最大的创新之一。

【1-2-1】在工业化阶段，人类实际面临着这样的悖论。想不想提高生产率，想不想要更多的福利？想要。想要就得付出代价。非人化就是代价。很多人以为市场经济下的资源配置机制就是自由竞争，其实不是，即或是完全的市场经济下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资源配置机制。在工厂围墙外是自由竞争，在工厂围墙内只有指挥与服从。否定人性的流水线理论和实践是谁发明和实施的呢？正是美国人。人性的最终回归一直要到生产力发展到人类能够控制的程度，才能够彻底解决。

下面我们说到与管理学院、与EMBA相关性更大的管理学。

经济学与管理学并不是一回事。人们经常把它们放在一块儿，叫做经济管理。其实经济学和管理学是完全不同的两块。尽管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经济活动，但是它并不等同于经济学。

管理学的发展也是和工业化进程、和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化、和技术的不断发展密切联系在一块的。人类在和机器抗争的过程中，在经济学之外还找到了另外一个武器，这就是管理学。

管理学的发展过程也经历过若干阶段。早期的企业管理是以工厂主个人的、分散的、个别的经验为主的。企业主以个人对市场的认识来组织生产、

采购原料；以个人对技术的了解程度来决定采用什么样的设备或工艺；根据个人对工人的认识来安排劳动力。

系统的管理理论产生得相当晚。在工业革命一百多年以后，直到20世纪初，这种分散的、依赖于个别经验管理方式已经不能适合生产发展的要求，市场竞争的要求，以及机器本身不断精密化、大型化的要求时，真正可以称之为理论的管理学才诞生出来。

第一次管理理论的突破发生20世纪初的美国。此前工业化过程中的重大发明，例如纺织机、电力、铁路等都没有美国人什么功劳。美国人对工业化的第一个贡献就表现为管理方面的革命，人们后来把美国人在这个阶段发明的管理理论称之为科学管理理论。

美国人此时发明的管理理论之所以被称之为“科学管理理论”，并不是说它最科学，最接近真理。而是因为它第一次在管理中强调客观依据，而不是人的主观感觉、主观认识、主观经验。

科学管理理论是怎样强调客观依据的呢？比如说，流水线生产是美国人发明的。流水线要把各个生产工序组合起来，形成为一个协调的生产过程，就需要决定一个劳动力一天能生产多少零件，一个工序一天应该有多大的产出。这就是定额。而定额又是怎样确定出来的呢？不是依据老板的经验，工头的估计。这些都不可靠。甚至也不依靠过去的生产记录。因为生产记录也只是一种经验数据。有个叫做泰勒的美国人提出，定额应当通过试验确定。那时电影已经发明。泰勒把工人的劳动动作拍成电影，然后分析、分解这些动作，优化动作程序，去掉多余的动作。通过不断总结以后形成一套程序化的操作，然后按照这个操作所需时间确定定额。这就是定额制的管理，也叫泰勒制。

泰勒制的贡献就在于强调定额要通过客观的试验来确定，并且强调以定额为基本管理参数。人们根据这样一个基本的管理参数或参数系统来组合生产，并把这种管理从一个工序发展到了工序的集合，即流水线。定额制大大提高了机器的效率和劳动生产率。在那个时候，工厂的生产扩张速度决定着国民经济的扩张速度，工厂的效率就决定着国民经济的运行效率。可以说，管理好国民经济的关键就是管理好工厂，管理好生产。这个管理革命使美国的工业化迅速超过了比它早一百多年的欧洲大陆，美国也很快成长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国家。

应该说，泰勒制、定额、流水线的发明是对工业化的一大贡献。与这一套相应的，就形成了一种严密的工厂制度。泰勒制科学管理的发明，一方面极大地提高了人和机器的配合与协调程度，提高了生产效率；但它也进一步

的把人与机器的关系、人类社会与工业化的关系推向了异化的领域。

什么叫“异化”呢？就是人想支配的东西反过来支配了人。人发明了机器，本来是想扩大自己的支配力，但结果是人反而被机器所支配。在工厂制度、流水线下，人成了机器的奴隶。泰勒制一方面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又存在着一个重大的缺陷。什么缺陷呢？就是非人化。用中国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拿人不当人。

为什么说拿人不当人呢？机器本来是人手的延伸。但当泰勒制和严密的工厂制度实施之后，人变成了机器的延伸。人的节奏必须全面地服从机器的运转节奏。机器从最初一分钟到最后一分钟都不会疲劳，但人会疲劳。人有男女老少、有喜怒哀乐、有身体状况适应还是不适应。但机器不管。流水线上完全否定了人的生理、精神上的差别，否认人的创造性、主观能动性。一旦上班来，人必须按照机器的节奏工作，其他一概不考虑。不管如何没有人性，大家都得昼夜三班倒。人变成了机器的延伸和机器的附属物。大家可能看过卓别林主演的《摩登时代》。它反映的就是当时管理理论发展之后，一方面造成了美国的大机器工业和规模生产发展的情形，另一方面又反映了机器对人的统治和支配。在这种制度下，人已经不是自己了，已经变成了物的奴隶。这就叫异化。

在工业化阶段，人类实际面临着这样的悖论。想不想提高生产率，想不想要更多的福利？想要。想要就得付出代价。非人化就是代价。很多人以为市场经济下的资源配置机制就是自由竞争。其实不是。即或是完全的市场经济下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资源配置机制。在工厂围墙外是自由竞争，在工厂围墙内只有指挥与服从。推进工业化就得建工厂，建工厂就得有工厂制度。进了工厂的大门就没有了讨价还价的余地。工人得听工段长的，工段长听车间主任的，车间主任听调度、厂长的。制度严格，没有商量和讨价还价的余地。这道理即深奥又浅显，既简单又复杂。工厂的大门就是界限。大门以外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资源的配置通过竞争实现。东西贵了就不买，便宜了才买。甲地贵就到乙地去买。每个人都可以自主决策。但工厂大门里则不适用市场经济的一切原则，只适用工厂制度下的原则。工厂之内的资源是如何配置的呢？是通过权威、纪律、指挥与服从的关系来实现的。若不服从，就得离开工作岗位，站到一边去。操作工必须遵守生产规则，不遵守，就可能出事故，甚至大事故。比如在化工厂，不像我们在学院里，楼道里不可以抽烟，楼道外面可以抽；化工厂里到处都不能抽烟，空气里弥漫的都是可燃气体，一按打火机就可能闯下弥天大祸。制度成了工厂里的统治者，机器成了工厂制度的核心。

我很想有机会跟美国总统和美国人民讲点管理理论的发展史。他们现在比较喜欢讲人权。其实对人权的否定正是工业革命带来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难题。在工业化过程中，如果不讲“唐人街”上奴隶制的缝衣厂或旧中国的“包身工”等特殊情况，能够和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相容的非人化莫过于流水线。而流水线的理论和实践是谁发明和实施的呢？正是美国人。人性的最终回归一直要到生产力发展到人类能够控制的程度，才能够彻底解决。

当然，管理理论并没有停留在这个非人化的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起，世界又出现了管理理论的第二次革命。战后，日本是如何实现了经济赶超的呢？有两个原因：一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产业经济学、产业政策的理论创造。二是日本发动了第二次管理革命。

第二次管理革命当然不能全归功于日本。但是，是日本最全面、最系统的提出了一系列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改革。日本的管理革命体现在哪里？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人的主动参与，二是强调系统化和优化。

日本人认为，人是有主观能动性，有创造性、有喜怒哀乐的。尊重人、尊重人性，让人有主动参与的积极性，从而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的效率。于是就产生了日本的“管理参与制”、“终身雇佣制”以及相类似的制度。

与此同时，管理理论还发展起了一门重要的学问，叫做组织行为学（Management Behavior），其实就是管理心理学。专门研究人在劳动过程中的心理，研究到了很细致的程度。比如说，日本企业里是等级很森严的。部长可以打课长的嘴巴子，课长可以踢职员的腿肚子。这当然会造成人员的不愉快。怎么办呢？一方面不能否定这种等级制度。因为等级有助于提高效率，避免无休止的争论。但另一方面下级不愉快影响效率怎么办？日本人想出了一个办法。比如部长对待下级很严厉，就做一个和部长一模一样的橡皮人，和这个部长穿一样的西装，打一样的领带。谁对部长不满，可以在上班前踹那个橡皮人一顿泄泄气。心里平衡了，再回到岗位上继续工作。日本企业还有一个传统，叫做“社内旅行”。日本的公司叫会社。大家一起去游玩，然后喝点酒。下级借酒可以痛骂上司一顿，以此来协调上下级之间的关系。

当然管理心理学并非就是这些小动作、小游戏。它是一门很复杂、很精密的学问。管理心理学确实解决了前期管理理论中的重大缺陷。它的最大贡献就是强调把每个人都当人看待。看大门的可以向总经理提建议。上司在员工过生日时要送礼物什么的。在一定意义上说，也就是我们最近常说的“以人为本”。

日本管理革命的最大贡献在于把系统化、最优化的思想运用到了管理中。什么是系统化的思想呢？整体不等于各个部分的简单相加就是系统思想。日本管理理论提出，企业内部的每一个环节都是相互关联的，每一个局部的效率都会影响着整体的效率。由此就诞生了大家都很熟悉的“全面质量管理”、“全面成本管理”、“价值工程”、“看板管理”等很多管理技术、管理理论。

“全面质量管理”是日本人最先提出来。“全面”就是系统的思想。日本人提出，好的产品质量不是靠检验环节检出来的。质量问题也不是每一个环节都派监工就能解决好的。实际上从原料的采购，到仓储、运输、生产到最后包装，每一道环节都和产品的质量形成有关系。只有把产品形成的整个过程管起来，才能够造出真正具有完美质量的产品来。好的产品不是靠检验检出来的，而是靠高质量的生产过程生产出来的。于是就有了全过程、全员、全要素管理的“全面质量管理”。把过程的所有环节都管起来，这就是所谓系统化的管理思想。“全面质量管理”、“全面成本管理”都是追求这么一种系统化管理目标的理论。整体不等于局部的简单相加，每一个局部活动的质量都会影响整体的质量，每一个局部环节的效率都会影响整体的效率。这种认识就叫系统理论、系统思想。

中国古代早就有“田忌赛马”的故事，讲的就是系统论思想。这里顺便给大家讲个用系统理论认识、判断形势的例子。美国攻打伊拉克时，许多专家给国务院写信，认为应该增加我们的石油储备。而我们向中央提出，中国的确应当增加自己的石油储备，但不是现在，我们应当待机而动。为什么呢？因为整个世界是个系统。到今天为止，美国攻打伊拉克总共才22天，但这件事已经渲染了一年多了。在这一年多中，许多石油出口国、进口国都在大量存油。大家都存油，我们就需要客观评价这种风险，也许我们用不着存太多的油。至少短期内在油价高位时不需要出手太快。实践证明，战争一打响，国际油价立马就大幅下跌了。这个判断就是立足于系统论的认识。不是单独考虑一个局部，而是根据全局，根据各个局部之间的相关性来决策。世人都知道“诸葛一生唯谨慎”，所以他可以在兵临城下时施“空城计”。虚虚实实才是安全。

日本的管理创新不仅追求系统化，而且还追求最优化。优化的思想也给管理理论带来了极大的飞跃。很多人以为产品的质量总是越高越好。其实不是。日本的管理学家认为，有时候降低产品质量也是对的。为什么要降低质量呢？因为质量也会过剩，而没有一种质量是不需要成本的。提高质量的过程也就是增加成本的过程。多加一个检验员就得多发一份工资，好的材料就

比差的材料贵，经久耐用的产品一定是要有代价的。如果产品质量存在着过剩，那么消费者就要为这个并不需要的质量多支付代价，社会就要多浪费资源，企业的竞争力也会因为过剩质量导致的高价格而受到影响。于是日本人就发明了一种新的管理方式，叫做“价值工程”，就是专门评价一个产品，把多余的功能去掉。人们穿皮鞋需要鞋底过于结实吗？不需要。因为鞋面坏了人们就会把它扔掉，鞋底就不需要做得那么结实。可以少用些橡胶或者用质量差一些的橡胶。一个汽车由发动机总成、变速箱总成、仪表总成、传动轴总成以及内饰、座椅等许多部件组成。我们可以以发动机的寿命为限，把外壳的寿命降低点。没必要让外壳20年不坏。只要发动机坏的时候，外壳也坏得差不多就行了。板材、油漆、加工工艺都按照这个标准选择就行。其他部件也都按照发动机的寿命标准设计，不高于它，也不低于它，就可以了。前些年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比较穷，买不起新车，只能买几百美元的二手车。那时的中国留学生都知道，日本车不能买，不是因为日本车质量不好，而是因为日本车在超出设计寿命周期以后所有的部件就都已经坏得差不多了，几乎完全没有修的价值。

相反地，一台机器的180个部件中，有179个的寿命是三年，唯独一个部件的寿命是2年；那我们只要提高这一个部件的寿命就可以大大提高产品的耐用程度。价值工程就研究这些。研究怎样在保证必要质量的基础上让成本下降。

由于去掉了多余的质量、多余的功能，产品成本自然会大幅度下降，由此带动了日本产品的价格不断下降而市场份额大幅度上升。80年代末我从日本回国。那时国内家电还很少，都需要从国外带来，并且免税。大家都认为买一个家电就要能用一辈子。那时流行买录像机。买一个只能放像的放像机只需要170美金，但如果买一个全制式的、有很多功能的录像机大约需要460多美金。当时认为，功能当然是越多越好，就买了最贵的。但是我回来迄今十余年，就连放录像功能也没用到10次以上，剩下的功能根本就没用过。显然花了冤枉钱。傻瓜相机是怎么发明的？就是因为日本人注意到，很多人出门照相只为留念，并不要求有太高的精确度，而且相机的光圈呀、焦距呀什么的记不住。于是日本厂家就生产出了傻瓜相机。它的广告词就是“您只需按下快门，其他一切交给我们”。在很多场合，人们发现许多功能都可以去掉，这就是优化，管理中寻求成本最低、产出最大、利润最高、风险最小，这些都是在追求最优化。

与价值工程相类似的优化管理理论还有很多。例如“看板管理”。现在海尔有一种“零库存”的“海尔管理模式”。其实这个模式不是海尔发明的。早

在70年代初期日本就发明了看板管理，要求下道工序给上道工序发加工传票，原理一模一样。而且这种方法早在80年代初就已经全面介绍到中国来了。当时的国家经委培训厂长经理的11种现代管理办法，其中就包括看板管理。

与此同时，人们还总结出很多类似的管理理念。比如销量是否越大越好？不一定。因为要把所有产品都卖出去就得不断降价，可能最后得到的总利润还不如产量低一些得到的利润多。最优化、系统化的管理思想成为日本对工业化的一个巨大的贡献，也使管理理论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台阶，使人在和机器的相处中找到了一个新的平衡点。

【1-2-2】"管理股"的出现意味着管理要素所有者的利益不再表现为工资，而是表现为利润。管理要素的资本化使管理者的利益和出资人利益进一步密切地结合到了一块儿，管理理念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我们今天的改革中面临的高管人员融资持股、管理者持股等，很可能是一种符合客观规律的趋势。同样地，技术股也被称为技术要素的资本化。

20世纪70年代以后，管理理念、管理思想、管理方式仍在不断发展、不断创新。

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中有个"三要素论"，认为参与第一次分配的要素就是劳动、资本和土地，因而经济活动增值部分最终只能分配为工资、利润和地租。那时人们只承认货币资本是企业资本的基本形式，认为设备、人、原料等等都不过是资本变换自身形态的结果。不承认有什么"人力资本"。因此企业的利润只归货币资本的出资人所有。

这个"三要素论"统治了经济学相当长的时间，但是在管理理论创新之后被打破了。日本首先从自身的发展中认识到，管理要素是支持日本经济实现赶超的关键要素。管理并非仅仅是一种高级的劳动，而且可以表现为是一种独立于生理意义支出的独立要素。人们承认，管理要素也可以视为是一种资本投入。由此就有了"管理股"的出现。管理股意味着管理要素所有者的利益不再表现为工资，而是表现为利润。

在表面现象上，工资和利润都是钱，没有区别。年薪制下获得的收入和高管人员持股下分得的红利有什么区别？在你买东西、存银行时没区别。但在理论意义上可就区别大了。虽然都是钱，但同样的钱代表的经济内涵不一样。年薪制是雇佣的含义，拿的是薪水。期权和分红拿的是利润。把管理者的投入视为是资本构成的一部分。这个变化，我们称之为管理要素的资本化。

管理要素的资本化使管理者的利益和出资人利益进一步密切地结合到了一块儿，管理理念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我们今天的改革中面临的高管人员融资持股、管理者持股等，很可能是一种符合客观规律的趋势。

管理股之后又有了技术股的出现。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经济表现出了强劲的国际竞争力。是什么因素支持了美国经济的高增长？是技术要素。美国在此前 30 年中，在基础研究领域中的投入"厚积薄发"，在高科技产业明显处于垄断地位。技术要素成为了在国际竞争中获胜的关键。与此同时，人们也开始承认，技术要素也应当视为是资本构成的一个部分，也应当参与利润的分配。于是就有了"技术股"。同样地，技术股也被称为技术要素的资本化。

【1－2－3】当代经济学与管理学都承认，参与微观经济活动的最基本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土地、技术与管理五个方面。这个"五要素"的认识变化并非仅仅存在于西方的经济理论中，而且已经实际地深入到了我们当前的发展与改革进程中。党的"十六大"报告已经明确无误地接受了管理、技术资本化的认识，提出要"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要"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

管理与技术要素的资本化出现以后，企业支配权的构成、影响企业行为的企业利益构成都发生了明显变化。现在经济学与管理学都承认，参与微观经济活动的最基本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土地、技术与管理五个方面。"三要素"变成了"五要素"。

这个"五要素"的认识变化并非仅仅存在于西方的经济理论中，而且已经实际地深入到了我们当前的发展与改革进程中。我们党的"十六大"报告已经明确无误地接受了管理、技术资本化的认识，提出要"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要"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如果说，新形势下我们的改革中有什么创新，这种对管理要素、技术要素资本化趋势的认同就是最大的创新之一。

EMBA 的同学是学习管理的。学习管理的各种技巧、方法之前，首先要把握管理思想的发展沿革，把握管理革命的前沿，把握我国企业管理制度变革的基本趋势。我想这是很重要也很必要的。

9. 我国实践的回顾与总结

☆ 在世界发展格局中，不肯接纳新的生产力信息，这是造成我们近代史上很长时间历史悲剧的一个原因。

☆ 在对大机器工业发展规律非常缺乏了解的基础上，我们过早地发动了向重、化工业的强攻。

☆ 将近三年的“大跃进”使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遭受了一场巨大的浩劫。

☆ 在“要准备打仗”的形势估计下，我们把整整三个五年计划中70%的新增工业生产能力和投资全部投在了西部和西南的大山里头。

☆ “搞十来个大庆，十来个鞍钢”的“洋跃进”再次把国民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 从80年代初期的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的经济建设实践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六大变化。

【1－3－1】中国近代工业从一开始就是以“官商合办”为基本形式的，企业从一开始就绕过了市场，绕过了竞争。这个先天不足，对我们后来的体制形成有着非常深厚的影响。迄今这个非市场化起源的影子还时有所见。

这一讲的题目是“历史的回顾与总结”，因而不仅要有理论的回顾与总结，而且还要有实践的回顾与总结。这个实践，主要指我国自己的历史实践。

中国经济实践也要和工业化密切联系起来。回顾历史，还得从建国之前一个相对遥远的年代说起，从近代工业在中国的起源说起。大机器工业生产力在中国的发展曾走过非常曲折的路程。我们有必要对这段似熟悉似不熟悉的历史有一个重新的回顾。

以上我们提到，欧洲在18世纪60年代就发明了可以商业用的纺织机，在80年代就有了蒸汽机的革命。之后在19世纪30年代开始有了电的普遍应用。那个时候，中国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呢？

工业化在欧洲取得长足发展的过程中，中国仍处于完全的农耕时代，处于以手工劳动为主、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下。

1840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年头。从这以后，西方的工业化强国打开了中国大门。这是大家熟悉的过程。但是大家可能没有太注意到，林则徐禁鸦片的过程中，在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英国政府曾经提出一个建议，说愿意帮助大清帝国禁鸦片，阻止东印度公司向中国输入鸦片的贸易。请注意，英国不是说要卖给中国更多鸦片，而是愿意帮中国禁鸦片。但这有个条件，就是中国必须开放自己的商业口岸，让英国的商人在那里自由通商。

英国为什么会有这个建议呢？因为当时英国已经走到了工业革命之后，已经开始大规模采用机器生产。机器生产导致了效率的提高，产出的规模成倍增长。英国以及欧洲有限的市场已经不能容纳机器生产力发展对市场的要求。英国迫切需要找到更大的市场，以便卖掉他们生产的“洋纱”、“洋布”、“洋油”、“洋火”以及其他一些机器制造的产品。但是，当时封闭落后状态下的中国封建统治者冥顽不化，不懂得与时俱进，不懂得要努力代表先进生产力。当时的统治者认为，我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没有你洋鬼子夷人，不是也活得挺好吗？我为什么要跟你做生意呢。所以道光皇帝就给林则徐下了个命令，要他不仅要戒烟，而且还要趁戒烟这个势头，趁早把洋鬼子赶走。咱们从此不和洋人打交道，不相来往。以为就此就可以你过你的日子，我过我的日子。实际上，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以及后来的失败并不是林则徐的错。他被迫接受了这样一个指示，就拒绝了一个先进生产力进入中国的机会。我们说禁鸦片很好，肯定没有错。但是在世界发展格局中，拒绝新的生产力发展，不肯接纳新的生产力信息，这是造成我们近代史上很长时间历史悲剧的一个原因。

我们有个邻居叫日本。1840年以前，日本这个国家在近代史上也有整整300年闭关锁国的历史。在漫长的300年时间中，日本只和两个国家打交道。一个是葡萄牙，一个是中国，就是大清帝国。和外面其他国家一概不来往。我们可能只知道1840年以后中国和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实际上在同一时代，日本也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在19世纪后半期，日本通过“明治维新”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比我们更快、更迅速地走上了工业化道路。而中国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错过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到19世纪末，日本已经迅速发展为亚洲的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当然这并不是说它的工业化已经完成。但毕竟，日本已经在社会产业结构、内部经济构成状况上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与此同时，中国并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

可能在座很多学员去过欧洲。在欧洲，人们公认最有代表性的建筑之一是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埃菲尔铁塔是哪一年建的。它建于19世纪的最后几年，前后用了八年时间。这个铁塔，我们至今看起来仍可以感受到它的巍峨壮观。我们不能不为整整一百余年前，欧洲的冶金技术、锻造技术、机械加工技术、工业组织能力、工业设计能力所达到的先进程度所惊叹。金属材料是很容易变形的。如果材质轧制不均匀，经过长期风吹日晒后就会变形弯曲。把大量粗细不等，各种规格的钢材组合在一起，并且历经百年而不变形是很难的。到现在埃菲尔铁塔仍然很好地屹立在那里。可见100年前法国的金属冶炼、材质的水平就已经很高。埃菲尔铁塔代表了很高的工业发展水平。

但是在同一时代，中国在干什么呢？

中国在1894年以后这10年间经历了两件大事。一件事是，中国在此前学习外国，从国外引进、建立的海军舰队，当时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铁甲舰队，在甲午海战中，不堪一击，几乎没有交手，就被日本舰队打得差不多全军覆没。由此签订了“马关条约”，被迫割让了台湾。第二件事是，在河北、山东、天津、河南等一些地方爆发了一场以抵制大机器文明为主要目的的义和团运动。义和团的主体是在西方机器生产力挤压下破产的农民、运河船民、城市手工业者。他们祭起了孙悟空、二郎神、关大圣、玉皇大帝、王母娘娘、西山老祖等所有能够想起来的神灵，以为用喝香灰、撒符水的办法就可以练就“刀枪不入”的神功，用泼洒猪血、大粪就可以破解洋人的“巫术”，企图用血肉之躯来抵御洋枪、洋炮的进攻。这两件事联系起来，我们大约可以看见其背后，中国工业化史上的一个悲剧式过程。

在这之前，中国统治者对机器文明的认识是非常原始的，几乎是空白。当时有外国使节给中国最高统治者进贡了一辆汽车。现在看是很原始的汽车。但慈禧太后看了说，这东西怎么个坐法呢？我是至高无上的皇太后，开车人坐我前头不成，有损威仪。但开车人坐后头车又没法开。所以这辆车始终没用过。当时从天津到开滦煤矿曾修过一条铁路，就是胥各庄铁路，运煤。就有官员上书说，这铁路离京城太近，火龙的蒸汽、鸣叫会惊扰东陵地下埋着的祖宗，会破坏“龙脉”，所以就把它给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有很多老臣给皇上上书，说洋鬼子没什么可怕的，因为洋人的膝盖不能打弯，只要给我们的士卒每一人发一根长竹竿，先把洋人都拨拉倒地，他们半天才能爬起来，我们的士卒就可以砍瓜切菜一样把洋人都消灭。这可笑的想法从哪来的呢？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有外国使节到北京来觐见皇帝、送一些礼物。这时在礼仪问题上起了争议。外国使节不肯行三拜九叩大礼，只肯鞠躬。

他们说我也是代表一国皇帝而来的，最多就是向你鞠躬。朝廷的中堂们怎么跟皇太后解释也解释不通。向天朝进贡臣服怎么能不下跪呢。后来有个翻译解释说，不是洋人不肯跪，是他们的膝盖不能打弯。皇太后一听说，要是这样，那就恕这些外邦蛮夷无礼吧。统治者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尚且如此。

一直到19世纪后半叶，有一批最先懂得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封建官僚，他们中间出了一批能够接受新鲜信息的人物，叫做“洋务派”。以张之洞为代表，掀起了一段所谓的“洋务运动”。中国人从此才开始考察和了解国外新的生产力发展动向。在引进技术的过程中，张之洞派了很多人到欧洲考察煤矿，打算发展机器采煤。在此之前中国也有煤矿。但那是用人工、畜力采煤。张之洞派到荷兰考察的人发回一封电报：说张大帅，人家问我们打算采什么样的煤、在什么样的地质条件下采煤，因为不同条件要用不同样的机器。张之洞回电说，糊涂，以中国之大，什么样的地质条件没有？你一样买点不就完了？这不是后人编的笑话，这是有历史记载的。但无论如何，在这些官僚的推动下，中国的近代工业才有了一个开始。

19世纪60年代，“洋务派”开办了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和各省机器局；并派遣留学生到海外学习先进科学技术，由此培养出了后来设计成功京张铁路的詹天佑等中国第一代工程师。从19世纪70年代起，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唐山胥各庄铁路、上海机器织布局、兰州织呢局等企业在“官督商办”的方式下陆续开办。80年代，以“洋务派”控制的海军衙门为依托，用“官商合办”的方式开办了一批工矿企业。中国用机器生产的近代工业由此建立。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近代工业从一开始就是以“官商合办”为基本形式的，企业从一开始就绕过了市场，绕过了竞争。这个先天不足，对我们后来的体制形成有着非常深厚的影响。迄今这个非市场化起源的影子还时有所见。

到19世纪末的时候，实际上，中国的口岸，特别是东南沿海，一直往北延续到天津港一带，西方列强的机器产品已经占据了很大的市场，中国的经济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大家知道中国近代史上有个红顶商人胡雪岩。胡雪岩怎么破产的呢，他一开始也是官商勾结，和洋务派官员勾结，帮助他们在国外买军火、借钱，就做这些生意。他应该是个洋务派，应该是个懂得新的生产力发展趋势的人物。但胡雪岩最后败在什么地方呢，他从养蚕户收购来的丝，只肯卖给手工作坊，不肯卖给洋人投资的机器缫丝厂。最后败在大机器生产力手里。在义和团运动中，人们认为喝香灰，洒符水就可以刀枪不入。靠着这样的“精神创新”去抵御大机器制成的洋枪洋炮，结果冲上去多少人被打死多少。僧格林沁王爷，一个蒙族王爷，率领两万蒙古铁骑在廊坊与联

军一战，也是无一生还，几乎没给对方造成任何伤亡。人家就在那里放枪，等着中国人往上冲。这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手工劳动已经不可能和大机器工业相对抗。

辛亥革命之后，近代史上有一个至今仍发挥着重要影响的事件——以五四为标志新文化运动。很多人知道，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如陈独秀等人是要把“德先生”、“赛先生”请到中国来。也就是民主救国、科学救国。其实在那个时代，还有一个同样响亮的口号，叫做实业救国。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批最先了解了国外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成果，并且最先累积起了一定资本规模的中国民族工商业者开办了一些新式工厂、新式企业，并且有了一定竞争力，提出了靠实业救国的口号。这是中国机器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后来由于日本侵略中国等一系列战乱和动荡，以及中国统治者的腐朽，这个进程最终归于失败。在老舍笔下的《茶馆》里有个典型人物，年轻的时候也是踌躇满志，西装革履，投资实业，最后终于在各方面的挤压下归于破产，和王掌柜一起走上了给旧时代高唱挽歌的道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中国民族工业曾经有过一个辉煌的发展过程。那个时期我们的面粉、纺织等不少机器加工业都有了比较好的发展。但真正对工业化有决定意义的重工业发展是和屈辱的历史密切联系在一块的。中国有近代意义的钢铁业、冶金业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中国东北后建立的。中国的重工业是伴随着国土沦丧的过程踏上中国土地的。

【1-3-2】建国前夕，人们迫切希望近百年来未能成功的工业化梦想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迅速变为现实。这种急于求成的情绪给以后经济建设的失误埋下了伏笔。毛泽东的一段话集中地代表了这种乐观看法和美好愿望。他说：“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很可能是相当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

到建国前夕，旧中国的钢铁生产能力只有十几万吨。要知道日本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钢产量已达300万吨。1949年时，中国大机器工业产值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在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仅占26.4%；仅有的一点工业还具有明显的畸外性，而且设备破坏严重，部门残缺不全。整个国民经济仍然停留在工业化以前的阶段。

由于在一百年中，中国仁人志士为实现工业化这个光荣与梦想，前赴后继努力奋斗而不得，人们对民富国强的渴望非常强烈。随着制度创新和政权的更替，人们迫切希望近百年来未能成功的工业化梦想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迅速变为现实。这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失败—努力—再失败—再努力的过

程使人们对未来的发展抱有了一种急于求成的情绪。

建国前夕，在炮火硝烟尚未散尽的河北一个小村庄里，我们党召开了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就是七届二中全会。这个村庄就是党的“十六大”之后，胡锦涛总书记带着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们去学习“两个务必”，继承革命传统的那个西柏坡。在那次会议上，我们一方面冷静地提出，建国之后要把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而且要保持谦虚谨慎、艰苦朴素的精神，保持戒骄戒躁的精神。这些都很好。但这次会议也有一个重大缺陷，给以后经济建设的失误埋下了伏笔。那就是对经济建设的发展进程估计过于乐观。实际上更多地强调了“戒骄”，而没有真正注意到“戒躁”。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的一段话集中地代表了这种乐观看法和美好愿望。他说：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很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

计日程功！就是说可以日新月异地发展。正是立足于这样的基本估计，我们在对大机器工业发展规律非常缺乏了解的基础上，开始展开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过程。一方面，极其渴望，另一方面，又没有经验，不了解客观规律，缺乏认识。

在经历了长期战乱的建国之初，经过短期的经济恢复之后，从1953年开始，我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五”是以重工业为主要立足点的。到现在很多人仍津津乐道的所谓“156个大型项目”，包括一汽、武钢、洛拖、石家庄的一些棉纺厂，还有包钢、兰新铁路等一些项目陆续上马。当时中国连农业生产还远没有恢复到历史最好水平，人民还需要休养生息的时候，我们过早地发动了向重、化工业的强攻。

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发展有一个特点，需要大量的积累和集中投入才能办得到。钱少了不成。不像开饭馆，钱少了也可以开，钱多了也可以开。重工业需要大量的投入。积累能力不充分怎么办呢，就得靠勒紧裤腰带。从消费里面挤出钱来，还得把资源集中起来。怎么才能让人们紧缩消费，并且实现资源集中呢？一个很自然的思路就是靠计划经济，靠“一大二公”。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发动的时候，也就是1953年，我们制定了一个像今天十六大提出的国民经济再翻两番、全面建设小康一样的长期战略。这个战略叫做“一化三改”。“一化”指的是“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所谓“三改”就是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那就有了以后的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城市里消除了手工业个体户，对民族工商业进行了赎买。所以说，中国的原有体制不是偶然的，是工业化进程中特定战略的必然产物。

“一五”时期的经济起步，尽管已经是超出了客观规律，超出了我们的实

际建设能力，但毕竟还有一定的历史条件使然。这个历史条件，一是当时新中国面对外部敌对势力的封锁，我们不得不早一点、快一点发展自己的重工业，建立起自己独立的工业生产体系；二是建国之后，大量的破产农民和城市的失业者需要就业，我们需要通过扩大投资规模来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缓和很多尖锐的社会利益矛盾。

“一化三改”曾经写进了我们国家1953年制定的第一部宪法。我们当时希望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个“不太长的时间”是多长时间呢？10到15年。今年是什么年头呢，今年是2003年。整整50年前，我们曾打算用10到15年完成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我们准备再用20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完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整整过了50年，我们才敢说还得再过20年，还得艰苦努力，在现在的国力基础上，基本完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中国工业化现在是什么样的基础呢？中国2002年年产钢1.8亿吨。世界第一大产钢国。我们说日本鬼子发动侵华战争时才年产300万吨钢，中国去年年产1.8亿吨钢。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敢说，还得用20年才能基本完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对照50年前的设想，用10到15年完成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我想无需再多加一字，大家也能看到当时我们对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对大机器生产力发展的认识是多么肤浅。当时全社会对工业化、对经济发展都抱着极为强烈的愿望。如果在座哪位是集币爱好者，可以把50年代初、中期发行的人民币拿出来看看。那时候人民币有五元、三元、两元、一元以及五毛、一毛，还有五分、二分、一分的，都是纸币。你会发现那时的货币图案很有特点。那时候不时兴把领袖的头像印在人民币上。人民币上印的都是拖拉机，高压线塔、大烟囱、水库水坝等等。人们认为这些图案都是典型的工业化象征。那时候要是有个画家画一幅农村的年画，光画胖娃娃抱大鲤鱼不行。得至少在远处画一个高压线塔，说明这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工业化的新农村。要不画几个大烟囱在远处冒烟也行。现在我们知道大烟囱是环境污染的象征，那个时候认为那是工业化的象征。人们认为，工业化有什么了不起？共产主义不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嘛。

【1-3-3】50年代末的“大跃进”；60年代在“要准备打仗”的形势估计下实行“靠山，分散，进洞”的方针；70年代末错误地估计中国的资源前景，提出要“搞十来个大庆，十来个鞍钢”等，曾反复地把国民经济推到崩溃的边缘。“左”的指导思想、无视客观规律的盲目蛮干和原有的不合理体制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惨痛的教训。

到了1958年，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尽管“一五”时期的建设速度还是不慢的，但即或如此，看起来“用10到15年完成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个任务是无论如何也完不成的。完不成怎么办呢，在建设任务和建设速度上进一步“加码”。所以就有了“大跃进”。

怎么加码呢，在农业上提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就是你想让一亩地打一万斤粮它就能打一万斤粮，你想让它打十万斤，它就能打十万斤。这种现在听起来非常荒谬的说法，当时居然能够成为“主流话语”。有些现在仍健在的老科学家当时也居然写文章论证，一亩地光合作用产生的能量能够打十万斤粮食。在工业上提出要“以钢为纲”，要求1958年的钢产量比上年翻一番，1959年再翻一番。当时要“全民大炼钢铁”，说老百姓家还要锅干吗？过几天就实现共产主义了，吃饭不要钱，走哪吃哪，根本不用做饭，把锅赶紧砸了炼钢铁去吧。所以挨家挨户，把所有的金属都收了，把山上的树都砍光了，去炼铁炼钢。这么一个形势当时称为“大跃进”。

将近三年的“大跃进”在1960年初期就被制止了。三年的“跃进”给我们的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带来了长达五年的经济调整。后来我们所说的“三年困难时期”，实际上不是三年，是五年的国民经济调整。第二个五年计划被迫中止。这个调整一直持续到1964年，国民经济才基本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左”的指导思想加急躁冒进，使我们的国民经济建设走了一个大的弯路。

荒唐的工业化强攻导致了一场生产力的大破坏、大倒退。我们不仅在工业化进程上经历了一个严重的失败，而且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也遭受了一场巨大的浩劫。在三年大饥荒中，由于粮食严重短缺，中国饿死了两千多万人。而大家知道当时中国人口总数才不过六亿五千万。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很多政策调整。比如在60年代初期，当时主持经济工作的陈云同志提出了包产到户等发展经济的一些措施，对很多“左”的冒进指标进行了较大调整。当时动员了两千万人回乡生产。集聚到城市里的很多农民看到，在城里也吃不饱，还不如回家种地，反而还能吃饱肚子。所以很多人就回到了农村。

到1964年，我国国民经济有了初步的恢复，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但是经济发展的良性状态并没有持续很久。以后就爆发了大家知道的，1966年起的“文化大革命”。我们的国家经历了长达十余年的政治动乱。

从60年代中期开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我们对国际形势提出了一些错误的估计。比如说“要准备打仗”。在第三、第四以及第五个五年计划中，经济建设、工业布局没有遵从客观规律的要求，而是在“要准备打仗”这个形

势估计下，实行了一个“山、散、洞”方针和所谓的“三边政策”。“山、散、洞”方针指的是工业选点要“靠山，分散，进洞”，“三边政策”指的是“边设计、边施工、边投产”。这些显然都是违背工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几年前我有一回到二汽出差，从十堰坐火车回来，碰到武钢的一个领导。武钢的这个领导说，当年他是二汽最老的元老。他说，当时二汽的厂址怎么选定的呢？就是军代表领着他们几个一腔热血的刚毕业大学生，从武汉出来开着吉普车一直往西走，没有大路走小路，没有公路走乡间路，一直走到没有路的地方，实在是不能再往前走了，从车屁股后面抱出一捆木头桩子往地下一打，这儿就是二汽。靠山进洞嘛，远离大城市，越远越好，走到不能走的地方就行。有什么科学论证？什么论证都没有。至今到十堰还是不方便。就是今年，二汽请我去一趟，开一个会，我还是非常怵。为什么呢？我得从北京坐飞机到武汉，再从武汉坐一夜火车到十堰。然后当天还回不来。最快也得当晚坐火车到武汉，第三天从武汉坐飞机回北京。这么一来一去，飞机、火车的反复折腾也得至少三天。从北京到上海出差，我经常早上来，当天晚上就回去了。上海到北京的航班差不多一小时一班。实际上现在二汽很需要一个支线机场。大家从地图上看一下就知道了，从十堰飞西安只要四十分钟就够了。西安到全国各地哪里的飞机都有。

我刚才说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执行到一半就被迫中止了。在第二、第四和第五个五年计划中，我们又根据“要准备打仗”的战略估计，实行了靠山、分散、进洞的工业布局原则。在整整三个五年计划中，我国70%的新增工业生产能力和投资全部投在了西部和西南的大山里头。一个工厂分散在几条山沟，根本没法形成规模化生产。很多工厂的成本实际上是无论如何也无法获取市场竞争力的。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有过一段“军转民”的历史。大家可能听说过。“军转民”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调整“三线”工厂。有些能搬出来就搬出来。搬不出来的就解散了。山沟里的、山洞里的不能要就不要了。因为布局条件实在没办法满足工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基础设施不具备。很多职工去的时候都是年青人，现在子女都要结婚生孩子了。那一代人真是“献了青春献子孙”。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也是一个历史大弯路。

1977年，祸国殃民的“文革”动乱结束。但当时的中央领导在经济建设上仍然继承了急躁冒进和“左”的指导思想。先是不顾国民经济元气大伤的现实，提出“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的口号，要求在短期内把“文革”损失的时间补回来。后来又错误地估计了中国的资源前景，提出要“搞十来个大庆，十来个鞍钢”。大庆的石油产量是5000万吨，中国要是有十来

个大庆，石油产量就得到五六亿吨，满足2020年的需求都有富裕。这个口号倒是挺诱人的。你看这次美伊战争中伊拉克人民的生活很惨，其实在上次海湾战争前，伊拉克人均收入在4000美元以上，巴格达家家都雇着保姆呢。不靠别的，就靠卖油。中国要能有十来个大庆该多好呀？可惜我们并没有这样的资源前景。今后我们还有一个专题会谈到，实际上我们现在连一个大庆都已经难以维持下去了。因为没有后备资源可采。由于当时"搞十来个大庆、十来个鞍钢"是打算从国外借钱来搞的，所以这个战略后来被人们形容为"洋跃进"。

"洋跃进"造成的危害并不比1958年的"土跃进"小。它把国民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个战略在70年代末期被得到纠正。这一段"冒进"的代价是国民经济被迫再次大调整。1981年开始的第六个五年计划是在实际执行了两年之后才宣布的。为什么要执行两年以后才宣布呢？因为头两年需要大调整，重工业全线撤退。1980年和1981年重工业表现为4%左右的负增长。与此同时全力发展轻工业。我们现在看到人民生活消费品市场这么充裕，这个变化是从80年代初期的"轻纺工业六优先"政策实行后才开始出现的。

【1－3－4】在过去20余年中，我们创造了很多值得认真总结的成功经验。例如特区经济、乡镇企业、浦东开发、恶性通货膨胀后的"软着陆"、非公经济的大发展等。但我们也有很多值得汲取的教训。例如在资源产业搞"国家、集体、个人一块上"的"有水快流"，市场化进程中的"股改贷"尝试等。还有一些举措有成功也有不足。例如区域间的"梯度发展战略"、存在不规范问题的股票市场等。还有些问题，例如"下岗分流"、"积极财政政策"、"国企三年脱困"等，可能还需要实践的进一步发展的才能做出确切的评价。

从80年代初期的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的经济建设实践中出现了六大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国民经济总量急速扩张，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我们不仅顺利完成了80年代初期制定的国民经济"翻两番"的目标，而且在很多产业上成为了世界产量第一的生产大国。2002年末，中国的外汇储备比80年代初期增长了400余倍。

第二个变化是对外开放不断发展。从引进成套设备、发展"三来一补"起，我们逐步有了特区经济的兴起，十四个沿海城市的对外开放，中国企业参与海外资本市场融资，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不断发展。今天媒体不断讨论的问题是，中国能否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

第三个变化是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在过去20余年中，中国有两亿多人口解脱贫困实现了温饱。1980年时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是400亿元，2002年末这个指标是接近9万亿元。80年代初期人们关心的是粮票换鸡蛋，今天人们关心的热点话题是“汽车进家庭”。

第四个变化是短缺让位于过剩，买方市场全面取代了卖方市场。在第六、第七和第八个五年计划中，经济政策的主要指向还都是如何发展供给，但从第九个五年计划的中期起，“扩大内需”已经成为了经济政策的重心。经过不懈努力，长期困扰我们的“短缺”已经成为过去。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已经从生产领域转移到了消费、需求领域。

第五个变化是市场力量已经取代计划成为了资源配置的主导力量。我国的家电等一批新兴产业，几乎完全是在市场的竞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政府计划已经在绝大多数领域中不再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一大批具有自然垄断性的基础产业，例如民航、电力、电信等产业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进入市场并且努力发展竞争。民营企业、非公经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六个变化是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北京“申奥”成功，上海“申博”成功意味着中国已经进入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阶段。2002年末，我国的城市人口与80年代初期相比增长了140%以上。与此同时，我国的产业结构也出现了明显变化。旧体制下“重工业自我循环”的状况已经被彻底扭转。改革开放初期曾严重制约国民经济的能源、原材料工业已经摆脱了“瓶颈”地位。我国已经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移动通讯用户群。旅游业等新兴社会服务业正在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支持因素。

在过去20余年中，我们创造了很多值得认真总结的成功经验。例如特区经济、乡镇企业、“八七扶贫攻坚战”、浦东开发、1988年和1995年两次恶性通货膨胀后的“软着陆”、非公经济的大发展等。但我们也有很多值得汲取的教训。例如80年代中后期提出在资源产业搞“国家、集体、个人一块上”的“有水快流”，市场化进程中的“拨改贷”尝试，农村工业化进程中要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等。还有一些战略举措是有成功也有不足。例如优先发展东部沿海的地区“梯度发展战略”、存在大量不规范问题的股票市场等。还有些问题，例如“下岗分流”、“积极财政政策”、“国企三年脱困”等，可能还需要实践的进一步发展才能作出确切的评价。这些问题的回顾和总结，在我们以后的专题中还会专门涉及。

4. 提问与讨论

☆ 所有的经济学都探讨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社会利益矛盾的协调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没必要区分为社会主义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经济学。

☆ 让大多数人都能够分享社会经济发展好处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努力证明大多数人利益合理性的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学。

☆ 怎样才算重视劳动者利益？劳动者利益首先得是“苗”，不能是“草”。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我们才能真正维护好劳动者利益。

☆ 本质和现象经常是以相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也是客观规律。

☆ 中国将对新的发展经济学、转轨经济学做出无可替代的贡献。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八个字，去掉哪四个字都不行。

☆ 中国老百姓所享受的福利将是我们中国老百姓自己创造出来的福利。

【提问一】：经济学究竟有没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呢？如果有，最根本的区别何在？

答：我先问个问题。最近美国打伊拉克的战争是舆论、媒体关注的焦点。大家知道伊拉克这个国家的全名叫什么吗？叫做“伊拉克社会主义共和国”。萨达姆认为他搞的就是社会主义。历史上的法西斯德国有个“纳粹”组织。“纳粹”是什么意思呢？是“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缩写。希特勒也自称过社会主义。显然，我们不可能认同这些所谓的“社会主义”。过去百多年中，有过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与理论，涉及到理想制度、意识形态、政治理念以致哲学概念。这总结起来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们只就经济学领域的

问题来作一个简单概括。

要说清楚有没有专门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还得说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那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辩证法道理，我认为至今还是颠扑不破。这个道理就是，一方面从本源上说，除了自然资源之外，人是社会财富的唯一创造者，社会的一切经济活动最终都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且这里的“人”一定指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绝不是指很少的一小部分人。另一方面，在工业化、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事情的本质不可避免地以与其相反的现象表现出来。资本成了创造财富的源泉，人们经济活动的目的表现为为资本赚取利润。不可避免的原因是因为生产力发展的客观水平、客观规律使然。

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人们把研究上述“现象”的经济学理论都称为资本主义经济学，认为这些理论都不过是为资本说话的，都没有科学意义；认为我们就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与此同时，人们把对“本质”的认识又推到了极端，企图把满足人的需要、劳动创造财富等社会经济活动的深层次内涵直接表现为社会制度，这就有了“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的理论。在传统理论中，人们把“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的经济理论称为社会主义经济学。

在改革开放中，我们逐步认识到，原来对“现象”的认识、研究也是有意义的。不仅有意义，而且现实的社会制度、经济体制还就得服从这些非本质方面的要求。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人们熟知，东西的价格贵了买的人就少，便宜了买的人就多。这是本质还是现象呢？是现象。本质是人们趋利避害的“利己”动机。但是不是理论的解释到此为止就行了呢？显然不行。真正有意义、真正有用的认识还在“现象”里头呢。现在我们知道，我们不仅不能简单地让人们通过“狠斗私字一闪念”来抑制这种现象，还得利用这种现象，掌握这种现象的运动规律。通过价格杠杆来实现某种稀缺资源的优化配置好不好呢？非常好。人们知道，价格杠杆是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资源优化配置机制。这种机制不仅比发“购物券”的效率高、成本低，而且实际上更公平。因为不会产生“走后门”的弊端。你能说利用价格杠杆、研究价格杠杆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吗？

实际上，我们EMBA的同学不仅要知道“涨价少买、降价多买”的道理，还得掌握更深入的道理，得知道什么样的产品、在什么样的收入水平上会出现“涨价少买、降价多买”；价格变动和需求量变动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内在联系。这就要研究“价格需求弹性”、“收入需求弹性”的问题。研究这个问

题需要有微积分的知识。退回十年，轿车降价不会有多少人关心。因为降不降价大多数老百姓也买不起。在那个时候，人们对价格变动不敏感。现在为什么媒体三天两头“炒”汽车“价格大战”的消息呢？因为人们的收入水平已经达到对轿车价格敏感的程度。你给你公司女雇员的工资从1000元提高到1300元，提高30%，她花在化妆品上的钱就可能增长150%，从每月100元提高到250元。因为现在就城市女性来说，化妆品的“收入需求弹性”非常大。你说这些研究有没有意义，有没有用呢？有必要问一问这些学问是“姓社”还是“姓资”吗？

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说，工厂制度的本质是为了给资本家多赚利润。但不为资本家多赚利润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不要工厂制度了呢？不成。按照工厂制度组织起来才能提高生产率，才能保证生产安全。在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中，“砸烂一切规章制度”曾经被当成了彻底铲除资本主义的一项“革命”措施。结果怎么样？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首当其冲面临的任务之一就是“建立合理的规章制度”。

我认为，人应当认清事物的本质。不研究本质，科学也就不成其为科学，人类也就无法最终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但另一方面，本质是终极的，是归于静止的。唯有现象才是动态的、发展的、最有活力和最积极的过程。而且本质并非只有一个层面。物理学早就证明了“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那我们就不需要研究能源结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了吗？人最终都是要死的。没有谁能逃脱这个本质。那我们就不需要研究怎么活、怎么活得更快活一些了吗？本质和现象经常是以相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也是客观规律。

这些说到哲学上去了。现在有门很有意思的学科叫“经济哲学”。我对这个学问很感兴趣。

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上来，社会主义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经济学有没有区别。我说也有也没有。

先说没有区别。所有的经济学都探讨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社会利益矛盾的协调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没区别，没必要区分为社会主义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经济学。我们只能说，有的探讨符合客观规律，有的探讨不符合客观规律；有的与客观规律更接近一些，有的实际上偏离了客观规律。其实我们过去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就更接近真理吗？我们在“实践的回顾与总结”中就讲道，我们走过了太多的弯路。

再说有区别。在对社会利益矛盾的协调问题上，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经济学派经常会表现出不同的利益取向。比如说，只保证少数人得好处，唯一强调资本利益的经济学就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的经济

学。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呢？我认为，让大多数人都能够分享社会经济发展好处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努力证明大多数人利益合理性的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学。但是请注意，这个区别并非就是在社会利益矛盾的对垒双方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那么简单。80年代中后期我们搞了特区经济，对外资实行“两免三减”等政策优惠。这是不是在维护资本的利益呢？可以肯定说，是。而且资本在深圳等特区的聚集实际上决定了劳动力、人才等各种资源向这些地区的聚集。用理论化的语言说，资本的意志决定了资源在区域间的分布。但是特区经济发展的最终结果是什么呢？是中国的国民经济整体由此有了新的增长点，对外开放有了极大的发展。相反，在过去一段时间中，由于有些认识仍未突破原有的束缚，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宁愿牺牲出资人的利益也要保证职工的就业，结果是把企业拖垮，出资人的利益没有保证，职工的饭碗也丢了。

我们现在知道，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的必然组成部分。我们要发展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还知道，社会主义并非就是“一大二公”，非公经济也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提出，我们要按照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要素的贡献进行分配；提出，合法的非劳动收入也要受到保护。传统理论中的三大要素都去掉了，那么还剩下什么是社会主义了呢？我认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就是社会主义，建设全面的小康社会就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我们在第七讲中还要专门涉及。

【提问二】：既然不能否认“劳动创造了世界”，为什么现在的改革似乎给人一种感觉，劳动者的利益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越来越被忽视了呢？

答：我不认同在改革过程中“劳动者利益被忽视了”这个判断。在过去20余年中，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的生活都有了明显的改善。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大多数老百姓都从改革、开放中分享了好处。我们可以用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总额、每百户居民家庭拥有耐用消费品量等多方面指标清楚地证明这一点。不仅如此，在过去几年中，我们还在城市中普遍建立了最低工资制度、最低生活费保障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养老金社会发放的制度等。在我们的这个社会中，劳动者的利益并没有被忽视。

但另一方面，人们感觉到“劳动者利益变得不重要了”并非是没有来由的。因为市场经济总是强调出资人利益，强调企业利润的经济。与此相比，农民收入增长不快、下岗失业人数增加等现象则很容易让人觉得，劳动者利益被忽视了。

怎样才算重视劳动者利益？是不是在制度上把劳动者利益摆在最优先的地位就是重视和维护了劳动者利益了？我们不妨举个例子。

在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强调劳动者共同、平等地占有生产资料，强调实行“按劳分配”。应当说，对劳动者的利益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吧？但事实是怎样呢？在1953年到1979年的26年间，我们的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26倍，工业生产能力增长了19倍，人民生活只改善了近一倍。而且这个改善还是家庭就业人数增加带来的。那个时候20年没长过工资的比比皆是。各种消费品更是几乎全部得凭票供应。你能说这种状态是维护了劳动者利益吗？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曾经批判过张春桥的一句昏话，叫做“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邓小平同志一句话针锋相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劳动者利益首先得是“苗”，不能是“草”。

我们一再强调一个看问题的角度，就是辩证法的角度。在很多时候，当你想往东边走的时候，先往西走一点，也许你能更快地到达东边。农业文明时代，人们把所有能够动员的资源全部都投入到谋取消费资料的过程中，70岁老人也得早起到村边看看有没有过马车留下的牲口粪弄到自家地里，六、七岁的小孩也得跟着大人一起到田间劳作。但就是这样，吃穿用也还是不够，人们过的仍是“糠菜半年粮”的日子。一遇天灾人祸，就得饿死人。后来人们发现，腾出一部分人力物力不去直接谋取吃穿用，而是去造工具。直接谋取消费资料的人少了，人类享用的吃穿用的东西反而更多了。这就是工业文明的进步。这就是辩证法。

我们只有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像“十六大”报告所说的，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我们才能真正维护好劳动者利益。

【提问三】：现在人们提到经济学好像都是指的西方经济学，我们中国能有自己的经济学吗？

答：这个问题提得很好。目前有不少人否认中国有经济学家，甚至否认中国有经济学。我以为这种说法恐怕太过极端。

无需否认，目前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仍处于比较薄弱的状态，还缺乏系统化的理论体系。这和我国工业化的历史、市场经济发展历史尚不充分密切相关。我们目前的改革发展实践在很多方面尚处于摸索阶段。

但是条件尚不成熟并不等于说中国有不了自己的经济学。我还没听说过有一门经济学能够离开大量、普遍的实践发展而能够被创造出来。中国正在进行着前所未有而且作为一个大国最具有普遍意义的工业化实践、发展实践

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实践。这个实践正在以最生动、最有活力的形式为经济学提供着可供总结的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坚信中国将对新的发展经济学、转轨经济学作出无可替代的贡献。在一定意义可以说，未来中国是最有希望在经济学的发展上有所成就的国家。

一方面，中国最有可能诞生新的经济学理论；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也正在面临“新经济”、“经济全球化”等的挑战。以美国为例，2001 年的加州电力危机说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需要重新审视，做假账的“安然事件”说明现有企业制度存在重大缺陷，对进口钢材加征特别关税的“201 条款”说明被奉若经典的自由贸易理论正在被美国自己否定。

有必要强调一点，尽管不同的经济学可能有不同的适用条件，但经济学整体是人类文明的共同结晶。我们应当努力在这个领域作出中国人应有的贡献。但我们没必要刻意强调哪些是别人的，哪些是自己的。只要是对客观规律的科学总结，我们都应当认真学习。

【提问四】：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有什么区别吗？

答：市场经济有其共同规律。我们要搞市场经济，首先要认同这个共同规律，而不是首先强调自己有什么国情特色。前两年，日本三菱公司的“帕杰罗”越野车发现设计缺陷，在全球被召回。但当时我们有些主管部门的官员说，汽车召回制度不适合中国的国情。结果现在我们仍得研究并且准备实施汽车召回制度。不存在这样一种国情，说中国消费者权益受到保护的标准就应当低一点。

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市场经济的确又有其特殊性的一面。我们是从计划经济体制改革而来的市场经济，不是从充分的自由竞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我们还有大量的农民并未真正进入市场，目前的市场经济还是一个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并存的经济。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区域发展差异导致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还需要一个较长周期。这些是实实在在的国情。简单说“市场经济应当是什么样的”，可能在中国就行不通。例如，就业制度改革就不是简单地把过去的体制承诺“一风吹”就行的。我们还得先对原有国企职工实行“有偿解除劳动合同”的改革才行。

上述特点是中国特有的，但不能说这些特色是“社会主义”的。目前看，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键是强调发展过程中的共同富裕。我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八个字，去掉哪四个字都不行。没有后面的四个字，我们就没法保证效率和优化，这已经为我们的实践所证明。没有前面的四个字，

我们就没法避免分裂和分化。这才是中国最大的国情。

【提问五】：我们过去一些年的失误是不是就是体制性的失误？今后我们能避免这些失误再现吗？

答：体制性的失误是显而易见的。不然我们也用不着这么长时间地推进改革。高度集中的统一决策，又缺乏民主、科学的论证程序，导致了很多主观失误酿成巨大恶果。但体制性失误并非是唯一的原因，我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也是在不断深化的，没有谁是神仙，有些事情是在实践中才逐步认识清楚的。

我给你举个例子。在改革开放之初，没有人知道我们最终要走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条路上来，也不知道今天中国还要加入 WTO。最初为什么会允许非公经济发展呢？是因为 70 年代末大量知识青年返城，“一大二公”的体制内无法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我们只好提出“国家、集体、个人一块儿上”的“三结合”就业方针。最初，是就业的压力导致了我们的经济格局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80 年代中后期我国家电产业起步的时候，政策规定只允许国家定点的国有企业进入，不许民营企业的进入。那时认为，私人企业、民营企业即或不是资本主义的，至少也是非社会主义的。但是市场选择的最终结果是，当初机械工业部、轻工业部、电子工业部、兵器工业部，还有各省定点的那些厂家没有几个活下来的。倒是当初连“户口”都报不上的许多民营企业现在成为了我们家电产业的“龙头老大”。80 年代中期对私营经济发展还有一条规定，最多只允许雇七个人，认为雇七个人以下没有“剥削”，七个人以上就有了“剥削”了。为什么当时会提出这么荒唐可笑的说法呢？因为当时的认识还受到旧体制和传统理论的束缚。

人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我们也不能指望谁能够一下子把客观规律全部认识清楚。邓小平同志是个伟人，他也只能说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用的是否定式。那什么是社会主义呢？这需要以后的实践，需要到“十六大”才能解决。

【提问六】：如果注重大多数人的利益就是社会主义，那么现在发达国家与中国相比，哪里的劳动者享受的福利更多呢？

答：这是一个很值得严肃回答的问题。世界上堪称发达国家的地方一共有多少人口呢？一共有 7 亿人口。从 18 世纪 60 年代英国的产业革命算起，迄今人类用了 200 多年，付出了奴隶贩运、殖民地掠夺、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不知道多少杀戮、贫困、歧视、种族冲突的代价，才把这 7 亿人送进了工业

文明，让他们享受了现代化的物质基础。这些发达国家的福利是全世界人民付出了极其沉重代价的结果。我们现在要在过去20余年、未来20余年的努力中把13亿人送入工业化、现代化。我们不可能依靠掠夺来实现自己的发展，也不可能把发展的代价转嫁给别的国家。简单地比较哪里享受的福利更多，我想这不能说明问题。正因为我们国家的老百姓还没有享受到如同发达国家那样的福利水平，党的“十六大”才提出，我们要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中国发展的基础是我们自己的艰苦努力，中国老百姓所享受的福利将是我们中国老百姓自己创造出来的福利。

第2讲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SHEHUIZHUYISHICHANGJINGJI

在上一讲中，我们实际上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到了社会主义及其经济制度的问题。在这一讲中我们着重交流市场经济的主要制度框架和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客观必然性问题。

先给大家讲个故事。是真事儿，不是瞎编。

80年代初期，我们国家制定前一个“翻两番”战略的时候，有个著名专家给中央提建议，认为中国不能提倡穿皮鞋，因而也不宜发展制革业。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要是都穿皮鞋，那得杀多少牛呀？当时中国的人口是10亿。一条牛的皮能缝多少双皮鞋，中国一共有多少牛，那是有数的。专家用数学模型算出的结论是，把中国的牛都杀了也不够。何况牛还是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呀。怎么能都杀了做鞋穿呢？

结果怎么样呢？到今天我们看到，人们已经普遍穿上了皮鞋。你到火车站看看，民工春节回家穿的也是皮鞋。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商店里的皮鞋多到卖也卖不掉的程度。我们在座的女士可以证明，大概每人没有三十双皮鞋也有二十七八双。高腰的、矮腰的，冬天的、夏天的。一阵子流行圆头的，后来又改方头的了，最近又改尖头的了。穿皮凉鞋还不行，去年又时兴穿皮拖鞋了。人们有了这么多皮鞋，那中国的牛到底杀光了没有呢？我们一打听，敢情不仅没杀光，反而比以前更多了。多到有专门提供乳制品的牛，有专门供吃火锅的牛，还有专门提供牛绒的牛。

是谁创造出了这个按照计划经济的思维，人们怎么算也算不出来的奇迹呢？是市场。

这就是市场经济的活力、魅力、魔力和创造力。

由此就引出了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市场经济为什么会造就出那么多的“牛”？

1. 什么是市场经济

☆ 市场经济下的交换就是“亲兄弟明算账”的交换。交易双方必须计较多少，必须维护自己的利益。

☆ 否定了个别利益，实际上也就否定了公共利益。结果是大家共同受穷，谁的利益也没有得到保障。

☆ 要有秩序就得讲求规则。没有规则就乱套了。那就不是竞争，而是战争了。

☆ 市场经济下的各种秩序，是人们在万千次交易、竞争中总结出来的。建立秩序是有利于所有市场参与者的利益的。

☆ 任何道德、法律或行政权力方面的不平等都会使等价交换的原则扭曲，市场交易规则中不能有任何的超经济强制。

☆ 把生产与消费区别为姓“公”和姓“私”的观念其实是所有制关系上姓“公”姓“私”的争论在消费领域中的延续。

☆ 改革发展到这一步，维护消费者权益已成为当前改革进程中社会经济关系调整最核心、最直接、最前沿的问题。

☆ 维护消费者权益就得按照国际标准，而不是按传统思维下的“中国国情”来说话。

☆ 信用也是一种资源。利用信用资源，可以放大实际的资源规模，可以大大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可以动员更多的闲置资源投入到经济活动中去。

☆ 老百姓到银行贷款不是因为没钱，而是因为他们钱多了。是因为他们的钱多到需要“理财”的程度了。

☆ 信用这种资源不是和“大公无私”联系在一起，而是和财富、产权的多元化归属联系在一起的。

【2－1－1】市场经济就是按等价原则进行交换的经济。市场经济下的交换是“亲兄弟明算账”的交换。交易双方必须计较多少，必须维护自己的利益。交换中这个“必须维护自己的利益”的行为非常重要。可以说，这是市场经济一切规律的根本出发点。在所有经济学中都存在一个无需证明的假定前提。这个假定前提就是，人都是趋利避害的。

什么叫市场经济呢？大概一百个经济学家可以提出一百零一种以上的说法。有人说，市场经济就是私有制的经济；有人说，市场经济就是价值经济。还有说是自发性的经济、竞争的经济、优胜劣汰的经济、信用经济、法制经济等等。

应当说，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包括“私有制”的说法。关于“所有制”的问题我们下面还要专门说到。但是这些说法都像是“盲人摸象”，都只触及一个局部，都没有总体的概括力。

什么是市场经济？其实很简单。市场经济就是按等价原则进行交换的经济。

市场经济得以存在和发展，其根本基础首先在于分工的普遍化。我们说到过，没有工业化就不会有市场经济。为什么呢？因为工业化、大机器生产才能造就社会普遍分工的物质基础。农业文明时代，农村妇女天天晚上摸黑纳鞋底也供不上一家人穿鞋。用机器生产，一个工人一天能缝 100 双鞋。现在工艺又改进了，不用缝制了，用胶粘。一个工人一天能粘 1000 双鞋。生产这么多鞋，当然不是他自己穿，或者给他家人穿，或者给他老板穿。干什么用呢？用于出售。就是交换。

分工还不是市场经济的唯一基础。刚才说到，在市场上出售就是交换。可分工引起的交换并非只有出售一种方式。计划经济下也有分工，但大量的产品是“计划调拨”的。不是真正的出售。为什么呢？因为“一大二公”体制下的传统理论认为，大家都是一家人，用不着算计那么清楚。“肉烂在锅里”。谁多谁少不都是“国家”的吗？或者说是“劳动者共同所有”的吗？我们在改革的初期就开始力图打破“大锅饭”。但那个时候所说的“大锅饭”主要指企业中“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其实原有体制下最大的“大锅饭”并不在平均主义的分配上，而在于否定等价交换的市场交易原则上。

市场经济下的交换是怎么样的交换呢？就是“亲兄弟明算账”的交换。交易双方必须计较多少，必须维护自己的利益。人们都在菜市场买菜，有和卖菜的小贩讨价还价的经验。萝卜白菜的价格贵一毛钱，小贩的利益就多一

毛钱。价格便宜一毛钱，买方的利益就多一毛钱。谁的钱也不是白来的。

请注意，交换中这个“必须维护自己的利益”的行为非常重要。可以说，这是市场经济一切规律的根本出发点。在所有经济学中，其实都存在一个无需证明的、共同的假定前提。这个假定前提就是，人都是趋利避害的。

我们的改革实践已经明确无误地证明，公共利益、共同利益一定是建立在个别利益的基础上的。否定了个别利益，实际上也就否定了公共利益。在我国农村改革前的人民公社中实行“工分制”。理论上说，谁干活都会导致大家共同的分值提高。这种“工分制”把大家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了吧？但实践证明，这种否定个别利益的制度设计导致了农民“出工不出力”的反抗。无穷无尽的政治运动、反复的“大公无私”教育也无济于事。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大家共同受穷，谁的利益也没有得到保障。上世纪70年代末，我们首先进行的改革就是“分田到户”，承认农民的个别利益。结果是什么呢？是1984年建国35周年庆典时，邓小平在天安门阅兵那个时候，全国农民高唱“在希望的田野上”。

我们不想扯进“人是不是自私的”这种没有多大意义的争论中去。我认为，这个争论就像“无所不能的上帝能否提出一个连他自己也回答不了的问题”那样的一个悖论命题。悖论本身是门学问。研究悖论也是有意义的。下面我们就会讲到，市场经济的一切活动都充满悖论。比如，“分散的所有权能够更高效率地集中资源”。但这个“自私”与否的争论是把人的本质这种哲学命题拿来解释现实、生动的社会经济生活。这个动辄质问别人这种问题的，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理解为对理想社会向往的单纯。这是典型的“形而上”学。论证方式上有个“归谬法”。例如我们可以问，人都是要死的，人就不应当避死求生了吗？

实际上，党的“十六大”报告已经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回答。“十六大”报告说，不能以人有财产还是没有财产、财产多和少来区分人们在政治上的先进与落后。我认为，我们可以把这句话在理论上诠释为，不能以人们是否有趋利避害的利己动机来区分人们在政治上的先进与落后。“十六大”报告说，关键要看人们的财产是怎么来的。在我们的问题中，关键是趋利避害要有规则。我们后面还会专门讲到规则的问题。

【2－1－2】等价交换只能在供求双方平等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任何道德、法律或行政权力方面的不平等都会使等价交换的原则扭曲，都会导致市场经济关系紊乱。用理论化的语言说就是，市场交易规则中不能有任何的超经济强制。

我们在上一讲中特别讲到了，任何资源都是有限的，经济学重点研究的就是有限的资源，或者说稀缺的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由于资源有限、机会有限，当人们都想趋利避害的时候怎么办呢？由此就产生了竞争的问题。

供给不足，大家都想买到，那就产生了需求方的竞争。供给充分而需求不足，卖方就希望买方优先买自己的产品。由此就有了供给方的竞争。供求双方讨价还价表现为供求之间的竞争。实际上，市场经济下的竞争是无所不在的。其表现形式也是变化万千。不仅同类行业之间、满足同种需求之间的产品会有竞争，例如出版社和电视台之间有竞争；生产完全不同产品之间的企业也会有竞争。因为有可能两个企业、两种行业会使用同一种资源。例如石油既可以作燃料，又可以生产化工产品，而石油是有限的。技术替代、功能替代、效用替代都会导致竞争。

在过去一些年的改革过程中，大家对竞争已经比较熟悉了。但对竞争的评价恐怕仍有不同看法。因为竞争必然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公平的问题。还有人更把市场经济下的竞争道德化，说，承认人会“趋利避害”就已经颇有“抑善扬恶”的味道了，还要提倡竞争，这不是在倡导“弱肉强食”的罪恶理论吗？对这个诘问，我觉得有必要多说几句。

2001 年的春运前夕，国家计委就“旅客列车提价”问题举行听证会。我作为“专家代表”出席了那次听证会。这个会是电视台向全国实况转播的。当时，各界代表的发言纷纷表述的重点都是，我这个群体如何收入有限，如何有理由在春节回家。还有律师说，春节涨价是铁道部借机敛财，有违公平的原则。听证会上每个代表的发言限定为五分钟。有个计分的大计时器在主席台上放着呢，电视画面上不一定看得见。

这五分钟说什么呢？我想了三天三夜，最后决定重点说一个道理。我说，我们的听证会要证明什么呢？是要证明哪个群体最有理由春节回家吗？是要证明哪个群体的收入能否承受涨价吗？是要证明春运是否真会引起铁路收不抵支吗？都不是。我们姑且承认各位说得都对，大家都有理由春节回家，民工就是无力承受车票涨价，铁路就是借机敛财。但是假定有十个人要回家，铁路最大运力充其量只能运走八个。我们即或证明了大家的上述论证，对解决这个问题有助吗？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是用什么样的办法把这八个人从十个人里面挑出来。大家说，还有没有比价格杠杆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的办法呢？如果有，咱们就采取你说的那个办法。如果没有，我们就得采取价格调整的办法。我们要证明的就是这样一件事。

这个例子所说的，就是用价格竞争来解决资源优化配置问题。在春运这个例子中，我们还有没有其他解决办法呢？也有。例如，我们也可以不提价，

沿用让大家提前排队的办法，谁买到算谁的。但这个办法中，旅客彻夜排队的代价、“走后门”的代价、让“票贩子”倒票赚走的代价加到一起，可以肯定地说，需求方多支付的代价要远远大于火车票涨价的代价。更重要的是，作为需求方，涨价时旅客们多支付的代价将直接有助于铁路今后增加供给，而在“排队”方案中旅客们多支付的代价则完全无助于铁路供给增加。再例如，我们还可以用计划经济下的配给方式。每个公民发500公里的铁路购票证，大家自己去相互调剂余缺。这个方案听起来够公平吧？但是社会能够承受，或者说有必要承受这么大的一个资源配置成本吗？而且可以断言，即或这个方案真的行得通，那“购票证”的黑市将立刻兴盛起来。真正需要购票的旅客真的能够少付代价吗？

这样看来，我们在竞争中就不需要关照弱势群体了吗？就不需要体现公平吗？需要。这个公平同样可以，而且应当通过价格杠杆实现。例如，我在听证会上说，应当首先把哪两个人从乘车需求中排挤出去呢？应当把最有能力选择替代方式的人、占有着更多社会资源的人排挤出去。比如说，能够不坐火车而改乘飞机的人，能够不去旅游而去到郊区住度假村的人。怎么排挤呢？很简单，加大软卧票的涨价幅度，降低硬座票的涨价幅度。后来实际实行的涨价方案基本上采取了我的这个建议。

我们说对软卧票多涨价，是不是就是一种非市场化的不公平呢？不是。这个建议是有充分的经济学道理的。听证会上没时间详细说，在这里顺便和大家简单交流一下。对我们这门课来说，了解这个分析、这个道理绝对不为多余。

经济学上有两个极为重要的概念，一个叫“影子价格”，一个叫“机会成本”。

先说“影子价格”。铁道部关于春运涨价的理由之一就是存在着“影子价格”。在火车票这个例子中，大致说，票贩子卖出来的价格就是春运票价的影子价格。票贩子们都知道，倒腾硬座票是挣不了多少钱的，加价幅度很有限，能挣钱的是卧铺票。为什么呢？因为稀缺。这个稀缺不仅表现为卧铺票少，而且表现在买卧铺票的人购买力强上。影子价格是最能表现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既然你铁道部提出了“影子价格”的理由，那就应当遵从“影子价格”所表现出来的价格差。软卧的“影子价格”最高，所以软卧就应当多涨。

再说“机会成本”。什么叫机会成本呢？你来听EMBA课就得少做生意。少做生意的损失就是你上EMBA班的机会成本。要不我怎么说，感到讲这门课颇有压力呢？因为在座的很多人都是老板，机会成本很高。要让人家说听这门课“值”，上海人说“划算”，就得让大家觉得听这个课的收益大于你的

机会成本才行。

那在春运这个例子中，铁路的机会成本是什么呢？我们假定正常情况下一节硬座车和一节软座车的票价销售收入都是一万元。现在由于春运超员，硬座挤进了更多的人。比如说50%吧。票价不涨，一节硬座车厢已经可以有一万五千元的票价收入了。可是软座一般不能超员，收入还是一万。诸位都是做生意的，你说铁路该不该考虑少挂一节软卧多挂一节硬座，或者对软座提价50%呢？因为这时软卧车厢的机会成本已经提高了50%。提价50%才能让软座的机会成本和硬座的机会成本持平。这很公平。

道理讲到这儿还没完。硬座是在超员情况下增收50%的。就是说每个旅客享受的空间大大缩小了。而软卧即或提价50%，因为并没有超员，旅客享受的空间并没有缩小。那么坐软卧的旅客该不该为供求失衡条件下占有优质资源再多付一些代价呢？应该。在这个例子中，在硬座不提价的情况下，软座只涨50%还不行，应当涨80%，甚至100%才合理，才公平。如果硬座提价，那软座应当涨得更多。

这就是市场经济。这就是竞争。竞争有什么好处？竞争的好处主要有三条。一条是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有限资源的利用效率。二是优胜劣汰。优胜劣汰不仅是把资源配置给更有效率的支配者的意思，更重要的是不断促进社会、市场、技术不断向前发展。三是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在很多场合，用不着开很多会，无休止地讨论个没完，谁出价高就卖给谁。决策变得非常简单。

有了竞争，就必然引起另一件事，那就是秩序。近年来媒体上经常讨论的一个重点话题就是整顿和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对市场经济秩序的讨论从一个角度反映出，我国的市场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因为市场经济发展了，竞争普遍化了，人们才需要考虑和关注秩序。

要有秩序就得讲求规则。没有规则就乱套了。那就不是竞争，而是战争了。战争也没离开规则。战争的目的是什么？用经济学眼光看有两种，一是通过践踏规则掠夺资源，二是通过强制手段重建规则。

中国人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大家都看足球比赛的转播。足球赛一定要有胜负，这就是竞争。但你得想法把球往对方球门里面踢，不能专门踢对方球员的腿肚子。这就是规则。赛不出胜负就罚点球，非得罚出一个胜负来。这也是规则。如果哪个球队说，我明明实力比对手强，罚点球有太多运气成分，不公平，谁胜谁负应当由“组织”来定，让组委会开个会讨论决定行不行？或者说用民主的办法定，让所有球队的队员投票决定行不行？不行。游戏规则若此。大家都得遵守。遗憾、不满也得遵守。要不你就别参与。

规则、秩序都是一种制度安排。我们说到过，制度安排就是一种社会共

同约定。那什么是市场经济秩序呢？由此而来，市场经济秩序就是为保证社会经济系统顺畅运行的社会共同约定。在交通规则中，“行人车辆靠右走”是一种社会约定；在自然经济向小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逢五赶集”是一种社会约定；在我国传统的经商理念中，“童叟无欺、货真价实”是一种社会约定；在工业化进程中，以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中介的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是一种约定，在市场经济普遍建立过程中，“一手钱一手货”发展为“货、款让渡在时间上分离”这也是一种社会约定，只不过是信用参与其中的一种社会约定。市场参与者之间的社会共同约定就是市场经济秩序。

市场经济下的各种秩序，或者说各种社会约定是怎么来的呢？是人们在万千次交易、竞争中总结出来的。人们在市场交易的实践中逐步懂得，建立秩序是有利于所有市场参与者的利益的。约束所有的人，也保护所有的人。最初的秩序、规则可能是自发的。但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交易范围的不断扩大，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自发的秩序、规则早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于是有了经过特定程序，由专门的社会管理部门制定、颁布的规则和规则约束下的秩序。社会共同约定是市场经济秩序。把这种约定上升为法律、法规、交易规则、技术质量标准以及道德准则等就是规则、制度。

人们对竞争经常有善恶褒贬的说法，但对秩序、规则本身则一般没有。不会有人说我们不需要秩序，不需要规则。但是对规则的认定则有很大的不同。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到过欧洲的人可能知道，那里的商店星期日不营业。周六也只开门很短的时间。为什么人们都休息，都有时间逛商店的时候那里的商家不营业呢？因为那里的老板说，老板也应当有周末的权利。那愿意休息不愿意赚钱的老板就关门休息好了。还不行。主张休息的老板说，我关门别人不关门，岂不是让别人占了我的市场份额了吗？我们得通过一条法律，就是周末谁也不许开门。开门就违法。大概欧洲的老板都同意这个提议，消费者也接受这个规定，所以那里商家的“游戏规则”之一就是周末不开门。

依据管理学的基本理论，规范化的社会共同约定，或者说社会共同行为规范，应当包括“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和“违背规范的后果如何”三个基本方面。常识可以理解，完善、顺畅的交通秩序一定包括“行人车辆靠右走”、“非机动车不可以在机动车道行驶”和“违规要受到惩罚”三个组成部分。维护交通秩序的“硬件”设施、交通秩序的具体组织与维护者等都是“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和“违背规范的后果如何”这三方面基本约定的延伸。如果秩序出现混乱，一定是这三个方面中的某一个环节出现了漏洞。市场经济秩序及维护这个秩序的规则也同样如此。

现在人们在讨论秩序、规则时喜欢说“公正”、“公开”、“公平”的“三公”原则。这三项的确是建立良好秩序的根本基础。但怎么样才算公正、公平？大家的判断标准并不一致。我们说个维护消费者权益的问题。

在我国现实的市场环境中，我们经常碰到一些地方、行业、企业用种种形式搞垄断价、地区封锁的事。垄断价肯定是侵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但搞垄断价的人也有很充足的理由。什么理由呢？为了保证国家税收，为了改善国有企业经营状况，为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这话听起来理直气壮。你消费者不过是个私人，为了国家、公家、国有资产的利益吃点亏还不是应当的么？

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呢？完全没有道理。

市场经济有个最基本的规律，叫等价交换。怎样才能等价交换呢？只能在供求双方平等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任何道德、法律或行政权力方面的不平等都会使等价交换的原则扭曲，都会导致市场经济关系紊乱。用理论化的语言说就是，市场交易规则中不能有任何的超经济强制。

我们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基本关系是两个完全平等的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不应当存在一方利益优先于另一方的特权。认为企业、供有者、政府一方是公，是公有利益；消费者是私，是私人利益，认为不能让公有利益吃亏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是把不同的经济关系，把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关系偷梁换柱地换到了供给与需求、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经济关系上。在厂商与消费者的交易过程中，不存在任何公与私的关系，消费者不论面对国有、集体、个体或外资企业，都是等价交换的过程，要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消费者没有义务为任何企业的所有者利益承担责任，没有义务为政府的税费增收承担责任。

把生产与消费区别为姓“公”和姓“私”的观念其实是在所有制关系上姓“公”姓“私”的争论在消费领域中的延续。为什么我国的市场经济秩序会出现混乱？这种错误观念的存在，以及在这种错误观念下形成的市场规则不合理是重要原因之一。这就提出了一个很严肃的命题，我国的消费理论、消费政策也要拨乱反正，而且要从深层次拨乱反正。

有必要强调指出，消费者利用自己的合法收人，在合法的消费过程中支出货币以换取消费资料，这是市场经济下正常合理的经济行为。消费者在这个经济行为中丝毫也没有占公共利益的便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经济关系，以及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经济关系，与“公有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关系毫不搭界。不仅如此，在当前改革的过程中，我们所要推进的恰恰是消费的“私人化”进程。例如公车改革、住房货币化改

革、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等。可以而且应当理直气壮地说，这个“私人化”代表着对客观规律的顺应，符合历史进步的方向。

别以为维护消费者利益是个小事。消费者这个概念本来就是市场经济的概念。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有“消费者”这个概念吗？没有。那时只有劳动者、创造者、贡献者的概念。人们认为消费是恶，生产、贡献是善，尽可能少地从社会索取，尽可能多地给社会贡献，才是必要的、崇高的。市场经济不是这样的，有生产就有消费，消费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环节。社会发展到今天，消费已经不再是生产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附属的环节，而是关键的、第一位的环节。创造出需求，才有生产发展的余地；创造不出需求，生产就会停滞、萎缩，经济就无法增长。改革发展到这一步，维护消费者权益已成为当前改革进程中社会经济关系调整最核心、最直接、最前沿的问题。

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家想，中国现在经济发展中最大的“瓶颈”是什么？是有效需求不足，是供大于求的失衡。过去几年来，我们花了那么大的政策代价去启动内需。在过去几年中，我国的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始终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目前这个余额已经达到十万亿元。这说明，人们消费的物质基础是存在的，老百姓有这个消费能力。人们为什么不消费？一定存在某种经济关系的障碍。其中之一，就是市场秩序不利于消费者，市场规则没有切实保护好消费者。当老百姓实现自己的消费行为时，他的利益总是受到侵害，你说他会愿意打开钱袋子吗？我们的消费者是理性的，是聪明的。他们不会因为市场规则的偏移而放弃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去选择那些质次、价高的产品。我们可以这样说，善待和尊重消费者，维护消费者利益就是扩大内需，就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具体体现形式之一，就是应对加入 WTO 挑战的最重要举措。

【2－1－3】市场经济秩序出现普遍性混乱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社会中有一部分人唯利是图或法制、道德操守低下。如果在实际经济运行中，当人们发现，破坏制度总是可以比遵守制度获得更大的收益，那么这个社会的经济秩序一定会趋于紊乱。因为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从遵守制度转向破坏制度。

市场秩序、市场规则不是哪个国家想怎么定就怎么定的。随着分工和交换范围的扩大，这种社会约定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实质上就是在加入一个世界公认的规则、秩序。WTO 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呢？其核心是在“公平交易、自由竞争”基础上的一系列协定，即大家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政府不能或只能尽可能少地设置障碍。我们必须遵守这些规

则。否则无法加入国际竞争中去，无法与外部世界形成稳定的分工关系。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产业、企业和外来竞争者之间将处于面对面的竞争格局，面对质量、价格、服务以及可持续发展以及维护消费者权益等诸多因素的较量。加入 WTO 后，我们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在企业的规模、技术、资本实力、产品质量、售后服务等方面，更重要的是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完善交易规则的挑战。举个例子说，我们维护消费者权益就得按照国际标准，而不是按传统思维下的“中国国情”来说话。我们的出口产品质量必须符合国际通行的，或者进口国规定的标准，不然就会受到抵制。

目前我国的水果生产在规模上已经是世界第一，在品种、成本上也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但遇到一个新问题，就是“农残”问题。农药残留在水果表皮及其深处，洗都洗不掉。制成果汁都去不掉。这个“农残”标准不是我们定的，是有国际标准的。这种标准既是一种市场规则，也是当前一种新的贸易保护、国际竞争工具，叫做非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包括技术壁垒、环保壁垒、消费者保护壁垒等。

不仅在国际市场如此。在国内市场上也得遵守国际共同的“游戏”规则。例如，如果中国企业在国内市场上维护消费者权益的标准低于国际标准，那么消费者就会买外国企业的东西。中国企业就不可能在国内市场上的竞争中取胜。很多人担心中国的企业能否承受得了国际标准。为什么承受不了呢？为什么只能由中国的消费者承受较低的权益保护标准，不能由企业承受较高的国际竞争标准呢？一方面，不是你想不想承受。这个共同的“游戏”规则是回避不了的。另一方面，没有什么比危机更能促进进化、进步和群体素质提高的了。事情逼到那一步，我相信中国的企业只会做得更好，不会做得更坏。

要想建立规范的秩序，就得解决“不遵守秩序怎么办”的问题。这就要有法。法律就是专管“不能干什么”的。为什么人们说，市场经济是法治的经济？因为离开法治，市场经济的秩序、规则寸步难行。

前期我国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状况已经发展到了失控的程度。我们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有个分析。认为其根本原因，在“无法可依”与“有法不依”两方面中，有法不依是导致混乱的主要原因；在“体制内”因素和“体制外”因素两方面中，政府、执法机构腐败及“猫鼠串通”等体制内因素的失控是主要原因；在市场机制与非市场机制两方面中，依托行政权力的垄断行为、地方保护主义等非市场机制是主要原因。

有人把当前我国市场经济秩序混乱的原因归结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制度“真空”。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其说明的只是表层原因。

中国的市场经济运行规则尽管仍不健全，但禁止和惩处故意危害人民健康与社会安全行为的法律还是明确具备的。一个显然的事实是，“毒大米”、“‘豆腐渣’工程”出现的原因并非是无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

关键是为什么有法不依。

从经济学意义上说，市场经济秩序出现普遍性混乱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社会中有一部分人唯利是图或道德操守低下。在任何制度背景下，唯利是图、损人利己、铤而走险或缺乏遵守共同行为准则意识的人总是存在的。我们说过，所有的经济学说都有一个共同假定，即人总是趋利避害的。不论社会具有怎样的公开约定，如果在实际经济运行中，当人们发现，破坏制度总是可以比遵守制度获得更大的收益，那么这个社会的经济秩序一定会趋于紊乱，因为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从遵守制度转向破坏制度。譬如制售假货可以骗钱且不受惩戒，或违规成本远低于违规收益时。这一点从常识中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会出现普遍性的“有法不依”？因为维护制度的人或机构本身也在从破坏制度中捞取“好处”。可以断言，凡是违规、违法现象长期、普遍存在的地方，一定有执法者与违法者的串通，一定有执法者从违法行为的存在中获取利益。

【2-1-4】信用这种资源不是和“大公无私”联系在一起，而是和财富、产权的多元化归属联系在一起的，是和保护多元化的社会利益联系在一起的。不讲信用就侵犯了别人的所有权。在计划经济、“一大二公”的体制下，几乎所有的财富、所有的资源都是国家的，无所谓产权，也就无所谓信用。

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碰到一个问题。“一手钱一手货”的交易方式不能满足需要。有时候需要先交钱后付货，有时候需要先付货后收钱。交换这个过程在时间上被分割开了。还不仅如此，人们还看到，有时候做生意时自己的资金不够，可以和亲戚朋友借。在进一步发展中，人们发现，这种“借”还可以由一个专门的社会中介机构来承担，当成个生意来做。于是就有了银行。由此，就发展起了我们今天所说的信用经济。以后，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更多的信用工具、信用方式被创造了出来。比如说人们已经有一定了解的债市。企业发债，投资者买企业债。在这个借贷关系中，双方谁也不认识谁。那债权人为什么能够把自己的钱让债务人拿去用呢？因为有信用参与其中。

在实践中人们发现，信用原来也是一种资源。利用信用资源，可以放大实际的资源规模，可以大大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可以动员更多的闲置资源

投入到经济活动中去。

在我国过去2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动用信用资源并不是一件新鲜事。我们的改革开放始终是伴随着信用资源的利用、优化配置和扩张而发展起来的。上海的宝钢最开始就是借钱修建的。债权融资在我国不是一件新事物。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几乎所有重大事件都和债权债务关系的发展密切相关。借钱就是动用信用资源。但是当时动用的主要是政府和财政的信用资源。此后，我们不仅懂得了动用信用资源，而且这个信用资源的涉及领域和范围还越来越扩大。

80年代初中期，对内举债、发行国库券的重要举措帮助我们渡过了“拨乱反正”后财政赤字高涨和第二次国民经济大调整的艰难岁月。此后，在80年代中后期的“拨改贷”，也是利用信用资源。就是把原来国有企业“统收统支”，由国家整个包下来的核算方式改为企业要扩大再生产向银行贷款。后来看这个措施可能存在很多缺陷，很不完善，导致了不良的后果。但无论如何，从懂得利用信用资源这个意义上，这项改革还是具有一定的市场化意义的。在90年代后期，我们有以增发国债为基本内容之一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等。这个历史过程表明，信用资源已经在我国的经济运行中占有着重要地位。

现在大家对国债这个信用形式的投资品种已经很熟悉了。最开始发行国库券时，各单位是摊派的，不买都不成，从你工资里扣。现在买国库券要排队。由于国库券具有风险低、收益高、流动性好等特点，现在这种信用品种已经为社会所普遍认同。

目前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政府的信用资源动用得比较充分了，但不是没有余地，而是还有余地。在2002年和2003年的“两会”上，有一些人大代表对持续增发国债的“积极财政政策”提出质疑。一些经济学家，包括一些媒体，也对这个问题有各种看法。这个担心并非没有道理。但是总体上说，我们现在的国债规模占GDP总额的比重明显低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继续动用财政资源还有余地。但我们认为，这个信用资源即便有余地，也要慎用。因为财政的信用资源也是有限的，这个信用资源应该在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更多地配置到提供公共产品的领域。而不是简单地配置在经营性资产的扩张上。公共产品包括社会保障体系、社会公共卫生安全等，也包括推动城市化进程、完善基础设施，以及调整社会公平程度等。这些方面都具有公共产品性质。

一方面，政府的信用资源动用得比较充分了；另一方面，企业的信用资源动用得比较过度了。正因为企业的信用资源动用得过度了，才有了人们所说的“三角债”，企业债务负担过重等诸多的社会现象；才有了银行不良资产

的问题。但与政府信用、企业信用相对照，我国13亿人口的个人信用资源则几乎处在空白状态下。而个人信用资源恰好是我们国家一个巨大的资源宝库。

有人说中国现在信用缺失。我认为这个看法不对。信用是我们几千年文化传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中国人的语言中，“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这样注重信用的话俯拾即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从贩夫走卒到文人士子都格外强调信用的重要。中国人怎么会没有信用呢？中国怎么会是个信用缺失的社会呢？关键问题有两个。一个是社会经济秩序存在着混乱，我们上面提到了。再一个是我们对市场经济下开拓信用资源的方式尚远不熟悉。

为什么说我们还远不熟悉呢？例如，在很多人的认识中，资本市场就是股票市场。其实这个认识很片面。资本市场包括两个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一个是股市，另一个是债市。一年期以上的债市也是资本市场。在所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债市的规模都远远大于股市。在过去七年中，发达国家债市的融资规模是股市的7倍。而在我们国家，债市小得可怜，和股市的规模相比明显失衡。

我国的个人信用资源没有被合理地动员出来，和我们的社会服务、社会投资、社会金融体系不完善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在过去20年中，改革开放给老百姓带来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私人财富有了一个初步的累积。这个私人财富的累积已经达到了相当规模，在很多地方已经超过了即期消费和远期消费这样一个分割的临界点。以前老百姓的钱没有花光把它存起来，是因为他为明年或者以后的消费留一个后手。他的收入主要满足近期消费和远期消费。但是现在相当多的城市中，人们收入的累积已经超过了近期消费和远期消费的区分。在一部分人群中已经出现了消费和投资的区分。私人财富达到这样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提供的社会化信用工具仍不充分。

现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加上股份制银行发的各种各样的卡，数一数，没有一百种，大概五十种也有了。每一个银行自己发的卡就有很多种。如果在城市里生活了一段时间，你口袋里和抽屉里的卡，用的和不用的大概有十几种。但是这些卡在开拓个人信用资源的同时，实际上是在分割着个人信用资源。

假定你拥有某银行的信用卡。信用卡通常都有一个可以透支的额度，当你一不小心花的钱超过你的透支额度了，例如本来允许你有5000元的信用额度，你陪女朋友出去玩，不留神花了7000元，回来忘了还了。过了一个月，

银行认为你是恶意透支，让公安局找你去了。这可能给你惹下很大麻烦。实际上，你的信用资源是不是连这7000元都不能支撑呢？远不是。可能在同一个银行，你的活期账户上还有5000元，一年期定期存单还有三万元，甚至美元存款还有几千上万。但就是在同一银行，所有这些账户中的个人资产信息是被分割的，不能够相互支撑。

最近几年，老百姓逐渐熟悉了一个词，叫消费信贷。这个问题值得多说几句。从1999年上半年迄今，各种媒体在“消费信贷”问题上的报道几乎是众口一词地让老百姓转变观念，要人们“敢于花明天的钱”。有的媒体甚至还用“敢不敢”的说法来挑战读者。不客气地说，这是一种误导，会造成很不良的社会后果。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老百姓生活的最大变化是什么？是人民积累了一定量的私人财富。“邓小平让中国人民富起来”的说法深入人心。而“敢于花明天的钱”的说法给人一种心理印象，好像小平同志尚未走远，国家就要把老百姓在过去20多年中千辛万苦积攒起来的钱折腾出去；折腾积蓄还嫌不够，还要人们把尚未挣到手的钱也提前消费。这种说法老百姓能“买账”吗？可见，把信贷消费说成就是要负债消费，这不仅是对开拓个人信用资源的曲解，而且会造成对改革进程的严重阻滞。

什么是信贷消费的真正意义呢？是开拓信用资源，放大社会和个人的消费及投资能力。举个例子说。假如你有了一笔100万元的私人资产。这笔钱可用于买个别墅住进去，改善你的住房条件；也可投资股市或者和你兄弟合伙开个饭馆，以便挣更多的钱。那怎么决策呢？市场经济下合理的选择是，或者说一个有益组合是，先买别墅住进去，然后把别墅抵押出贷款来再用于投资。

在这个例子中，对个人来说，是“一笔钱办成了两件事”，而且你的私人资产价值不仅没有因为动用信用资源而减少，反而增加了增值机会。更重要的是，社会经济发展可从这种组合中获取极大的好处。因为个人信用资源的参与使一份财富创造出了倍增的消费与投资需求。

在开拓信用资源的过程中，不光我们的媒体把信贷消费说成是让老百姓“花明天的钱”，我们的银行从内心深处、从骨子里也有这样的想法。银行总是假定每一个来贷款的都是穷人，贷款人即顾客都打算欺诈我。他们的规矩实际上是先假定来的100个人都是骗子，银行的任务就是把其中可能存在的一个好人挑出来。在这样的规矩和假定下，选择成本变得极其巨大，交易过程也变得极其复杂。你要申请消费信贷，银行就要求你有这个文件，要求你有那个章。还得有人给你担保等诸多手续。实际上，我们的老百姓是不是那

么没信用呢？不是。银行把信用资源单纯理解为了道德信用。其实，最有意义的信用资源不是道德信用，而是资产信用。

目前，中国老百姓的资产信用已经累积到了一个相当大的程度。从全国看，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已经有10万亿元。这还不算老百姓手里的国库券和企业债券，还不算他们在股票市场的金融资产。从理论意义上说，这10万亿元存款就足以担保人们借同样多的钱。在目前的城市居民中，保守的估计，有20%的家庭金融资产累计超过10万元。这是从人均抽样调查中得出的结论。在沿海开放城市，10万元的家庭金融资产算不上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但是请注意，中国城市家庭的20%是多少呢？是2630万户。开拓个人信用资源的时候，人们常常说要建立个人信用记录。我们的确需要完善信用记录这样一个社会信息系统。这是必要的。上海最先举办了征信公司，这无疑是一种社会进步，但是开拓社会信用资源，我以为最重要的还不是道德信用。

给大家作个比喻。我现在拿了一些文件来，有幼儿园老师给我开的证明，说我从小就不说假话；有小学同学给我写的书面证明，证明我上小学时就拾金不昧；有大学同学的证明，说我跟同学借钱都是按时还的；包括我们单位组织部门的证明，说这个同志一向廉洁奉公。拿着这么一些道德证明文件，银行敢不敢给我贷款？仍然不敢。反过来说，我现在就在同一个银行有5000美金的存单，还有10万元的人民币定期存款。我把这些金融资产抵押给银行，从银行贷给几万元炒股票成不成？肯定成。银行明知道对方是个无赖，他也可以放心无疑地把钱贷给你。对不对？这就叫资产信用。

开拓个人信用资源首先需要做好的一件事情是开拓个人资产信用。我认为有必要向我们的银行家强调这样一个观点，千万别以为老百姓到你那里去借钱是因为他们太穷了，穷到像杨白劳一样吃不起饭了。不是。恰恰相反，老百姓到银行贷款不是因为没钱，而是因为他们钱多了。是因为他们的钱多到需要“理财”的程度了。理财是什么含义呢？首先你得有资产，而且有一定规模的金融资产。然后你需要为这一定规模的资产寻求一个收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的组合。满足这个组合要求的工具之一，就是消费信贷，或者更准确一点说是私人信贷。

市场经济是本很厚的教科书，其内容非常生动有趣，千变万化。讲这些内容，三天三夜也讲不完。但最后，我们就得说到一个要害。什么要害呢？市场经济一定要求多层次、多元化的财富归属，一定要求尊重、保障要素所有者的所有权，一定要求产权明晰。

我特别希望大家深想一下，信用这种资源是和什么联系在一起的呢？不是和“大公无私”联系在一起，而是和财富、产权的多元化归属联系在一起

的，是和保护多元化的社会利益联系在一起的。你不讲信用，不按时还钱，就侵犯了别人的所有权。为什么我们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时候才有了动用信用资源的可能性呢？因为在计划经济、“一大二公”的体制下，几乎所有的财富、所有的资源都是国家的，都是归于一个利益主体的。还钱不还钱只是一个记账的要求，国家欠国家的，无所谓产权。无所谓产权，也就无所谓信用。

产权的多元化并不等于就是所有的财富、资源都归私人，不等于就是“全盘私有化”。实际上市场经济下的产权形式是极其丰富多样的。例如，我们办企业的都知道，除了自然人所有的产权外还有企业法人所有的产权。近年来我们还知道，除了对应于实物资产的产权外还有知识产权。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还提出，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改革措施之一将是，中央与地方政府分级行使所有者职能。这其中，不仅私人产权应当是有严格法律界定，受到制度保护的，而且国家、政府所有的产权也应当受到制度保护。

我们在改革构成中出现的一个问题是，很多国企欠银行钱不还，借的时候就没打算还。为什么呢？因为在一些企业领导人脑子里，我企业是国家的，银行也是国家的，国家借国家的还用还么？这种观念显然是从旧体制延续而来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谁也不能随意剥夺别人的产权。私人的不能剥夺，国家的、公有的也不能剥夺。有了这个制度，所谓的信用经济才能真正建立起来。这个问题我们在下面还会讲到。

2. 中国为什么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中国的改革还需要突破很多意识形态、习惯势力的障碍，经常需要在很多方面做出妥协。

☆ 人们为什么能够“隐性就业”呢？因为存在着隐性、半隐性的就业市场。

☆ 不触及产权的改革思路已经走到了尽头。经济体制改革的诸多思路不约而同地相交于一个共同点，这就是产权制度。

☆ 计划经济的前提是有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政府。这在我们可以想象的时间范围内不可能做到。

☆ 市场经济是个优胜劣汰的经济。谁可以实现资源利用效率最高，谁就应成为资源的支配者。

☆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市场经济就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大家”的经济。

☆ 公有制也要服从资本的运行规律。就赢利性领域说，国有资本与私人资本的职能并没有区别。

☆ 在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民经济只区分为“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

☆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中的“劳”不是实际付出的劳动消耗之“劳”，而是“社会必要劳动”之“劳”。

【2－2－1】我们的改革，最初并不是因为谁先知先觉地知道中国得走市场经济之路，中国还得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还得和国际经济接轨。最初没人知道。70年代末，就是因为农民吃不上饭了，要饿死人了，才有了把土地分给农民的改革。但在这个“单干”中，分散决策、承认个别利益、独立承担风险、生产者自由处置产品、价格随行就市等市场经济的几乎所有内容都已经包括在内了。

大家知道，我们的改革目标是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我们走到这个目标，经历过一个曲曲折折的认识过程。

我们的改革，最初并不是为谁先知先觉地知道中国得走市场经济之路，中国还得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还得和国际经济接轨。最初没人知道。70年代末，就是因为农民吃不上饭了，不改革要饿死人了，才有了农村“包产到户”，也就是把土地分给农民的改革。最开始还不能说是“分地”。地还是集体的。只能说是“联产计酬责任制”。叫做“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其实就是单干。但在这个“单干”中，分散决策、承认个别利益、独立承担风险、生产者自由处置产品、价格随行就市等市场经济的几乎所有内容都已经包括在内了。

在80年代初期，伴随着农村“联产计酬责任制”改革成功，人们开始思考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问题。当时由于就业的压力，城市已经出现了“个体户”等非公经济成分，并且表现出了明显的经济活力。但即或如此，人们对改革的认识并没有走出计划经济的基本框架。最初的思路叫“计划经济为主，商品经济为辅”。那时候还不认同市场经济，只能说“商品经济”。

为什么只说“商品经济”呢？当时的想法是只认同等价交换、企业核算等概念，不认同竞争。这个想法现在看起来很可笑。没有竞争怎么能有等价交换呢？而且真正有意义的核算应当是通过竞争和市场检验，按照市场承认的标准，就是理论上说的“社会必要标准”的核算，而不是财务账面上的核算。例如，现在大家都知道，你这个企业的产品卖多少钱，得以在市场上卖出去的那个销售价格，也就是市场接受的价格为准；而不可能以你自己的成本加你自己认为合理的利润来核算。但当时在理论上的突破远没有这么彻底。一直到80年代初期，我们的经济学教科书写的都是“社会主义只有竞赛，没有竞争”。

那个时候，虽然提出了要搞“商品经济”，但这个“商品经济”只是“为辅”的。资源配置的主导力量仍是计划、政府、国有企业。在这样一个“计划经济为主、商品经济为辅”的思路框架下，改革的措施主要集中在“奖金上不封顶下不保底”、“对企业减政放权、松绑让利”等方面。也就是说，在不触动计划、公有制这样一个根本格局的前提下调整政府和企业，那时就是指国有企业和城市集体企业之间的经济关系，以及企业和职工之间的经济关系。供和求这样两个市场经济的最重要因素并未成为影响资源配置的主要因素。

“计划经济为主、商品经济为辅”的思路实际仍然在延续计划经济的框架，仍然是改良的计划经济。这个改革思路到“翻两番”战略提出不久的80

年代中后期就遇到了挑战。在国民经济发展实践中，我们发现，商品经济仅仅“为辅”还不行。首先是供求关系不断出现的变化使自发性的市场力量表现出了极大的活力。那个时候在流通领域已经涌现出了一大批非公成分。一些当时被称为“倒爷”的人们，在计划力量无法达及的领域中，把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密切地连接了起来。当时这个变化叫做“多渠道、少环节”的流通领域改革。这个变化使国民经济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活力。与此同时，农民不再满足于“土里刨食”的传统生存模式。乡镇企业开始有了蓬勃发展。农民们依靠着“千方百计、千山万水、千言万语、千辛万苦”的精神，利用当时的市场短缺，把自己生产的产品送到了城市，极大地丰富了市场。更为人们熟悉的是，纯粹利用市场机制的“特区经济”开始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就像歌里唱的，“一个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划了一个圈”。这个“圈”就划出了中国改革的一片新天地。

这个新天地就是计划经济的框架开始被突破。80年代中后期，我们的改革尝试提出了一个最新的思路，叫做“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有它的历史贡献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这个提法使我们突破了计划经济的框架和束缚。请注意，不论这个说法是否完善，它毕竟是把“商品经济”放在了主要位置上。在语言逻辑上，商品经济是中心词，“有计划”只是一个起限定作用的修饰语。在语法上，这个词组叫做“偏正结构”。商品经济是“正”。有了这个理论上的突破，我们才可能有价格充分放开的改革，才可能开始探索“企业是什么”的问题；也才可能明确提出，中国经济在开放过程中要和世界经济接轨。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市场化改革取得了不容忽视的进展。例如，政府不再对价格实行管制。越来越多的市场价格由供求之间的竞争自主决定。这个进展的作用可以说是历史性的。要知道，一直到80年代中期，我们的火柴涨价还得“先党、团员后群众”，“先机关、企事业单位后居民”地层层转达呢。现在，人们对价格这个市场杠杆已经很熟悉和认同了。但是当时走过这样一段路是很不容易的。在这个改革过程中有过“价格闯关”的盲目冒进，出现过80年代后期通货膨胀的不良局面。但毕竟我们走过来了。再如，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开始讨论企业的地位、作用，开始探索企业利益。由此就有了“厂长、经理负责制”的制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企业“破产”这个词也在这个时候走入了人们的经济生活。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提法本身是有毛病的。商品经济，又要有计划，如同当时一些学者就指出的，这个提法好像是在说“铁的木”、“方的圆”一样不可思议，不合逻辑。但我们现在没必要嘲笑当时的幼稚。人的认识就

是这样走过来的。谁也不是神仙。何况，中国的改革并非是认识到客观规律就能实行的，还需要突破很多意识形态、习惯势力的障碍。在实际的发展进程中，改革经常需要在很多方面作出妥协。当时不把“计划”两个字加上，“计划经济为主”的格局就可能打不破。

在那个阶段，妥协表现在很多方面。再比如，当时有个“核心”和“中心”的说法。企业要实行厂长、经理责任制，那么就有人诘问，党委书记往哪里摆？厂长、书记谁是一把手？写文件的人就煞费苦心地想出了这么两个词，说“厂长是中心，书记是核心”。这么一说，确实是“八面见光”了。其实到现在也没人能说清，“核心”和“中心”孰大孰小，以及这两个“心”是什么关系。也许我们现在看起来，这个争论像“朝三暮四”和“朝四暮三”一样地可笑。但是当时颇有不少学者一本正经地就这个问题写过不少长篇大论的文章。我估计不少人还凭这个评了职称。

还有个例子是大家熟悉的股市。一直到90年代初期，在一些地方，包括北京的重点高校，倡导股份制还要被当做“自由化”来追查的。那个时候动辄问“姓社姓资”的声音还很有市场。后来股市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也是人们想出了一个妥协的办法，说开办股市是为了“扩大国有资产的支配力”。今天，我们又发展了，人们说，当初说股市是“为了扩大国有资产的支配力”的说法不对，不符合规范化的资本市场的要求；还说这个说法是导致国企为“圈钱”而上市、侵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根源。这个批评很对，我也非常同意。但这是现在的认识。当时要是不这么说，股市“姓什么”的问题就解决不了，我们向市场经济迈进的这一大步就迈不出去。

我们这门课不是叫做“理论与实践”吗？我想，这个“实践”不仅包括我们怎么做的，而且应当包括为什么这么做。不仅包括这么做的正面理由，而且应当包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存在缺陷的原因。

一直到90年代初期，到党的“十四大”的时候，我们终于明确地提出了要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改革目标。市场经济四个字的分量，可以说有千钧之重。在这个目标下，我们才有了推进国企股份制改造、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措施，才有了大力发展非公经济的体制空间，才有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历史性进步。

1999年末，中美之间签订了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定。2001年末，中国正式成为了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当时，全国人民为此欢欣鼓舞。媒体称，这是70年代初期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后，中国走向世界的又一大胜利。但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入世”的一个根本条件是什么呢？这个条件就是，申请国必须是“市场经济国家”；至少也得是市场化程

度已经达到世贸组织要求的程度，并且承诺在特定时间内完成市场化改革的国家。没有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改革，我们能够有这个胜利吗？不可能。

从90年代后期以来，大家逐渐熟悉了一个过去比较陌生的词，叫做“积极的财政政策”。从1998年以来，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我们应对通货紧缩威胁的过程中发挥了功不可没的作用。没有这个政策，我们就不可能成功地抵御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不可能在2001年和2002年的世界经济增长中呈现为“一花独秀”。这个“积极的财政政策”也是市场经济才有的政策。最近两年来很多人讨论的“建立公共财政的制度框架”。这个问题也是市场经济下才能提出来的问题。

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国民经济中的供求关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过去长期的短缺让位于相对过剩，卖方市场转变为了买方市场。在这样一个过程中，结构调整的原因、国企改革不断推进的原因、资源枯竭的原因等加在一起，“下岗”的问题骤然变得严峻起来。大量的国企职工离开劳动岗位。针对这样一种形势，我们坚决地推进市场化就业的改革方向，大大加快了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步伐。过去几年中，大家肯定听说过“两个确保、三条保障线”的说法。“两个确保”就是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和确保下岗职工生活费按时足额发放。“三条保障线”就是“下岗职工再就业服务中心”、失业保险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三条保障线。这个政策极大地缓解了当时非常尖锐的社会矛盾。大家想想，如果不是养老金从企业发放转为社会发放的改革，那么多连工资都发不出来的停产、半停产企业的退休职工今天的生活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在过去几年中，媒体还经常提到一个词，叫“隐性就业”。隐性就业可能会掩盖真实的社会就业水平，可能会导致社保资源的浪费。比如有媒体说有人开着私家车去领社会救济。这些弊端肯定都有。但是隐性就业也有一个好处。它实际上缓解了我们这个社会中由失业导致的矛盾冲突。人们为什么能够“隐性就业”呢？因为存在着隐性、半隐性的就业市场。不夸张地说，没有市场化的发展与改革，我们今天的形势可能容不得大家坐在这么好的教室里上EMBA课。

【2-2-2】公有制只是一种资源要素的所有制形式。我们没必要把公有制“神话”。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国民经济系统，其所能支配的资源总是有限的。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国民福利增加来说，究竟是这些资源写在谁的名下更重要，还是提高这些有限资源的利用效率更重要？市场经济是个优胜劣汰的经济。谁可以实现的资源利用效率最高，谁就应成为资源的支配者。

是不是我们提出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改革目标后，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面临的问题就都解决了呢？远没有。

在提出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改革目标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是很肤浅的。最初，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主要停留在两个表层层面。一是所有实物产品的交换都通过市场实现，交换过程的价格依照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二是企业的人财物、供产销不再由政府主导，不再由计划决定。一直到90年代末期之前，我们在“减政放权”、“价格放开”以及让企业成为“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等方面的改革都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到了90年代末，一个不能再回避的新问题提到了我们面前。这就是产权的改革问题。

在以往很长时期内的改革实践中，我们一直希望通过“责任制”、“承包制”等方式来回避掉产权问题。企图不触动产权，特别是不触动存量资产产权归属的前提下来寻求国企改革的出路。在这些努力中，人们熟悉的有“厂长经理责任制”和首钢“利润递增包干”的10年尝试，有“拨改贷”的改革和组建跨地区、跨产业的大企业集团等。比如说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屋子，我们不去追究其产权归属，也不去推动产权流动，而是通过“对外发包”或者责任制的方式来提高它的利用效率。这些想法的本意是绕过意识形态的争论。但可惜的是，这些努力都未能取得具有普遍意义的预期效果。到90年代末期，不触及产权的改革思路已经走到了尽头。经济体制改革的诸多思路不约而同地相交于一个共同点，这就是产权制度。

我们在哪些方面遇到了产权问题呢？

党的“十五大”报告就提出，国有经济要进行有进有退的战略性调整。“有进有退”是不是要涉及到产权的进退呢？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应当进行多元化的产权制度改造。这是不是产权问题呢？上届政府在“国企三年脱困”的努力中，朱镕基总理说“债转股”是“杀手锏”。“债转股”是什么呢？债权转股权当然是产权构成的调整。特别是转成股权之后的出路最终还要在市场上卖掉。大家知道，我们的社保基金有个“空账”问题。充实社保基金就要归还政府、国有资产的隐性负债。这必然要涉及到产权的问题。在国有企业职工体制身份转换问题上，上届的朱镕基总理亲自给这个转换起了个名字，叫“有偿解除劳动合同”。有偿解除劳动合同，拿什么“有偿”？有钱拿现钱，没钱用资产。这也回避不了产权的问题。我们一大批国有企业到海外上市，卖的是什么？是产权。最近，媒体讨论的一个热点是“人力资本”的问题。称“资本”就要涉及到产权。管理股、技术股的参与，必定引起产权构成的巨大变化。

往近处说，党的“十六大”提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要点是建立资产权、人权、事权“三统一”的新国资委，是中央与地方政府分别行使国有资产的出资人职能。这无疑是产权领域的变革。至于“国有资产能不能卖”的问题，更是产权市场化的关键之点。实际上，目前国有资产转让已经没有制度性的障碍。包括上市公司的国有股，都已经明文规定可以向外资转让。目前的约束只有两个：一个是允许外资进入的产业领域还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这个规定是和我们对 WTO 的承诺联系在一起的。另一个是国有资产转让需要履行的报批手续。但无论如何，已经没有“不能卖”的制度性规定了。

产权改革和产权的市场化问题是我们当前改革中的一个重点问题。在最后一讲中，时间允许的话我们还会专门涉及。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知其然”还得“知其所以然”。我们从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上面只涉及到了过程，并未深层次地触及“所以然”的问题。我们还得讨论一下“所以然”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讲不行。我认为，我们的理论界迄今对这个“所以然”讲得还不够。讲得不够，就经常有人跑出来怀疑改革的必要性。

我们前面提到过，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有三个基本支点，叫做计划经济、公有制、按劳分配。我们就把这三条和市场经济作个对比，深入解析一下。

计划经济是建立在人们对理想社会的设想基础上的。它的哲学基础是人可以事先理性地安排事物的发展进程。

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肯定是不断走向理性化的，人对自身命运的掌握程度肯定也是会不断提高的。但这是一个不断趋向的目标。我们目前能不能达到呢？

可以肯定地说，不能。

我们人类对自然、对社会、对我们自身的认识还远不充分。目前我们面临一个公共卫生危机的考验，就是 SARS 的威胁。SARS 袭来一段时间后，我们才发现，我们对这种最初等的微生物，这种病毒一无所知。我们以往所了解的病毒传播渠道、病毒发展特征和抵抗病毒侵害的经验等在这次疫情中几乎完全不适用。大家知道，前不久美国的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在返回地球时失事坠毁。美国打伊拉克的战争掩盖了人们对这件事的注意力。实际上危机远不止航天飞机坠毁，还有三个宇航员在宇宙空间站上没回来呢。没有新的航天飞机去接他们，这三个人就得永远留在外层空间围着地球转了。科技发达到今天，我们也还有太多的未知因素。

就经济学领域说，计划经济究竟有没有现实性呢？

从逻辑上说，计划经济的确说得通。人们把未来发展过程中的一切问题都首先预料到了，然后把可支配资源按照最优的关系、全社会的共同利益安排好。这不是最好的发展模式么？

事实上，这个模式要真的成立，有两个不可缺少的前提。一个是，我们得有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政府。而且这个政府一切行为的出发点都是最大限度地维护社会共同利益的。另一个是，我们得有足够充分的信息收集、整理、优化的手段和能力。

这两个前提能不能做得到呢？不可能做到。至少在我们可以想象的时间范围内不可能做到。

预见性是所有经济活动参与者都希望获得的能力。但是实际上预见、预知是非常难的事。为什么呢？因为客观世界的发展存在着太多的不确定因素。我国的股民据说有三千万，也有说真正活动的、实际操作账户的不过一千万。这千千万万的股民，在千百次的操作中，每个人每次买股票时的预期、判断都是上涨。没有一个人在任何一次买股票时的预期是下跌。除非她是成心替“大款”糟蹋钱的“二奶”。但结果如何呢？结果是这上千万、上亿次的决策中绝大多数是错的。不然为什么有70%的股民被“套”呢？

经济学家总是在不停地预测经济发展前景。但是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比股民没强到哪里去。我们发现，即或到了今天，我们对信息的掌握程度、处理信息的技术手段都比以前不知强了多少倍，但我们预见错的经常多于预见对的。要不怎么有人给经济学家下定义，说什么是经济学家呢？就是那些不断对未来作出判断，但其准确率比天气预报还低50个百分点的那伙人。

我给大家举几个现实的例子。

1996年，我国制定了一个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即“第九个五年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规划”。就是人们常说的“九五”计划。在这个中长期战略规划中，我们判断，在“九五”期间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危险仍是通货膨胀。而事实如大家所知，从1998年初起，我国国民经济运行的主要威胁是什么呢？恰好相反，是通货紧缩。在过去一些年中，我们的政策体系始终在致力于扩大内需。在一个关系国民经济战略全局的文件中，我们对最重要的趋势判断都估计错了。这个判断失误不是小错。就像一个股市中的股民，你对大盘是上升还是下跌这么一个基本趋势都估计反了，你再精选个股也非被动不可。

实际上，“九五”始料未及的远不止这一个方面。“九五”中期出现的许多问题，例如国企职工大量、普遍离开劳动岗位的下岗问题、亚洲金融危机

及其导致的外部增长环境恶化问题、长江大水以及由此显示的与自然界之间矛盾趋于激化的问题、后备资源严重不足和国际油市反复动荡引起的石油安全问题、东北老工业基地和西部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滞后问题等都存在着明显的估计不足。

如果说中国大陆的经济学家学问还没学到家，那我再给大家举个香港的例子。现在很多香港人的私人资产是负数。也就是“负资产”。这个“负资产”是怎么来的呢？

1997年上半年以前，全世界的经济学家都异口同声地说，环太平洋地区将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亚洲将是21世纪增长最快的地区。在那个时候，人们都对亚洲经济发展的未来抱有非常乐观的预期。人们普遍相信，今天买房子会比明天划算。明天的资产价格一定比今天更高。于是那个时候香港的楼市出现了非常火爆的局面。假如那个时候有个香港人买了一栋1000万港币的房子，按照香港买房子的惯例，300万“头款”，剩下七成银行“按揭”。这个模式大家都已经熟悉了。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问题来了。香港楼市的价格持续下跌。到现在，与1997年上半年相比，香港的房价已经跌去了65%。假定现在这个香港人和银行商量说，我当初交给开发商的300万元“头款”不要了，房子请你们银行收走，我“光屁股”走人，咱们“两清”行不行？银行说那不行。你跟银行借了700万元，现在你那个房子卖的话也就能卖350万元。剩下的那一半我们找谁要去呢？所以房子你还得住着，贷款还得还，这就叫“负资产”。看来香港人都是上了经济学家的当了。

再往近处说。到现在“十五”计划执行到一半了。“十五”计划我们判断准确了没有呢？也存在很多问题。过去两年，我们说中国的经济表现是“一花独秀”。支持这个“一花独秀”的主要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城市化，一个是制造业。这两个因素恰好是“十五”中并未给予重点关注的方面。这个问题我们在结构和区域两个专题中还会给大家介绍。

中期判断存在较大误差，短期行不行呢？短期也很难保证没有误差。

按照惯例，我们每年末有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结当年经济发展，部署下年经济工作。2001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曾估计，2002年，我国的出口能够保持上年的水平，弄好了能有微弱的正增长就不错了。为什么判断这么不乐观呢？因为一方面，我国的出口在2000年和2001年都有过一个较大的增幅，基数已经比较大。另一方面，2001年下半年，特别是第三季度之后，美国受到了9·11事件的打击，美国以及整个世界经济因此出现了明显的不景气，国际贸易明显呈现为紧缩趋势。外部市场紧缩，我国出口进一步增长的难度就会很大。再加上此前我国鼓励出口的政策已经用得差不多了。比

如说提高出口商品退税率，比如说给民营企业进出口权等。这些“招术”都使得差不多了。就好像医生治病，各种各样的药方都已经使得差不多了。所以我们并未对出口增长抱太大的指望。但结果怎么样呢？恰恰相反，在存在众多不确定因素的2002年，我们的出口和前一年相比增长了20%以上。而且在四个季度中一个季度比一个季度增长快。第一个季度增长18%，我们恐怕第二季度会掉下来。结果第二季度还快，第三个季度还快，这种格局一直持续到2003年的一季度。这一年我国的出口取得了始料未及的辉煌成绩。而且不仅出口增长快，出口构成也有明显的升级变化。这一年我国计算机及通讯类产品的出口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在45%以上。

2003年开局，我们对今年经济运行形势的判断要比2002年乐观得多。因为2002年开局的时候，不确定因素非常多。从外部看，世界经济是否会因美国9·11事件而出现衰退？从内部看，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多年后，需求拉动的增长格局究竟能否形成？有很多不确定因素，我们心里没有底数。但2003年恰好相反，有利因素要多得多，不利因素要少得多。而且最重要的是，不管有利还是不利因素，基本上都比较确定。好像不存在太大的变数。在这种情况下，尽管2003年“两会”上公布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是7%，但在经济学家们的心里头都认为，保持前两年“一花独秀”的格局应当问题不大。为什么呢？因为社会消费结构的变化已经明显显现出来了，汽车这一新的经济增长点已经明显启动，投资出现了多年未见的快速增长局面。一季度形势确实印证了这个乐观估计。2003年一季度和上年同期相比，我国的GDP增长速度是9.9%。远快于预期。就在大家都乐观的时候，“非典”来了。谁都没估计到的公共卫生危机落到了我们的头上。

别小看这个“非典”。最早出现的时候，我们以为它就像前两年出现过的禽流感、疯牛病一样，基本上没有传到中国，嚷嚷几天也就过去了，对中国的影响将是微乎其微。谁也没有想到会发展到后来这个态势，因为这是一个人类从未遇到过的“敌人”。我们几乎没有任何类似的经验。哪怕长江决口，我们都可以估计最大损失将会是怎样。但对“非典”我们一时却无法估计。我认为，我们对这次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决不要低估。即或从乐观估计出发，能够在上半年有效控制，我们的损失也将是很大的。现在我们国家加上周边国家“非典”患者以及死亡者人数比美国打伊拉克伤亡人数还要大。我们现在几乎所有的出国比赛都已经取消了，出国的代表团被对方拒绝接待。4月8号本来国际劳工组织要在中国开个会，我在这个会上还有个发言。因为要用英语，我费了很大力气准备材料。结果会议被取消了。国际劳工组织的一个官员因为感染SARS在北京亡故了。

有些专家说“非典”影响不大，理由是受打击的旅游、餐饮、交通等部门在国民经济中不占主要比重。这个话说得不大专业。这几个产业虽然不占主要比重，但却是过去几年国民经济中增长最快的产业。对国民经济增长影响最大的不是占比重最大的产业，而是增长最快的产业。打个比方说，在你们家中你挣的钱可能不占主要比重，你老父母的收入比你高很多；但他们的收入不再增长了，而你的收入却每年都有明显增长。你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下岗，对你们家收入增长的影响大还是不大呢？当然，我们也不要高估“非典”的负面影响。因为再怎么说，它也只是一个短期影响因素。

我们举上述例子是想说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类似的不确定性因素是经常会出现的。人类现在还不具备充分掌握和了解这些不确定性因素的能力。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网络、计算机、数学模型、研究人员、博士也还办不到，何况过去搞计划经济的那个时候。

在我们以往的改革中，计划经济是最先被改掉的。前面我们已经讲到过，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03 年“两会”之后，新一届政府的机构改革内容之一，就把过去的“国家计委”改为了“国家发改委”，就是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彻底去掉了“计划”两个字。政府机构的这一改革意味着，政府不再行使制定计划和利用计划配置资源的职能。

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中，第二个支点叫做“公有制”。对“公有制”这个概念，我们有必要追问一下当初传统理论的起源。

现在很多人以为，传统理论强调公有制是出于社会公平，或者共同富裕的目的。其实不是。公有制的必要性是由计划经济的必要性引起的。假定计划经济是必要的、合理的，那么怎么才能实行全社会的有计划呢？唯有把全社会的利益统一到一个主体头上才有可能。全社会没有个别利益，只有一个统一利益，那就是国家利益、政府利益。大家不分彼此，谁也没有更多的财富，人们的经济行为都服从于一个统一意志。那时全社会才能真正按照计划的要求行事。计划经济才能真正得以实施。

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中，公有制的必要性是和计划经济联系在一起的，与“社会公平”并无直接的逻辑联系。只是在中国，在我们国家的实践中，“一大二公”在“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体制中被更多赋予了实现社会“公平”的含义。

现在既然不实行计划经济了，那么公有制还有必要实行吗？可以肯定地说，为满足计划经济要求而实行的公有制已经基本上没有必要了。什么是“为满足计划经济而实行的公有制”呢？就是全社会的公有制。在计划经济

下，一部分公有，一部分私有是没意义的。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必要，而且也明确无误地不再实行那种全社会的公有制了。在实践中，在我国的国民经济中已经发展起了一大批非公经济成分。如同大家所知，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公有制只是一种资源要素的所有制形式。我们没必要把公有制“神话”，好像公有制才能促进国民经济的兴旺发达。请大家一起来想一个问题。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国民经济系统，其所能支配的资源总是有限的。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国民福利增加来说，究竟是这些资源写在谁的名下更重要，还是提高这些有限资源的利用效率更重要？我想，答案应当是显然的。国民经济兴旺发达的根本动因是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不是这些资源的归属写在谁的名下。市场经济是个优胜劣汰的经济。谁可以实现的资源利用效率最高，谁就应成为资源的支配者。

我们一再重复邓小平同志的一句话，“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怎样才能不贫穷？“发展是硬道理”，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是硬道理。在“十五”计划酝酿期间，我参加过很多地方政府的区域发展战略研究、研讨。相当多的地方政府都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一个认识，叫做“不求所有，但求所在”。什么叫“不求所有，但求所在”呢？就是企业的产权是否归我政府所有，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经济资源是否留在我这个区域内发挥作用，并且不断发展壮大。资源留在区域内，并且不断优化组合和提高利用效率，本省、本市、本县的税收就增加，就业就增加，经济总量就扩大。对区域经济发展来说，这才是最重要的。

在过去一些年中，中国的民营企业、民营经济展现出了极大的活力和竞争力。上海过去有个著名品牌的产品，叫“飞跃”牌缝纫机。以前老百姓家里娶媳妇，能买到一台“飞跃”牌缝纫机，那是很值得炫耀的一件事。那得走后门，“有路子”才行。但随着人们收入提高，生活水平改善，缝纫机已经退出了老百姓的消费领域。至少城市中，人们都买衣服穿了，谁还自己做衣服呢？更不要说补旧衣服了。由于市场急剧萎缩，又由于国企的机制不活，生产“飞跃”牌缝纫机的企业陷入了停产困境。一个浙江企业家独具慧眼，连品牌带设备从上海买走。现在这家企业是全球最大的工业用缝纫机出口制造商。

我们也没必要把公有制这种所有制形式“道德化”。迄今仍有很多人有种似是而非的想法，好像公有制毕竟是为全社会谋利益的，私人老板是为他自己谋利益的，由此认为，还是公有制好，我们还是应当多选择公有制，限制甚至抑制非公经济。

[2-2-3]千千万万的“老板”出资办企业本来是为自己谋取利益的，但要为自己谋取利益就得满足市场的需求，从而最终为全社会谋取了利益。“看不见的手”就是指导致这种主观与客观矛盾现象的市场机制。“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大家”是市场经济的大道理。没有这个道理，我们就不会有市场经济中的活力和优胜劣汰。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概括说，市场经济就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大家”的经济。

这里我们得讨论一个大家常听说的概念，叫做“看不见的手”。这个说法的内涵经常被人错误地引用。媒体上用“看不见的手”来描述价格波动的不确定性，以为“看不见的手”是指影响价格的一种人以外的异己力量。其实这个理解不对。在经济学理论中，“看不见的手”的本意是指，千千万万的“老板”出资办企业本来是为自己谋取利益的，但要为自己谋取利益就得满足市场的需求，从而最终为全社会谋取了利益。人们把这种现象形象地概括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大家”。“看不见的手”就是指导致这种主观与客观矛盾现象的市场机制。

“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大家”不是小道理，是市场经济的大道理。没有这个道理，我们就不会有市场经济，不会有市场经济下的效率，就不会有市场经济中的活力和优胜劣汰。在一定意义上说，我们甚至可以概括说，什么是市场经济呢？市场经济就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大家”的经济。

私人、民营、非公经济主观为自己，导致了全社会的经济发展。这好不好呢？没什么不好。我们说个管理学的道理。大家想，人在为自己的时候效率高呢，还是在被监督下的时候效率高呢？我们的国企在很长时间内曾企图用“监督”的办法解决效率问题、不负责的问题、贪污腐败的问题。现在我们已经发现，单纯依靠“监督”不是一个好办法。关键是要有好的制度设置。经理人股票期权激励机制就是一种制度设置。就是说，我们的国企也在寻求用“主观为自己”的制度设置来替代单纯“监督”的制度设置。

[2-2-4]在真正的市场经济下，国民经济只区分为“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所有以赢利为目的的经济活动都归入“私人部门”，不论出资人是私人还是政府。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下，“公”和“私”的区别只和职能联系，并不和所有制联系。

前面说到，对发展国民经济和提高国民福利来说，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比资源记在谁的名下更重要，这是不是就意味说，公有制就一定没效率，我们就不需要公有制了呢？我们还得对公有制说几句。党的“十六大”不仅强

调要发展非公经济，同时也格外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但是，我们得指出，这里说的公有制经济是与传统理论所说的那种“一大二公”的公有制经济是有着重要区别的。有哪些区别呢？主要有三方面。

第一，我们现在要实行的公有制实际上是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运行的、由国家、政府作为出资人的公有制，不是原来那种虚拟的“全民所有制”。首先是产权清晰，归政府所有。不是“谁都有份，但谁都不管”的公有制。其次是按市场经济原则运行。要参与竞争，要实行经济核算，要对经营的后果负责。

第二，公有制的基本实现形式将从国有企业转变为国有资本。五年多前的“十五大”报告就已经提出，我们要探索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这个“多种实现形式”的内涵之一，就是在不断推进的改革中，把所有制的概念从企业层面改变到资本层面。企业就是企业，企业没有所有制。出资人及其资本归属才有所有制。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说到，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为什么呢？因为“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具有关键性作用”。这段话很值得反复寻味。请大家注意，这里说的是“国有经济”，而不是“国有企业”。

第三，除特殊领域外，公有制也要服从资本的运行规律。我们的国有资产实际上可以分为行使不同职能的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提供公共产品或者准公共产品的。比如国防、钞票印刷、重要交通基础设施等。人们很容易理解，这个部分不赚钱也得干。这是政府的责任。另一个部分是用来赢利的。这个部分则必须服从资本的运行规律。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就赢利性领域说，哪怕是百分之百的国有独资企业，其行为同样是出自“经济人”动机。在这个动机下，国有资本与私人资本的职能并没有区别，它们在参与社会经济活动过程中的运行规则、行为方式也没有区别。

其实，在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民经济只区分为“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所有以赢利为目的的经济活动都归入“私人部门”，不论出资人是私人还是政府。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下，“公”和“私”的区别只和职能联系，并不和所有制联系。

从国有企业到国有资本的改革，以及产权的市场化问题话题也很长。我们在最后一讲关于改革的专题中还有机会涉及。

下面就要说到传统理论的第三个支点，也就是“按劳分配”的问题了。

按劳分配本身没什么不好。市场经济也得讲按劳分配。就是在私人企业中，你能干，干的活多，你的薪水就会高。这个原则大家并无异议。但实际

上，我们在原有体制下并没有真正实行过“按劳分配”。我们实行的是什么呢？是“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大锅饭”。再加上在当时国民经济处在短缺条件下，几乎所有的消费品都不得不实行“配给制”，凭票供应。那时有“按劳分配”吗？并没有。这个弊端早在上世纪的80年代初期就已经为人们所认识。

市场经济下的按劳分配不仅要打破“大锅饭”，还得讲究一下按什么“劳”分配。因为工作关系，我每天大概要接待三个以上的记者。打电话来的，扛着摄像机直接找来的，都有。迄今仍经常有记者在采访时问我，说某两个企业的职工付出是一样的，报酬相差很多，这是否公平？这就涉及到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已经解释清楚了的重要理论概念，叫做“社会必要劳动”。

特别要强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中的“劳”不是你实际付出的劳动消耗之“劳”，而是“社会必要劳动”之“劳”。不是按照每个人生理意义上的付出进行分配，而是把你的付出按照一定的社会必要标准折算以后再分配。通俗地说就是，得按社会对你劳动的承认程度进行分配。这很容易理解。你不会干，蛮干，即使你“出大力流大汗”，付出的劳动可能只是无效劳动。你生产的产品卖不出去，你付出的劳动也是无效劳动。

市场经济不仅有“按劳分配”，而且有“按要素分配”。这个问题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也专门讲到了，叫做要确立按照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的原则。劳动也是一种要素。各种要素的所有者凭借各自要素的贡献参与分配。这句话概括得非常好。不仅说到要按要素分配，而且强调要按照各种要素的贡献进行分配。包括按“劳”的部分，也要按贡献进行分配。

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我们在分配制度上的改革主要是四个方面。一是打破“大锅饭”，真正实行多劳多得。二是按照市场化原则，根据社会承认程度进行分配。三是实行按劳分配和按照要素的贡献进行分配相结合。四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我们在以后的“全面小康建设”专题中还会专门讲这个问题。

对“按劳分配”，我们还有必要讲到一个问题。在传统理论中，“按劳分配”这个概念说全了，本来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实际上包含着两方面含义。一是人们的一切劳动能力都要全部参与到社会劳动中去。二是一切消费资料的获取都和对社会劳动的直接参与相联系。现在看，这样的理论出发点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也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我国是一个人口和劳动力供给大国，就业岗位的供求矛盾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客观必然。我们不可能提供让每个人都“各尽所能”的机会。不仅就业岗位有限，而且有限的就业岗位还要不断向竞争力较强的群体倾斜。就是择优上岗。因此我们就得承认一个现实：让一些劳动能力弱化的劳动者不断退出劳动力供给队伍，这是一个合理的选择。用理论化的语言说就是，适度降低劳动者对社会劳动的参与率。这是缓解就业压力不可避免的重要措施之一。失业、下岗职工的出路应当包括安置和再就业两个方面。其中“安置”的基本含义就是要依靠不断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使一部分劳动者退出劳动力供给队伍。

9. 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矛盾

☆ 每当人们协调好市场和政府之间的矛盾关系时，社会经济就向前发展；每当这个矛盾趋于激化时，社会经济就遇到麻烦。

☆ 竞争产生竞争效益，生产集中导致规模效益。后人把这个论断叫做“马歇尔两难”。

☆ 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竞争不足。一旦遇到新的经济矛盾，人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从旧体制的经验中寻求答案。

☆ 我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并非是资源的稀缺，而是资源配置的无效率和非优化。

☆ 政府总是要站在反垄断立场上的。垄断是厂商的本能取向，反垄断是政府的天然职责。

☆ 拿价格说话，这种尺度的单一性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 问题不在于存在着价格竞争，而在于那些劣的企业无法顺畅地从供给领域退出。

☆ 局部市场与统一市场之间的矛盾并非只是地方保护主义，国内市场与世界市场之间的矛盾关系也在激化。

☆ 要把资源集中起来，又不能打破资源归属的制度约定，市场经济就是在这两个约束条件下证明了自己的神奇。

☆ 不能公开剥夺，也不能暗中剥夺。前期股市发展的不完善就在于存在着允许暗中剥夺的漏洞。

☆ 资本市场的真谛不是把别人的钱装到自己口袋里的“游戏”，而是尊重、保护、维护多元化的产权归属的制度产物。

【2-3-1】我们的改革面临的大量问题，背后隐藏的是如何处理好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如何协调和这个矛盾的问题。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问题、民航、电力、电信以及铁路等行业的资产重组问题，国企职工身份转换问题，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问题、整顿与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问题，以致我国“入世”后面临的挑战问题等，无一不涉及到市场与政府之间的这一矛盾。

我们前面讲到，市场经济是一个讲求效率和优化的社会经济形态。但如果再深入分析，效率和优化是从哪里来的呢？从竞争、分散决策、各种资源的自发动员能力等方面来。市场经济并不是一个完美的社会经济形态。就是最崇尚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也得承认，市场经济是有缺陷的经济形态。在市场经济的运行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很多基本矛盾。

什么叫基本矛盾呢？我们不是说人和自然界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永远是人类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这是哲学意义上的。我们说的是特定经济形态下的基本矛盾。只要是市场经济，这些矛盾冲突就存在，而且是每时每刻都存在。我们在发展、改革中面临的各种经济难题实际上最终都出自这些基本矛盾。

有哪些矛盾呢？从各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和迄今经济学的理性总结看，有这么四个矛盾是回避不了的。一是政府和市场的矛盾，二是竞争和垄断的矛盾，三是局部市场和统一市场的矛盾，四是产权多元化和资源集中的矛盾。每当人们把这些矛盾关系协调得好一些的时候，社会经济就出现较顺畅的发展。每当人们忽视了这些矛盾，人们的认识不符合客观规律时，这些矛盾就激化，社会经济发展就受到挫折。

第一，政府和市场的矛盾。

人类有政府的历史很长久了。但有和市场机制相对抗的政府，这个历史并不很长。我们这里的很多学员可能去过欧洲。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在欧洲的很多城市中都有一个非常有历史特色的广场。布鲁塞尔的那个小广场是个旅游景点，旅游团经常去。据说马克思写《资本论》时就住在那个广场角落里的一家小旅馆中。

布鲁塞尔的小广场很有代表性。那个城市小广场呈现为一个“天井”的格局。一面是王宫，也有说是市政厅，王权领导下的市政厅。王宫对面是教堂。两侧的建筑在历史上是商会。王宫和教堂的堂皇当然不用说。但那些商会的建筑迄今看起来仍可以想象，当初的豪华富丽程度应当不亚于王宫和教堂。这种格局的城市广场相当形象地体现着当初欧洲工业化和市场经济发展初期，市民阶层的“商会”挑战王权、神权的过程。在那个时候的欧洲，商

会实际上是真正的市政府。他们拥有着制定交易规则、收取税赋的实际权力。王权、神权只能从他们收取的赋税中分取利益而已。为什么那个时候的商会能有这么大的社会权力呢？因为工业化带来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一方面要求发展竞争，一方面又要求有对竞争进行协调的社会统一力量。这两件事王权和神权都管不了，只能交给商会来管。站在布鲁塞尔那个城市广场中，人们大概能够悟到，马克思是怎样站在那个小旅馆的窗前，亲眼目睹着资本借助机器生产力、通过竞争和协调竞争的能力从贵族和宗教手中攫取到社会统治权力，从而写出不朽巨著《资本论》的。

我们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自发竞争的市场机制和协调竞争的政府作用，从市场经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始终是相伴相随的。

市场经济诞生的初期，人们相信自由竞争的力量，几乎“一边倒”地排斥社会统一管理经济、干预经济的政府。人们认为，最多有个商会，再有个法律，能够议定“游戏”规则、裁判争端就行了。不需要有个掌握资源并且干预经济的政府。那个时候有个历史上曾经有一定影响力的政治思潮，叫做“无政府主义”。这个“无政府主义”政治思潮的诞生和兴盛，和当时市场经济下方兴未艾的自由竞争发展密切相关。

当时只有马克思冷静地指出，自由竞争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供求之间的矛盾、社会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一定会趋于激化。这种激化肯定会导致经济危机。他呼吁，社会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协调力量才能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当然，马克思的这个呼吁被后人发挥成了计划经济，把事情推到了另一个极端。这是后话。按下暂且不表。

自由竞争的确造就了大机器工业的迅速发展。最具代表性的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工业化的迅速实现，但马克思也不幸言中。我们在上一讲中提到，1929年到1933年，全球爆发了严重的过剩危机，世界经济陷入了一个大萧条时期。痛定思痛，人们开始认识到没有政府还真不行。于是此后就诞生了“凯恩斯主义”。如同我们前一讲提到的，宏观经济学强调，政府要干预经济，其中主要是干预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请注意，宏观经济学强调的政府作用并不是我们现在很多人说的“制定规则”和“维护秩序”，而是“干预”。运用一定的资源配置力量干预。

宏观经济理论的确有效。由于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协调，市场经济又获得了一个较大的发展空间。从40年代末期开始，战后很多发达国家为什么越来越少地发生那种危机性的供求失衡了呢？为什么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抗也日趋缓解了呢？这和政府对市场的适度干预，从而主动调整社会利益矛盾密切相关。

但经济再向前发展，新的矛盾又出来了。日本作为后起的工业化国家要实现经济赶超。50年代初期，美国人告诉日本人，市场机制是万能的，千万不要违背市场自身的要求。日本人认为，发达国家已经把最赚钱的行业都给垄断了，他们的企业也已经非常强大了，在这种“先行者利益”面前，单纯的自由竞争肯定不会有日本的“好果子”吃。日本要造就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出口产业，政府必须扶持。日本人还由此造出了一个词儿，叫做“市场失败”。就是市场机制在某些情况下会导致非良性后果的意思。比如不顾社会利益的污染、恶性竞争、无人肯投资基础设施等。由此就有了日本的产业政策。

日本的产业政策造就了市场与政府之间的一种新型格局。这种格局还真的使日本一举成为了世界经济大国。于是人们说，日本的经验好，应当照日本的这个产业政策办，政府不仅应当干预总量，还应当干预结构、干预产业发展。韩国把日本的产业政策又进一步发挥，形成了政府扶持大企业的模式。韩国也有了举世公认的发展。到亚洲金融危机之前，韩国的发达程度在世界上排名第九。

但很不幸，就在人们沉溺于这些成功时，市场又提出了新的挑战。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1998年初，这个危机从东南亚蔓延到东亚。在这场危机中，日本、韩国模式的缺陷充分地暴露了出来。政府扶持下的企业、产业的脆弱性充分地暴露出来。此后，人们开始对以前崇尚的产业政策、大企业模式提出了很多反思和批判。

到今天，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处理好了没有呢？还没有。这里再给大家举个近处的例子。2001年3月，美国的加州连续爆发了多次大规模的分区停电，近百万居民的生活受到影响。这就是对美国后来一系列政策发生重大影响的“加州电力危机事件”。

加州是个什么地方？是著名的“硅谷”所在地，可以说是“新经济”的心脏地区。而电力是什么？是工业文明的基本标志。加州为什么会爆发电力危机？是美国人不会发电，或者没有能力协调电力供求？都不是。此前，美国在克林顿手里连续出现了八年多的经济景气。美国人相信，高科技主导下的“新经济”时代已经到来了，电力这种传统产业已经成为“夕阳产业”了。在此乐观估计下，市场导向下的资源配置机制出现了偏差，资源大量、集中地流向了高科技产业。到2000年5月时，作为“新经济”代表的纳斯达克指数达到创记录的5400点高位。这造就了无数的新富翁，也给人们带来了关于财富神话的无尽想象。而在此时，被人们忽略的电力等传统产业已经无法通过市场、通过竞争获得足够多的资源，已经明显出现发展乏力的迹象。

偏偏在这个时候，美国政府认为，都到“新经济”时代了，我还扶持你

一个夕阳产业干什么呢？于是打算进一步改革电力的资源配置格局，把电力供求全交给市场来调节，政府退出对电力产业的扶持。政府的一个失误，加州就爆发了震撼“新经济”心脏的电力危机。

别小看“加州电力危机”影响。美国后来许多重大政策都受到这个事件的影响。2001年5月，布什签署了一项“新能源计划”，叫New Energy Plan。按照这个“新能源计划”，美国打算在政府扶持下重新大力发展传统能源，甚至不惜降低美国的环境保护标准以及放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遏止全球变暖的国际义务。可以说，美国那么急切地打伊拉克，和对传统能源的再次关注密切相关。

这个过程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每当人们协调好市场和政府之间的矛盾关系时，社会经济就向前发展；每当这个矛盾趋于激化时，社会经济就遇到麻烦。每当人们根据形势变化对矛盾双方的关系及时作出合理调整时，社会经济就顺畅发展；每当人们忽略了变化，矛盾双方的关系滞后于新的形势时，社会经济就面临新的危机。

我国过去的实践正好是另一个极端。计划经济就是完全否定市场的作用，极度夸大政府作用的一种经济形态。我国过去很长时期的发展实践已经证明了这种经济形态的失败。我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改革，就是让市场机制充分发育，充当资源配置主导性力量的改革。

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改革，是不是就是“政府退出”和“市场进入”呢？也不是。我们的改革也得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这里也给大家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忽视政府作用而滥用市场机制的例子。80年代中、后期，各地发展经济的呼声非常高涨。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就提出了一个“有水快流”的战略，让各地有什么资源就发挥什么优势，“国家、集体、个人一块儿上”。把资源产业发展完全交给了市场。结果导致了小煤窑、小矿山遍地开花，人们不顾条件地对各种自然资源实行掠夺性开采。这种滥采滥挖造成了对资源、对环境的极大破坏。这个恶果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消除。最近一段时期来，根本没有基本安全措施的小煤窑连续出现特大恶性事故，屡禁不绝。其实就是那一段资源产业发展失控的后遗症。

另一个是排斥市场作用而滥用政府权力的例子。是不久前才发生的。河南是我国小麦主产区，河南人爱吃馒头。于是在郑州就发展起了一个“馒头产业”，有人专门蒸馒头供应市场，做这个生意。郑州市政府说，馒头是吃的，这个事情关系到人民健康，政府得管这个市场。于是就成立了专门管馒头市场的“馒头办”。市政府成立了“馒头办”，区政府也成立“馒头办”。这

些“馒头办”管什么呢？管批蒸馒头卖的许可证。不白批，得交钱。交钱还不算，还得买“馒头办”指定厂家的面粉。大家很容易想见，这个“馒头办”是在规范市场呢，还是在滥用行政权力从市场中“寻租”，攫取利益呢？最后是市政府的“馒头办”和区政府的“馒头办”因为利益分配不均打起来了，互相不承认对方发的“证”，这个荒唐事才在媒体的报道下寿终正寝。

我们的改革面临的大量问题，实际上如果深入观察就会发现，这些问题背后隐藏的，也是如何处理好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如何协调和这个矛盾的问题。前几年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问题，最近的民航、电力、电信以及铁路等行业的资产重组问题，国企职工身份转换问题，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问题、整顿与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问题，以致到我国“入世”后面临的挑战问题等，无一不涉及到市场与政府之间的这一矛盾。

【2-3-2】垄断是市场经济的大敌，是一种腐败，是一种市场暴力。垄断导致技术停滞与制度腐败。垄断没有什么“好”、“坏”之分。当生产力发展在客观上导致一定的垄断时，我们的选择不是维护垄断，而是寻求新的竞争机制，在更高层次上发展竞争。

第二，竞争和垄断的矛盾。

市场经济就是靠竞争来完成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促进效率不断提高的。但在实践中，人们还经常不得不向垄断妥协。为什么呢？因为工业化带来了一个重要的效益现象，叫做“规模效益”。

最近一些年来，“规模经济”的说法经常出现于各种媒体，但很多地方是在“望文生义”地滥用。“规模经济”不是指大企业有实力，能够轻易排挤小企业的意思。这个概念是和工业化、和机器手段的不断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人们从常识中可以知道，在很多工业产业中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产量规模越大，单位产品成本就越低。为什么呢？因为有个“固定成本”分摊的问题。

“固定成本”就是你开不开工都得付的成本。比如地租、房租、银行利息、设备折旧等等。这个固定成本一般和产量无关。不会因为产量增加而增加。显然，产量越大，也就是规模越大，分摊到单位产品中的固定成本就会越少。产品成本低了价格就会低，产品就可以有更大的市场竞争力。这种现象叫做规模的经济性。

规模的经济性是工业化阶段的一个特有现象，是成批、大量生产的产物。也就是说，是生产力的要求。但问题就出在这里。成批、大量生产就要求有

较大的市场。一家工厂的供应能力就可以满足方圆很大一块区域的需求。在工业化理论中，这叫“生产集中规律”。

生产集中给人们出了一个难题。因为生产一集中，市场供给就集中到了一家企业，就导致了垄断。要竞争就得一定程度地分散生产，缩小单厂规模。19世纪末时，英国有个经济学派叫“剑桥学派”，这个学派的创始人叫马歇尔。他认为，竞争产生竞争效益，生产集中导致规模效益。人们需要不断在这个两难中作出选择。后人把他这个论断，以及人类在市场经济发展中不断面临的竞争与垄断之间的矛盾叫做“马歇尔两难”。

在整个20世纪，可以说市场经济的发展始终和协调这个两难的矛盾密切联系在一起。俄国十月革命的领导人列宁最先提出，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特征就是垄断，垄断了就要打世界大战。这个结论就是“列宁主义”的核心。后来的历史发展也不幸被他言中。美国人最强调“竞争优先”，说美国的富强就是因为崇尚竞争。在美国，反垄断法是发达国家中最严厉的。大家肯定听说过最近两年来“微软”被控垄断的案例。美国强行将规模大到在市场中占有绝对份额的公司拆分，这在历史上发生过很多例。日本人嘲笑美国人是“把下金蛋的鹅放到案板上剁”。日本经济政策的特点是在“马歇尔两难”中选择“生产集中优先”，选择规模优先。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新日铁”，当初就是在日本政府政策的左右下，由日本排名第一和第二的“八藩”和“富士”两家公司合并而成的。但美国人也并非不搞垄断。迄今世界上那些跨国公司中美国资本是大头。日本也不是不搞竞争，他要搞的是国际竞争优先。从上世纪70年代起持续30年的“日美汽车贸易摩擦”就是国际竞争中的剧烈摩擦。

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竞争与垄断之间的矛盾关系又有了新特点。消费需求不肯再满足于成批、大量生产下的价格便宜，而改为要求多样化、个性化。大家可能注意到了，“非典”时期的口罩都要体现个性。很多人在自己的口罩上画上卡通形象等体现个性的图案。小批量生产又成为新的生产方式。不仅如此，由于技术进步不断加速，规模的经济性往往成为了阻碍技术升级的“拦路虎”。

给大家举个例子。我国在80年代中期发展家电业的时候，很多省区都纷纷引进设备，上马冰箱、彩电。因为一开始实力有限，往往引进的生产线规模都不够大。后来很多人就批评家电业“重复建设”、“重复引进”，不懂得利用规模的经济性。到80年代末，录像机又开始在市场上出现了。当时中央有关领导就下了个指示，说这次再不能重复建设、重复引进了，全国就建一座录像机厂，哪个省都不准单独建。中国这么大市场，就建一个录像机厂，那

还能达不到经济规模吗？肯定能达到。但是没想到的是，经济规模的目标倒是达到了，但技术又进步了，录像机的技术寿命完结了。现在 VCD 都过时了，DVD 又出来了。那个录像机厂的规模再经济，单位产品成本再低，价格再便宜，问题是谁还买呀？

大家知道，汽车产业是一个规模经济非常明显的产业。2000 年时，我国轿车业的发展曾面临过一个争执。当时很多人呼吁国产车降价。人们说，中国加入 WTO 在即了，那么高的价格谁买呀？汽车厂家说，你们消费者要是多买我就降价。消费者说，你要降价我就多买。结果形成了一段对峙局面。后来还是厂家先降价，由此引发了 2002 年中国的“轿车元年”。最近轿车销售火爆，网上兴起了一种新的购车方式，叫做“团购”。有人发起，欲购车的消费者先在网上报名，报够了一定数量，再集中和厂家“侃价”。据说依车型不同，价格能比自己单独去买便宜 5000 元到 20000 元不等。

市场经济在我国的发展历史还不长。从我国的情况看，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竞争不足。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后，很多人忧心忡忡于有些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不高。为什么不高呢？因为缺乏优胜劣汰的市场“洗礼”。

当前在我们的市场化改革中，反垄断的迫切性正在明显增加。一方面，我国正处于工业化过程中，大机器应用造就的生产集中很容易带来市场份额的过度集中。另一方面，我国又处于经济体制的转换过程中，依靠行政权力决定垄断价格的旧体制痕迹还远未清除干净。一旦遇到新的经济矛盾，人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从旧体制的经验中寻求答案。

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最大“瓶颈”并非是资源的稀缺，而是资源配置的无效率和非优化。谁能完成资源配置的优化呢？是市场，是竞争。我国启动消费的根本难点在于旧体制遗留下来的垄断性消费条件抑制了消费者的消费欲望。我国投资需求不足的关键在于民间投资无法跨越很多产业的垄断性“进入壁垒”。国企改革的最终出路也在于赋予其优胜劣汰的机制。

说竞争和垄断是一对矛盾，人们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经常会面临“两难”，并不是说垄断也有好的一面。垄断是什么？垄断是市场经济的大敌，是一种腐朽，是一种市场暴力。垄断导致技术停滞与制度腐败。我们可以明确无误地说，垄断没有什么“好”、“坏”之分。当生产力发展在客观上导致一定的垄断时，我们的选择不是维护垄断，而是寻求新的竞争机制，在更高层次上发展竞争。

竞争是市场经济优化配置资源的根本手段。但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实现充分竞争的。在现实生活中，有时候还得容忍垄断的合理存在。例如，

不可能在一个住宅小区内设置两个自来水公司供水。在这种“自然垄断”领域，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作用是失效的。为了利用规模经济、降低单位成本，就得在市场份额上容许一定垄断因素的存在。但这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被迫选择。自然垄断并不等于说无须贯彻市场原则。怎么贯彻呢？人们已经创造出了很多成熟的做法。例如，对参与主体采取招标方式进行优化选择；再如，通过“听证会”等方式要求那些实施必要垄断行为的主体证明其行为确实符合公众、社会的整体利益。

应当格外强调的是，容忍一定程度的垄断不等于说政府或者政策应当鼓励垄断。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厂商为了自身的利润最大化，总是不断趋向于获取垄断地位。而政府及其政策在什么时候都不能鼓励或纵容垄断。相反，在所有市场机制发展成熟的国家，政府都总是要站在反垄断立场上的。换言之，垄断是厂商的本能取向，反垄断是政府的天然职责。

【2-3-3】价格竞争没有什么不好。人们普遍关心价格，企业普遍学会用价格和社会对话，这是一种历史进步，是市场经济制度发展的表现嘛。市场经济的最大特点就是把交易过程中的一切条件都换算为单一的货币单位。拿价格说话，这种尺度的单一性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在这个“拿价格说话”的过程中，有限的资源就被配置到了那些“优”的生产者手中。

一段时期来，我们的媒体对“价格战”口诛笔伐的颇多。这个问题也许值得多说几句。说清楚这个道理，非常有助于大家理解市场经济下一个极为重要的杠杆作用，这就是价格。

在规范的经济学概念中，根本不存在什么“价格战”的说法，有的只是价格竞争。其实，同样的事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长年累月每天都在发生，人们早已习以为常，没有谁会对此大惊小怪。

价格竞争有什么不好吗？价格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人们普遍关心价格，企业普遍学会用价格和社会对话，这难道不是一种历史进步，是市场经济制度发展的表现吗？这当然是好事。

我们一些媒体把“价格战”归结为卖方竞相削价。好像我们的厂家、商家都特别愿意把东西更便宜地卖给消费者似的。这是只见现象不见本质的认识。

厂家、商家为什么要竞相削价呢？因为资源有限、市场有限、机会有限。市场经济下的参与者都是平等的。要获取有限的资源、市场、机会，就得参与竞争，证明自己比别人更优。竞争过程就是社会的优化选择过程。

优化选择就得有个尺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就是社会评判优劣的最重要尺度。价格竞争是市场经济下最基本的竞争形式。其他所有竞争形式，包括品牌竞争、质量竞争、服务竞争、品种竞争以及技术竞争等，都只能是价格竞争的延伸。其实，在市场经济下其他所有形式的竞争力都是可以换算为价格的。

我们特别有必要指出一个深层次的道理：市场经济的最大特点就是把交易过程中的一切条件都换算为单一的货币单位。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拿钱说话”，“拿价格说话”。这种尺度的单一性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在这个“拿价格说话”的过程中，有限的资源就被配置到了那些“优”的生产者手中。

确实有很多人担心，价格竞争是否会导致一些行业出现“全行业垮台”。这种说法可以一言以蔽之，叫做“杞人忧天”。在全世界各国的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从来没有过因为价格竞争而导致“全行业垮台”的先例。为什么？因为竞争总是导致效率的提高和技术的更快进步。严酷的竞争环境必将导致技术的加速进步。环境的变异推动进化，这已为自然界种群发展历史所证明。事实上，再没有比战争环境更严酷的考验了。如果没有两次世界大战，我们到今天也可能还没有喷气式客机、无线电通讯以及核技术。这不是“本本”的说教，是已为实践证明了的真理。

在关于价格竞争的讨论中，人们很容易诘问的一个问题是，“价格战”确实导致了很多企业的亏损。其实，这个问题的另一个问法应当是，为什么这些无法赢利的企业仍不肯退出？在我国当前的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问题不在于存在着价格竞争，而在于缺乏与价格竞争相应的退出机制；在于那些劣的企业不肯，或者无法顺畅地实现从供给领域的退出。

第三，局部市场与统一市场的矛盾。

在市场经济的完善过程中，我们遇到一个明显的障碍。这就是愈演愈烈的地方保护主义。其实，这不是什么新问题。市场经济的发展始终是和局部市场与统一市场之间的矛盾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根据经济学常识可知，市场越大，资源配置的优化程度就越大。统一的大市场是发展竞争的必要条件。地方封锁、地方保护实际上是一种地方垄断行为。这种行为不仅不利于国民经济整体的发展，最终也不利于区域经济自身的发展。

当前，地方保护主义已经从最初的市场分割与区域封锁发展为公然保护“假冒伪劣”，从维护局部经济利益的动机发展为利用行政权力攫取违法利益的“寻租”动机，从政府行政行为发展为司法行为。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已经

成为一段时期以来市场经济秩序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是不是我们对地方保护主义、局部市场封锁一味谴责就够了呢？我们曾在给中央的研究报告中着重提到，客观而论，地方保护主义的快速蔓延与改革措施不完善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有几个因素不可忽略。其中，一是前期在区域倾斜政策中，政策资源配置的不平衡实际上成为了地方保护主义产生的重要诱因。二是长期以来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经济关系仍未理顺。中央赋予地方政府的区域经济发展责任与其相应的资源支配能力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三是一些相对滞后地区被迫采取高筑市场壁垒的方式避免利益流失。四是信用状况恶化使“自我保护”成为一些地方的主要应对措施。

进入21世纪，我们面临的局部市场与统一市场之间的矛盾并非只是地方保护主义、地方封锁一个表现形式。另一个重要表现形式是，中国已经成为了世贸组织的正式成员国。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的国内市场与世界市场之间的矛盾关系也在激化。人们一方面在呼吁竞争，另一方面又都在担心国际竞争延伸到国内市场中来，担心我们的国内市场为别人所占有。

人们对加入世贸组织的必要性已经说了很多了。我们必须在更大范围内参与到国际竞争中去。唯此我们才能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但另一方面，我们确实又得对我们自己的市场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怎样才能把握好这个“度”，找好其中的平衡点？这是考验我们智慧的一个现实难题。

这个难题现在很多产业已经面临。也给大家举个例子。1998年，我们对全国的石油石化产业进行了一次全产业的资产重组，组建了“中石油”和“中石化”两大集团。重组的目的就是要发展国内市场的竞争力。但在“入世”面前，又有人呼吁，建议把两大集团，以致包括“中海油”，统统合并到一块儿，成立一个全国统一的垄断性公司，以应对外来竞争。这个建议好不好呢？我看不好。根本的竞争力不是资产规模，而是内在运行机制。合起来不改机制也还是没有竞争力。

我们两大石油石化集团对应对外来竞争也采取了一些措施。这些措施之一就是收购加油站。大家可能听说过加油站的收购大战。一些加油站的价格被抬到了天价。是不是把国内的加油站都收购完了，外国石油公司就没有机会到我们国内市场上和两大集团竞争了呢？恐怕没那么简单。因为加油站是可以不断再建的呀。大家在各个城市的餐饮业发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你把全城的餐馆都盘下来也不可能垄断这个城市的餐饮业。因为你不但阻止不了新餐馆的开张，而且你高价收购餐馆的行为正好向市场发出一个预期，引导着人们开更多的餐馆。人们开餐馆的目的就是以高价卖给你。这种收购发出的信号是让人们把卖餐馆、卖加油站本身当成生意来做。

举石油石化的例子是想说明，在如何处理好、协调好局部市场与统一市场之间的矛盾关系上，迄今我们还缺乏足够清晰的认识和完整的思路。探索这个矛盾的运动规律仍然是我们改革与发展要面对的一个重大挑战。

【2－3－4】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最大区别，就在于用什么办法实现资源集中。用革命的方式、剥夺的方式就是计划经济。弄清楚这一点并非无关紧要。党的“十六大”报告说：人们的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要受到保护。为什么？没有这个保护、这个制度，我们就没有了市场经济。

第四，产权多元化与资源集中的矛盾。

我们前面多次讲到，工业化要求资源集中。要开矿山、办钢铁厂、建100万吨级的乙烯装置、500万吨级的炼油厂，没有大量的资源积聚和集中不行。也就是说，一方面得把全社会的资源集中到一块儿，另一方面得把在今后许多年中连续发挥作用的资源在一个短期内集中投入。这种客观要求，靠单个特别能赚钱的老板不行。因为常识可知，铁路不能一公里一公里地修。要是靠单个老板赚了钱再不断地把利润投入到修铁路上来，可能到今天我们也有不了铁路。

但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又必须维护产权的多元化。没有这个“多元化”就成了计划经济了。当初计划经济的设想，就是企图用构建一个统一利益的办法来满足资源集中的要求。

又要把分属不同所有者的资源集中起来，而且还得是高效率、低成本地集中起来；又不能打破资源归属于多元化所有者的这个制度约定，各种要素原来是谁的还得是谁的，不能剥夺。这不是矛盾吗？这个矛盾是市场经济面临的最重要矛盾之一。

马克思的《资本论》有个精彩之处。他在论述利润又得在流通中产生，又不能在流通中产生时，说了一句话：“这里是‘罗陀斯’，你就在这里跳吧”。这句话像莎士比亚写的《哈姆雷特》中的“生，还是死，这是一个问题”那句话一样有名，但也一样费解。翻译家们不知道该怎样翻这句话，就照着发音“硬译”了过来，然后在后面加了个注解，说马克思的意思就是，你就在这两个完全相悖的条件中证明你自己的才能吧。

市场经就是在这样两个看起来完全相悖的约束条件下证明了自己的神奇。

这个“戏法”是怎样变成的呢？是通过一系列市场化的方式，一系列的制度约定变成的。一个人们最熟悉的方式是银行。人们把自己的钱存到银行，

银行给储户开具一张具有法律效力的存单，表示你把钱交给银行并不等于你放弃对这些钱的所有权，钱的归属还是你个人。但银行可以把千千万万储户的钱集中起来贷给企业。由此就实现了资源集中。一方面不改变资产的归属，另一方面又实现了资源集中。

银行只是一种中介机构参与的方式。市场经济下更大的资源集中方式是资本市场。我们所说的产权是指用来谋取收益的资产产权。在市场经济下，这个产权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债权，一种是股权。

老百姓把钱存到银行，通过银行贷给企业，这只是利用债权方式实现资源集中的一种特例。更直接的方式是货币资本的所有者直接把钱借给企业。这就是企业债。

在经济发展中，更多的时候是，打算投资的人并不了解需要借钱的企业。都等到人们相互认识、相互了解了再借钱，那得等多久呀？实际上那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显然不能满足工业化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怎么办呢？人们就创造出了债市。企业按照社会约定的统一规则在资本市场上发债，投资者自由地在市场上买卖企业债和流通企业债。由此就实现了资源集中。

股权不过是债权的进一步发展和延伸。这两种产权形式的区别就在于投资者对风险的承担程度不同。债市也给人们以启发。既然债权能够通过公众化的市场流通，那么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股权也应当可以通过公众化的市场流通。由此就有了股市。

现在，我们中国的投资者对股市、债市的原理已经比较熟悉了。但人们最多把那里当做可以买卖有价证券的场所，很少想过和市场经济的深层次关系。这个深层次关系就是保证产权在资源集中的过程中不被剥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最大区别，就在于用什么办法实现资源集中。用革命的方式、剥夺的方式就是计划经济。弄清楚这一点并非无关紧要。党的“十六大”报告说：人们的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要受到保护。为什么？没有这个保护、这个制度，我们就没有了市场经济。

处理好产权归属多元化与资源集中这个矛盾也并非易事。不是定个说法就完了。不能公开剥夺，也不能暗中剥夺。我们的前期股市发展的不完善表现在什么地方？就在于没处理好这个矛盾。存在着允许暗中剥夺的漏洞。这就是股民们说的“上市圈钱”和“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

在中国，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是个任重道远的事。不是有个资本市场的形式就行了。我们需要真正在理论和实践中弄明白，股市、资本市场的真谛不是把别人的钱装到自己口袋里的“游戏”，而是尊重、保护、维护多元化的产权归属的制度产物。我们不是为了把老百姓的钱更多拿到“国家”手里才

需要股市。而是国家、社会、企业用了老百姓的钱，但这个钱的产权归属仍然是老百姓的，投资者为了这样的一个目标才建立股市、建立资本市场的。现在政策一再呼吁，要人们把通过银行实现的间接投资转变为直接投资。完成这个转变其实并不难。关键就在于，直接投资下的产权归属能不能得到像银行一样或者比银行更明晰、有力的制度保障。不是说投资者不承担风险，没有受损失的可能性，而是说不能有变着法暗中改变所有权的制度漏洞。不仅公开市场如此，不入市的产权部分也得如此。这个话的分量很重。希望大家格外注意。

4. 提问与讨论

☆ 剥夺不是简单占有别人财富的意思，而是在经济发展中不断再生产出贫困和一无所有的意思。

☆ 造就市场和需求不仅得让人们有钱消费，还得让人们有时间消费。创造与索取之间有节奏地轮动才能推动经济向前发展。

☆ 整顿与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一个关键点应当是缩小而不是扩大政府制定规则的权力。

☆ 人们在自己的利益受到不公正侵害，而且不能向侵害人讨回利益时，最容易选择的行为趋向就是想法把这种不公正导致的损失转嫁给别的对象。

☆ 如果政府的利益与市场交易主体的利益掺杂在一块儿，政府是不可能扮演好公平的秩序维护者角色的。

☆ 在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中，最坚定、最不会被收买的是消费者群体。

☆ 资本市场也是市场。优胜劣汰的取舍标准是效率而不是所有者的性质。

☆ 家族式的民营企业能否扮演合格股东，这个问题应当留待市场的优化选择机制来回答。

☆ 可以确定无疑地说，我们需要大力发展虚拟经济，需要以积极、正面的态度来对待虚拟经济。

【提问一】：传统理论说资本主义才有对劳动者的剥夺，计划经济能说是“剥夺”吗？

答：什么是“剥夺”呢？这得说点理论。

在经济学意义上，剥夺不是简单占有别人财富的意思，而是在经济发展中不断再生产出贫困和一无所有的意思。马克思最先讲了资本主义的“剥

夺”。他是怎么讲的呢？他说，由于资本要素所有者不断把利润投入扩大再生产，同时把劳动要素的收益压低到最低限度，由此就造就了一个事实：一方面是财富和资本的不断积累，另一方面是贫困的不断积累。马克思把这叫做“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

请大家务必注意，这里有两个要点。一是经济在不断扩张和发展，二是社会仍在不断再生产出一无所有的贫困人群。这才叫剥夺。我这里格外强调“再生产”这个概念。这一点在理论上非常重要。

在马克思那个时代，资本更多获取利润的方法就是两条。一条是不断把利润投入到经济活动中去，扩大再生产。另一条是延长劳动时间，或者让劳动者在同样的时间内干更多的活。马克思把后一条叫做攫取“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大家如果在大学读过政治经济学公共课，对这个基本常识应当不陌生。在马克思那个时代，他没有说错。这样两条增加利润的办法导致的结果就是剥夺。

问题是后来实践又向前发展了。工业化进程又给人们提出一个新挑战，这就是成批、大量生产出来的产品由谁来消费的问题。要是社会的大多数人都没有能力、没有时间消费，东西卖不出去，资本还是赚不到钱。与此同时，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过程中，资本所有者发现，依靠技术、设备、工艺的改进要比延长劳动时间或者增加劳动强度更容易办到，而且更能降低成本和增加利润。于是一个和马克思那个时代相反的趋势出现了。发达国家率先不断缩短劳动时间，同时提高工人工资。原来一周工作六天，后来改成工作五天。现在发达国家大都每周工作四天半，每天6.5个小时。一年中还有很多长假期，叫“Long Weekend”。

大家可能听说过美国“福特汽车”老一代掌门人的故事。老福特最先提出，我怎么才能靠造汽车发财呢？关键是要让我工厂里的工人，让普通老百姓都买得起、用得起汽车。能够更大规模地造出汽车不难，工业化已经完全有这个力量。关键是要造出这么一个巨大的需求，巨大的市场。老福特是第一个提出“平民车”思想的人。我今年2月底去欧洲时，还参观了“奔驰”的博物馆。奔驰就没有这个思想。在博物馆中展出的都是某年橄榄球明星用过的车、某年好莱坞影星用过的车、当年日本天皇用过的车等。奔驰在历史上以造“贵族车”为特点。老福特的“平民车”思想极大地推动了美国以致全世界汽车产业的发展。后来有人把老福特也称为“社会主义者”。老福特是不是社会主义者我不敢轻下断言，但他这个预见确实符合了客观规律。

那么是不是现在资本家都变得心疼老百姓，一心为工人着想了呢？我们别用道德眼光打量经济学现象。用理论化的语言说，这种缩短劳动时间、增

加劳动者收益的趋势叫做“不断再生产出持续扩大的市场，持续扩大的需求”。延长劳动时间已经没必要了。因为改进技术已经比延长劳动时间更能有效地满足提高利润的要求。关键是造就市场，造就需求。造就市场和需求不仅得让人们有钱消费，还得让人们有时间消费。发达国家为什么最先提出了一周“双休日”的办法呢？因为生产与消费、创造与索取之间有节奏地轮动才能持续推动经济向前发展。

日本人在80年代时工资水平增长很快，老百姓积累了很多的钱。但日本人没功夫去消费。日本有个词儿叫“过劳死”。日本公司的员工跟机器似的，只知道工作不知道休息，经常出现身体透支而死亡的事件。这就叫“过劳死”。80年代末，日本开始实行5天工作日的时候我正在日本念书。刚开始是隔周休息两天。多休息的这一天，日本的职员整天坐在家里发愣，不知道该干什么。结果还得了一种病，叫“双休日病”。后来人们知道了，可以去打高尔夫球，可以去旅游。也就是说，“再生产”出了扩大的市场和需求。

那么我们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再生产”出了什么呢？我举两个人们熟悉的例子。

上世纪60年代初、中期，我们极力提倡一种精神叫做“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在工作上向高标准看齐，在生活上向低标准看齐”。还有，能喝白开水不喝汽水什么的。这就是在要求老百姓把消费压缩到生理所能容忍的最低限度。让人们把所有消费都尽量减少，省出来全部投人经济建设中去。那时候到银行存钱不叫投资，叫支援国家建设。

到了60年代中、后期，靠把人的消费需求压低到生理的最低限度都不能满足积累的要求了，就提出了大庆油田的“王铁人”这个新的英雄人物典型。王铁人有句名言，叫做“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这句话所体现的英雄主义、为国争光的精神我们不仅不能否定，还得进一步发扬光大。但对这句话作一个经济学审视，就会发现，那个时代的这句口号要求人们做什么呢？要求人们把消费压低到生理限度以下。“大油田”是什么？是工业化的象征。“宁肯少活20年”是什么意思？就是要人们为了工业化把消费需求压低到生理限度以下。这比雷锋精神更进了一步。

大家从这两个例子中可以看到，我们原有的计划经济“再生产”出了什么？再生产出了贫困和一无所有。我们在很长时间内，几乎各种消费品都实行配给制，凭票供应。直到80年代初期，到民政局登记结婚时，民政局还管发票——家具票。在结婚证上盖个章，“家具票已领”。这个“家具票”能买什么呢？能买一张圆桌，或者四把折叠椅，或者一张木头板床，或者一个木头大立柜。你说我搞一回对象挺不容易的，这四样基本的东西我都得要呀？

民政局的人回答挺幽默：您明天再来离婚，离四回结四回，您就把这四样东西都买齐了。

这样一种社会再生产状况有没有剥夺呢？我再说一遍。社会经济发展了，但大多数人未能相应地分享这个发展，这就叫剥夺。不管在名义上社会的总财富归谁，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仍再生产出贫困，这就叫剥夺。这就不是社会主义。还是邓小平同志那句话：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我郑重申明这个观点。

【提问二】：我看整顿市场经济秩序的关键还是要靠政府，政府才能动用强制力量。

答：我同意你说的一半，政府得在整顿市场经济秩序中有更大的作为。不同意一半，我们不能对政府指望太大。

在整顿市场经济秩序的过程中，人们很容易倾向于把责任付之于政府，不断呼吁“政府管”。政府该不该管呢？该管。但很长时期来，政府对大量破坏市场秩序的事并非没有管，而是没有管好、管住。

政府为什么没管好、管住？首先不是因为“政府管”的力度不够，而是“管政府”的力度不够。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整顿市场经济秩序，恐怕需要从“管政府”入手。

其一，政府信用必须首先昭显。在市场条件经济下，作为市场参与者的企业、个人出现不守信用的现象并不奇怪。但如果社会信用存在着普遍失范，那么肯定地说，最值得质疑的就是维护信用的那个主体，也就是政府自身的信用是否存在着失范。如果警车在马路上横冲直撞，你能指望交通参与者遵章守则么？

但遗憾的是在很多时候，我们的政府在自身守信上并未作出让人信服的表率。例如，相当普遍地，在很多地方“出口退税”的承诺无法按约及时兑现，由此占压了企业的大量资金。企业有什么办法？只能违约拖欠银行的贷款，拖欠客户的应付款。2002 年到 2003 年连续两年的春节，建筑业的民工因讨要拖欠工资而铤而走险的事愈演愈烈。是谁拖欠了民工的工资？政府工程拖欠是最重要的源头。一些地方盲目上马的那些无资金保障的“政绩”工程是罪魁祸首。2001 年末时，许多专家呼吁，2002 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应当让地方政府承担更大责任，应当允许发行地方政府债。但最后论证的结果是，中央政府发债后转借给地方政府。为什么？因为中央政府信不过地方政府！管好政府，首先要管好政府的信用。政府失信，害莫大焉。

其二，政府的行为必须要有法来管。很多人说，政府应当发挥制定规则、

维护规则的作用。这话只说对一半。实际上，整顿与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一个关键点应当是缩小而不是扩大政府制定规则的权力。如果警察能够有随意制定交通法规的权力，那只能导致交通状况的无秩序。

无节制地扩大政府制定规则的权力必定会导致政府的“公权力”演变为从市场牟取一方私利的“私权力”。那种借规范秩序之名，要求必须到指定企业去购买、要求必须购买指定品牌及型号产品的政府行为可以说俯拾即是。某地卫生部门要求餐馆在厨房里张贴的“生案”、“熟案”标签必须买卫生部门印制的，价格是10元一张。某省蔬菜外运必须委托政府指定的公司才能申请到车皮。这不是破坏秩序的“强买强卖”是什么？这不是欺行霸市是什么？这里面无需查证，必有政府部门的利益参与其中。别以为这种政府行为仅仅是无关紧要的“小索取”。这种失范的政府行为正是导致秩序混乱的“瘟疫”源头之一。制度经济研究早就证明，人们在自己的利益受到不公正侵害，而且不能向侵害人讨回利益时，最容易选择的行为趋向就是想法把这种不公正导致的损失转嫁给别的对象。政府可以管什么，怎样管、依据什么管，都应当由法律来管。郑州市如果当初在成立“馒头办”之前先由人民代表大会立法，或者至少先依照法定秩序召开社会公众的听证会后再决定，肯定不会出现最后把“馒头办”办成“馒头生产销售垄断公司”的荒唐闹剧。

其三，政府的利益应当退出市场。当前整顿市场经济秩序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是，政府的利益必须退出市场。如果政府的利益与市场交易主体的利益掺杂在一块儿，政府是不可能扮演好公平的秩序维护者角色的。

除了上述以“公权力”牟取部门私利的形式外，政府利益延伸到市场中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两点。一是税赋与政绩。很多地方保护主义就从此而来。目前实际上不仅地方封锁，很多假冒伪劣也经常是地方政府默许、包庇甚至纵容的结果。再一是国有企业。在新一轮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中，政府投资、政府产权的利益一定要和政府的行政权力形成明确的“隔火墙”。政府不能把“公权力”延伸到维护自己作为投资者的利益中。

其四，政府的权力需要受到更多制约。有一个长期没有被人们足够思考、迫切需要辨明的问题是，究竟谁是市场经济秩序最坚决的维护者？是政府吗？不是。政府是由人组成的。而人是可以被收买的。组成政府的人并没有足够的利益动机去坚决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正因如此，政府行为的公正性并非总是可靠的。

最可靠的是谁？是消费者群体。在市场经济秩序混乱时，受害最大的总是消费者群体。在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时，最坚定、最不会被收买的是消费者群体。那种“知假买假就不是消费者”的说法为什么能够堂而皇之地大行其

道？就因为政府被制假、售假的人收买了，因为政府的公正性无法受到足够的制约，因为消费者没有相应的社会权力和力量来主张自己的权益。要整顿、规范好市场经济秩序，政府不但要坚定地依靠消费者，要坚决地维护消费者利益，而且要自觉地接受消费者、维护消费者权益的社会团体以及社会舆论的监督。社会要造就一个准则：市场经济秩序的最终裁判者是市场，是消费者；而不是政府。

【提问三】：民营企业参与产权购并目前还有很多限制。您对民营企业买国有资产怎么看？

答：近年来，我国的民营企业已经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投资主体。民营企业通过产权收购、参股、控股等方式，不仅实现了自身的发展壮大和竞争力的增强，而且进入了许多原来国有企业“一统天下”的领域。一段时间来，人们对民营企业参与产权购并有较多的不同看法。我认为，我们应当正面回答这些质疑。

其一，民营企业参与产权购并是否有悖于共同富裕的目标。当前，对民营企业参与产权购并的最大非议就在于，应否让“私人”取得对社会资源的更大支配权。

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公平竞争，优胜劣汰。资本市场也是市场。指定哪一种经济成分才有资格“扩大支配力”，其实是对市场经济原则的否定。不论是在资本市场上还是在产权购并中，产权流动、产权竞争的目的都应当是高效率的要素支配者取代、驱逐那些低效率的要素支配者。优胜劣汰的取舍标准是效率而不是所有者的性质。

民营企业通过产权购并、支配更多的社会资源，可以有更大的获利机会。这将导致社会财富不断向少数人集中。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放手”让其活力充分迸发。因为这种“放手”的最终结果是造福于人民。这不是我说的。“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这是党的“十六大”报告说的。

其二，民营企业参与产权购并是否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除极少数必须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外都要积极推行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显然，民营企业不仅是“多元化投资主体”中不可缺少的一元，而且应当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出资人之一。

在实践中，是否存在着交易双方串通损害国家利益，这与并购者是否是“民营”无关。制度不完善，在国有投资主体之间的产权交易活动中也可能发

生同样的弊端。防止产权交易过程的国有资产流失不能靠“肉烂在锅里”的等待。积极地完善相应的产权交易制度，形成有效的国有资产经营体制和方式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

其三，民营企业参与产权购并是否有利于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有些舆论认为，很多家族式的民营企业不可能成为优秀和高效率的要素支配者。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民营企业能否在现代企业制度中扮演合格的出资人角色，能否成为合格的股东。

就整体而言，民营企业参与产权购并通常伴随着三个目标：一是扩大优势企业的市场占有率，整合市场资源；二是调整资源、要素的配置领域，扩大生产经营规模；三是改善要素组合状况，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对这样三个目标的追求，恰恰是对社会和对企业都最有意义的追求。

至于家族式的民营企业能否扮演合格的股东角色，这个问题应当留待市场的优化选择机制来回答。从目前世界各国的经验看，没有理由认为家族式企业就一定是低素质和落后的。家族式企业也有大量的成功先例，非家族式企业也不乏失败的教训。民营企业就是民营企业，没有必要从是否是“家族式”来判定其是否有资格参与产权购并。事实上，我们也不可能等待民营企业成长到足够成熟再允许他们参与产权购并。产权市场的竞争和产品市场的竞争是同一个法则，那就是优胜劣汰。

其四，民营企业参与产权购并是否会加大金融风险。在产权购并中有可能会出现“资产购并——抵押贷款——再购并——再贷款”的“老鼠仓”式融资。防止这种恶意融资的根本之举是完善金融监管、建立预警制度，而不是按照企业的所有权性质设立准入壁垒。实际上在我国，过去一些年来和产权投资相联系的金融风险主要来自于经济运行的制度缺陷，而非企业的所有权性质。一个明显例证是，国企“债转股”的1.4万亿元不良资产就是前期“拨改贷”等改革措施不完善遗留的后果。

【提问四】：计划经济是否也有一定的优越性？这次抗击“非典”疫情是不是就说明计划体制还是有用的？

答：好像有种说法，说上海之所以疫情相对较轻，就是因为上海的国有企业多。我完全不能赞同这种说法。

计划经济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吗？人们还远未忘记的事实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因“大跃进”导致的人祸和连续的天灾，三年中因饥饿而死的人数上达千万！是向市场靠拢的“三自一包”挽救了已达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70年代末大批返城知青带来了就业压力，政府已经无力化解这个危机，

不得不允许“个体户”等新的市场经济成分诞生和发展，由此才导致了后来中国经济体制的深刻变化。今天，我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面临的最大难题恰恰是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养老金“空账”问题。如果不是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改革，中国在老龄化社会日渐到来的过程中将根本无以应对这个重大的隐性危机。

在抗击“非典”的斗争中，人们的确看到了政府采用非市场化手段动员各种资源的能力。但市场经济并不等于不要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责本来就是，平时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平，面临危机时动员各种资源抵御灾害、战争等危险。政府应当有面临危机时动员一切必要资源的能力、权力和效率，这在各国皆然。这种职能和作用是法律赋予的，社会赋予的，人民赋予的；与“计划经济”体制无任何必然的因果关系。

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时间还不长，人们可能不甚熟悉的是，实际上在市场经济下，政府动员资源应对危机的能力要比计划经济条件下强大得多。为什么呢？因为政府可以借助大量市场化的工具、手段极大地放大自己的力量。在此前的抗洪救灾中，我们已经发行过“赈灾彩票”。在抗击“非典”的过程中，迄今中央、地方两级财政的初步预算是70亿元。现在假定我们发行100亿元10年期的“公共卫生特种国债”，分10年偿还，每年只需分摊10亿元。政府财政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应对这笔支出。要知道，我国目前的年税收总额已可达两万亿元。此外，通过银行贷款、财政贴息的方式为企业提供应对生产救灾物资的周转资金，通过政府购买特定灾害保险的方式化解不确定性风险，都可以起到更大程度地团结全社会同舟共济的作用。相反，“计划经济”方式的“政府直接包下来”，其后果只能是弱化全社会平时减灾防灾的责任意识，强化人们对政府的风险依赖。我们在抗击“非典”政策中应当努力避免形成的，恰好是这种不良预期。

【提问五】：“十六大”报告中提到一个“虚拟经济”的概念，迄今对这个概念的解释很少。什么是虚拟经济呢？

答：回答这个问题又得讲理论。什么是虚拟经济呢？用理论化的语言说，虚拟经济就是资本独立化运作的经济。

虚拟经济并非现代经济的新产物。我们知道“借贷资本”诞生得很早。出借方暂时让渡了一个价值额，在约定期满后取回了一个带有增殖部分的价值额。这就是一个完整、典型的以赢利为目的的、独立化的资本运作过程。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货币资本市场、股市、债市、期市、汇市以及金融衍生品市场都不过是上述简单过程的进一步演绎。

虚拟经济存在与发展的基础是产权交易。在规模不断扩大、形式日益复杂的产权交易过程中，资本的所有权与使用权不断分离而支配权不断集中，资本运动就成为了一个与实物经济相脱离的过程，成为了一个“虚拟”的经济活动过程。人们在股市上用货币资本买到一定量的产权时，这个产权实际上是虚拟的。因为这个产权并没有具体的实物指向。股民作为股东得到的只是某种资本所有权的信用保证。人们从用贷款形成的实物资产可以再抵押贷款的事实中认识到，在相当多的虚拟经济活动过程中，只要有与风险相当的信用抵押，交易就可以进行。于是就有了“边际”保证金方式的期权交易。由此，风险开始成为了交易的组成部分。以信用为对象的交易又被发展为了直接以风险为对象的交易。于是就有了各种金融衍生品的交易。至此，虚拟经济的扩张已经发展为与实物经济的扩张完全无关。

理论推导最终要回到这样一个题目上来：我们究竟需不需要发展虚拟经济。可以确定无疑地说，我们需要大力发展虚拟经济，需要以积极、正面的态度来对待虚拟经济。我国改革与发展面临的诸多重大难题只有在虚拟经济的运行过程中才有可能获取答案。

简单分析就可以看出，前期国企脱困的“债转股”就是一个虚拟经济的运行过程。这个过程中的运动主体是什么？是产权，是资本。这个“虚拟”过程并非游戏。在这个运作过程中，银行的不良资产将获得剥离，企业的债务负担将被卸下；更重要的是，由那些陷人债务困境企业占用的大量国民财富的利用效率将大大提高，社会经济关系将趋于协调。

当前，伊拉克战争引起了人们对我国石油安全的深切关注。维护我国石油安全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大规模参与到国际石油期货市场中去，参与风险市场的竞争，获得对石油价格的发言权。这个问题我们还有专题讲到。

第3讲

中国就业战略

ZHONGGUOJIUYEZHANLUE

今天开始，我们将更多地触及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前沿问题。从现实问题的解析中，我们来认识理论和实践。

我前面说过，中国将为“发展经济学”和“转轨经济学”作出无可替代的贡献。为什么？因为中国正在进行的发展和改革，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在工业革命之后最大、最深刻的一场实践过程。人类在这个过程中将重新审视自己的经验，验证已有的认识，发现制度上的缺陷，探索未知的领域并且使自己的行为更大程度地顺应客观规律。可以这样说，中国的发展与改革实践将使人类在自己的文明史上迈出新的一步。

我们今天讲就业问题。

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过程是人类的一个饱受痛苦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痛苦集中地表现在劳动者就业、失业的命运跌宕上。当然这个阶段的人类痛苦还包括殖民地掠夺等。但在工业化国家内部主要是就业、失业。正因为如此，在这个阶段产生了很多著名的大文学家，留下了许多不朽之作。法国雨果的《悲惨世界》、英国狄更斯的《艰难时世》、俄国高尔基的《在人间》以及美国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作，都极为震撼人心地描述了那个时代失业对社会的影响。

在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种种重大难题中，不论以怎样的顺序排序，就业都应当排在第一位。为什么？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因为中国正处于机器取代手工劳动的工业化过程中，因为中国正处于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过程中。现在很多企业，不论民营还是国有，都在门口或者工作地挂一幅标语，“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我看这幅标语不仅是对劳动者、对职工的警示，也应当是对政府的警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我们的国家在今天、明天以致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最大难题就是“找工作”。

1. 中国城镇就业形势远未缓解

☆ "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我们的国家在较长时间内最大的一个难题就是"找工作"。

☆ 中国老百姓首先需要的不是救济，而是就业和就业保障。

☆ 国有经济系统的就业总人数一直以每年以400万－500万的规模在减少。这个趋势在今后一个不短的时期内还会持续下去。

☆ 提高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就得采用自动化程度更高的先进设备，这就决定了仍要持续地大量排出富余人员。

☆ 现在即或有了足够多的投资，我们也不知道把这些富余人员组织起来干什么。

☆ 最尖锐的矛盾不在"面"上，而在"点"上。在资源型城市 失业引起的社会矛盾极其尖锐。

☆ 每年的城镇新成长劳动力还有1000万人左右。未来十年将要求有一亿个新增就业岗位。

【3－1－1】在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种种重大难题中，不论以怎样的顺序排序，就业都应当排在第一位。现在很多企业，不论民营还是国有，都在门口或者工作地挂一幅标语，"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这幅标语不仅是对职工的警示，也是对政府的警示。我们国家最大的难题就是"找工作"。

我们在"理论的回顾与总结"一讲中提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市场经济、对工业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解析从始至终都是以就业为基本线索的。他说什么了呢？说了三条很重要的结论。第一，工业化、市场经济得以确立的前提是把小生产者和他们的生产资料分离开，让他们成为必须受雇于资本的"自由劳动力"。第二，劳动者为什么必须得忍受工厂制度下的苦难呢？因为资本家用"金锁链"把他们锁住了。你可以不干，但这

种“不干”的自由是以失业的更大痛苦为代价的。第三，在工业化初期的那个时候，社会靠什么来维持较低工资水平，对抗劳动者提高工资的要求呢？靠客观上不断存在的“失业后备军”，靠劳动者之间对有限就业岗位的竞争。

就业是什么？党的“十六大”报告有个极为精要的概括：“就业是民生之本”。在工业化和市场经济诞生以来，就业始终是一切社会经济矛盾的交汇点。

只要是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不管你是“发薪”阶层还是工薪阶层，你实际上都得关心就业问题。你的利益都始终和就业形势的变化密切联系在一起。不仅劳动者如此，就是当老板的，也不可能离开这个根本的环境因素制约。为什么呢？因为人是企业经济活动、社会经济活动中唯一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主体，是最重要的、具有创造性的要素。这个要素所有者的利益不能满足，整个社会就不可能安定。就业市场发展不充分，企业就无法通过合理代价找到所需要的劳动力。就业秩序出现混乱，社会就会出现很多严重冲突。前不久媒体报道过若干事件，一些地方的老板因为开除职工，遭到被开除人的报复，出现了把老板的家人绑架甚至杀害的恶性案件。这些问题背后都有就业矛盾激化的影子。

党的“十六大”报告里提出，我们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小康”不仅是要让老百姓活下去，而且要活得好一点，让大多数老百姓的生活有保障。有保障就是民生。最大的民生保障在哪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固然重要，但关键还在再就业。靠政府每天给老百姓发救济金行吗？不行。落脚点在就业。

最近美国打伊拉克的战争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为什么会被推翻？其原因可能有很多，大国间的矛盾、石油利益、各种国际政治势力的角逐等。我们不去评价这些，单说一个客观事实。一个国家在长达12年的时间里，60%～65%的国民靠“石油换食品”的准救济方式来生活，这个国家的社会基础能稳固嘛？石油换食品，那真是在靠卖“家底”在维持生计，而且也不打算变革，不打算发展。这样的国民经济是决不可能持久的。前几天有个军事专家在中央电视台评论伊拉克战局，这个专家曾经在伊拉克待过2年多，我相信他是个懂行的军事专家。他说我对伊拉克老百姓比较了解。那里很多人并不肯发奋图强。有些人懒到什么程度呢？和美国人打仗埋地雷，他们觉得埋地雷还得用铁锹挖个坑，这多累得慌啊。于是就把地雷搁在高速公路上，等着敌军的坦克往上撞。这样的国民素质也不可能打胜仗。

就在昨天晚上的一个电视节目中，民政部的一个司长在那里讲，我们国家最好不要建“社会保障系统”，因为资源不够，我们不如建“社会救济系

统”。这样我们可以用有限的资源谁困难就救助谁。这个司长的话有一定道理。但有片面性。为什么呢？因为中国老百姓首先需要的不是救济，而是就业和就业保障。

【3-1-2】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公认的最勤奋的民族。在我们这个民族的传统理念中，大多数老百姓是宁愿要一份工作而不愿意靠社会救济金活着的。这种理念在我们中国老百姓的心中是根深蒂固的。

中国迄今仍是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的落后并不是中国人不肯干活，不勤奋造成的。中国老百姓是最肯吃苦的老百姓，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公认的最勤奋的民族。“脸朝黄土背朝天”，咬牙刻苦的精神可以说世界上没有其他民族能比。

我给大家讲个故事。90年代初期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时候，那时中国留学生一年的奖学金也就万把块钱美金。有的还没有，得靠自己打工。边上学边刷盘子，拿点很低的工资小费。但相当多的中国留学生，四年下来不但拿了个文凭，还攒了万把块美金。这让美国人非常吃惊，无论如何不能理解。美国人说这点钱对他们来说，根本就活不下去。在美国，就是中等收入的家庭，一下子能拿出两三万美金积蓄的也并不很多。因为他们多数是负债消费。美国人问中国留学生，你们怎么居然还能存下钱啊？真是不可理解。简单说，就是靠吃苦耐劳。

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也造就了全世界华人的经济地位。不管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很落后的国家，华人一般至少是中产阶级，是相对过着安定生活的一个群体，流落于社会底层的很少。老一代很多是中餐馆老板。在洛杉矶有个“新中国城”，那里大多是80年代以后从台湾、香港以及大陆去的移民。他们大都是电脑工程师，医生、律师、高科技企业老板等相对富裕的阶层。那里中餐馆的档次都和老的“唐人街”不一样。

在东南亚一带，华人更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占有者。我有一次去印尼，问到那里的学者，印尼社会为什么老发生“排华”事件啊？华人那么坏嘛？对方说，不是因为华人给社会找了麻烦，而是因为他们太有钱。印尼学者说，你在雅加达的商业街上从这头走到那头，几乎每个店，不管是超市还是小商店，老板差不多百分之百都是华人。这种社会财富的分布状态导致了一些很尖锐的社会矛盾。印尼这个地方地处热带，跨越赤道，自然物产非常丰富。历史上，那里的土著是用不着去干活的，他们饿了爬到树上摘个果子吃就能填饱肚子。所以他们不懂得放牛放羊种地，不懂得去生产。华人来了后在那

里开工厂，办企业，很快就赚钱发财了。印尼人口众多，两亿多人，华人华侨的比重只占3%～4%。但就是这样一个很小比重的人群，拥有印尼国民财富的70%。

马来西亚的华人比重大点，占30%略多。那里的华人也占有了社会绝大部分的财富。那里还有10%左右的印度人也比较富有。以前，马来西亚的民族对立很严重，老是闹矛盾，发生社会对抗。马哈迪尔主政以后，采取了民族和解的对策。和解的办法就是发展经济。发展是硬道理。发展了，大家都好。马来族也好，印度族也好，华族也好，大家不要对抗，不要谁把谁吃掉，每个民族都要作出妥协，让对方有一个可以接受的利益格局，大家就和解了。现在在马来西亚，华人可以去做生意赚钱，但不许当政府官员，只许马来人当政。华人可以自己办华文学校。但政府不给钱。不仅不给，还得给政府交钱。理由就是华人有钱，应当为社会发展多承担一些义务，吃点亏。华人办的工厂、超市还必须按一定比例雇佣马来人。

在有些国家，有些群体是有工作不去干，就愿意接受救济。这样的人肯定不是华人。美国法律招工不许有歧视性条款。但在美国，中餐馆一般看不到有黑人在端盘子。这不仅是老板不愿意，客人也觉得不习惯。但是中餐馆招工的时候不能有歧视性条款，不能说只招华人，不招其他人。但事实上也招不到黑人。有时候也有黑人应聘。但老板问他有这方面经验吗？他说没有。问他能按时上班吗？他说我很难说。问他上班时能不嚼口香糖吗？他说这个习惯我不大愿意改。那老板怎么办？只能说你不适合这个工作，在他求职单上写上一个批语。不接受他，这个黑人往往还很高兴，说Thank you，谢谢老板。为什么呢？因为美国领失业救济金的时候有个规定，失业者必须主动去应聘过若干家企业没有成功。上面说的这个应聘者其实并不想找工作，就是为让老板给他写这个不录取的批语才去应聘的。

我们举这些例子就是想证明，在我们这个民族的传统理念中，大多数老百姓是宁愿要一份工作而不愿意靠社会救济金活着的。这种理念在我们中国老百姓的心中是根深蒂固的。

【3－1－3】一方面下岗职工总数明显减少，另一方面城镇的社会登记失业率明显上升。截至2002年末的统计，有410万累计未安置的下岗职工，有770万城镇登记失业人口。两项合计约为1180万人。如果考虑到未登记的，可能要达2000万人以上。

一段时期来，人们经常听说“就业形势严峻”这个话题。但究竟有多严峻？很多人是从身边的具体感受来认识的。我用一些具体的数字来说明。

前不久，3月18日，新当选的温家宝总理在“两会”之后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央视作了实况转播，很多人都看过。我想，作为当选总理后第一次在媒体、社会公众面前“亮相”，温总理那次记者招待会肯定是有备而来的。在那次会上他说了很多信息、提到很多数字，我们以后还会反复提到温总理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所说的话和数字。

温总理讲到，新政府要解决好三个重大的经济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就是就业和社会保障。他在列举了一系列数字后说，“这几个数字，已经点出了三个问题：农村问题，就业和贫困人口的问题，东西部地区差距问题。因此，当好中国的总理不容易。如果要我说现在的心情，我觉得身上的担子有千钧重。”温总理说到“千钧重”时的表情好像犹在我的眼前。新一届政府显然把就业摆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上了。

其实，在就业问题上，温家宝总理上任时面临的形势和朱镕基总理上任时面临的形势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在“形势严峻”这个问题上是一致的。但在“如何严峻”上有些明显变化。我给大家举些数字。

朱镕基总理那一届政府是1998年初产生的。他上任时，1997年末全国累计未安置的下岗职工总数是1151万人。温总理面临的情况是，2002年末全国累计未安置的下岗职工总数是410万。

1998年初时，最严峻的就业问题是下岗问题，就是国有企业职工大量、普遍离开劳动岗位的问题。可以说，这个问题是1996年制定的“九五”计划始料未及的。当时我们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1998年时，面对“下岗现象普遍化”这样的形势，当年中央召开了两次全国“再就业工作会议”。为什么开了两次呢？第一次会议时的研究重点确实是“再就业”。就是如何通过政府政策的援助，通过国家投资等方式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让下岗职工重新就业。后来我们很快就发现，这样一个目标是根本办不到的。一方面当时“积极的财政政策”首先要引导投资需求，确保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还要推进扩大内需。后来财政还要应对长江、松花江流域的南北洪水造成的灾害。“保岗位”实际上办不到。另一方面，我们发现一个新问题，就是引起当时下岗问题的首要原因并非是投资不足，而是供大于求的失衡，东西卖不出去。政府加大投资并不能在短期内解决问题。即使有了投资，也不知道把人们组织起来干什么。于是就开了第二次会。

第二次会叫做“再就业与安置工作会议”。虽然也说“再就业”，相关政策仍叫“再就业政策”，但政策的重点从帮助下岗职工“找工作”转向了帮他们解决基本生活来源。由此就有了以“再就业服务业中心”为核心的“三条保障线”。从这两次会议主题和政策重心的变化中，人们大约可以看出当时对

下岗这个问题的思想准备、政策准备是不充分的。在实际应对中经历过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

“再就业服务中心”是上海最先创造出来的一个应对措施。在全国的下岗高峰到来之前就创造出来了。1996年时我专门就这个问题到上海作过调研。

“再就业服务中心”的主要职能其实不是“再就业”。它有帮助下岗职工找工作、提供就业技能培训等职能，但不是主要的。主要的职能是筹集下岗职工的生活费。

当时上海的做法是“三个三分之一”。政府出三分之一，企业出三分之一，社会筹集三分之一。什么是“社会筹集”呢？就是向来上海打工的外地人员征收。当时上海规定，每月向在上海的外地打工妹每人收50元。安置上海的下岗职工，凭什么要向外来打工者收费？当时上海的理由是，因为外地人打工抢了上海人的饭碗。现在看来，这种歧视性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是不合适的。对上海当初安置下岗职工的政策评价也是褒贬各有。后来各地也没有普遍采用这个从外地务工人员头上收钱的政策。但“再就业服务中心”的确是个创造。

大家对“下岗”这个词耳熟能详。我们的媒体在反映城镇居民中一些困难群体的问题时也经常用这个词，但经常用得并不准确。在政策领域，“下岗”这个词是有特定含义的，不是失去工作的都能叫“下岗”。

什么是“下岗职工”呢？按照准确的政策界定，1985年全国普遍实行劳动合同制之前参加工作的、具有全民所有制或城镇集体所有制身份、离开劳动岗位、又没有和企业解除劳动关系的那部分职工才叫下岗职工。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离开劳动岗位又没有和企业解除劳动关系”这个说法。

“再就业服务中心”的贡献就在于此。当时我们还没有充分发育的劳动力市场，对国企职工转换体制身份也几乎没有任何政策规定。在突如其来的下岗问题面前，我们必须有一种临时性的措施先把矛盾缓解下来。“再就业服务中心”就起到了这样一个作用。一方面，下岗职工并不和企业解除劳动关系，国企职工这个身份暂仍保留；另一方面，没有工作没关系，可以从“再就业服务中心”那里领取生活费。

当时，我们还看不清楚离开劳动岗位的这部分国企职工的最后去向。国家、企业当时都没有最终解除原有体制下的“终身就业”这个承诺的决心。国企职工也没有这个思想准备。当时人们指望，经过一段时间，企业经营情况好转后还会把这些下岗职工再招回来。因此下岗职工并未和企业解除劳动关系。在当时情况下，这样一个举措起到了很大的稳定人心、缓解社会矛盾的作用。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这个过渡性的政策给了我们一个寻找更好解

决方案、完善政策措施的时间余地。

刚才说到，朱总理上任时面临的累计未安置下岗职工总数是1151万人，温总理上任时面临的累计未安置下岗职工总数是410万人。那是不是说，新一届政府面临的就业矛盾已经大大缓解了呢？远不是。

迄今反映我们国家城镇失业状况的指标有两个。一个是下岗职工总数，另一个叫做城镇社会登记失业人员总数。同一个问题，我们现在面临的是另一面，社会登记失业率的上升。

2003年的“两会”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向全国人大报告了一个数字。2002年我国城镇的社会登记失业率是4.0%，2003年可能要达到4.5%。而这个数字在1990年时是2.5%，1995年时是2.9%，1998年时是3.1%。1998年时的数字已经是此前的历年最高水平。后来很多记者问我，社会登记失业率快速上升，是否意味着我国就业形势正在恶化？我对这个问题作点解释。

2003年的下岗职工总数比1998年明显减少并不意味着就业形势已经缓解，社会登记失业率的快速上升也不意味着就业形势正在恶化。为什么呢？因为从2000年以来，我国已经在推进一项改革，这就是国企职工的体制身份转换。

这项改革首先是从下岗职工开始的。我们前面说过，下岗的国企职工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时并不和企业解除劳动关系，还可以从“中心”领取生活费。但“再就业服务中心”这个政策是临时性、过渡性的，还可以说是妥协性的。经过一段时期的政策准备以后，从2000年起，这个政策已经不再继续实行。

一般说，下岗职工最多可在“再就业服务中心”领取三年生活费。如果三年内仍没有找到工作，那就要转归一般社会失业保障体系救助，同时要和企业解除劳动关系。2000年后下岗的国企职工一般也不再进“中心”，而是直接和企业解除劳动合同并纳入社会失业保障体系救助。与这个改革配套，我们实施了一项非常重要的措施，叫做“国企职工有偿解除劳动合同”。这个措施我们以后还会讲到。

“再就业服务中心”的政策停止以后，一个必然的趋势就是很多原来纳入下岗职工统计口径的人员现在纳入了一般社会登记失业人口。统计口径的变化造成了我们前面提到的，一方面下岗职工总数明显减少，另一方面城镇的社会登记失业率明显上升。把这两部分人员相加，大致可以代表我国城镇的实际失业人数和实际失业率。

目前我们的城镇实际失业状况是怎样的呢？截至2002年末的统计，有410万累计未安置的下岗职工，有770万城镇登记失业人口。两项合计约为

1180万人。温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的数字是大约1400万。这个差别有个原因。城镇登记失业人口也有个政策界定，那些有就业愿望，并且到当地政府指定的劳动部门去登记的失业人员才纳入统计。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显然有些人并未到政府指定的部门去登记，可能在自己找工作，或者处于流动状态中等等。我国的失业保障体系建立不久，尚在完善中。人们还不太熟悉，很多人未能及时登记。我想，温总理的数字是把这个情况估计在内的统计。但即或是1400万人的估计，这个数字也是比1998年朱镕基总理上任时的数字下降很多的。当时下岗职工和城镇登记失业人口合计的实际失业人数达到1900万人。如果考虑到未登记的，可能要达2000万人以上。

我们要正确地估计形势，就要作具体分析。就下岗问题说，温总理上任时面临的形势有比朱总理那时乐观的一面。不论怎么算，目前累计未安置的下岗职工总数和社会实际失业人员总数已经明显下降了。这是一个乐观的方面。

再一方面是，与过去相比，我们已经积累了很多有益的经验。我们懂得了利用类似“再就业服务中心”这种临时性、过渡性措施来缓解矛盾。我们已经初步形成了社会保障体系。职工和企业解除劳动关系后，还有地方去领失业救济金。此外我们还在城市中普遍建立了最低工资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同时，我们还探索出一些援助下岗职工再就业的新措施。比如提供新的劳动技能培训。现在上海这方面做得最好。很多纺织女工去做“月嫂”，做家政服务以及社区服务等。上海有关方面曾给我介绍过一个例子。上海纺织行业的一些三四十岁的女车间主任、党支部书记下岗后充实到了里弄、社区，去当居委会主任。这就大大改变了原来居民社区的领导、组织力量，对开发社区资源、扩大内需、满足老百姓日常生活需要和增加就业岗位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一举两得。

【3－1－4】在过去几年中，我们的就业岗位增长速度是不慢的。1999年城镇就业人员总数新增796万人，2000年新增739万人，2001年新增789万人，2002年新增930万人。温总理说2003年政府目标是新增800万个就业岗位，这个目标实际上和过去我们每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员的平均数大概持平。

我们的改革也在朝着有利于缓解下岗带来的社会利益矛盾方面发展。至少现在我们已经有了“有偿解除劳动合同”这样一个明确的政策方向。下岗这个问题持续了这么多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形成了一定的应对手段和工具。当然，是不是目前对这个问题已经可以得心应手

地应对了？还远不敢说。但是形势和四五年前不一样了。那时我们真是措手不及。

值得特别说明的是，在过去几年中，我们的就业岗位增长速度是不慢的。1999年城镇就业人员总数新增796万人，2000年新增739万人，2001年新增789万人，2002年新增930万人。还得注意到，这些数字说的是城镇新增就业人数。"新增就业人数"不同于"新增就业岗位"。因为新增就业岗位肯定得远大于新增就业人数。新增就业岗位得把当年减少的就业岗位抵消掉，才是新增就业人数。我想，这常识就可以理解。温总理说2003年政府目标是新增800万个就业岗位，这个目标实际上和过去我们每年新增城镇就业人员的平均数大概持平。

但另一方面，温家宝总理面临的任务和解决问题的难度并不比朱总理那一届政府轻。

"两会"的时候央视采访我，问我怎么看待新一届政府面临的主要难题。我说，如果用一句话概括的话，温家宝总理这届政府面临的形势是老问题、新特点。这和朱总理上任时面临的形势不同。朱镕基总理上任时，面临的是一系列始料未及的新问题。比如下岗、国企脱困、亚洲金融危机、长江大水、通货紧缩趋势、可持续发展以及后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挑战等。温总理面临的是什么形势呢？一方面所有这些问题没有一个真正彻底解决了的，所有问题都同样尖锐存在，包括"国企脱困"问题。财务意义上的脱困并不等于根本转变了运行机制。所有这些问题温总理都得接过来，包括"三农"这个老问题。但另一方面，这些问题又都呈现出了不同的新特点。比如加入WTO的问题。我们想到的那些挑战没来，我们没想到的挑战却不期而遇。我们现在不是经常说到，中国能否成为世界制造中心这个话题吗？这个新挑战正在考验我们的智慧。

【3－1－5】在过去3年中，国有经济系统每年的就业总人数一直以每年400万－500万的规模在减少。2000年时国有单位就业人数是8102万人，2001年减少到7640万人，2002年减少到7163万人。另外还有，城镇集体单位的就业人员总数也以每年200余万人的速度减少。2000年、2001年和2002年城镇集体单位就业人员总数分别是1499万人、1291万人和1122万人。这个趋势在今后一个不短的时期内还会持续下去。

我们回到就业、下岗这个问题上来。

在过去一些年里，我们的城镇经济系统一共排出了多少下岗职工呢？

1995年时，我国的国有和城镇集体单位在岗职工总数是1.4亿人，2002年末这个数字下降到8000万人。也就是说，从“九五”计划开始到现在，下岗总数至少已达6000万以上。说“至少”是因为，目前的在岗人员总数中还包括这些年中的新增职工。如果把这部分新增职工扣除，下岗人员总数还要多得多。

因为国有单位中还包括很多事业单位。而下岗主要集中在工厂。我们再来看看工厂。如果单说制造业，单说制造业中的国有单位，这个数字可能更尖锐。1995年时，制造业中国有单位的就业人员总数是3326万人，2001年时这个数字是1194万人，2002年时这个数字是995万人。也就是说，从“九五”迄今，国有制造业职工就减员2300万人，减少了2/3还多。

这些数字不是随便估计的，都是国家统计局公开发布的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上的数字。有确切出处。

是不是经过了这么五六年的时间，经过了这么大规模的下岗，国有经济系统的富余人员已经排出得差不多了呢？这个过程还远没有结束。在过去3年中，国有经济系统的就业总人数一直以每年以400万～500万的规模在减少。2000年时国有单位就业人数是8102万人，2001年减少到7640万人，2002年减少到7163万人。另外，城镇集体单位的就业人员总数也以每年200余万人的速度减少。2000年、2001年和2002年城镇集体单位就业人员总数分别是1499万人、1291万人和1122万人。这个趋势在今后一个不短的时期内还会持续下去。

2001年时，当时的国家经贸委有一个研究报告。这个研究报告认为，国有经济系统的冗员还在1/3以上。经过了这么大规模的减员，我们的国有经济系统还有1/3的富余人员？人们可能不相信。依我们的研究、观察，我认为1/3的估计可能还太乐观。我给大家举个微观的例子。

我国钢铁业有个很著名的企业，就是鞍钢。在过去很多年中，鞍钢不仅是我国钢铁业的“龙头老大”，而且还曾是我国所有企业中的“龙头老大”。鞍钢年产880万吨到890万吨钢。2002年，我国钢铁业的产量增长很快，鞍钢在这一年的钢产量大概能接近1000万吨。鞍钢有多少职工呢？有24万。假如国家现在出台一个改造、振兴老工业基地的政策，由政府出钱，把鞍钢的设备、工艺全部更新。而且这个更新还不用选21世纪最新的设备，例如数字化的、全智能模拟的。只选大约30年前一般自动化水平的。30年前的自动化水平，一个千万吨级的钢铁厂需要多少员工呢？只需要6000人就够了。

如果大家不相信国际水平的这个数字。我们眼前还有另一个可资比较的现成例子。这就是上海的宝钢。

宝钢年产860万吨到870万吨钢，生产能力大约也是1000万吨。宝钢一共有多少职工呢？一共只有1.2万职工。宝钢的谢启华总经理我认识，曾打过不少次交道。90年代末期时，宝钢曾打算把钢的生产能力扩张到3400万吨。我在论证中说，这万万不可。因为那样的话就等于把全国钢铁市场价格风险的1/3加到了宝钢一个企业的头上。后来宝钢接受了我这个意见，谢总还把我的这个研究报告批给宝钢决策层领导们传阅。谢总有一次和我说到，如果让宝钢把原有体制遗留下来的政治职能、社会职能再剥离一些，再去掉2000到3000人一点不会影响宝钢的产能。我国2002年的钢铁产量是1.8亿吨。大家想想，单是钢铁产业，我们就还可以去掉多少职工？

再给大家举个石油石化的例子。1998年，我国对石油石化产业进行了一次全行业的重组，形成了“中石油”和“中石化”两大集团。当时，“中石油”系统有97万职工，“中石化”系统有119万。最近一些年来，这两大集团不断进行“主辅分离”，进行人员分流。但基本框架变化不是很大。冗员问题仍是这些年来困扰两大集团的一个主要难题。

我国之所以在1998年对石油、石化产业进行整体重组，当时一是为了在国内市场上发展竞争，培育市场化的竞争主体；更重要的就是准备在海外上市，加快石油石化产业与国际市场的接轨，特别是和国际资本市场的接轨。在1999年时，两大集团都在努力完成上市准备，争取率先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市。“中石油”先准备好材料，所以是“中石油”先到纽约市场去申请的。但我们的企业把材料拿到纽约股市去以后，人家一看说，你们怎么“扶老携幼”就来了啊？怎么这么多退休人员、幼儿园的费用都在企业成本里面？这样的成本我们纽约的投资者怎么和你们合作啊？我们只好把材料拿回去进行第二次重组。于是就有了后来“中石油”剥离辅业的大动作。2002年北方一个大油田出现了社会不安定的事件，就和这次剥离过程的政策存在某些不完善有关。

我国的特点，国有大企业的资产主要集中于重要基础产业，例如钢铁、石油石化等。为什么这些产业今后还得大规模分流人员呢？因为这些产业目前面临一个重大挑战，就是迅速提高国际竞争力，应对入世后的外来竞争。怎么才能提高国际竞争力呢？无需争议的一个措施就是，大大加快产业主体技术的更新改造。不是一般的更新改造，而是直接瞄准国际先进水平的改造。提高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就得采用自动化程度更高的先进设备、工艺。不是一两个企业要改造，而是几乎全产业的设备、工艺都要进入一个大规模更新的高潮。就这一条，就决定了我们的这些资源密集型的重要基础产业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恐怕仍要持续地大量排出富余人员。

我们差不多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今后一段不短的时期内，国有经济系统对就业岗位的贡献肯定是负的。就是说，国有经济不仅不能为社会提供新增就业岗位，而且还要继续减少就业人员总数。我们说就业形势严峻，这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我们面临的就业形势严峻，不仅表现在国企排出富余人员的过程仍不能减缓上，而且还面临一个新问题。这就是通货紧缩趋势下的供大于求。

建国以来，我们面临过多次失业高峰。50年代初期，我们的重工业之所以被迫提前起步，原因之一就是要安置当时聚集在城市中的大量失业人口。60年代初期，为了消除"大跃进"造成的恶果，在国民经济的大调整中我们曾动员了2000万人回乡生产。60年代末，"文革"的政治动乱导致城市经济系统几近瘫痪，为安置当时的城镇新成长劳动力，我们动员了数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70年代末期，在知青返城的高潮中我们通过"国家、企业、个人一块上"的三结合就业方针化解了危机。但此前所有这些失业高峰有个共同特点，那时增加就业岗位的主要难点在于缺乏足够多的资金，在于没有足够的生产资料把这些劳动力组织起来投入到社会生产中去。那时市场不成问题，短缺处处存在。所以卖"大碗茶"也能挣到饭吃。

现在面临的问题则不同。现在即或有了足够多的投资，我们也不知道把这些富余人员组织起来干什么。因为市场已经普遍呈现为饱和以致相对过剩的局面。这种情况是以前没有面临过的，但将是我们在今后化解就业压力时需要长期面对的。

【3－1－6】即使把下岗和一般失业人员都包括进去，我们的实际失业率也仍在可承受的范围内。2002年末时的城镇实际失业率不过5.71%。但最尖锐的矛盾不在"面"上，而在"点"上。在一些国企特别集中的老工业基地、过度依靠单一产业的资源型城市上。那里的实际失业率可能高达20%。在这样的地区，失业引起的社会矛盾极其尖锐。

上述所说还都是就全国整体情况而言的，实际上，目前我们就业形势的严峻性更多地体现在局部区域上。

即使按温总理的1400万实际失业人口算，把下岗和一般失业人员都包括进去，我们的实际失业率也仍在可承受的范围内。2002年末时我国城镇就业人员总数是2.48亿人，由此推算的城镇实际失业率不过5.71%。但最尖锐的矛盾不在"面"上，而在"点"上。在一些国企特别集中的老工业基地、过度依靠单一产业的资源型城市上。

东北有很多单纯依靠单一产业、单一国有大企业的基地型城市。有些城市经过几十年的开采，地下的资源已经趋于枯竭。还有的城市，由于单一的大型国企不景气，整个区域经济陷入了困境。一个以煤炭为支柱产业的城市，煤炭挖光了，20万煤炭工人下岗。那里的实际失业率可能高达20%甚至30%。在这样的地区，失业引起的社会矛盾极其尖锐。

全国各地辽宁是我去过次数最多的省份，写了不知多少研究报告。1996年时我就写了一篇供中央领导决策参考的研究报告，题目就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要以再就业为核心》。这篇报告后来被辽宁评为省社科成果一等奖。当时劳动部的部长、副部长，辽宁省的省委书记都对这个报告有批示。那时我们到辽宁一些城市中调研，市长接见我们，不能走市政府的前门。因为前门都被集访、群访的人群堵满了。东北的“三九”天，地上的大雪没膝深。那些下岗的老百姓在雪地上苦苦等待。他们要求什么？他们只要求一份工作。看到这些，我真的感到心痛不已，泪水夺眶。

以上只是就城镇来说，而且只是就业形势严峻的一个方面。实际上我们面临的就业难题远不止上述这些。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还提出了一个数字，我们每年的城镇新成长劳动力还有1000万人左右。未来十年，光消化这部分就业需求就将要求有1亿个新增就业岗位。

我们已经提出了对国企职工“有偿解除劳动合同”的政策思路。但到现在为止，我们并未就这个思路提出具体的操作性方案。现在是哪个地方、哪个企业有钱，哪个地方或企业就“各自为战”地实施。“中石油”在2000年的石油涨价中发了点财，所以他们实行的是按一年工龄4000元给予补偿的办法。这样下来，30年工龄就得补偿12万元。平均一个职工获得的补偿在10万元以上。后来“中石化”也基本上按这个价码实行了补偿。但这个标准引起了很多新的矛盾。全国的国企职工都按这个标准补偿是办不到的。2002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也开始面临减员问题，这种垄断性行业也可能采取高标准的补偿。但另一方面，在一些困难行业，例如2000到2001年的煤炭、森工和军工，不可能实行这样的补偿标准。2001年时国务院发了个文件，按这个文件规定，因种种原因关并的煤矿职工最多每人补偿2万元。2万元封顶。这种不平衡也是从就业、下岗问题延伸而来的新问题。

此外，我们从2000年起实行的就业政策叫做“市场导向下的竞争就业”，但我们的劳动力市场还远未发育成熟。正因如此，去年党的“十六大”才特别提出，要大力发育包括劳动力市场在内的要素市场。

2.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出正在加速

☆ 就业的主要压力已经不在城镇，而在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

☆ 农民不买东西，关键是收入不能支持他们大规模消费城市生产的工业品。

☆ 朱镕基前总理说，最让他头疼的问题就是农民收入问题。

☆ 启动农村市场和提高农民收入的主意特别简单。就四个字，"减少农民"。

☆ 并不是没有地种的农民才是剩余劳动力。导致生产率降低的那些追加要素都是"剩余"的。

☆ 在10年左右的周期内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出的规模要达到1.5亿－2亿人。

☆ 如果把我国的农业生产率提高到国际先进水平，需要6000万农民就足够了。

☆ 从时间上说，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问题已经没有了后推的历史余地。

☆ 城乡劳动力对有限就业岗位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

【3－2－1】在整个"九五"计划期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一年比一年低。1996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是8.99%，2000年时这个指标下降到2.11%。"十五"期间的2001年和2002年，这种状况有所改善。这两年农民纯收入的增长速度分别是4.20%和4.76%。但这也只是恢复到1997年到1998年的增长水平。温总理着重指出，"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问题，第一是农业发展滞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这已经成为制约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因素"。

下岗问题在很长时期内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但实际上，目前下岗问题已经不是中国就业形势严峻的主要原因。现在我们面临的最大就业压力并非

是来自城镇劳动力。

我前面说到，2002年底时累计未安置的下岗职工不过410万人。尽管这仍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但这个数字不足以给我们的社会造成危机。极而言之，我们就是采取“包下来”的办法，长期发生活费，这也是办得到的了。此外，下岗的政策界定是1985年以前参加工作的人。从实际情况看，“下岗职工”这个和原有体制身份相联系的人群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自然减少。就像当初的“离休”一样。下岗职工所需要的政策，更多的是怎样和养老保障制度接续，怎样援助他们中的一部分年龄偏大、劳动技艺单一的人退出对劳动岗位的竞争，怎样合理兑现体制身份转换的补偿等方面问题。

下岗职工以外的另一部分人群，城镇登记失业人口的问题主要要通过发育劳动力市场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两方面措施来解决。

给大家算个大账。我国目前的城镇就业人员总数是2.48亿人。如果单说城镇，由于我国是个人口大国，区域间存在着明显的发展不平衡，经常性地存在着一个5%左右的社会失业率是不可避免的现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一个合理的现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包括那些经济发达的国家，就是在他们的经济景气状态非常高涨的情况下，也会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个经常性的失业人群和失业率。我们就是在全面小康社会建成以后，可能这样一个经常性的失业现象也会存在。5%的失业率是多少失业人口呢？按目前的城镇就业人员总数算，大约就要有1300万人左右。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经常性存在的失业人口数字还会增加。

我们说，一个经常性的失业人口存在很正常。但这并不意味着存在这么一个规模的城镇失业人口无足轻重，不需要社会和政策的关注。但关注的侧重点不一样。

在“体制身份转换”这个特定历史任务完成以后，政策应当关注的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局部地区的就业问题。例如因为产业结构升级、资源枯竭导致的局部经济衰退和就业状况恶化。这在各国皆然。各国都有过老工业基地的改造问题。二是对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和就业不稳定的“边缘化”人群的社会救济问题。例如对残疾人员就业、特困家庭最低生活保障等。

就业的主要压力已经不在城镇劳动力。在哪里呢？在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

我们前面说到过，温家宝总理面临的问题是老问题、新特点。在就业问题上，温总理面临的最大新特点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在加速转移的问题。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这个问题，在上届政府的时候已经开始了。但在朱总理上任的时候还不是很突出，由此引起的矛盾不是很尖锐。这有两

个原因。一个原因是那时候我们推行的是叫农民“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的政策。另一个原因是在过去一段比较长的时期内，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镇务工的就业市场实际上和城镇劳动力的就业市场是分割的。由于文化水平、技能素质等方面的差异，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和城镇劳动力在就业岗位的选择上也有比较明显的差异。农村劳动力从事的主要是保姆、餐馆服务员、建筑等领域的工作。他们与城镇劳动力在同一个市场范围内竞争的机会很少，城乡劳动力对劳动岗位的直接竞争并不十分普遍。在朱总理上任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就业问题上最尖锐的矛盾是下岗问题。

但现在不同。现在在就业问题上，最尖锐的矛盾在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我们先说一个国民经济全局的形势判断问题。大家都知道，就业问题尽管重要，但它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从短期看，中国经济短期面临的首要矛盾并不是就业问题。是什么呢？短期内的主要矛盾是供求失衡问题，是通货紧缩的阴影仍在持续的问题。

通货紧缩的一个外在表现叫做“价格紧缩”。就是持续的物价负增长。从1998年初到2000年5月，我国的物价总水平曾连续30多个月呈现为负增长。2000年5月，朱总理到欧洲出访，在布鲁塞尔时曾对那里的商界、政界人士讲到，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重大转机。这个“重大转机”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物价“由负扳正”。

此后，从2000年5月一直到2001的10月，我国的物价总水平连续15个月表现为微弱的正增长和零增长。但从2001年11月起到2002年12月，我们又有了连续14个月的物价负增长。2003年，也就是今年以来，我国前三个月的物价总水平是正增长0.3%。再次出现微弱的正增长。

我们为什么要提到物价呢？因为在市场经济下，价格是所有市场参与者之间最通用的语言。人们做生意，不管你说上海话，广东话，南京话，北京话，不管是中国话还是外国话，相互间最能沟通的语言就是价格。我们可以说，价格几乎包含了交易过程中的一切必要信息。从经济学角度看，价格信号中包含着所有市场参与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及其状态。市场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利益矛盾。这些矛盾是趋于激化还是趋于缓和，所有有关信息都可以通过价格变化反映出来。举个例子说，政策为什么要特别关心农产品价格呢？因为这个价格是影响城乡之间利益关系的最重要杠杆。

那么持续的价格负增长反映出了什么问题呢？物价总水平的持续低迷反映出，目前在我们国家总量关系中，总供给和总需求关系仍然处于不平衡状态，而且是严重的供大于求的失衡。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人常说，价格是调

整市场供求之间关系的杠杆。如果价格持续低迷，说明供求失衡已经严重到超出了价格杠杆能够自动调节的范围。

那么供大于求的失衡跟就业有什么关系？这就要说到农村市场。

人们发现，将近70%的农村人口对工业品的消费程度还是非常低的，农村市场还远远没有启动。显而易见，如果农村市场启动的话，我们应当不会在现在这个发展阶段就面临这么严重的供大于求的失衡。

从1998年以来，我们始终致力于研究扩大内需，平衡供求的问题，想了不知多少主意。1998年时曾有人在媒体上写文章，说我们国家白供养了这么多专家了，又是研究员，又是教授、博士什么的，还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科院、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这些研究机构。这么多人怎么连这么点问题都想不明白？启动农村市场啊。让农民买东西，供求失衡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启动农村市场的答案其实人们很容易想到。中国13亿人口中还有68%是农民。启动农村市场，国民经济中的供求失衡不是就可以大大缓解了吗？问题是怎么启动。问题是农民为什么不买东西。回答这个问题也并不难。关键是农民的收入不能支持他们大规模消费城市生产的工业品。

【3－2－2】启动农村市场和提高农民收入的主意特别简单。就四个字，“减少农民”。局限在农村、农业这个领域里，我们不可能根本解决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问题。农业技术进步所能导致的产出增长和生产率提高总是不断趋近于一个极限。农产品的需求有自然限度。这些特点决定，农民的增收就不可能依靠本产业的规模扩张来实现。这一点，不仅已经为经济学的理论所证明，而且也为各国的发展实践所普遍证明。

再下一个问题可就不那么容易回答了。这个问题是，究竟怎么才能提高农民收入。

我们没有关心提高农民收入的问题吗？大家可以把过去五年，甚至更长一些时候的重要报纸找出来，比如人民日报、上海的解放日报等。你任意抽取一张，可以说几乎每天的报纸上都可以找到有关提高农民收入的字眼。

上届政府在提高农民收入问题上可以说是千方百计了。前几年，我们在粮食购销体制上实行过一项改革，叫做“敞开收购、顺价销售、封闭运行”。这个政策的目的何在呢，就在于防止“谷贱伤农”。试图通过政策补贴和政府强制拉高粮价的办法保护农民的利益。这个政策的成败得失可能还有很多值得总结之处。但目标是保护和提高农民收入，这丝毫没有疑问。

不仅在产品的“出口端”，在投入端，政策也采取了强力介入的措施。在化肥、农药、种子、农机具、农膜等各种支农物资上，政府想尽一切办法减免税费和降低价格。政府尽量少收税或者不收税。通过指定专营的办法减少流通加价。在减轻农民负担上，这些年我们不知发过多少文件。

2002年的“两会”结束时，朱镕基总理也有个记者招待会。当时有香港记者问到，说朱总理您的任期还有一年，在您任期内让您最头疼的是什么事呢？朱总理回答，最让他头疼的问题“三农”问题，其中头疼得睡不着觉的问题就是农民收入问题。朱总理这番话也是电视实况转播的，人们记忆犹新。

通过这样的强调，采取了这么多措施，农民收入增长了没有呢？年年还是增长的。但是，令我们尴尬的是，在过去一个很长时期内，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呈现为连年下降的趋势。在整个“九五”计划期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一年比一年低。1996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是8.99%，2000年时这个指标下降到2.11%。

收入增长速度持续下滑，收入预期不断恶化，你说让农民拿什么买东西？在座各位将心比心，如果你的收入增长速度连年下降，你的支出增长会每年不断提高吗？

“十五”期间的2001年和2002年，这种状况有所改善。这两年农民纯收入的增长速度分别是4.20%和4.76%。但这也只是恢复到1997年到1998年的增长水平。今年“两会”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温总理着重强调指出，“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问题，第一是农业发展滞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这已经成为制约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因素”。

应对供求失衡，实施扩大内需的战略，根本举措在于开拓农村市场。开拓农村市场的关键在于提高农民收入。那么提高农民收入的关键何在呢？

2001年、200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有所提高。我们分析，提高在哪里了呢？提高在外出务工的工资性收入上了。2002年，通过外出务工，全国农民大约平均每人增收100元。说到底，要解决农民收入问题，最终要靠把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解脱出来，转移到城镇和非农产业就业。没有别的出路。

在过去几年中，为了研究扩大内需、启动农村市场和提高农民收入的问题，我们把中国最好的学者都集中起来一块儿想主意。包括留学美国的、留学日本的、留学欧洲的，都集中起来，大家想了很长时间，终于想了一个主意。这个主意特别简单。什么主意呢？就四个字，“减少农民”。

人们达成共识，如果局限在农村、农业这个领域里，我们不可能根本解决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问题。由于对自然的依赖程度和市场的特殊性等方面

的决定，农业的生产率提高速度永远赶不上工业和其他国民经济领域。工业领域可能靠一个技术更新，一夜之间就可以使生产率成倍提高。上海的“磁浮”列车可以把轨道交通的运行速度一下子提高4倍。农业不可能有这个前景。技术进步过程有个客观规律，农业技术进步所能导致的产出增长和生产率提高总是不断趋近于一个极限。简单逻辑就可以很容易地反证这个道理。如果农业产出增长或者生产率增长不存在极限，我们不就可以在一亩地中打出够全世界人吃的粮食了吗？

此外，农产品的市场也不同于其他产业。10年前，手机在中国叫“大哥大”，很有钱的人才能拿在手里炫耀。现在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移动通信用户群。5年前，旅游还是和外国人联系在一起的，最多是和商务、公务活动联系在一起的，现在寻常百姓举家出游不算新鲜事。这些产业的市场扩张是没有自然限度的。但农产品不行。农产品的需求有自然限度。你再往好里吃，也有自然限度。这些特点决定，农民的增收就不可能依靠本产业的规模扩张来实现。这一点，不仅已经为经济学的理论所证明，而且也为各国的发展实践所普遍证明。

那么靠政府补贴、政策扶持行不行？也不行。农业发展应当有政策干预，不能单靠市场竞争。但政府补贴、政策扶持并不是根本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最终途径。假定说，政府今年用政策补贴的办法把粮价从每公斤1.4元提到1.6元，明年从1.6元提到1.8元。政府能持续地不断提价吗？我们得有多大的财政力量才能持续地补贴下去？而且还得不断提高标准地补贴下去？那是不可能办到的。政府扶持、政策补贴不可能最终解决农民的富裕问题，甚至连彻底脱贫这个根本问题都无法真正解决。因为即或在一段时间内，通过政府政策支持实现了脱贫，一遇天灾人祸、市场变化，这些地方还会返贫。这种情况在过去几年中我们已经反复遇到过。

[3-2-3]生产率是社会走向富裕的物质基础。不断提高生产率，人们分享到的社会福利才能增加。一个农民种一亩地能打500斤粮食，两个农民种一亩地能打600斤。两个农民种一亩地的结果是生产率大幅度降低，农民的收入不可能有效增长。

为什么减少农民才能提高农民收入呢？我们来讲个经济学道理。

假定一个农民种一亩地能打500斤粮食，两个农民种一亩地能打600斤。要是按照过去“以粮为纲”的指导思想，这一亩地就该两个人种。那时提倡“千里百担一亩田”的精神。就是抗旱时走一千里地，去挑一百担水，来浇这一亩地的庄稼。你说，这块地庄稼的成本得多高呀。这种指导思想，用经济

学的语言归纳就是，能够导致实物产出增加的追加投入都是正确的。按这个思想，如果三个人种一亩地能打650斤粮食，那一亩地就应当由三个人来种。

这是计划经济的思想。市场经济不这样看。市场经济认为，一亩地一个人种打500斤粮食，叫做“人均实物劳动生产率500斤”；两个人种打600斤粮食，叫做“人均实物劳动生产率300斤”。两个人种一亩地时，尽管粮食的产出量增加了，但生产率却大大下降了。而在市场经济下，生产率是提高收入最重要的物质基础。一个显然的道理，为什么在工业文明时代，人口和土地还是这么多，而社会享受的福利资源要比农业文明时代多得多呢？因为人们在生产过程中使用了机器，由此带来了生产率的大规模提高。

生产率是社会走向富裕的物质基础。不断提高生产率，人们分享到的社会福利才能增加。两个农民种一亩地，结果是生产率大幅度降低。农民的收入就不可能有效增长。正确的办法是把第二个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去。一方面，我们把第二个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来，留在土地上的第一个农民就会增收，他的收益就从300斤粮食提高到了500斤；另一方面，第二个农民从事其他职业而获得收入，两个农民平均的收入水平就会进一步提高。

有学者不赞成“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个提法，认为应当叫“农村富余劳动力”。我看这个叫法还不能改。“剩余”是经济学上具有特定含义的概念。“剩余劳动力”不是没活可干的人，不是“富余”。并不是没有地种的农民才是剩余劳动力。在经济学意义上，导致生产率降低的那些追加要素都是“剩余”的。

当剩余要素不能顺畅转出时会怎么样呢？剩余劳动力也得吃饭呀。这就会迫使两个人去种一亩地。由此就导致了农业生产率的下降。实际上，剩余劳动力被强制地束缚在土地上的后果不仅是导致生产率下降。农产品的产出增加还会导致供大于求，由此引起农产品价格下跌。增产不增收。我国农业在过去几年面临的恰好就是这个问题。

此外，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转出还会造成另一个严重恶果，这就是土地与人口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导致对土地的过度垦殖。在土地上超过合理限度地追加要素来增加产出，结果就是土地过载和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这个后果也不能忽略。

那么怎么减少农民呢？只能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

2002年春节前后，外交部的驻外使节都回国休假、述职。外交部也请我去讲讲国内经济形势。我就讲到了减少农民这个问题。我说，你们这些驻外使节都是交际极广的人物，在国外公交、私交的朋友很多。你们谁能帮咱们走个后门，托托人，把咱们中国的农民往别的国家转移上两个亿？大家说，

估计是不行。没这个可能。唯一的出路就是在我们国内自己解决，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

【3－2－4】如果把我国的农业生产率提高到国际先进水平，需要多少农民就够了呢？不超过4000万人就够了。有学者说，中国的自然禀赋条件较差。考虑到这一层，6000万人也足够了。我们现在的农村劳动力有多少呢？2002年末的数字，我国乡村就业人总数为4.90亿人！

我们面临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出的规模有多大呢？我们反复提到温家宝总理在2003年“两会”后记者招待会上说的话。在这个招待会上，温总理说目前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大约是1.2亿人。

那么还得有多少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呢？

在我国的“十五”计划中有个说法。按照已经写入“十五”计划的数字，在2001年到2005年期间，将有400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城镇和非农产业就业。4000万人是个什么概念呢？我们前面讲到了，我国城镇新成长劳动力是1000万，我们目前下岗和失业总人数是1400万，2002年末城镇就业人员总数约为2.5亿人。这4000万意味着什么，大家想想就知道。

是不是再转出400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个问题就解决得差不多了呢？远不是。事实上，从农村的发展需要和提高农业生产率的要求看，从城乡平衡发展的要求看，我们需要在未来5到10年左右的周期内，每年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出1500万到200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也就是说，在10年左右的周期内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出的总规模需要达到1.5亿到两亿人才行。

为帮助大家有个基本估计，我给大家一组数字来说明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出的规模需要有多大。我们国家每年的粮食总产量，正常年景是4.7亿到4.8亿吨。有这个产量就足够全国人吃马嚼了，包括工业用粮也够了。我们一共有19亿亩耕地。在我国加入WTO的过程中，不是有很多专家担心中国的农业缺乏国际竞争力，会遭受比较大的冲击吗？如果把我国的农业生产率提高到国际先进水平，也就是平均每个农民能种多少亩地、每个农民种地能打多少斤粮食的指标提高到国际先进水平，那我们的农业就不怕入世的冲击了。

假定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种19亿亩耕地，打4.7亿吨粮食，需要多少农民就够了呢？不超过4000万人就够了。有学者说，中国的自然禀赋条件较差。考虑到这一层，6000万人也足够了。我们现在的农村劳动力有多少呢？2002年末的数字，我国乡村就业人员总数为4.90亿人！

可能会有人争辩说，中国农村就业人员中不都是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这没错。比如还有开小饭馆的。但是，在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构成中，直接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占绝对比重，这个是个无需争议的事实。

为了说明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潜在规模之大，我再给大家一个参照系。温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提到，欧美所有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只有4.3亿人。这个“所有发达国家”主要指世界上的三大经济区。就是北美经济区，以美国、加拿大为代表；东亚经济区，以日本、韩国为代表；欧洲经济区，以欧盟中的英、法、德等国家为代表。在这些国家中一共有多少就业岗位呢？一共有4.2亿个就业岗位。就是说，假定我们真有个办法让这些发达国家的人都“下岗”，把所有的就业岗位都让给我们中国农民，连他们的总统、议长、企业的CEO什么的都由我们中国农民替他们当了，那也不够满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对就业岗位的需求。

说到这里，很多人可能会问，我们能否推迟这样历史进程呢？

不能。实现这样一个转出规模，我们才能保证留在土地上的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跟上国民经济扩张的速度、跟上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才能保证城乡之间的利益矛盾不致激化。

什么叫“矛盾激化”呢？现在一些农村剩余劳动力上北京、下广州、奔上海、到深圳去打工，一时找不到活干，少数素质差的就把马路上的下水道井盖偷去卖废铁。再恶劣一些的还有溜门撬锁的，极少数还有拦路抢劫的。我们说，这些现象不能简单归咎为“素质问题”或“法制观念”。它们是城乡发展不平衡矛盾的外在现象。如果我们不能让农村居民在未来的一个战略周期内更大程度地分享经济发展的好处，那么可以断言，城乡发展不平衡矛盾导致的现象可就没这么简单了。那时群体性、暴力性的对抗就会发生。不要说经济发展，连社会稳定、制度安全都会受到极大的威胁。从时间上说，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问题已经没有了后推的历史余地。不做好这件事，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改革就没有希望，工业化、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事实上，在过去几年中，我们的政策已经从限制农民进城逐步调整为降低农民进城的种种制度、政策壁垒。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实行了几十年的城乡分割的户口壁垒已经明显松动。例如，石家庄已经出台大幅度降低城市户口“门槛”的规定。广东甚至已经开始了取消城乡户口差别的操作。在劳动力市场上，前期一些地方保护下岗职工的歧视性政策正在被加快清理。北京已经明确规定，用人单位不许在招工时规定“只招北京户口”等条件。

我们说就业形势严峻，还不仅在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规模有多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必然会带来一个问题，这就是城乡劳动力

对有限就业岗位的竞争。可以说，这个趋势是不可避免的。

目前，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方面城市劳动力正在不断降低选择就业岗位的条件，而另一方面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正在通过种种就业技能的学习途径努力提高自己对就业岗位的竞争能力。城乡劳动力对有限就业岗位的直接竞争态势已经明显出现。问题的严峻性还不止于此。这两部分劳动力群体中最先相互“碰撞”的，很可能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中年轻力壮、流动性强、具有一定文化基础的相对强势群体和城市劳动力中年龄偏大、劳动技能单一、文化素质较差的“下岗”职工等弱势群体。就是说，我们面对的不仅是就业岗位的供不应求，形势的严峻性还在于，我们还将面对协调社会群体间的利益矛盾问题。

3. 对就业岗位的竞争已经发展为国际化的竞争

☆ 在国际经贸争端中，贸易顺、逆差已不是主要原因了。主要原因是对“饭碗”的竞争。

☆ 在当前的经济全球化竞争中，最稀缺的资源是就业岗位。

☆ 我们最需要的是就业岗位。有了这个资源，我们什么事情都好办；没有这个资源，我们可能什么事情都办不成。

☆ 我们要做的就是要争取让更多的就业岗位配置到中国来，转移到中国来。

【3－3－1】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左右周期内，即使世界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国际贸易总量不断扩张，世界范围内的就业岗位也几乎不能增长。哪个国家要想增加就业，就得争取把有限的存量岗位更多转移到本国国内来。在过去一段时期内，在我国面临的国际经贸争端中，贸易顺、逆差已经不是引起争端的最主要原因了。最主要原因是对“饭碗”的竞争。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出对就业形势的压力有多大，大家已经有个基本概念。是不是中国就业问题的难点到此为止了呢？还没有。还有新的难点。

最近两三年中，我们注意到，对就业岗位的竞争已经发展成为了一个国际化的竞争。国际间对就业岗位的竞争矛盾正在趋于激化。

什么叫“就业竞争的国际化”趋势呢？这个趋势不是指有多少中国劳动力输出到国外劳务市场中去，也不是指有多少外国人打算到中国来打工。这方面内容也有。比如劳务输出对中国来说仍是重要的。在伊拉克战后重建的问题上，从我国的情况看，能够让我们分享的恐怕还不是多大的石油开采权，主要是劳务输出的机会。但劳务输出不是我们面临的国际化竞争的主要内容。

全世界的经济学家有个共识，别说现在全球经济仍处于低迷状态，就是从明天起，整个世界经济转为了持续的高涨、繁荣，而且持续上10年，全球

就业岗位的增加也将是微乎其微。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左右周期内，即使世界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国际贸易总量不断扩张，世界范围内的就业岗位也几乎不能增长。为什么呢？因为有高新技术的加速发展，因为有“新经济”下的发达国家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因为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世界范围内的重新分工和资本重新优化配置。

经济扩张和就业岗位难以增加必然带来对有限就业岗位的国际化竞争。哪个国家要想增加就业，就得争取把有限的存量岗位更多转移到本国国内来。

我们注意到，在过去一段时期内，在我国面临的国际经贸争端中，贸易顺、逆差已经不是引起争端的最主要原因了。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是对“饭碗”的竞争。

大家可能听说过，2002年中日之间出现过一个贸易争端，日本要抵制中国的大葱、大蒜，还有浴巾什么的，中国采取了一系列反制裁措施，对日本进口产品加征特别关税。日本经济已经连续12年没有走出低迷、萧条的泥潭了。日本人真打算靠抵制中国的大葱、大蒜摆脱经济困境？不可能。日本人没那么傻。真正的目的是想挑起争端，抑制日本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趋势。最近两年，国际上有个对中国非善意的说法，叫做“中国威胁论”。这个“中国威胁论”的日本版，就是所谓的“产业空心化”。

什么叫“产业空心化”呢？日本一些政客、学者认为，由于中国的崛起，特别是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把日本的资本都吸引到中国去了。日本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是制造业。但是现在，制造业真正的生产重心已经不在日本，要么已经把制造基地转移到了中国，要么干脆委托中国企业“贴牌生产”了。日本的制造业由此已经变成了“空心”的产业。这就是所谓“产业空心化”的含义。

“产业空心化”的结果会怎么样呢？提出这种说法的人认为，这个趋势的直接结果就是日本的就业岗位被中国人抢走了。到2003年初，日本的失业率达到5.5%。别小看这5.5%。这是日本在过去30年中的最高失业率。要知道，在90年代初期，日本还是一个劳动力不足的国家。5.5%的失业率放在欧洲大陆可能不算什么，但放在日本可就很严重了。因为日本的文化、社会传统很特殊。

在日本有个其他国家不具备的“官民协调体制”和“劳资协调体制”。那里的工会代表雇员和老板谈判时谈什么呢？不光谈长工资，而是有时还会谈“降工资”。这让美国人听起来可能不可思议。但这的确是真的。比如在70年

代石油危机时，日本的会社也同样面临困境，经营不下去，就得缩减生意、降低成本。这时日本的工会就找老板谈，建议说，我们大家都同意只拿六成工资，每人每周只上三天班，大家轮着干，公司能不能不裁员？这是日本特色，别的国家没有。所以日本的失业率到5.5%就是很严重的了。

日本的失业率上升，归根结底是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和美国在高科技产业的竞争中打了败仗，上世纪90年代日本想成为计算机大国，结果没成功。另一个原因是日本从90年代初期开始的“内需扩大”战略未能取得实效，反反复复的过程反而使财政陷人了极大的赤字危机。此外还有，亚洲金融危机也使日本经济中原有的“泡沫”进一步破灭。这和中国人无关，和中国的制造业发展无关。但日本总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企图把矛头引向中国。在日本媒体上，总是不断有把矛盾归咎于中国竞争的声音。日本政界、经济界众口一词地强调，中国以低廉劳动力成本为优势的制造业竞争已经成为了日本经济难以复苏的主要障碍。

在整个20世纪中，美国一直以高举自由贸易大旗的“旗手”自居。但近年来，美国社会公众中反对“贸易自由化”、“经济全球化”的声音成为了主流。1999年在世界贸易组织召开会议的过程中，在西雅图爆发的对经济全球化的抗议活动几乎酿成暴力冲突。其原因就在于抗议者担心全球化将导致美国就业岗位的减少。

2002年时，美国启动了一个新的贸易保护条款，叫做“201条款”，就是对进口钢材加征特别关税。大家可能听说过这件事。启动这个条款是要以很大的政治、外交资源为代价的。因为要得罪日本、韩国、德国、俄罗斯、中国、巴西以及印度等很多国家。美国可能在不同的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中需要这些国家的合作。那为什么美国还要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启动这个“201条款”呢？是因为布什或者美国的经济学家忽然认为钢铁业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带头产业，或者将成为高科技的主要领域了吗？肯定不是。最先把钢铁业称为“夕阳产业”的就是美国人。美国之所以不惜代价地启动“201条款”，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现在在美国，钢铁业还提供着15万个就业岗位。关系到这么多就业岗位的存留，政治家是不敢轻易放弃的。保护“饭碗”成为了政府政策的首要选择。

欧洲的情况呢？欧洲的矛盾更尖锐。在过去很长时期内，不算英国，欧洲大陆的失业率曾连续十余年在两位数以上。2002年才勉强降到一位数。

前不久，欧洲政坛出了一件让全世界震惊的事。法国总统大选，预选时先选两位候选人，结果选出了一个“新纳粹”的代表人物。法国不仅号称最有民主传统，而且社会主义思想也具有很深的社会基础，且历史上曾饱受纳

粹之苦。为什么会选出这样一个结果来呢？原因同样很简单。这个“新纳粹”人物的竞选纲领就是，把移民都赶走，保护“真正的法国人”的饭碗。这个竞选纲领很有诱惑力。因为这些年，失业已经成为了法国社会矛盾的最尖锐之处。后来在世界各国的政治压力之下，这个候选人才被迫退出了对总统职位的角逐。

2002年，在海南的博鳌召开了一个国际会议，叫做“亚洲经济论坛”。朱镕基总理亲自出席，在会后还开了个记者招待会，也是电视实况转播的。在那次会上，有个温州企业家提问说，朱总理我问个问题，我们温州的民营企业生产的一次性打火机出口到欧洲去，欧盟抵制我们，说我们的产品不安全，非要让我们在产品上加装一个保险开关。中国不过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不过是一些民营企业，一次性打火机不过是制造业最末梢的一个简单产品，欧盟值当这样大动干戈，动用法律的、行政的力量，动用“技术壁垒”，14个国家联合起来抵制我们吗？朱总理当时没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说加入WTO后经贸关系主要靠企业去对垒，政府不能有太多干预。

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欧洲这些国家并不是真的认为中国的一次性打火机不安全。我们的温州企业家调查过了，在过去10年中，欧洲从未有过因为儿童玩弄一次性打火机而失火的事件。真正的问题是在哪里呢？在于打火机在中国还是在欧洲生产，关系到2万个就业岗位配置到欧洲还是配置到中国。现在全世界一次性打火机中80%是在中国生产的，其中绝大部分在温州。欧盟的真实意图就是保护“饭碗”。

[3-3-2]在当前的经济全球化竞争中，什么资源最稀缺？不是资本，不是技术，而是就业岗位。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内在含义之一，就在于中国正在参与到对全球有限就业岗位的竞争中去，让更多的就业岗位配置到中国来，流动到中国来，转移到中国来。

在当前的经济全球化竞争中，什么资源最稀缺？不是资本，不是技术，而是就业岗位。全球的资本已经明显过剩。找不到有利投资领域的资本到处充斥。要不也不会集结起那么多的投机资本，叫做Hot Money，就是“热钱”。全世界的技术创新能力也非常充裕。美国现在“下岗”最多的就是电脑工程师，最稀缺的资源是就业岗位。

近年来人们经常提到“经济全球化”这个说法。经济全球化是什么呢？就是国际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优化配置和国际间的重新分工。资本加速流动，就带来了就业岗位在全球范围的流动，也就带来了对就业岗位的国际

化竞争。

最近一段时期，在讨论“中国能否成为世界制造中心”的过程中有个声音很值得注意。有些人说，中国不应当成为制造中心，因为那是没有核心竞争力的表现。还有人说 OEM 方式，也就是“贴牌生产”，是给别人打工。这些意见认为，我们中国应当集中力量发展高科技产业。要是 13 亿人都写软件，搞技术创新，那我们中国得赚多少钱呀。我看这样的专家是“伪专家”，至少是书生误国。全世界写软件的就业岗位一共才有多少？13 亿人都写软件卖给谁啊？

实现中国的经济发展，提高老百姓的福利和收入水平，协调我国社会利益矛盾，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是就业岗位。有了这个资源，我们什么事情都好办。没有这个资源，我们可能什么事情都办不成。从一定意义上说，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就意味着有限就业岗位在全球的重新配置。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内在含义之一，就在于中国正在参与到对全球有限就业岗位的竞争中去。我们努力要做的，恰好就是要争取在这场国际化竞争中让更多的就业岗位配置到中国来，流动到中国来，转移到中国来。

再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们广东有家有名的民营企业，叫“格兰仕”。现在全世界的微波炉有一多半是这家企业生产的。当然有些是“贴牌生产”，挂的是人家的商标。

我曾经有次问这个企业的老总，格兰仕怎么能够扩张得这么快呢？老总说，欧洲一些企业的老板把他们的生产线白送给我了，不要钱。我说这就奇怪了。莫非欧洲那些老板都“心太软”，要不就是你们两家结亲戚了？

老总说都不是。原因很简单。欧洲那个地方的福利化程度很高，原来企业一周开工六天，后来改成开工五天，现在每周开工四天半。原来每天工作八小时，现在每天工作六个半小时，而且中间还得有两次“Coffee Break”，就是停下来休息喝咖啡。你说这样的开工率，设备、生产线的利用率能有多高？而在我们顺德这个地方，工厂里不仅没有节假日，连白天黑夜都是三班倒。你说这个开工率又有多高？欧洲老板把生产线送给我有个条件，就是他原来在欧洲生产多少万台微波炉，我还得给他“贴牌生产”多少，而且加工费还得比他自己生产时的成本低。我说这容易。在我这样的开工率下，分摊到单位产品里的固定成本要比欧洲不知道低多少。不仅给他“贴牌生产”的成本低，富余的产能我差不多都是白用。这就是格兰仕为什么能发动降价行动的秘密。

格兰仕把生产线从欧洲搬到了中国，客观上就是把就业岗位从欧洲搬到了中国。现在格兰仕有多少员工？有四万多。这四万打工仔、打工妹在格兰

仕干活，在中西部就有四万个家庭脱贫，实现温饱。这有什么不好吗？这是对中国发展最大的好。前不久有个事件，有家媒体报道说，格兰仕自称“世界名牌”是“假冒伪劣”。这个报道一出去，对格兰仕产品在市场上的打击很大。格兰仕有没有自称是“世界名牌”？我没有充分调查。但我想，一家民营企业的产品能够占到全世界同类产品的一大半，这还不是“世界名牌”，那什么是“世界名牌”呢？

其实，这个事件的真实背景是我们有些政府的行政权力机构，企图把评比“名牌”的权力拿在自己手里。我对这种旧体制留下的恶习可以说深恶痛绝。这些为了一己之私利打击格兰仕的人不知想过没有，你打击的不是格兰仕的老板，你打击的是老百姓的饭碗啊。

参与对就业岗位的国际化竞争，对我们中国来说意义极其重大。一切有利于这个竞争的事我们都要做。一切有利于这个竞争的行为我们都要支持。我们的一些民营企业已经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大成绩。我们的政策、我们的媒体要支持他们，给他们以鼓励。在这个问题上要有大局、全局、长远的眼光。从我国的切身利益出发，我们需要高度重视这一态势。要积极参与而不是回避这一竞争。在世界经济增长放缓的形势下，我们的产业政策调整、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等各项战略措施，应当有利于参与这一竞争。争取把全球有限的就业岗位更多地配置到中国来，这应当成为我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一个新的战略目标。

4. 提问与讨论

☆ 让老百姓过好日子就是创造市场，创造市场就是创造就业岗位。

☆ 劳动者利益要适度优先于资本利益，就业岗位增加要优先于社会收入水平提高。

☆ 政府什么时候都不应当鼓励“减员”。

☆ 为什么维护政府利益的税收制度越来越严格，而维护劳动者利益的工资制度则明显松弛以致懈怠呢？

☆ 欠发工资是劳动要素与资本要素之间的交易规则失范，因而也是市场经济秩序混乱的一种表现。

☆ “蓝领”是工业化进程中实现“人机对话”不可或缺的媒介。

☆ 应当让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有进入城镇的第一步台阶，而不能简单地要求所有岗位一律“持证上岗”。

☆ 中国没抢日本人的饭碗。

【提问一】：我们在就业问题上面临的压力很大，那解决这个问题出路究竟何在呢？就业战略的核心是什么？

答：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刚才更多地讲到了就业形势，对策方面涉及得不多。借这个问题补救一些。

在就业问题上，中国面临这么多不利因素，我们究竟能不能最终解决这个就业问题呢？我认为一定能。怎么解决？就是发展。发展是硬道理，千真万确。

从目前看，我们在就业岗位的国际化竞争中还是占了一点先机的。在各种要素中，最难跨国界流动的就是劳动力。我们说，把中国建成世界制造中心，本质上就是劳动力出口。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最终之策。最终解决还得靠我们现在一个很重要的战略，叫做扩大内需。

扩大内需最初提出来，是为了应对通货紧缩、供大于求的失衡的。1999年时，中央就明确提出，扩大内需要成为一项战略方针。2001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扩大内需要成为一项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这个判断很重要。为什么要长期坚持？因为就业岗位的增加最终依赖于市场需求的扩大。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国的劳动力有7.8亿人。这还是现在的数字。我们的全面小康实现之日，那时全国将有16亿人口，劳动力将达到9.4亿人。到哪里去找能容纳9.4亿劳动力就业的市场呢？只能在我们国民经济的内部创造。以后我们还会有一讲“全面小康”的专题专门讲这个问题。让我们的老百姓过好日子就是创造市场，创造市场就是创造就业岗位。

从“十五”计划的过程看，我们的就业岗位增长有两个重要的支持因素。一个是产业结构调整，另一个是城市化的加速。城市化不仅为最能容纳就业的社会服务业提供基础，而且建设城市的过程本身就可以直接提供大量就业岗位。这两个问题我们也还有“结构”和“区域经济”两个专题来探讨。

最终要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我们需要在长期发展战略中确立“就业优先”的原则。这个问题在“十五”计划的酝酿过程就已经提出来了。但迄今，在很多涉及全局的战略问题上，这个原则体现得仍不够坚决，仍有必要大声疾呼。

什么叫“就业优先”呢？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说。

从理论层次上看，工业化阶段的经济发展历来有两条基本思路。一条是物的扩大再生产优先，另一条是解决人的问题优先。

物的扩大再生产优先也不能说没道理。为什么呢？因为解决人的问题，例如就业问题、收入提高问题、生活质量改善问题等根本地依靠于生产发展，依赖于经济总量扩大，依赖于效益提高。因此，一般战略中总是扩大再生产优先，人的问题服从于物的扩张。例如国际上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都始终是把资本积累、资源获取、技术变革、管理改进、结构优化、产品升级等等问题放在首位。我国的工业化战略，从历史过程看，也基本延续的是这样一条思路。不仅原有体制下“先生产，后生活”的口号明显地反映了这一特征，改革开放以来深圳等“特区型经济”发展也是以物的聚集为核心的，例如特区优惠政策始终围绕着吸引资金展开。

但是，在我国的中长期战略发展过程中，我们更需要正视的是特殊性。

什么是我国的特殊性呢？我国的特殊性在于，一是老百姓个人资产的积累程度还很低，生活来源对就业的依赖程度还相当大；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高潮才刚刚开始；三是经济体制改革正在处于社会利益结构剧烈调整阶段，在缓解各种社会矛盾的问题上，就业处于核心的位置。所

以说，在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战略中贯彻“就业优先”是一个必然选择。

从实践看，目前“就业优先”的原则应当重点体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劳动力市场发育要优先于其他要素的市场发育。特别强调，我国的发展战略应当是逐步建立起符合工业化、城市化方向的非歧视性劳动力市场，消除城乡、工农利益矛盾趋于激化的潜在威胁。劳动力的市场参与规则不但要协调竞争秩序，而且要协调不同群体之间对有限岗位的竞争矛盾。

第二，劳动者利益要适度优先于资本利益。规模经济、减人增效等都是提高资本收益的措施。促进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政策都是有利于就业和劳动者利益的政策。国企改革、结构转换、企业规模结构调整以及技术手段改进等方面政策需要与就业岗位的增加密切结合起来。

第三，降低失业率的政策要优先于其他总量平衡的政策。在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中，对增长速度、信贷规模、货币发行、财政与外汇平衡等方面的控制应当适度服从于降低失业率的要求。

第四，有利于促进就业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政策成本要优先于其他财政支出给予安排。城镇扶困、完善社会基本保障制度、国有企业职工体制身份转换、社会培训成本、下岗职工再就业工资补贴以及向衰退区域导入新产业等方面的政策成本应当在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中给以优先保证。对就业矛盾格外突出的局部区域还应采取特殊对策。

第五，就业岗位增加要优先于社会收入水平提高。按照一般规律，收入水平增加总是建立在生产率提高基础之上的，而生产率提高总是会形成对就业岗位的排斥。在我国未来一段时期内的战略措施中，有必要特别注意控制社会收入水平的提高速度，尽量减低由此形成的对就业岗位的排斥。

【提问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在就业方面应当做什么呢？

答：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们前面说过，政府在什么时候都应当强调增加就业岗位。“减员”是出资人、老板维护自己利益的行为，政府什么时候都不应当鼓励“减员”。但是我们也得澄清一个认识，那就是，我们不能指望由政府“创造”出足够的就业岗位来，特别是不能指望依靠政府投资来解决就业岗位的不足。

政府应当做什么呢？例如调整产业结构，让能够更多容纳就业的社会服务业更快发展；帮助中小企业提高竞争力，使他们成为提供就业岗位的主力军；为老工业基地等特定区域提供导入新产业的政策援助；在经济发展趋缓时鼓励扩大投资，增加就业机会等。但大家不要误解的是，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就业政策，而是结构政策、区域政策、宏观调控政策的内容。这些政策在

客观上有利于就业岗位增加。政府也应当在这些政策上有意识地突出对就业的作用，就是我们上面讲到的“就业优先”。但我们不要把这些政策误认为是就业政策。

什么是真正的就业政策呢？或者说，在就业问题上政府政策可以直接作的是什么呢？是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促进就业岗位供求信息的充分传达。尽快建立起社会化、高效率的就业信息网络应当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就业援助政策之一。

第二，防止供求不平衡导致交易价格被压低到供给成本之下。政策干预价格的目的是维护公平。干预的方式是实施最低工资制度。

第三，保证有限的就业机会优先分配给最优秀、最有效率的群体。当不能保证全社会劳动力的就业需求都得到满足时，就业机会分配的基本原则就应当向最有效率的劳动者群体倾斜。

第四，通过援助的方式帮助特定群体退出对就业岗位的竞争。一部分劳动力退出对就业岗位的竞争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在一定程度上需要政策承担。

第五，适度设立进入壁垒，迟滞某些群体进入劳动力供给行列的速度。发展就业前的职业教育、实行严格的岗位资格证书制度等是加高壁垒最有效的方式。

此外，就业政策还包括提高劳动力的市场竞争效率等方面。

【提问三】：现在很多地方出现一个新的问题是，有就业岗位，但是拿不到工资。欠发工资的问题应当怎么解决呢？

答：欠发工资的问题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2002 年 3 月，朱镕基总理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 10 处提到了工资问题。在这 10 处中，有 8 处是和欠发工资有关。国务院总理向全国人大述职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居然要反复提到欠发工资问题，而且具体到欠发职工工资、欠发干部工资、欠发干警工资、欠发教师工资；具体到要采取财政措施，要各地政府先发工资后上项目。这说明什么？说明当前欠发工资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

根据我们的研究，欠发工资的现象主要集中于三类情况。一是由于经营不景气，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的国有企业。最近两年，由于国企职工与企业有偿解除劳动关系的相关政策尚待完善，国企欠发工资的规模呈现出不断累积的态势。二是县、乡两级的财政供养人员。由于区域间发展不平衡，一些贫困落后地区的县乡财政实际上无法支撑现有的公职人员、教师的工资性

开支。三是一些三资企业、私企、私人包工队等也成为了欠发工资的“重灾区”。制度环境的松懈给了一些私人老板以盘剥劳动者的可乘之机。

最近两年的春节，从媒体报道中就可以明显感到，各地关于农民工返乡前领不到工资的事件骤然增多。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拿不到“血汗钱”的打工者爬到高楼、高压线塔上以死相拼的事件。显然，当前欠发工资极大地放大了失业问题对社会安定造成的威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利益的基本表现形式是就业和工资。一个值得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是，劳动者利益在社会利益构成中的地位正在趋于弱化。一些地方政府说，欠发工资是因为财政没钱。当时朱总理曾经明确批评说，“有的地方连工资都不能按时发放，还在乱上建设项目，违反规定兴建楼堂馆所”。

有必要对“政府没钱”的问题多说几句。

政府是没钱吗？1999 年，我国的税收总额突破 1 万亿元，2001 年突破 1.5 万亿元；2003 年的预期可达 2 万亿元以上。这个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这几年国民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国家税收总额每年的增长都在 20%以上。

我们不能说财政增收就一定有钱发工资，因为欠发工资的还有企业。我们只说一个制度建设方面的尖锐对比。我国税收的快速增长是在基本没有增税的情况下实现的。没有增税为什么会有税收的快速增长？一个基本解释是，税收总额的增长主要来源于堵塞了原有的税收漏洞、严肃税收征管的制度环境所致。

依法治税、从严治税、严肃税收征管的制度环境很应该，没有人反对，但与欠发工资成为普遍现象的问题对照起来看，则不能不令人得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重要结论。为什么维护政府利益的税收制度越来越严格，而维护劳动者利益的工资制度则明显松弛以致懈怠呢？是不是存在着在制度建设上重视政府利益而忽视劳动者利益的现象呢？

制度建设的发展不平衡值得引起高度警惕。普遍性的欠发工资现象正在成为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明显隐患。扩大内需，说到底要依靠扩大最终消费需求。对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来说，工资收入是其消费需求的基本来源。欠发工资现象已经极大地抵消了我们在过去几年中的政策努力，恶化了社会经济预期，形成了对扩大内需战略的直接阻滞。

一段时期来，欠发工资之所以成为了普遍现象，除了国企不景气、一些地方财政困难等原有因素外，还存在着一些深层次原因。一是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利益关系未理顺，一些地方把工资发放当成向中央讨价还价的“筹码”。二是我们前期政策不适当地强调要企业“减债增资”，一些企业就从欠发工资

中找出路，把欠银行的显性债务转化为欠职工的隐性债务，把拖欠工资当成了降低财务风险、节省财务费用以及实现“减债”的途径。三是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一些企业不适当地把经营性风险转嫁给了劳动者。一些企业，包括一些国有企业，借口“形成利益共同体”，以“风险工资”等形式把市场的经营性风险也强加给了劳动者。由此而来，市场出现“价格战”、应收款出现呆坏账、产品出现滞销等都成为了一些企业欠发、扣发职工工资的理由。四是强化税收征管的过程中一些地方出现了先缴税后发工资，以及以工资抵税等不良趋势。

在一定意义上说，欠发工资是劳动要素与资本要素之间的交易规则失范。因而欠发工资也是市场经济秩序混乱的一种表现。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有必要通过完善法律制度，严格执法来保护劳动者利益。

欠发工资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企业没钱、财政没钱，而在于欠发工资远未上升到违法的高度。欠税违法而欠工资不违法，或者不那么明显地违法；欠银行钱有可能被法律力量强制偿还而欠职工工资则不会受到法律惩罚。这是欠发工资现象愈演愈烈的根本制度漏洞所在。形成工资按时发放的法律制度，其根本意义在于在社会利益构成中确立劳动者利益优先的社会共同行为规范。

【提问四】：现在人们都很重视服务业对就业的贡献。但前不久有个报道说，中国实际上最缺乏的是高级技工。在这方面有就业的开发潜力吗？

答：你提出的实际上是个“蓝领就业”的问题。探索扩大就业、缓解就业矛盾的途径，确实不应忽略蓝领就业的问题。

一段时期以来，在就业问题上存在着一个普遍性的认识误区。很多人认为，随着新经济的发展，以“白领”为代表的人力资源才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传统工业领域的“蓝领”将趋于消亡。这个认识并不正确。

无需否认，在过去几年中“下岗”现象主要是由“工厂”排出冗员为主引起的，但这是否意味着，蓝领就业岗位在中国已经不需要了呢？恐怕未必。我们举两个例子来说。一是，在国有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的同时，非国有制造业所提供的就业岗位从 1995 年的 6477 万人增长到了 2002 年的 7313 万人，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 13%。二是，我国的载客汽车从 1995 年的 418 万辆增长到了 2002 年的 1202 万辆，差不多增长了 2 倍。这个数字不含私人轿车。也就是说，在这 5 年中，仅载客汽车的增长就至少提供了 800 万到 1000 万个汽车驾驶员的就业岗位，还不算由此引起的汽车维修等领域就业岗位的增加。

工业化是一个艰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其间，“造机器”和“用机器”将始终是社会经济系统中最重要的分工领域。从本质上说，“蓝领”是工业化进程中实现“人机对话”不可或缺的媒介。要让13亿人认识机器文明、驾驭机器文明、享受机器文明，中国的“蓝领”绝对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显示，大约10年后中国的汽车保有量将达到1亿辆。按照每20辆车需要1个专职维修人员的国际经验，届时我们至少需要500万个合格的汽车修理技师。在美国，汽车维修技师是要有专门的资格证书的，他们的收入通常远高于一般的办公室“白领”文员。

我们前面说到过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中心的问题。但我们得看到，目前尽管我国的制造业产品出口和外资流入呈现出较好势头，但其基础主要是劳动力的成本低廉而不是劳动力的群体素质。这个基础是不稳固的。要把这样一个势头保持下去，要让中国真正成为世界制造中心，我们还必须加快蓝领队伍的培育和发展。

“中国制造”的长期国际竞争力将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一支高素质的蓝领队伍。企业的技术研发能力固然重要，但技术产品是具有很强的“可贸性”的。韩国以及我国的台湾省之所以成为全球最重要的IT产品采购基地，关键在于其蓝领队伍的强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全球有限就业岗位的国际化竞争将主要是一场蓝领竞争。

【提问五】：现在要求有资格证书的就业岗位越来越多。这对那些农村剩余劳动力来说是不是一种就业壁垒呢？政府应当怎样帮助他们呢？

答：就业岗位的资格认证制度在我国叫“劳动预备制度”，我国是从1999年开始在全国普遍推行的。从国民经济整体说，建立劳动预备制度是为了优化劳动力配置，使有限的劳动岗位优先配置到那些效率最高的劳动者头上。从劳动者利益的角度说，建立劳动预备制度是为了提高劳动者对有限就业岗位的竞争力。不是政府提高了就业的准人“门槛”，首先是就业岗位长期供不应求的客观趋势提高了这个“门槛”。

建立劳动预备制度很有必要。但一个新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来保护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利益，怎么使这项制度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战略接轨。目前，不论从培训费用的负担方式还是培训的时间长度看，这项制度很可能形成为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歧视性政策。我们有必要在这项制度建设中更多地补充对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援助性政策。例如，应当让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有进人城镇的第一步台阶，而不能简单地要求所有岗位一律“持证上岗”。政府还应当采取措施，为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提供接受培训的低息

或无息贷款。农村进城务工人员自愿接受较高成本的复杂岗位培训时，政府应当有明确的鼓励性措施等。

从我国目前已经建立和正在完善的各项劳动用工制度看，可以考虑逐步将目前的城镇最低工资制度适度扩展为岗位最低工资制度，将劳动预备制度与岗位最低工资制度结合起来。一方面，把必须持证上岗的“门槛”与持证的基本收益结合起来，政策才能真正成为完善的政策。另一方面，由此可以激发劳动者自觉自愿接受岗位培训、获取资格证书的积极性，并为他们提供向雇主争取相应权益的政策依据。

建立和完善劳动预备制度应当特别强调因地制宜。城乡之间应当有差别，大城市与小城镇之间应有差别，不同产业、不同岗位之间应当有差别。在劳动预备制度的法律体系完善过程中，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宜以地方法规为主，赋予地方立法机构根据区域内经济发展情况以更多立法权限。

【提问六】：您刚才提到，日本版的“中国威胁论”是“产业空心化”，在这个竞争中中国究竟抢没抢日本人的饭碗呢？

答：在日本，这种“中国抢饭碗说”不仅在民间、舆论中流行，连严肃的学者也深信不疑。在2003年初召开的一次国际研讨会上，“日本劳动研究机构”的专家就明确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严肃的学者应当用事实说话，用理性的分析说话，不能以表面现象故意耸人听闻。

我们说，日本的确存在着“产业空心化”的现象，日本目前的确面临比较严重的就业问题。但需要辨析的问题是，日本的失业率高涨是否是中国人，或者说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的？这个诘难毫无根据。

先说，中国的就业是否真的受惠于了日本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在1995年到2002年期间，中国制造业中的就业总人数从9803万人下降为8308万人，减少1495万人，降幅为15.25%；其中同期国有制造业的就业总人数从3326万人下降为995万人，减少2133万人，降幅为70%。面1995年到2002年，中国城镇就业人员总数从19093万人增长到了24780万人，增长5687万人，增幅为30%。显而易见，中国过去几年就业岗位的增长完全没有受惠于制造业。

即或按照日本专家的资料，目前在华“日系”企业雇员不过58万人。这个数字只占中国过去7年城镇新增就业岗位的1.02%，占目前中国城镇就业总人数的0.23%。“日系”企业所提供的就业岗位不过相当于中国这些年中的出租车司机就业岗位增加数的几十分之一。

再说，在华日资企业生产的产品打算卖到哪里去。

世人皆知，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潜力最大的市场。日本人对此是心知肚明的。近年来，日本汽车企业大幅调整了对华投资的战略。大家可能注意到了，一段时期来中国汽车产业中发生的并购、扩张事件大多和日资企业扩大在华投资有关。从本田与“广汽”的合作，到以丰田参与为背景的“一汽”收购“天汽”，到北京宣布要在2004年拥有15万辆“威驰”轿车生产能力。日本的汽车制造业打算把在中国生产的汽车卖到哪儿去？无需遮掩，是瞄准中国本土的汽车市场而来，绝没打算销往日本。“威驰”的广告就坦率得多，说这是专为中国人设计的车。就是说，即或日本企业在华投资为中国带来了一定的就业岗位，那这个就业岗位的增加也是以中国市场的急剧扩张为依托的，是中国自身的需求增量带来的。根本不存在中国制造业“抢谁的饭碗”的问题。

当然，还有一个日本专家不好意思说的问题，那就是对第三国市场的竞争。这个问题其实真的不需多说。中国已经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在第三国市场上，我们共同公平地按“游戏规则”参与就是。WTO从没规定哪一国的市场只能是谁的“饭碗”。

最近日本财务省发表的“日中经贸关系研究报告”有个比较理性的说法。这个报告认为，日本制造业向海外转移是产业结构调整所致；日企投资中国实际上促进了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对日本经济产生的影响有限。我们欢迎这种理性认识。

第4讲

中国结构战略

ZHONGGUOJIEGOUZHANLUE

这一讲还是和中国具体发展实践非常贴近的内容。我们讲讲结构的问题。

“十五”计划提出，我们的战略发展要“以结构调整为主线”，还说要“实现全面优化的结构”；另外还提出，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这也是结构问题。我们数了数，在“十五”计划中，“结构”这个词出现了将近100次。为什么这么频繁地讲到结构？“十五”计划有个基本判断：因为“我国已经进入必须通过结构调整才能促进经济发展的阶段”。

什么是结构？一种物质由哪些部分组成，这些组成部分之间是个什么样的比例关系以及按照什么样的方式相互结合，就叫结构。物理学家早就发现，金刚石和石墨的组成成分是一样的，仅仅是成分的比例关系不同，这两种物质的硬度就截然不同。磁铁掉在地上很容易摔碎，没有磁性的熟铁则不容易摔碎。为什么？因为同样成分的排列方式不一样。中国人早就知道，“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这个道理让经济学家一说就高深了，这叫做“合理的要素组合可以提高生产率”，叫做“结构效益”。

和经济有关的结构问题非常多。城乡结构、区域结构、能源结构等都是结构问题。最近几年人们注意到，企业内部的产权关系对企业行为、企业利益取向影响很大，由此就提出了一个“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问题。但我们这一讲所说的结构，主要指产业结构，不涉及那么宽。

1. 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 我们面临一个总结与思考，比较与选择的时代。

☆ 在国际分工中占据什么样的领域，关系到一个国家在分工中获取利益的多和少，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发扬风格”。

☆ 不断优化结构，才能实现人类经济系统与自然界之间关系的协调。

☆ 实践证明，越是实行了计划经济，我们反而越是未能解决好结构问题。

☆ 随着产业链的延长，同样的资源投入可以获取更大的国民生产总值、国民福利和国际比较利益。

☆ 很多发达国家的省能结构、清洁型结构是建立在损人利己的基础上的，是靠把污染产业转移到别的国家来实现的。

【4-1-1】结构理论认为，过剩危机、萧条等都是结构性比例关系失调的结果；认为国民经济的规模扩张不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经济规模扩大，社会享受的福利资源不一定会增多；还认为，不断优化结构，人类才能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协调，才能实现人类经济系统与自然界之间关系的协调。

我们面临一个总结与思考，比较与选择的时代。从80年代初以来，人们普遍思索着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为什么一些先发达的国家会抑制不住衰落的趋势而一些后起国家却能跻身经济列强？为什么一些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却总是在发展过程中出现大起大落？为什么一些拥有丰富资源的国家未能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平衡发展而一些资源贫乏的国家却捷足先登？为什么同是振兴民族经济的努力，有些成为了经济发展的后起之秀，有些却陷入了严重的债务危机或尖锐的城乡对立、贫富分化？

多种多样的原因，形形色色的答案。但有一点为人们所共同注意到，这

就是工业化过程中产业结构形态的重大影响。任何成功都具有开放、优化选择、适时转换的结构特征；任何失败都同与此相反的状态相对应。

人们从常识可知，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总是会受到资源禀赋的限制，不可能想生产什么就有什么资源。显然，资源的构成和一个国家的产业构成密切相关。例如，大家熟知的石油输出国有极为丰饶的石油资源，这种资源禀赋就使得它们的石油采掘业和石油化工产业发展得快。

发挥本国的资源优势，可以使国民经济在世界分工中获得更多的好处。地下的石油资源使这些地表资源贫乏的国家一跃成为了人均按收入排名很靠前的国家。亚洲有个小国叫文莱。据说那里的富豪不睡席梦思床，也不睡水床，而是睡黄金床。因为那里富产石油。现在人们所熟知的国际投机资本，也就是所谓“热钱”，最初的来源并不是索罗斯领导下的“基金”，而是由石油输出国在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中赚取的“石油美元”。

自然禀赋非常重要，但单纯依靠自然禀赋形成的产业结构并不能保证社会走向发达。有些石油输出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很高，国民财富的数量也非常巨大。但这些国家并没有因获得大量财富而发展起足够强大的工业体系。我们看到，海湾各国中真正实现了工业化的并不多。大家别以为伊拉克是个穷国。在两伊战争以前，伊拉克的人均国民收入曾达到4000美金。很多巴格达居民家里都雇着保姆。伊拉克老一代人的受教育程度是很高的。为什么美国老怀疑它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呢？就是因为伊拉克老一代人中物理学家、化学家非常多。

而另一方面，日本并没有什么资源，但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的经济发展仍然非常迅速，成为了世界一流的工业大国。日本靠什么呢？一个重要原因是结构战略的成功。资源很大程度上影响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状态，但并不能根本决定一个国家的产业是先进还是落后。

不论国土面积大小、人口多少，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做到什么都自给自足，总会与国际社会发生一定的分工和交换。分工的好处就是使相同的资源投入获得更多的产出，更多的社会福利。国际分工也是一样。国际间的分工也是一个国家产业结构的重要影响因素。有的国家专门发展高科技产业，有的专门发展机械制造业，有的专门发展流通业、转口贸易等。由此，国际分工就影响了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

在一个经济系统中，产业结构的概念就是分工的概念。但在国际分工中可不是干什么都一样。人们注意到，在国际分工中占据什么样的领域，关系到一个国家在分工中获取利益的多和少，在竞争中处于上风头还是下风头，是受人控制还是左右世界经济格局。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发扬风格”。实际上，对结

构问题的研究始终是和经济赶超、和参与国际竞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对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专门研究逐步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理论，叫做结构理论。在经济领域，结构理论研究的实际上是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实现这些资源的最优化分配和组合。就产业领域说，结构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分工，包括是国民经济中的分工形式和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如何参与国际分工。

结构理论不重视总量关系，认为总供给和总平衡不是最重要的，过剩危机、萧条等都是结构性比例关系失调的结果；认为国民经济的规模扩张也不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经济规模扩大，社会享受的福利资源不一定会增多；还认为，不断优化结构，人类才能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协调，才能实现人类经济系统与自然界之间关系的协调。

迄今结构研究形成的这些认识都是很有意义的，对我们观察、思考我国国民经济的战略发展具有很重要的启示。

【4－1－2】计划经济造成的恶果不仅是短缺和比例失调，还有一个经济发展失去方向的大问题。80年代初期理论界讨论“生产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生产本身还是为了人民过好日子。现在看来连小孩子都懂的问题，那时要全国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们一本正经地去讨论才能弄明白。为什么呢？因为在传统理论中，为了发展生产而发展生产，为了发展生产而按比例，研究了半天，把人自己这个主体都给研究没了。

在前面的专题中，我们多次提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比较。结构问题本来是个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配置与分工优化问题，不涉及意识形态和社会经济制度。但这个“姓社”、“姓资”的问题还真的对迄今的结构研究发生过不小的影响。

在一定意义上，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其实可以说是最早研究结构问题的理论。计划经济这个概念，说全了叫做“有计划、按比例”的经济。“按比例”指的就是产业间、部门间的数量平衡关系，就是个结构概念。有计划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按比例。按比例要求有计划，有计划要求公有制，公有制要求按劳分配。这就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几个主要组成部分之间的逻辑关系。

人们可能会觉得奇怪，敢情原有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出发点不是公平，不是消灭剥削，也不是大公无私，而是“按比例”。这不是随便说的，是确凿的事实。如若不信，你可以找任何一个有学问的大学经济学教授去证实一下。

那么传统理论为什么要强调“按比例”呢？因为这个理论认为，生产过

程就是消费，消费过程就是生产，供和求总是同时产生的，怎么会有过剩或者短缺的失衡呢？本来不应当有。市场经济下的供大于求、供不应求的周期性往复不是总量的问题，而是产业之间的结构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就是按比例，哪个产业、哪个部门也不要过分大或者过分小，大家实现一种数量关系的协调，社会经济就可以顺畅发展了。那怎么才能实现这种“按比例”呢？自发的竞争不行。自发竞争一定导致产业、部门之间供大于求、供不应求的不断周期往复。解决的办法是事先有计划。这就是计划经济最初的理论依据。

我国的计划经济实践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理论假定基础上的。原来国家计委每年制定计划时有个第一位的原则，叫做“综合平衡”。什么叫“综合平衡”呢？就是根据国家所掌握的资源量来制定统一计划，决定机械，钢铁、纺织、化工、石油等领域中各自配置多少资源。总量上别突破实际能力，还得让这些产业之间的数量关系实现协调。这就叫“综合平衡”。

这些设想不是挺好吗？设想是不错。但不幸的是，我们原有的计划经济实践证明，越是实行了计划经济，我们反而越是未能解决好结构问题。我们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最大的失误、最明显的教训恰好是各个产业领域之间的比例失衡和结构性的危机反复出现。我们几次国民经济大调整，都是对结构关系的调整。

前面讲过，50年代末我们发动了“全民大炼钢铁”的运动，把重工业化简单化为钢铁先行。结果是钢铁工业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带动国民经济其他部门万马奔腾，钢铁工业自身实际上也没有多大发展，反而给国民经济带来了极大的危机。在“文革”的政治动乱中，我们依靠计划的结构战略表现出了一种更为畸形的特征。当时提出了许多现在看来非常可笑的目标。比如要求各地都要建成“完整的工业省”，要扭转南粮北调、扭转北煤南运等等。很多区域性的生产系统不仅不能扬长避短，反而扬短避长。没有煤炭资源的地方也要努力找煤、挖煤，没有钢铁生产条件的地方要出钢。区域性的产业结构进一步畸形化。“文革”结束时，当时的领导人头脑发热，又提出要“搞十来个大庆，十来个鞍钢”，由此导致了国民经济的第二次比例关系重大失调，几乎把国民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到80年初期，我们不得不将重工业实行全面后退，又用了两年半到三年的时间来调整，才使国民经济恢复到相对良性的状态。

产业之间关系没搞好，那么总量关系如何呢？大家熟知，在计划经济下，我们长期面临的是严重短缺。当时居然还有所谓的经济学家写文章论证说，短缺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因为短缺说明需求增长总是超过供给的增

长。真是热昏了头的胡说。这个说法也够“非典型”的。要是放在现在，恐怕就得给这个学者量量体温，看他是不是得了“SARS”。

其实，计划经济造成的恶果还不仅是短缺和比例失调，还有一个经济发展失去方向的大问题。我们在改革前的好几十年中，挖出煤来炼钢，炼出钢来造机器，造出机器来再挖煤。形成了一个生产系统自我循环的格局。大家想一想，这种格局下即或没有比例失调，即或总量扩张很迅速，对社会有什么好处呢？我们这个“有计划、按比例”的体制，连这样一个简单问题都没想过。80年代初期理论界有个“拨乱反正”的思想解放运动。那时经济学界有场大讨论。讨论什么呢？讨论“生产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生产本身还是为了人民过好日子。现在看来连小孩子都懂的问题，那时要全国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们一本正经地去讨论才能弄明白。为什么呢？因为在传统理论中，为了发展生产而发展生产，为了发展生产而按比例，研究了半天，把人自己这个主体都给研究没了。

我们这个教训并非无足轻重。在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中，人们关注的主要是数量比例关系。用系统论的眼光看，我们追求的是一个没有目的性的系统。在“回顾与总结”一讲中，我们提到过一个重要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叫做“投入产出法”。投入产出法就是一种定量化地研究产业之间，各分工领域之间资源优化配置的方法。它的发明者是前苏联的一位经济学家，后来到了美国定居。

投入产出理论的贡献是很大的。它用矩阵方式、数量模型方式来求解资源在全社会合理配置的问题、求解国民经济中各产业之间的供求关系和数量比例关系问题，寻求最优解。但投入产出法的基础是计划经济的“按比例”，它把“有计划、按比例”思想的缺陷也同样继承了下来。这个理论的最大缺陷就是，无法说明这样一个最优化的经济系统为了什么而运转。极而言之，如果我们按照投入产出法求出的一组解来配置资源，那我们有可能造就这样一个经济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每一个局部环节的供求关系都是非常均衡的，但社会从这个系统的运行中几乎得不到任何好处。

【4-1-3】了解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有两个方面认识不可缺少。一个是产业结构演变规律，另一个是产业政策。前一个是对客观趋势的总结，后一个是在认识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对经济发展过程的主动干预。要把握中国的结构战略，首先需要知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是怎样的；其次还要知道，对这样一个客观演进过程，人能在哪些方面发挥主观能动性。

在很长时期内，美国人不承认结构研究的必要性，在美国人眼里，研究结构的理论都是和计划经济相联系的理论。美国人认为，市场经济用不着研究结构。市场经济的问题只是周期性的通货膨胀，通货紧缩的问题，只是投资过热或投资过冷的循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经济学研究总量平衡问题就够了。至于一定量资源究竟投在哪个产业更合适，这个问题交给自发的市场机制就行了，人们根本用不着去操那么多心，政府更不必去干预。

在结构理论和实践上做得最出色的是日本。

二战结束后，有个美国派驻日本的占领军司令，叫马歇尔。他曾经帮日本制定过一个复兴计划。这个计划就叫“马歇尔计划”。这个复兴计划的核心就是要日本从政治制度到经济制度全盘接受美国的一套。在政治上实施美国所谓的民主制度，解散财阀，削弱天皇的权力，建立一个民选的政府。经济上它希望日本学习美国的自由竞争制度。企业生产什么由市场决定，政府不要干预资源配置。究竟日本适合发展纺织还是化工？政府不要管，让市场自发地选择。

马歇尔复兴计划对日本的唯一帮助就是把美元对日元的汇率一下子贬到了1:360，使日本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获取了很大的竞争优势。这个汇率曾经维持了21年的时间，日本的很多产业能够发展到今天的地位，受惠于这个低值汇率很大。

但日本在产业结构的选择上并没有接受马歇尔的意见。日本学者认为，如果按照马歇尔计划，日本原来有什么传统就去发展什么产业，那日本永远也别想赶上和超过美国。比如，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纺织业在世界上曾有过一定的位置。如果日本当初接受马歇尔的意见，主要发展纺织业，那根本就不会有后来的日本钢铁产业、汽车产业。恰好是因为没听美国人的话，才有了今天的日本。

日本人明智地认识到，日本是一个国土狭小、资源匮乏的国家，要把日本建成一个经济强国，必须走一条贸易立国之路，也就是大力发展出口产业。实际上，日本这个“贸易立国”的说法并不准确。日本真正实施的是出口产业立国。因为日本并非是把功夫下在流通领域上，而是下在了出口产业的选择和培育上的。战略的重心是在生产领域，而不是在贸易领域。简单说，日本人的成功不在于卖得好，而在于生产得好；在于培育出了最有国际竞争力的出口产业。在一定意义上说，日本经济赶超的成功就是结构战略的成功。

了解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有两个方面的认识不可缺少。一个是产业结构演变规律，另一个是产业政策。前一个是对客观趋势的总结，后一个是在认识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对经济发展过程的主动干预。战略总是一种主

观认识的结果。要把握中国的结构战略，首先需要知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是怎样的；其次还要知道，对这样一个客观演进过程，人能在哪些方面发挥主观能动性。

从对世界各国历史经验的理性总结中，人们逐步认识到，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的演进、升级是有规律的。一般说，大致可分为重、化学工业化阶段，高加工度化阶段，高开放度化阶段，资源节约化阶段以及技术密集化阶段等。这些阶段的叫法听起来好像有些别扭，好像是日本话。这些概括的确是从日文照搬过来的。因为这些叫法最初是日本人归纳出来的，后人也就接受了日文中的这种说法。中文中很多词汇都是从日文中直接借用过来的。过去有物理、通勤等词儿，比较新的还有“料理”、“营业中”等说法。我看上海的大小餐馆都比较喜欢在门上贴这样的词儿，这也算是一种时髦吧。我们不妨继续沿用就是。

我们前面说过，人类在工业文明阶段所获得的一个重要认识就是，所有人都投入到直接谋取吃、穿、用的消费资料生产中，社会仍不能保证所有成员都吃饱穿暖；一部分人不直接去谋取消费资料，而是去造工具，造机器，满足全社会吃、穿、用的消费资料反而会增多。我们还说到，用机器取代手工劳动的过程就是工业化。

在工业化起步阶段，由于大机器生产的客观要求，人们需要把资源向获取能源、原材料的产业集中。首先是能、矿产业要有较大发展。没有大规模取自自然界的资源，工业化是无法进行的。到今天我们还在修建三峡大坝，为什么？我们首先需要从自然界大规模地获取资源。有了资源还得有能够造机器的原材料，于是就有了钢铁、有色等冶金业的发展。我们前面提到法国在100多年前建的埃菲尔铁塔。在以石头建筑为主要特点的巴黎，那个钢铁建筑物就是在炫耀当时冶金业的发展成就。有了金属材料还不够，还需要有化工原料，还需要利用化学工艺。于是就有了化工产业的发展。

在工业化过程中一定不可缺少的一个阶段就是重、化学工业的发展。在这个阶段上，全社会的资源迅速向工业再生产链上游的产业集中，这些产业的扩张速度当然就远快于其他产业。国民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些重工业、化学工业的发展。人们把这个阶段叫做“重、化学工业化阶段”。

在重、化学工业有了一定发展之后，社会资源的配置重心会逐步地向再生产链的下游移动。就是像我们现在经常说的，提高产品的加工层次和附加价值。由此，机械制造、用于最终消费的各种工业品生产会出现一个较快的增长期。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同样的资源被多次、反复加工，形成为更为值钱的产品。与此相应地，经济增长对资源的依赖程度会趋于降低。为什么对

资源的依赖程度会降低呢？因为随着产业链的延长，同样的资源投入可以获取更大的国民生产总值、国民福利和国际比较利益。炼钢、炼铝这样的原料产业对自然资源投入的依赖程度很大。如果把钢材造成精密仪器，那么同样资源获取的经济效益就可以多得多。这个阶段叫做高加工度化阶段。汽车是这个阶段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产品。因为汽车综合代表了国民经济中加工、制造产业的发展水平。

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产业链条的不断延伸带来两个结果。

一个结果是国民经济与外部市场的交换不断扩大，也就是我们说的“和世界经济接轨”。这个“接轨”不仅表现为更多的互通互访，更重要的是表现为稳定分工。为什么要“高加工度化”呢？因为多生产高加工层次的产品，可以在同样人财物投入的情况下，通过国际交换获取更大的国际比较利益。由此就有了高开放度化。

另一方面的结果是国民经济发展日益摆脱对资源的依赖。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延伸加工层次的一个重要好处就是GDP的增长不再依赖于资源投入的增长。这就是资源节约化阶段。大家知道，瑞士曾经以造手表名扬天下。一吨金属材料能造多少手表呀？这个国家的产业结构中显然对资源的依赖程度较低。实际上在发达国家，资源节约化的结构变动趋势并非仅仅是加工层次不断延伸的自然结果。人们注意到，工业化过程中的污染程度、对环境的破坏程度和产业结构的状态是密切相关的。发达国家早就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叫做“清洁结构”。就是要通过主动调整产业构成，实现对环境、对资源的保护。

在工业化后期，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持力量，社会资源开始迅速向技术密集型的产业集中，由此就导致了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趋势。

当然，上述归纳并非是唯一的。

有学者提出，工业化初、中期是生产带动消费，有什么样的生产发展就有什么样的产业结构；后期是消费主导生产，有什么样的消费结构就有什么样的产业结构。因此应当明确提出一个消费主导型的产业结构演变阶段。要没有这样一个阶段，我们就无法说明在工业化后期为什么社会服务业会发展那么快；为什么旅游、餐饮、商业、金融、保险等业会成为就业构成中占主导地位的产业。人们形象地说，是“一周五天工作日”的实行带来了上述产业结构的变化。

还有学者提出，上述归纳都仅仅是对工业化阶段的归纳，实际上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已经走到了“后工业化阶段”，或者叫现代化阶段、信息化阶

段、新经济阶段等等。因为在这个阶段，国民经济的发展、扩张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信息资源的开拓、投入，依赖于技术要素的聚集，依赖于人工合成的材料发展等。

最近又有学者提出，在现代经济中，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变化已经说明不了规律了，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的是全球重新分工，产业结构的演进应当有一个全球化阶段。发达国家在过去几年中干什么了？不就是抢占高新技术的产业领域吗？在这个趋势下，才有了一般加工制造业向后发国家的转移。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实际上主导了全世界的产业结构升级。

当然，还有学者提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还应当注重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过程中的规律研究，还应当格外注重与城市化进程密切相关的产业结构变化。

应当说，这些意见都很有道理，很有意义；都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完善了我们对产业结构变动、演进规律的认识。但我们并不应因此就否认或者轻视对一般变动规律的认识。前面对产业结构变动一般规律的概括是有充分实践依据的。

日本的国民经济曾是一个赶超型的经济，它比较明显地浓缩了产业结构变化的过程。从日本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出产业结构变动的不断升级过程。

日本在60年代成为了世界级的钢铁大国，在70年代成为了汽车大国，在80年代成为了家电大国。从60年代的钢铁大国到80年代的家电大国，日本也是很清晰地走过了一条“为全世界生产”的高开放度化之路。在上世纪的90年代，日本很想成为计算机大国，但是没成功。日本从80年代起就扶持计算机产业，日本的集成电路曾经在世界上处于领先水平。现在很时兴的笔记本电脑、液晶显示屏等最初也是日本人发明的。但是日本在产业政策上的失误使它最终在技术密集化的结构竞争中败给了美国人。

实际上，我国在改革开放20余年来的发展历程也可以明显看出产业结构变动的上述规律。

在80年代初期，中国的钢产量只有3600万吨。“九五”计划最后一年，即2000年，我国的钢产量达1.2亿吨，为世界第一大产钢国。2001年我们的钢产量是1.4亿吨。2002年，我们的钢产量达到1.8亿吨。也就是说，我们2002年一年钢产量的增量就相当于80年代初期全年的产量。现在我们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钢铁大国。

2002年我国的汽车产业明显地全面启动，产量与上年相比增长了36%。其中轿车产量增长了51%。2002年我们一共卖了310万辆汽车。给大家一个

参照系，2002年包括中国在内，全世界的汽车产量一共只增长了2%。全世界的汽车生产能力是5400万辆，增长2%的含义就是比上年多卖出100万辆车。大家很容易推算出，全世界这100万辆车的销售增量，绝大部分是在中国实现的。

从80年代初期的“六五”计划起，一直到“七五”、“八五”计划，我们一直在强调以能源、原材料为产业发展的重点。现在我们大家在讨论什么？在讨论中国能否成为世界制造中心。高加工度化的趋势已经明显显现。

在80年代初期，我们有24%的工业生产能力因为缺能、缺电而闲置。那个时候很多工厂实行“停三保四”。就是一周内只能保证四天供电，另外三天只能停工。90年代初期，我1993年从美国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北京还限制居民用电，严禁老百姓装空调。有钱也不让装。因为缺电。要用空调，得按比正常电价高出四五倍的惩罚性电价交费。到90年代后期，1998年以后，我们面临什么问题呢？面临煤炭“关井”的问题，面临电力供应过剩的问题。当时的问题是，“二滩”电站建好后电卖不出去，不知道该卖给谁，这才有了“西电东送”的工程。

90年代末国外有个对中国抱有敌意的说法，叫做“中国崩溃论”。大家可能听说过。这个“中国崩溃论”的理由何在呢？其中一个主要的理由说，怎么这几年中国自己公布的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仍然很快，而能源消耗量增长会愈来愈慢呢？这不可能。一定是中国的统计数字有假，国民经济实际上没增长那么快。中国离崩溃不远了。这个耸人听闻的说法在西方还挺有市场。我想，提出这种观点的人一定没有学过产业结构的变动规律。如果他们肯虚心一点，也许我会有兴趣告诉他，日本是怎样在70年代到80年代的发展过程中实现了能源消费增长速度不断慢于国民经济增长的，教教他们什么叫产业结构的资源节约化阶段。

我们不用刻意去批驳这种“崩溃论”的说法。不值当。稍微有点脑子的人应当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在过去十年略多一点时间中在城市中普及了家电，在过去五年中拥有了世界第一大的移动通信用户群，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中私人轿车正在大踏步地进入寻常百姓家。这样一番景象，像一个即将“崩溃”的经济景象吗？

我不想用政治眼光来评价“中国崩溃论”的说法。西方很多人，包括相当多的受过教育的人，对中国的了解是极其肤浅的。中国大学生对美国的了解和美国大学生对中国的了解相比，高出10倍恐怕都不止。曾经有个日本的政治家发表言论说中国经济如何落后，证据是陕西很多农民迄今住的还不是房子而是“山洞”。后来才有人给他启蒙说，陕西那种“山洞”叫窑洞，冬暖

夏凉，省能、建筑成本低。是一种很科学的民居形式。著名的政治家尚且无知到这种地步。

“中国崩溃论”还有一个理由，说中国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呆、坏账比重很大，按照西方的理论标准，中国的金融体系眼见就会全面崩溃。西方银行理论的确有这么个说法，这种说法也不是没有根据。大家知道去年的世界杯足球赛时，夺冠呼声那么高的阿根廷队为什么很快就被淘汰的吗？当时阿根廷国内正闹金融危机，就是银行系统的呆、坏账太多，老百姓失去了对银行的信任，都去挤兑。阿根廷政府没办法，只好冻结了所有存款。你想想，阿根廷的球员刚要上场，老婆来电话告诉他，咱们家的存款都被政府冻结了，你说球员能踢好吗？

这个理论在阿根廷确实应验了，但在中国不行。“中国崩溃论”的上述说法是2000年时提出来的。现在2003年了，中国的金融体系不仅没崩溃，老百姓还是相信银行，还是愿意把钱存进银行，中国的城乡居民储蓄还是持续高增长。现在中国学者讨论的问题是，怎么才能说服老百姓少存点多花点。

【4－1－4】很多发达国家的省能结构、清洁型结构是建立在损人利己的基础上的，是靠把污染产业转移到别的国家来实现的。日本专门从中国买一次性筷子。由此带来，日本人用的一次性筷子砍的都是中国的树。我国铁合金生产发展很快，而且产品大部分还能出口。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刻意把铁合金这种高耗能、高污染的产品生产转移给了中国。

我们说，产业结构变动是有规律的。但也不能把规律绝对化。在前面的专题中，我们曾多次提到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辩证法。在历史上，我们曾多年强调要“优先发展重工业”。而且把这个问题强调到什么程度呢？强调到“姓社”、“姓资”的程度。以前我国的经济学教科书上都写着，“先发展重工业是社会主义的工业化之路，先发展轻工业是资本主义的工业化之路”。努力想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并没有使重工业真正发展起来。但在80年代的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最早的一个结构政策是对重工业实行“后退”的调整，实行了一个“轻纺工业六优先”的政策。恰好是因为“轻纺优先”了，我们才有了后来重、化工业的大发展。

当然，国外的经验也并非都是成功的、好的经验。比如说，资源节约型结构、省能结构、清洁型结构的确是一种优化的结构形态。但很多发达国家的省能结构、清洁型结构是建立在损人利己的基础上的，是靠把污染产业转移到别的国家来实现的。

日本人吃饭都用筷子，一次性筷子最初就是日本人发明的。但日本人注意到，一次性筷子对森林资源的破坏很大，于是日本就专门从中国买一次性筷子。由此带来，日本人用的一次性筷子砍的都是中国的树。90年代初、中期，我国北方一些省区的乡镇企业中铁合金生产发展很快，而且产品大部分还能出口。是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不会生产铁合金？不是。是他们刻意把铁合金这种高耗能、高污染的产品生产转移给了中国。

也有一些趋势是，发达国家的确是想把较低层次的分工转移给中国。但在一定发展阶段上，接过这个分工对我们是有利的，我们也没必要拒绝这个分工和这个结构变化趋势。例如，服装鞋帽生产算不上什么高加工度化的产业，但现在全世界的超市里都卖中国生产的服装鞋帽。这有什么不好吗？在一个特定发展过程中，接过这个较低层次的分工是我们获取更高竞争能力的必要台阶。

2. 我国产业结构战略调整的主要方向

☆ “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基本落脚点就在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上。

☆ 老百姓想买的没生产出来，市场上卖的老百姓不想买。这是我们面临的根本性问题。

☆ 人们的认识不“饱和”，市场就永远不会“饱和”。

☆ 老百姓并非不需要更多的彩电，但是要有条件，要么足够便宜，要么足够好。

☆ 消费结构升级并非是一个均衡的过程。收入出现了分层，消费构成也就出现了分层。

☆ 我们的浦东还缺些东西，就是与这个区域经济相匹配的充分发达的社会服务系统。

☆ 中国目前刷卡消费的购物环境这么落后，全国的旅游收入至少因此减少了一半。

☆ 目前政府网站是做得最差的。很多部委就和一幅宣传画差不多，没有什么信息化的意义。

☆ 我们的产业发展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时候：面临国际市场上的全面竞争，我们需要有最精良的装备才行。

☆ 抱着“套牢”的旧技术不“割肉”的企业，在市场经济下是死定了的企业。

☆ 大企业消灭不了小企业，因为市场永远是多样化的；小企业永远是创新的最肥沃土壤，因为它们总是面临着不创新就无法生存下去的严酷环境。

【4-2-1】新型工业化道路“新”在何处？一是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二是要能够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减轻对自然资源的依赖。三是要能够充分发挥我国的人力资源优势。四是要能够满足从生产扩张推动经济增长到需求扩大拉动经济增长这样一个转变的要求。五是要提高各种资源的配置效率。其中重点是要实现顺畅的产业退出。在一定意义上说，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主题就是新型的结构战略。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始终是和结构战略密切连在一起的。今后的发展仍然要格外强调结构战略。2001年提出的“十五”计划明确地说，在一个中期发展过程中，结构调整是主线，结构性矛盾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我们就必须走一条新型工业化的道路。这个“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基本落脚点就在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上。

新型工业化道路“新”在何处？国家计委的专家曾有个解释。一是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毫无疑问，产业间的相互带动是一个结构升级的问题。因为这关系到资源主要向哪个方面集中。二是要能够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减轻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按照现有的产业构成，我国的自然资源禀赋是不可能支持国民经济再翻两番的战略目标的。三是要能够充分发挥我国的人力资源优势。也就是说，要能提供足够多的就业岗位。就业岗位的多少和产业构成密切相关。我们必须把劳动密集型产业摆到一个合理位置，利用人力资源优势获取更多国际比较利益。

依我看，这三条还不充分，还应该添加两条。一条是要能够满足从生产扩张推动经济增长到需求扩大拉动经济增长这样一个转变的要求。另一条是要提高各种资源的配置效率。其中重点是要实现顺畅的产业退出。不仅国有资产要实现有进有退的战略性调整，整个国民经济的各种资源都应当实现在各产业间的重新优化组合。

显然，在一定意义上说，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主题就是新型的结构战略。

从过去几年以及当前看，我们的国民经济面临一个现实的矛盾。这就是供大于求的失衡。我们前面讲到过，我国已经有过反复出现的物价负增长。这些年，人们已经逐渐熟悉了一个概念，叫做通货紧缩。

从1998年到现在，我们一直在和这样一种不良趋势作斗争。各种经济政策的首要指向就是扩大内需，平衡供求。增发国债、连续7次降息、恢复征收利息税、给公职人员加薪、增加法定假日和启动“假日经济”、发展消费信贷、鼓励住房与汽车消费需求等政策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也和扩大内需、平衡供求的目标密切相关。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低工资制度以及失业救济制度等不仅可以直接有助于保障低收入人群的收入，

而且可以改善社会的经济预期，有助于调整人们的消费行为。

【4－2－2】从1998年到2002年，我们的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年均增长速度是12.4%。这个时期的工资增长速度也是从1979年以来各时期中最快的。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在2003年第一季度末时已经接近10万亿。和供大于求形势出现之前的1997年相比，翻了一番还多。也就是说，有支付能力的社会购买力是存在的。问题出在结构上。老百姓想买的没生产出来，市场上卖的老百姓不想买。这是我们面临的根本性问题。

在扩大内需、应对通货紧缩的政策研究中，人们日益清楚地看到，中国面临的供求失衡问题和发达国家面临的类似问题是不同的。问题的根子不在总量，而在于结构。

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供大于求和供不应求等都是总量平衡的概念。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我国面临的现实情况并非是社会所生产的产品已经超出了人们的需要。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就是在沿海发达地区，人们的生活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也还有着不小的距离。老百姓享受的物质文明、国民福利远不到饱和的程度。也就是说，我们面临的不是绝对过剩问题。

不是绝对过剩，那么是相对过剩，是社会所生产的产品超出了社会普遍的购买力吗？也不是。扣除了物价变动因素，2002年时我们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978年的4.72倍。这个增长速度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是相适应的。从1998年到2002年，我们的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年均增长速度是12.4%。这个时期的工资增长速度也是从1979年以来各时期中最快的。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储蓄。1997年末，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是4.6万亿，2002年末时这个数字是8.7万亿。2003年第一季度末，这个数字已经接近10万亿。和供大于求形势出现之前的1997年相比，翻了一番还多。接近10万亿是个什么概念？和我们2002年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当。请注意，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大幅度增加还有一个背景，就是在过去几年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中，每年还增发了1500亿左右的国债。也就是说，有支付能力的社会购买力是存在的。

既然老百姓有钱买，为什么东西卖不出去还会成为一个长期、普遍的现象呢？问题出在结构上。生产结构、供给结构和消费结构不对称。老百姓想买的没生产出来，市场上卖的老百姓不想买。这是我们面临的根本性问题。

可能有人会质疑说，不对吧，现在老百姓家里该买的都买得差不多了。至少是在城镇，在大多数家庭，冰箱、彩电不是已经相当普及了吗？你还让

老百姓买什么呢？我想，我们在座很多人也都很关心产业的市场前景问题。我们就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个前景。咱们以家电产业为例来说明一下怎么判断市场前景。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我国家电这种产品在城镇老百姓家庭中已经有比较高的普及率了。高到什么程度呢？到2002年末，我国每百户城镇家庭拥有的彩电数量是126台，冰箱是87台，洗衣机是92台，空调是51台。2001年时，彩电的价格降价此起彼伏。那时就有专家分析说，我国的彩电市场已经饱和，每年最多能卖出2500万台，而我们的彩电生产能力已达4000万台。由此很多人忧心忡忡，说我们的彩电生产能力严重过剩了，这样下去可怎么办呀？

在2001年时，媒体的记者们就这个问题问过我100次以上。我说，你怎么知道市场只能卖出2500万台而不能卖出4000万台呢？你的根据是什么呢？是现在的市场实际销量。而这个2500万台的销量仅仅是现在市场价格下的需求量。依据这个经验数据所作出的判断是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的。

什么是市场经济的规律呢？老百姓都知道，价格贵就卖得少，价格便宜就卖得多。这就是市场经济的规律。商家们管这叫“薄利多销”。“薄利”就是降价。降价时销售量就会增加。用经济学家的话说，这叫做“价格与销量成反比”。再高深一点，我们还可以把价格和销量的关系用曲线方式来表示。当我们分别以销售量和价格为横、纵两个坐标轴时，需求价格曲线表现为是一条由左上角向右下角倾斜的连续曲线。

这个曲线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的问题很简单。对彩电的销售量来说，根本不存在一个市场“饱和”的极值。有人可能不相信老百姓会因为便宜而多买彩电。我们不妨借这个产业发展前景的问题给大家讲点市场学的道理。

我们假定人们在4000元一台的时候买了一台彩电。彩电在人们的生活中可提供多方面的效用。一台彩电就可以使人们90%的效用需求都得到满足。例如接受信息、娱乐、孩子受教育等。但还有10%的需求没有满足，例如老公要看足球时妻子偏要看时装，这时还有一些不便。由于这种不便可能只代表10%的效用。我们可以在理论上假定，消费者不会再去花4000元的同样价钱来满足那10%的效用。因为人们会觉得“不值”。

如果彩电降价，降到1500元一台甚至更低，人们就有可能考虑为尚未满足的10%需求买第二台彩电。再有足球赛时，两口子各看各的，省得打架。多好。

两台彩电可能会满足人们99%的效用需求。还有1%的需求没满足。如果彩电再降价，降到足够低，比如600元，甚者400元一台时，人们还可能买第三台。放在卫生间，一边方便一边看。为什么呢？省得在最精彩的进球

那一瞬间恰好憋不住而留下遗憾。也就是说，一家买三台彩电，甚至更多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关键看价格。

是不是单一的价格因素决定着彩电市场的需求量呢？也不是。实际上在市场上卖得最好的并非是最便宜的彩电。春节时我到商场去看过，万元以上的彩电旁边一般都放着一个小牌：样品，无货。大屏幕、背投、高清晰度、立体声、双画面甚至数字化等，各种具有新功能的彩电都卖得很好。也就是说，老百姓并非不需要更多的彩电，但是要有条件。这个条件就是，要么足够便宜，要么足够好。

后来的实践是不是证明了市场经济的这个道理呢？确实证明了这个道理。2002年，大家几乎没怎么听说彩电厂家抱怨压价。不仅没抱怨，在2002年，彩电厂家还一举扭转了上年“全行业亏损”的局面，上半年就实现了全行业赢利。怎么实现的呢？一是产品结构升级，大量具有新技术、新功能概念的新产品推向了市场。二是进一步开拓了国际市场。这一年中国的彩电出口增长了45%。

这就是市场。这就是市场经济。中国老百姓普遍用家电的时间才不过10到12年的时间，怎么就会饱和了呢？发达国家卖了那么多年的彩电，当中国彩电在价格或者技术上有足够强的竞争力时，国际市场不是也立刻就爆发出45%的需求增量来了吗？可以说，人们的认识不“饱和”，市场就永远不会“饱和”。

生产和消费需求对不上号，就出现过剩、积压。对上号了，供求关系就趋于协调。彩电的例子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实际上，我国产业结构与需求结构不相匹配的问题远不止彩电产业这样简单。

在过去20余年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各个产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我们的家电产业从无到有，现在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一的家电大国。我们的钢铁、水泥、很多重要化工产品、摩托车等的产量也是世界第一。这个发展成就是举世公认的。但也正由于发展速度非常快，产业的升级和产业间相互关系的调整来不及适应经济规模的扩张，就出现了结构性的矛盾。可以这样说，我们的产业构成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短缺时代，停留在人民收入水平较低的时代，没能及时跟上消费结构变化的步伐。

【4-2-3】即使在市场“疲软”最严重的时候，餐饮业的增长始终没有“疲软”。从中我们受到一个启发。这个启发就是，在中国老百姓的收入中，已经可以有更多的部分用于购买劳务性产品了。人们为什么旅游？可以有很多答案，例如为了开阔眼界，为了联络亲情，为了锻炼身体，为了享受闲暇，为了调整身心等等。但是钱花给谁了呢？主要花在了为人们提供食、住、行方面服务的劳务产品上了。

曾有人提出，我国出现供大于求的失衡主要并非是产业结构的问题，而是因为老百姓的收入正处于一个消费结构升级的积累过程。在城镇，万元级以下的耐用消费品人们买得差不多了，10万元级的东西人们还没攒够钱。

应当说，这个看法有一定道理。消费结构升级并非是一个均衡的过程。实际上从80年代以来，我国的社会消费热点的确呈现出一个此起彼伏的高、低潮不断交替。并不是每个时候都是消费的高潮。特别是在我国以前还有一个特点，社会收入水平比较平均，大家老是共同进入对某种消费品的需求高潮，然后又一块儿退出这个高潮。这在80年代后期的家电普及过程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但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这个特点已经趋于淡化。收入出现了分层，消费构成也就出现了分层。

目前，很多城市都有些专门针对所谓“白领”阶层的名牌、精品店，这些商店的东西并不便宜；与此同时，各地也都出现了专门以廉价为特点的“大卖场”、“小商品批发市场”等商业业态。大家知道，其实“小商品市场”并非只卖小商品，家电、建材、家具、通讯器材、食品，甚至乐器、药品，什么都卖。两种业态的商家都有很好的销路，都有自己的顾客群。这就是市场细分的结果。

实际上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这个社会的消费分层已经明显显现。这对产业结构调整、对生产厂家来说是好事。因为他们的生产能力由此就可以获得长一些的市场寿命。

不仅如此。在过去一些年中，我们这个社会的消费热点也并未出现过所谓的“断层”。我们大家一起回想一下。

从90年代初、中期开始，通信消费开始成为热点。那个时候有个漫画，公共汽车上BP机一响，全车的人都低头看自己的腰间。这个热潮到现在也没有退去。不仅电信器材，例如手机等信息接受终端的销售仍方兴未艾，而且通信服务本身的消费也在以超过其他任何一个产业的速度增长。这两年时兴一种很灵活的通信方式，就是手机短信。据说是手机短信的发展救了网络产业中那些门户网站的命。他们原本把广告作为基本的赢利模式，现在以手机短信为核心的增值服务大大缩短了他们赢利的时间期限。最近中国的网络股在美国纳斯达克市场上也是“一花独秀”，连涨不止。我们不如说，是中国庞大人口群的通信消费造就了中国网络股的强劲表现。90年代中期，移动电话还是少数富人的炫耀性消费品。90年代后期，中央有关部门还发文说要防止“耳朵腐败”，严格限制领导干部配手机。但到1999年建国50周年时，我国就一跃成为了拥有世界第二大移动通讯用户群的国家。到2002年，我们拥有了世界第一大的移动通讯用户群。

在90年代中、后期，餐饮、旅游等社会服务业开始成为新的消费热点。1998年到2000年，我们在扩大内需的研究中发现，即使在市场“疲软”最严重的时候，餐饮业的增长始终没有“疲软”。谁都知道，在餐馆就餐肯定比自己家里就餐的花费要大得多。那为什么人们还乐于扩张这方面的开支呢？从中我们受到一个启发。这个启发就是，在中国老百姓的收入中，已经可以有更多的部分用于购买劳务性产品了。

在过去收入低下的时代，老百姓花钱是格外讲究物美价廉的。钱花了，一定要有某种东西拿回家。花钱买服务？人们很难接受这种观念。其实不是头脑不接受这种观念，是钱包不接受这种观念。后来随着“长假期”的实行，旅游这种新型消费品一下子就大规模地进入了寻常百姓家。人们为什么旅游？可以有很多答案，例如为了开阔眼界，为了联络亲情，为了锻炼身体，为了享受闲暇，为了调整身心等等。但是钱花给谁了呢？主要花在了为人们提供食、住、行方面服务的劳务产品上了。

进入21世纪，汽车消费就开始启动。最初是在北京、深圳等高收入人群较密集的地方。到2002年时，这个趋势已经明显显现出向普通家庭扩展的趋势。大家可能对这个趋势之猛缺乏一个数量的观念。我们预测，2003年末时，中国汽车保有量中私车所占比重肯定会超过一半。这意味着至少有1300万辆私车。

其实，在上述过程中还有计算机热，还有住房消费的升温等。我们不一一列举。最近浙江一带的房价居高不下，宁波、杭州的房子有多少卖多少。我们一点也不怀疑，在新的一轮城市化过程中，住房消费将会在一个不短的时期内成为国民经济的带头产业。

简单说，我们的产业结构正在经历着一个从生产决定消费到消费引导生产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产业的发展，各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的变化明显服从着消费需求的变化。

产业结构要与消费、需求结构相匹配，这还只是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一个原因。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是一个赶超型的经济发展过程。我们只和自己比还不行，还必须和国际先进水平比。世纪之交，我国国民经济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就是，我们必须应对入世之后的外来竞争挑战。

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对各种资源的利用程度、依赖程度，受产业结构的构成状态影响很大。我们现在的产业结构，是为完成工业化初、中期的任务而形成的结构。产业分类本身就包括按照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等的分类。这些产业的相互构成关系，也是产业结构的一种表现形式。现在看，要完成全面小康建设这个战略任务，我们这个结构必

须按照少用自然资源，多用人的方向调整。

为什么必须满足多用人的要求？我们在就业专题中已经讲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单纯讲求规模、讲求速度都不行，必须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的客观趋势联系起来，必须和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密切联系起来。

要满足就业要求，肯定就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高科技产业好不好呢？当然好。但是一个写软件的上市公司，可能只需要几十个人就够了。都搞高科技，我们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就不可能协调。所以在中国的产业结构选择中，我们还必须注重对劳动要素容纳程度比较高的产业发展。

别以为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就是落后产业。大家可能听说过一个生产羽绒服的民营企业，叫“波斯登”。我曾经去过这个企业。这个企业的厂区非常漂亮，有俱乐部、职工宿舍、球场、绿地等设施。此外就是若干座厂房。这些厂房每座都是四层楼。每层楼能容纳一千多人生产。昼夜三班倒。大家想想这个企业容纳了多少人就业吧。这个企业的产品行销全世界。我们大量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企业。

【4－2－4】没有饮食文化传统的美国人现在跑到最有饮食文化传统的中国来开餐馆了。他们的诀窍何在？中国没汽车文化，但有儿童文化呀。麦当劳、肯德基就把自己社会文化的立足点转移到了儿童文化上，把他们的产品改造成了“儿童食品”。店堂摆放、家具、色彩都是适应儿童心理的，店员都戴着卡通形象的纸帽子。就连厕所都有专门给小孩子撒尿用的矮的小便池。就这么一招，就把中国的儿童给征服了。能把生意做到这样的文化精深之处，没有深厚的管理基础是不可能的。

当然，制造业尽管对容纳就业具有一定优势，但真正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我们还得更多靠社会服务业的发展。

大家可能没太注意到一个提法的变化。在“十五”计划中，我们没用原来人们常说的“第三产业”这个提法，而用了“社会服务业”的提法。

三次产业划分也是产业分类的一种。因而三次产业之间的构成关系也是产业结构的一种形态。这个划分方法是我们从国外学来的。从80年代中后期的“七五”计划时期起，我们也比较多地在结构研究、结构调整中沿用了这种分类。但这种划分有个缺陷，就是产业之间的界限不清晰。外国人也发现了这个缺陷。于是就有人提出，把信息产业算作第四产业，把政府算作第五产业等等。这就越发让人弄不清楚各个分类的内涵了。在“十五”计划中，我们说我们还是用中国人一听就懂，内涵外延都很清楚的“社会服务业”的

概念吧。

“十五”计划和党的“十六大”报告中都特别强调发展社会服务业。发展社会服务业并非仅仅是为了满足就业的要求。社会服务业的充分发展是现代化的产业构成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我们上海的浦东建设得那么漂亮，开 APEC 会议时让那些见多识广的大国领导人都赞叹不已。我也去过不少国家，也有点资历可以进行一点国际比较。浦东的硬件确实堪称是世界先进水平的。这个评价一点都不过分。纽约的曼哈顿岛是世界级的商务中心，那里的很多楼房建筑已经老旧了，其酒店设施还不如我们浦东的先进、堂皇呢。这是实话。但我们的浦东还缺些东西，就是与这个区域经济相匹配的充分发达的社会服务系统。

完善这个社会化的软件系统，我们还需要长期努力。在日本，从任何一个街区角落，包括离东京数百公里的地方，你要去机场、港口，行李是不用你随身搬着、提着的。打个电话就有“宅急便”给你送到。你到机场，行李一定到机场，不会损坏，不会误事。就是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我估计我们还做不到这样方便。

我在美国时，有一次领着国内几个部委的司、局长组成的代表团考察。我说坐飞机、住酒店你们看不到美国的全部。我们租了一辆车，我开车领着他们到处看，住 Motel，就是汽车旅馆。这些国内来人想吃中餐，我说这很容易。每个 Motel 都有当地的中餐馆广告，打个电话就有人给你送到住的地方。包括红烧鱼、酸辣汤都可以给你送来热的。不仅仅是在大城市可以做到，几乎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做到。

社会服务业还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最重要产业。你想旅游，想吃海鲜，那不是有钱就一定能办到的。必须得有与人们收入水平相称的、发达的社会服务系统才行。在发达国家，只要你能想得出来，几乎什么样的社会服务都有供给。你想到海底去结婚，到山顶上去度假，到无人的海岛去关几天，都有人能给你办到。只要你肯出钱。

社会服务业本身也是一个多层次的构成。在“十五”计划中，我们把它分成了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传统型的社会服务业。在国外和我们国家都是传统的，比如餐饮、商贸流通等。很多人说，中国的餐馆够多了，随便哪条街上都能找到好几家。我们还要发展这个领域吗？是的。我们还要发展。我们现有的餐饮业是不是发展充分了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中国具有悠久的饮食文化，这没有什么争议。走遍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你都可以轻易地找到中餐馆。从最繁华的纽约曼哈顿街区、巴黎的香榭

丽舍大街到最危险的巴以冲突前沿地带、最荒凉的撒哈拉大沙漠边上。没有人认为美国人会做餐馆。美国有什么饮食文化吗？没有。炸薯条和冰激凌是美国人发明的，仅此而已。但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没有饮食文化传统的美国人现在跑到最有饮食文化传统的中国来开餐馆了。“麦当劳”、“肯德基”等，在中国的很多城市中开一家火一家。

美国人向中国人“叫板”。中国人说，“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美国人必有它的过人之处。他们的诀窍何在？

美国是个以汽车文化为基础的社会。美国人自诩为“移动的民族”，把汽车当成朋友，当成第二个家。人们调侃，在美国老婆都能借，汽车不能借。麦当劳、肯德基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基础之上诞生的“汽车食品”。大家可能注意到，麦当劳、肯德基的食品不用碗盘来装。它的饮料用密封性很好的纸杯，汉堡包用纸包着，再装进一个纸盒。为什么呢？为了方便一边开车一边吃。麦当劳、肯德基在美国的主要销售方式不是“堂吃”，而是从窗口购买后带走吃。人们把汽车开到餐馆窗边，不用下车，递上钱拿上食品开车就走。

他们这些食品就是为一边开车一边吃的人提供的。为“Very Busy Person”提供的。但是中国没有汽车文化。怎么打入中国呢？就有高人给他们出主意了，说中国没汽车文化，但有儿童文化呀。麦当劳、肯德基就把自己社会文化的立足点转移到了儿童文化上，把他们的产品改造成了“儿童食品”。

大家看到，麦当劳、肯德基的店堂摆放、家具、色彩都是适应儿童心理的，店员都戴着卡通形象的纸帽子。碰到有小顾客过生日，他们还专门给你放音乐，送小礼物。就连厕所都有专门给小孩子撒尿用的矮的小便池。就这么一招，就把中国的儿童给征服了。把儿童征服了，就把负责买单的家长给征服了。有些经营之道，说穿了可能就是一张“窗户纸”，一捅就破。但是能把生意做到这样的文化精深之处，没有深厚的管理基础是不可能的。

这一比，比没比出我们的餐饮业的差距来呢？其实，麦当劳、肯德基的长项还不止于此呢。你要出国旅游，我告诉你个诀窍。要是因为语言不通找不到厕所别着急，你就找麦当劳、肯德基的标志。那里肯定有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厕所，而且不管你在不在那里消费都让你用。他们全世界的门店都做得到这一点。我们有几家餐馆做到这一点了？有几个人想到用厕所来树立企业形象、传播无形广告了？

可见，我们在传统的社会服务业领域也还有个发展、应对外来竞争以及提高到国际先进水平的问题。

第二个层次是在国外属于传统领域，在我国属于新兴领域的社会服务业。比如金融服务、家庭理财、保险、旅游等业。有个很老的电影叫《百万

英镑》，英国人在一百多年前就用个人支票了。我们到现在还难于发展。前年有家银行推出了个人支票的金融服务品种，我们上海有个顾客最先“尝”这个鲜，兴冲冲地办理了手续就拿去买东西，结果商家不认。磨破嘴皮说到最后的结果是，你三天后再来取货吧。

这几年到中国旅游的外国团队发展很快。有老外给我们提意见，说中国目前刷卡消费的购物环境这么落后，中国的旅游收入至少因此减少了一半。人来了、没在中国花多少钱就走了。你说我们冤不冤？在国外的旅游地，任何一个小餐馆刷卡消费都不会有问题。

我们的老百姓过去到银行去就是存取款，哪里知道还有个理财的金融服务？别说老百姓，银行里面真正了解这个服务的内涵、形式的人也不多。前不久建行北京分行的人还和我说，咱们能不能合作一个课题，就研究一下这个个人理财的金融品种究竟怎么开发。

大家注意到这几年有个现象，就是“春运”。大量农村进城经商务工的人员都要在春节前回家。目前这个规模已经达1.2亿人。这些人回家都要把一年的辛苦钱带回去，娶媳妇、盖房子、过年给家里添置些东西什么的。迄今我们的银行给这样一个巨大的金融潮提供了一个安全、便捷、成本低廉的汇兑方式没有呢？远没有。有些银行有异地存取款业务，但要收不低的手续费，还要到县城去取。还有的地方当地有土政策，汇到家的钱必须在当地存够三个月、半年才取给你。那不把娶媳妇给耽误了吗？那不管。领导就这么规定的。我们的农民兄弟怎么办呢？他们就只好把现金揣在身上随身携带。每人少则三五千，多则若干万。这样一个全国性的现金大流动，不仅极其不安全，而且也造成极大的金融资源浪费。大量现金被迫停滞在金融系统之外的途中。为什么连这么一个简单的金融品种我们都办不到呢？大概是我们的银行家们都心太软，怕那些拦路抢劫的车匪路霸，或者违规上路罚款的公安们没机会挣钱。

第三个层次是在国外和在我们国家都属于新兴领域的社会服务业。例如信息服务业。

一方面。中国的信息服务业发展还是很快的。现在你到一个很偏远的小县城也很容易发现那里居然还有“网吧”。但另一方面，我们在基础信息平台上的工作做得还非常不充分。我举个例子，在美国开车，到一个不熟悉的地方去也很容易。因为你可以很轻易地得到非常详尽的地图。详尽到一个城市的每一条路，在两个路口之间路段上的门牌号是多少到多少，哪条路是单行线或禁行线。不仅信息详尽，而且检索极其容易。按照街名的字母拼法就马上可以检索到目的地在地图上的坐标。

这个地图怎么得到呢？在美国高速路上各州之间分界线的地方一般都会有个叫“Welcome Center”的休息地，就是本州的“接待站”似的。那里可以免费索取本州的地图。进入该州后，州内各城市的边界地也会有类似设施。你又可以免费取得这个城市的地图。有些城市比较大，比如洛杉矶，还会有城市分区的地图。1997年时我到美国去，也是租了个车自己开着，走了很多地方。那时就可以办到，在相应的旅游网站上，你只要输入出发地和目的地，就可以得到一张最优的行车路线图。从几号高速在什么地方转道几号高速，什么方向，应有尽有。不仅是短途，包括从美国东部到西部的长途，都办得到。我们现在还远做不到这个程度。包括北京在内，那个地图不仅不详尽，而且有个最大的毛病，就是无法检索。如果不熟悉你要找的那个目的地是在哪个街区，那你两个钟头也别想看出个所以然。

我们现在说，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这个信息化不仅是把生产过程的管理要通过自动化的信息处理手段完成，也不仅是把各种管理信息数字化，更重要的是形成一个社会信息汇集的平台。在这个信息足够充分的平台上，信息服务业才能真正发展起来。可以这样说，在目前中国的网站中，政府网站是做得最差的。大家可以上各中央部委的网站看看。几乎没有什么有用的信息，而且非常陈旧，几乎很少更新。原来有些网站还有个部门的联系电话，后来很多部委连这样一个最基础的信息都不提供。那个网站就和一幅宣传画差不多，没有什么信息化的意义。这次“SARS”疫情闹到这么厉害了，我迄今仍不能在卫生部网站上找到公布疫情的地方在哪里。

我们目前信息服务业发展的制度环境也远不理想。旧体制留下的部门利益仍在严重影响着信息服务业的发展。这几年，关于联通、中移动、铁通、中国电信等各家电信运营商之间恶性竞争，采用不正当手段破坏互联互通的报道始终不绝于耳。在这样一个新兴的社会服务领域，我们还有太多的工作要作。

【4-2-5】中国人有一句老话，“一分钱一分货”。外国人为什么把用得好好的“二手设备”卖给你呢？因为这个设备的技术寿命、市场寿命已经完结了。尽管自然寿命还没完结，但用这个设备造出来的产品一定在市场上没有竞争力。我国现在的钢产量是世界第一。但这么大的钢产量中，真正采用高端技术生产的所占比重很小。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产业技术构成的低度化。

我们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不仅表现在哪个产业发展快一些、哪个产业趋于缩减这样一个层面上。在当前的新形势下，还有一个重大问题迫切需要解

决。这就是产业技术构成的全面升级。

在关于入世问题的讨论中，为什么人们对我国相当多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表现出那么多的担心呢？一个原因是，目前我国产业结构的总体技术基础是比较落后的。

我国产业结构的技术基础落后有个客观原因。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的“翻两番”战略中，由于当时资金与成本限制，我们的很多产业不得不采取了倚重初级技术、适用技术的结构选择。主要表现在大量引进二手设备、接替发达国家淘汰产业、“三来一补”推动下的劳动密集型组装业大发展等。那时叫“少花钱多办事”，“不花钱也办事”。

这在我国的钢铁产业中表现得最为典型。首钢的经验之一就曾经是，怎样用新设备三分之一的价格从国外买回“二手设备”实现了生产规模迅速扩大的。现在我们看明白了，中国人有一句老话，“一分钱一分货”，这句话是真理。你想想，外国人为什么把用得好好的“二手设备”卖给你呢？因为这个设备的技术寿命、市场寿命已经完结了。尽管自然寿命还没完结，还能用一阵。但用这个设备造出来的产品一定是技术上落后的，或者是不经济、在市场上没有竞争力的。我们前面说到过，我国现在的钢产量是世界第一。但这么大的钢产量中，真正采用高端技术生产的所占比重很小。

这个现象并非仅仅存在于钢铁业。在我国很多产业都普遍存在。我们的轿车业，最早引进的“桑塔纳”，从引进的时候就已经是落后10年的车型了。这个基础怎么能发展起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呢？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产业技术构成的低度化。

当前，这种低度化的技术构成已成为了产业国际竞争力不强的最重要原因。中国钢铁工业生产能力中的铁钢比为1.06，而日本为0.76，美国为0.52；中国连铸比仅为53.3%，而发达国家均在90%以上。由此导致，中国每吨钢比世界先进水平多耗能0.2～0.3吨，1亿吨钢就要多耗2000万～3000万吨标准煤。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将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技术结构的升级。我们几乎所有重要基础产业的主体技术都得大规模更新。具体说就是，在各个产业中淘汰落后技术和缺乏竞争力的中间技术，加大对先进技术的倚重程度，全面更新工艺设备。这个更新，不是简单地以旧换新，而是直接瞄准国际先进水平的大规模更新。

在过去很多年中，我们曾经特别提倡依托老企业、原有生产能力进行技术改造。那时我们认为这是一条“多快好省”的技术进步之路。现在看，这个传统思路不行了。就好像我们在比较穷的时候先买了一辆旧车开着，当时

看省钱又实惠。以后我们如果老是对这个破车修修补补，再怎么修它也是一辆破车了，怎么也不能适应公司的业务要求了，现在我们需要换一辆好车、新车。我们的产业发展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时候。面临的国际市场上的全面竞争。我们需要有最精良的装备才行。

湖南长沙附近有个县，有家很有名的民营企业就在那里，叫做“远大空调”。“远大”主要生产中央空调，客户对象是高档酒店、写字楼等。我去参观过。这家企业怎么起步的呢？它的诀窍就是，直接瞄准最好的设备、工艺，直接引进世界上最好的产品。现在，在“远大”总部的监控室中就可以通过网络随时监控所有销售出去的产品的运转状态、各种使用数据。如果有什么异常，“远大”会马上通知用户。当然，这场“SARS”疫情也在考验“远大”。现在看，原来那种全封闭的写字楼在公共卫生安全方面存在重大缺陷。今后怎么适应这个变化，我想“远大”是会有自己的应对之举的。

不仅传统产业要更新技术设备，一些新兴产业也面临同样挑战。以彩电业为例，传统的模拟彩电技术正在为数字技术所取代、单纯视听功能面临“三网合一”功能的替代。

我们刚才说过，2001 年时彩电行业有个“价格战”。当时很多媒体把这个现象归咎于厂家的“恶性竞争”。厂家也一肚子委屈，到处抱怨说价格已经让他们“全行业亏损”了，并且企图用“最低限价”的垄断办法来抑制这个降价趋势。其实，当时彩电行业究竟亏在哪儿了？是亏在消费者出价太低上了？还是出在个别厂家“破坏价格秩序”上了？都不是。那些都是表面现象。厂家亏在了技术进步过程中的固定资产无形损耗上了。

什么叫“无形损耗”？由于技术寿命趋于完结，社会不再承认你的设备、技术还值原来那么多钱，就叫无形损耗。设备还是那些设备，完好程度也没有降低，就是技术过时了，社会不承认了。这种“损耗”是市场经济下特有的一种损耗。而且是一种无法弥补的损耗。

我们很多人都有买电脑的经验。现在很多老百姓都知道，你一年前花两万元买的配置很高的笔记本电脑，即使连包装箱都没打开，也就是说，自然寿命还没开始启用，现在要卖的话，恐怕连一半价钱都不一定卖得出去。为什么呢？技术过时导致了自然贬值。

无形损耗的存在，就使原有设备无法按原投资额分摊折旧。因为你摊进去社会不接受。还以彩电业为例。数字技术、“三网合一”的预期使得市场已经不承认厂家现有的固定资产还值原来那么多钱。假定原来每台彩电得分摊 600 元折旧费才能不亏，现在最多只能摊入 300 元，甚至 200 元。厂家亏在哪里？就亏在这个“无形损耗”上。

降价其实是聪明的选择。因为赶快降价，厂家还可以在固定资产的技术寿命彻底完结之前尽量收回部分投资。不降价的结果就是血本无归。这个损失是技术进步带来的，技术进步导致的资产“缩水”是市场经济下的一种不可避免的风险。这个风险只能由厂家、或者厂家的出资人自行承担。能不能通过价格垄断的办法把这个技术进步造成的无形损耗转嫁给消费者呢？我想中国的消费者不弱智，这个办法肯定行不通。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那厂家应当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是力争在行业内率先实施技术、设备更新。什么时候都是走在技术寿命周期前面的厂家才能赚钱。抱着“套牢”的旧技术不“割肉”的企业，在市场经济下是死定了的企业。

【4－2－6】美国《财富》杂志关于世界500强的排行榜中，中国的企业有12家榜上有名。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已经拥有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下这个判断恐怕还为时过早。因为世界500强中的其他488家之所以大，都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是市场力量导致的资源集中。唯有中国这12家并未经过市场的充分竞争“洗礼”。不论资产规模大，还是销售额大，都还只是人为合并的结果。

产业结构涉及的主要是供给领域、生产领域的构成关系。这个构成关系不仅包括各产业之间的数量比例、再生产接续关系，而且还包括技术结构、组织结构等多方面内容。

其中技术结构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社会生产主要依靠初级实用技术、中间技术还是先进技术，各种技术在经济系统中所占比重如何。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不仅是传统工业领域和高新技术领域之间的关系调整，而且是经济系统自身技术结构的调整。

产业组织结构主要指大、中、小企业之间的构成关系。大有大的难处，小有小的弱点。在入世这个问题的讨论中有一种声音，认为中国各产业的企业应当尽量合并，组成“航空母舰”，以抵御外来竞争。这种看法恐怕失之偏颇。

2002年时，美国《财富》杂志关于世界500强的排行榜中，中国的企业有12家榜上有名。有记者问我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已经拥有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我说，下这个判断恐怕还为时过早。为什么呢？因为世界500强中的其他488家之所以大，都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是市场力量导致的资源集中。唯有中国这12家并未经过市场的充分竞争“洗礼”。不论资产规模大，还是销售额大，都还只是人为合并的结果。

还有媒体提出，在一些竞争比较激烈的产业，能生存下来的最后可能只

有几家“龙头”企业，小企业恐怕很快就会被淘汰。我认为这种估计也过于悲观。就是在竞争最激烈的产业领域，小企业一样可以有很充分的发展空间。

没有比计算机产业的技术垄断性更强的了。但就是在美国“硅谷”，仍有千百家小型的IT公司充满生机地存在着。在一些领域，在竞争中市场份额可能会很快集中于少数几家大企业。比如说80%甚至更高的市场份额集中于七八家甚至更少的几家企业。但剩下的很少一部分市场份额仍将由几十、上百家小企业分享。大企业消灭不了这些小企业。因为市场永远是多样化的。大企业要想把最后的一点市场份额夺过来，那成本代价可能要高到非常不经济的程度。而且大企业还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在众多小企业中，随时有可能发展起向大企业挑战的新的竞争者。小企业永远是创新的最肥沃土壤。因为它们总是面临着不创新就无法生存下去的严酷环境。

很多人都看过水下生物世界的科教电视片。人们可能会惊叹，大自然怎么会如此神奇地造就一个极其精密的生物链。其实就是亿万年自然竞争、优化选择的结果。自然规律也同样表现在社会活动中。给大家讲一个美国汽车产业大、中、小企业之间分工的例子。

在美国，汽车的车型是非常五花八门的。但你去买任何一种车型的配件，哪怕是20年前，甚至30年前的车型，其配件也能买得到。那是怎么办到的呢？美国的汽车生产企业及其直接的配套企业，一般只保证新车型一年左右周期内的配件供应。大企业长期保证配件供应是很不经济的。但汽车又是一个和售后服务联系异常密切的产业。没有充足、方便的配件供应的汽车是不会有人买的。大企业的办法，就是把老车型的模具低价，甚至无偿地提供给一些中小企业，和这些中小企业签订合同，由它们保证在若干年内的配件供应。就像小鱼围在大鱼周围“捡剩”一样。小企业也不能保证20年的配件供应呀？没关系，如果是很老的车型，还有很多手工制作的“个体户”接着吃这碗饭。你说我有个30年的“老爷车”，我非要把它修好不可，配件商也可以办到。你登记下来一周后拿货。他去找这些专门手工制作配件的人给你单造一个。但是有一条，假定一个化油器一般也就30美元，给你单造一个可能得300美元。问题是市场中就有这种需求，就有人宁愿花这个钱。于是不同层次的企业就都有了自己的生存空间。

实际上小企业更大的生存空间还在于专业化分工。日本的制造业企业很多都是世界级的，但日本的制造业产品其实主要是依靠中小企业生产出来的。在日本，这叫“下请制”。就是大企业把万万千千的零部件承包给具有固定合作关系的中小企业生产。我在日本时有个朋友，他的企业就是一家“夫妻店”式企业。有几台全自动的注塑机，模具由母公司提供。原料从社会化

的供应商处买，打个电话就送来了。老板管取货送货、调试机器，老婆管记账、给打工仔做饭。再雇几个学生打工，就行了。但其生产的产品是日本大公司的配件，是卖到国际市场上去的。

我国国民经济中的结构性矛盾，不仅表现在产业与消费结构之间不匹配，还表现为与资源结构之间的一种冲突。在前一个“翻两番”战略中，我们重点发展了再生产链上游的能矿、原材料产业。钢铁、化工、水泥等重要基础产业都实现了很大的规模扩张。但我们不可能继续沿着这样一个结构形态发展下去。再过20年，钢铁工业再翻两番，资源禀赋不支持这样一个结构形态。

我们国家的资源禀赋是比较差的。很多重要矿产品都严重短缺。省能、省资源，保护环境已经成为结构调整、升级的重要目标。这些内容，我们将在“资源战略”的专题进行分析。

另外，在“十五”计划实施前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还有一个明显趋势，就是在全局性的调整之外，各地因地制宜的区域性结构调整非常活跃。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已经成为我国结构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在区域结构上有经验也有教训。这个问题，我们也留待下面“区域战略”的专题里面再讲。

总体上说，我们已经走出了前20年中以选择“战略重点部门”为核心的结构战略时期。依靠产业快速扩张来支持国民经济增长的时期已经基本过去。我们目前的产业组合状态已经不能适应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要求。从短、中期看，缓解结构性矛盾的主要任务，一是淘汰上游产业的过剩生产能力，实现资源配置的重心后移。二是推进技术结构升级，从物质技术基础上提高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三是加速高科技产业和新型第三产业发展，其中特别是要加快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的步伐，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利用网络技术、电子商务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四是与培育新的经济点相配合，大力扶持教育、旅游、娱乐、保险等新型社会服务业的发展。

3. 产业政策与资源优化配置

☆ 产业政策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干预供给领域中资源配置的中、长期政策。

☆ 我们的产业政策存在着明显的“越位”。对产业保护、扶持的范围过大。产业政策实际上被严重“扩大化”了。

☆ 后发优势就是少走弯路的优势。后起国家可以规避发达国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教训，直接实现优化的资源组合状态。

☆ 如果有更多的资本在逐利动机驱动下涌入这个产业，这个产业就没必要当做“幼稚产业”来加以政策扶持。

☆ 我们面临一个产业退出的问题。怎么缩减产业规模、淘汰过剩生产能力的问题摆在了我们目前。

☆ 有时候市场机制不仅不能诱导资源向优化的方向流动，反而会进一步推动结构性矛盾激化。

【4－3－1】产业政策是市场经济下政府干预供给领域中资源配置的中、长期政策。这里面有几个关键词。一个是供给领域，不是宏观调控领域，不是收入分配领域。再一个是政府干预，不是政府包办，政府包办就成了计划经济了。第三个是中长期，不是一两年。产业政策主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促进重要战略产业的发展，二是协调国内外的产业竞争关系，三是推动产业结构的适时升级。

说产业结构，就不能不提到产业政策。

什么是产业政策呢？产业政策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干预供给领域中资源配置的中、长期政策。这里面有几个关键词。一个是供给领域，不是宏观调控领域，不是收入分配领域。再一个是政府干预，不是政府包办，政府包办就成了计划经济了，就不是产业政策了。第三个是中长期，不是一两年，而是注重长期的产业发展。

产业政策主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促进重要战略产业的发展，二是协调

国内外的产业竞争关系，三是推动产业结构的适时升级。

产业政策是政府行为。但应当特别指出的是，产业政策格外强调发挥市场的作用。在市场机制不能发挥作用，或者不能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的地方才需要产业政策。这一点很重要。

我国的产业政策是在对计划经济的渐进式改造中发展起来的。在相当一段时期中，人们把产业政策当成了计划的替代品，总是把产业发展的主要责任付之于政府的政策。这个认识是不对的。

前期我们的产业政策存在着明显的“越位”。对产业保护、扶持的范围过大，连产业中应当发展什么样的产品，应当由哪个企业来生产等问题都被纳入了产业政策。产业政策实际上被严重“扩大化”了。这个缺陷的后遗症迄今仍随处可见。比如迄今信息产业部还直接规定，“小灵通”是低水平的技术，要严格限制发展。现在人们一说到产业发展，首先问的问题仍然是，国家将给什么样的政策扶持？

产业政策是日本人发明的。日本人在产业政策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提出了“培育优势”、“后发优势”的概念。

在传统的国际分工理论中，人们认为，一个国家应当根据自己的资源、传统优势来选择主要应当发展的产业。日本人不信这个“邪”。日本什么资源都没有，国土面积都非常狭小，能发挥什么优势？日本人创造性地提出了“培育优势”的理论，说我们能够自己“造”出一个优势来。这就是很多人听说过的“幼稚产业育成论”。什么是“后发优势”呢？简单说，后发优势就是少走弯路的优势。后起国家可以规避发达国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教训，直接实现优化的资源组合状态。

日本的产业政策曾在钢铁、化工、造船、汽车以及计算机等产业的发展中下过很大功夫。政府通过政策扶持、政策保护来干预资源配置，促进资源向战略重点产业集中，由此培养起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的优势产业。大家熟知的“新日铁”就是在日本政府的政策撮合下，由“八藩”和“富士”这两个在日本排名第一、第二的大企业合并而成的。日本的钢铁企业由此就一下跻身了世界钢铁企业的前几位。在产业政策的强力扶持下，日本的钢铁业迅速成长，国际竞争力大为提高。到1971年时，日本普通钢、热轧薄板和冷轧钢板的成本分别只相当于美国同期成本的56%、70%和68%。在既没有铁矿石，也没有能源的日本，钢铁业一举成为了优势产业。

日本的企业界后来不承认汽车产业发展曾经受惠于政府政策的扶持。这恐怕不符合实际。我给大家举个日本政府政策保护汽车产业的例子。

日本的汽车业从60年代后期起步，到70年代初期，日本在这个领域中

已成为老牌霸主美国的强大竞争对手。1970年，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汽车出口国，1975年跃居世界第--大汽车出口国，出口量达268万辆。1980年那一年，日本人卖给了美国人395万辆汽车，却只从美国买了1.05万辆车。差不多是400:1。1981年，日本尽管实行对欧美市场的“自主限制”，汽车出口仍达605万辆；同年排世界汽车出口第二位的联邦德国仅出口215万辆，而一向号称汽车大国的美国当年仅出口了69万辆。

这样一个严重不均衡的市场格局引发了长达二十年的日美汽车贸易摩擦。在这一过程中，日本政府用“口惠实不至”的办法极尽对汽车产业的保护。美国人对400:1的悬殊进出口比例非常恼怒，1981年以后，日美间几乎每年都要就日本“自主限制”的问题进行谈判。

在贸易谈判中，日本人的态度总是很好。再三鞠躬说，是我们不对，我们要“检讨”，我们要“反省”，我们回去后一定要自我限制。美国人就相信了日本人的话，等着他们自我限制。第二年，日美汽车贸易的顺、逆差还是“涛声依旧”。日本人态度仍然很好。又是深刻检讨。说我们回去批评企业了，号召他们到美国投资就地生产，只是政策力度不够。这次回去我们一定采取有效的措施。美国人又相信了日本人的话。年年谈，但美国对日的贸易赤字年年不见好转。就这样三拖两拖，一直到1985年，美国人才发现自己有多么的幼稚和天真。

日本汽车产品大举占领美国市场的态势和日本年复一年的拖延终于让美国人失去了耐心。1985年9月，美国召集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的财长和央行行长在纽约一个叫“广场饭店”的地方开了一个秘密会议。这个会议的主题就是各国采取联合行动，迫使日元升值。这就是所谓的“广场协议”。“广场协议”尽管有助于缓解美日贸易摩擦，但此时，日本汽车在美国和世界市场上的地位已经稳固。

当然，日本的产业政策也不都是成功的。在汽车产业发展过程中，日本政府曾想照搬钢铁工业用过的政策，强制企业大量兼并，只许兼并后的很少几家“定点”企业生产轿车，以实现所谓的规模经济。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日本政府促成的合并没有发生，而它不允许生产汽车的企业反而发展得很好。

大家知道日本有个汽车厂家叫“本田”。就是接替法国人和广州汽车合作的那个企业。本田原来不会造汽车，它是造摩托车的。在汽车产业的扩张中，本田也想造汽车。但政府不给它报“户口”。本田咬咬牙说，日本国内不让造，我就到海外去造。由此就打下了海外市场的一片天地。尽管到今天本田也不是日本最大的汽车生产厂家，但在早期，它是日本最大的汽车出口商，

远远超过丰田。实际上，日本汽车的海外市场最早是在产业政策中连“户口”都报不上的本田打下的。

【4-3-2】产业政策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战略重点产业选择。战略重点产业不是仅仅按照重要程度来选的。如果有更多的资本在逐利动机驱动下涌入这个产业，这个产业就没必要当做“幼稚产业”来加以政策扶持。

产业政策包括产业培育、产业保护、产业扶持、产业退出等多方面内容。

产业培育就是前面说过的“幼稚产业育成论”。这个理论的核心是战略重点产业的选择。从历史经验看，产业政策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战略重点产业选择。我们有必要特别说说这个战略重点产业的选择问题。

现在回首看，我们在80年代初、中期的战略重点产业选择是比较成功的。但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是，高科技、制造业、农业、社会服务业，你说哪个不重要？都重要。还有能源。伊拉克战争给我们的提示就是，中国的能源、石油安全不能不占据更高的战略位置。汽车不重要吗？从“九五”计划中我们就把汽车、住宅列为支持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如果都重要，都选为战略重点产业，这等于没选。

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仍需要有自己的战略重点产业。但应当辨明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战略重点产业不是仅仅按照重要程度来选的。

我们前面说过，产业政策是政府干预经济的一种方式，而且这种干预必须是首先让市场经济发挥作用。在市场机制力所不逮的地方才需要产业政策介入。选择战略重点产业，关键是看市场机制能否保证这个产业获取足够的资源配置。汽车产业的确很重要。但目前看，这个产业已经可以从市场中获得比较充分的资源。产业政策，特别是产业培育方面的政策就不一定需要。

请注意，这个市场指的不止是产品市场。不是说汽车卖得有多么好，已经可以有充分的自我积累能力了。这个市场更多地指的是资本市场。如果有更多的资本在逐利动机驱动下涌入这个产业，这个产业就没必要当做“幼稚产业”来加以政策扶持。这可能和我们很多人的理解有很大不同。

产业保护是人们最熟悉的产业政策。不仅过去的关税壁垒，最近几年在中国入世问题上，人们也逐渐了解了很多新的概念。例如“非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也包括很多方面，如环保壁垒、安全壁垒、技术壁垒等。这几年，我国很多企业在出口上就经常遇到对方的非关税壁垒。比如农产品的“农残”问题。提高水果、蔬菜上的农药、化学物的残留量标准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抵制中国农产品的常用手段。前面说到过的，欧洲抵制中国一次性打火机的事

件，采用的就是典型的技术壁垒、安全壁垒。通过提高技术标准、安全标准来阻止外来竞争。

在非关税壁垒上，日本人还有更绝的一招，叫做社会文化壁垒。因为农产品自由化问题，美国人和日本人争吵了很多年。日本的农业主要是小农经济，国际竞争力不强。日本市场上的大米价格比国际市场贵7倍。但日本的农民是自民党的“铁杆”选民。而且日本农业也是日本维护自身经济安全的一个重要“保留地”。所以日本的产业政策始终不肯放弃对农业的保护。

在“拖延”战略不灵以后，90年代末，日本被迫降低了美国牛肉、大米进入日本的关税壁垒。美国人兴高采烈，以为终于可以在日本市场长驱直入了。但很快发现，事情远不是那么简单。美国牛肉在日本市场上就是卖不动。为什么呢？原来日本的媒体不断发表专家的文章说，日本的“和牛肉”虽然比“洋牛肉”贵很多，但“和牛肉”的味道和营养是“洋牛肉”没法比的。理由是，日本的牛都是喝啤酒、听音乐长大的。

历史上，日本在计算机业发展过程中曾经采取过的一个保护政策是，规定政府机关、公立大学等所有靠财政支付的部门要买计算机，必须买日本的国产计算机。现在这种公开的保护行不通了，但潜在的保护壁垒并没有根除。在日本，坐进口轿车的只有两种人，企业界的大亨和黑社会“老大”。政治家、官员是不敢坐外国车的。如果哪个政治家违背了这个社会“游戏”规则，他私家车库的照片往媒体上一“曝光”，他的政治前途就完了。

产业扶持和产业培育、产业保护是相通的。扶持就需要保护。我们前面说过，日美汽车贸易摩擦时，日本政府采取的是“口惠实不至”的拖延政策。这就是一种扶持。我们经常在研究报告中提醒中央决策层领导，千万别相信日本人的“反省”、“检讨”之类的“软”承诺。要谈就拿出实实在在的具体措施来，“光说不练”的游戏就不用再玩了。

产业扶持并不只是保护。比如日本在造船业发展过程中曾在很长时期内实行出口信贷政策。谁买日本造的船，日本政府支持下的政策性银行可以给买主提供优惠贷款。

我们上海的宝钢最初也是利用日本的这种政府贷款引进的。日本人也很诡，政策资源也不是滥用的。我们在引进宝钢时，第一期引进有日本政府的优惠贷款，诱惑你签合同。第一期工程只是开头，第二期的资金还不够怎么办？那就对不起，只能从商业银行贷款了。

80年代初期引进宝钢时曾有个事件，当时的冶金部长叫唐克。全国人大开会时被人大代表叫去质询了三天。代表们质疑，我国发展钢铁产业为什么不自力更生，却去借外国钱呢？借外国钱，借政府贷款还不算，为什么还要

借高利息的外国商业贷款？借外国钱还不算，为什么还要专门拿这个钱买外国的设备？买外国设备还不算，为什么建成后还只能吃进口矿？当时很多人大代表就质询，你们冶金部是不是有汉奸，是不是让日本人收买了？后来因为这个事，宝钢的二期引进还停了一阵子。日本又提供了一些政府贷款，我们的设备进口也从单一的日本调整为德国等多个国家，这个事件才算平息。

现在看，日本当时的政策其实并无异常。人家借给你的是政策性贷款，条件就是你得买人家的设备。一方面当时我们的确在引进中缺乏经验，有些吃亏之处。另一方面，我们对人家的政策目标也缺乏了解，把日本促进设备出口的政策当成“友谊第一”了。后来一看没有“友谊第一”的意思，又有些反应过度。当然现在看，引进宝钢是我国钢铁产业发展过程中一个非常正确的决策。

[4-3-3]在一个供大于求的领域中，在市场机制、自发竞争不能导致一个良性结果时，就需要政府政策的介入。一个简单办法就是政府收购过剩生产能力。政府帮助私人资本、市场化的投资力量从过剩领域退出，全社会的总投资规模并不会减少。这比政府直接投资要好得多。因为市场化投资力量可以大大增加经济的竞争活力。

最值得说的，是产业退出政策。在过去很长一段发展时期内，我们对产业政策研究主要集中于培育、保护、扶持等方面。几乎没想过，产业还需要缩减。而且产业缩减的时候还需要政策的介入。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短缺，是发展不足。几乎所有的产业都发展不足。发展、扩张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是我们产业政策关注的主要方面。但是到“九五”计划中期，我们也开始面临一个问题，这就是产业退出的问题。怎么缩减产业规模、淘汰过剩生产能力的问题也摆在了我们面前。这时我们才注意到，原来产业政策还有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叫做产业退出政策。

在日文中，产业退出政策叫做“产业调整政策”。日本人说的“调整”和我们的理解不一样。这个“调整”就是退出。

产业结构的变动是一个各产业此长彼消的相对概念。在全社会资源总量为一定的情况下，一些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上升，一定意味着另一些产业所占比重下降。这种下降经常还会伴随着产业规模的绝对缩减。产业结构升级的道理其实很容易理解。就是把资源尽可能多地配置在对提高本国国民福利最有利的领域，或者能够发挥本国优势、获取更多国际比较利益的领域。股民都知道，自己的本钱是有限的。要想多获利，就得把自己的资金从那些上涨机会小的股票中撤出来，买入价格上涨机会大的股票。国民经济也

是一样。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中，有些资源需要从原有产业撤出，投入到新的产业领域中去。

资源退出的道理不难理解。关键是这个过程需要政府政策介入的理由何在。日本人在他们的产业政策理论中有个解释，叫做防止“市场失败”。

什么叫“市场失败”呢？就是有时候市场机制不仅不能诱导资源向优化的方向流动，反而会进一步推动结构性矛盾激化。

举个例子说。假定因为种种原因，有个产业的供给严重大于需求了。正常情况下供大于求会导致价格下跌，一部分无法赢利的资源、生产能力就会退出这个产业。这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正常情况。

但是这个趋势并不是什么时候都是必然出现的。因为人们在投资时，货币资本已经转换为了实物资本，供大于求时，资产价格一定下跌。因为这个行当不赚钱，没人愿意买赔钱的资产。那么这时投资者就像买股票被“套牢”一样，实物资产无法变回货币资产。

这个时候，谁先退出谁吃亏。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留下，别人退出。别人退出了，供给减少了，价格就会回升。这样供求恢复平衡时自己的投资就可以不受损失。当出现这种僵局时，产业结构的调整就会变得非常缓慢。社会资源长期滞留在一些非优化的领域会造成社会整体利益的受损。

问题到此还没完。在一个供大于求的领域中，很多人会想：怎么才能让别人退出而我留下呢？一个办法就是继续扩大投资，扩张规模、降低成本，或者引进更先进的技术设备来提高产品档次，通过追加投资来提高自己的竞争力，想法把别人挤出去。如果每个人都这样想，结果就是在这个产业中，生产能力不仅不能自动缩减，反而会出现新的一轮扩张。由此导致更大程度的供大于求。这就叫“市场失败”。在市场机制、自发竞争不能导致一个良性结果时，就需要政府政策的介入。

政策怎么介入呢？一个简单办法就是政府收购过剩生产能力。比如说，按原来投资总额打个八折，政府把一部分多余的生产能力买下，长期封存甚者干脆销毁。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如果率先退出的资本损失太大，这个资本就会选择继续扩张而不是退出。就像股民在股价下滑太多，套得太深时，他的选择往往不是“割肉”，而是加仓以摊低成本。如果政府能够出一个减少损失的政策收购价，保护这部分资本的利益，就会有一些资本愿意选择退出。由此就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速度。

有些人可能想不通。资本自己投错了领域让政府买单？就像股民深度套牢后有人出高价收购一样，这不是太不公平了吗？政府为什么要承担这个私人资本投资失误的代价呢？人们还会联想，政府要是有这个资金财力，还不

如直接投入新兴领域去呢。

回答这个问题，就要问问产业政策是干什么的了。产业政策不是取代市场机制由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的政策，也不是和市场机制各自独立地并行配置资源的政策，而是利用市场机制、同时弥补市场机制不足的政策。我们假定政府有100亿元的投资能力，这时的政策资源配置的确有两个选择。一个政府自己直接投资新兴领域，另一个是政府帮助私人资本、市场化的投资力量从过剩领域退出。假定政府把这100亿元用于援助资本退出了，那这100亿元最终会到哪里去呢？最终仍会投入到政策鼓励的新兴产业领域中去。全社会的总投资规模并不会因为政府选择了产业退出政策而减少。但在这种情况下，投资的主体仍然是市场化力量而不是政府。这比政府直接投资要好得多。因为市场化投资力量可以大大增加经济的竞争活力。

日本人在产业结构升级上也曾犯过一个大错误。在60年代初期，日本的炼铝工业生产能力还不到20万吨。由于铝合金材料对传统黑色金属材料的替代过程导致了价格上涨，再加上60年代廉价石油的刺激，日本的铝锭生产能力和同期的钢铁产业一样出现了急剧扩张。到1978年时，日本炼铝生产能力达到了164万吨，成为世界当时第一大铝锭生产国。但是日本是个资源贫乏的国家。日本的铝矾土资源几乎100%要依靠进口。而且发展炼铝工业光有铝矾土还不行，还要有大量的能源供给才行。生产电解铝需要大量消耗电力，日本人形象地称铝锭为“电罐头”。消耗电力又要大量进口石油。这还不算，炼铝还是个污染很严重的产业。显然，日本发展这个产业是个明显失误。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使这个结构缺陷充分地暴露了出来。

日本的产业政策在纠正这个缺陷上发挥了非常明显的作用。日本人在发现炼铝业的缺陷以后，采取了几乎是全面撤退的战略。到1986年，日本铝锭的实际产量降到了14万吨。之所以能够有这么一个快速的缩减，关键在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帮助资本退出的政策。这些政策不仅包括前面所说的政府收购过剩生产能力，而且还有政府收购过剩的库存产品长期封存。哪个企业愿意从生产铝锭转为经营进口铝锭，政府还给若干年的进口免税政策。

我们之所以重点描述日本的产业退出政策，是因为在今后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我国产业政策的重心可能需要从产业培育、产业保护、产业扶持转向产业退出。我们前期的产业结构调整中，仍比较多地沿用了计划经济时期“关停并转”的老方法。比如在1996年的纺织“压锭”、1997年的煤炭“关井”、1998年的钢铁“限产”和最近两年来关停小煤窑、小炼油厂等“五小”的过程中，我们主要采取的还是行政命令的办法。现在看，这个方法已经不能适应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需要了。为什么很多小煤矿明关暗不关？一个原

因是资本无法得到合理的补偿，这些资本就不肯轻易退出。由此不仅带来了结构升级的迟缓，而且实际上政策成本也是得不偿失的。因为这种政策打击的恰好是市场经济下最活跃的投资主体。

当然，日本的产业结构理论和产业政策理论也不是百试不爽。90年代后期的亚洲经济危机之后，产业政策曾受到了国内外很多经济学家的置疑。我国在80年代中后期，曾有一段学习日本产业政策的高潮。但那时，日本自己的学者并不认可对日本产业政策的过高评价。日本的经济学家们共识，日本的经济发展不能否认政府积极干预的作用，也不能否认日本结构战略的成功；但是说到底，第一位的力量还得归于市场机制，而不是政府干预。我在日本学习时，我的教授给我形象地比喻说，日本的经济发展就像是赛马。赛马比赛赢得冠军时，你说主要是骑手的功劳呢，还是马的功劳？实际上是马跑得快。

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爆发后，日本产业政策的一些缺陷集中地暴露了出来。在世界范围内，人们对日本的产业政策形成了一股反思的高潮。其实，如同在前面的专题中说到过的，反思也好，重新认识也好，说到底，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如何处理好市场与政府之间关系的问题。这个关系处理好了，产业政策就是一个好政策。这个关系处理不好，产业政策就是一个不好的政策。

4. 提问与讨论

☆ 企业其实没有自觉遵守诚信义务的动机。企业之所以会注重“诚信”，那是制度外在约束的结果。

☆ 为什么造假账呢？因为技术加速进步导致的资本面临无法补偿的危机。

☆ 竞争就是“狼”。竞争，包括外来竞争，只会造就一个结果，那就是中国产业的突变、升级。

☆ 十多年前我们没有被国外的竞争者扼杀，现在我们成为世界产量第一了，我们倒惧怕起外来竞争了？我想没这个道理。

☆ 赚钱就是核心竞争力。全世界的家电业生产能力为什么向中国集中？因为在中国生产最赚钱。这就是核心竞争力。

☆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严酷的竞争一定会来，产业灾难一定不会来。

☆ 退出政策将成为政策体系新的重心所在。反垄断已成为必然趋势。与城市化相结合的区域经济结构再组合将成为产业政策的新特点。

☆ 我们的房子不是盖得太多了，而是远远不够呀。

☆ 从加快改革的要求看，我们还需要开辟三级市场。就是应当允许人们把实际占有的租赁权也上市流通。

☆ 如果我们在产权竞争中打了败仗，那丢饭碗的就是现在的董事长、总经理们。

☆ 商业资本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可以使生产者不吃亏而消费者又买到便宜货。

☆ 要率先实现现代化，必不可少的一步就是要率先构建现代化的商业体系。

【提问一】：老师刚才提到，技术进步会导致“无形损耗”。这个问题对产业发展的影响是否很大？发达国家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答：这个问题问得好。可以说，这个问题触及到了不断加速的技术进步对全世界社会经济制度的一个重大挑战。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对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尤为重要。

我们从一个大家都肯定听说过的事情讲起。就是美国大公司接连不断的假账丑闻。

2002年6月，美国第二大长途电话公司的世通公司承认夸大盈利达38亿美元。同年7月，美国药品制造业巨头默克公司虚报124亿美元营业收入的财务丑闻又被媒体揭出。这一系列令人难堪的事件不得不让人们发问：美国的大企业怎么了？

人们最容易想到的答案，一个是诚信，再一个是监管。其实，最根本的问题并不在这两个方面。其深层次原因可能比人们的想象复杂得多。

毫无疑问，“假账”是对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诚信原则的背叛。导致这些企业造假的原因首先在于社会出现了诚信缺失。但仅靠提倡“诚信”能不能解决“假账”问题呢？不能。市场经济下的企业都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的。企业其实没有自觉遵守诚信义务的动机。企业之所以会注重“诚信”，那是制度外在约束的结果。

那么靠加强“监管”能不能解决问题？也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因为社会不可能在每一个经济运行环节都在资源支配者背后派一个“监管人”，然后在“监管人”背后再建立一个监管“监管人”的体系。一方面，这样一个依靠监管维持经济运行的制度成本实际上是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承受的。另一方面，客观上也很难保证监管人不被收买以及和被监管方串通。

我们面临的问题，实际上是技术进步对迄今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上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挑战。

如果透过“造假”这一现象层面深入观察，人们便可发现这些大公司的假账事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不是为“逃税”而造假账，而是为蒙骗投资者面造假账。有些造假者为了造得更像真的，还特意按假账收入主动向政府纳税。

不为逃税，那为什么造假账呢？因为技术加速进步导致的资本面临无法补偿的危机。

近年来，媒体、专家不断地告诉人们，现代经济的发展已经走出了依靠自然资源大量投入来支持经济规模扩张的阶段，甚至已经走出了依靠资本要素高度集聚与集中的工业文明阶段。信息资源、“人力资本”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持要素。正是在这样一个普遍认识下，当人们关注于高新科技发

展带来的生产率提高和福利增加时，很少有人注意到“资本”这个传统要素的生存命运。

资本是什么？是用来获取利润的“本钱”。“将本求利”是做生意的最基本常识。在经济学上，资本是个社会“有机体”。资本要获利，首先要生存。资本生存的标志，是在经济活动中在数量上得到充分补偿。通俗地说，就是做买卖首先得“捞回本”。

在工业化和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为适应这种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特点，“摆平”资本要素的利益，人们摸索出了一种社会约定，这种约定叫做“折旧”。就是把资本在机器设备上的投入分摊到若干年的成本中逐步收回。

“折旧”方式的确适应了传统的大机器工业发展。但在高科技产业不断发展的今天，这种资本补偿的方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如同我们前面讲到的，技术进步速度不断加快带来了极其迅速的“无形损耗”。在很多领域，前期研发费用、固定资产投资已经不可能用20年、30年的分摊方式补偿。因为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产品的诞生很快会导致老技术、老产品过时而不再值钱。

其实，近年来技术进步对资本生存命运的挑战可以找到很多例证。为什么世界上很多制造“手机”的企业纷纷声称，他们开发的最新型号产品总是在中国市场上最先推出？因为唯有中国这样一个基数极大的市场才有可能满足在短期内分摊并且收回研发等资本投入的要求。为什么开发最先进的“卫星移动通讯”技术的美国铱星公司在技术上成功以后，在财务上会破产？因为它无法找到足够满足资本补偿要求的市场规模。

我们得注意到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在当今这个世界上，支撑市场经济运行的制度仍停留在工业化阶段的基础上。而在现实中，原有的资本补偿方式已经不能满足资本利益的基本要求，但新的方式还没找到。之所以出现许多世界著名大公司造“假账”的事件，根本原因在于世界还没有找到适应“新经济”的新制度。“世通”公司造假的方式其实很简单，就是把“经常性支出”的账记到了“资本性支出”栏目。通俗说就是，把应当摊入成本的支出还当成投资记在账上。用中国企业更熟悉的语言说，就是“不摊折旧”。不摊折旧不就虚增利润了么？

资本面临无法补偿的危机，于是就“饮鸩止渴”。靠造假账，特别是虚增利润的假账来吸引投资者，以促进资源向这个领域大规模集中。因为离开资源的大规模集中就不可能有新经济。可以断言的是，监管、审计、公司治理实际上都难以应对技术进步的这个挑战。一个极其重大的新问题在考验人类智慧：新经济条件下，资本该怎么活？

【提问二】：我们很多产业核心竞争力还非常弱小，中国入世究竟会不会给很多产业带来灾难呢？

答：我国的产业确实还缺乏充分的市场竞争考验，在很多方面还技不如人。这是事实。但在过去几年关于入世的利弊争论中，我始终持乐观态度。

颇有一些人把竞争视为“狼”，更把强大的外部竞争视为是“狼中首恶”，把入世视为是“引狼入室”。我认为这种认识确实是一种“形而上”的认识，是孤立、静止、片面看问题的认识。

“狼来了”有什么不好吗？人们从对自然界进化规律的研究中早就知道，狼的存在是羊这一物种发展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正是由于亿万年来狼对羊群的不断追逐，不断淘汰其中的病弱个体，羊的群体才得以强壮和进化。如果没有这种强制性的外在淘汰机制，即或有充足的食物供给，羊群也会因退化而自然消亡。这个道理听起来残酷，然而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个规律同样适用于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竞争就是“狼”。竞争，包括外来竞争，只会造就一个结果，那就是中国产业的突变、升级。

大家想想，十几年前中国家电业是在什么条件下起步的？一是几乎一片空白；二是国外厂家从技术设备到营销经验都已经高度成熟。现在怎样呢？现在中国是世界第一的家电大国。从一个没有基础、外部竞争对手极其强大、市场没有等待余地的起点开始，我们是怎样取得这个成就的？没有别的，就是在这个产业中率先引入了残酷、激烈的市场竞争。靠充分的竞争，靠不断淘汰“病弱”个体而使群体趋于优化的竞争，我们就有了现在的家电业。

十多年前我们没有被国外的竞争者扼杀，现在我们成为世界产量第一了，我们倒惧怕起外来竞争了？我想没这个道理。

当然中国的产业也不是没有弱点。但有些弱点也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不堪一击。我们还以家电业为例。我接触到的很多记者说，中国的家电业没有核心竞争力。证据是很多关键元器件仍依靠进口。我说，中国家电业很多关键元器件仍依靠进口不假。但那不是家电业的弱项，那是中国IT产业的弱项。比如大规模集成电路、数字化的芯片、液晶屏幕以及一些程序软件等，都要依赖信息产业的发展。中国不产澳洲大龙虾，我没听谁说这是中国的海鲜大酒楼核心竞争力不强的表现。我到处说的一个观点是，什么是核心竞争力？赚钱就是核心竞争力。全世界的家电业生产能力为什么向中国集中？因为在中国生产最赚钱。这就是核心竞争力。

我们再举个农业的例子。人们说，中国的农产品成本普遍高于国际市场的价格，入世后中国的农业恐怕要全军覆没。我说这叫“杞人忧天”。这个前景根本不可能存在。

中国的农业需要不需要提高国际竞争力呢？迫切需要。发展现代农业、实行农业产业化、不断采用最新的生物技术等。这些都没有疑义。但以中国农业的成本和国际市场价格的简单比较为由，就说中国农业会“全军覆没”，这完全不符合基本的经济学道理。

首先，我们说，中国入世，不仅是中国的供给能力、中国的产业入世，而且还包括中国需求也要同时入世。现在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是中国还在自己生产着所需粮食的情况下的价格。大家想想，要是中国农业真的停产，13亿人都到国际市场上去买粮食，那国际市场还会是现在这个价格吗？

还不止于此。我们前面讲过“机会成本”的概念。国际市场的竞争者要想挤垮中国农业，仅仅是价格比我们的实际成本低还不行。这个价格还得比中国农民的机会成本更低才行。

例如，一个美国农民种地时一天能挣50美元。如果这个美国农民不种地，去找别的工作，他一天最多能挣48美元。这48美元就是这个美国农民的机会成本。你要打垮这个美国农民，非得让他的产品价格低到一天连48美元也挣不到的时候，他才会放弃种地去干别的。现在我们假定一个中国农民种一天地的平均收入是10元人民币。但如果他不种地，连一天挣3元钱的工作也不一定找得到。也就是说，中国农民的机会成本非常低。外来竞争者要想打败中国农业，他就得把产品价格降到中国农民的机会成本以下，降到让农民连一天3元也挣不到的水平。就是在发达国家，把价格降到这种程度也是绝对做不到的。

所以我说，在入世面前，我们的确要认真应对，但绝不要危言耸听。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严酷的竞争一定会来，产业灾难一定不会来。

【提问三】：产业政策说到底是一种政府干预，这种干预和WTO条款是否相容？我国入世后的产业政策主要有哪些变化？

答：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我们必须信守保证市场上公平竞争的这样一个根本承诺。这个趋势是肯定的。

我曾在外经贸部召开的一次WTO研讨会上就中国产业政策的变化趋势发言。我认为，随着改革与开放的推进，中国的产业政策将发生十大方面的变化。

第一，退出政策将成为政策体系新的重心所在。包括区域产业退出、淘汰过剩生产能力、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战略性调整与布局优化配置、政府援助下的资本退出、资源枯竭或可持续发展等原因导致的劳动力退出、减轻就业压力与减少劳动力供给的劳动力市场退出、体制转轨过程中的政府退出等。

第二，将尽量利用市场机制下的产权流动推进资源优化配置。资本运营、

资产重组等实际上都是这一政策趋势的基本体现。过去那种依靠行政力量“关停并转”的结构调整方式肯定会逐步淡出。

第三，反垄断已成为必然趋势。从1998年起，我国已经对石油石化、电信、民航、电力等多个产业进行了市场化重组。铁路的市场化以及“网路分开”也在酝酿中。一方面，哪怕是具有自然垄断地位的产业，也将面临市场竞争的挑战。另一方面，政府政策将在更大程度上体现鼓励竞争和反垄断。

第四，促进工艺设备瞄准世界先进水平的固定资产大规模更新。利用二手设备、“三来一补”等扩张产业规模的弊端已经充分显露出来了。实际上“十五”计划实施以来，我国产业政策已经明显体现出的一个趋势：在产业的进入壁垒中，所有制、内外资等方面的政策性壁垒越来越低，而技术、环保方面的壁垒越来越高。换言之，政策将主要管一件事，投资任何产业都必须能够跨越技术先进性方面的政策门槛。

第五，加大促进集中化、规模经济以及产品结构更新的政策力度，规模起点。在很多产业，产品目录等已经取代原来的“项目审批”方式成为新的产业政策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

第六，短期宏观调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向产业政策延伸。从1999年起，我国的财政贴息支持技术改造等政策已经成为扩大内需的政策体系组成部分。国债项目也日益具有明显的产业指向。

第七，与资本市场的发育密切结合，高新技术产业和重要基础产业都可能获得新的重大发展机会。一方面，为了促进资源向高新技术产业集中的步伐，尽快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创业板”市场已经经过了较长时期的酝酿。另一方面，中国的债市也在静悄悄地萌动，未来十年将是中国债市大扩张的过程。其中大型、特大型企业的企业债必将成为债市大扩张的主要推动力量。以资金密集型的基础产业将获得新的资本积聚机会。利用市场机制推动产业发展和结构升级正在成为新的政策趋势。

第八，与城市化相结合的区域经济结构再组合将成为产业政策的新特点。一方面，政策重心正在从传统的工业领域向旅游、金融、保险、信息服务、网络商务等新型服务业移动，社区经济、假日经济等也成为政策鼓励的新领域；另一方面“首都经济”、浦东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重庆设市、西部大开发等的核心实际上都是区域产业结构的再组合。

第九，与国际趋势相适应，促进就业岗位增加以及促进环境治理将成为援助性、保护性政策重心。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单纯抵御外来竞争的保护性、援助性政策的不断削弱是不可避免的必然趋势。在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方面，新的保护性、援助性政策将着重于提供更多就业岗位方面和实

现可持续发展方面。引入新产业的工资补贴、改善环境、治理污染农户资源的关停补贴或政府收购等将成为国际认可的政策趋势。

第十，大力推进“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的工业化已经走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经济系统内部的资源与市场已经不能满足经济扩张的要求。资源约束已经成为战略发展的心腹大患。中国入世的根本动机是要“走出去”。中国要在国际市场的价格形成与游戏规则制定上要有更大的影响力与发言权。

【提问四】：2003 年以来，有一种舆论说我国的房地产业已经有很大的“泡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答：在局部地区是否已经形成了房地产“泡沫”，那需要具体分析。但从国民经济整体看，我不认同这种警告。

这种警告的理由是什么呢？主要是两条，一条是说目前全国闲置的商品房已经达到若干千万平方米，另一条是说目前的商品房售价严重超过了普通老百姓的购买力。

我看这两条理由站不住脚。闲置的商品房，我们把它叫做“增量资源”。中国的城市化才刚刚拉开帷幕，未来 20 年左右的周期内还将有 4 亿以上的农村居民进城；我们正在进行一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老百姓住房条件的进一步改善显然是“全面小康”的题中应有之义。现在那些闲置的增量资源和这样一个趋势比，哪里就到了“泡沫”的程度呢？我们的房子不是盖得太多了，而是远远不够呀。

问题的核心在于，为什么这些增量资源会闲置？“泡沫”论者说是因为老百姓买不起。这个说法也不符合实际。

我认为恰恰相反，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就在目前的房价下，大多数城市居民也已经买得起、住得起新房子。增量资源之所以出现闲置，根本原因在于大量的存量资源，也就是老百姓现在住的旧房资源还没有真正进入市场，在于住房的二级市场发展远不充分。

为什么说大多数老百姓买得起房子呢？我们想想，现在的城市居民住在哪里了？他们是住在马路上了吗？没有。除很少的“无房户”外，绝大多数人已经住在房子里了。就是说，他们已经占有了一定存量资源。实际上，现在大多数老百姓只需要买多少平方米的房子呢？只需要买 15 到 30 平方米的房子。这样一个增量，人们是买得起的，或者在住房信贷的帮助下是买得起的。人们需要的是以小换大、以旧换新、以远换近而已。

问题在于，人们现在所住房子能不能也按照市场价格进入流通。如果能，

问题就变得非常简单。很多人就会卖旧房买新房。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只需添上有限的钱。不同需求层次的购房者相互交易，现有的增量资源很容易就可以消化掉。我们现在有1.4亿个城市家庭。有20%的家庭增加10平方米住房，我们就得有2.8亿平方米的增量资源才能满足需要。哪里会有什么“泡沫”呢？

存量住房资源不能进人市场的原因还不仅仅是二级市场不发达，还在于住房制度上的旧体制仍在发挥作用。很多人在住房制度改革中已经购买了自住的房子。但在出售时遇到一个问题，当初住房改革时有些单位要求，已购住房出售时必须卖给原产权单位，而且必须以原出售价卖给原产权单位。大家想想，如果现在商品房的市场价是3000元一平方米，你会不会把现住房以1400元一平方米的价格卖回给“原产权单位”呢？

更可笑的是，有些地方还要求，出售已购“公房”必须取得“原产权单位”同意。人们已经连产权买下的住房为什么还叫“公房”？人们已经取得产权的住房为什么还要去问“原产权单位”同意不同意？你买了一台电视机，后来打算卖掉，你需要去问问电视机厂家同意不同意吗？这种严重违背市场经济原则的旧制度痕迹导致了存量资源无法流动，也就导致增量资源的闲置。商品房积压就是这么来的。

实际上，从加快改革的要求看，我们不仅需要发展住房的二级市场，而且还需要开辟三级市场。什么是三级市场呢？就是应当允许人们把实际占有的租赁权也上市流通。现在很多公房的租赁是无期限的。尽管产权是职工所在单位的，但事实上这个产权是无法收回的。由此而来，这个无期限的租赁权，或者叫做居住权就是有价的。不承认这个租赁权的市场价值，实际占有者就不会让出这个资源。在这种状况下，全社会的住房资源就处于了低效率的非优化配置状态。

当然，现在的房价是不是合理呢？总体情况的确是过高。但这个房价过高的根本原因也在于大量的存量资源不能进人市场。我举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90年代初期，首钢提出一个每年上缴利润递增20%的改革方案。怎么保证这个利润递增呢？首钢说只要一条政策就行，那就是计划外的钢材允许随行就市地自销。当时钢材价格还实行“双轨制”。价格“双轨制”就导致了计划外价格的居高不下。为什么呢？我们假定一个企业打算以买100吨钢材，2000元的单价可以承受。如果计划内的指标只有70吨，但计划价格是1400元一吨，那么这个企业按照市场价购买其余30吨钢材时，其价格就可以出到3400元而不突破预算。“计划外”的价格就是这样给抬上去的。现在新房价

格偏高，就是因为旧房资源不能流通导致的。

【提问五】：中国入世时，人们普遍担心的一个产业就是汽车产业。我国的汽车产业有前途吗？中国的汽车市场能在多长时间内支持中国的经济增长？

答：我们先说市场，先说中国的市场有多大，中国需要多少车。我们在2002年就做了一个关于汽车市场的研究报告。我给大家几组数据。

2002年中国的汽车销量同比增长了36%，其中轿车销量增长了51%。这是一个让全世界汽车厂家垂涎不已的增长速度。把中国的销量加上，全世界2002年的汽车销量只增长了2%左右。也就是说，2002年全世界汽车市场上销量增长的部分主要在中国。这是第一组数据。

2002年中国汽车销量大增，也只不过卖出去了310万辆。可以相对照的是，2002年美国经济不景气，而且美国人口只有中国的1/6，美国人买车只是更新，没有新的需求增量，美国卖出多少汽车呢？卖出1100万辆。大家可以想想中国的汽车市场还有多大潜力吧。如果我们的人均汽车保有量达到美国现在的水平，需要全世界的汽车生产能力专门为中国生产26年半。这26年半中全世界的人都不买车，而且也不更新才行。这是第二组数据。

世界最大的汽车生产厂商，美国通用的总裁前不久说，他原来估计中国到2025年时汽车年销量可能会达到1000万辆，现在看这个时间表至少要提前10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产业部有个研究报告，认为10年左右的周期内中国的汽车保有量将达到1亿辆。我们现在的汽车保有量是多少呢？是1800万辆。据此推算，要在10年后有1亿辆汽车保有量，从现在起，我们得平均每年卖出1300万辆汽车才行。按照国际经验，汽车平均是7年一更新。家庭用轿车的更新时间会长一些，货车短一些。平均每年达到这样一个销售量，除去更新后，我们才能在10年后有1亿辆的汽车保有量。我刚才说过，2002年我们汽车销量大增，也才不过卖出去310万。换个算法，我们此后的销售量得按照2003年500万辆，2004年800万辆，2005年1200万辆这样的速度增长，10年之后我们才能有1亿辆的汽车保有量。这是第三组数据。

根据国家统计局每年发布的城市居民抽样调查统计资料，目前我国的城市居民中有超过20%的家庭现在就买得起、用得起私人轿车，或者在汽车信贷的帮助下买得起或者用得起车。20%家庭的划分标准是什么呢？家庭金融资产存量在10万元以上，或者家庭月收入稳定在5000元以上。按这个标准，20%城市居民家庭可以达到。这个估计是不过分的。那么中国城市居民家庭的20%是多少户呢？是2640万户。不算农村，2600多万户家庭现在就买得起私人轿车。我国2003年一年才不过卖掉了100万辆轿车。你说中国的汽车产

业还有多少年可以挂“高速档”？这是第四组数据。

很多人担心我国的市场会为进口车所占据。其实这种担心不必要。外国厂家就是想抢占中国市场，也得到中国来生产才行。商品输出在上个世纪前半叶就已经过时了。现在国际资本从发展中国家获取国际比较利益的基本方法是资本输出。

我们真正担心的不是汽车市场上的产品竞争，而是汽车产业中的产权竞争。我曾经在“二汽”和其他一些汽车产业的研讨会上讲过，入世以后，中国的汽车产业是不是会被挤垮？这个问题车间主任以下的不必担心。因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汽车产业的生产规模一定会持续地扩大。现有汽车生产能力都会有人来收买。

大家可以看到，在过去两年中，日本汽车企业大幅度地调整了他们对华投资战略，异常积极地和我们的汽车生产厂家合资合作。和广汽合作的法国人不干了，日本的本田立即接班。现在一汽已经和丰田全面合作。二汽也和日产要在集团公司的层面合作。需要担心的是那些高层管理者。如果我们在产权竞争中打了败仗，那主导中国汽车生产的就不再是中国的出资人，而是外国的老板。那时丢饭碗的就是现在的董事长、总经理们。

【提问六】：现在有个争论，有人说我们过度重视商业了，曾有一段是“全民经商”；也有人说，我们从计划经济时代到改革开放时代一直不重视商业，而中国的真正弱项恰好是商贸流通业。在中国未来的战略发展过程中，商业处在什么样的战略地位呢？

答：的确有这样的争论。媒体上经常见到的一个说法是，美国“沃尔玛”一家的销售额比我们全国所有大型百货店的零售商品总额加到一起还大，这样的国际大企业进到中国来，我们的商业肯定无路可走。还有人把零售业的问题抬到国家经济安全的高度，坚决反对在商业，特别是零售业对外开放。

我看这样的认识是反应过度了。一种商业业态永远垄断不了全部市场。就是在美国，人们的大部分消费需求也并非是“沃尔玛”一家满足的。就单说连锁超市，美国也有很多家。我想，“沃尔玛”把中国的市场全占了的可能性是根本不存在的。

但是，我们迄今对商业的战略地位认识的确有不充分的地方。在新的战略发展过程中，我们应当重提“重商主义”的思想，格外重视商业在发展与改革过程中的作用。为什么要提出“重商”呢？有以下的理由。

第一，商业的再振兴对扩大内需至关重要。

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已经从供给领域转移到了需求领域，经济增长

的动力来源已经从产业与供给扩张转变为需求拉动。要实现国民经济继续保持较高增长速度这一目标，关键要依靠扩大内需。这个问题已经没有多少争议。

但人们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发现，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连接障碍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供求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我们现实的经济运行中，为什么关于“垄断价”的争论总是持续不休，而诸多领域中“价格大战”又总是此起彼伏呢？因为生产者的供给价格与消费者的需求价格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在这两个价格之间缺乏一个缓冲和协调的主体。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个主体就是独立承担流通风险、降低交易成本的商业资本。商业资本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可以使生产者不吃亏而消费者又买到便宜货。用理论语言概括就是，可以起到使供给价格与需求价格趋于协调、衔接的作用。扩大内需，不仅要启动有效需求，而且要振兴商业资本。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在中国的电视台中，商家广告取代厂家广告“标王”地位之日，就是扩大内需战略的真正实现之时。

第二，商业的繁荣是提高城市资源价值的根本措施之一。

传统上人们认为，商业的存在价值就是可以降低把产品送到消费者手中的社会流通费用。但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特别是在城市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人们正在逐步认识到，商业的作用还在于提高城市资源的自身价值。为什么香港营业员的收入要比内地城市高出许多倍？并非因为香港营业员销货过程中的递拿效率比内地营业员高多少，而是因为香港的经济发展水平，其中特别是商业发展水平使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要素价值远高于内地。

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措施之一是推进城市化。我们的城市化不仅要依靠新经济增长点，而且要依靠商业繁荣带来的土地、房产、劳动力以及基础设施等要素的普遍升值。

第三，商业的发达与成熟已经成为现代化的基本标志。

现代化的重要外在标志之一，就是要有高度发达、成熟的商业体系。一个已为国际经验所证明的基本规律是，几乎所有经济发达的现代化城市都是商业高度发达、成熟的城市。为什么？因为唯有流通活跃，经济才有活力、要素的不断流动与重新优化配置才能充分实现。对那些经济较发达地区来说，要率先实现现代化，必不可少的一步就是要率先构建现代化的商业体系。

第四，现代商业的发展是新经济的重要体现。

目前恐怕已经没有人怀疑，将最先、最大规模地跨入“网络时代”的传统产业将是商业。显然，发展电子化、网络化的现代商业就是在“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就是在发展“新经济”。

第5讲

中国资源战略

ZHONGGUOZIYUANZHANLUE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打击伊拉克的战争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萨达姆知道，布什知道，其实世人都知道，美国人是冲着伊拉克的石油资源来的。实际上，这场战争的参与者并非只是美、英和伊拉克。世界上的大国，包括俄罗斯、德国、法国、日本，也包括中国，都已经参与到这场资源战争中去了。尽管这里面的角逐有的是半明半暗，例如俄、法、德的参与，有的是表面看不见，例如日本和中国。但这个角逐的激烈程度决不亚于我们在电视画面上每天见到的，在航空母舰、巡航导弹，精确制导导弹等威胁下的巴格达。在一个没有硝烟的领域，正在进行着一个为获取有限资源所进行的竞争与对抗。

我们今天这一讲就讨论资源。以下我们会逐步对战争等表面现象背后的对抗进行解析。

中国入世前后，关于“挑战与机遇”的问题讨论了有三年多了。我先问个问题：中国为什么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得出很多结论。但有一个问题不能忽略，中国的工业化已经发展到必须突破有限资源的限制、获取更大资源支持的阶段了。

机器体系的普遍应用带来了生产效率大规模提高。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有一个依靠大规模自然资源投入支持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本国有限的资源和市场往往难以满足经济继续扩张的要求。从更大范围内获取资源、获得市场成为经济继续发展的必要条件。这是一个符合规律的现象。

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发达国家工业化走过的道路。早期的工业化国家为什么去掠夺海外殖民地？因为要满足机器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资源要求。在19世纪后期的“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工业化开始起步。其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目的，就是要获得支持其工业化的资源。

我们今天也走到了这样一个不可回避的历史阶段。我们自己的资源禀赋已经不可能继续充分支持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我们怎么办？我们不可能重走发达国家的掠夺之路。我们也不能指望20世纪50年代后期世界“石油大发现”的历史机遇重现。唯一的办法，就是更大程度地参与国际市场，通过符合游戏规则的交换来分享全球的资源。

1. 我国自然矿产资源的基本状况

☆ 中国实在算不上一个“物博”的国家，应当说我们是一个自然资源匮乏的国家。

☆ 我国支持工业化的45种主要矿产品中有25种是严重短缺的。

☆ 未来我们要用只能增长30%左右的能源来支持国民经济增长300%。

☆ 如果中国的人均石油消耗量达到美国的水平，把全部后备资源都采出来，只够用1年零3个月的。

☆ 我国的人均石油资源占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1%，天然气资源人均储量只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左右。

☆ 8到10年左右的周期内我国的石油需求中将有一般以上依靠进口才能满足。

【5-1-1】我国国民经济的战略发展有个心腹大患。这个心腹大患就是，我们所面临的资源约束比任何一个大国在工业化过程中所受到的约束都要大得多。从目前的勘探结果看，一个基本结论是，我国支持工业化的45种主要矿产品中有25种是严重短缺的。

一个国家的资源禀赋是不可改变的自然状况，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实。

当初“上帝”决定自然资源在地球上的分布时是很不公平的。我们知道非洲有个国家叫南非。不知为什么，“上帝”把最值钱的几样东西都留在了那个地方。这个4500万人口的国家，黄金储量占全球总储量的35%，居世界第一。钻石储量居世界第五。还有造原子弹的那个铀矿，南非储量居世界第四。人所共知，这些都是最昂贵的矿产资源。另外，这个国家的钒资源占到世界储量的44.5%，铂族金属储量占55.7%，铬矿占68.3%，锰矿竟然占到80%。都是世界储量第一，可以说居绝对垄断地位。人们熟悉的一些支持工

业化的主要矿产资源中，南非的铁矿石在全世界居第九位，铜居第十三位。其煤炭资源超过全球储量的1/10。不足全世界百分之一的人口占有了这么多的优质资源。

我们前面提到过一个叫做文莱的亚洲小国。这个国家只有27万人口，却拥有1.8亿吨石油储量，40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储量。其人均石油储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0倍，是我国的140倍；人均天然气储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60倍，是我国的1380倍！这个国家的国民从不用缴税，终身享受免费医疗，孩子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甚至出国留学都实行免费教育。

那我们中国的资源状况如何？

我们从小学起，老师就告诉我们，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现在我们得对这个概念有个纠正。

中国地大，960多万平方公里。不论在世界上怎么排序，中国属于国土辽阔的大国，这没有什么争议。

中国的人口众多，是世界第一的人口大国，这也毫无争议。目前我国有13亿人口。印度近些年来人口增长很快，现在超过10亿。有专家估计印度人口在若干年后要超过中国。这个超过也没有什么特别意义，说明不了经济的发达程度。

中国的历史文化悠久，这也无人否认。目前全世界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说华语的。将来计算机的统治语言究竟是什么，恐怕现在还很难说。中国的经济强盛必将带来文化的强盛。曾有人断言，说中国的汉字在互联网时代已经没有出路。我看这个说法没有任何科学根据。汉字可以用表形、表意和表音等多种方式同时传达信息。在全世界所有的文字中，中文所传达的信息量是最大的。现在联合国所使用的七种官方语言中，在各种版本里，中文版的一定是最薄的。大家如果看过英文小说就会发现，英文小说的字比中文字小得多。即使如此，同一本小说的英文版也比中文版厚得多。这还只是说文字。如果说词汇，那么中文的词汇之丰富，在全世界就更无可比拟了。

也正是由于中文词汇的丰富多彩，才让我们的政策有了掩饰某种东西的机会。比如我们就有了“失业”和“下岗”、“待业”的区别。这个区别“老外”怎么也闹不明白。当然这个区别有没有意义则另当别论。“老外”就是个新词，就是个生活与时代的创造。昨晚的电视节目中有个对《现代汉语大词典》编辑的采访。这个语言专家说，现在是中文词汇的“大爆炸”时期，许多新词汇日新月异地进入我们的生活，以至于《现代汉语大词典》都来不及编入，只好在后面加附页。现在附页都占到正文的1/3了。

文字、文化也是一种资源。这个资源的深厚程度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对

象。我们重点说自然资源。

说到自然资源，我们不得不坦言，中国实在算不上一个“物博”的国家。不仅“物”不“博”，应当说我们是一个自然资源匮乏的国家。

人类生存要依赖于两个最基本的资源。一个是水，一个是土地。

从水资源看，我国是世界上13个贫水国之一。我国的淡水总资源虽位居世界第六，但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人均的1/4，居世界第121位。我国的北部和西北很多地区，最大的经济发展难题就是缺水。我到新疆很多地方看过，那里绿洲和荒漠的区别就在于有没有水。我们的很多重要经济中心城市、工业城市都依靠对地下水的“超采”来维持运行。目前我国有400个城市存在供水不足，缺水量达60亿吨。农村居民生活和农业也严重缺水，目前农村居民有4300万人饮水困难，农作物供水不足，每年平均干旱面积达4亿亩，缺水300亿立方米。正因如此，大家可能听说过，我们不得不启动一个非常巨大的可持续发展工程，叫做“南水北调”。把长江水调到北方一些地区来。

国土面积不等于可经济利用的土地，特别是可耕地。中国的国土面积中，高山、荒漠化地区等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占大多数。在现在正在进行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中，我们不是要把东部地区的人口西迁，反而要努力把西部一些自然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的人口迁出来。我国的最大国情是人多地少。我国目前的耕地面积只占全世界耕地资源总量的7%。而我国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2%。不仅如此，我们今后的发展方向还不能是开垦荒地，还得把大量的土地资源“还荒”。非如此不能实现我国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正在制定一个新的科技发展战略。在这个新战略中，最大的科技发展新方向之一，就是如何实现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协调。我们正在论证怎样把内蒙的230万牧民从草原上撤出来，全面“休牧”。

土地资源、水资源还不是我们重点要说的。我们重点要说的是和工业化关系密切的自然矿产资源状况。

我国国民经济的战略发展有个心腹大患。这个心腹大患就是，我们所面临的资源约束比任何一个大国在工业化过程中所受到的约束都要大得多。从90年代后期的“九五”计划以来，我国在资源勘探上的投入力度和规模是比此前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大得多的。不仅投入大，取得的成果也是最多的。但是即或如此，我们还是得承认，我们的自然资源是相当匮乏的。

从目前的勘探结果看，一个基本结论是，我国支持工业化的45种主要矿产品中有25种是严重短缺的。

支持工业化的这45种矿产品并不是我们自己定的，是全世界公认的。这些完成工业化不可缺少的资源包括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石油、煤炭、稀土

等多方面。在这其中，我们有25种是严重短缺的。而且这25种还不是小矿种。每一样都是致命的、至关重要的。

在前几讲中我们曾多次提到钢铁工业。早在2000年我国的钢产量达到1.2亿吨时，专家就提出，按照这个产量，我们的铁矿石将有超过1/3的部分需要依赖进口。2002年时我们的钢产量达到1.8亿吨，和2000年相比增长了50%，我估计铁矿石的供给中至少有一半是靠进口解决的。

中国的钢铁业需要依靠进口矿石，这不是短期、偶然的现象。从长期看，更多地吃进口矿是已成定局之势。为什么呢？这不仅是因为我们的铁矿资源少。中国的铁矿资源虽然少，但还是有一些的。铁矿的储量比石油还是强一些的。但我国铁矿中大多数的品位低，杂质多，无法满足生产高精尖产品的要求。在我国的铁矿储量中，难以直接利用的贫矿占到95%以上，含铁平均品位只有33%。

我国铁矿资源的这个缺陷，我们在20年前就知道。这就是80年代初期建的宝钢为什么“吃”进口矿的原因。目前世界上铁矿资源富集的国家主要是澳大利亚。我们的优质铁矿石主要是“澳矿”。

在金属矿产资源中，铁矿石的短缺还不是最严重的。我们的有色金属资源比黑色金属更不乐观，除了少量的小金属我们富裕一点外，铜、铝等大量需要的矿产资源我们都是匮乏的。

人们现在很少关注到铜这种金属。实际上我国现在有2/3以上的铜需要进口。乐观估计也在60%以上。中华民族是最早学会钢的冶炼铸造技术的。但是现在我们的铜资源已经非常短缺了。目前，我国钢矿保有储量6300万吨左右，其中可利用储量只有3500万吨。有研究报告估计，未来10年内中国钢的累计需求量可能要达到3000万吨，未来20年的累计需求量可能要达到8000万吨左右。目前已知范围内，我国铜资源的人均储量只有13.2公斤。这个指标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8%，俄罗斯的10%，相当于美国的8%，加拿大的4%。

不知道大家对铜这种资源的重要性有没有一些了解。前不久，我曾在有色金属协会，就是以前的中国有色集团，讲资源战略时讲过一个“铜文化”的问题。我们可以发现，人类文明史的每一次重大进步几乎都是和铜的发现、铜的开采和铜的利用联系在一块儿的。

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真正的农业文明是从人学会使用金属工具才开始的。在农业文明的起步阶段，最初的金属工具是什么呢？是铜器。宗教文明的产生也和铜器的应用密切相关。农业文明产生以后，人们开始系统地思考人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由此就有了具有哲学意义的、系统化的宗教。在几

乎所有这些宗教中，最初作为人“天”对话的媒介就是铜器。人把想对“天”、对自然、对神、对故去的人说的话铸刻在铜器上作为祭器。我们知道中国有一种古老的乐器叫做“编钟”。“编钟”既是祭器，也是乐器。最早的有音阶、韵律的乐器也是铜器。最早的这种乐器并非是奏给人听的，而是奏给“天”、奏给神听的。也是人“天”对话的媒介。

金属工具的诞生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人类生产的产品开始出现了剩余。于是就产生了交换。在物物交换的发展过程中，人们逐渐创造出了一个伟大的文明结晶。这就是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货币的产生极大地促进了交换和分工的发展。没有货币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市场经济。但最初能够在更大范围流通的、社会统一的、制度化的货币是以铜为原料的铸币。人类以前用的货币是什么呢？是贝壳、羊皮等。这些都不具有制度化的意义。统一铸制的铜币使货币的内在价值量有了社会的共同约定。人们在铜币上面铸上国号、重量、成色等，使货币具有了社会公认的权威性，使这种等价物为社会所普遍认可。

我们在前面说过，发电的技术早在18世纪80年代就诞生和为人们所掌握了。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电力并没有迅速普及。为什么呢？因为电力的普遍应用受到一个制约，就是电力输送的问题难以解决。人们已经知道铜是造电力输送导线的最好材料，但找不到足够的铜来满足这个需求。直到在赞比亚、智利等非洲、南美洲殖民地大规模的铜矿发现以后，铜的价格大幅度下降，人们才真正开始使用铜导线和实现远距离输送电力。

大家知道，电力的普遍应用是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但世界上的铜资源还是太少，人们就开始寻找替代品。在最初发现铝可以在电力输送上取代铜的时候，铝的价格比白银还昂贵。直到后来人们又发明了电解铝技术，铝导线才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铜。

再举个例子。人们看《甲午海战》等反映清朝社会现实的电影时都会注意到，那时的大炮炮弹都是圆圆的，像个大中药丸子，没有弹壳。士卒把炮弹从炮口塞进去。用火把一点，砰的一声打出去。这种炮弹打不多远，也没有多少准确度。直到人们找到铜这种金属，造出了铜弹壳，我们才有了近、现代意义的热兵器。也就是人们后来看到的，一搂扳机就能打的、能够瞄准射击的枪炮。只有铜这种金属才能满足造后膛击发的子弹、炮弹的要求。迄今除了榴弹式的武器自己向后喷火，其他热兵器的情况没有多少变化。

人们现在热衷于讨论的IT产业发展其实也和铜的应用有不解之缘。微电子业的“微”最初是靠铜的物理特性才实现的。在电子业的发展过程中，人们最先发明的是真空管，就是像小灯泡那样的电子管。后来发明了晶体管。

晶体管使元器件的体积大大缩小了，那电路板的体积怎么缩小呢？人们发现铜具有很好的压延性和化学性能，就用铜来制造印刷电路。线路印在很薄的铜箔上，然后用溶液将不用的部分腐蚀掉，就得到了不用导线、不用焊接的完整的电路板。印刷电路使得生产率大规模提高。集成电路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铜这么重要，但令人失望的是我们这些年来一直没有找到足够的铜矿资源。除了传统的江西铜矿资源外，我国第二大的铜矿资源在西藏。

有色金属中另一个大宗需求是铝。我们的铝土资源比铜矿还短缺。我国人均铝土矿资源只有283公斤，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7.3%。而且我们自己的铝土矿几乎全部为很难选、冶的硬铝石。目前我国的氧化铝需求已经有1/3靠进口。而且在10年左右的周期内，铝的需求中将有一半以上依赖于进口才能满足。

【5－1－2】未来我们要用只能增长30%左右的能源来支持国民经济增长300%。在我国的一次能源构成中，煤炭占将近70%。在国际经验中，还没有一个大国是以煤为主力能源完成工业化的先例。别以为我们的煤很多。我国的人均煤炭资源占有量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略多，55%左右；只相当于美国的1/10。

下面就要说到人们最关心的能源，特别是石油了。

从80年代初期开始，我国在“六五”、“七五”和“八五”的连续几个五年计划中都明确规定要重点发展能源产业。到“九五”中期，也就是1998年以后，令人们始料未及的是，我国国民经济中出现了一阵能源过剩现象。煤炭过剩、电力过剩。由此导致了我们在“九五”后期煤炭“关井”的结构调整政策。

一段时期来的能源过剩现象是不是表明中国的能源问题已经解决了呢？远没有解决。从中、初期看，不论从总量上还是从结构上，我们的能源仍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大隐患。

我国目前的一次能源总产量是14亿吨标准煤。标准煤是把各种一次能源形式，例如煤炭、石油、天然气、水电、核能等都按热值折合后的一种计量单位。我们在未来20年左右的周期内，还要实现国民经济再翻两番。但届时我国自己的能源产量最多只能增长到18亿吨标准煤。也就是说，未来我们要用只能增长30%左右的能源来支持国民经济增长300%。以这么小的一个能源增长规模来支持那么大一个国内生产总值的扩张规模，这令我们不仅没有十足的把握，而且非常担心。这还只是总量。

在我国的一次能源构成中，煤炭占将近70%。油气能源加在一起只占23%略多。“以煤为主”的结构是一种很不利的能源结构。在国际经验中，还没有一个大国是以煤为主力能源完成工业化的先例。

很多人都知道，与其他能源形式相比较，煤是一种低热值、高污染、高运输成本的劣质能源。煤的能源转换形式也比较麻烦。为什么在工业化过程中人们造出了“汽车”而没有造“煤车”呢？因为汽油可以灌进油箱，液体形式可以很容易地自流和雾化。而煤无法实现这些。从长远看，要提高我国国民经济的运行效率，提高油气资源所占比重恐怕不可避免。一个简单道理，内燃机车就是比蒸汽机车拉得多、跑得快。

煤这种能源形式有很多缺点，但大家别以为我们的煤很多。我国的煤炭资源储量还是比较大的，但我们的人多。按照人均水平一算，我国的人均煤炭资源占有量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略多，55%左右；只相当于美国的1/10。

【5－1－3】我们的石油资源人均储量是2.6吨，世界平均水平是23.5吨，美国是13.1吨；我国天然气资源的人均可采储量是1074立方米，世界平均水平是24796立方米，美国是16843立方米。也就是说，我国的人均石油资源占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1%左右；我国天然气资源的人均储量也只是世界平均水平4%左右。

在我国的资源禀赋中，对国民经济威胁最大的是油气资源的短缺。

大家很关心我们目前石油的供给状况。2002年，我们进口的石油总量是7000万吨，同时我们出口了1000万吨，但我们当年进口成品油达到2000万吨，自产石油是1.6亿吨。也就是说，我们有1/3的油是依赖进口的。

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石油供给中的短缺状况会越来越严重。从长期看，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如果海上石油有明显的突破，到2010年时我们的石油产量可能会有微弱的正增长。如果海上石油没有大的进展，我们最乐观的预期也就是保住这1.6亿吨产量。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后备资源可采。现在即便我们加大开发力度，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石油产业中去，石油产量也很难增长。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尴尬之处。

从理论上来说，我国已探明的石油储量为220亿吨。但是已探明储量并非都是可采的。我们已探明可进行工业开采的储量只有65亿吨。65亿吨是个什么含义？我们有13亿人口。用人口数一除，我们的后备资源只有人均5吨。

人均5吨又是个什么概念呢？给大家一个参照系。美国有2亿多人口。

不算其他一次能源形式，美国一年消耗的石油总量是9亿吨，人均消耗4吨。就是说，如果中国的人均石油消耗量达到美国现在的水平，我们把全部后备资源都采出来，包括边角余料都采出来，也只够我们用1年零3个月的。

我们前面说过，我国的煤炭资源人均储量仅比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略高，为55%。煤炭的情况要比油气资源好得多。我们的石油资源人均储量是2.6吨，世界平均水平是23.5吨，美国是13.1吨；我国天然气资源的人均可采储量是1074立方米，世界平均水平是24796立方米，美国是16843立方米。也就是说，我国的人均石油资源占有量只有世界平均的1/10略强一点点，11%左右。在“九五”计划期间，我们发现了一些较大的气田，天然气储量增长还是比较快的。这才有了“西气东输”这样一个概念。但即便如此，我国天然气资源的人均储量也只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25，4%左右，少得可怜。这就是我们的后备资源状况。

我刚才说，未来10年左右的周期内自产石油的最乐观预期就是保住目前的1.6亿吨。这个“最乐观预期”，还得是不计成本地开采的情况下才能实现。

大家知道，国际市场的油价是经常变动的。有时候变动幅度还非常大。不计成本的含义是说，哪怕国际油价低过我们自己的成本，我们也得自己开采的情况。现在，海湾地区石油的平均成本是每桶5～7美元，我们最好的主力油田，大庆油田的开采成本是17～19美元一桶。国际油价跌到17美元以下时，我们的油井绝对亏损。石油产业的成本不像一般的工业生产。采掘业的成本高低不仅取决于工艺、设备、管理等因素，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然条件。例如石油储量的丰富程度、埋藏的深浅，是早期的开采过程还是后期的开采过程都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大庆油田是我们最大的主力油田，年产5000万吨油。但经过近40多年的开采，大庆油田已经到了开采后期。现在相当多的油井要靠注水加压才能把油采上来。有的单靠注水都不行了，要靠注化学试剂才行。由此采上来的90%是泥浆，得二次分离才能拿出一点油来，成本很高。

最近一些媒体说我们在西部地区发现很多资源。的确是有一些发现。目前我国的新疆年产石油2000多万吨。乐观一些估计，10内可提高到2400到2600万吨。媒体经常提到的塔里木油田是我们新开发的较大油田。但大家要知道，塔里木油田只是500万吨级的油田，而大庆油田是5000万吨级的油田。大庆的油层深度在1200米左右，而塔里木油田要打6000米深才开始见油。6000米什么含义？垂直向地下走12里地。而且塔里木油田的开采条件非

常严酷，油采出来以后要经过自然环境很恶劣的漫长戈壁滩、沙漠地区，输油管道还需要在沿途不断加温、加压，才能把油送出来。显然，新油田的成本也是极高的。新油田替代大庆这样的已经进入衰退期的老油田的可能性几乎没有。2010年以后，中国的石油产量肯定是递减的。

【5－1－4】保守估计，到2010年时中国的石油需求量将达到3.2亿到3.5亿吨。也就是说，8到10年左右的周期内我国的石油需求中将有一半以上依靠进口才能满足。更远一些，2020年时中国的石油需要量可能要达4.5亿到5亿吨。那时我们每年至少要进口3亿吨石油。

我们自己的石油供给能力若此。那我们的需求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目前看，在2005年或者略晚一点的时间，我们的原油进口量就可能突破1亿吨。保守估计，到2010年时中国的石油需求量将达到3.2亿到3.5亿吨。也就是说，8到10年左右的周期内我国的石油需求中将有一半以上依靠进口才能满足。更远一些，2020年时中国的石油需要量可能要达4.5亿到5亿吨。那时我们每年至少要进口3亿吨石油。

为什么说这个估计是“保守”的呢？因为这个预测是在2000年时做的，虽然后来不断修正，但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没有估计在内。哪两个因素呢？一个是“汽车进家庭”引起的油品需求增长。另一个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改善环境的要求引起的能源需求结构变化。

从1998年开始，为了寻求扩大内需的新思路，我们一直在不断地研究新的消费热点问题。当时很多人提出，应当提倡“汽车进家庭”。但这个意见未获通过。“汽车进家庭”是2001年才写进“十五”计划的。大家看到，2002年中国的汽车“元年”已经启动。开汽车就得有油。由此带来的油品需求必然会呈现出一个长期的增长态势。

在过去几年中，北京“申奥”成功，上海“申博”成功。由此带来，我们的一些大城市正完成向国际化大都市的转变。这个转变的内涵之一，就是要实现国际标准的环境状况。要实现这个环境状况，基本措施之一就是用高热值、低污染的优质能源取代那些低热值、高污染、高运输成本的劣质能源。也就是要调整区域能源消费结构。这个调整，不可避免的趋势之一就是“煤改油”。

大家知道，北京在“申奥”时，国际上的反对势力主要就两条理由。一条是“人权”问题。这个是政治问题，我们不去说它。实际上奥运会的宗旨之一就是超越政治、宗教、种族、意识形态等的体育竞技。把这个理由和

“申奥”连在一起是没道理的。另一条就是北京的环境污染。这一条可确确实实是我们的弱项。现在，在北京工作的外籍职员都由公司发给很高的环境补贴。为什么呢？因为人家说，你北京的空气质量太差，到北京工作要付出很高的健康代价。为了“申奥”成功，我们是向国际奥委会作了承诺的。我们保证说，一定在2006年之前把北京的空气质量改善到符合国际标准，国际奥委会认可的程度。这个承诺是一定要兑现的。不然人家可以终止你的举办权。

实际上，北京从“申奥”成功之前就已经开始采取措施了。措置之一就是用低硫原煤取代高硫原煤。但从执行的结果看，到2002年冬天，空气质量改善的效果远不理想。所以北京又出台了一个政策，要求在未来3年左右的周期内彻底淘汰烧煤。要么烧气，要么干脆用电。包括民用和工业锅炉。2002年冬天北京鼓励用电取暖，夜间用电取暖电费半价。

其实，这个趋势并非是北京、上海才有。我们的很多大城市都已经开始致力于改善自己的环境状况。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由此带来的“煤改油”的趋势还没估计在上述预测之内。

2. 世界石油市场上的基本竞争格局

☆ 一个相当明确的基本判断是，世界有油卖，中国有钱买。

☆ 更多利用海外资源，我们已经具备了充分的物质基础。

☆ 我国有32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其实这意味着人家从我们这儿拉走了价值3200多亿美元的实物资源，然后给我们打了一张欠条。

☆ 那些过度渲染战争对石油供给影响的舆论，我们有理由怀疑他们是些“油托”。

☆ 国际油价巨幅波动的实质是西方大国在力图利用市场化手段争夺资源控制权。

☆ 威胁我国石油安全的首要因素不是战争，不是短缺，而是价格风险。

☆ 让国际油市的供给大规模增加，这就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

【5-2-1】一个相当明确的基本判断是，世界有油卖，中国有钱买。目前全世界的石油生产能力大约为33亿至34亿吨。即或考虑到中国以及整个亚洲的石油需求增长，世界石油生产能力仍是能够满足供应并且有余的。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世界石油市场供给增长的因素要明显多于需求增长的因素。

我们自己的自然资源匮乏，今后必将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依赖进口。买资源是不可避免的。那我们能不能买到呢？买资源会有什么弊端吗？国际市场上究竟能否有我们买资源的余地呢？我们现在就给大家介绍一些这方面的信息。

国际能矿产品市场涉及的方面很广。我们这里主要以最典型的国际石油市场的情况为例来说明。石油也是过去几年和当前人们关心的热点。国际油市也是我们关注最多的市场。

我们要依赖国际市场买油，这就引发了一个经济安全的问题。在过去几年中，就“石油安全”的问题，各个部门不知道开了多少研讨会。包括中央一些研究机构、国家计委、经贸委，也包括参与石油市场的各大石油石化集团，也包括外交、军事以及其他一些在国外工作的信息部门。

有一次在某个部门的会议上，对方说，在石油这个重大问题上，我们能帮助做些什么呢？我说，这很容易，就请贵部门多派出一些“酷”小伙儿，去和国际石油大亨们的闺女们谈恋爱，我们的石油供给就安全了。这当然是玩笑。但早在十余年前的上次伊拉克战争时，我们的军事专家们就确实严肃地提出过，如果中国的石油进口量要达到1亿吨，我们需要有一支具有足够续航、护航能力的远洋舰队才能保证海上石油通道的安全。如果中国的石油进口量要达到3亿吨，我们必须具备打赢一场像海湾战争那样的局部石油战争的军事实力才行。

大家知道，在国际海域上对石油安全构成威胁的不光有外国的联合舰队，还有复杂的国际势力，比如恐怖分子、国际海盗集团等。经常有一艘万吨轮在海上航行中忽然失踪了，过几个月又改头换面在某个海港出现了的事。船员都被杀害了。大家如果注意报纸就会知道，过去两年中中国海军远洋出访的消息一直不断。到加拿大，到欧洲。其意义是向世界宣示我们海军力量的续航能力。

这些判断是军事专家的判断。我们不去论证这方面内容。但石油确实是全世界所有经济、政治势力争夺的战略物资。全世界每年的石油产量只不过是33亿吨。中国要进口3亿吨，这个石油利益在整个世界石油利益格局中所占的比重是比较大的。我们对这个利益的安全性当然得有充分的估计。但我们需要有一个判断。目前对我国石油安全威胁最大的因素究竟是什么？是战争和武力吗？不是。在过去四年中，对我国石油安全威胁最大的因素是国际市场的价格风险。我们首先要考虑、要研究的是“买”油，而不是去“夺”油。我们首先需要研究市场。

中国的国民经济必须发展，中国老百姓必须过好日子，我们必须奔小康。谁也不能阻止我们前进的脚步。那么，怎么解决资源问题呢？我们前面提到，最简单、最直接的一个答案是到国际市场上去买。

但到国际市场上去买，又有两个必须回答的问题。一个是国际市场上有没有那么多的油卖？另一个是中国有没有钱买，能不能买得起？

在前面我们涉及有关资源问题的信息中，悲观方面的比较多。但这两个人们最可能持怀疑态度的问题，其答案反而比较乐观。就我们的研究成果看，一个相当明确的基本判断是，世界有油卖，中国有钱买。

先说世界有油卖。

我们已经多处提到，目前全世界的石油生产能力大约为33亿至34亿吨。从实物层面看，全球石油市场的供给是充裕的，供略大于求。这样一种供求关系格局包括过去几年，也包括未来一个较长时期。

在可预见的一个战略周期内，世界市场上的新增需求主要来自亚洲，其中主要来自中国。目前亚洲的自产石油能力明显趋于下降。原来作为亚洲主要油气出口源的东南亚各国中，目前保持出口能力的只剩下马来西亚。再有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小国文莱。文莱的石油和天然气主要卖给日本。几乎是让日本人全包了。印尼已经从石油出口国转变为净进口国。除中国外，亚洲新增需求的另一主要来源是印度。目前印度有超过1亿吨的石油加工能力，其石油供给中65%左右来自中东。

即或考虑到中国以及整个亚洲的石油需求增长，世界石油生产能力仍是能够满足供应并且有余的。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世界石油市场上供给增长的因素要明显多于需求增长的因素。从2000年以来，俄罗斯的油气出口已经成为其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持因素。在过去两年中，俄罗斯已经多次不顾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限产建议去抢占国际市场。目前，为油气资源寻求稳定的国际需求已经成为其明显的经济政策取向。在过去10余年的封锁中，伊拉克的石油出口只占世界石油贸易总量的0.2%，但伊拉克石油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11%，为全球第二大石油资源富集国。在萨达姆时代，伊拉克已有的92座油田中只有24座尚在开工、半开工。在对伊拉克的封锁解禁以后，这样一个巨大的供给能力将很快加入到世界市场中来。2002年末世界第五大石油出口国委内瑞拉的石油工人罢工，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不满于政府主动压缩石油产量的政策。

目前国际上的石油生产能力能够保证当前条件下全球对石油的需求。很多人可能不相信这个判断。因为过去很多专家都分析说，全世界的石油资源很快就要告罄。这个分析没有错。煤、天然气、石油等一次能源，我们统称为化石能源。也称为不可再生能源。从长期看，由于石油自身的不可再生性，随着全球石油需求规模的不断扩大，工业化的不断普及，确实可能用不了几十年。但就目前的市场形势看，供求基本平衡，供还略大于求的基本格局也是确实存在的。

今后一段时期内全球经济的增长并不会导致石油需求的太多增长。相反，有些国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对石油的需求还会下降。随着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越来越摆脱了对自然资源投入的依赖。他们靠什么呢？靠信息资源。过去几年中石油价格的暴跌暴涨并没有影响到美国经济

一直持续到2001年强劲增长。在过去几年里日本经济很不景气。但我们并未听说石油价格的暴跌暴涨使其雪上加霜。为什么呢？因为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正在升级，正在大规模淘汰高耗能，高资源指向型的产业；正在大力发展资源节约型的高科技产业、信息业。

最近军事专家有个分析，这次伊拉克战争中美国海上运输量的2/3以上并非是兵员弹药，而是油料。航母、战斗机集群、坦克集群等作战装备的油料消耗非常巨大。伊拉克富集石油，可美国运到伊拉克的东西中大部分是油料。油料运输成本很贵，运输过程又极不安全。目前国外的军事研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是怎么把装备的油耗降下来。目前打赢一场战争需要解决的最大难题也许已经不是精确制导的问题了，而是如何节约油料的问题了。由于发达国家的石油需求是呈现下降趋势的，在未来十年左右，如果没有特别的突发事件，国际市场上的石油供给是充足的。

前不久，英国《金融时报》一个记者就石油问题采访我时，我曾给他普及过一点经济学知识。我告诉他，最近若干年来，在石油问题上你听得最多的消息是什么呢？是OPEC，也就是石油输出国组织主动增产或减产以调节油价的消息。那么请记住，如果石油输出国组织还可以用增、减产来影响油价，也就是全世界的石油供求关系仍主要受供给政策影响的时候，这个世界并不缺油。如果有一天，当人们经常听到的消息变了，变为美国打算对私人汽车实行汽油配给制度，或者日本政府打算拿出更多钱用于石油代用品的技术开发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得用需求政策来调整石油的供求关系时，到那时石油短缺才真的到来呢。

世界有足够的油卖，为什么石油价格还会暴涨？这个问题我们待会儿再回答。我们先说中国有钱买。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长期、大比重进口石油的支付能力是具备的。在正常的市场情况下，靠买油来弥补我们的供求缺口，中国是买得起的，也用得起的。

买油得用外汇。中国的外汇储备情况是怎么样的呢。1980年时，我国的外汇储备只有7亿美金。1990年时我国的外汇储备增长到111亿美金。2002年末，这个数字增长到2860亿美金。2003年一季度末，我国的外汇储备已达3160亿美金。我们的确有足够的钱买油用。

不仅从外汇储备的存量和增长情况看我们买得起，而且从我国目前的国际贸易总量和增长态势看，从外汇平衡、进出口平衡、国际债务结构等多方面情况看，支持这样一个资源进口量的支付能力也是充分具备的。2002年一年，我国的出口增长了20%以上。如果细心观察，2003年一季度我国的出口

仍然保持了高速度。

我们现在的外汇储备增加并不单纯依靠贸易顺差。就是说，我们并不是仅靠卖给别人多，从别人那里买得少来增加外汇储备了。目前我国外汇来源中，一个越来越多的部分是外商直接投资。2002年，我们实际利用外资是多少呢？是528亿美金。大家注意，不是协议金额，是实际利用外资，外国钱实实在在地拿到了中国。一年的总量是528亿美金。这个规模是世界上排名第二。并且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这个势头仍将继续保持。

中国部分地区出现的“SARS”疫情让很多人担心对外经贸的影响。我说你放心，资本这个东西不怕SARS，就怕不赚钱。国际资本绝不会因为疫情这样一个自然属性的风险就不到中国来。如果那样就不是资本了。

资本决策只有一个原则，那就是利润。如果说每年进出口的增长速度还要受一点国际市场景气不景气、是扩张还是紧缩，国际间的经贸关系是协调还是对抗等因素的影响，那外商直接投资受这些因素的影响程度要小得多。不是说SARS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没有影响。现在看，这个影响肯定要比1997年到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影响大得多。但这两件事有个区别。亚洲金融危机极大地改变了国际资本在一段时期内的流向，但SARS疫情不会改变这个流向。没有别的理由，资本认的是钱，是利润。我们在前几讲中说过，2002年全世界汽车市场销售量增长了2%，这个2%的绝大部分在中国。你说外商会甘于放弃这个市场吗？他哭着喊着也得来。

说中国买得起买不起，还得看我们买油来干什么。中国不是正在成为世界制造中心吗？我们买油的目的是推进工业化，是加工制造更多的产品拿到国际市场上去卖。进口资源而出口加工制造业产品将是我国在今后一段较长时期内参与世界经济分工，获取更多国际比较利益的主要方式之一。在过去几年中，我国的出口不仅在规模上不断增大，而且在出口产品的构成上也在不断升级。我们的出口产品正在完成从资源产品为主向加工制造品、技术产品为主的转变。2002年，我国的出口产品中，计算机和通信类产品的同比增长幅度是47%。因此，我们买进原油支持工业化，加工制造更多产品出口是划算的。

无需争议，更多利用海外资源，第一是我们已经具备了充分的物质基础，第二是对我们的国民经济发展有利。

【5－2－2】现在我国有32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其实这意味着人家从我们这儿拉走了价值3200多亿美元的实物资源，然后给我们打了一张欠条。对国民经济发展真正有意义的不是欠条，不是债权，而是实物资源。保险柜里锁着很多欠条，对发展我们的国民经济，提高我们的国民福利水平并没有什么直接的作用。

可能有人心里会有一种从持家过日子而来的想法，外汇多了咱们多存一点，能不花尽量不花不好吗？恐怕不好。外汇储备还真不是越多越好。这里我们也顺便给大家讲一点外汇方面的经济学知识。

外汇这种东西没有不成，太少了也不成。一定量的外汇储备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形式之一。一定量的外汇储备是提高国家信用程度，规避债务风险的一种安全储备。你外汇储备多，人家就敢把钱借给你，敢和你做生意。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水平太低，在国际竞争中的风险就大。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怎么爆发的？最开始就是因为泰国等一些东南亚国家的外汇储备不充分，短期债务到期无法偿还引发的。还不上就只有靠廉价卖资源、靠货币贬值来换取外汇。由此就导致了一个连锁反应。一个国家的短期外债危机导致了一场区域性的大规模金融动荡。现在我们周边有些国家很愿意和我们做生意，但我们还真不敢把东西卖给它。为什么呢？因为对方的外汇储备很低，外汇的收入能力很不可靠。我们得提防着它还不起钱。这是我们吃了不少亏以后才总结出来的教训。一些国家把我们的商品拉走了，然后说没外汇还钱。要么你接受他们的本国货币，要么让你把他们卖不掉的甘蔗或者羊皮拉走抵债。

没有外汇储备或者外汇储备太少了不行，但外汇储备太多了也不行。且不说外汇本身就是一个高风险的财富储备形式，国际汇市上的汇率变化是非常大的。欧元刚诞生的时候1欧元可以换1.1美元。几乎没人料到，欧元很快地贬值到了只能换0.84美元。人们都认为美元坚挺，多存美元。最近美元又疲软了。1欧元又能换1个多美元了。里外里能亏出百分之三十几去。

这个还不说。更重要的是，外国钱是人家外国政府可以随便印的。想跟中国买东西了，随便印点就能买。这就是强势国际货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硬通货”的一种经济特权。这个外汇储备其实就是一张欠条。不过是这个欠条的信用比较好一点，流动性高一点罢了。现在我们说我国有32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其实这意味着人家从我们这儿拉走了价值3200多亿美元的实物资源，然后给我们打了一张欠条。当然也意味着我们可以拿这些外汇到他们国家买回同样价值量的东西。仅此而已。

我们知道，对国民经济发展真正有意义的不是欠条，不是债权，而是实物资源。常识可知，实物资源越多、利用效率越高，我们的国民福利才能增长得越快。保险柜里锁着很多欠条，对发展我们的国民经济，提高我们的国民福利水平并无直接的作用。

【5-2-3】过去几年中世界石油市场是被人操纵的。被什么人操纵呢？一个叫国际垄断资本，另一个大的国际资本集团是国际投机资本。过去几年来，国际油价巨幅波动的实质是什么呢？就是西方大国在力图利用市场化手段争夺资源控制权。

现在我们就进入最关键的问题，世界有油卖，为什么国际油价会暴涨？

前一段，由于伊拉克战争的影响，国际油价出现了连续攀升的态势。在此形势下，有一些媒体在那里夸大其词地渲染什么"第三次石油危机就要来了"。这种说法，如果不是故意哗众取宠，至少也是对石油市场价格变化的无知。

实际上目前的油价变动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仅在过去大约四年多的时间内，国际油价就曾经历过两轮暴跌暴涨、暴涨暴跌的反复波动过程。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国际油价就不断下滑。1998年我国南、北方发大水时大家可能记得这么一个镜头。在松花江、嫩江的抗洪过程中，我们连筑三道堤坝也未能阻止洪水冲进大庆油田。但后来好像并没听说大庆油田由此遭受多大损失。为什么呢？因为1998年那一年世界石油市场上的价格暴跌，远远跌到了大庆油田的成本之下。当时我们的一个产业政策就是关闭部分油井。大水来了，我们干脆把一些被淹的井关掉就算了。

到1999年1月时，国际油价曾跌破了10美元一桶的12年来的历史低位。此后油价不断攀升，到2000年10月时国际油价又涨到了37美元一桶的10年来的历史高位。此后油价再次下滑，美国9·11事件之后，到2001年11月时最低跌到了17美元一桶的价位。此后由于美国发动"反恐"战争的声音不断升级，再加上一些别的因素，油价再度攀升。到这次伊拉克战争开战前夕，国际油价曾一度攀高到了40美元一桶。

既然世界不缺油，为什么在过去几年中世界石油市场上会反复出现价格的暴跌暴涨、暴涨暴跌？因为这个市场是被人操纵的。被什么人操纵呢？被两个大的国际资本集团。

这两个大的国际资本集团，一个叫国际垄断资本，就是我们在上世纪70年代以后已经很熟悉的那些石油跨国公司。当前国际上资源富集的大油田仍主要掌握在西方的国际垄断资本手中，世界排位中前20家大型石油公司垄断了全球已探明优质石油储量的81%。这些跨国公司不仅垄断了全球最富集的油田资源，最主要的石油生产能力，而且把他们的触角延伸到了流通领域，在石油市场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其代表就是埃克森、壳牌、BP、道达尔等。

另一个大的国际资本集团是国际投机资本。就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人

们渐识“庐山真面目”的索罗斯之流。索罗斯们掌握的“对冲基金”专门进出国际上的各种虚拟市场，比如股市、汇市、期市、油市等，在那里兴风作浪。

别小看索罗斯的能量。他所支配的那些“基金”尽管规模巨大，但在国际虚拟市场上并不足以在掀起太大的风浪。实际上，在他的背后还有第三个大的国际资本集团，国际金融资本。就是那些西方大银行。在近年来国际金融市场每一次波动中，背后都有这两个资本集团相互联手的影子。亚洲金融危机就是索罗斯挑起的。1997年索罗斯狙击港币大败亏输，他没想到港府保卫“联席汇率”的决心有这么大，会果断地直接入市干预。这个失败记录并不意味着索罗斯的力量不大，他曾经袭击英镑成功。英镑的市场流通规模要比港币不知大多少倍，他尚且得手。你就知道索罗斯在短期内可以调动的货币资本规模有多大了。

现在人们经常听说经济全球化这个说法。经济全球化的一个表现就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加速流动。现在几百上千亿美金的国际投机资本从美国纽约股市上退出，到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市场上建仓，这个过程需要多少时间？只要15分钟就够了。

在这次伊拉克战争开始前，我们有些记者对这种情况缺乏了解，只凭表面现象就在那里大声疾呼“中国怎么应对新的石油危机”。其实这次伊拉克战争前的石油涨价也是两大国际资本集团联手作祟的结果。并不存在什么“石油危机”。

美国打伊拉克，真正影响世界石油的供求关系了吗？没有。有谁听说因为战争，哪里的石油生产大规模减产了？并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国际油市的供求对比关系几乎没发生大的变化。如果有变化，仅仅是一些对油价攀升抱有预期的力量在囤油，希冀在战争打响后卖出来卖个好价钱。仅此而已。

从世界范围说，伊拉克石油在目前全球石油贸易中所占比重不过0.2%。可以说微不足道。伊拉克已经被封锁了十余年。能够运到国际市场上的石油只是联合国“石油换食品”计划框架内的很少一部分，再加上少量的石油走私。而且在过去一些年内，萨达姆自己也曾多次中断过伊拉克的石油出口。所以战争打响对全球石油供应的影响并不足虑。

从我国的情况说，我国2002年从伊拉克进口的石油不超过70万吨。70万是个什么含义呢？不过是我国石油进口总量的1%，我国年石油消耗量的0.3%。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耗总量中的比重更是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

其实，具有新闻敏感性的记者本来应当知道，在过去一到两年中，影响国际石油价格的因素并非只有对伊开战一件。

2002年，俄罗斯的经济增长率可能达到7%。其中大约有5个百分点是靠卖油气资源实现的。大家最近可能听说过中俄合作在我国东北修建石油管道的事。这个项目已经谈了很长时间。为油气资源寻求稳定的国际需求已经成为了俄罗斯明显的经济政策取向。现在国际油市上的一个很大变化就是俄罗斯已经使石油输出国组织无法控制世界石油市场的供给。

除此之外，还有2002年巴拿马运河提价12%。目前全球的油船有1/3要通过巴拿马运河。还有委内瑞拉闹了两次政治危机。其中一次是总统政变，两天之内换了三回总统。还有一次石油工人罢工。还有大家已经耳熟能详的中东巴、以武装冲突不断升级等。在每天的新闻中，不是人体炸弹就是以色列把阿拉法特关了禁闭。

在上述这些因素中，任何一项对油价的影响都并不比对伊开战小。但我们判断，所有这些因素都只是影响油价的短期因素。所有这些短期因素都不足以改变全世界的石油供给能力是过剩而不是短缺的事实。这才是影响油价的长期因素。

毫无疑问，中国很重视对伊开战对油价的影响。但我们同时也知道，目前一些国际舆论“炒作”对伊开战的目的是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在国际石油期货市场上接过价格已被拉高的仓单。那些过度渲染战争对石油供给影响的舆论，我们有理由怀疑他们是些“油托”。这些舆论我们在2000年第三季度时已经领教过了。那时国际油价上涨到36甚至37美元一桶，欧洲的电视台把出租车司机、渔民抗议示威的画面演给全世界看，美国说自己已经动用战略储备了，日本也站出来说日本的储备还应当增仓。结果是从2000年末开始到2001年美国9·11事件之后，油价一路下滑到17美元一桶。

过去几年来，国际油价巨幅波动的实质是什么呢？就是西方大国在力图利用市场化手段争夺资源控制权。传统的“炮舰政策”仍然在用，比如打伊拉克战争。另一手是用符合“游戏”规则的办法争夺对资源的控制权。

大家知道马来西亚有个领导人叫马哈蒂尔。这个人上台掌权后在推进马来西亚国内政治稳定、民族和解和经济发展上应当说作出了很大贡献。因此他在马来西亚和东南亚获得了不小的声誉。我们到马来西亚访问时，那里的华人侨领都会口口声声地提到，“在尊敬的马哈蒂尔医生领导下”。马哈蒂尔很想当亚洲的头儿，至少接替李光耀当个东南亚的头儿。经过20余年的努力，眼看他的国际声誉日上的时候，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了。马来西亚的经济在这场危机中受到严重挫伤。他的多年努力一朝化为泡影。199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香港开会，马哈蒂尔和索罗斯都去了。马哈蒂尔看见索罗斯当然就气不打一处来，在会上几乎失态地大骂索罗斯。索罗斯倒没有急赤白脸。

他说马老先生您先别生气，您先说说，我所做的一切有哪一点违背市场的游戏规则了？您受了损失我很遗憾。但如果我没有违背规则，那您就无权骂我。您只能怨您自己对规则和风险的无知与轻率。

【5－2－4】威胁我国石油安全的首要因素不是战争，不是短缺，而是价格风险。国际油价的巨幅波动不仅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大的利益流失，而且已经给我国国民经济的稳定运行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在过去几年中，我们为扩大内需和维持经济增长速度付出了极大的政策代价。但这个政策代价在很大程度上被油价的反复波动抵消了。

在油价巨幅波动现象的背后，我们不应忽略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经济大国、国际资本正在用符合游戏规则的办法争夺对资源的控制权。在关于我国石油安全的讨论中，我们一再强调一个观点：威胁我国石油安全的首要因素不是战争，不是短缺，而是价格风险。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在国际油市上我们一直处于被动地接受价格的地位。中国作为最大的新增需求来源国，对国际油价的形成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迄今在我们的石油采购量中采用了市场化避险手段的部分微不足道。

我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还不长。我们对这样一个全面竞争的国际市场同样缺乏了解。也正由于这个缺乏了解，我们始终采取了游离于市场竞争之外的一种立场。大家想想，如果1桶油多要我们一个美元，我们进口1亿吨石油得多付多大代价。

我们前面说到油价时的单位都是“桶”，说到我国的石油资源及进口量时的单位都是“吨”。桶是容积计量单位，吨是重量计量单位。桶和吨之间还有个换算。因油质不同、比重不同，有的1吨合7桶略多，有的1吨合7桶不到。我们大致按1吨折合7桶的比例换算，1桶油多要我们1个美元，1吨油就多收我们7个美元。进口1亿吨石油，我们就得多付7亿美元。实际上如我们刚才提到的，国际市场上的油价波动幅度是非常大的，甚至在一天之内波动三四个美元都屡见不鲜。我们吃了多大亏呢？2000年时，我们为进口6000万吨石油多支付了大约70亿美元。

国际油价的巨幅波动不仅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大的利益流失，而且已经给我国国民经济的稳定运行带来了极大的损害。1998年到1999年初国际石油价格暴跌是我国石油被迫限产和成品油走私形势骤然严峻的基本原因之一。其后的价格猛涨，又给我国的石化产业带来了成本急剧上升的严重困难。从技术、经济特点上说，石油采掘与石油炼制都是对均衡生产要求很高的产业。从社会再生产链上说，石油与石化产业的景气状况对几乎所有产业都有重大

影响。

人们常说，石油的价格直接关系到从原子弹到面包几乎所有产品的成本。由于不断推进油价与国际市场的接轨，从1999年11月以来，我国不得不频繁、反复地调整国内市场的成品油价格。有时候连续上调，有时又连续下调。成品油价格的反复大幅变动实际上非常不利于刚刚走出通货紧缩低谷的国内经济的稳定运行。在过去几年中，我们为扩大内需和维持经济增长速度付出了极大的政策代价。但这个政策代价在很大程度上被油价的反复波动抵消了。

有一次我在北京坐出租车，出租车司机和我诉苦。他说，国家这个油价是怎么定的呀，好像专门和我们开出租的过不去似的。前一阵子汽油价格连续上调，你知道这油价上涨的代价是全要摊在开出租的人头上的。公司不会因油价上涨而少收“份儿钱”，出租车价也不能因为油价上涨而提高。油价涨多少我们的收入就得减少多少。后来涨得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就一气买了1000升的“油票”。油票是先付款后加油，加油时不受油价变动的影响。我心想这回可以少受点损失了吧？没想到我刚买完，油价又连续5次下调。

这个出租车司机不简单，还懂得买“期货”，套期保值。我们不说他“做”反了方向是什么原因。我们只说，油价的波动甚至已经给出租车司机这样经济末梢的群体的利益造成了损害。

国际油价的大幅波动和起伏不定不仅已经构成了对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严重威胁，而且还严重影响了我们的改革进程。1998年初，朱镕基总理这一届政府一产生就说要推进“费改税”的改革。“费改税”中的第一项就是要把养路费改成燃油税。每年说要改，每年出不了台。为什么呢？就因为国际油价起伏不定，成品油价上再加税恐怕很多部门无法承受。结果一直到这一届政府卸任也没改成。

我们前面提到过“中石油”和“中石化”到海外上市的事。由于油价的不稳定导致了这些企业经营业绩的不稳定，在海外上市过程中的筹资规模受到了严重影响。差不多比我们的预期少筹了一半。因为资产价格提升不上去，同样的股权被迫低价卖掉了。

【5－2－5】中国在伊拉克战争上的立场是什么样的？一条是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和发展，另一条是有利于中国的根本利益。什么是中国自己的根本利益呢？不管伊拉克的问题用什么样的办法解决，只要能尽快解除对伊拉克的封锁，让更多的伊拉克石油卖到国际市场中去，让国际油市的供给大规模增加，这就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

迄今石油仍是大国之间利益博弈的最重要筹码。人们都注意到，在伊拉克战争这个问题上，美、英、法、德、俄等国家的立场出现了很大的分歧。为什么会有分歧呢？石油利益。

在2003年3月的“两会”之后，在温家宝总理的记者招待会上，有个西方记者问温总理，中国在伊拉克战争上立场是什么样的？温总理的回答是两条。一条是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和发展，另一条是有利于中国的根本利益。

这两条肯定是温总理事先早就想好等着记者们来问的。我看温总理回答的这两条太好了。非常简单明了。简单明了的背后又有着丰富的潜台词。什么潜台词？记者先生们你们自己去想吧。

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和发展，这个话所有的政治家都会说。布什也这么说的，萨达姆也是这么说的，但唯有中国是真心的。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肯定是我们最期望的。这个不用多说。另一条就有深意了。中国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的立场还取决于中国自己的根本利益。

在伊拉克问题上，所有大国的态度其实都是出自他们自己的根本利益。无一例外。

大家知道，俄罗斯是坚决反对对伊拉克动武的。是俄罗斯特别同情伊拉克人民的遭遇？还是普京“心太软”？都不是。普京是什么人呢？是前苏联“克格勃”训练出来的人，处理危机时的手段之狠辣是出了名的。大家想想前不久他处理莫斯科剧院人质事件中时所采用的手法，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绝不是心慈手软之人。对俄罗斯来说，什么是其根本利益呢？就是伊拉克问题不解决。联合国不是封锁了伊拉克10多年了吗？最好再封锁10年。为什么呢？因为伊拉克被封锁的时间越长，俄罗斯的油气资源就越能更多、以更好的价钱卖到国际市场中去；俄罗斯和大国周旋的谈判的地位也就越有利。俄罗斯的本意就是尽量地拖着，维持现状。一方面有萨达姆牵制着美国，美国就得向俄罗斯作出一定的妥协；另一方面俄罗斯的经济极大地依赖于向海外卖资源。国际市场的供给增加显然不利于俄罗斯的利益。

那法国为什么反对动武呢？法国自己没有多少石油资源。但法国的石油公司在海外有着非常大的利益。前些年联合国封锁伊拉克的时候，萨达姆缺钱花怎么办呢？他就把伊拉克石油开采权的“期权”给卖了。在这个未来的开采权中，法国的公司买走了40%左右。也就是说，如果有一天伊拉克解禁，伊拉克的石油开采权将有40%左右掌握在法国的石油公司手里。法国当然不希望打破这个既定的“规则”。

而美国为什么非得动武呢？对伊拉克封锁是美国主导的，美国公司当然就不敢参与进去买这个“期权”。到现在美国一看，原来我费了那么大的劲封

锁了伊拉克那么多年，都是替你法国封锁了，你法国倒趁机买了便宜货。假如真有一天封锁发挥作用，萨达姆下台、伊拉克解禁，那法国人不就成了最大赢家了吗？所以美国人必须打这一仗。靠打仗才能重新划分伊拉克的石油利益格局，武力推翻萨达姆，原来政府签的那些协议就可以不认账了，就可以由美国人来主导重新签协议。所以美国人就说，萨达姆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那是实质性违背联合国1441号决议，必须要打你；萨达姆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那是你藏起来不让我找到，那也是实质性违背联合国1441号决议，也必须要打你。总之是必须打你。为什么呢？核心秘密就在这里。

别看政治家们在各种国际讲坛上慷慨陈词地大讲特讲“国际正义”、“人权”、“人道主义”什么的。其实背后的真实动机是摆不到桌面上的。利益是最大的政治动机。

我们现在也弄明白这个游戏规则了。什么叫国际正义？什么叫国际主义义务？首先是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中国的经济发展了，我们就有力量对国际正义发表意见。我们自己的经济发展不上去，说什么也不会有人买账。

那什么是中国自己的根本利益呢？坦率地说，不管伊拉克的问题用什么样的办法解决，只要能尽快解除对伊拉克的封锁，让更多的伊拉克石油卖到国际市场中去，让国际油市的供给大规模增加，这就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

前不久在《人民日报》的“强国论坛”，我在回答网友们关于石油安全问题的提问时，有个网友问，美国打伊拉克和萨达姆当政，哪个杀人更多？中国为什么不坚决反对对伊拉克动武？我说，温总理已经讲得很明白了，中国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立场，出发点之一是符合中国自己的根本利益。这个出发点并不包括谁杀人更多。我刚才说温总理答记者问具有丰富的潜台词。这个潜台词只能你自己去体会。

3. 中国能源及石油安全的战略设想

☆ 改善我国能源结构，首要问题是煤炭资源的合理利用问题。

☆ 中国人要开汽车、坐汽车，出路就是发展电动汽车。

☆ 不论国民经济的需求多么紧迫，我们也必须建立资源储备，封存一部分资源。

☆ 石油战略储备是一种防御性的威慑力量。就像核武器，可能一辈子都不扔，但不能没有。

☆ 企业义务储备才是为应对价格风险而建立的储备。

☆ 我们也可以给石油安全买保险。到哪里去买呢？到国际石油期货市场去买。

☆ 人们不可能通过市场"消灭"风险。问题只是这个风险由谁来承担。

☆ 规避市场不是在规避风险，实际上是在规避安全。

【5－3－1】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历史留下了一个很大的技术遗憾。什么遗憾呢？就是电力和汽车这两样工业化的典型产品在技术上未能结合到一块儿。因为在他们的工业化过程中，油气资源没有成为机动车发展的"硬"约束条件。现在轮到中国人要开汽车、坐汽车了。但实现这样一个追求，注定我们得解决一个天大的难题，这就是能源问题。

面对上述资源形势，我们需要有自己的安全战略。这个安全战略，不仅是遭受武力攻击时的战略，或者受到敌对势力政治要挟时的战略，更重要的是要有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进一步说，我们不仅要保障经济本身的运行安全，而且还要保障人民生活的安全、国家制度安全等多个方面。

在过去几年中，资源安全、能源安全、石油安全的问题已经有过很多讨论。一方面，我们已经有一些比较系统的战略考虑。另一方面，所有这些战

略考虑大都还停留在起步阶段。我们的措施到位得还远不充分。

安全措施不到位，这不奇怪。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80年代以来的前一个“翻两番”战略中，资源、能源供给的战略考虑仍是立足于国内的。从“六五”到“九五”计划中，我们的投入重点是勘探、开发国内资源。到目前，我国最大的资源开发项目“三峡工程”仍在施工中，还没有最后完成。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对依靠海外资源的思想准备、战略准备都是不充分的。

另一个原因是我们前期对“对外开放”的认识比较狭义。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人们理解的对外开放主要是发展外向型经济和引进外资。几乎没有太多考虑过全方位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问题。而在上面所说到的国际石油市场中，我们面临的是一个风险竞争、资金竞争、产权竞争以及综合国力全面竞争的市场。面对这样一个竞争态势，我们在此前积累的对外开放经验是远不充分的。

大家听了前面对我们资源禀赋状况的介绍，可能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前景存有很多担心。其实也不用太担心。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们在过去的长期发展实践中也有一句话，叫做“年年困难年年过，年年过得还不错，关键看工作”。我们没必要自己吓唬自己。过去多少年来我们为粮食问题发愁，为吃饭问题发愁。现在中国面临的问题是粮食过剩。70年代初期，有个“罗马俱乐部”说人类经济发展必须在10年内退回到“零增长”，否则全世界的资源最多到世纪末就会枯竭。我们现在到了21世纪了，全世界的资源也没枯竭到让经济体系崩溃的地步。让我们牢记邓小平同志的一句至理名言：“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解决一切难题的根本出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脚步是挡不住的。

因为时间关系，在资源战略中，我们还是重点说说石油安全战略。

石油安全对我们很重要，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多人说我们应该建立石油战略储备。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准备这样的后手，以备不时之需。这只是很容易想到的一个措施。尽管这个措施也十分重要。但这不是我们安全战略中唯一的措施，甚至不是最关键的措施。中国的石油安全战略是一个完整的复杂体系。就我所知，它至少包括六个方面。

第一，调整我们的能源结构，减轻对油气资源的依赖程度。

能源结构是个比较复杂的概念。这个概念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能源消费结构，也就是需求结构；另一个是能源供给结构。供给结构又可以分为各种不同能源形式的构成状况和国内自产与进口之间的构成状况两个方面。需求结构也可以分为不同能源形式的构成状况和作燃料与做化工原料的

构成状况两个方面。此外，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还都包括一次能源和二次能源之间的构成关系。

能源供给结构受自然条件约束比较大。我国煤多，当然煤的比重就大。我国油气资源匮乏，进口比重就高。这一点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了。

需求结构受供给结构影响很大。如果本国具有某种优势资源，当然这种能源形式就会利用得多一些。瑞士多山，水电就发达。但在开放的条件下，需求结构并不一定取决于供给结构，也不一定必须服从本国的自然资源状况。一个国家的能源需求结构还在很大程度上受技术发展水平的制约。法国自己没有多少石油，核资源也并不充裕，但法国的电力供给中超过70%依靠核电。

我们这里不需要研究那么细，主要说一下怎么少用油气，多用其他能源形式的问题。这大致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努力实现劣质能源的优化、洁化利用；另一个是开发新能源。

我们先得说说怎么用好自有资源的问题。在我们自己的一次能源构成中，“上帝”安排的，煤和水力比较多一点。这是没法改变的自然状况。我们不可能把这些资源弃置不用。

改善我国能源结构，首要的问题就是煤炭资源的合理利用问题。我们前面说到，煤炭的缺点是热值低、污染大、运输成本高。但就是对煤炭采取最排斥态度的专家也得承认，中国的经济发展还得立足于用煤，立足于利用好煤炭这个资源。

煤炭在中国的能源结构中占最大比重，这个事实是无法改变的。现在我国的煤炭在一次能源中所占比重大约是68%左右。至少在未来20年内，我们再怎么努力，煤炭所占比重也不可能低于50%。不低于50%是个什么概念？大约预测，我们的全面小康实现之日，国民经济所需的一次能源大约是18亿吨标准煤。也就是说，那时我国的煤炭产量也不能低于10亿吨。今后高新技术发展，新能源能不能大规模替代传统能源？现在我们还不敢断言。至少在现在的科技发展水平上，传统能源仍是不能放弃的。

针对煤的弱点，国内外都做了大量的技术方面的探索。从最前沿说，目前已经有煤炭的液化、气化技术。就是在地下把固体的煤炭转化为液体、甚至气体，转化完以后再开采上来利用。可以想见，这样一来，煤炭的根本缺陷就可以避免。热值可以大大提高，废渣、粉尘的污染可以留在地下，运输也将变得比较容易。但很长时期来，这些先进技术始终停留在实验室，最多是个别小规模试验阶段。离商业化应用还有很长的距离。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成本无法忍受。技术上能办到，但市场化还无法办到。

大规模的液化、气化技术尚待时日，但我们也要加紧研究。别的国家看看太难，可能会放弃这个技术方向，转而去寻找替代方案。比如日本把文莱的油、气差不多买断了。欧洲很多国家更大程度依靠核电。但我们不行。不论我们的石油怎么“走出去”利用海外资源，不论我们怎么努力发展核电，煤炭也是主力能源。中国注定必须找出煤炭洁化利用的技术方案，而且是市场可接受的技术方案。我们没有绕过去的余地。哪怕用20年、30年甚至更长，我们也得做。

新一届政府成立后，最近国务院领导亲自挂帅主抓的一件事就是重新研究、规划我国的中、长期科技发展战略。我们曾在很多场合呼吁，一定要把煤炭的优化、洁化利用列入我国的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千万不能短视，不能有任何侥幸心理。可以这样说，用好煤炭资源是中国人躲不过去的历史使命。

液化、气化不是一下子能够做到的，我们也有退而求其次的办法。比如建设坑口电站，比如提高煤炭的洗选率等。尽量提高对煤炭资源的初步加工程度，尽量减轻煤炭对环境的影响，减轻对运输的压力，同时也尽量减轻国民经济对油气资源的依赖。

在能源结构问题上，我们还需要研究的一件事是电力的利用问题。从战略眼光看，中国的能源不能光盯在一次能源上，还得研究二次能源。那就是电力。

电力的归属有点复杂。火电叫二次能源，水电、核电叫一次能源。我们这里不去争论这个归属。总之是电力。中国人要发展工业化，可能需要更大程度地在应用电力上下功夫。

为什么单单提出电力的问题？因为我们说过，中国煤多，水力资源也较丰富。这两种资源的最好利用方式就是转换成电力。下面我们还会说到，发展新能源，利用核能，最基本的形式也是转换为电力。怎么减轻对油气资源的依赖程度？一个主要思路就是用电。

用其他能源形式替代油气资源，减轻国民经济发展对油气资源的依赖，主要是在燃料能源方面。我们应当努力用电来替代油气燃料，尽量把有限的油气资源用在化工原料领域而不是烧掉。

用电取代油气资源的最主要领域就是汽车，还有就是电力机车取代内燃机车。电力机车取代内燃机车在技术上已经非常成熟。目前我们很多城市大力发展的轨道交通，包括轻轨、地铁、城际轨道交通等，肯定是建立在电力牵引基础上的。上海建的磁浮列车，虽然不是电力牵引，但也是电力动力。电磁技术才能实现悬浮状态的移动。这个领域大家很容易理解。我们重点说

说汽车。

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历史留下了一个很大的技术遗憾。什么遗憾呢？就是电力和汽车这两样工业化的典型产品在技术上未能结合到一块儿。大家知道，电力的普遍应用和汽车的普遍应用是工业化的两个重要里程碑。但迄今，这两个里程碑式的产品未能合二为一。电动汽车至今还是试验性的产品。

为什么发达国家会留下这个技术遗憾呢？简单说，因为在他们的工业化过程中，油气资源没有成为机动车发展的“硬”约束条件。早期的欧洲工业化依靠掠夺殖民地。美国的工业化也没离开对世界石油资源的控制。就是后起的日本，在战后的工业化高潮中也恰逢中东的廉价石油大发现。汽车、机动车始终是依靠这种更容易获得、在技术上更容易转换的能源形式发展起来的。

现在轮到中国人要开汽车、坐汽车了。我们发现，别说中国的石油，就是全世界的石油都加起来，也不可能满足全中国老百姓都开车的要求。美国人均1.13辆汽车。美国人均年消耗石油4吨，全国每年消耗9亿吨石油。我们多次提到，全世界一年的石油产量只有33亿吨。我们有13亿人口。要是中国的人均石油消耗水平达到美国现在的水平，那得52亿吨石油才能满足需要。不要说全国老百姓都开车，就只是中国的城市人口都开车也不行。我们的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之日，全国的城镇人口可能要达到8亿人。8亿人，如果人均消耗4吨石油，也差不多需要全世界的石油全给我们才行。这显然是无论如何办不到的事。

那中国人不开汽车行不行？不行。我们不可能放弃汽车这样一个工业文明的重要结晶。汽车的发展不仅关系着我国未来一个很长时期内主导产业的发展，关系着我们的城市化进程，关系着扩大内需战略的实施，而且关系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向现代化方向发展。凭什么发达国家的人就能开汽车、坐汽车，中国人就不行？谁也不能阻止中国人享受现代物质文明的追求。但实现这样一个追求，注定我们得解决一个天大的难题，这就是能源问题。

事情其实说复杂很复杂，说简单又很简单。出路就是发展电动汽车。用电力取代油气燃料。电动汽车难不难造呢？一点都不难。电动汽车的构造比内燃机技术为基础的汽车简单得多。因为电动汽车不需要发动机总成、变速箱总成、离合器总成、复杂的油路和进排气装置等。这些都不需要。一个马达一块电池就可以了。直流电可以无级变速。单就制造工艺方面说，车的成本也可以大大降低。

那现在造电动汽车的难点主要在哪里呢？主要就在于目前还造不出适宜商用的、能够满足动力要求的燃料电池。其实电池也不难造。其原理物理学

家早就给我们探索清楚了。造电池的难点主要在于找到合适的储能材料。其实这种储能材料人们也已经找到了。难点在于找到大规模的储量。归根结底还是自然资源。我有一次在中国地质大学讲能源战略。我说中国老百姓能不能普遍坐上汽车，能不能享受这个现代文明，关键就看我们在座的同学们能不能为我们找到这种适宜造高储能燃料电池的资源储量了。

【5－3－2】在未来20年甚至更长一些的周期内，我国的核电站应当保持一个不断递增的开工建设规模。这不仅是改善我国能源结构的需要，而且是改善我国在国际石油市场上谈判地位的需要。

调整能源结构，一个方面要提高煤炭的利用效率，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发展核电。目前，我国的核电在发电总量中所占比重只有0.6%。可以说微不足道。我国迄今核电在能源中的定位仅是“适度发展”。现在看，适度发展可能不够了。至少，这个“适度发展”应从试验性、补偿性之“度”调整为战略性、进取性之“度”。

我国核电所占比重太低是有一些特定原因的。我们不是不懂得核电是一种极有潜质的新兴能源，我们应该大力发展。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前一届政府遇到了一些不太有利的内、外部条件，限制了我们下更大的决心。

从外部上说，80年代后期以来，世界上一些国家的核电事故对人们的信心打击很大。比如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美国的三里岛事故等。此后，许多发达国家放慢了核电的发展步伐。在我们周边的一些国家或地区也存在比较强烈的反核声音。如大家知道的台湾“核四风波”。我们建大亚湾核电站时香港特区也有很多人反对。最近一段来，发达国家也有一种趋势，不断加大对传统能源的关注和争夺力度。美国新一届总统一上台，就在2001年5月发定了一个“新能源政策”，叫New Energy Plan。这个新能源政策不是发展新型能源的政策，而是扩张传统能源的政策，重心在于怎么重新发展传统能源。比如重开烧煤的火力发电站，降低大气污染标准、到自然保护区的阿拉斯加去找石油等。这些动向无疑会给我们决策者带来一定的疑惑，影响我们的决策决心。

从内部看，从90年代初期的第八个五年计划以来，我国上马了一大批大型水电建设项目。比如二滩、三峡等。这些集中在黄河、长江中上游的特大型项目有的初步建成后还需要继续配套投入，如二滩电站就需要有相应的“西电东送”。有的还远没有完成，比如三峡工程。所以到朱镕基总理手里时，国家投资的力量有限，不能又搞水电又搞核电。这两个方面都是很花钱的，

都是需要很大规模的投资支持的。水电已经上马，只能先保水电。所以在前期，核电始终没有明显的发展。基本状态是表面说要“适度发展”，实际上是不发展。

人们对发展核电的最大疑问是安全。实际上核电是最安全，最有前途的能源形式。核能源是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最低、对自然环境影响最小的一种能源形式。最近我国的“核集团”和我们有个合作项目，所以很多情况我还了解一些。别以为火电站就没有辐射。火电的辐射污染更厉害。一个百万千瓦核电站的辐射只相当于同等水平的火力电站的百分之一。

从目前的形势看，我们的核电站需要大力推进。我们给中央的政策研究报告曾经建议，在未来20年甚至更长一些的周期内，我国的核电站应当保持一个不断递增的开工建设规模。这不仅是改善我国能源结构的需要，而且是改善我国在国际石油市场上谈判地位的需要。人们很容易理解，如果我国宣布一个比较庞大的发展核电计划，这边公开进行设计招标，那边“中石化”在国际上买油的谈判地位立即就会改善。因为对方知道我们有了更大的选择。

给大家讲个细节。党的“十六大”上温家宝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但他出任总理则需要等到“两会”履行完正式法定程序，正式当选才行。但就在这个过程中，他已经开始部分履行总理的职责了。温总理认为，发展核电这个问题不能再拖了，于是当机立断，不等正式上任就先批准了好几个报到国务院几年未批的核电项目。这个事给“核集团”以极大的鼓舞。

从这个事情中我们可看到温总理对核电的重视。目前有关部门已经明确提出，我国第一阶段的核电发展目标是要在发电总量中所占比重达到4%。4%虽然仍不是一个很大比重，但从0.6%到4%，这个跨越是非常巨大的。显而易见，我国的能源结构战略将有一个明显的调整。

【5－3－3】不论国民经济对石油的需求多么紧迫，我们也必须建立自己的资源储备，封存一部分资源。煤炭、石油、天然气等石化能源的稀缺程度肯定会越来越高。稀缺程度不断提高，这些资源的市场价值就会越来越高。我们的眼光要长远，要顾及长远利益，这是尊重客观规律的一个选择。

第二，建立资源储备。

在关于石油安全的讨论中，很多人呼吁建立石油战略储备。其实，石油的安全储备包括多个层次。第一层次叫做资源储备，譬如封存部分已探明储量。地下资源勘探好了先不开采，或者油井打好了先不出油。

资源储备是一种非常必要的安全措施。石油领域有个重要的比例关系，叫做“采储比”。就是采油能力必须和后备资源储量保持一个合理的比例关系。由于石油需求的拉动，在我国的石油生产中，合理的“采储比”一直未能建立起来。这是一个很不安全的态势。军事家都知道，打仗的时候，不管前方的仗打得多么激烈，指挥员手里都不能没有预备队。对石油产业来说，不光是要有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就是保持正常产量，保证可持续发展，也需要保持合理的“采储比”。不论国民经济对石油的需求多么紧迫，我们也必须建立自己的资源储备，封存一部分资源。

美国其实是一个资源大国。目前美国在石油进口国中是排名非常靠前的。但这不等于美国没有石油资源。如果美国人把他们在南得克萨斯州的油井阀门都打开，美国在一夜之间就能成为石油输出国。但美国的战略是先采别人的，用别人的。本国资源埋在地下作为一种战略性的安全储备。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稀缺程度肯定会越来越高。稀缺程度不断提高，这些资源的市场价值就会越来越高。自己的资源埋在地下就自然升值。

中国虽然没有美国那么丰富的资源禀赋，但是建立资源储备也是我们安全战略必要构成之一。2002 年起，我们已经开始封存一些气田、油田，封存一些新增生产能力。我们的眼光要长远，要顾及长远利益，这是尊重客观规律的一个选择。

【5－3－4】石油战略储备是一种政府行为，是政府出钱、财政出钱建立的储备，是一种应对重大国际政治、军事危机的政府储备。这个储备不是为应对国际市场油价波动风险建立的。石油石化企业不能指望依靠这种政府储备去调剂市场供求。实际上，石油战略储备是一种防御性的威慑力量。就像核武器，可能一辈子都不扔，但不能没有。

第三，建立国家石油战略储备。

在过去一段时期中，由于国际油价的不断上涨，很多人呼吁我们要建立石油战略储备。毫无疑问，维护我国的石油安全，我们一定要建立自己的石油战略储备。这个措施是十分必要的。没有石油战略储备就可能受制于人。但很多人对石油战略储备有个误解，以为有了石油战略储备我们就可以不怕国际油市的价格波动了。这个看法不正确。

应当明确，石油战略储备是一种政府行为，是政府出钱、财政出钱建立的储备，是一种应对重大国际政治、军事危机的政府储备。比如台海出现危机，外国势力封锁了我们的海上石油通道。这个时候才能动用石油战略储备。

这个储备不是为中石油或者中石化应对国际市场油价波动风险建立的。我们的石油石化企业不能指望依靠这种政府储备去调剂市场供求。实际上，石油战略储备是一种防御性的威慑力量。就像核武器，可能一辈子都不扔，但不能没有。

第四，逐步建立需求大户的企业义务储备制度。

企业义务储备才是为应对价格风险而建立的储备。大致说，企业义务储备是通过强制性的法律规定，要求用油大户必须保持一个法定的原料储备量的制度。比如要求100万吨以上的炼油厂、30万吨以上的乙烯装置，至少要保持三个月的原料储备。因为这个原料安全不仅关系到你这个企业的经营，而且关系到国民经济的稳定运行，因此企业要承担这个义务。

当然，建立企业义务储备还需要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经过立法的方式建立后才能具有强制性。企业义务储备并不是让企业自己完全承担这个储备成本。要知道存油是个很费钱的事，要占用很多资金。国家可以给予企业义务储备以相应的政策支持。例如规定可以由银行贷款、财政贴息。这实际上等于企业没花钱。因为是银行出本金，财政付利息，企业只承担了一个采购、保管、管理以及倒库运作的义务。

企业义务储备制度并非只是让企业承担义务。这个制度实际上暗含着政府对企业一种不违背WTO规则的补贴。前面我们说到这种储备可以采用“银行贷款、财政贴息”的方式。因为这种补贴是对企业承担公共安全义务的一种补贴，不是对企业经营的补贴，因而并不违背WTO的条款。但实际上，这种补贴下的储备肯定对企业规避国际油市的价格风险、在原料采购上低进高出有莫大好处。

第五，建立远期合约交易制度。

目前我们在石油安全上面临的问题之一是，国际市场上的供给和我们国内炼油厂的需求是直接对接的。也就是说，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和企业的成本直接对接。国际油市的风险全部直接传导到用油企业中。国际市场卖多少钱，我们的石油企业就得付多少钱。在这中间缺乏一个风险分散的层面。那么，在国际市场和用油企业之间可不可以建立一个缓冲的地带，设置一个风险分散的屏障呢？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这就是建立石油供求的远期合约交易制度。

远期合约交易制度实际上就是一个模拟的局部石油期货市场。在这个交易过程中，有些居间投资的力量进行风险操作。用油企业通过一定比例的远期合约套期保值，可以把自己的成本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从而达到维护整个国民经济运行安全的目的。

有人提出，我们干嘛要那么麻烦？干脆建立一个国内石油期货交易所不就行了吗？应该说，这个基本思路是对的，要是能够建一个石油期货交易所最好不过。但现在建立石油期货交易所也有一定的难度。因为期货交易要有足够大的量才有意义。足够大的交易量就需要足够大的入市资金。我国现在的情况是，能够在实体经济之外投入虚拟经济领域的资本比较有限。我们又想发展股市，又想发展债市，如果再开一个石油期货交易所，社会整体的资金力量恐怕还不足以承受。还有，这个交易所要不要对外开放？如果不许国外资金参与，我们很难实现足够大的交易规模。如果允许国际资本自由进出，那些海外的投机资本进入到我们的市场中来，也许会把国外的风险更大程度地带到国内来。那样的话不仅没有达到风险分散的作用，反而放大了国内市场的风险。

最近，在美国对伊拉克开战的影响下国际油市暴涨，于是有日本学者提出，中、日、韩三国是否可以联合建立一个区域性的石油期货交易市场。因为这三国都是石油进口大国。把全球市场的风险在这个区域性市场上再释放一些，可能对我们这三个国家都有利。就我看，这个建议倒是一个积极的建议。

【5－3－5】我们也可以给石油安全买保险。到哪里去买呢？到国际石油期货市场去买。在期货市场上，一方面我们可以采取防守型的套期保值，锁定成本、规避风险。国际油价涨也好跌也好，我们的国民经济运行成本是一定的。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采取进攻型的不断高抛低吸，通过扩大交易量摊低成本和影响价格。

第六，我们应该大规模进军国际期货市场，建立期货储备。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石油安全储备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层次，叫做期货储备。就是在国际石油期货市场上保持一定量的远期合约。

过去，我们对国际期货市场基本上是采取避而远之，畏而远之的态度。这也难怪，因为在尝试参与这个市场的过程中我们确实曾经吃过亏。

我们有个生产铝的企业，通过国际期货市场套期保值运作规避了价格下跌的风险，赚了不少钱。这个企业的领导一看，原来炒期货比辛辛苦苦生产产品赚钱容易多了。于是就把大量的生产资金投入到了国际期货市场上。殊不知，这个期货市场上是需要有丰富经验和强大资金实力的。你的交易对手对全球电解铝的总产量是了如指掌的。结果我们这个企业头脑膨胀，在缺乏经验的情况下盲目大量持仓，持仓量远远超过了企业实际的生产能力。最后被“逼仓”，就是在交割期到来之前一直找不到平仓的有利价格，最后只好在

交割期亏损平仓。这个企业实际上是暗中被人算计了，亏了1.6亿美元。这个教训对我们的决策影响很大。迄今人们一说到国际期货市场就有“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之感。

那我们规避这个市场是不是就安全了呢？更不安全。

我们需要明确一个重要的基本认识，期货市场的功能首先是规避、防范风险。我们躲着这个市场不仅没减小风险，实际上扩大了风险。人们很容易理解，你买了医疗保险，可能在保险期内并没有生病，这是你的一个风险；但你不买医疗保险，实际上你是在赌你一辈子不生病。你说买保险的风险大呢还是不买保险的风险大？

我们也可以给石油安全买保险。到哪里去买呢？到国际石油期货市场去买。在期货市场上，一方面我们可以采取防守型的套期保值，锁定成本、规避风险。国际油价涨也好跌也好，我们的国民经济运行成本是一定的。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采取进攻型的不断高抛低吸，通过扩大交易量摊低成本和影响价格。

在期货市场上操作必须承担相应的风险。但我们得想明白一个道理。风险就是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的事。价格涨落是个不确定的因素，可能涨也可能跌。但价格有涨有跌是个必然发生的事。因此这个风险本身是确定存在的事。风险是客观存在。人们不可能通过市场“消灭”风险。问题只是这个风险由谁来承担。正是因为有人在这个市场上承担了更多风险，这个市场才有了风险分散的功能。参与市场才有让自己少担风险，让别人多担风险的可能。才有转嫁风险和增加自己安全系数的可能。规避市场不是在规避风险，实际上是在规避安全。

我们假定中国的公司在国际石油期货市场上的持仓量中占有一个比较大的比重，我们就可以有效地影响价格。对国际价格有影响力不是靠请对方吃饭能实现的。面是靠大量参与交易实现的。你参与交易，就影响价格；参与交易量越大，影响力越大。

以前我们买油，比如说打算进口500万吨，就是派出采购人员，带上信用证，询价后找到一个合适的卖主，然后签合同，到时把这500万吨油运回来就行了。以后我们可能不这样。买500万吨油，我们的交易量可能达到5000万吨甚至更多。为什么呢？假定我们以30美元一桶的单价买了500万吨油，我们刚买完对方就降价，降到27美元。没关系，我再买500万吨。你再降我再买。直到你降不起为止。价格回升了，我再陆续把多买的卖出去。这样通过高抛低吸就可以有效地摊低成本和影响价格。期货储备就是高抛低吸的筹码。因此，期货储备是一种获取对市场价格的发言权、影响力的措施，

也是规避价格风险的一种积极措施。

期货储备的作用还不止于此。前面讲到，我们国内的成品油价格和国际市场接轨过程中，国际油市的短期波动严重影响了我国国民经济的稳定运行。假定有一个比较大的期货储备，我们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摆脱目前这种被动跟踪国际油价、频繁调整国内成品油价格的局面。比如说，这个月我们需要进口500万吨石油。假定因为短期因素影响国际油价突然暴涨了10%，这时我们势必要对国内成品油价格作出相应的调整。但如果这时我们在国际油市上持有5000万吨或者更多的远期合约，这个远期合约的成本和这500万吨现货的成本一平均，就可以大大降低国际油市上短期因素对国内油价的影响。

参与国际市场的交易，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解决中国的石油安全问题，关键是要走出去。我们的石油“走出去”战略是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战略。这个全方位、多层次战略意味着，我们要全面参与到包括现货、期货、产权等所有方面的国际竞争中去。

4. 提问与讨论

☆ 西部的资源前景远不乐观，这个判断是有比较充分的客观依据的。

☆ 从多方面迫切需要出发，应当建立一个规模足够大、且能够加入市场经济运行的核工业基础。这个核工业的主要构成就是核电。

☆ 从本质上说，市场经济中的所有“游戏”规则都和降低风险、控制风险的社会共同约定密切联系在一起。

☆ 新的世界经济格局并非是局部石油战争主导资源配置，而是符合“游戏”规则的风险竞争主导配置资源。

☆ 我国新的石油战略不应当是“要准备打仗”的战略，而是战胜市场的战略。

☆ 对我国来说，也许我们不需要“跑过”油价，只要“跑过”竞争对手就行。

【提问一】：我国的西部还有幅员辽阔的国土处于待开发状态，随着西部大开发的进展，我们是否可以找到更多的资源？

答：在西部找到更多的资源，这是我们大家都希望看到的前景。但希望归希望，现实归现实。西部的资源前景远不乐观，这个判断不是主观随意地得出的，是有比较充分的客观依据的。

我们对加快西部发展的研究并非始自西部大开发。上世纪80年代末我就参与国家软科学基金资助的西部发展研究。那时研究西部的主要立足点之一，就是国民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西部的资源。当时人们普遍觉得，西部地下埋藏着极为丰饶的自然矿产资源。

这个认识一直延续到90年代中期。实际上，1996年制定的国家“九五”计划中已经将抑制区域间发展差距列入了战略规划。但当时对西部发展的期望，主要是寄托在“资源大开发”上的。“九五”计划提出，要优先在中西部安排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国家实行投资倾斜；要理顺资源性产品

的价格，增强中西部地区自我发展的能力等。可见，那时我们对西部的资源前景还是充满信心的。但后来的勘探开发结果非常令人失望。除去我们早就知道的一些大江河上游的水力资源外，西部几乎没有找到什么特别值得夸耀的资源。至少没有找到任何一种能够根本影响我国某种资源前景的储量。

有一次我和西部的一个省长一起坐飞机出差，省长指着飞机翅膀底下在晴朗阳光中清晰可见的起伏山峦说，我们西部这些大山底下埋的都是宝贝，拿镐一刨就能卖钱。我不忍心说穿这个美好的幻想。真实情况是，我们的西部没有那么美好的资源前景。相反，过去一些年的勘探结果警示我们，西部相当多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是极其脆弱的。那里迫切需要的不是资源开发，而是环境保护。即便有一些资源，开发的环境代价可能会远远超过经济收益。大家可能会注意到，在国务院“西部办”制定的那个西部开发规划和“十五”计划中，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并非是“资源大开发”，而是环境保护。

我们曾经设想，将钢铁、有色、化工、石油等一些传统基础产业向西部转移，东部一些较发达地区让出这些产业。比如上海就曾设想逐步淘汰钢铁、石化等高资源指向型的产业，专门发展高科技、金融等产业。上海提出，要把自己办成“远东金融中心”。但现在的情况是，我们的这些基础产业还得向沿海一带集中，而且是向东南沿海一带集中。为什么？因为要吃进口矿。吃进口矿就得向沿海具备港口条件的地方集中布局。这个港口条件还不是靠海就行，还得是深水港。能停靠30万吨以上矿船的深水港。

为什么必须是深水港呢？因为依靠进口矿石时，必须用30万吨以上矿船，运费才经济。如果大船倒小船，小船倒火车，这样折腾几番后运费就已经决定，其产品的成本不会有国际竞争力。所以原来设想的向西部转移是不现实的。给大家举两个例子。

在1998年我们最初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时，当时的国务院领导特别提出，国债资金支持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港口项目一个不上”。当时觉得港口是过剩的。但现在大家知道，上海正在建设一个超大型的深水港，就在吴淞口外的大小洋山岛。在那里建港还得修一座17公里的跨海大桥。从“一个不上”到投入这样大的力量修建深水港，这个转折怎么来的？就是从对西部资源前景的判断而来的。上海不仅不能淘汰钢铁、石化，反而还得大力发展这些基础产业。

另一个例子是广东。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外向型经济和制造业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其中惠州曾经提出要叫响“惠州制造”的口号。现在大家知道有个已经上马的“南海项目”，就是中海油和法国人合作的80万吨乙烯工程，要建在惠州。这个项目的第二期还要建一个500万吨级的石炼化装

置。原来说这是亚洲最大的乙烯装置。现在可能上海石化要上马一个比惠州还大的乙烯工程。为什么在惠州这样一个发展制造业极具优势的地方上马这样一个石化项目呢？因为那里才具有必要的港口条件。

大家知道辽宁是我国钢铁和石化生产能力的主要聚集地。但今后辽宁这两个产业的地位只是区域性生产基地了。为什么呢？因为辽宁不具备吃进口矿的港口条件。辽东半岛虽然有不少港口，比如，大连、营口、丹东、锦州等等。但这些港都太小。最大的大连港，经过疏浚以后，还得乘潮而进，最多也只能停靠10万吨的矿船。当然最新的发展是，中国和俄罗斯签订了一项输油管道合同，这条管道建成后的最大年输油能力是3000万吨。如果这个项目成功，东北的石油石化产业将获得新的重大发展机遇。

【提问二】：我国发展核电究竟有没有潜力？现在的主要难点是什么？

答：核电这个问题提得好。从维护核大国地位、优化能源结构、改善在国际石油市场上的谈判地位、推进高新技术发展、支持国民经济再“翻两番”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等多方面迫切需要出发，我国都应当进一步提升核电在国民经济中的战略定位。

核电的发展不仅关系到能源安全和能源结构调整，而且关系到我国的战略安全。当前，我国的核大国地位在各种国际力量的抗衡中正在受到新的挑战。前苏联解体后，美国正在推进其新的核垄断战略。一方面，在伊拉克战争、朝鲜核问题上以“反恐”、制裁“邪恶轴心”等借口不断采取先发制人的政治甚至军事手段清除新的潜在核能力。另一方面，通过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退出“反导条约”以及迫使俄罗斯接受战略核力量对比不均衡性等力图实现核力量的全面优势。美国要实现“一国独大”，可以断言，把中国排挤出“核大国俱乐部”是其既定战略。此外，周边国家的核能力增长也正在形成对我国核大国地位的挑战。最近，美国打伊拉克的理由就是不允许萨达姆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另外“朝核”问题也引起我们很大关注。日本其实从来没有放弃对核力量的追求。我们千万别小看日本的核潜力。印度、巴基斯坦都已进行过多次核爆试验，印度还在建造核潜艇。

在当前的世界政治、军事、经济格局中，我国在核大国俱乐部中的地位决不能动摇。在禁试禁产的国际条约约束下，保持这个地位的关键环节之一就是要确立与核武器配套的科研生产体系。而要维持这样一个体系，仅靠原有体制下“准备打仗”的发展之路已经不能适应需要。我们必须走“寓军于民”、“寓国防于市场”之路。我国的核体系应当是一座“金字塔”型的体系。保持核威慑力量的核技术是“宝塔尖”。在这个宝塔尖下，应当建立一个规模

足够大，且能够加入市场经济运行的核工业基础。从长远战略看，我们必须拥有一个足够强大的核工业，才能为核技术研发经费建立起市场化的补偿渠道，才能通过大量产业化的应用为核技术发展提供更多试验机会并形成生产与储备核原料的能力，也才能长期维持一支高素质的核科技队伍。这个核工业的主要构成就是核电。

启动新的核能战略已成为保证能源安全的迫切之需。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一个战略性的基本判断是，由于油气短缺，中国远期能源基础一定得更多靠电。与火、水电相比，电能发展中潜力最大、可持续性最强的是核电。

在世界范围内，核电已是成熟技术，截至2002年底，全世界运行的核电机组已达441个，总装机容量已达3.56亿千瓦，在全球供电量中所占比重为16.1%，在全球一次能源中所占比重为6.7%。目前世界上已有17个国家的核电在本国总发电量中比重超过25%。如果我国用20年左右的时间将核电在总发电量中所占比重提高到美国现在的水平，核电在一次能源中所占比重就将达10%。按20亿吨标准煤的需求量计算，这个比重相当于1.44亿吨石油或1500亿立方米天然气。

我国的能源安全分三个层次。从短期看，目前我国对国际油价几乎没有发言权和影响力，如果提出明确的核能发展战略，我国在国际石油市场上的谈判地位将立即改善。从中期看，发展核能将极大地缓解国民经济对国际石油市场的依赖程度。从长期看，传统能源的枯竭已为人们所普遍认识，能源安全最终取决于新能源领域的技术竞争。

我国的核工业要真正具备市场竞争力，前提是形成足够大的产业规模。我国目前已经具备了自行设计百万千瓦核电站的技术能力。降低核电的建设成本、发电成本、技术成本，不断提高设备的国产化水平，关键之一是要形成产业规模。在一个较长的战略周期内，我国应保持每年有核电新机组开工，且开工数目不断增长的态势。

从安全性方面看，我国目前采用的是技术成熟、在国内外均具有良好安全记录的堆型。目前世界上核电站安全防护技术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我国核工业完全可以满足高标准核安全法规的要求。从可持续发展方面看，我国目前的环境污染相当大程度来源于煤的燃烧。而核能几乎不排出影响环境的有害气体，发展核能是改善我国环境状况的重要措施之一。

我国核工业发展的主要不确定因素之一是核原料的资源状况。目前已探明储量绝大部分是前期核军工发展时期找到的，进一步勘探仍有找到新储量的潜力。

【提问三】：我国的石油战略要立足于“走出去”，可是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们现在具备这样的人才吗？我们的经验够吗？

答：这个问题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我国石油进口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买不到油，买不起油，而是如何安全、价格有利地把油买回来。这就要研究市场，全方位、多层次地研究国际市场。

研究国际市场并不是简单地研究在石油采购中如何讨价还价。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是全方位、多层次的竞争。可以说，中国石油的根本出路是走出去，走出去的主要方向是全面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在我国的石油战略中，研究市场可能比研究如何找到油和如何把油采出来更急迫、更重要。

迄今在我国的石油战略研究中，仍有一种传统的惯性认识，就是把市场，特别是国际市场视为是一种“异己”力量，认为买油就是风险，就是不安全；总是有意无意地把战略研究的目标定位在少买、不买油上。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是和中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的形势相悖的。

市场经济就是风险经济。但规避风险的办法不是远离市场、躲避市场竞争。恰恰相反，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充分利用市场化的避险手段、掌握市场运行规律才是我们规避风险、提高安全程度的最好途径。

从本质上说，市场经济中的所有“游戏”规则都和降低风险、控制风险的社会共同约定密切联系在一起。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创造出了大量的市场化避险手段。例如我们提到过，期货市场的首要功能并非是放大风险，而是降低风险、规避风险。在这个市场上，一些参与者所承担的风险恰恰是市场分散风险的方式之一。要维护我国的石油安全，我们就必须学会驾驭市场和掌握市场的主动权。

值得强调指出的是，过去一段时期所发生的各种国际经济、政治事件中，没有一件真正改变了国际油市上供大于求的基本格局。新的世界经济格局并非是局部石油战争主导资源配置，而是符合游戏规则的风险竞争主导配置资源。看不到市场、忽视市场的战略是最危险的战略。我国的石油安全战略当然需要有最坏情况下的备案。但在过去四年中，中国在石油问题上面临的主要威胁并非是战争，而是价格风险。我们不能让局部战争的表面现象掩盖了真正的危险所在。简言之，我国新的石油战略不应当是“要准备打仗”的战略，而是战胜市场的战略。

至于熟悉国际市场的人才，我在《人民日报》的“强国论坛”中答问时也被问到过同一个问题。无需讳言，我国缺乏有足够经验的国际期货交易人才。但这一点不可能构成中国是否参与国际期货市场的根本决策依据。因为从制度因素说，雇外国籍的交易员未必不可控制，中国籍的交易员也并非不

可被对方收买。进一步说，经验是在实践中积累起来的。不大规模参与，永远也有不了合格的交易员人才。

【提问四】：国际油价上涨对我们的国民经济损害很大。我们为什么不多存一些油来应对这种危机呢？

答：我们前面已经说到过，存油的确是必要的。但是光靠存油不是一个最优的办法。因为存油的代价也是非常巨大的。在石油安全问题上，我们还得考虑一个合理的安全成本问题。

举个例子说，在伊拉克战争之前，很多人都在呼吁存油。但我们给中央的研究报告则提出了相反的建议。存是一定要存，但不一定是现在。为什么呢？一个理由是当时油价虚高，战后一定会很快回落。买这个高价油不合算。另一个重要理由是，美国打伊拉克已经炒作了很长时间，产油国和用油国都储存了大量的油。大家都存油，都打算战争一打响卖个好价钱，或者价位高时可以不买油，那么在这样一个短期形势下我们就未必需要存很多油。军事家说“兵不厌诈”。虚虚实实才是安全。人人都知道“诸葛一生唯谨慎”，所以他就有机会上演“空城计”。

另一方面，别以为国际油价上涨对我们只有负面影响。辩证地看，油价上涨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重大的战略机会。

国际石油涨价肯定会对我国的石化产业形成很大的成本压力，同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民经济的稳定运行。但这些不利影响并不是只对中国的。应注意到的是，我国周边同领域的竞争对手面临的压力比我们更大。

对我国的石油石化领域来说，石油跌价的危害比石油涨价还大。因为石油涨价的时候，尽管下游要承受成本压力，但上游企业，比如石油采掘业还可以赚钱。但油价下跌时，上下游都困难。油价跌到每桶 18 美元以下时，我们的大部分油田就无法开采了。因为自己采油的成本比买油还贵。这时对下游企业来说，虽然成本便宜了，国际市场上成品油、化工原料的价格跌得比原油还快。所以，中石化在过去四年遇到的最大尴尬就是，石油涨价时它非常难过，石油跌价时它也非常难过。

那么我们所说的战略机会何在呢？国际油价上涨可能给中国石油石化企业带来一个排挤外部竞争对手，清理门户的机会。

中石化的日子老过不好，就是因为在我们周边存在着一个庞大的石油生产能力。全世界的石油加工能力是严重过剩的。一方面对石油的供给来说是过剩的，另一方面对成品油和化工产品的需求来说也是过剩的。

目前全球的石油加工能力超过 40 亿吨，而全球石油生产能力只有 33 亿

吨。油价便宜的时候，大家还都能凑合活着。有的人吃半饱，有的人吃个七成饱。石油价格一涨，就注定有一部分人要饿死。也就是说，一部分石油加工能力注定要被排挤出局。

全球这样一个过剩的石油加工能力在哪里呢？相当大一部分聚集在亚洲，特别是我们周边的一些国家或地区。目前亚太地区的石油加工能力超过10亿吨。我国内地为2.26亿吨。其余有日本的2.39亿吨、韩国的1.28亿吨、新加坡的0.63亿吨，印尼的0.50亿吨和我国台湾省的0.46亿吨生产能力。连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也分别拥有0.34亿吨、0.25亿吨、0.21亿吨的生产能力。此外还有印度的1.07亿吨、巴基斯坦的0.12亿吨生产能力以及澳大利亚的0.42亿吨生产能力。这样一个庞大的石油加工能力群形成对我国石化产业强大竞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石化产业的发展始终受到这些外部竞争者的困扰。在1999年和2001年曾两度猖獗的油品及化工原料走私也主要来自于这些供给源。

我们说，伊拉克战争在巡航导弹轰炸下的巴格达之外还有一个“第二战场”。这个第二战场在亚洲。这个战场上“战争”的激烈程度决不亚于导弹打击下的巴格达。因为在一个极其尖锐的竞争过程中，势必有一部分石油加工能力要被排挤出局。

谁出局？中国的优势比竞争对手明显得多。首先，我们至少还有超过2/3部分的自产油。而我们的竞争对手绝大部分没有这个条件。在我国周边，除马来西亚仍维持石油出口国地位，印尼有相对强的石油自产能力外，石油加工大户中的日本、韩国、新加坡、我国的台湾省以及印度等对国际市场油源的依赖程度都比我国大得多。从产品需求看，我们的优势更为明显。我国有着广阔的并且是不断扩张的下游市场。工业化有三大基础材料，就是钢铁、水泥和乙烯。现在我国的钢铁和水泥都是世界上的产量第一大国。但是乙烯仍是我们严重短缺的。在石油涨价的情况下，即或下游市场因价格上涨而紧缩，我国自身的需求量仍足以支持我国的生产能力。我们有可能通过某种上下游一体化的方式让各个产业环节分担油价上涨的利益损失。但我们的竞争对手则远没有这个条件。因为我国石化产业的市场主要在国内，而竞争对手的市场主要在其国外。

我们曾经在给中央的政策建议中提出，只要我们的政策得当，能“挺”过一个不可避免的困难时期，先“死”的可能是我们的竞争对手。从世界范围看，国际油价上涨可能会带给我国石化产业一个排挤外部竞争、获取更大市场份额以致实现产业规模扩张的难得机会。

前不久有很多国外的记者就石油问题采访我。有个英国《金融时报》的

记者采访我。我告诉他，中国不缺对策，世界不缺油。后来登在《中国经济时报》上。

有个日本记者问我，你们中国打算怎么应对石油涨价危机呢？我说，记者先生，这很容易呀。假定记者先生和女朋友出去旅游时碰到一只老虎，你怎么就安全了呢？你不需要跑过老虎，只要跑过你的女朋友就安全了。现在贵国就是我们亲爱的女朋友。我们没打算跑过油价，我们跑过贵国就行呀。

这不是玩笑。这是真正的战略性思考。对我国来说，也许我们不需要"跑过"油价，只要"跑过"竞争对手就行。跑过竞争对手就是安全，跑过竞争对手就是战略性的重大胜局。

【提问五】：我国打算什么时候进入国际期货市场呢？我们的主要操作策略将如何？

答：作为世界石油市场上新增需求的主要来源国，中国肯定要去参与国际石油期货交易。国际油价主要是在期货市场上形成的。中国不可能总是被动地接受别人决定的交易价格。这个前景无需质疑。但中国什么时候进入国际期货市场，以多大资金规模进入这个市场，我想别说我不知道，就是知道了也不能随便说。

石油期货市场作为一个风险市场，没有一个参与者会把自己的"底数"告诉对方。索罗斯要是知道香港政府保持联系汇率的决心，他1997年就不会去袭击香港股市了。"传媒若报江东缺箭，孔明安可草船借矢"？你说对不对？

至于怎么操作，我倒想，也许高油价可能会给我们提供一个低成本建立战略储备的有利时机。早在2001年3月，"建立国家石油战略储备，维护国家能源安全"的决策就已经明确写入了我国的"十五"计划中。但过去一段时间中，国际油价一直没有给我们提供合适的建仓机会。

世界石油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并不支持目前的高价位。国内外专家相当一致的判断是，目前并不存在石油短缺，因而油价上去了很快还会落下来。高油价损害中国利益的前提是中国在这个价位上买油。如果我们换个思路，不是直接买油，而是先卖油，我国就有可能利用国际期货市场实现为战略储备的廉价建仓。

国际油价的特点是期货价格确定现货价格。一个简单例证就可说明上述可能性。因为期货市场上的远期合约是可以先卖后买的，如果我们在40美元时卖出一桶油，再在20美元时买回两桶油，那么我们就可以以价格为零的代价获得一桶油。

国际油市是一个高风险的市场。但在上述博弈中，和那些企图拉高油价

的对手相比，对方的风险要比我方大得多。因为油价最终总是要受制于实物层面的供求关系的。除非风险市场上的投机资本有无限多的资金作后盾，否则脱离实物供求关系、持续维持高油价是无法做到的。实际上，国际油市上的投机资本即或有心实现这样一个局面，国际金融资本也不可能支持。因为巨额信贷资金陷在石油期货市场上长期无法脱身的巨大风险是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也不可能承受的。

实施这样一个战略操作，不仅需要一般的政策支持，而且需要战略性的金融体系支持。我们曾经建议，我国把石油安全与金融安全联系起来考虑，采取合理对策，把单纯的外汇储备与更灵活的石油战略储备密切结合起来，把石油期货仓单视为是一种新的国际货币，参与外汇组合。一方面通过变换资产存在形态来提高金融资产质量和规避汇率风险，另一方面通过“石油金融”的支持实现石油战略储备的廉价建仓。

【提问六】：最近日本人提出要求人民币升值，这和石油利益有关系吗？

答：2002年末以来，日本官方及公众媒体又提出一种“中国威胁论”的新说法，指责中国“输出通货紧缩”，要求人民币升值。2003年2月，日本财长盐川正十郎在OECD七国集团会议上向其他六国提交通过提案，要求通过一项与1985年针对日元的《广场协议》类似的文件逼迫人民币升值。

日本在这个时候提出要对人民币施以“广场协议”，其用心是极为险恶的。日本和中国都是石油进口的大户，在石油涨价面前，大家面临的问题是同样的。这个时候如果人民币升值，显而易见，中国的石油加工能力就将面临双重困境：原料成本高涨和和外部成品油、石化产品低价竞争的困境。日元相对于人民币贬值，日本生产的成品油和石油化工产品就会比中国的产品便宜。不仅在国际市场上比中国产品便宜，而且还可以很轻易地打入到我们的国内市场上来。这样一来，中国的石油加工能力非全军覆没不可。要么被日本企业兼并，要么干脆破产。

在石油涨价面前，我们和日本人就像坐在同一条船上。日本人的想法，不是大家怎么同舟共济地把船划到安全地带，而是怎样把别人推下船去保证自己安全。这种以邻为壑、嫁祸于人的把戏我们已经领教过太多次了。

日本人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意图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并非仅仅是针对中国目前家电等产业的出口态势而发的。其真正目的是企图阻止中国提高自己重要基础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努力。如果按日本人的要求办，受到打击的还不仅是我们的石油石化行业。

过去两年中国汽车发展的态势非常好。所以过去两年内，日本的汽车生

产厂商在和中国企业的合作上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热情。目前我国汽车市场上不断推出的新品牌中，大部分都是日本品牌的组装车。大家想想，如果这个时候人民币升值，日本汽车的零部件不就变得非常便宜了吗？那日本汽车不就可以长驱直入般进入中国市场了吗？更主要的是，进口的日本零部件很便宜，中国的汽车配套生产能力就会失去发展机会，我们的汽车国产化战略就会受到致命的打击。在钢铁业也是一样。我国的高精尖钢材品种还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进口。其中主要是从日本进口。人民币升值，进口钢材更便宜了，我国钢铁业的结构升级和产品升级还能有指望吗？这个用心实在太险恶了。我最近有次当面向温家宝总理汇报对经济形势的看法时，亲耳听到温总理说，在汇率问题上“我有自己的主见，不会动摇”。

前不久，日本外相川口来我国访问，温家宝也有一番讲话。温总理说，中日之间要扩大相互信任程度，寻求更大的共同利益。我想温总理这两句话不是无所指的。当然日本外相来也不是无目的的，肯定是有备而来，大家一定是有话要说的。中日两国在油价上涨面前要寻求更多共同利益。不要老想着把别人从船上推下去。我前面说到，有个日本学者建议中、日、韩三国共同建立一个区域性的石油期货市场，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寻求共同利益的积极的注意。

第6讲

中国区域战略

ZHONGGUOQUYUZHANLUE

这一讲我们研究区域经济的问题。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相当多涉及区域经济的记载。比如人们熟悉的诗句，有王维的“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说的是当时西部大漠孤烟的苍凉。有苏东坡的“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说的是当时广东“珠三角”地区的蛮荒，以至于诗人被贬后自嘲，说有荔枝吃就不怕“上山下乡”。还有杜牧的“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说的是当时秦淮盛况下城市经济的繁华。还有描述地方经济发达程度的说法。例如说四川盆地、成都平原是“天府之国”，誉称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说洞庭湖和鄱阳湖地区是“两湖熟，天下足”，夸耀当年这个地区物产之丰盛。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还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些都是在讲区域经济。

其实，在世界各国的工业化过程中，都遇到过很多和区域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事件。大家知道，美国历史上也有个“西部大开发”。没有这个“西部大开发”就不会有今天的洛杉矶和旧金山，就不会有“硅谷”。90年代初期“两德”统一之后，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区域经济的改造问题。战后的日本经济发展，在结构战略上是相当成功的，但在区域战略上则比较失败。迄今日本经济仍为“过疏化”和“过密化”的问题困扰。前苏联曾企图开发远东地方，但最后几乎一无所获。中国台湾从60年代起就打算修建环岛高速公路，一直争论了30余年，越争地价越贵，越争越修不成。这些都是区域经济的发展问题。

在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过程中，大家熟悉的特区经济、老工业基地改造、“温州模式”、西部大开发，以及最近很热门的“经营城市”等问题也是区域经济的问题。

此前我们介绍过宏观、微观的概念。其实在经济学中还有个“中观”的概念。产业经济、区域经济就属于“中观”经济的问题。

1.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沿革

☆ 我们的发展成就是和区域战略的成功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相当多重大难题也和区域战略的不完善密切相关。

☆ 没有当初的“三来一补”，我们就不会有机会讨论“中国能否成为世界制造中心”的问题。

☆ “国家、集体、个人一块儿上”的“有水快流”导致很多地区出现了对资源的破坏性开采。

☆ 浦东开发不仅带动了经济增长，而且为向市场经济方向转变的改革提供了一个巨大动力。

☆ 积极财政政策和西部大开发的实施让西部地区获得了新的发展机会。

【6－1－1】我国的区域战略，最生动、最富于变化，也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可以这样说，我们今天的发展成就，相当多是和区域战略的成功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比如特区经济的发展、沿海对外开放、上海浦东开发等。但相当多迄今存在的重大难题也和区域战略的不完善密切相关。比如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发展滞后、东西部发展差距拉大等。

在前面几讲中我们曾多次提到，我国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大国。地域辽阔就带来两个问题：一个是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我国从2000年以来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就是一个以调整区域间发展不平衡差距为基本目标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另一个是多样化的因地制宜发展问题。“九五”计划后期以来，我国的区域发展战略明显进入了一个多样化的阶段。和以前相比，这个“多样化”是主动的多样化。不是中央的区域政策变化导致的多样化，而是各地都在努力寻求自己的发展机会，制定优化的发展战略。“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已成为我们听得最多的地方政府领导的施政纲领。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仅要研究和制定国民经济整体的战略，要研究和制定产业发展战略，要研究和制定资源、就业和其他一些方面的战略，还得

研究一个局部性的发展问题，这就是区域发展战略。地方要定区域战略，中央也要定区域战略。针对不同地区采取不同政策的战略。

区域经济也是一门很有特色、涉及面非常宽广的学问。这个研究领域有很多分支，涉及的内容不仅和经济学有关，而且和地理、资源、人口分布、基础设施配置以及分工、市场培育等各方面密切相关。目前在我国的很多重点大学中都有区域经济的相关研究，而且各有特色。例如北京大学在经济地理方面的研究比较出色，中国人民大学在区域战略和区域政策方面有比较深厚的积累，北方交通大学在各地区基础设施配置方面的研究得天独厚，外经贸大学对内陆省区沿周边对外开放的问题发表过很多重要意见。此外，在区域经济研究上，还有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的地理所，社科院的农村所、人口所、社会学所也都有不同侧重的研究。除了这些专门研究机构外，我知道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等都对区域发展问题有很多关注。有一次，我陪同全国政协的陈锦华副主席去调研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问题。那是全国政协派出的一个“常委调研团”，成员中有五个前省委书记。可见各方面对区域发展问题的重视程度。

在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自建国以来，在区域战略上一直存在着比较多的争论，相应地，在战略上也有过比较大的摇摆。直到今天，湖南、河南、江西、湖北，还有安徽等省区还抱怨说，以前有东部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现在有西部大开发，就我们中部省区非东非西的，“不是东西”。我参加过在武汉召开的很多次有关区域经济发展的研讨会。上海浦东开发的时候研讨的主题是“长江中下游经济发展战略”。重庆设市直辖以后研讨的主题是“长江中上游经济发展战略”。湖北、武汉究竟该向长江上游经济圈靠拢还是该向长江下游经济圈靠拢？人们迄今仍有不同看法。

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有过很长的历史沿革。

早在建国后不久的50年代，我们就曾提出一个关于“处理好沿海和内地关系问题”的战略。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156个大型建设项目”明显向内地的中西部倾斜。内蒙古的包钢、西安和石家庄的纺织、河南的洛拖、湖北的武钢以及延伸到西北、西南的包兰、兰新、宝成铁路等都是那个时候修建的。应当说，那个阶段的投人使我国中、西部的工业化上了一个大台阶。这些项目迄今在中、西部省区的工业产业中仍是重要的骨干力量。

60年代以后，在“要准备打仗”的指导思想下，我们在“三五”、“四五”、“五五”的三个五年计划中把建设的重点放在了西部。在整整15年，我们把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的70%投在了西南地区和陕西等比较偏远的地方。所谓的“三线建设”就是指的这个时期。

现在看，“三线建设”并不是一个成功的区域发展战略。这个时期的区域经济发展留下了很多历史后遗症。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有过一段“军转民”的过程，主要就是对“三线建设”项目进行改造。“三线建设”的另一个缺陷是，由于大量的工业项目只是“嵌入”式的，与当地经济很少接轨，由此进一步加大了区域经济中城乡分割、工农业分割的“二元”状态。

当然“三线建设”也留下了一些宝贵财富。我们的二汽、长虹、西飞等一大批重要产业的龙头企业都是“三线建设”留下的。我国西南的光学、航天、电子、核工业、化工、机械等产业，很多都是在那个时期打下的基础。80年代末期，我们接受了国家软科学基金委托的一个项目，研究西部发展问题。在研究中我们很吃惊地发现，贵州作为我国最贫困落后的省区之一，当时它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中所占比重居然在全国名列前茅。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因为在“三线建设”时期，很多专业的大学生毕业都是“整班”地端到那里去的。那里聚集了我国在60年代毕业的一大批优秀人才。其实，这个特点在四川也很突出。不过是四川人口基数太大，“三线建设”造成的高学历人口的比重变化不像贵州那样明显就是了。还有陕西。我们同样吃惊地发现，陕西当时的人均工业固定资产总量在全国位置非常靠前，而且相当多集中在航空、航天、电子、光学、新材料等高科技领域。

我们前面讲过，在改革开放前，我们在区域战略上还犯过一个错误。那就是要“建设独立的工业省”。这个战略就乏善可陈了。除了造就一大批后来被关停的“五小”，没有留下什么值得肯定的东西。60年代末我们上山下乡的时候看过一个电影纪录片，说的是呼和浩特的“马车社”造出了汽车。其实就是在木头马车上装上了一个单缸柴油机和一个转向系统。这个“汽车”不知道警察给不给上牌照。这样的“发展”当然不会有什么前途。

我国的区域战略，最生动、最富于变化，也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可以这样说，我们今天的发展成就，相当多是和区域战略的成功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比如特区经济的发展、沿海对外开放、上海浦东开发等。但相当多迄今存在的重大难题也和区域战略的不完善密切相关。比如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发展滞后、东西部发展差距拉大等。

在80年代初期的“六五”计划发展过程中，全国性供不应求的严重短缺和产业间的失衡是主要矛盾。当时的战略与政策主要把精力集中在了应对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和突破能源“瓶颈”上，但是“六五”期间也有一些区域性的变化。其中最明显的是两点。一是以“宝钢”为代表，华东的上海、华中的武汉和南京等地通过引进上了一大批钢铁、石化产业的生产能力。二是江浙一带出现了新的发展动力和新体制成分。后来人们常说的“苏南模式”、

"温州模式"最初就起源于那个阶段。国家作为唯一投资主体的局面就此被打破。"六五"时期，"苏、锡、常"地区已经形成了一种明显的快速发展势头。后来被邓小平称为"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也是从那个时候在这个地区起源的。

"六五"计划并没有重视区域性的战略发展和区域间的组合关系问题。但"六五"提出，辽宁、河北、天津、北京、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市、自治区的沿海地区要大力发展，其他内陆地区要加快能源、交通和原材料产业的发展来支援沿海地区。这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后来"梯度发展战略"的原始雏形。

【6-1-2】"梯度发展战略"突破了我国过去片面强调"均衡布局"的传统布局模式，使客观规律与实事求是成为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首要出发点。后来的经济发展证明，"七五"期间东部优先发展的战略为我们抓住了一个很重要的战略机会。没有当初沿海地区艰难起步的"三来一补"，我们今天根本就不会有机会讨论"中国能否成为世界制造中心"这样的问题。

80年代后期的"七五"时期在区域发展问题上非常重要。这个阶段，我们提出了一个以"梯度发展理论"为核心的相对完整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什么是"梯度发展战略"呢？本质上就是沿海地区优先发展。"梯度发展战略"提出，我国的经济分布客观上存在着东、中、西三大地带，并且在发展上呈现出逐步由东向西推进的客观趋势。当时设想，"七五"以至90年代要加速东部地区的发展，同时把能源、原材料建设的重点放到中部，并积极作好进一步开发西部的准备。简单说就是优先发展东部，中部要支援东部，西部仍需积蓄力量和耐心等待。

"梯度发展战略"的实施，一方面使国家的经济与改革政策明显地向东倾斜；另一方面使东部经济呈现为加速发展态势。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发展是特区经济的形成和沿海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当时，我们相继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以及后来的海南建立了五个经济特区。在引进外资和发展市场机制上给予这些特区以很多前所未有的优惠政策。此外，我们还在大连、天津、上海、广州等地开辟了14个沿海开放城市，13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洲、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等经济开放区。在这些地区实行了多层次鼓励引进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优惠政策。

"梯度发展战略"是一种以"效率优先"为基本指导思想的区域发展战

略。应当说，这个战略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具有重要历史贡献的。

在理论上，这个战略突破了我国过去片面强调“均衡布局”的传统布局模式，承认地区间发展严重不平衡的现实，强调遵从由不均衡到均衡的客观经济发展规律，从而使客观规律与实事求是成为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首要出发点。在实践上，这个战略强调在地区间形成产业结构转换的接续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结构战略和区域战略的有机结合，而且这个战略还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发展与改革的密切结合。向沿海倾斜的发展实际上同时具有明显向市场机制、向对外开放倾斜的特点。

后来的经济发展证明，“七五”期间东部优先发展的战略为我们抓住了一个很重要的战略机会。迄今我国很多重要的经济增长点，比如特区经济、外向型经济等都是在那个时候打下良好基础的。没有当初沿海地区艰难起步的“三来一补”，我们今天根本就不会有机会讨论“中国能否成为世界制造中心”这样的问题。

当然，“七五”期间的“梯度发展战略”也是不完善的。从区域政策上看，这个阶段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对“世界性技术革命”的前景估计过于乐观。1987年提出要“跳过若干发展阶段，直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忽略了中国现实的工业化任务，打乱了一些区域既定的产业结构转换战略，实际上后来也并未真正形成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高潮。二是在“兴地富民”过程中过于急功近利，违背规律地在资源开发上提倡“国家、集体、个人一块儿上”的“有水快流”，由此导致很多地区出现了对资源的破坏性开采。过去几年中，大家听说很多不规范小矿恶性事故频仍的报道。这些小矿大都是在这个阶段上马的。三是80年代后期出现了明显的“地区经济结构趋同”趋势。一方面各省、区在地方经济利益的推动下，利用财税制度改革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地方财力纷纷大力发展自己的加工产业，另一方面由于地区结构趋同，地方保护主义与市场分割、地区封锁日益趋于严重。四是在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的差距不断拉大过程中，地区间的经济矛盾趋于尖锐。

一方面区域经济成为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带动力量，另一方面区域间经济矛盾又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羁绊之一。“七五”留下的就是这样一个“双刃剑”格局。

从80年代末开始到90年代初期，“梯度发展理论”实际上遇到了严重挑战，一方面，发展差距拉大导致的地区间利益矛盾趋于尖锐；另一方面，外部环境变化和对外开放发展过程中，内陆与周边国家接壤的地区获得了新的发展机会。更主要的是，当时人们都对西部的资源前景寄予厚望。大家还记得，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原来依靠海路的对外开放遇到一些敌对势

力的封锁，而在与我国陆路接壤的一些国家之间边境贸易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

根据实际情况变化，针对“梯度发展战略”的缺陷，我国在“八五”实施过程中对东、中、西部关系上作了多方面的调整。这些调整相当多在90年代发展中起了重大作用。

其中，一是强化了扶持贫困地区的脱贫政策。大家知道，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我国收入分配的改革方向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其实这句话是在90年代初期的“八五”计划中就已经提出来了。不过当时是针对区域间发展不平衡问题提出的。后来大家熟悉的“八七扶贫攻坚战”就是在“兼顾公平”的原则指导下发动的。“八五”计划的安排很具体，提出国家要给予贫困地区更大的财力、物力和技术力量支持，要安排一批矿山、水利、交通和工业项目，要继续实行“以工代赈”政策，增加农民的劳动投入，为解决温饱问题创造条件等。

二是加大对中、西部能、矿资源开发项目的投入力度。其中就包括超大型的三峡工程上马、黄河中上游水利综合开发以及西部石油和中部煤田加快发展等。我们现在正在建设的“西电东送”、“西气东输”两个大的工程，实际上都得益于“八五”期间开始的投入。

三是扩大沿周边地区的对外开放，加快边境口岸建设，发展与周边国家的边境贸易、产业互补以及对外部资源的利用。我国陆路边境长达2.2万公里。现在我们在北部、西部、西南拥有的多个边贸口岸，大都是那个时候发展起来的。

四是加快东西走向的交通干线建设，开通了沿陇海线延伸的“第二条大陆桥”。“八五”期间，我们打通了一条重要的东西交通线。这就是沿陇海铁路、兰新铁路，从新疆出境，一直延伸到欧洲鹿特丹港的铁路干线。这条横跨亚欧大陆的铁路干线为东西部经济合作，以及很多区域之间的分工重组提供了很重要的条件。

“第二条亚欧大陆桥”贯通之后，还有一个小插曲。江苏的连云港市和山东的日照市都说自己是“亚欧大陆桥”的东端起点。连云港市说陇海铁路以连云港为起点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日照市说现在铁路又修到我这里了，日照市明明比连云港更靠东边。两家各找了一些学者去论证。不论谁是起点，从这件事中可见人们对这条东西交通线的重视和寄予的期望。

“八五”期间，在区域经济发展上最值得一提的事件是上海的浦东开发。浦东开发不仅带动了长江中下游以致国民经济整体出现了一个增长高潮，而且开拓出了一条城市化的新路。这一点我们一会儿还要讲到。更重要的是，

浦东开发还为向市场经济方向转变的改革提供了一个巨大动力。在2002年的APEC会议期间，许多外国首脑都称赞，浦东的建设确实达到了世界一流的水平。不论是城市面貌还是酒店的硬件设施，和世界上哪个国家比都并不逊色。

【6－1－3】积极财政政策和西部大开发的实施让西部地区获得了新的发展机会。我们到西部省区看看，那里的机场、高速公路、农村电网等设施相当多都是在“九五”期间兴建或者完善起来的。我国在90年代初期才有的第一条高速公路，现在西北、西南很多省区的高速公路的水平一点都不弱于东部。

90年代后期的“九五”计划期间，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前期被掩盖的很多矛盾开始集中暴露。大家熟知的下岗、通货紧缩、国企“三年脱困”、长江及松花江发大水、亚洲金融危机等都发生在这一阶段。与此相应，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了非常明显的不断调整特征。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一个是积极财政政策和西部大开发的实施让西部地区获得了新的发展机会。其中，从1998年开始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其主要措施就是增发国债。这些年的国债项目，特别是投向基础设施的国债项目，主要配置在了西部省区。我们到西部省区看看，那里的机场、高速公路、农村电网等设施相当多都是在“九五”期间兴建或者完善起来的。我国在90年代初期才有的第一条高速公路，现在西北、西南很多省区的高速公路的水平一点都不弱于东部。

再一个是特区经济的发展。90年代中后期，深圳曾经很担心取消了优惠政策以后，特区经济还能不能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这中间有个变故。1997年时，我们已经开始取消或者降低出口退税率。对外商投资的“两免三减”税收优惠也已经在论证是否还有必要保留。这些政策对深圳等特区经济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恰好在这时，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了。1998年，朱镕基那一届政府一产生就宣布，要确保当年的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达到8%。要实现这个“保八”目标，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就变得非常重要了。为此，不仅已经取消或降低的出口退税基本恢复，而且有些还有所提高。外商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也明确宣布继续实行不改变。

再一个是西部发展的问题。我们前面说过，“九五”计划曾经延续“八五”的思路，想在西部大上资源产业。在最初的“九五”计划中曾明确规定，国家投资的能矿、冶金、化工等产业的项目要优先向西部安排。但后来发现西部并没有那样乐观的资源前景。所以到2000年初发动西部大开发时，这个思路基本被推翻。在当时国家计委拟定的西部开发规划中，重点从资源开发变为了环境保护。还有一个方面。“九五”计划已经提出，要建立向西部倾斜

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但大家知道，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国家财政面临的任务骤然增加了一大块。启动投资和促进增长要靠财政投入，1998 年长江抗洪救灾后大江河治理要增大财政投入。后来在科索沃危机中，美国炸了我们的大使馆。由这个事件引起，调整国防预算、加快更新军队装备也是可以想见的迫切之需。这些情况摆在面前，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规模、力度和节奏肯定要受到很大影响。

2. 当前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特点

☆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句话用在区域经济上很合适。

☆ “兴地富民”的关键是要有一个良性的区域产业结构。

☆ 媒体记者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珠三角”和“长三角”哪个更有优势。

☆ 旅游资源并非就是人文古迹、庙宇石碑，“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氛围也很吸引人。

☆ 任何一个地方的企业都有可能成长为名牌，但没有适合企业成长的环境，有了名牌也得丢掉。

☆ “副省级”城市这个现象意味着我国区域经济中新的经济增长点和产业聚集核心正在形成。

☆ 中国用10年左右的时间让两亿人口吃饱饭这件事，应当说是对世界的一个很大的贡献。

☆ 西部有些资源是不能开采的。因为利用这些资源的环境代价远远超过经济收益。

☆ 单纯依靠政府力量、依靠外部支持，西部大开发是不可能成功的。

☆ 不合作，谁也发展不好；合作，大家就都能获得更大发展机会。

☆ 谁也不想错过“率先实现现代化”这趟车。参与区域合作，是搭乘上这趟快车的必然选择。

☆ 温总理明确说，“要把老工业基地的改组、改造和振兴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 东北的问题差不多都是计划经济体制留下的后遗症。

☆ 东北不缺资源，缺的是对这些资源重新优化组合的力量。

【6－2－1】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兴地富民”的关键是要有一个良性的区域产业结构。解决增长问题也好，解决地方财政增收问题也好，解决就业问题也好，解决城市化问题也好，不论本地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区域结构调整是一个核心。结构调整已经成为了各地战略选择中的共识。

从“九五”以来，一方面，我们的区域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大成绩；另一方面，我们也遇到了许多前所未遇的难点。中国老百姓有句话，叫做“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句话用在区域经济上很合适。因为在世纪之交这个发展阶段上，区域经济发展面临不同的主题，也呈现出许多与过去不同的新特点。

第一，区域产业结构调整。

我们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是说各区域的情况越来越呈现为因地而异的特点。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兴地富民”的关键是要有一个良性的区域产业结构。解决增长问题也好，解决地方财政增收问题也好，解决就业问题也好，解决城市化问题也好，不论本地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区域结构调整是一个核心。结构调整已经成为了各地战略选择中的共识。我们先用“珠三角”地区和特区经济为例来说明。

政策优势淡化以后，特区经济还能不能持续高速增长？这个问题从七、八年前就已经被提出来了。最近两年来，这个担心演变为一种和“优越感”和“失落感”相交杂的情绪。目前在华南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有个很强烈的声音，就是担心被长江三角洲地区超过。我到广东去，媒体记者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珠三角”和“长三角”哪个更有优势。还有人在网上发表了一篇言论，叫《谁抛弃了深圳》，曾经在当地引起很大反响。至少我们感到，特区和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明显表现出一种忧患意识。其实，“珠三角”地区持续高速发展的答案已经有了。首要的就是调整区域产业结构。“中国能否成为世界制造中心”这个命题最初就是由这个地区提出来的。两年多前，广东就提出要树立“广东制造”的品牌问题。

曾经有人提出，广东的制造业层次低，缺乏核心竞争力，不应作为战略方向；认为广东和“珠三角”地区应当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新型金融服务业才对。我看这个认识有片面性。在中国工业化的现阶段，制造业就是最有前途的优势产业之一。事实上广东目前的经济发展已经极大地受益于制造业的发展。

在“珠三角”地区，不仅制造业呈现为加速聚集的态势。而且其他一些新兴服务业也呈现出很大的扩张态势。深圳原来有什么旅游资源吗？几乎没

有。但现在深圳的旅游业已经成为当地增长最快的产业。不知大家去过深圳的“世界公园”没有。那里的主题公园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世界一流的水准。现在深圳的旅游项目已经成为内地游客到“港澳游”的一个重要附加部分。

不仅特区经济需要靠调整结构，连香港经济发展的战略立足点也在于调整结构。过去在香港的经济中，过境贸易是一个大项。现在内地产业与国际市场的连接关系越来越紧密，而且人们都清楚，台海两岸最终实现“三通”是谁都阻挡不了的。这样香港就得为自己寻找新的出路。大家知道香港最近在兴建亚洲第二座“迪斯尼”乐园，以图大力扩张旅游业，改善香港的产业结构，但很少有人注意到是谁投资的这个项目。这个项目目前是香港政府投资的。历史上，香港政府是从不投资于商业化的项目的。为什么这次破例了呢？因为这个项目对香港结构转型，对香港的经济非常重要。香港政府不惜打破规矩亲自投资，不惜填海造地兴建这个项目，为什么？因为香港现有的旅游资源不足以支撑香港产业结构转换，不足以支持旅游业成长为支柱产业。香港政府的打算是投资建成后，在真正商业化运作阶段再把股权卖掉。

再一个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的例子是云南。人们知道云南的烟草工业非常发达。云南品牌的香烟曾一度垄断了国内高档烟市场。那时云南省财政的70%靠烟草。人称“烟草财政”。但云南很早就意识到，烟草的饭是吃不长久的，因为别人很快就会学会做同样的事。

90年代初期我曾在云南的玉溪烟厂调研过一个多月，那时褚时健还在任。褚时健告诉我，引进先进设备、培育原料基地、实行糖化发酵工艺等经验都是说给记者们听的，真正的秘诀其实很简单。就两条。一条是一定要把烟梗挑出来。当时我们国内的很多烟厂舍不得“浪费”，把烟梗切碎了仍然搀在烟里。结果人们吸的时候老熄火。另一条是粘过滤嘴和烟纸要用进口胶水。因为当时国产胶水易发生“漏气”、“掉头”的毛病。大家想，像这样的诀窍，行内人当然很快就可以悟出来。现在各省都出了一些地方名牌，在质量上一点不比云南的卷烟差，很多还超过它。我去年到红塔集团调研，研讨的题目就是红塔山怎么应对这种“同质化”的挑战。人家不愿意说被超过的挑战，说同质化的挑战，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云南省很有远见，很早就开始实施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在传统的烟草、有色金属之外，现在已经发展起来了旅游、热带种植业等新兴产业。云南是全国第一个提出要建成“旅游大省”的。从“世博园”起，现在云南全省的旅游经济已经成势。丽江本来是个落后的地方。我们前不久去时，看到地震灾后重建的城市非常漂亮，而且各种旅游设施非常齐全。少数民族的导游小姐可以讲非常好的普通话和英语，很专业，素质非常高。现在北京、

上海以至东京、汉城所卖的鲜切花，很多都是云南空运供应的。一个地处边陲的不发达省区，现在知名度很高。旅游团趋之若鹜。靠什么？靠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战略的成功。

现在很多省区都意识到结构调整的重要性。湖南也提出，我们湖南的少数民族不比云南少呀，因此湖南也要建成旅游大省。新疆、甘肃、宁夏、贵州、四川以至东北的辽宁、黑龙江等省区都提出了要大力发展旅游业的设想。

现在人们知道了，原来旅游资源并非就是人文古迹、庙宇石碑。几乎什么都是旅游资源。甘肃说，甘肃不仅有敦煌，而且有戈壁滩。戈壁滩也是旅游资源。就有人愿意来看"风吹石头跑"的景象。"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个氛围也很吸引人。

辽宁原来不重视旅游业。他们重视的是钢铁。钢铁多年是国民经济的"老大哥"，旅游算什么？在很多人心目中旅游不过是"不上台面"的小打小闹。但现在辽宁居然也提出要建"旅游大省"。辽宁其实有很多非常优质的旅游资源。除了人们熟悉的大连，还有很多港口城市。海港本身就是旅游资源。辽宁的锦州、本溪都有很好的自然景观。本溪有个"水洞"，名字听起来平淡无奇，但那是一个很大的地下溶洞，还有可以行船的地下暗河，非常奇特。多年来，鞍山的名字是和钢铁连在一起的。但大家可能不知道，鞍山已经决心要吃"旅游饭"了。鞍山出玉石，现在那里造了一个据说是亚洲最大的玉佛。当然，有佛教界的人士说，那还不能叫佛，只能叫雕像。得有高僧住持过的才能称为"佛"。但不论怎么说，当地不惜工本地发展旅游业的决心由此可见一斑。

东北工业基地的再振兴，关键问题之一也是区域内的产业结构调整。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再说。

【6-2-2】区域经济发展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涌现出了一批经济发展异常迅速的所谓"副省级"城市。这个现象的出现并非是政策、战略有意为之，而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结果。"副省级"城市这个现象意味着我国区域经济中新的经济增长点和产业聚集核心正在形成。

第二，"副省级"现象。

在过去几年中，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涌现出了一批经济发展异常迅速的所谓"副省级"城市。原有的相对靠后、经济规模总量并不十分大的一些非省会城市逐步成长起来，成为在国民经济中影响很大、举足轻重的城市。人们熟悉的就有深圳、大连、宁波、青岛、厦门等。

这些城市的经济都非常有特点。

深圳是一个特例。如同一首歌里唱的，“一个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就圈出了这样一个充满朝气和活力的新兴城市。深圳的最大成功并非是建造了一座城市本身，其最大的成功在于引进和试验了市场经济的活力，在于带动了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华南地区以至国民经济的发展。现在深圳人心里想什么呢？是有朝一日赶上和超过上海甚至香港。在深圳人的眼里并没有把省会城市的广州列为竞争对手。

青岛是个著名的旅游城市。但青岛这些年更引人注目的不仅是旅游业的发展，不仅是城市建设的突飞猛进，而且是名牌企业的不断涌现。随便数数，中国现在最知名品牌中青岛占一个相当大比重。海尔、海信、青岛啤酒、澳柯玛、双星等等都是家喻户晓的企业品牌。

青岛的名牌企业聚集也是一个奇特现象。为什么这么多名牌企业出自青岛？或者说，为什么青岛这个地方能够产生这么多名牌企业？为什么这些名牌企业没有出在省会城市的济南？人们对此有过很多探讨。依我看，最重要的是环境。企业家的确很重要。褚时健接手玉溪烟厂的时候，那个企业仅仅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小烟厂。别说全国名牌，连地方名牌都谈不上。在他手里，玉溪烟厂发展为红塔集团，红塔山香烟不仅一度红遍全国市场，而且在东南亚都很有名气。不管褚时健后来的结果如何，我们不能否认企业家的贡献。有人说是企业文化。我看这个说法也值得质疑。青岛啤酒原来有什么企业文化？就是老“国企”的文化。一直到90年代初期，青岛啤酒的前途可以用岌岌可危来形容。后来换了人，就有了今天如日中天的“青啤”。但企业家毕竟是可以流动的，生产能力也是可以流动的，唯有环境不能流动。青岛的啤酒节可以说是“一石双鸟”，既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又巩固了青岛啤酒在业内的“盟主”地位。其实，任何一个地方的企业都有可能成长为名牌。但没有适合企业成长的环境，有了名牌也得丢掉。山东其他地方也不是没有出过名牌。在白酒行业，山东是出过若干个名牌的。大家还记得当年有个“秦池”，曾经以“天价”夺得央视的“标王”。但现在也沉寂多时了。

青岛不仅出名牌企业，而且在城市建设和城市规模扩张上有独到之处。青岛是最早创出建“新区”的城市扩张之路的城市。青岛市政府也是最早提出和实践“经营城市”的地方政府，当然，“经营城市”的发明权是大连。但青岛最早进行了大规模实践，这是无可争议的。青岛市政府是把办公地搬到了新区，带动新区的基础设施完善和土地及其他城市资源升值。这个战略决策不仅极大地拓展了城市旅游业发展的空间范围，而且给老城区改造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最近一些年来，大连是受人们赞誉最多的城市之一。大连的城市面貌确实漂亮。它最早提出要在城市中“开墙透绿”，实行绿色资源的共享。这个城市面貌整治的初期，老百姓也是很反对的。因为难免要触及很多人的利益，包括一些弱势群体的利益。下岗职工在街头摆个小摊，搭个棚子为生。一整治被拆除了，他当然反对。但整治完成后，老百姓又都是一片称好的声音。我到大连，那里的干部群众都很为他们的城市骄傲。大连有个很大的城市广场，建得非常漂亮。这个广场设计者的高明之处不仅在于突出了依山傍海的视觉美感，而且把现代化城市的轮廓和自然景观很巧妙地结合在一块了。这很不容易。很多地方，比如我们广东的惠州，也有不错的自然风光，但在山、湖之间建了几个度假村、大酒店，从城市中眺望过去，很不协调，很刺眼。大连这个广场相当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大连“开墙透绿”，我认为是为全国的城市化带了个好头。

由于历史条件，大连原来的城市基础设施是相对较弱的。由于街道狭窄，交通经常堵塞。大连的地势有个特点，与青岛、重庆有类似之处，就是城市道路的起伏很大，不适于骑自行车。怎么改造呢？人们提出了很多方案。有说建立交桥、高架路的，有说拆房扩路的。这些方案都因代价太大而“搁浅”。这时有个“高人”对当时的市领导说，给我两个月的时间，我给你提个方案，用不着花太多的钱就能改好。这个专家用这两个月时间走遍大连，调查路况和交通流量，最后画了一张图，说你照我这个图改，把大部分路都改成单行线，交通肯定就通畅了。果然，仅此一改，大连的交通状况立刻得到了极大改善。当然这里面有些传说的成分。但大连现在的道路大部分都是单行线，这确是事实。

大连的发展不仅是因为城市绿化搞得好，更重要的是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发挥了巨大作用。过去谁听说过大连有制服装的传统呢？没有。人们记忆中出名的是上海服装。在很长时期内江苏、浙江一些乡镇企业生产的服装都写一个上海的厂名。但大连人就敢办一个国际服装节。这个服装节现在已经成了品牌。大连国际服装节不仅带动了商贸流通业、服装业的发展，而且带动了旅游业、酒店业和其他社会服务业的发展。城市产业结构为之发生了很大变化。更重要的是，这个举措大大提高了大连的知名度，拓展了对外开放的空间。有一次我到辽宁听到一个说法，说我们这里是“大连国、沈阳省、辽宁市”。不管这种说法包含一种什么样的看法或者情绪，大连在辽宁的经济地位不断提高，对区域经济的动作用不断增强是毋庸置疑的。

宁波和其他几个“副省级”城市的情况又不一样。宁波本身并不很大，但宁波周边聚集着的一批县级市的发展程度都很了不得。由此造就了一个经

济发达的城市群。宁波和浙江整体的情况有类似之处，最值得关注的就是改革彻底。我到宁波调研时，那里的人们告诉我，宁波已经没有什么国企职工这个身份了。所有的就业者的体制身份转换任务都已经完成。相应地，那里也就没有什么下岗职工了。没有下岗职工不是说没有失业问题，而是说没有其他地方那种体制身份的“双轨制”了，就业问题的社会保障统一为失业保障，而且那里也没有什么纯粹的“国有企业”了。没有国企不等于没有国有经济。有的只是国有资本，只是在企业中的国有股权。

这些“副省级”城市的兴起使区域经济有了出乎意料的表现。这个现象的出现并非是政策、战略有意为之，而是“无心插柳柳成阴”的结果。“副省级”城市这个现象意味着我国区域经济中新的经济增长点和产业聚集核心正在形成。实际上，目前还没有取得“副省级”地位，但经济总量、区域经济中的地位以及城市规模的扩张速度等都显现出赶超省会城市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江苏的苏州，内蒙古的包头等。

【6－2－3】我们要努力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让西部人民看到一个变化。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一个相对明确的时间概念，叫做“争取十年内取得突破性进展”。在西部大开发中要逐步建立长期稳定的西部开发资金渠道，引导外资和国内资本参与西部开发；并且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在改革开放中走出一条加快发展的新路。

第三，西部大开发。

最近两年来，西部大开发已经成为我们普遍关注的一个区域发展战略。很多人说，在前一个战略发展过程中，东西部之间的发展差距拉大了。这是事实。但这个差距拉大是由很多原因造成的。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过去十年左右的周期内，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是有很好的表现，作出了很多成绩的。

90年代以来，西部地区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功不可没。西部最大的贡献就在于扶贫开发。90年代初期，全国吃不上饭的贫困人口有2.4亿人。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现在我国的贫困人口只剩下不到3000万了。脱贫的这两亿多人群，西部地区占了大多数。让2亿人从温饱不足逐渐走向温饱，这个成绩不应低估。

战后五十多年来，联合国在援助发展中国家上不知花了多少钱。派出专家、兴修水利、援建医疗教育设施等。但迄今这些受援国家的大多数仍是战乱频仍、瘟疫横行。非洲很多经济欠发达国家仍有大量人口常年处于饥饿状态。我看过一幅照片，一只饿鹫虎视眈眈地盯着一个垂死的黑人小女孩等待一顿美餐。这张照片后来获得了普利策新闻奖。不要说非洲，在亚洲也有相

当数量的人口远未实现温饱。我们前面说印度这些年来的工业化进程比较快。比如印度的软件业世界排名靠前、钢铁业、石化业也具有相当规模等。但印度的贫富悬殊非常大。印度现在的人口超过10亿。很多到过那里的学者回来说，什么叫“第三世界”？去过印度就知道了。在人类文明发源地之一的恒河流域，你可以随处可见饿殍倒卧路边的悲惨景象。我估计印度的贫困人口应当不下于两亿。中国用十年左右的时间让两亿人口吃饱饭这件事，应当说是对人类、对世界的一个很大的贡献。

当然，我们目前的脱贫标准还是比较低的。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说，目前没有摆脱贫困的3000万左右，这是按每年人均收入625元的标准计算的。大家知道，这个标准是低水平的，如果标准再增加200元，农村贫困人口就是9000万。我们没有隐讳这个事实。但无论如何，西部地区在“扶贫”问题上的贡献不能忽略。

坦率地说，我们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最初是比较粗糙的。在2000年最初提出来的时候，并没有很明确地指明“大开发”要开发什么，开发到什么程度，开发的结构该如何把握等等。由此导致人们对西部大开发的期望值过高。很多西部省区提出，中央把当初给深圳特区的优惠政策给了西部，西部就能实现华南地区、经济特区那样的增长。后来中央真的把在特区实行过的政策全部给了西部。比如对外商投资的“两免三减”政策现在整个西部省区都适用。但结果是并没有像人们想像的那样出现外商向西部的涌入和西部经济的迅速改观。

西部大开发是一个需要几代人才能最终实现的目标，不可能像深圳一样在十年间造就一个接近现代化的城市经济，也不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就根本改变西部地区贫困落后面貌。但我们要努力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让西部人民看到一个变化。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一个相对明确的时间概念，叫做“争取十年内取得突破性进展”。在此前的西部开发规划中，我们一直没有提出比较明确的时间目标。究竟到什么时候，开发到什么程度？现在明确了，十年左右要取得突破性进展。突破在哪些方面？从“十六大”报告和原国家计委拟定的西部大开发总体规划上看，在未来一段时期内西部大开发的要点主要是四个方面。

一是打好基础，扎实推进，重点抓好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

把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放在第一位，这个安排是有明确意图的。西部省区这些年的基础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还远不充分。例如水利设施不足，铁路路网单薄，公路通达程度低，不少乡村还没有通电，电话普及率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城市基础设施欠账多。特别是环境问题，在西部省

区的经济发展中必须格外重视。西部地区陡坡耕地面积占全国的70%以上，水土流失面积占全国的80%以上，荒漠化面积占全国的90%以上。资源开发必须与环境保护并重，这是西部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我们前面说到，西部有些资源是不能开的。因为利用这些资源的环境代价远远超过经济收益。

1998年以后，我国出台了一个全面“禁采”的规定。在西南一些省区中有些贫困县就是靠砍木头为生的，当地官员称为“木头财政”。现在一棵树都不让砍了，当地经济遇到了极大困难。遇到极大困难也不能砍。1998年的洪水警示太深刻了。上游水土保持不好，我们大江河的下游就无法避免洪涝灾害。整个大江河流域的环境就会遭到彻底的破坏，在这一点上绝不能因小失大。

在环境问题上我们是有很深刻教训的。环境一旦破坏，往往是无法恢复的。人们现在都听说过九寨沟这个地方。九寨沟是一个自然景观极其优美的地方。我曾经去过，用人间仙境、亦真亦幻等词汇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但九寨沟是怎么发现的呢？九寨沟是一个藏族人聚集的地区。大家知道，我国的少数民族聚集有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按照海拔高度分布。不同民族驻在不同海拔高度的地区。不论在青海、四川还是云南，藏族一般住的都是海拔最高的地区。九寨沟外是一条延绵数百公里的山谷。实际上过去这条山谷都是像九寨沟一样美丽的原始森林。一些年来，人们沿着这条山谷砍树，山的低处和中部都砍光了，差不多砍到海拔最高的地方时碰到了一支地址勘探队。勘探队对这种掠夺性砍伐活动大吃一惊，紧急给中央直接打报告，九寨沟的美景才在最后毁灭的边缘被保护下来。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桂林山水甲天下”之说迄今已有800年。直到90年代初期，桂林地区竟然出现了很多利用当地石灰岩烧水泥的水泥厂。究竟是水泥值钱呢还是宝贵的山水旅游资源值钱呢？这种短视行为绝对不应再在西部大开发中重现。当然桂林现在也绝对不会再干拿美景换水泥的傻事了。

西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统一的一个交点是发展环保产业。环保产业已经成为了当前我们在西部大开发中的一个政策输入点。因为环保作为产业，最开始可能不挣钱。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就把环保投入和扶贫结合起来。把国家的贫困救济变为环保投入。贫困地区的老百姓参加种树、参加小流域改造、参加大江河治理的投工由国家支付工资。既扶了贫，又改善了环境。

目前我们在环保领域里头也有一个新的探索。这就是把环保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密切结合起来。例如在很多生态脆弱的地区推进“一退三还”。退耕还林、还草、还湖。一些贫瘠的土地、生态代价得不偿失的土地就不要再去

耕种了，把它们退还到自然状态去。现在我们并不缺粮食，缺的是良好的生态环境。最近一些年来，中央财政在这个调整上提供了很大投入。

二是积极发展有特色的优势产业，推进重点地带开发。

在西部大开发的政策中，应当注意到中央政策的一个新提法，这就是强调“特色产业”和“重点地带”。

近年来，西部很多省区都发展起了一批极具特色的优势产业。除了前面讲到的与独特的民族、自然景观相结合的旅游业外，还有陕西的林果、青海的钾肥、内蒙古的羊绒和稀土、新疆的番茄、云南的锡、广西的铝矾土等产业。

以前有多少人听说过陕西出苹果呢？人们只知道陕西出小米。现在陕西是亚洲最大的苹果种植基地。内蒙古的羊绒业也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产业。羊绒又称“软黄金”。按重量说，它的价格比黄金还贵。内蒙古的羊绒制品已经形成了若干著名的国际品牌。就是说不仅出原料，而且已经发展起来了国际一流的加工制造业。当然现在发展羊绒业也还有一些科技难题需要突破。因为产羊绒的只有山羊。这些山羊有个毛病，它们不但吃草，而且还爱啃草根。这样就把草原资源的生态给破坏了。有些专家说内蒙应当禁止发展羊绒业以保护环境，我倒觉得不应当因噎废食，因为科学技术总会有办法解决人工饲养下的饲料问题。不会老让山羊去啃自然草原的草根。山羊这个物种之所以能够存续到今天，大自然一定有一个让它和草原之间保持平衡的办法。否则这个物种早就灭绝了。只不过我们现在还没有认识到大自然的奥妙究竟何在就是了。内蒙还有一个优势产业就是乳制品业。90年代初期曾经有一段，台湾省和韩国等地的冰激凌在北京大行其道，好像我们自己连冰棍都不会造了。但很快，内蒙的伊利冷饮就把这些外来品牌挤出了市场。

新疆地处西北，是个严重缺水的地区。但缺水不等于农业不发达。内地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新疆的农业是很发达的。区内农业一年生产的粮食和棉花产量足够满足全疆人口两年的消费需求。那里土地多得不得了，但就是缺水。在过去五年里新疆每年都为两件事发愁，这就是棉花和粮食的价格与市场。最近一些年，由于粮食和棉花的价格起伏不定，给区内经济造成了很大麻烦。棉价暴涨的时候很多人去抢购，由此就有了所谓的“棉花大战”。棉价暴跌的时候，各地又实行地区封锁，新疆的棉花怎么也卖不出去。近年来新疆还发展起一个优势产业，就是番茄制品。新疆那个地方特别适宜种植番茄。现在番茄汁、番茄酱已经成为了新疆的重要出口产品。

四川近年也培育出一个特色优势产业，就是生猪养殖业。现在全国猪肉生产最大的基地就在四川。人们都听说过四川的刘永好，他的希望集团是最

大的私人资本集团。刘永好最初是怎么发财的呢？就是生产饲料起家的。

在西部有些省区，还有一些在规模和后备资源前景上为区外竞争者无法相比的优势产业。例如宁夏、陕西、内蒙古的天然气和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的水电。过去几年中，我国西南地区向东南亚卖电已经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人们发现，西南地区的电力送到东部来并不划算，所以现在干脆往越南、柬埔寨、泰国这些地方卖。而且在过去几年增长的速度是奇快的。广西2002年向境外输出的电力规模比2001年增长了5倍，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支持因素。

西部省区在工业领域也有一些重要的优势产业。例如陕西等地的飞机制造业最有希望发展成为我国支线飞机的生产基地。内蒙古的重型矿用载重车不仅在技术上已经趋近国际先进水平，而且已经具备批量生产的能力。云、桂、黔等省区以及西北一些地区已经形成为我国最重要的有色金属生产基地。盐化工以及我国稀缺的钾肥生产能力的主要配置地也在西部省区。进入“十五”以来，我国的汽车工业，其中特别是轿车工业发展异常迅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国东、中部和重庆、四川、广西、陕西等地的汽车制造业之间相互提供了强大的配套生产能力。2002年中国的汽车市场出现了快速扩张的局面，西部很多省区也受惠于汽车这个新的产业热点。这一轮增长与此前不一样的是，在以前的热点产业发展中，西部省区老是比东部慢一拍，老是赶在市场高潮的末期。这一次的特点是西部和东部几乎同时启动。

西部发展还有一个独特的优势，这就是有些产业占有着区域性垄断的市场资源。西部地域辽阔的特点为一些产业提供了存在和发展的空间。新疆、重庆、四川、甘肃、贵州、内蒙古等地的钢铁、水泥等产业就明显具有这种区域性市场垄断优势。过长的运输距离使外部竞争者很难参与到区内竞争中来，因为运费不划算，不如就地生产。区域内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产生的大规模需求为这种就地生产、就地销售，具有明确市场指向性特征的产业提供了长期的发展基础。

在西部很多省区，还有一些产业因民族、地缘等关系占有着区域性的国际市场。其中很多省区的轻工、纺织、服装、建材、烟酒、大小家电、机械、汽车以及少数民族特需品等在周边国家的区域性市场内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并拥有垄断性的市场份额。目前，沿周边边境线的各省区已经形成了以边境口岸加工区、纵深边境城市和区内中心城市加工区三道针对这种境外区域性市场的产业加工梯次。可以预见的是，这种依托区域性市场的产业也将成为西部省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增长点。

西部大开发中提出了一个“重点地带”的概念。按照西部大开发总体规

划，目前这个“重点地带”定位于四个区域。其一是西陇海兰新线经济带，其二是长江上游经济带，其三是南（宁）贵（阳）昆（明）经济区，其四是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重点地带”的问题我们下面还要涉及。

三是逐步建立长期稳定的西部开发资金渠道，引导外资和国内资本参与西部开发。

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其中倾斜性发展政策的重心已经从东部沿海地区转移到了西部省区。目前的支持西部发展的政策涉及加大建设资金投入力度、优先安排建设项目、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加大金融信贷支持、大力改善投资软环境、实施税收优惠政策、实行土地适用优惠政策、实行矿产资源优惠政策等多方面。其中国家明确提出，要“集中力量在水利、交通、通信、能源、市政、生态、农业、科技、教育和农村基础设施等方面建设一批具有明显带动作用的重点工程，扎扎实实地推进西部大开发”。

与此前东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区域性政策相比，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政策优势有三个特点。其一是政府直接投入和政策性的资金投入力度空前。其中包括政府直接投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财政转移支付、优先安排外国政府贷款和政府投资环境保护等措施。其二是政策惠及的范围极为广阔。相当多在东部实施中只惠及“特区”的政策被普遍应用于西部广大地区。例如对设在西部地区符合国家鼓励类的内资和外商投资企业均实行财税减免的优惠政策。其三是侧重于长期性的战略发展。在相关政策体系中，对环保、资源开发、产业结构调整、城市化、人才培养、经济运行机制转轨等给予了比东部发展时高得多的关注。

四是进一步解放思想，在改革开放中走出一条加快发展的新路。

在西部经济发展问题上，政策支持、注重自身优势、鼓励外部资金投入等都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推进改革，要形成一个市场化的区域经济运行机制。单纯依靠政府力量、依靠外部支持，西部大开发是不可能成功的。西部在体制特征上有双重不利因素。一个是城市经济中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非常深。因为那里相当部分的工业生产力都是计划经济下形成的。另一个是自然经济，小农经济在广大农村地区仍是主要的经济形式。

2002年，我主持了一个“西部未来15年发展前景”的课题。在这项研究中，我们发现，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西部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已经出现了与全国同步的特征。其中市场化程度得分达到或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区有重庆、四川和广西。虽然大部分省区的排位仍比较靠后，但是得分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其中陕西、宁夏、新疆上升幅度较大。这个评价所用的指标叫市

场化指数。这个市场化指数是从政府与市场关系、非国有经济发展、产品市场发育程度、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等5个方面，选取19个指标综合计算得出的。

西部地区对“大开发”是寄予厚望的。从2002年起，中央准备建一个以国务院名义召开的“西部论坛”，每年举行一次，以此形成一种舆论的力量，推进中、西部交流以及西部和国外经济之间的相互了解。这个协议提出以后，西部很多地方都表现出了极大热情，都争取把“论坛”设在当地。其中最积极的是西安、成都和重庆。这三个城市都认为自己具有西部“盟主”的地位，纷纷派出自己的队伍到中央有关单位去游说，开出各种各样的优惠条件。当然最后设在哪里是中央说了算。但这也反映出，我们西部地区对尽快实现发展的急迫心情。

【6－2－4】在过去很长时期内，很多省、市的发展战略经常是只考虑我有什么优势。谁都说，要把自己建成“辐射”周边多少省、市、县的经济中心。这种战略看起来雄心、决心很大，但往往不切合实际，也不符合客观规律。市场经济就是分工经济。分工越发展，相互之间获取比较利益的程度就越大。近年来，我们很多地区都在实践中渐渐悟出了这个道理。我们生活中“珠三角”、“长三角”的说法，其实反映的都是区域性分工协作关系的形成。

第四，区域经济合作。

“十五”计划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明显特点是跨行政区划的区域性经济合作发展很快。

我参加过不知多少区域发展战略的研讨。在过去很长时期内，很多省、市的发展战略经常是只考虑我有什么优势，我这个地方怎么发展，很少涉及和周边、和其他区域的合作、分工以及市场互补等问题。如果有涉及周边环境的地方，也是一厢情愿的居多。谁都说，要把自己建成“辐射”周边多少省、市、县的经济中心。这种战略看起来雄心、决心很大，但往往不切合实际，也不符合客观规律。市场经济就是分工经济。分工越发展，交换就越广泛，发展的机会就越多，相互之间获取比较利益的程度就越大。近年来，我们很多地区都在实践中渐渐悟出了这个道理。

现在的区域合作不是80年代末期那种政府“拉郎配”的“横向经济联合”，而是市场力量主导的联合，分工发展造就的合作。我们最近常说“珠三角”、“长三角”的说法，这其实反映的都是区域性分工协作关系的形成。

所谓“珠三角”包含着粤港经济合作和广州、深圳经济合作以及整个珠

江三角洲地区很多经济发达的市县之间的合作三个层次。这其中还有个微妙变化。以前“珠三角”内部的竞争也是很激烈的。惠州说要树立“惠州制造”的品牌，东莞说要树立“东莞制造”的品牌。现在那里的人们谈论“珠三角”，更多的含义是我们整个地区怎么共同应对外部其他区域的竞争。区域内的彼此竞争正在被协同合作所取代。以前在很长时间内，“珠三角”在国内没有对手。现在有了。很多地方都憋着劲要赶上和超过它。所以区域内的人们就有了共同的危机意识、忧患意识。

现在粤港之间的经济关系发展也处于一个微妙期。亚洲金融危机以后，“珠三角”地区仍继续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区域内的产业竞争力不断改善。过去两三年内，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一的家电大国、通讯及计算机类产品出口旺盛，“珠三角”地区是功不可没的。但一个鲜明的对照是，香港经济一直处于低潮，迄今仍是失业率高涨、物价及市场紧缩状况明显。2003 年的 SARS 疫情给香港的冲击可能要比广东大得多。因为广东的产业结构和香港不同，大量制造业并不怕疫情。香港走出困境的出路在于更紧密地加入到这个区域经济合作中来，香港人也知道。但是他们面临两难。香港过高的工资水平、楼市价格束缚了香港人自己的手脚。香港的工资、房价比美国还高，形成了一个“骑虎难下”的局面。

“长三角”地区的合作也可以用“如火如荼”来形容。大家知道，浙江的宁波和上海之间要修建一座长距离的跨海大桥。这座桥可以把上海的经济辐射力顺畅地延伸到宁波、温州等地。江苏的苏州以及无锡、常州等地也在努力向上海靠拢。浙江与上海交界的浙江一侧，有个地方叫昆山。那里差不多快建成“小台北”了。据说有十多万台商举家在那里定居。社区环境、各种配套服务设施都是按照台湾的样式来配备。还开设有台湾人的子弟学校，用繁体字教课，因为人家怕小孩子将来回台湾不认识繁体字。

其实，“长三角”地区内部也存在着很微妙的关系。在 90 年中期以前的很长时期内，江苏经济的发展一直是优于浙江的。但是近年来，浙江明显占了上风头。从历史上看，浙江其实并没有多少工业化的“家底”，而江苏仅南京周边就聚集着那么多的石化生产能力，而且以往国家还在汽车、电子、家电等产业投下过大量资金。要说工业化基础，浙江和江苏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浙江靠的是改革比较彻底，市场化程度比江苏更高。在“苏南模式”下的集体经济处于调整期的时候，浙江迅速跃起，区域内竞争也很激烈。还有一个竞争是承认不承认上海是“龙头老大”的竞争。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到浦东开发的过程中，浙江、江苏都有过摇摆。在一段比较长的时期内，杭州、南京都想成为区域经济中心，不服上海。而且对省内一些地市级城市向上海

靠拢持警惕的态度。但很快，江苏、浙江都发现，这个区内争强的局面是维持不下去的。江苏的“苏、锡、常”地区的企业家、甚至政府官员越来越多地往上海跑，而不是往南京跑。浙江的宁波也是越过杭州向上海频抛“绣球”。现在“长三角”地区内的人们已经认识到，合作是区域经济共同发展的最优选择。沪甬、沪杭、宁沪之间不仅都有高速公路直通，而且城际快速轨道交通也在酝酿中。

前不久央视找我作节目，内容是关于“长三角”地区十几个城市的旅游业要相互开放，形成一个合作团队的。过去这个地区内的旅行社是不能相互到对方城市去设分社的，游客只能在各个城市的旅行社之间被“卖”来“卖”去。央视的主持人问我，为什么要合作呢？我说，长途旅游、400公里城市圈的城际旅游和城郊旅游是旅游的三个层次。“长三角”的城市之间就是这样一个400公里的城市圈。这个圈内是一个互为客源、互为旅游目的地的市场。不合作，谁也发展不好；合作，大家就都能获得更大发展机会。现在“长三角”也在走出区内竞争的狭小范围，共同向区外其他区域发出挑战。

特别值得提出的一点是，“珠三角”、“长三角”区域经济有一个不应忽略的背景。这就是沿海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的战略。谁也不想错过“率先实现现代化”这趟车。参与区域合作，是搭乘上这趟快车的必然选择。

当前的区域经济合作远不止“珠三角”和“长三角”两个区域。西部大开发中有个重点区域叫“南、贵、昆经济区”，指的就是广西、贵州和云南三个省会城市之间的合作。这三个省会城市都打环保牌，纷纷把自己命名为“森林城市”、“绿色城市”、“生态城市”。人们知道，西南这三个省区的经济基础总体是比较薄弱的，但弱中有强。三省合作是“弱弱联合”，三个省会城市合作可就变成了“强强联合”。这三个省会城市的合作可以形成一个谁也不敢忽视的、强大的区域性工业生产能力、城市化推动力量、西南地区完善基础设施的中坚力量。实际上，这三个城市还都有自己的“亲戚朋友”，也就是在区外的合作伙伴。比如上海和云南是对口支援地区，这两个地区的关系非常密切。云南旅游业发展起来后，飞云南的航线成为了“热线”。但现在除云南自己的“云南航空”外，能够从省外直接飞到西双版纳、大理、丽江的飞机只有上海航空，其他公司的飞机都只能飞到昆明，包括国航的航班。游客要是坐其他公司的飞机，必须到昆明中转。这三个城市的合作基础还有很多，大家打开地图看一看就会发现。这三个城市联线所覆盖的区域，恰好是我国水力资源最丰富的地区、有色金属资源最丰富的地区。

北部和西北也有类似的合作，例如“呼、包、银经济合作区”。就是呼和浩特、包头、银川三个城市的跨行政区划合作。一方面，内蒙西部一直延伸

到宁夏的这个地区，总的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但这三个城市的联线地区则并不差。从农业上说，“黄河百害、唯富一套”，黄河的“后套”地区就在这一带。在这个地区，黄河水可以自流灌溉。人们对包头的了解可能不太多。其实包头的工业基础是非常雄厚的。不仅有包钢，而且还是我国炼铝的有色金属生产基地。还有非常强大的重型装备机械加工能力。那里原来有个一机厂、二机厂，分别生产坦克、大炮。现在很大一部分生产能力已经转为民品生产，和德国奔驰合作生产重型矿用汽车。当地人给这种重型汽车起了个名字，叫做“草原奔驰”。包头还是世界最大的稀土生产基地。过去包头是计划经济“嵌入”西北地区的一块“飞地”。那里的重工业和当地经济联系非常薄弱。在包头，通用语言是东北方言。出了包头则是西北方言。可见以往包头与周边经济的关系隔绝之深。

银川也不简单。宁夏是我国的“袖珍”省区。人口只有500万。一方面，宁夏有最贫困的“三北”地区，但另一方面，银川所在的宁夏平原是个水草肥美的地方。那里宜工、宜农、宜商、宜副。银川附近煤炭资源很充裕。能源、化工等产业的发展具备很好基础。农业有黄河水灌溉，商业也很有传统。不知道大家注意过没有，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和汉族的文化传统有个区别。汉族的文化传统是“轻商”。“士、农、工、商”，商排在最后一位。中原文化中，历史上商人的社会地位很低。但伊斯兰教民族不一样。他们历史上就有“重商”的传统。在“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中，贵族和平民都到海外去经商。人类最早的大规模海外商贸业就是阿拉伯人开始的。这个地区的合作也是很有前景的。

再给大家举一个区域经济合作的例子。江苏的苏北地区历史上一直是发展滞后的。人们说起江苏，总是提到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张家港等城市，很少提起徐州。最近徐州和周边几个省区的地级市在酝酿形成一个跨省区的“淮海经济合作区”。苏北那里是江苏、河南、山东、安徽四省交界。江苏的徐州和山东的枣庄、安徽的淮北、河南的商丘等市的官员坐到一起商量，说我们四个地区在各省发展程度上都是较低的，也都是在各自省里不大受重视的。这么多年来我们都在等着本省重视，等来等去，看来是指望不大了。现在不如我们四个“穷哥们儿”联合起来，跨行政区域地进行跨界合作，共同推进区域经济发展。别小看这四个城市。这四个城市是华东地区的重要能源供应地。枣庄、淮北、徐州的煤炭要是停一停，上海的经济立刻就会陷入大麻烦。这四个地区还是京九、津浦、陇海以及京杭运河等交通要道的交汇处。凭这几个地区的资源、区位等各种优势，他们确实有发展更快一些的条件。原有行政区划的分割现在正在被打破。这个淮海经济区最初酝酿的时候，

江苏省还有些不以为然。认为凭你徐州的基础，莫非还能搞出一个“苏北省”来？现在看这个合作趋势越来越明显，省里的态度出现了很大变化，从观望转为比较积极的支持。当然，省里的这个支持也有自己的打算。这个打算就是希望江苏一方在这个四省“联盟”中能占据一个“盟主”的地位。

【6－2－5】凭东北的资源和国民财富存量，摆脱困境、实现经济发展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东北的存量资源为什么不活跃？关键是被旧体制形成的一些经济关系束缚住了。理顺这些经济关系，资源就会在“看不见的手”的推动下流动起来，活跃起来。区域产业结构就会自动出现良性化的调整。市场化的力量、非公经济、中小企业就会自发地成长起来。被束缚的资源不能释放出来，新的体制力量就没有生长的余地。

第五，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改造。

从9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实际上包括三大块。就是西部大开发、东部率先实现现代化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最近两年，人们对前两个部分听得比较多，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发展战略了解可能不是很多。其实我们的区域战略、政策一直是具有向东北老工业基地倾斜的特征的。上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国务院副总理一级，几乎没有人没到东北调研过。本届政府温家宝总理在上任后的第一个记者招待会上就明确地说，“要把老工业基地的改组、改造和振兴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东北并非是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那里的矿产资源是非常丰富的。煤炭、铁矿石、石油等都非常富集。东北地区，特别是辽宁省，工业固定资产人均占有水平、城市化水平也是全国最高的。此外，黑龙江的大豆、吉林的玉米也是非常出名的。南方人爱吃大米，其实最好吃的大米不产在南方，而是产在东北。北京卖大米的小贩那里，米口袋上印的都是东北大米。当然不可能都是东北大米，肯定有很多是冒牌货。但这也说明东北的农业基础是很雄厚的。至于钢铁、汽车、石化等基础产业的生产能力，东北更是最重要的聚集地。

改革开放以来，东北的经济发展也并不慢，成绩也是非常显著的。90年代初期，我国最先建成的第一条高速公路并不在经济发达的华南、华东地区，而是在东北地区。就是沈阳到大连的“沈大高速”。那个时候我刚从日本回国不久，陪联合国的一个工业考察团到辽宁的营口调研。坐车行驶在沈大高速公路上时，看到我们中国也有这么好的高速公路，我的心情还很激动了一阵子。当然现在这不算什么了。我们现在全国有1.9万公里的高速公路，我国

的高速路通车里程在世界上排名第二。

东北的资源条件很好，工业化及城市化程度都高，那东北的区域经济究竟有什么问题呢？东北的问题差不多都是计划经济体制留下的后遗症。概括起来说，一是区域产业结构不合理，重工业过重，新的经济增长点迟迟没有形成。二是大型国企太多，机制不活，市场化的力量发育缓慢。三是下岗失业问题严重，社保资金入不敷出。四是一些资源型城市面临资源枯竭，后续产业没有形成，城市经济陷入困境。五是重工业等造成的城市污染严重，而且城市老化、基础设施不足。六是一些老企业设备、工艺陈旧，缺乏市场竞争力。上述问题还是表面的。深层次问题还有，区域经济中的体制性欠账太多，包括大量国企欠银行的显性负债和欠职工、欠社保基金的隐性负债；对外开放的进展不快，引进外资始终落后于东南沿海地区等。

东北老工业基地在历史上是有重大贡献的。这我们不能忽略。但这些年来，东北的发展脚步越来越沉重，这也是不可回避的事实。其实，东北的问题说到底还是体制性的问题。东北的下岗、失业问题为什么要比全国其他地方严重得多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迄今没有摆脱过度依靠国企就业的旧格局。在很多城市中，城市经济也是主要依靠单一的一、两个资源产业或者重工业，依靠单一的一、两个大型国企。这个产业或企业的市场前景趋于衰退，整个城市的经济运行都陷入困境。我们到鞍山、本溪调研时，当地政府的领导说，鞍钢或者本钢要是拖欠工资，整个城市的餐馆都没客人，你让我怎么发展社会服务业？在东北，到现在政府仍是资源配置的主导性力量。最近，温家宝总理要求加强对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的研究。辽宁拿来一个方案请我们评价。我们一看，还是“老三段”。第一段是说过去东北老工业基地作出过多少贡献。第二段是区域经济面临多少难题。第三段是需要中央在各个方面给予什么样的支持，就是给多少钱的一个单子。其中也有创新，比如说要求允许发行多少企业债等。但我们问，不论发债也好，中央投入也好，筹集来的资金由谁来配置呢？如果仍是政府，或者原有体制改造很不彻底的国企来配置，今天把“窟窿”堵上了，明天会不会形成新的“窟窿”呢？

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改造，最终是要靠市场经济的改革。要依靠市场化力量来实现资源的优化重组。东北不缺资源，缺的是对这些资源重新优化组合的力量。现在在浙江、在广东，已经很少有人还指望政府来给“找工作”。但在东北，要求政府负责解决就业的声音还是非常普遍的。政府应当管。即使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什么时候政府都不能不管就业，但是首先要靠市场。这个观念在东北和在沿海其他地区差别还是很大的。

东北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是产业结构。在80年代初期，辽宁曾有过一段轻

工业和消费品制造业发展的好势头。比如那时的营口钢琴和洗衣机，丹东的电视机等都是全国的名牌产品。但这个势头不仅没有保持下来，反而在后来的发展中“重重轻轻”的格局被更加强化。“重重轻轻”就是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的意思。80年代初期，辽宁的重工业在工业中所占比重是72%，到2000年时反而成了88%。为什么？因为在最初的战略选择中过度强调“发挥优势”。辽宁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重工业。再加上一直持续到90年代初期的钢铁短缺，人们对原材料等产业的市场前景存有过度乐观的预期。这个“优势”发挥下来，就使区域经济错失了一个重要的转型调整机会。等到旧产业没有生命力了才发现，区域经济中新的接续产业还远未成长起来。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到东北，特别是辽宁的次数是最多的，比哪个省区都多。有陪中央领导去的，有当地政府邀请去的，有我们承担课题专门去调研的。在我写的区域经济的研究报告中，有关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问题的占一多半。但我们发现，1996年我们提出的问题，迄今仍是区域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把那时的报告拿来，个别地方修修改改，现在仍然适用。可见，东北老工业基地在过去几年中，在体制转轨上，在解决深层次矛盾上的进展是不快的。

多年来，东北老工业基地一直处于“带病”运行的状态。过去中央也没少给支持。但总是那种“救火队”式的支持多。哪里出问题，就拿出钱来局部解决一下。一直没有很好地触及深层次矛盾。2002年大庆发生了一些影响社会安定的事件，社会影响很不好。这个事件发生在东北不是偶然的。它的起因相当典型地说明了在东北旧体制的力量还有多么大的影响力。

新一届政府上任后，温家宝总理提出，要下力量提出一个彻底解决东北老工业基地问题的方案。在我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中，我曾经提出一个看法。我说，凭东北的资源和国民财富存量，摆脱困境、实现经济发展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中央应当支持，而且应当给予大力支持。这个问题不需要含糊。但首先是要使东北的存量资源“活”起来。中央的支持一定在“激活”存量资源的前提下投入。否则我们就会长期陷在那种“面多加水、水多加面”的怪圈中钻不出来。

东北的存量资源为什么不活跃？关键是被旧体制形成的一些经济关系束缚住了。理顺这些经济关系，资源就会在“看不见的手”的推动下流动起来，活跃起来。区域产业结构就会自动出现良性化的调整。市场化的力量、非公经济、中小企业就会自发地成长起来。被束缚的资源不能释放出来，新的体制力量就没有生长的余地。

存量资源是被什么束缚住了呢？最主要的有两条。一条是显性负债，就

是企业欠银行的钱。另一条是隐性负债，就是原来的国有经济欠职工、欠老百姓的钱。前一条很容易理解。后一条主要指“有偿解除流动合同”中的“有偿”和社保基金的“空账”问题。

怎么才能把存量资源从这种束缚状态下解脱出来呢？这个问题很大，我们只能用个框架式的说法来说明。

假定东北的国企欠银行和职工的显性及隐性负债有3万亿元（这只是为说明问题随便举的数字），再假定成立个“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公司”，让它在债市上发行3万亿“老工业基地改造特种债券”。这现实不现实、由谁来买这个债券我们先不说它。先假定这个做法能成立。

然后我们用发债的钱把那些国企的资产买下。这样原来的企业就有了钱去还掉那些显性负债和隐性负债。企业就“轻装”了。现在钱到哪里去了呢？3万亿元到了银行和职工的手里。我们再回过头来，假定最初投资债券的主体就是银行和老百姓，买债券的钱就是企业归还的钱。那么我们会发现，在这个“游戏”中，区域内的国民财富总量并没有一分一毫的减少。我们也没有从外部追加投入新的资源。仅仅是这样一个金融“游戏”，那些目前非常尖锐的社会利益矛盾就可以全部化解。以前银行的不良资产现在变成了“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公司”持有的股权，以前国家、国有经济欠职工的隐性负债现在变成了社会公众投资者对“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公司”的债权。

再下一步怎么办呢？很简单。我们可以把“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公司”持有的股权卖掉。卖给民营企业、外国投资者或者公开市场的投资者。我们不谈论怎么卖。只假定能卖掉。卖掉这些股权的钱归还债券形式欠的钱。如果卖股权的钱不够还，国家只要补贴这个差额就行了。最后的事，就是解散作为发债主体的“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公司”。

至此，所有体制性欠账，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转轨成本全部支付了。区域内经营性资产的产权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转移到了市场化的投资主体手中。企业的产权多元化改造也已经实际上实现。政府已经可以从资源配置的主导地位上退出了。

当然，实际的经济发展与改革不可能这么简单。我们所描述的不过是一个框架式的流程而已。

从长远看，我认为东北老工业基地不仅绝不会就此衰落下去，而且一定会有一个再振兴的高潮。我们东北的广大人民群众一定会在全面小康建设的这一战略发展过程中再创辉煌。

9. 城市化战略与城市经济再认识

☆ 中国经济“一花独秀”的最重要的支持因素之一是城市化进程明显加速。

☆ 城市化不仅是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持力量，而且还是解决我们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难题的共同出路。

☆ 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城市，重新认识城市的深层次内涵。

☆ 在发展战略问题上，城市化战略是一个最摇摆不定的战略，也是教训最多的战略。

☆ 东西部发展差距的拉大主要在于城市发展差距的拉大。

☆ 建设国际化大都市，讨论这个话题有没有必要呢？非常有必要。

☆ 城市面貌改造是谁的福利增加了呢？是社会公众的福利增加了。

☆ 我们的城市应否停留在“县城放大”的水平上，应否停留在工厂区加工人新村的水平上？不应当。

☆ 还用“先治坡、后治窝”的眼光、观念看待现在的城市化进程已经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了。

☆ 没有现代化的城市，我们就有不了现代化的产业，有不了现代化的就业岗位。

☆ 什么是城市功能分区呢？就是城市资源的空间布局按照经济功能划分为若干区域。

☆ “鼓励单位自建住房”的政策为我们留下了很多城市遗憾。

☆ 大城市结构调整和存量资源优化重组的要求要远比农村社区的城镇化改造更为迫切。

【6－3－1】在我国建国以来的发展过程中，在发展战略问题上，城市化战略是一个最摇摆不定的战略，也是教训最多的战略。一方面，我们在城市化上有很多不足；但另一方面，我们的很多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也来源于城市化。特区经济的始端就是建造了深圳这座现代化的城市。浦东开发也极大地带动了上海、、华东、长江中下游以至全国经济的发展。我们今天之所以有机会讨论“珠三角”和“长三角”的优劣比较问题，应当说是得益于这两个城市的发展。

我们下面用一些时间，专门讲一讲城市化的问题。城市化是区域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结合的空间交点在哪里呢？就在城市。

大家知道，在过去两年里有一个说法，那就是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增长格局中“一花独秀”。我们的国民经济凭什么保持了“一花独秀”的地位呢？最重要的支持因素之一是城市化进程明显加速。大家过去两年中如果到各地去过，是不是觉得我们的很多城市面貌变化特别明显呢？城市化这个“发动机”不仅将支持2003年的经济增长，而且还将支持我们未来20年的经济增长。

实际上，城市化不仅是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持力量，而且还是解决我们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难题的共同出路。解决中国的就业、产业结构升级、扩大对外开放、调整供求失衡、完善基础设施、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等诸多重大难题的相交之点就在于城市化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在哪里？在于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产业结构调整的主战场在哪里？在于城市经济资源的重新优化配置，城市经济系统的再组合。城市是区域经济扩大对外开放的窗口，是腹地资源加入全球化竞争的门户。更多的人进入城市，创造出更多的城市型消费群体，是实现扩大内需战略的必然选择。世界各国的经验都证明，资源、人口向城市集中，是优化基础设施资源配置，缓解人类经济系统与自然界之间矛盾的最优方案。

可以说，中国人是最早对城市有所了解、最早形成城市的。现在有句时髦的词儿，叫做“经营城市”。其实中国人也是最早懂得“经营城市”的。“完璧归赵”的故事讲的就是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秦国打算用15座城市和赵国换一块玉的故事。这个故事还留下了另一个成语，叫做“价值连城”。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我们是对城市的功能、作用以及发展规律了解最少的民族。直到现在，我们很多人对城市的认识还停留在人口的大规模聚集点或者是工厂聚集区的水平上。也就是2002年，建设部提出一个加强城市规划的文件，强调城市发展的重点应当是为中低收入者建住房。这实际上

是把我们的城市化拉回到建“工人新村”的水平。显而易见，这种认识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了。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城市，重新认识城市的深层次内涵。

各国在自己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都曾留下很多著名城市。大家知道，中东地区巴以冲突的焦点之一是耶路撒冷的归属问题。耶路撒冷是两大宗教文明的起源地。基督教、伊斯兰教都以它为圣地。这至少可以说，人类的宗教、哲学等文明进步是和城市的出现与兴起联系在一起的。有一句西方谚语，叫做“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欧洲的著名城市，例如罗马、巴黎等，都是先建地下的排污设施，在地下的暗沟上面建城市。那里的人们在很早的时候就知道城市基础设施的必要性了。这些暗沟至今仍在使用。大家看反映这些城市的警匪片时仍可时常见到与歹徒或者黑势力作斗争的“孤胆英雄”在下水道的暗沟里活动的镜头。我们得承认，中国历史上的城市则没有一个有这种科学的基础设施。人们看到一些清宫戏中，皇帝所住的皇宫也是靠人力畜力来收集、运送粪便、污水和其他垃圾的。大家到北京故宫去参观时，稍微留心的话就会发现那里院落相隔的高墙上开有专门为垃圾车进出的门。在第二讲中，我们举过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布鲁塞尔的城市广场。了解这些历史遗留下来的城市广场，对认识城市在工业化、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很有意义。

在我国建国以来的发展过程中，在发展战略问题上，城市化战略是一个最摇摆不定的战略，也是教训最多的战略。从建国初期起，我们就一直致力于要把北京从消费型城市改造成生产型城市，硬把北京的城墙和很多古建筑给拆了，在城区内建了大大小小很多工厂。到80年代末期，又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城市方向，于是又努力推进“退二进三”，就是退出第二产业，进入第三产业。在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我们建起了很多“工业基地”式的新兴城市。但这些城市自身的产业单一，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很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很差。不仅如此，这些工业城市与当地的区域经济格格不入，形成了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60年代到70年代，在“要准备打仗”的思想指导下，经济布局更走上了一条“深挖洞、广积粮”之路。城市建设几乎完全停滞。现在北京依稀还能找到70年代建的所谓“简易楼”。为什么建“简易楼”呢？因为那时认为，不知哪一天炸弹就会落下来把城市夷平。60年代末期的“上山下乡”更是城市化进程的一场大倒退。

从80年代初期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化战略实际上仍表现出了很大的摇摆性。例如，在改革开放的前10年中，作为中国工业重心所在的城市，上海竟然被“遗忘”了整整10年。在这10年中，人们在不停地争论，上海究竟该扩张还是不该扩张，究竟该发展什么产业。一会儿说，上海太大了，人口太多

了，我们不应再继续扩张这种特大型城市了。一会儿又说，上海不该再发展钢铁、石化等重工业了，重工业应当转移到中西部去，上海应该发展点高科技或信贷服务业。10年时间就这样在争论中等待过去了。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很漂亮、很具有现代化气息的上海，这是90年代初期浦东开发以来才有的变化。这实际上反映了我们在大城市发展上的战略思路摇摆不定。

再如，从80年代中期开始，农民自己创造出了一种农村工业化的形式，就是乡镇企业。到90年代初期的时候，我国的财政税收、出口创汇和GDP总值，乡镇企业的贡献都超过1/3。就是人们说的，“三分天下有其一”。邓小平当时盛赞乡镇企业是“异军突起”。但一直到90年代后期，我们给农民的政策仍然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到90年代末期，我们才发现，这个政策给乡镇企业的发展留下了极大的隐患。例如基础设施不足、和环境保护的矛盾非常尖锐、远离市场造成信息不灵、各种要素很难实现优化配置等。从那以后，乡镇企业被迫进入了一个调整期。

当然，影响城市化进程的并非全是战略选择上的失误，也有一些客观原因。例如西部很多省区在90年代中、后期“八七扶贫攻坚战”中不得不把可动用的资源更大程度地投入到扶贫中去。地方财力、区域内的资源很难向城市集中。实际上东西部发展差距的拉大也主要在于城市发展差距的拉大。

一方面，我们在城市化上有很多不足；但另一方面，我们的很多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也来源于城市化。特区经济的始端就是建造了深圳这座现代化的城市。这个城市的发展带动了整个华南以致全国的经济发展。上海的浦东开发也是一例。浦东差不多是建了一座新上海。浦东开发也极大地带动了上海、华东、长江中下游以致全国经济的发展。我们今天之所以有机会讨论“珠三角”和“长三角”的优劣比较问题，应当说是得益于这两个城市的发展。

“九五”末期，在对重大战略难题的研究中人们已经认识到，中国前期的经济发展存在一个明显缺陷，这就是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人们共识，应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出的历史任务、缓解日益尖锐的就业矛盾、调整城乡之间经济关系、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以致实现资源节约、转换经济增长方式、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步伐、调整人类经济系统与自然界之间关系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等的共同解决办法就是发展城市。

在“十五”计划酝酿过程中，人们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其他战略共识度都比较高。比如说应当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平衡供求矛盾。尽管也有一部分人说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淡出。但在总体上，继续实施扩大内需的战略并没有多大争论。再比如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调整产业结构等。这些都没有多大争论。争论最大的就是关于“城市化”还是“城镇化”的提法。

这个争论持续了很长时间。一部分人认为，在新的战略发展过程中，我们应该明确提出城市化的目标。不应该再在这个问题上摇摆不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地要依赖于大中城市的改造和扩张。但另一种意见坚决反对“城市化”的提法。他们认为，一提城市化，肯定又会走到“二元结构”、城乡分割的老路上去，这就会进一步拉大城乡差距，造成城乡对立。而且提城市化战略的话，我们将无法应对城市基础设施不足、农民过度向城市涌入以及城市环境污染等难题。这种意见认为，我们还是提“城镇化”比较稳妥。他们的想法是，农民要进城，也不要一下子搬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应当先让他们从村里搬到镇里，从镇里搬到县城，然后再从县城往中等城市搬。农民进城的过程应当是一步一步地多搬几次的过程。

争论的结果是保守的意见占了上风。以乡村社区集中为重点的“城镇化”提法为“十五”所采纳。“十五”计划在“实施城镇化战略，促进城乡共同进步”一节中提出，要“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推进城镇化要遵循客观规律，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发育程度相适应，循序渐进，走符合我国国情、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样化城镇化道路，逐步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完善区域性中心城市功能，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引导城镇密集区有序发展”。显然，“十五”计划所强调的城市发展重点仍然是小城镇和中小城市。为突出这一意图，“十五”还特别强调，要“防止盲目扩大城市规模”。

但最值得说的是，实践的发展并未按照“十五”的这些设想展开。从2000年以来，各地普遍启动并呈现出极大活力的，恰恰是大中型中心城市的规模扩张以及与此相应的城市建设加速和城市经济活跃。在上世纪80年代深圳建设和90年代上海浦东开发的经验启迪下，在北京“申奥”成功、上海“申博”成功后，各地纷纷在自己的发展战略中大大强化了城市化的位置。我们前面说过，制造业的发展是“十五”计划始料未及的。其实城市化进程的大大加速也是“十五”计划始料未及的。过去两年来的实践证明，支持我们“一花独秀”的一条“腿”，使国民经济在2002年仍然保持接近8%增长速度的一个主要支撑因素就是城市经济，特别是大中城市的经济发展。

【6－3－2】关键问题并不在于是否有官员想往自己脸上“贴金”，而在于中国的城市应不应当推进城市面貌改造。城市改造得漂亮一点，通行效率高一点，环境美化一点，这是谁的福利增加了呢？是社会公众的福利增加了。让人民热爱自己的城市，为自己的城市感到骄傲，安居乐业于自己的城市，这有什么不好呢？我们迫切需要向现代化、国际化靠拢的城市。还用“先治坡、后治窝”的眼光、观念看待现在的城市化进程已经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了。

城市化成为了经济增长的亮点，这一方面确实出乎人们的意料。但另一方面，也带给我们很多的思考。这说明，我们对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认识仍是远不充分的。我们原来的经验、认识可能已经不适应变化了的形势。例如，前不久“央视”请我去做一个节目。谈什么呢？谈北京、上海怎样把自己建设成一个国际化大都市。现在看，我们讨论这个话题有没有必要呢？非常有必要。北京在2008年就要举办奥运会了，还不应当建成国际化大都市吗？北京、上海要率先实现现代化，还不该提出建成国际化大都市的问题吗？我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扩大对外开放已经走到了一个新台阶上，我们还不该提出建成国际化大都市的问题吗？应该。但仅仅在两年多前制定的“十五”计划中，我们还不敢贸然提出这个目标。这个例子说明，形势发展带来的变化在很多方面已经明显超出了我们当初的预见。

实际上一直到今天，应不应当大力发展和扩张城市、如何发展城市的争论并没有停止。例如，在城市发展中大搞城市绿化、大兴土木扩建新城区究竟对不对？人们至今仍在争论不休。有人说这是腐败工程，有人说这是形象工程，各种批判的声音不绝子耳。例如离上海不远的南京就有个例子。在过去两年中，南京在城市整治中砍了很多树。为什么要砍呢？因为这些树成了城市改造的一个障碍。由此就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人通过各种途径、引述多种理由激烈反对砍树。最后闹到中央派人来调查。一调查后就弄明白了。砍树尽管不可避免，但在南京的规划中，新种的树要比砍掉的多得多。就我看，这个例子反映出来的其实不是对“树”的认识分歧，而是对城市化的认识分歧。“醉翁之意不在酒”。反对声音之所以那么强烈，根本原因其实是反对大城市扩张。类似这样的事情可以举出很多。

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首先表现在城市面貌的改造上。在过去两年中，全国大中城市的面貌普遍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不仅省会城市，而且很多地市级的区域中心城市，在城市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完善方面都有很大进展并取得了显著效果。以前在各城市主要街区随处可见的以小摊贩为主的“占道市场”现在已经很难见到。城市广场、城市绿地、城市交通立交枢纽、城市标志性建筑等成为了新的城市景观。

近来在一些媒体上，有声音把城市的“靓化工程”说成地方官员往自己脸上“贴金抹粉”的“政绩工程”，甚至说成是不顾老百姓死活的“花架子”。我非常不赞成这种意见。有没有一些官员搞“政绩工程”？肯定有。这不需要否认。但关键问题并不在于是否有官员想往自己脸上“贴金”，而在于中国的城市应不应当推进面貌改造。

城市改造得漂亮一点，通行效率高一点，环境美化一点，这是谁的福利

增加了呢？是社会公众的福利增加了。这有什么可质疑的呢？我最近两年到很多城市出差，各地出租车司机最爱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您感觉我们城市的变化大不大。我亲自在一个城市广场听到普通老百姓对我说，我过去两年工资没涨，住房面积没增加，但我们家所在社区有了这么一个漂亮的广场，晚上和家人一起在这里散散步，我感觉自己的生活上了一个台阶。有一次我到安徽芜湖出差。那是一个长江边上的城市。到达时已经晚上八点多，天还下着雨。但接待的官员执意要带我去看看他们的城市广场。再三谢绝不行，只好去。去看了以后我觉得不虚此行。确实好、确实漂亮不说，更重要的是把长江文化、本地历史浓缩地表现了出来。让人民热爱自己的城市，为自己的城市感到骄傲，安居乐业于自己的城市，这有什么不好呢？我认为这就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就我走遍这么多城市的感觉，改造城市面貌是得到绝大多数老百姓拥护的。把城市面貌改造笼统地说成是"政绩工程"的说法是不负责任的。

大家别以为城市绿地、城市广场就是为了好看。这个认识是不充分的。这些城市公共设施是非常必要的城市减灾防灾设施。给大家讲个故事。1908年时，美国的旧金山因为地震引发了一场城市大火。因为地震造成道路毁坏、房屋坍塌，救火人员无法扑救，而且水源也没有。人们几乎束手无策，眼看就要火烧连城。最后是怎么救灭的呢？是市长下令把城市中一条富人聚集的主要街道两旁的房屋全部拆掉，打出一条隔火道。由此救了旧金山的半个城。从这以后，全世界的城市规划师就长了一个见识，城市应当有能够起到隔火作用、避难等作用的开阔街道和广场。我们对城市的认识还不充分，包括对城市灾难的认识还不充分。也许有一天，我们会通过立法的形式强制地载明，在城市面积中必须有多大的公共绿地、广场。在历史上，毁于各种天灾人祸的城市实在不胜枚举。往近处说，过去30年中就有我国的唐山大地震，日本的神户大地震，美国的洛杉矶大地震。多少血的教训证明，如果城市中没有足够的避难空间，那次生灾害导致的伤亡可能比地震等灾害直接导致的还要大得多。这是关系公共安全的必要设施。

我们得承认，我们对城市的认识还远不充分。毕竟我们刚刚起步。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城市这门学问我们还有太多要学的东西。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北京在自己的旅游宣传材料上说，我们北京有160多座立交桥，而且每座桥和每座桥不一样。有的鸟瞰像个蝴蝶，有的从侧视像展翅的雄鹰。这些设计思想都够美妙的。但设计者忘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这就是，立交桥是干什么的？立交桥是一个交通设施。它的基本功能和第一目标应当是提高通行效率。怎么才能提高通行效率呢？立交桥的设计越简单、

重复率越高，通行效率就越高。因为越简单、重复率越高，司机的学习过程就越短。过了第1座桥就知道后面的99座桥怎么通过。如果一座桥和一座桥不一样，那么司机就得每过一个桥学习一次。过完第100座桥，第1座桥怎么过已经忘了。如果你到北京出差乘坐出租车，你随便问一个出租车司机知道不知道北京每个立交桥都怎么走。可以说，没人知道。因为没法记住。司机到了桥上经常是左旋右转找不到出口。这样通行效率怎么会高呢？这是一个像修摩天大楼没建厕所一样的原始错误、低级错误。但这个错误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桥梁专家太笨，而是因为我们对城市的认识实在还处于一个起步阶段。类似这样的问题还有很多。所以我说我们不要轻易地否定过去两三年的城市绿化、靓化工程。

还必须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我们中国的城市需要不需要“提档升级”。我们的城市应否停留在“县城放大”的水平上，应否停留在工厂区加工人新村的水平上？不应当。要提高我国国民经济的运行效率，要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要让更多资源加入到经济全球化的竞争当中去，要使中国的老百姓有机会享受到更多的国民福利，我们已经迫切需要推进城市面貌的升级改造。解决这个问题不是过早，而是嫌晚。北京“申奥”时，国外最主要的反对声音就两条理由。其中之一就是环境污染。我们迫切需要向现代化、国际化靠拢的城市，还用“先治坡、后治窝”的眼光、观念看待现在的城市化进程已经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了。

有媒体曾经用“要就业还是要市容”的话题质问城市面貌改造的动作。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城市资源优化利用、提升城市资源的市场价值是一定有利于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和提高劳动者报酬水平的事。以牺牲公共资源和破坏环境的代价换取少量低档次的小商品经济的就业岗位是非常浅见和得不偿失的。没有现代化的城市、现代化的环境，我们就有不了现代化的产业，有不了现代化的就业岗位。这个道理需要大讲特讲。

当然，我们的城市化进程远不只表现在“靓化工程”一个方面。进一步的表现是城市产业结构的优化重组。北京早就提出要“退二进三”，就是退出第二产业，进入第三产业。上海一直在努力把自己办成远东、亚洲的金融中心，要打造现代化的新型社会服务业。很多城市都把“世界500强”企业有多少落户本省、本市作为区域性的战略发展目标。

山东有个聊城，城市规模不算大，产业基础也并不雄厚。但最近这个城市利用自己“水上城市”的特色和资源，大造“东方威尼斯”的舆论。这个城市想做什么呢？想把旅游开拓成自己城市的“龙头”产业。优化选择产业已经成为了很多城市的发展战略与推进城市化的基本立足点。我们前面提到

过鞍山。以钢铁著名的鞍山市要以“旅游兴市”。怎么“兴”呢？鞍山说，我们并不是要把现在的主城区改造成旅游观光地。鞍山的特点是周边的一些县城风光很秀美，是旅游、度假以及发展会务经济的好地方。鞍山的城市化就是和产业选择合一的造就一个城市群的城市化。

目前，工业企业退出城市核心区域的布局改造在几乎所有城市中都已普遍展开。在商业领域中，连锁经营、品牌专营、大型超市、社区服务系统等新的商业业态正在到处涌现。房地产开发更是出现了档次升级、规模升级、功能升级的趋势。大型居住区连片开发、街区配套建设、高档标志性建筑项目成为了城市建设的基本形式。

【6－3－3】城市功能分区就是城市的空间布局按照功能划分为若干区域。从我国目前的发展趋势看，新型政务区、商贸流通区、商务中心区、旅游区、居民居住小区等分区特征已经在各地的城市建设中明显显现出来。城市功能分区，城市的交通基础设施才能最经济地优化配置，城市的资源才能得到最优化的利用。

城市产业结构选择与升级问题，我们在前面结构战略的专题中已经提及过。这个变化在90年代中后期时就已经开始了。实际上，我国目前城市化进程中还有两个新特点。这就是城市功能分区和以建设新城区为主的城市规模扩张。

有必要多讲一点城市功能分区的问题。这个问题对我国的城市化来说是个新问题。

什么是城市功能分区呢？就是城市资源的空间布局按照经济功能划分为若干区域。从我国目前的发展趋势看，新型政务区、商贸流通区、商务中心区、旅游区、居民居住小区等分区特征已经在各地的城市建设中明显显现出来。城市功能分区，城市的交通基础设施才能最经济地优化配置，城市的资源才能得到最优化的利用。城市的商业用地是“寸土寸金”，在这样昂贵的土地上建工厂或者建住宅楼是非常不经济的。有了城市功能分区，交通流量才能实现有效控制、交通基础设施才能实现有效配置。例如，城市轨道交通发展的前提就是要有明确的城市功能分区。不然我们就无法判别，该从哪里到哪里修地铁、建轻轨。

什么是新型政务区呢？政务区就是政府等机构的集中地。日本东京就有一条街，名字就叫“官厅街”。美国的华盛顿其实就是一个独立化的政务区。北京在改善交通状况的努力中修好了二环路、三环路、四环路，现在五环也快通车了，六环正在修。如果这么“摊大饼”式地扩张下去，再多交通基础

设施投入恐怕也难以缓解目前的交通拥堵。那怎么改善呢？有专家提出，为什么不能把党中央、国务院迁出核心市区呢？如果建一个新的政务区，把中央和北京的政府机关都迁到那里，北京市区的交通立刻就会缓解。这不是开玩笑。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假如我们在北京的四环路和五环路之间找一大块空地，好好盖几座采用智能模拟技术的现代化办公大楼，前面一大片绿地，后面一大片停车场，地铁或者轻轨直接通到楼下。这有什么不好呢？非常好。政府机构办公有什么必要非得在核心市区呢？没有任何特别的必要。既不利于提高办公效率，也不利于外来办事人员。其实，青岛已经这么办了。青岛市委、市政府搬到新区，既改善了政府机构的办公条件，又极大促进了新区的发展和城市规模扩张。

城市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商业。现在各地城市发展中都已经摒弃了简单提倡发展商贸流通业的做法。在很多城市中，以大型超市、百货店、专卖店、步行街、专业街等组合成的新型商贸流通区已经成为了城市的一道“靓丽风景线”。我们上海的淮海路、南京路就是这样有特色的新型商业街区。我和很多人交换意见时大家都同意，在我们的各个城市中，上海的商业街是最有“商气”和商业氛围的。北京王府井改造得就不理想。那里的氛围叫人感到一种“霸气”和“土气”。消费者走在那里的街上，有一种被周围的商家蔑视的感觉，你觉得自己被压抑和很渺小。有上海人对我说，上海的漂亮女孩子都在哪里呢？都在淮海路上漂着呢。逛街的女孩子们把自己当成了商业街市的一个组成部分，用时髦的话说叫“流动艺术”。这里的“漂”字用得很贴切。现在各大城市中，这种商业集中区域都已经很具规模。

特别要说一说商务中心区的概念。最近人们常听说一个新词儿，叫 CBD，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译成中文就是商务中心区，也叫中央商务区。商务中心区不同于商贸流通区。它是由会展中心、星级酒店、高档写字楼和一系列为这些商务机构服务的物业组成的一种新型城市功能分区。说“新型”，其实是说在我国的城市中发展历史不长。美国纽约的曼哈顿岛就是一个典型的 CBD。上海的浦东其实就是一个大型的 CBD。CBD 是带动城市档次升级和城市产业结构转变升级的重要力量。根据国外的经验，CBD 是那些举足轻重的大公司、大银行聚集的地方。那里的活动支配着规模巨大的资源流向。可以这样说，认识 CBD 是认识现代城市不可缺少的一章。CBD 中也有商业设施。例如在一些高档写字楼的地下或者底层经常有一些卖高档汽车、高档名牌服装的专门店。这些商业设施是为这个区域的“白领阶层”服务的。CBD 中决不会整天的开大型促销会。外部的流动人员在 CBD 中也是不受欢迎的。

由于发展历史不长，我们对 CBD 的认识还太过粗浅。不妨给大家举个例

子。仅仅在十余年前，中国还没多少人懂得 CBD 的内涵和客观发展规律。90 年代初期，北京要建一个金融街。那时没人知道所谓的金融街应当是一个 CBD 概念。那时我们以为，金融街不就像服装一条街、餐馆一条街那样，找一条街道，在这条街道两旁都建银行大楼，那不就是金融一条街了吗？北京的金融街最初就是在这样的认识下建立起来的。建起来我们才发现，从北京的复兴门到阜成门这一狭小空间根本不能满足 CBD 的规模要求。而且这条街道和政务性、商业性的街道交叉。不同人流导致街区功能无法定位。在阜成门立交桥头有个高档写字楼，叫“新世纪广场”。当初销售的时候，开发商说这个建筑是立于未来国际化大都市北京金融街上的“超五星级”写字楼。建好后，由于南北向的金融街和东西向的商业街交叉，一层的物业无法利用。最后开成了一个有众多小摊贩经营的“小商品市场”。这就导致了很多已经进驻的公司不满，由此还引出过一段官司。这些业主、公司状告开发商，说你当初和我们说是“超五星级写字楼”，现在成了这种格局，叫我们怎么跟我们的客户介绍呢？说我们公司就在小商品市场的楼上？这太有损我们的企业形象了呀。一个国际知名的大公司怎么和小商品市场为伍呢？现在这个地段已经骑虎难下。向东扩张，和北京老城区保护的矛盾非常尖锐；向西扩张，又会和大量商业设施、政务设施冲突。现在北京的办法是在城市东边的朝阳区另选一块地方，重建一个真正的 CBD。这次的规模非常大，规划也比较好。

城市发展中的功能分区也是不断变化的。比如说武汉有一个汉正街，曾经以小商品市场闻名全国。现在我们去参观时发现，这个街区的定位已不仅仅是一个商贸流通区的概念了。它的新定位是城市旅游街区。到武汉的旅行团都把汉正街当成一个旅游点。那里出售的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而是汉文化。游客到汉正街去不仅是为了买东西，而且也是为了参观汉文化。那里卖的东西都是和武汉文化、和旅游密切相关的商品了。

现在旅游街区的建设也引起了很多城市的重视。大家可能听说过昆明的“世博园”。其实昆明“世博园”的水平离“世界园艺博览会”的标准还差得很远呢。最多也就是一个花草展览会而已。但这个概念的提出和这个街区的整治明显成为了带动昆明市以及整个云南省旅游发展的龙头，我们没必要去深究昆明这个园林究竟到没到“世界级”，人家这个城市改造与发展的动作确实起到了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城市升级和产业结构转换的目的。

北京是我国最大的旅游城市之一。但现在北京的难题恰好是，故宫、北海、天安门广场等旅游点和政务区相邻和交叉。两种功能区域在交通、人员集散、商业设施配套等方面都存在着尖锐的冲突。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城市居民住房非常困难。上海尤其是住房

困难的地区之一。以后我们把改善居民居住条件作为城市建设的重心，这个思路本身并不错。但我们在建住房的时候没认真地研究城市的发展规律，不懂得什么叫城市功能分区，采取了一个“鼓励单位自建住房”的政策。这个政策一直持续到了90年代中、后期。一个工厂把围墙拆了，就可以建成几座宿舍楼，为职工解决住房问题。由此而来，哪个单位都是有块空地就建住房。这就导致了城市区域之间的功能相互交叉。就连聚集着中国最优秀的城市规划师的建设部，自己也建成了一个“前店后厂”。前面是办公楼，后面是宿舍楼。这样的城市布局下，基础设施没办法优化地配置，交通效率也非常低。随着城市发展，为居民生活配套的各种福利设施，例如保安、服务、医院、学校等设施也没法给这么少的几座楼单独配备。在“鼓励单位自建住房”政策下发展起来的居民楼，分散在城市各处，并没有真正形成规模化的居民小区。不仅布局分散、功能不全，而且也无法形成档次区别。这样的错误为我们留下了很多城市遗憾，恐怕我们要在今后的改造中花很大力气来才能把前期由于对城市规律认识不充分导致的缺陷纠正过来。

现在我们的城市发展中还出现了一种功能分区，就是新型居民居住小区。说“新型”是因为前些年我们所建的一些居民小区实际上仍存在着很多缺陷。那时我们并未真正懂得现代化城市中的居民小区应当是什么样的。我们在相当长时间内对城市发展的认识缺乏足够的超前性。例如，仅仅在十余年前，北京开发了一个当时最大的房地产项目，叫做方庄小区。当时看是比较够规模的。但在这么大一片小区内居然没有考虑预留停车场。当时就没考虑到能买得起房子的人也能买得起车。仅仅十年时间，这个小区已经严重落伍。人们很快发现，那里几乎所有绿地、道路都被停放的小汽车侵占了。而近年开发的楼盘，比如望京、西三旗等地的小区，就比较够规模，配套设施也好一些了。现在我们知道，生活区有生活区的要求。集中化的居住小区才能更好地按照人们生活的要求设置环境，才能相应地配置商业、医疗、教育以及交通等设施。

【6－3－4】在现代社会经济系统中，没有大中城市的分工组织作用，人们主观想象中的“城镇化”根本就不可能出现。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入世的推动下，各地都需要有自己的能够直接与国际社会接轨的现代化“窗口”城市。大中型中心城市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配置重心。大城市结构调整和存量资源优化重组的要求要远比农村社区的城镇化改造更为迫切。

我们的城市化加速不仅表现在城市改造的加速上，而且表现在城市规模

扩张的重大突破上。当前，相当多的大中型城市都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城市扩张规划，而且这些规划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大规模的新城区建设和城市重心外移。我们也举几个例子。

离上海不远的杭州早就提出，要脱出原来以西湖为核心的旧城区束缚，建设一个以钱塘江两岸为核心的新杭州。浙江省很支持杭州的这个设想，现在连杭州市的行政区划都作出了很大调整。将来新杭州的城市重心在萧山一带，现在的杭州建成区可能只是一个“西湖区”。

湖南的长沙在“十五”计划酝酿期间提出，要在未来五到十年内将长沙的城区规模和人口规模都扩张1倍。我去参加过它的论证。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城市发展规划。目前抑制湖南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城市化程度明显偏低，能够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的中心城市太少，省会城市的规模也远不够大。长沙还有一个计划，想把株洲合并进来，打造一个大城市圈。

河南的郑州提出要新建150平方公里的新城区。这个规模差不多是要建一个新郑州。先建新城区，回过头来再改造老城区。现在这已经不是设想，是已经开工建设的事实了。郑州说，我地扼中原南北、东西交通的咽喉地带，为什么迄今发展不能尽如人意呢？原因之一就是区域经济缺乏形成新的增长点的城市空间。河南的确也是城市化偏低的中原大省。河南的人口全国第一，相当于两个法国。没有足够规模的城市化水平，河南将无法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省会城市率先扩张，我认为是具有战略眼光的。

河北的石家庄也有类似的“建新城”举措。人们称石家庄市是中国最大的“庄”。石家庄的城市面貌在省会城市中的确是比较差一些的。但石家庄周边的资源状况和城市的产业基础并不差。工农业发展的条件都非常好。石家庄市说，我们要把自己城市建成北方的最大的“药都”、“服装之都”。

黑龙江的哈尔滨市也提出了一个类似青岛城市发展的规划，打算把市委、市政府搬到松花江以北去，在江北建一个新城区，以期将来形成一个挟松花江两岸的新哈尔滨。为什么呢？哈尔滨说，人们都知道哈尔滨是一个重工业城市。其实这些年来，哈尔滨的产业构成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个制药、一个旅游已经成为了哈尔滨的新支柱产业。现在电视台整天都是“哈药”的广告。哈尔滨的旅游业也很兴盛。夏天一个太阳岛，冬天一个冰雪节。已经形成了很大影响。但现在哈尔滨老城区已经不能提供这些新兴产业发展的城市资源了。城市扩张是势所必然的事。当然，也有建设部的专家对哈尔滨挟江建城的规划设想不以为然，说你们哈尔滨的那个松花江和广州的珠江、武汉的长江、上海的黄浦江不一样，松花江是10年里头有9年没水；只有1年有水，发大水。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简单说，在松花江下游建个橡

皮坝就能在大部分时间内起到调节水量的作用。珠江景观原来也并不好看。是经过人工调节后才变得很漂亮的。

广州的城市建设在前几年是比较滞后的。在前年“九运会”期间，城市整治才有了比较大的改观。但总体说，广州还是太小。而且历史因素的影响，广州和深圳一比就逊色很多。最近广州也在不断提出自己新的城市化设想。前年的时候还有一个插曲。广州市规划部门提出一个设想，想把佛山、顺德一带都包容进广州来。这只是广州自己的一个设想。不知怎么广州规划局的这个想法被媒体给捅出去了，还引起了不小的振动。佛山、顺德方面很反对。不管怎么说，打造一个大广州城市圈已经是大家的共识。最近又有提议说，不应围绕广州一个城市设计战略，而应当把整个“珠三角”地区的城市都包含进去，用城际轨道交通把这些城市都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城市群。

四川成都的城市发展，我也参加过论证。成都说，我们成都也应当大力扩张。我们的问题是不知道向东还是向南发展好。确实，成都城市扩张的周边条件非常好。地势平坦、自然环境优越不说，基础设施也已经比较完善。国际机场、铁路、高速公路，甚至能够通航的河道已经串联成网。成都为什么要向外扩张呢？因为成都是个历史太过悠久的老城。它的历史要比北京、南京，甚至西安都要长。作为都城，北京的历史到元，南京到宋，成都的古迹可以追溯到汉，到“三国演义”那个时代。在那之前还有“都江堰”。在那之后还有李白、杜甫时代的遗迹。近代还有抗战时期的很多遗迹。成都不但历史厚重，而且还是一个老工业基地，旧体制成分占的比重仍相当大。在这种情况下，成都的城市改造是很难的。因为改造的成本太高。有些是文物不能动的。有的房子眼看都要塌了，可是也无法拆掉搞连片开发。有些资源被旧体制成分占据着，“赎买”的代价太高。比如有个国企早就停产了，如果要把这片厂房、土地整治成一个房地产项目，银行马上站出来说，你政府先把原来企业欠的钱还了才能动。而建一个新城区，成本要低得多不说，从一开始就可以形成新的体制氛围，按照新的城市规划布局。

其实，不光是省会城市，很多地市级的区域中心城市也在城市规模扩张上选择了城市重心外移之路。大家知道江苏的无锡、常州、苏州原来都有自己的开发区。现在这些开发区都悄悄把名字改叫“新区”了。常州新区、苏州新区等。这个变化不是简单的名称改变，是这些地区的城市功能定位的改变。这些开发区将不再是工业园区的概念，而将是新的核心市区的概念了。

实际上，西部省区的很多城市也都各自加大了对城市的改造、扩张力度。目前，城市定位、城市形象塑造、经营城市、打造城市品牌、提升城市资源价值等已经成为区域经济中最常见的用语。在各地招商引资的项目排列中，

城市建设项目已经普遍取代了工业项目的地位而上升为第一位。人们很容易从身边有关区域经济的广告中感觉到，对城市环境综合优势的宣传已经取代了对工业资源优势的宣传。

大中型中心城市先于小城镇、小城市出现加速扩张是一个符合客观规律的必然结果。中国的小城镇、小城市应当发展。但必须明确的一个基本认识是，小城镇、小城市发展的前提是社会化分工的广泛发展。在现代社会经济系统中，没有大中城市的分工组织作用，人们主观想象中的“城镇化”根本就不可能出现。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入世的推动下，各地都需要有自己的能够直接与国际社会接轨的现代化“窗口”城市。而且大中型中心城市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配置重心。大城市结构调整和存量资源优化重组的要求要远比农村社区的城镇化改造更为迫切。“九五”中后期以来，我国地级以上的230余座城市始终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可以预见，在今后一些年中，大中型城市的发展仍将是国民经济保持较快增长速度的最重要支持力量之一。

4. 提问与讨论

☆ 优势战略其实并非是优化的战略，“比较优势”只是工业化起步阶段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

☆ 很多区域经济之所以目前有举步维艰之感，关键在于大量资源被困于生产能力过剩或市场需求萎缩的不良产业。

☆ 西部新的区域发展战略思路应当贯彻“重在点、兼顾线、舍弃面”的原则。

☆ 在发达国家，认识劣势是最难做到的实事求是。不清楚自己的劣势就很容易夸大自己成功的可能性而忽略失败的可能性。

☆ 城市并不仅仅是一个建筑物和要素、资源的组合，不仅仅是一个人口的聚集地，而且还是一个社会经济关系的组合系统。

☆ 从各国的经验看，在大城市里，轨道交通实在是一个非常好的公共交通工具。

☆ 别以为轨道交通是一个落后的、传统的夕阳产业。那个火车头是一个移动的机器人。所有最先进技术都集合在那个火车头上了。

☆ 全球未来20年内在轨道交通上投资，恐怕有超过2/3的部分集中在中国。

【提问一】：您提到，新区域经济发展的特点是区别化的因地制宜，那么在区域战略中应当怎样选择优势呢？

答：过去一段时间中，很多地方都在总结自己的优势上做了很多文章。优势要找，但我看，在新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中，也许认识自己的劣势更重要。

由于缺乏经验或历史性、体制性条件限制，我国80年代以来的区域发展

战略中颇多值得反思之处。与改革开放的初、中期相比，新世纪区域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环境与任务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适时总结与借鉴多方经验，可能对促进本地区发展起到十分有益的促进作用。新区域发展战略的最重要创新之处，在于要打破过去从总结优势出发的思路。

过去20年中，我国的区域战略中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太多地注重于“优势”的开掘而忽略对劣势的归纳。这是相当多的区域经济战略不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什么克服劣势应当成为产业发展思路的第一原则？有三条理由。

第一，克服劣势才是解放生产力的关键。劣势是什么？劣势就是资源漏洞，效率“瓶颈”。不堵住漏洞，多少增量投入也将被漏掉；不克服“瓶颈”，宝贵资源只能在“瓶颈”约束下承受越来越大的效率损失。北京曾在手表、卷烟、电冰箱、电视机、汽车、计算机等领域都存在明显优势，我国很多城市的自然禀赋、固定资产存量、城市化基础等方面也都曾存在明显优势，但后来的发展并未能因此而明显受益。为什么？根本的不是过去对优势扶持过少，而是对劣势缺乏足够认识。克服劣势几乎从没有在区域战略中占据应有的位置。例如体制劣势、结构劣势等。劣势把优势吞没了。在很多区域，强调扶优为主的战略需要调整为克服劣势为主的战略。至少在未来5年内应当如此。

第二，优势战略其实并非是优化的战略。任何优势都是与其他区域比较而言的。从分工理论说，“比较优势”只是工业化起步阶段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人们早就发现，后发地区如果仅仅依靠比较优势来确定战略产业或支柱产业，永远只能获取比先发地区小得多的比较利益，永远无法实现经济赶超。过去20年中，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大量城市正是在“优势定位”的思路下导致了“重重轻轻”格局的不断强化和目前的结构困境。日本正是看到了这种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战略缺陷，反其道而行之，才从对本无优势的“幼稚产业”扶持开始，创出了产业经济学理论和后来的经济发展成就。

第三，优势是有时间性、阶段性的。在工业化进程中，产业升级是不断进行的。今天的优势产业可能正是明天的夕阳产业。我国从“九五”后期开始重点压缩过剩生产能力的产业在前几个五年计划中都曾是重点发展的产业。90年代以来，很多地区根据自己的资源“优势”、产业“优势”等上的项目后来相当多都变成了沉重的包袱。

认识劣势是最大的实事求是，也是最难做到的实事求是。不清楚自己的劣势就很容易夸大自己成功的可能性而忽略失败的可能性。

具体说，我曾对很多地方政府提出过两个建议。

一是坚决从衰退产业退出。我国很多区域经济之所以目前有举步维艰之

感，关键在于大量资源被困于生产能力过剩或市场需求萎缩的不良产业。从区域经济的实际情况看，要坚决从那些决策失误的项目中退出，从生产能力过剩的产业中退出，从没必要实行国有独资的企业中逐步退出。

二是真正选好新的支柱产业。要瞄准就业最大化、地方财政收益最大化、对提高人均收入促进作用最大化的产业，瞄准市场前景最大化的产业，而一定要摒弃追求产值最大化的思路，摒弃单纯从本地资源可能出发的思路，摒弃简单地追逐市场热点的思路。瞄准市场是有客观判定标准的。借鉴国际经验，瞄准市场的判定标准是收入需求增长弹性系数。收入需求增长弹性系数是指需求增长率与收入增长率的比值。从经验中就可以得知，在人们收入提高过程中，新增收入部分不会按原有收入状态下的消费结构分配。依据收入需求增长弹性系数选择产业就是要重点发展那些收入需求弹性系数最高的产业，简单说，也就是要选择人们收入增加的部分将主要投向的产业。瞄准市场不是瞄准当前的市场“热点”，不是瞄准人们花钱最多的产品，而是要瞄准收入需求增长弹性系数最高的产业。

【提问二】：西部大开发已经进入到第四年头。您认为要实现“十六大”报告提出的，10年内取得重大突破的关键点何在呢？

答：我觉得，要在10年内取得重大突破，要让西部人民在一个不太长的周期内看到初步成果，关键还在于发展城市经济。

在过去20余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西部地区实际上曾面临过多次有利的发展机会。例如，80年代初期我国农业生产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下呈现出了持续全面高涨的局面，而四川等地曾是在农村“联产计酬责任制”的改革中走在前列的地区之一；80年代中后期我国区域战略调整与发展的重点之一是在“军转民”等形式下对存量资产的改造与挖潜，而当时我国较为先进的工业生产能力主要聚集在中西部的“军工”与“三线”企业中；在确立“以能源交通为战略重点”后，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超大型的三峡工程上马、黄河中上游水利综合开发、西部石油与中部煤田加快发展以及沿陇海线延伸的“第二条大陆桥”铁路线开通等大规模增量资金的投入主要聚于西部；在90年代初中期，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我国与俄罗斯、西亚、东南亚等周边国家或地区的边境贸易发展曾形成为一个对外开放的新高潮；90年代中后期，“小康”战略和“扶贫攻坚战”的重心也在中西部。

但是，这些重要的战略机会并未能促进西部的普遍崛起。为什么？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在于，在上述各次历史机会中，我们始终忽略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及其改造。错失机会，最基本的原因在于或者仍沿用了传统的“基地型”、

“项目型”建设思路，如“军转民”及能源开发；或者效果主要体现于“面”，如“扶贫”；或者指导思想及措施明显呈“短期化”，如边贸发展。西部发展滞后，关键在于缺乏带动经济增长的要素聚集点。东部与西部发展差距不断拉大，根本在于城市发展差距不断拉大。

目前，我国共有地级及以上城市230余座。在过去几年中，这230多个城市的经济增长始终是远超过国民经济平均增长速度的。城市经济的作用显而易见。但在地级以上城市实现的国内生产总值中，西部所占比重只有12%左右。东、西部城市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5:1。实际上，东西部发展差距拉大，主要是城市发展差距拉大了。

从西部的实际情况出发，新的区域发展战略思路应当贯彻“重在点、兼顾线、舍弃面”的原则。其中的“点”就是指城市经济。城市经济是西部大开发过程中解决区域战略与国民经济整体战略之间、环境及资源保护与开发及发展之间、短期调控任务与长远战略发展任务之间、工业化基础薄弱与加快人民收入提高的迫切要求之间、结构调整与总量扩张之间、基础设施不足与战略性大开发之间、弱小的市场经济成分与强大的国有经济和自然经济成分之间、“二元”分割的城乡经济之间、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诸多矛盾的最优结合点。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国民经济面对的一项新的战略任务是农业结构调整。而在农业结构调整中，退田还林、退田还湖、退田还草以及“坡地体耕”的重点在西部。与此同时，可持续发展战略也要求加紧实施全面的“禁采”、“禁伐”。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开发与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以及与农业结构调整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解开这个矛盾之结的切入点就在于城市经济。发展城市经济是西部大开发中减轻对自然环境压力，克服生态脆弱劣势和有效利用资源的必然选择。

发展城市经济还是积累工业化条件的必由之路。一般说，西部相当多的地区存在着人口聚集程度低、基础设施条件差等不利于工业化发展的因素。发展城市经济的过程，不仅是提高资源集中与优化配置程度、人口聚集程度和最经济地改善基础设施条件的过程，而且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带头地区和有效提高西部地区人均收入、解决就业问题、调整结构和巩固“小康”战略成果的过程。

不平衡发展是我国前20余年的成功经验之一。西部大开发应当首先造就自己的经济增长带头地区。在今后15年或略长一些的时期中，不仅老的省会城市应当大力发展，而且要努力争取在每个省区形成若干个中等的经济中心城市。让这些城市成为当地的“先发”地区。与此同时，还要围绕县城建设

加快中小城镇发展，在条件具备的地方推进乡镇合并。一些不适宜人类居住地区的人口、“一退三还”地区的人口应当尽可能向城市周边迁徙。

城市建设应当成为西部大开发中基础设施投人的重心。在新的开发战略中，基础设施建设不应再继续过去那种力图“村村通公路”的低水平、广覆盖的不经济方式，而应当把重点放在城市基础设施的改善与高级化上。改善西部的投资环境，当务之急是改善城市环境。不仅传统的电、气、水及公、铁、航空等方面要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轻轨、城市立交、移动通讯系统、电子网络也应当列人西部城市发展的中期目标。应当努力形成这样一种局面，让城市经济环境的大改善成为西部大开发的第一轮高潮。从一定意义上说，西部大开发战略能否成功，关键在于能否在各地区造就若干具有现代经济意义的城市。

新一轮城市经济发展战略应当首先注重发展大、中城市。目前，我国西部各省区城市构成的特点是大城市不够大，不够强；中等城市不够优。一方面省会城市仍要加强改造与发展，另一方面还要努力将具有区域经济中心作用的若干中等城市扩张成大城市。如果在未来 15 到 20 年内，西部每个省区能够拥有 2～3 个百万人以上的大城市，6～8 个 50 万至 100 万人的中等城市，那么城市人口在总人口的比重将有可能增加到 1/3 以上。由此带来，向城市集中的移民潮可能会形成西部大开发的更大高潮。一个必须认清的基本判断是，西部大开发不可能也不应当是在现存人口分布状态下的就地开发。西部一定需要一个与城市扩张相应的移民高潮。唯有在移民高潮的基础上，区域经济结构改造、保护环境以及兴地富民等战略措施才能获得充分的操作余地。

【提问三】：应当怎样判断西部各省区目前发展所处的位置、阶段呢？

答：西部大开发的根本含义在于推进西部地区的工业化。我认为，就总体情况看，西部地区仍处于工业化初、中期，部分城市经济处于向工业化中后期转变的发展阶段。

从这样一个基本判断出发，我认为，西部经济目前所处阶段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特征。

第一，西部经济发展正处于新一轮工业固定资产大规模投人时期。西部大开发并非是西部工业化的始点。从历史上看，西部是中国近代大机器工业最早的诞生地之一。兰州织呢局的历史和江南造船厂、开滦矿务局一样长。甘肃的玉门油田是我国石油工业的发祥地。建国后西部地区也曾有过两次工业化的高潮。一次是“一五”时期，另一次是从“三五”到“五五”计划的

“三线建设”时期。西部大开发以来，国家对西部地区投资力度不断加大，特别是青藏铁路、西电东送等标志性工程相继开工后，西部地区的投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可以预期的是，未来一段中期范围内，在西部地区的资金投入中，投入固定资产更新部分的资金增长速度将会不断超过投入到新增生产能力的资金增长速度。由此带来的将不仅是投资需求的扩大，而且是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变化和区域经济竞争力的持续增强。

第二，西部经济发展正处于“边际收益递增”阶段前的基础设施完善时期。应当注意到，西部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就已经开始。1998年起，积极财政政策下的政府投入，从一开始就是以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为核心的。这些投入主要受益区域就是西部。利用国债项目进行的农村电网改造、新铁路线建设、新机场建设和高等级公路建设项目主要分布于西部广大地区。从目前看，西部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果已经开始显现。农村以农村电网和农业水利设施为核心，城市以交通枢纽工程、周边高等级公路建设以及通信设施为核心，西部的基础设施条件已经有了清晰可见的变化。经过过去若干年的积累，经济发展的“外部性成本”已经初步支付，受益于此，经营性资产的“收益递增”阶段可能于“十五”末期，即2005年左右开始显现，在下一个中期发展过程中出现第一个高潮。

第三，西部经济发展正处于政策效应不断显现的时期。在未来一段发展过程中，支持西部经济增长的一个独特资源是强大的政策资源。区别于东部发展过程，政府发展西部的政策体系将不仅限于以财税优惠为核心的“招商引资”，而将是一个长期、完整的政策体系。西部的政策投入将呈现为互有重叠的三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是以政府投资为主的阶段。这个周期的延续时间大约为2000年到2008年。第二阶段是以城市化、产业结构重组、沿周边对外开放为主的阶段。这个周期的延续时间大约将是从2002年到2010年。第三阶段是以制度建设、资源流动和产权的市场化为主的阶段。这个周期大约为2004年到2012年。

第四，西部经济发展正处于资源市场化的前期和资产价格的市场发现过程。在过去很长时期内，与华南、华东地区相比，西部资源要素的市场化程度很低。一方面，由于大量资源滞留在市场之外，资产价格无法通过普遍性的交易趋近于真实价值；另一方面，由于区域经济整体的发展基础薄弱，较低的投资回报水平也明显拉低了西部大量资产、资源的市场价格表现。从2002年的情况看，这种状态有可能在未来2~5年的周期内发生较大变化。当前，西部的土地、资金、劳动力等要素正在步入一个新的普遍市场化过程。在这个市场化过程中，影响投资回报水平的外部制约因素正在改善，例如基

础设施不断完善；非良性的要素组合状态正在得到调整，例如体制性的“冗员负担”正在被逐步排出。随着资源、要素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被投资回报水平掩盖的资产价格将在市场上获得一个重新发现的机会。

第五，西部经济发展正处于城市化高潮前期和“集聚效应”趋于显现时期。“十五”以来，西部地区也普遍出现了以新城区建设和城市重心外移为特征的城市规模扩张趋势。西部城市化具有明显的资源集聚特点。不仅基础设施投入呈现出向城市集中的态势、新兴产业向城市集中的态势，而且一段时期来，政策性的生态移民、水利移民也由过去从农村到农村的移民演变为部分向城市移民。这是一个符合规律的重要动向。城市化、资源集聚与集中必然带来集约化的好处，带来边际收益的递增趋势。其中最有潜力的是省会城市周边的近郊区域和一些新产业集中的新兴城市。

第六，西部经济发展正处于产业结构转换与优势产业成长期。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西部各省区的产业结构正在进入一个明显的大转换过程。内蒙古的羊绒业、奶制品业，云南的旅游业、花卉业，陕西的林果业、飞机制造业，四川的家电业、饲料及家畜养殖业，新疆的农产品深加工业，重庆的汽车制造业的发展都显现出强烈的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意义。结构变动，而且是各省区具有不同特点的结构变动，意味着西部的经济正在处于一个重新分工和资源重新再组合的过程。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是一个中长期的过程。这个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目前还难以充分显现。但按照规律和国内外经验，未来5到10年将是西部地区受益于结构升级的重要时期。

【提问四】：国外的城市建设有什么值得我们借鉴的重要经验吗？

答：在国外的城市发展中迄今仍有许多我们无法充分解答的历史悬念。比如说，计划经济、公有制、中央集权下的城市发展应当非常有规划才对。但事实恰好相反。在过去一些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们中国城市的规划性最差，反而是国外那些在市场经济、私有制下发展起来的城市表现出了极强的规划性。

我们举几个国外城市的例子。美国旧金山的地表特征和大连、青岛有类似之处，就是倚山而建的，街道起伏不定，坡度非常大。但如果你从飞机上往下看，或者你拿一张旧金山的地图看的话，就会发现，旧金山的街道是非常笔直的，像切“豆腐块儿”一样横平竖直。不论地势如何起伏，街道都是直的。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又另具特点，面向阿姆斯特河形成三个同心的半圆的通道，然后是一条条放射状的街道。一看就是整齐划一，规划性非常强。这些规划性很强的城市格局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市场经济也能表现出这样

强的规划性？这里面有很多值得我们探索的东西。

国外城市的规划性不仅表现在街道设置上。比如，巴黎是一个静态城市。这个城市以静态的地表建筑为核心，所有动态的交通系统服从于地表的静态系统。城市的扩张、城市的资源组合、城市发展、城市产业的选择都完全服从于它的地表建筑。到现在为止，巴黎也只有一个高层建筑。这个建筑建好后遭到巴黎市民的强烈反对，大家都认为它把城市的整个面貌都给破坏了。以后巴黎就再也没有建这种现代化的高层建筑。巴黎街道两侧全都是17、18、19世纪遗留下来的历史古迹。当地法律规定，所有这些房屋的业主都不能随意对房子的外表进行改造，必须保持原貌。屋子里面随便改，但外貌不能改。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城市能夺走巴黎世界第一旅游城市的桂冠。包括京都、拉斯维加斯、夏威夷等多少旅游胜地，都难以取代巴黎世界第一旅游地的地位。

而美国的洛杉矶正相反。洛杉矶是个动态的城市。这个城市是先建立交桥、高速路。地表建筑服从高速交通系统的布局要求。这个城市纵横交错都是高速公路。然后在高速路分割的“块”里建房子。所以洛杉矶尽管有好莱坞、迪斯尼等旅游景点，但城市面貌并不好看。甚至找不到一条代表性的街道。一眼看去纵横交错的全是立交桥、高速路。

我曾经专门去法国考察过巴黎的基础设施。巴黎人给我们介绍说，他们一开始遇到停车位不足问题时也是努力新建停车位，拓展街道。后来发觉这种努力的效果不好。为什么呢？他们说，在城市里每增加一个停车位，就引来三辆半车。努力改善的结果是使城市更加拥堵。后来巴黎的做法就是不再增建停车位，而是不断提高停车位的收费。你找不到车位，或者付不起停车费就不要开车进城。把汽车停在外环路以外，然后坐地铁上班。美国的纽约也是一样。纽约很多停车位是15分钟一计费，每15分钟可能要收你三个美元。美国更绝的是很多停车位的自动“眯表”。要是你停车时间超过你投的钱，马上有人给你贴罚单。那一次多投点钱行不行？也不行。每次最多只能投半小时的钱。整个规则的意思就是迫使你必须尽快开走，有钱也不能多停。我们看电影上的美国人都是步履匆匆。那都是因为慢一点他的车子就要吃罚单。在国外的少数几个大城市，例如东京、巴黎、伦敦、纽约，你要想开车上班，那是非常之难的。在纽约曼哈顿岛，就是被恐怖分子炸了的那个世贸大厦那里，一般白领是根本不可能开车上班的。因为他一天的工资也不够停车费的。只有那些大老板们才开私车上班。而且也不是自己开，是专职司机开。老板到公司下车后司机马上把车开走。

实际上在发达国家，真正住在大城市市区里的不是有钱人。东京可能还

有很少一些有钱人住。在美国的纽约、洛杉矶、旧金山等一些城市，住在市区的都是一些低收入群体。有钱人一下班都回郊外的家了。东京、纽约的很多街道，一到5点钟就没人了，叫“鬼街”。在街上游荡的都是些黑人，你走在街上得躲远些。

城市并不仅仅是一个建筑物和要素、资源的组合，不仅仅是一个人口的聚集地，而且还是一个社会经济关系的组合系统。市场经济下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利益关系是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市场经济秩序是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规范的，离开城市，我们就不可能形成市场经济下大家共同遵守的各种市场行为规范。

【提问五】：最近很多城市提出要建轻轨、地铁，这样一个趋势对区域经济发展有好处吗？

答：过去一段时间内，我国很多地方都对兴建轨道交通表现出了很高的积极性。上海的磁浮、北京的轻轨不用说，提出要建地铁的城市就超过20座，此外还有提出要建城际轨道交通的。

在过去一段发展过程中，我国的高速公路有了非常大的发展。目前我们已经有1.9万公里的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在下一个发展周期，我们的高速公路还会发展，还会继续完善。但另一个基础设施的高潮已经在悄然兴起。这就是轨道交通。

从各国的经验看，在大城市里，轨道交通实在是一个非常好的公共交通工具。运行效率高、地面资源占用程度低，而且可以长期稳定运行，有许多别的交通工具所不及的优点。香港修建新机场的时候遭到很多非议，很多人说选点选得太远了。后来香港在机场和市区之间修了一条“机场快速”的轻轨，现在已经没人说新机场太远的话了。现在我去香港，一般都告诉对方不要到机场接我。因为你开车来接，你也很累，我也不舒服。坐两个多小时汽车是很累人的。坐快速轻轨20几分钟就到了，而且乘坐非常舒适。

现在很多城市都热衷于发展地铁。广州、沈阳、青岛、济南等，大约有20多个城市。济南的地铁据说已经通过了论证。大家知道，济南是著名的“泉城”。济南修地铁，不怕把“泉脉”给挖断了吗？济南市政府曾给我们解释说，我们的泉水是在地下100多米深的地方，地铁只挖到45米深，所以无妨。济南会不会把泉水给挖断，我们不去论证它。但我认为，大城市努力发展轨道交通是应该鼓励、推动的一个好的趋势。

有一种说法说，世界有地铁的历史100多年了，迄今还没有找到一个盈利模式，所以我们不应盲目发展地铁。这种说法未免太过简单思维。世界

100年没找到盈利模式，那么我们是否应当等哪个国家找到盈利模式再去发展城市轨道交通呢？这显然不合理。迄今没有找到，至少我们可以假定，城市轨道交通这种投资就不应当是靠直接的运营收入来收回投资的。政府投资轨道交通应当靠什么收回投资呢？应当靠通车后的土地增值收益和沿线经济发展后的税负增收收回投资。北京修了一条26公里的轻轨，轻轨通达之处的房地产价格立即上涨。

实际上，城市轨道交通不仅包括地铁和轻轨，而且还包括城际轨道交通。目前，我国已有一些城际轨道交通初露端倪了，比如成渝之间每天要开12对城际快车。宁沪之间铁路要和高速公路竞争，也开通了城际快车。京津之间现在每天也开行多趟城际快车。北京到石家庄之间每天对开4趟城际快车。但目前这种城际快车还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际快车，因为目前的城际快车还是在铁路主干道上跑的。而铁路主干道是不能满足城际快车的发车频率和速度要求的。因为铁路主干道是按照货运的承重要求和速度来设计和铺设的，本来就没设计那么高的时速。而且太多开行城际旅客列车还会妨碍货运。因此，城际之间的快速轨道交通是需要在铁路主干道之外另行铺设的。

我相信在未来的几年内城际轨道交通会像高速公路的发展那样很快全面铺开。宁、沪、杭之间，山东很多城市之间，“珠三角”地区的很多城市之间都可以用轨道交通连接起来。北京到周围的一些城市，例如天津、承德、唐山、张家口、保定、石家庄之间都应当发展城际快速轨道交通。

别以为轨道交通是一个落后的、传统的夕阳产业。现代化轨道交通是现代科学技术的综合产物。不要说磁浮，就是轮轨式的轨道交通，那个火车头已经不是我们原来熟悉的蒸汽机、内燃机了，那是一个移动的机器人。所有最先进电子技术、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模拟技术都集合在那个火车头上了。轨道交通的车厢也是一个可移动的最先进的房屋。它的舒适度、安全度、各种功能要求是非常高的。我前不久和铁路方面的专家谈到轨道交通时，专家告诉我，现在沿线的铁路交通信号早已不是靠人工举信号灯的方式了。自动化程度非常高的信号系统要集合仪表、电子、激光、新材料等很多尖端科技成果。信号系统应当发出什么样的光，能够耐受什么样的自然条件不出错等都是很高的学问。

建议大家重视轨道交通发展带来的市场机会。有专家估计，全球未来20年内在轨道交通上投资，包括轨道铺设本身、车辆制造、轨道信号系统、轨道两边的相配套设施等，恐怕有超过2/3的部分集中在中国。铁路这种东西，发达国家已经发展得差不多了。日本“新干线”早就建好了。美国的铁路轨道已经在拆了。非洲大陆的轨道交通还很遥远，因为经济上还没有客观要求。

最近一段，网上又在讨论京沪之间的长距离快速轨道应不应当采用日本“新干线”技术。所以说未来15到20年内，轨道交通在中国大陆的商机非常大。有一次我接待瑞士的一个代表团。瑞士有一家很出名的公司叫ABB。这个公司轨道交通设备的制造技术是世界一流的。我提出，建议他们的ABB公司来参与中国轨道交通的建设。当时就有一个ABB公司的董事在场。他告诉我，ABB公司在财务上遇到了很大的困境，股票狂跌。这位董事的股票也被深套其中。我说，我们差不多可以断言，能给你的股票带来“解套”机会的大概只有中国这个市场了。

第7讲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QUANMIANJIANSHEXIAOKANGSHEHUI

今天这一讲，我们讨论党的“十六大”报告的主题，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我看到我们这个EMBA班有个很漂亮的联络手册，上面每个同学的照片、联系方法、兴趣爱好、座右铭、最喜欢的格言等都很齐全。做得很上档次。我也喜欢一句话，也算一句格言吧。叫什么呢？很简单，叫做“吃饱了不饿”。

“吃饱了不饿”这句话，俗是俗了点。但这句话揭示着一条最朴素不过的真理。人在饥饿的时候什么尊严也没有。我们坚信，让全国人民过上好日子，这就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1. 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小康"

☆ "全面小康"是一个具有极高政治智慧的最好提法。

☆ "总体小康"是以满足人们的生存需要为主的小康，"全面小康"是以满足人们发展需要为主的小康。

☆ 让13亿人都吃饱饭的物质基础已经实实在在地具备了，满足全社会实现温饱的供给能力我们的确是充分地具备了。

☆ 一个社会成为了学习型社会，这个社会就进入了一个理性的社会、文明的社会、发展的社会、进步的社会。

☆ 持续和不断扩大的需求潜力蕴藏于人们的发展需要中。

【7-1-1】"全面小康"是一个具有极高政治智慧的提法。这个目标首先坚定地回答了来自"左"的诘难，坚决地否定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思潮。这个目标也同时坚定地堵死了右的政治倾向。我们要的是"全面的小康"，绝对不是两极分化的社会，绝对不是一小部分人占有社会绝大部分财富，而大多数人一无所有的社会。

2002召开的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一个新的战略目标，叫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力争实现国民经济总量在2000年的基础上再"翻两番"，全面建设一个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全面小康"这个目标听起来好像平淡无奇。最初在议论这个目标时就有两种不同的声音。

一种意见认为定低了。还要奋斗20年，才不过是"小康"啊？不带劲。为什么不提"全面实现现代化"、"建设世界一流强国"这样的目标呢？那多响亮啊。仅仅是个"小康"，是不是自信心不足？是不是太保守了呢？

另一种意见认为定高了。我们走到今天才不过是个"初级阶段"呀。全国还有不少区域没有脱贫，还有一个很大的人群还没有吃饱饭，城市中还有

很多困难群体。我们不能低估未来的发展难度，不应盲目乐观，不能高估我们已经取得的成绩。中国未来20年的目标还应当是“脱贫”。

这两种意见都有道理，都从不同方面说明了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战略位置，但都有片面性。我认为，党的“十六大”提出的目标是在科学总结我们过去多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符合客观实际、又富有远见并且实实在在的战略目标。这个战略目标貌似平淡无奇，但这是一个具有极高政治智慧的最好提法。

为什么这么说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目标首先坚定地回答了来自“左”的诘难，坚决地否定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思潮。我们要建设的是一个让老百姓过好日子的社会。我们要的，首先得是“苗”。没有“苗”的社会，贫穷的社会绝对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也绝对不是我们所要的社会。这个目标也同时坚定地堵死了右的政治倾向。我们要的是“全面的小康”，绝对不是两极分化，绝对不是一端是资本不断积累，另一端是贫困不断积累的社会。我们要建设的绝对不是一小部分人占有社会绝大部分财富，而大多数人一无所有的社会。

这个目标好不好呢？我看非常好。这就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党的“十六大”报告讲了很多问题，涉及政治、军事、国防安全、国际形势、安定团结、社会发展等多方面。我们不可能全面宣讲，只讲其中和经济有关的方面。

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关于经济方面的内容也很多。至少讲了四个大的问题。这四个问题，一是“全面小康”的战略目标，二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三是改革社会分配制度，四是调整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我们今天的内容以“全面小康建设”为核心，兼顾其他。

前面有关专题中我们已经涉及过，我国历史上曾多次制定长期发展战略。在整整半个世纪之前的1953年，我国就提出“要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也就是“15年超英赶美”。现在看来，我们那时的认识是多么幼稚和肤浅。1/4世纪略长一些之前的1975年，当时的总理周恩来曾代表党中央提出过一个“到20世纪末基本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长期发展战略。在当时，“四个现代化”的战略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人心、动员全国人民结束“文化大革命”那场政治动乱的作用。这个历史功绩不可抹煞。但现在看，在当时的生产力基础上用25年时间实现现代化，这显然是不现实的。“基本实现”也不现实。我们从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那么大的发展成就，到今天我们也才敢说，再过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部分达到现代化。可见当时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也是很不充分的。80年代初

期，我国再次制定一个长期发展战略，就是上一个“翻两番”战略。这个战略我们顺利地超额完成了。而且完成的结果大大超过了我们当初的预期。

在80年代初期最初提出翻两番战略时，那时的“翻两番”指的是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但到80年代中期的“七五”时期，为了更好地与国际社会接轨和更好地反映我国国民经济增长情况，我们把目标调整为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到90年代中期制定“九五”计划时，我们顺利实现了与1980年相比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把目标调整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这个调整后的目标虽然只加了“人均”两个字，但这意味着我们的战略的目标大大升级了。因为80年代初期我国的人口是10亿人，2000年末的时候我国人口接近13亿人。大家可以想想，这“人均”两个字在战略目标上的“加码”有多重。

即或有了这样一个“加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我们也顺利实现了。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一个新的翻两番战略。这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

我们已经经历过一个建设小康的战略发展过程，为什么新战略目标仍是小康呢？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国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还只是一个“总体的小康”。

【7－1－2】我国的确还存在着一个总数量不算小的未吃饱饭的人群，但我们让13亿人都吃饱饭的物质基础是已经实实在在地具备了。在前一个战略发展过程中，满足全社会实现温饱的供给能力我们的确是充分地具备了。

“总体小康”和“全面小康”有什么区别呢？首先一个区别是，“总体小康”是以满足人们的生存需要为主的小康，“全面小康”是以满足人们发展需要为主的小康。

我们前面提到过，有不少人对我们目前是否实现了总体小康，是否充分满足了人们的生存需要持怀疑看法。这个看法并非没有根据。党的“十六大”报告丝毫也没有隐讳、回避我们目前发展不足的问题，在提出“全面小康”目标之前，就明确说明，目前“我国生产力和科技、教育还比较落后，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改变，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扭转，贫困人口还为数不少；人口总量继续增加，老龄人口比重上升，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大；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我们仍然面临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经济体制和其他方面的管理体制还不完善；民主法制建设和思想道德建

设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巩固和提高目前达到的小康水平，还需要进行长时期的艰苦奋斗。”

请大家注意上述“十六大”报告中的最后一句话，“巩固和提高目前达到的小康水平，还需要进行长时期的艰苦奋斗”。也就是说，我们对目前已经达到的发展水平是有很冷静、客观的估计的。我们并没有高估“全面小康”战略起步时的发展水平。温家宝总理在上任后的第一个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国目前没有摆脱贫困的人有3000万左右，这是按每年人均收入625元的标准计算的。这个标准是低水平的，如果标准再增加200元，农村贫困人口就是9000万。可见，我们对我国现实发展水平是有充分、冷静估计的。

冷静、客观地评价我们的发展成绩是必要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的确需要一个全局性的判断。判断一下中国是否真的实现了“总体小康”，是否真的可以说，我们已经达到能够满足13亿人生存需要的发展水平。

还是先给大家讲个故事。

1996年的时候，有个叫布朗的美国人写了一本书，叫做《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这位布朗先生是位大学教授、农业专家。他是在研究了中国农业问题后写的这本书。布朗先生提出，到90年代末期，中国从80年代开始的农村改革已经差不多走到头了，农村政策调整所能带来的农业增产潜力已经基本挖掘殆尽。中国的农业要想继续增产，那必须建立现代大农业才行。但是中国又不具备建立现代大农业的资金、科技投人力量。人口在继续增长，而粮食没有增产潜力，布朗教授由此得出结论说，20世纪末，最多到21世纪初，中国肯定会发生大规模的粮荒。

到20世纪末，中国的人口已近13亿人口。粮食短缺怎么办呢？布朗先生推断，中国只能到国际市场上买粮食。13亿人都吃不饱，那得买多少粮食呀？国际市场上的粮价由此还不得飞涨？中国缺粮、买粮导致国际粮价飞涨，那些比中国更穷的非洲国家就会买不起粮食，就会大面积的饿死人。

布朗先生这本《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的书当时在西方挺有影响。这本书后来成为了“中国威胁论”的最早起源之一。“中国威胁论”后来被演绎成了很多版本。我们前面说过，日本版的“中国威胁论”叫做“产业空心化”。2003年以来还有一个最新版本，叫做“中国输出通货紧缩”。后面的这些演绎我们先不去评论它。布朗先生这本书可以说是开了一个“中国威胁论”的先河。

1998年，美国农业部得到布朗教授这本书以后如获至宝，赶紧给美国国务院打了一份报告。报告什么呢？说我们美国的贸易代表团不是正跟中国谈判中国入世的双边协定问题呢吗？赶快通知我们的代表团，叫他们在和中国

人的谈判中要一个优惠政策，提出一个新的价码。那就是要求在“双边协定”中写上，中国在世纪之交如果缺粮的话，必须优先买我们美国人的粮食。

针对美国人的要求，我们中国的代表团提出，说 WTO 的规则我们知道呀，其最根本的规则不就是公平竞争，择优选择吗？如果有一天我们中国缺粮，我们保证不歧视，国际市场上谁的粮食好，谁的价格公道，我们买谁的不就行了吗？凭什么非得写入“优先”买你美国的粮食呢？美国人很霸道，说不行。不写这一条我们就不签字。大家知道，农业问题是我们和美国人在入世问题谈判中讨价还价最厉害、拖延时间最长的一个问题。最后是我们妥协，是朱总理亲自决定的。这就是 1999 年中美之间关于中国入世问题的谈判中所谓“加州小麦”问题的由来。

中国妥协后，双方签字。美国人高高兴兴地回去了。

戏剧性的事情在后面。

到 2001 年 11 月，美国农业部又给美国国务院写了个报告，说坏了，我们都上了布朗那小子的当了。我们从上世纪末等到这个世纪初，也没等来中国缺粮的消息。我们派人去一打听，原来中国不缺粮。他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粮食过剩。用他们总理朱镕基的话说，中国现在面临的农产品问题是个“愉快的烦恼”。

美国人至此才恍然大悟。原来双边贸易谈判中关于农产品的要价是白要了。这个筹码根本没有实际意义。幸亏这位布朗教授是个白人，要是个华裔，我估计弄不好得被 FBI 给逮起来，像所谓的“李文和案”一样，审审看他是不是被中国政府收买了，故意送的假情报。

朱总理为什么说我们面临的是个“愉快的烦恼”呢？这就得说说我们中国现实的粮食供求情况。

在过去很多年中，我们为粮食问题担心。那时担心的是短缺。但现在我们不短缺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愉快”。但粮食太多了也是个很大的麻烦。目前我国的国库存粮就达 2.5 亿吨，这还不算民间存粮。就是老百姓“卖粮难”，存在农民手里的那个部分。民间存粮估计也在 2.2 亿吨以上。这样一个存粮数是个什么含义呢？我国正常年景一年的粮食总收成大约在 4.7 亿至 4.8 亿吨上下。1998 年那年虽然是全国南北大水，但那年是我国建国以来的第二大丰收年。那一年我们打了 4.95 亿吨粮食。中国农业的特点是不怕涝，只怕旱。叫做“涝灾灾一线，旱灾灾一片”。就是说，我们目前的总存粮数差不多相当于我国正常年景一年的总产量。

粮食多了有什么不好呢？最大的问题就是粮食价格低迷，严重影响农民的收入增长。这就是“谷贱伤农”。从 1998 年以来，我国农产品市场就面临

粮价低迷的问题。至今粮价仍是影响农民收入的最主要因素。我们前面说过，1996年时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是8.99%，2000年时这个指标下降到2.01%。2002年，我国农民纯收入增长速度恢复到4.76%。应当说回升幅度还是不小的。大约是平均每个农民增收100元。但这一年全国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是打工获取的工资性收入，农产品的价格情况并没有改善。由此带来，这一年在一些粮食主产区，甚至还出现了农民纯收入绝对下降的局面。

粮食价格低迷，那能不能用政策干预粮价呢？能。但要看怎么干预。在这里我们顺便先插讲一点农产品价格的经济学常识。

从1998年以来，粮价始终是我们政策干预的重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大家听说过的“敞开收购、顺价销售”政策就是为了干预农产品供大于求情况下的粮食价格。但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我们的政策介入点可能存在比较大的缺陷，政策效果不好。说清楚这个问题，需要扯得稍微远一点。这个问题也和我们最近两年来的农业政策调整有密切关系。

我是念经济学的科班出身，而且是实实在在地念了10年。四年本科、三年硕士、三年博士。一点不掺水。还不算到东洋、西洋留学的年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始终没搞明白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人牛奶过剩了就倒进大海，柑橘过剩了用压路机压碎。我就去问教授这个问题。教授回答，你怎么连这都想不明白？那时因为资本主义太腐朽呀。因为资本家都是蛇蝎心肠，宁愿倒到大海里也不愿给穷人喝。不是开玩笑，当时的教科书里就是这么写的。在很长时间里，我们就是这么认识这个问题的。

当农产品过剩的问题真正轮到我们头上时，我们才明白，原来把牛奶倒进大海是一项非常科学、非常合理的农业政策，是政府干预农产品价格的一种良性行为。当粮食严重过剩时，合理的政府政策应当是什么呢？应当由政府出钱把多余的粮食买下来。买下来干什么呢？倒上汽油把它们烧掉。

这也不是开玩笑。这种政策是强制地消除供给剩余，迅速恢复农产品正常价格的有效方法。

粮食这种东西有个特点，就是消费需求弹性很小。常识可知，人们不会因为价格降低或者收入增长而多消费粮食。在经济学上，供大于求的部分叫做供给剩余。当粮食这种产品存在着一个很大的供给剩余时，这个供给剩余会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压抑着粮价在低位无法抬头。

打个比方说，我国一年的需求总量大约是4.7亿吨粮食。假定我们未来10年每年都恰好生产了4.7亿吨粮食。也就是说，粮食的生产和消费处于长期供求平衡的状况。但由于存在着一个很大的供给剩余，也就存粮，粮食价格可能长期无法正确显示供求关系的真实情况。

我们假定供求平衡下的粮食价格应当是1.6元一公斤。如果新粮打算以1.6元一公斤出售，陈粮就会站出来说，我1.4元、1.3元就卖。甚至1.2元也可以商量。这就迫使新粮也得把价格压低到1.4元，甚至1.3元一公斤。问题是，即或全年粮食价格在低位运行，我们能不能多卖出粮食呢？不能。我们刚才讲过，粮食这种产品的消费需求弹性很小。人们不会因为粮价低迷而多吃粮食。粮食价格再便宜，全国一年的消费量也不会比4.7亿吨更多。到年底我们一看，去年剩下多少存粮，今年还会剩下多少存粮。存粮数并不会因为价格低迷而减少。

过去“敞开收购、顺价销售”的政策就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认识误区。保护农民利益、防止谷贱伤农，这个政策出发点是很好的。在任何国家，这都是政府应当做的。问题在于，依靠政策和国家补贴强制地拉高粮价的结果是什么呢？是向生产者、向供给方、向农民发出了一个增长和短缺的错误信号。政府补贴粮价的行为所传达的是政府鼓励增产的信号。由此带来，第二年会出现更大的供过于求和供给过剩。

那应当怎么办呢？是不是也得由政府把多余的粮食买下来烧掉呢？我们已经找到了比“烧掉”更积极、更有效的办法。这就是政策性减产。

最近两三年来我们想明白了一个道理。同样的政策代价，补贴粮价不如补贴减产。产量减下来，供给剩余不就自动消除了吗？2002年，我国的粮食总产量是4.57亿吨。比我们正常年景的4.7亿到4.8亿吨减少不少。但大家别担心。这个减产的主要因素是政策干预而并非是自然灾害。我们发现，鼓励减产的政策代价要比补贴粮价低得多，而效果会好得多。

我国最近两三年里实行了一项不事声张的农业政策，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一退三还”、“坡地休耕”。不适宜人类耕作，对自然环境破坏大的土地要全部退耕还林、还草、还湖。也就是说要还回到自然状态去。要把这些地“荒”了。此外，25度以上的坡地，水土流失严重，土地收益远抵偿不了生态代价、环境成本的，我们也要全部休耕。按照2002年的政策，农民休耕一亩地，中央政府补贴300斤粮食，还给50元现钱。

古往今来，不种地政府给钱粮，大家听说过这种事吗？我们现在实行的就是这样一个政策。前一届政府的朱镕基总理高兴地把这个政策叫做“开仓放粮”。这个“开仓放粮”的目标不是赈灾，而是调整农产品供求。

这个政策是一举三得。一是主动干预供给。这不仅最终会有利于粮食的供求平衡，而且直接向市场发出一个供给减少的信号，有利于较快地促进粮价回升。二是减轻政策代价。我们在实行“敞开收购、顺价销售”的政策时花费了很大的代价。担负政策性金融职能的农业发展银行仅此一项就增加了

数千亿元的粮食占款。在现在的减产政策中，政府不仅不需要拿出太多的现钱，而且还可以有效地降低库存，减轻存粮的损失。三是在调整粮食供求关系的同时改善了环境，促进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2002年，我国仅退耕还林的耕地就达8700万亩。我们前面还讲到过，我国从50年代就努力开垦东北的北大荒，那时说要把北大荒变成“北大仓”。在下一个战略发展周期内，我们的任务是把“北大仓”再还回到北大荒去。保护那片宝贵的湿地资源。我们还打算把内蒙古的230万牧民全部迁出草原，实行全面禁牧。

现在回到刚才的主题。我们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什么问题呢？是想说明一个很重要的判断。我国的确还存在着一个总数量不算小的未吃饱饭的人群。但我们让13亿人都吃饱饭的物质基础是已经实实在在地具备了。在前一个战略发展过程中，满足全社会实现温饱的供给能力我们的确是充分地具备了。

这个估计、这个结论可不是轻易下的。要知道中国是个“饿怕了”的民族。在一定意义上说，过去几千年、过去100年、过去50年，我们始终在为“吃饱饭”这个目标奋斗。我为什么在这一讲的开头先说了一个“吃饱了不饿”是真理的话呢？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忘记了温饱是人们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曾把“突出政治”突出到了“吃饱饭”的前面。而恰好是我们自己实践，再明白不过地证明着一条客观规律。人吃饱了饭才能论及其他。

在我国几千年的农耕社会里，老百姓向往的理想社会是什么呢？就是衣食饱暖而已，但人们衣食饱暖尚且不得。民间文学是最反映老百姓的希冀与企盼的。安徽的黄梅戏中有个脍炙人口的故事，叫做“天仙配”。“天仙配”里有个唱段，现在被人们当成歌，在卡拉OK里经常唱，这就是“夫妻双双把家还”。一个小伙子和天上的仙女谈上了恋爱。和仙女谈恋爱，多浪漫。但他们向往的生活是什么呢？不过就是“你织布来我耕田，你挑水来我浇园”。由此就能“从此不受那人间苦”。老百姓没想别的，丰衣足食足矣。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老百姓中流传什么样的民谚呢？“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不纳粮就能吃饱饭。不是中国老百姓缺乏远大志向。中国古代哲学中早就有“格物致知”的思考，中华民族是最早思考生命、人类和自然界之间最一般关系的民族。但是如果一个社会普遍存在着连饭都吃不饱，生存都不能保证的人群，这个社会怎么可能产生出更高境界的文化呢？

大约100年前，中国出了个伟大的哲人，叫孙中山。孙中山先生曾经几十年到处奔走，鼓吹革命，号召老百姓起来推翻清朝封建统治。但是在很长时间内“和者甚寡”，就是老百姓呼应的很少。孙中山先生百思不得其解，就做调查研究。老百姓告诉他说，孙先生，您讲的什么“共和”呀、“民主”

呀，我们不懂。孙先生回去想了一夜，想明白了，就把自己的革命纲领修改为“耕者有其田”。“耕者有其田”，就是种地的有地种，有地种就有饭吃。老百姓说，孙先生，这回我们听懂了，我们拥护你的主张。这才有了中国辛亥革命推翻皇帝的历史进步。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有过一段很长的历史，叫做“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也叫“十年内战”。大家印象中好像闹红军那个时候的历史不长，其实那是一个很长的时间，长达10年。比抗日战争还长两年。但在这10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共产党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没在全国造成多大影响。为什么呢？因为那时我们提出一个口号，叫做“武装保卫苏维埃”。老百姓弄不明白，这个“苏维埃”和我有什么关系。人们说，我们周边方圆百十里地没这么一个姓“苏”的人呀，我们武装保卫他干什么呢？后来我们调整了自己的纲领，提出要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满足老百姓的生存要求，这才有了我们党后来的发展。所以后来“十年内战”时期又叫“土地革命”时期。我们找到了自己政党的立足点，这就是让老百姓吃饱饭。

半个多世纪之前，到我们建国前夕，美国曾大幅度地调整了对华政策。到1948年时，美国已经明确放弃对国民党政权的支持。当时蒋介石派宋美龄到美国国会去游说，结果是一块“美援”也没要到。美国国务院还专门就此发表了一篇关于对华政策的“白皮书”。美国人说，我们看明白了，共产党取代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已经是早晚的事了，你们共产党比国民党强，这我们承认。但我们美国人认为，你共产党上台也解决不了中国历朝历代都解决不了的吃饭问题，也无法养活中国那么多的人口。你们共产党最终也要垮台在吃饭问题上。当时毛泽东曾经专门针对美国人的这种说法写了一篇文章，说我们共产党人就不相信解决不了这个吃饭问题。毛泽东向世人大声宣告，“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这就是非常著名的那篇《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也叫《答艾奇逊书》。

建国以后，我们的确是始终致力于解决老百姓的温饱问题的。人们熟悉的政策语言中，不知道有多少都是和吃饭有关。比如“以粮为纲”，“要把粮食的问题抓紧”，“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农业学大寨”、“猪多肥多粮多”，“深挖洞、广积粮”。在计划经济年代，制定国民经济计划的第一条原则就是“一要吃饭、二要建设”。那时毛主席连农民每顿饭怎么吃都有具体的指示，叫做“忙时吃干、闲时吃稀”。

1/4个世纪之前，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怎么起步的呢？那个时候没人知道要发展市场经济，要加入WTO。那时没有那么深刻的理念，没有那么长远的预见性。农村改革的最初动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农民吃不上饭了，要饿死人

了。一直到1984年建国35周年时，农村改革已经取得初步成果，邓小平在天安门上阅兵，游行队伍通过时放的是什么音乐呢？是“在希望的田野上”。从80年代走过来的人们都很熟悉那首歌的歌词：我们的理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禾苗在农民的汗水里抽穗，牛羊在牧人的笛声中成长，西村纺纱东港撒网，北疆播种南国打场。我们完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直到那个时候，我们认为，希望的田野什么呢？就是老百姓都能实现温饱的田野。

我们回溯这些历史过程是想说明什么呢？是想说明，我们已经走过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阶段。从那么漫长的一个求温饱而不得的历史中走来，到了21世纪的今天，我们敢说要实行一个鼓励粮食减产的政策。这个变化是不是可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呢？

实际上，我们不仅具备了让人们吃饱饭的能力，而且具备了让人们拥有必要生存资料的能力。

中国老百姓有句话，叫做“小康不小康，关键看住房”。2001年末的统计数字，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虽然相对城市滞后，但人均住房面积达到25.7平方米。住房问题最难解决的是城市。我们现在的城镇情况是怎么样的呢？80年初期，我国城镇居民的人均住房面积不足5平方米，上海和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人均住房面积更是不足3平方米。也就是说，人们的私人活动空间只比一张单人床略大。2002年的数字，中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的15.5平方米。请注意，这是使用面积。城镇人均建筑面积达到20.3平方米。这里还得再加一个重要说明，1980年时我国城镇总人数只有1.9亿人。而2001年末全国城镇总人数为4.8亿人。比80年代初期翻了一番还多。

【7－1－3】经济学早就证明，人在基本的生存需要满足之后，还会有安全的需要、实现抱负的需要、为社会所承认的需要、享受的需要等很多层次。这些都属于发展的需要。发展的需要既有社会属性的需要，也有自然属性的需要。

有充分理由和事实说明，我们已经实现了“总体小康”，我们已经走过了以满足人们生存需要为主的发展阶段。

人们的生存需只是最低层次的需要。生存需要满足之后，顺理成章地，我们的发展目标就将是满足人们的发展需要。

什么是发展需要呢？经济学早就证明，人在基本的生存需要满足之后，还会有安全的需要、实现抱负的需要、为社会所承认的需要、享受的需要等很多层次。这些都属于发展的需要。

发展的需要既有社会属性的需要，也有自然属性的需要。

就自然属性而言，休闲、娱乐、健康等都是自然属性的需要。为什么最近这些年保健品的广告在中国的电视上大行其道呢？就是因为人们已经普遍产生了追求健康和更高层次生活质量的需要。

在自然属性的需要之外，发展需要还表现为社会属性的需要。人们希望获得更好的职业岗位、掌握更多知识充实自己、满足自己的兴趣爱好、更大程度地实现自己理想抱负、在社会中受到更多尊重等都是社会属性的发展需要。

谁都知道，经理的职位可以获得比一般雇员更好的薪水收益，但要获得经理的职位就需要竞争，要提高自己的职业竞争力就得学习。人们就要求有更多机会开阔自己的眼界，充实自己的知识，掌握更多的信息。就在我们这个 EMBA 班上课的楼道里，我看到有个宣传版，那上面贴着一个前期学员的体会。他说，自己是个外企的老白领了，现在职位、待遇都不错。但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进入公司的越来越多，现在公司吐故纳新是很快的，自己的危机感越来越强，所以特地来报名学习，“充电”。

在我们的身边，满足发展需要已经成为社会普遍的要求。前不久，中央党校请我去做一个讲座。给什么人讲呢？给民营企业家讲。培养高级干部的中央党校现在开办民营企业家的学习班。民营企业家们自己出钱交学费、自己买飞机票从全国各地跑来听课。为什么呢？因为民营企业家也懂得，创业难，守业更难。不掌握更多信息和知识，大浪淘沙下被逐“出局”是很容易的事。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我们要造就一个全员学习，终生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一个社会成为了学习型社会，这个社会就进入了一个理性的社会、文明的社会、发展的社会、进步的社会。

【7－1－4】没有足够大的市场，没有足够快的需求增长，我们的国民经济“翻两番”目标就不可能实现。在既有的消费结构下，扩大内需的余地是极其有限的。一个明确的判断是，要形成支持我国 20 年经济增长的需求、市场，关键是要启动和扩张人们的发展需要。持续和不断扩大的需求潜力蕴藏于人们的发展需要之中。

“全面小康”的建设过程将以满足人们发展需要为主，这不仅是对规律的客观描述，而且还是我们主观的战略设计。

我们前面说过，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走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已经从生产领域、供给领域转移到了消费领域、需求领域。短缺已经过去，买方市场、过剩、普遍性的供大于求已经来到我们身边。80 年

代初期时，我们引进一个宝钢，得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才能办得到。现在不用了，就是建三峡那么大的工程也不用了，大家可以想一想，在与三峡工程并行的过程中，我们号召人们做什么呢？不是省钱，而是扩张消费。在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扩张生产已经不困难，难在扩张需求，扩大消费，寻找市场，培育市场。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只要有一种新的需求产生，在很短的时间内供给就会成倍地自动产生出来。寻常百姓家里用空调才是最近几年的事情。仅仅两三年时间，我们在2003年面临的问题已经是空调生产太多，卖不出去了。

没有足够大的市场，没有足够快的需求增长，我们的国民经济“翻两番”目标就不可能实现。正因如此，中央在2001年时就强调指出，扩大内需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党的“十六大”报告也指出，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长期的、基本的立足点。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不断增长的需求从哪里来？

在过去几年扩大内需的研究中，人们发现，如果只是想方设法动员大家多吃一点、吃好一点，那不可能形成持续的需求增长能力。在既有的消费结构下，扩大内需的余地是极其有限的。人们从自己生活常识中就可以知道，吃穿用的需求是很容易趋于饱和的。吃饺子光吃肚不吃边，你又能吃多少呢？一个明确的判断是，要形成支持我国20年经济增长的需求、市场，关键是要启动和扩张人们的发展需要。持续和不断扩大的需求潜力蕴藏于人们的发展需要之中。

启动和扩张人们发展需要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社会消费结构的调整、升级过程。一直到90年代初期，旅游还是为“创汇”服务的产业。那时除了商务、公务的出差以外，旅游好像还只是外国人的事，高档一点的饭店叫做“涉外”饭店。但在过去几年中，旅游已经走进了老百姓的生活。

70年代初期，日本有个首相叫田中，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日本列岛改造论》，与此同时日本实行了一个“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日本提出，在那个计划实现之日，日本每年将有1000万国民出国旅游。那时全世界的旅游产业都为日本的这个大胆设想感到惊讶。但曾几何时，1000万国民出国旅游的规模现在看已经是“小儿科”了。2002年中国出境游的人数有多少了呢？1680万人。远远超过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现之日的人数规模。要知道我国目前出境游还只是在少数几个大城市开放，就已经有了这样的规模。现在到欧洲，在各个旅游景点上碰头碰脸的都是中国的旅游团队。今年2月我再次到欧洲的时候，接待我们的是一个小伙子，一个中国留学生。他告诉我，现在中国留学生靠在餐馆洗碗打工那个年代已经过去了，现在中国留学生打工

都当导游。一天130欧元，比餐馆高多了。这在欧洲算是很高的工资了。因为现在中国来的旅游者太多了。而这个职业当地人还做不了。因为他们无法与中国旅游者充分交流，无法适应中国旅游者的要求。

不只是出国旅游，更大规模的是国内旅游。这次SARS对我国的旅游业打击很大，引起各方面的普遍关注。但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也恰恰证明了我国现在旅游业早已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产业了。一直到80年代中后期时，上海的年轻人谈恋爱还只能到外滩去，在那个矮矮的“恋爱墙”边挤一个位置。一对紧挨一对，相互之间只能目不斜视。现在上海的年轻人到哪里去谈恋爱了呢？到咖啡馆，到酒吧去。一般的咖啡馆还不行，还得是有“格调”的咖啡馆。

这些事情说明什么呢？说明人们的消费结构已经出现了重要的变化。人们已经可以，而且愿意为购买劳务性产品支付代价了。实际上，2002年开始的汽车消费热、在SARS疫情中进一步得到强化的健身热都显示出了社会消费结构的变化。现在，更多的人已经把眼光盯在了住房上。前不久有媒体“爆炒”房贷中的“等额还贷”与“递减还贷”的区别，说这两种还贷方法的利息代价能相差数万元。媒体的这个说法是很荒谬的。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区别。两种还贷方法的“单价”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媒体的这种“炒作”为什么能吸引人们的眼球呢？因为社会已经普遍关心住房消费问题了。无需怀疑，住房也将成为人们消费构成中的一个新的热点。

培育更多的消费热点，创造出更多的消费需求，我们的国民经济才能获得新的增长机会。正因如此，党的“十六大”报告特别强调指出，要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逐步提高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要不断拓宽消费领域，优化消费结构，满足人们多样化的物质文化需求。在新的战略发展过程中，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小康”呢？要建设一个以满足人们发展需要的“小康”，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小康”。

2. 全面小康社会是个什么样的社会

☆ "全面小康"将是人们的私人资产不断加速累积的小康，大多数人都有"产"的社会。

☆ "人民生活更加殷实"是什么意思呢？通俗说，就是让老百姓都有"家底"。

☆ 没有资产，只有一定水平的收入还不能叫"中产阶级"。

☆ 人们谋求以钱生钱，这种现象叫做"私人财富的资本化"。

☆ 大多数人有产，那么大多数人不断富裕的经济关系就将自动地被再生产出来。

☆ 如果每个人都无所顾忌，都觉得破坏制度我没有损失，这个社会还能长治久安吗？

☆ 绝大多数老百姓有"产"就是一种共同富裕。

【7-2-1】在我们今后的战略发展过程中，社会收入水平还会不断提高，人们在收入之外所享受的社会福利也会不断增加。但这已经不是评价社会富裕程度的最重要指标了，最重要的评价指标将是私人财富的累积程度。全面小康社会将是一个绝大多数人都有"产"的社会。

从满足人们的生存需要为主转变为满足人们的发展需要，这是"总体小康"和"全面小康"的一个明显区别。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区别。

最重要的区别是什么呢？"总体小康"是人们收入不断增长的小康，而"全面小康"将是人们的私人资产不断加速累积的小康。这是最实质性的区别。

"十六大"报告提出以后，媒体的记者们在采访中喜欢问，"全面小康"实现之日，我国的平均工资水平能达到多少，人均住房面积能达到多少，有多少人能拥有私车等问题。仅仅局限于这些量化指标是无法说清楚"全面小康"的。这是在用前一个战略的眼光来打量、审视、想象、憧憬下一个战略

的发展前景。

在前一个“翻两番”战略中，我们主要用什么指标来评价人们生活改善和社会富裕程度的提高呢？主要是收入水平。比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人均纯收入、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等。在前20余年中，老百姓生活好了，社会的富裕程度提高了，主要表现在哪里呢？主要表现在城乡人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上。用经济学的话说，主要是用增量和流量指标来表示。

从改革开放伊始，我们是从一个什么样的基础走来的呢？是从“一穷二白”和“一大二公”的基础走来的。

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人们不仅收入没有多少差别，私人财富也几乎没有差别。那时，大家的收入都很少，除去勉强维持生活外几乎没有什么剩余。如果说张家比李家经济条件好，好在哪里了呢？就好在张家还有一个木头板的大衣柜上。住房是公家的，吃饭穿衣是凭票供应的，几乎没有人能积累下什么像样的家底。70年代末期，国家给“文革”中受迫害的老干部落实政策，一些人补发了几千块钱的工资。那时这就是“大款”了。为了回笼这笔货币，国家还专门从国外进口了一批彩电。那时彩电还只是摆在百货店的货架上让老百姓引颈观望的东西。80年代初期还有个故事。有个叫杜芸芸的女孩，继承了10万元落实政策的遗产，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也引起了她亲戚们的普遍关注，最后她不胜其烦，不得不把这10万元捐出来了事。那时10万元的“家底”就是足以叫全社会“眼红”一阵子的差别了。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评价社会富裕程度的普遍状况，当然只能用收入指标。自己和自己比，自己和别人比，今年和去年比，现在和过去比，比的都是收入。

不仅如此，在前一个战略发展过程中，我们还是从“一大二公”的体制背景下走来的。什么是“一大二公”呢，就是生产资料全部是公有制的。老百姓除了维持简单生活的消费资料外，其他财富全都归国家、归政府、归全民、归企业、归集体所有。除了吃穿用的一点东西外，没有什么是私人的东西。你要打碎一块玻璃，那肯定是破坏了国家财产。那时，生产与消费，差不多就是“公”和“私”的区别。在那个时代，储蓄都叫“爱国储蓄”，到银行存钱是“支援国家建设”的行为，不是你私人的投资行为。由于几乎没人有私人资产，当然也就无法进行私人的存量财富指标比较。

在过去20余年，我国老百姓的收入状况有了多大改变呢？1980年时，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78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191元。而2002年时，这两个指标分别为7702元和2476元。1978年时我国职工年平均工资水平是392元，1990年时是2140元，2002年时是12422元。尽管这些收入指标还需要剔除物价变动因素，但没人能否认在过去20余年中我国

老百姓的收入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其中，1998年到2002年是我国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增长最快的一段时期。在这个期间，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是12.4%。这个速度远高于同期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特别值得说明的是，从1998年到2002年，我国的物价水平是处于负增长和极其微弱的正增长区间的。也就是说，这一区间内职工的工资性收入增长，每一块钱都是实实在在不打折扣的正增长，通货膨胀的因素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进行收入比较，还值得说明的一点是，在过去几年中，我们还在城市中普遍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社会成员的实际收入增长中，这一块儿的比较还没有算进去。

在我们今后的战略发展过程中，社会收入水平还会不断提高，人们在收入之外所享受的社会福利也会不断增加。但这已经不是评价社会富裕程度的最重要指标了，最重要的评价指标将是私人财富的累积程度。

我们要建设的全面小康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这里我们郑重强调一个认识。全面小康社会将是一个绝大多数人都有“产”的社会。

“十六大”报告开宗明义就有一段话，“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人民生活更加殷实”是什么意思呢？通俗说，就是让老百姓都有“家底”。中国人都知道，“殷实之家”指的就是有“家底”的家。要是你觉得这个“殷实”的说法还不够明确，那么还有一句话。“十六大”报告在描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的那一个段落中明确提出，什么是全面小康的目标呢？其中之一是“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

【7－2－2】什么叫资产呢？能够带来收益的财富才是资产。我们要想持续地扩大内需、扩张消费，就必须加快社会的私人财富累积速度。人们的“家底”越厚实，未来消费需求扩张的潜力就越大。人们谋求以钱生钱，在经济学上管这种现象叫做“私人财富的资本化”。“家庭财产普遍增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私人资产加速累积。

家庭财产普遍增加，而不仅仅是收入水平不断提高。这个说法非常重要。请注意，这里的“财产”还不仅是指一般消费品的财产。不是说过去家庭成员每个人有10双皮鞋，全面小康实现之日将有30双、50双皮鞋。这个财产更重要的是指资产。

前不久有记者问我，中国能否产生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我说，目前我们还只有“中等收入者阶层”。为什么呢？因为“中产阶级”首先得有“产”。没有资产，只有一定水平的收入还不能叫“中产阶级”。

什么叫资产呢？能够给带来收益的财富才是资产。假定你有一个大别墅，里面有好几间卧室，你轮流在各个卧室里睡觉，那这个别墅还只是你的财富。当你把别墅的若干房间租出去获取租金时，这个别墅就变成了你的资产。

在前几年扩大内需的政策研究中，我们发现一个现象。同样是月收入5000元的“白领”，有房有车的人和没房没车的人，在消费结构和消费行为上的差异非常大。越是有“产”的人，其收入转变为消费的部分往往越大。由此就引申出一个重要的认识。人们的私人财富累积程度越高，往往就越敢花钱。简单地动员人们把即期收入都拿出来赶快花掉，这可能并非是一个好政策。我们要想持续地扩大内需、扩张消费，就必须加快社会的私人财富累积速度。人们的“家底”越厚实，未来消费需求扩张的潜力就越大。

实际上，私人财富累积不断加速并非是我们的主观设想，而是一个符合规律的客观过程。当人们的收入提高到一定程度，自然而然地就会有一部分收入沉淀下来。在过去一些年中，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的增长速度不断超过收入增长速度，反映的就是这种私人财富的变动趋势。

最开始时，这种“沉淀”是和即期消费与远期消费的分割联系在一起的。例如，人们想攒点钱“买大件”，或者娶媳妇盖房。当这种“沉淀”的规模超出远期消费的必要时，很自然地人们就会想到投资。想到用自己的财产去获取收益。我们用不着去寻找多么复杂的经济学证明。在座诸位中恐怕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比如说在饭桌上和太太商量，说你看咱们家的存款也有二三十万了，银行利息又不高，咱们能不能找点以钱生钱的路子呢？

人们谋求以钱生钱，在经济学上管这种现象叫做“私人财富的资本化”。事实上，在住房商品化的改革和股市、债市的不断扩张中，我国社会已经明显出现了私人财富资本化的趋势。其实，人们在银行的储蓄也已经是投资的一种形式了。存款也是能够带来收益的资产。从国际经验看，早期的私人财富以金融资产为主，以后不动产的比重不断增加；早期以满足远期消费为主的储蓄为主，以后为获取更多收益的投资部分会不断增加。这个趋势在我国已经日益显现。“家庭财产普遍增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私人资产加速累积。

[7-2-3]大多数人都有“产”了，我们当然不能以人们有财产还是没有财产、财产的多少来区别人们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大多数人都有机会获取非劳动收入了，人们合法的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当然都应当受到保护；大多数人都有资产了，按照要素分配就是一项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分配方式。

由此我们要说到一个重要结论了。

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反复论证了这么几段话。一是提出了一个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发展目标，二是明确提出“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应该得到保护”，三是强调“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做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和落后的标准”，四是提出要调整收入分配制度，“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

在“十六大”报告公布之后，国外一些媒体把上述说法归结为“让私人老板入党”。这个认识是很浅薄的。还有很多人认为，这些话是为私人老板、民营企业家的利益说的。这个认识也远不充分。私人老板的非劳动收入、按要素分配获取的收入该不该受到保护呢？应该。申明这一部分社会利益主体存在的合理性重要不重要呢？也重要。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党，提出这些重要认识的目的并非仅仅是要证明一个少数群体利益的合理性，而是要证明社会绝大多数成员利益的合理性。

什么是大多数人利益的合理性呢？就是让社会大多数人都成为“有产者”，要让普通老百姓都能有机会分享投资收益的合理性。大多数人都有“产”了，我们当然不能以人们有财产还是没有财产、财产的多少来区别人们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大多数人都有机会获取非劳动收入了，人们合法的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当然都应当受到保护；大多数人都有资产了，按照要素分配就是一项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分配方式。

【7－2－4】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个极为重要的论断，就是社会的经济关系总是在物质资料再生产过程中被同时地再生产出来的。大多数人有产，那么大多数人不断富裕的经济关系就将自动地被再生产出来。造就这样一个社会基础，我们才能真正实现繁荣昌盛和长治久安。

我们再次重申，全面小康社会，就是一个让绝大多数人都有“产”的社会。如若不信，请你下载一个“十六大”报告的电子版。你可以用各种文字处理软件中的“搜索”功能检索一个人们耳熟能详的名词。这个名词就是“无产阶级”。党的代表大会文件是党的最高文件。在我们党的最高文件中，“无产阶级”这个词一次也没有出现。我们过去熟悉的“无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世界观”、“无产阶级思想”等都不再提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造就的肯定不应是一个让全社会绝大多数成员都一无所有的社会。而是一个让老百姓普遍有产的社会，是一个人民生活更加富足的社会。

在人民安居乐业、丰衣足食的基础上，造就这样一个大多数人有“产”的社会好不好呢？非常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个极为重要的论断，就是社会的经济关系总是在物质资料再生产过程中被同时地再生产出来的。大多数人有产，那么大多数人不断富裕的经济关系就将自动地被再生产出来。造就这样一个社会基础，我们才能真正实现繁荣昌盛和长治久安。

我们再说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认识。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富裕程度的提高总是与社会经济关系的趋于缓和、趋于协调密切相连的。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人们总是一无所有，每个人都无所顾忌，谁都觉得破坏制度我没有损失，这个社会还能长治久安吗？原来我们的传统理论认为，让人们一无所有，大家就都能“大公无私”了。现在我们认识到，这个想法是不符合客观规律的。一无所有必定导致社会经济关系的紧张，社会利益矛盾的激化。相反，人们的财富增多了，社会富裕了，协调各种社会利益矛盾的余地就大大增加了。社会就有了更坚实的稳定和发展基础。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在我国社会深刻变革、党和国家事业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妥善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把一切积极因素充分调动和凝聚起来，至关紧要”。请大家掂量一下“至关紧要”这四个字的分量。

我们的讲座从一开始就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话题展开。我们还得重复邓小平说过的话。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为什么没用肯定句呢？因为在邓小平那个时代，实践的发展尚不充分。我们的认识首先是“什么不是”。那时我们还不能充分回答“什么是”。实践发展到今天，党的“十六大”正面回答了这个问题。绝大多数老百姓都有“产”就是社会主义。

“十六大”报告提出要“与时俱进”，提出要“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现在我们懂得了，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并非应当表现为大家都穿一样的衣服，都吃一样的饭，而应当表现为人们在发展过程中有越来越多的机会，而且是更公平的机会。应当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改善自己的生活，每个人都有机会累积起自己的私人财富。社会主义不是要求共同富裕吗？绝大多数老百姓有“产”就是一种共同富裕。我们应当毫不含糊地说，这就是社会主义。

3. "全面小康"中"全面"的内涵何在

☆ 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存在许多方面的不平衡，这并没有什么不正常。

☆ 全面小康的建设过程就是一个使各方面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得到更大程度调整的过程。

☆ 发展不平衡是一种客观现象。我们不应简单地把不平衡夸张为一种恶。

☆ 不平衡本身也是一种公平。按贡献分配，就一定会有不平衡。

☆ 不平衡仍将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不可避免的现象。要消除这些不平衡，可能需要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

【7-3-1】中国是一个大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工业化起步的时间还不长。由此造成在我们目前的国民经济中还存在着诸多的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产业发展不平衡、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存在不平衡等。

前面我们讲了"总体小康"和"全面小康"的区别，但这仍然不是全部。"全面小康"不是"总体小康"的简单延伸。这里"全面"两个字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经济要发展，政治上也要与时俱进。"十六大"提出了一个要实现"政治文明"的目标。经济发展还必须和社会发展密切协调。"十六大"提出要"推动社会全面进步"。还有，人们不但要追求富裕，还要追求安全，所以我们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经济发展还得和自然界之间关系协调，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所以我们要改善环境，保护资源。这些都是"全面"的题中应有之义。

我们重点讲经济发展方面。"全面小康"中的"全面"，应当是从不平衡发展逐步趋向于平衡发展的含义。

在前期战略发展过程中，中国的经济成就是举世公认的。我们前面说过，我国很多产业现在都已经成为了世界生产格局中举足轻重的组成部分。我们

上海浦东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已经不弱于发达国家。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中国是一个大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工业化起步的时间还不长。由此造成在我们目前的国民经济中还存在着诸多的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产业发展不平衡、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存在不平衡等。

我们在区域战略中已经一定程度地涉及，我国的区域发展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发展不平衡。

温家宝总理就任后的第一个记者招待会上说了一个数字。他说，中国沿海五六个省市的 GDP 就超过全国 GDP 的 50%。2002 年，我国的 GDP 总值已经跃上 10 万亿元的一个新台阶，达到 102398 亿元。按现行汇率计算，人均 1000 美元略低一点。其中，东南沿海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可超过 1400 美元，北京超过了 3500 美元，上海超过了 4000 美元。而我国西部 12 省区的平均水平还不到 600 美元。区域间的发展差距由此可见一斑。

实际上我国区域间的发展不平衡不只是东西部发展差距拉大，还包括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发展滞后问题、中部省区加快推进工业化的问题等。在不同区域内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也很严重。广东是我国最富裕、发展程度最高的省区了，但广东也还有未脱贫的地区。山东北部地区属于发展很快的省区，但山东的沂蒙山区和其他地区的差距仍是很明显的。大家打开地图看看就会发现，四川本省就可以截然划分为“东部”和“西部”两个发展程度相差极大的部分。最近有个资料，在宁夏，首府银川和宁夏最贫困地区的人均 GDP 相差 11 倍以上。

我国发展不平衡的另一重要表现形式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我们不用去贫困山区作调查。只要到我们上海的飞机场和火车站两个地方看看，你就会发现，在飞机场候机室和火车站候车室里的人群完全处于两种不同的生存状态。前面我们举过温家宝总理关于脱贫标准的话。如果把脱贫标准从年收人 625 元提高到 800 元，中国就还有 9000 万人没有脱贫。我们前面说到，2002 年我国城镇人均可支配收人是 7702 元。这个数字不要和那 9000 万人的收人比，就是和同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人的 2476 元比，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差距。

我曾经看过一个久久不能忘怀的照片。一个农村进城务工的妇女，背上背着一个睡着了的孩子，在街边上给人擦皮鞋。她的服务对象是谁呢？是一个七八岁的城里小孩。在这个城里小孩的背后，站着他衣着光鲜的母亲。我不是说这个城里小孩有什么错。我只是说，同样是孩子，他们的生活差距实在是太大了。至于我们从电视画面上看到的，农村小学生在四面透风的危房

中上课，在黄泥垒成的桌子上写作业的场景，更是让我们非常难过。

城乡发展不平衡进一步导致了很多人群之间的收入不平衡。前不久某地煤矿发生事故，有个遇难的矿工，就是一个来煤矿打工的农民，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在他的矿帽上用粉笔写下了自己的遗言。什么遗言呢？除了嘱咐妻子把孩子抚养大外，就是一个账单，欠母亲200元，欠某同事1000元等。这个矿帽在央视的画面上播放过，令我目不忍视。这不是个别的现象。广东"珠三角"地区是全国收入最高的地区。国家统计局城调队的最新报告显示，在全国35个大中城市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排名中，深圳已经连续十年第一。而且深圳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2373元，排在第二位的广州仅为7781元，深圳比第二名的城市整整多出4592元。如果你以为到深圳或者到"珠三角"地区打工就能挣多一些，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同样有调查显示，在"珠三角"地区外来打工者的月平均工资，在过去10年间只增长了68元，目前仍不过是五六百元。

当然，人群之间的收入不平衡还有很多。比如垄断性产业的职工收入和非垄断性产业的职工之间收入不平衡，下岗职工和在岗职工之间的收入不平衡，一般职工与高层经营管理人员的收入不平衡等。

我国的产业发展不平衡也很显著。我们讲到过，我国的钢铁产业已经是世界上的"龙头老大"，但我们的汽车业在世界排名中还处于非常弱小的地位。与发达国家相比，各产业的发展差距有着显著区别。其中差距最大的，不仅包括工业领域的一些基础产业，而且包括零售业、金融业等很多产业。这令金融界的人士一直在不断呼吁，要重视入世可能给我国金融业带来的冲击。

我们还有一个人们未太注意，但非常重要的发展不平衡，这就是生产扩张能力和消费扩张能力的不平衡。我国的家电业已经具备了为全世界生产的能力。我们的白色家电、黑色家电产量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但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村人口还不具备大规模消费家电这种工业品的能力。2002年末，我国城镇居民平均每百户拥有彩电126台，洗衣机93台，冰箱87台，空调51台。而同年农村居民每百户仅拥有彩电69台，洗衣机32台，冰箱15台。这种生产扩张能力与需求扩张能力的不平衡是我国当前面临普遍性供大于求的基本原因之一。

【7－3－2】我们的工业化真正起步才不过20多年，在一个较快的发展区间内，当然就容易发生不断扩大的不平衡。这很符合规律。小孩子在十三四岁到十七八岁的长大过程中就经常是不平衡的。比如他的体力和他的身高不相称，生理成熟程度和心理成熟程度不相称，肌肉和骨骼的发育不相称等。我们的国民经济就处在这样一个快速"长大"的过程中。

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存在这么多方面的不平衡，这并没有什么不正常。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大国，我们的工业化真正起步才不过20多年，在一个较快的发展区间内，当然就容易发生不断扩大的不平衡。这很符合规律。要是观察过孩子们成长的过程，你就会发现，小孩子在十三四岁到十七八岁的长大过程就经常是不平衡的。比如他的体力和他的身高不相称，生理成熟程度和心理成熟程度不相称，肌肉和骨骼的发育不相称等。我们的国民经济就处在这样一个快速"长大"的过程中。上海是一个正在向国际化迈进的大都市，人们很容易注意到浦东的现代化高楼大厦，但我们也不难找到拥挤的弄堂。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平衡呢？不是因为上海发展太慢，恰好相反，是因为上海发展太快，还来不及对各个经济环节作出充分的调整。大家低头看看自己身上的穿戴就会发现，你戴的领带可能是真正的世界名牌，但你穿的衬衫可能就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乡镇企业产品，而你脚上的皮鞋可能是你太太从集贸市场上买的冒牌货。不平衡吧？但这不是因为你没钱，不是因为你太穷，而是因为你的收入增长速度太快，你还来不及对所有的生活细节作出相互平衡的调整。

相对平衡的确是经济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比如发达国家的不平衡程度就很小。美国的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生活水平差距并不明显。走遍美国全国，连每家门口的邮箱都是一样的，交通标志都是一样的。东部能买到的东西，西部地区全能买到。城里能享受的，乡村小镇一般也能享受。而且大量的私人农场、私人游艇、私人机场等贵族化的消费恰好不在大城市，而在乡村。但这没什么值得夸耀的。我们在第一讲时就讲到过。发达国家是用了200余年才把7亿人口送进工业化的。这个发展过程的代价是过去200年历史上的奴隶贩运、殖民地统治、世界大战和迄今很多欠发达国家的贫困与落后。发达国家内部的平衡化是以全世界极端不平衡为代价的。我们在资源战略中提到过，美国一个国家两亿多人口，一年就消耗9亿吨石油，而全世界一年的石油产量不过33亿吨。在这样一个资源分配格局下，全世界可能实现平衡发展吗？

[7-3-3]缩小发展不平衡的差距，可以说是"全面小康"最重要的内涵之一。但要消除这些不平衡，可能需要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这远不是20年的发展周期能够办到的事。在未来20年左右的周期内，我们所能做到的，仍只能是使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逐步得到扭转。我们一定要对这样一个发展过程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有充分的估计。

我们首先得承认，发展不平衡并非是一种良性格局。一方面，不平衡会导致社会利益矛盾的激化；另一方面，不平衡也不利于生产与消费、经济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协调。可以说，全面小康的建设过程就是一个使各方面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得到更大程度调整的过程。

党的“十六大”报告对调整和缩小发展不平衡差距的努力规定得相当具体，主要体现在四方面。一是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向纵深发展，要争取十年内取得突破性进展。二是促进农村富裕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使城镇人口比重大幅度提高。三是把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来抓。四是救助弱势、困难群体，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以此来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和使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全面小康”是和“共同富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缩小发展不平衡的差距，可以说是“全面小康”最重要的内涵之一。但应当强调的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们还不可能消除这种差距。不平衡仍将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不可避免的现象。要消除这些不平衡，可能需要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这远不是20年的发展周期能够办到的事。“十六大”报告并没有夸口说，我们在全面小康实现之日就是一个处处平衡的“世界大同”。我们讲的是要通过艰苦的努力，来缩小这个不平衡差距不断拉大的趋势。我们能够做到的，是在一定程度上使落后地区、落后产业发展快一些，使农民、城市中的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加得快一点，生活改善得明显一点。一方面，我们要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但另一方面，在未来20年左右的周期内，我们所能做到的，仍只能是使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逐步得到扭转。我们一定要对这样一个发展过程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有充分的估计。

我们存在多方面的发展不平衡，这也并非全是坏事。在一定意义上说，不平衡才是一种事物运动的动力。物理学上有个热力学第二定律，说的是一杯热水放在桌子上会逐步冷却，水的温度会降到和周围的温度一样。也就是会在温度上和周围取得平衡。但是物理学家也告诉我们，如果有一天整个宇宙间的温度都处处取得平衡了，那整个宇宙就会陷入一种“热寂”状态，所有的生命过程都将不复存在，所有的物质运动都会停下来。幸好这个世界的运动规律不仅有热力学第二定律，还有不断创造出新的不平衡的规律。比如人们还可以通过能量转换形式再烧一杯热水。系统论也告诉我们，距离平衡状态越远，事物的运动就越激烈，变化余地就越大。

发展不平衡是一种客观现象。我们不应简单地把不平衡夸张为一种恶。

我们说，不平衡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动力。不平衡所能提供的最大好处就是要素流动的势位差，由此带来资源、要素不断优化重组的活跃度。发展不平衡还可以提供多层次的市场和发展机会，可以很容易地与不同发展水平的生产能力相匹配。此外，不平衡还是竞争的源泉。企业要想在竞争中取胜，就得积极创造出优于别人的条件。优于别人就是不平衡。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认识也值得提出来。这就是，不平衡本身也是一种公平。请大家注意，“十六大”报告在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中的提法是按照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的贡献进行分配。按贡献分配，就一定会有不平衡。

当然，经济发展还有不同于一般物质运动的方面。比如在不平衡状态下，贫困地区的人才、资金等要素会不断向收益较高的发达地区流动，造成贫困地区更穷。这就需要政策的干预。需要超越市场力量的社会主动调节。西部大开发就是这种主动调节。

努力实现平衡发展的过程不等于是努力把发展水平拉齐的过程。例如，我们不可能指望让东部地区停下来，等待西部发展到与东部程度接近时再向前走。相反，东部地区在未来20年中的发展任务是率先实现现代化。尽管这样一个战略可能仍会导致新的发展差距，但实施这样一个战略才能更有利于西部发展。这就是辩证法。

4. 提问与讨论

☆ 社会化、制度化的保障体系已经成为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

☆ 社保体系是一项最重要的“公共产品”，是政府弥补市场机制缺陷时最基本的战略与政策输入点。

☆ 每当我们违背自然界的意志，企图把人类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自然界的时候，我们无一例外地会受到惩罚。

☆ 我们熟悉的“斗争哲学”正在转变为“和谐相处”的哲学。

☆ 绝大多数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处于和谐状态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充满尖锐的利益对立就不是社会主义。

☆ 没有效率，我们就不会有实现公平的物质基础。

☆ 让中等收入者阶层成为社会的主体，这是“全面小康社会”最大的公平特征。

☆ “个税”就是将“人民养活政府”这样一个基本经济关系直接显现出来的工具。

【提问一】：在前期改革中，老百姓的收入的确有了明显提高，但人们生活面临的风险也越来越大。下岗失业、医疗、养老等给人们的压力很大。解决这个问题是否也应包括在“全面小康社会”的内涵之中呢？

答：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刚才只是择其要地提到若干重点。实际上，“全面小康”当然应当包括安全的内容。社会保障体系提供的就是一种社会安全保障。

在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中，人们必然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天灾人祸，各种风险。这些风险包括自然属性的风险和社会属性的风险两个方面。疾病就是自然属性的风险，失业就是社会属性的风险。

风险是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的事。全面小康社会不仅应当是一个更加

富足的社会，还必须是一个安全的社会，是一个使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各种风险都将获得更完善的制度保障的社会。有再多的钱，再多的福利资源，没有安全保障，这种社会也不会是人们所向往的社会。

在前期的发展中，我们的小康建设是和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改革进程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过去一些年的改革与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城乡人民的收入水平持续提高；但另一方面，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的社会福利制度正在按照市场经济原则经历巨大的变革。原有体制下由“一大二公”的企业“包下来”的风险保障正在转变为社会统筹的保障，社会福利资源的配置方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由于改革措施尚不完善，再加上可用于社会保障的福利资源尚不充分，在相当多的环节上出现了保障“真空”。原有保障没有了，新的保障又没有建立起来。比如在有些不景气的国企中，由于企业财务出现困难，职工的医疗费经常被拖欠很久不能报销。有时甚至人都死了，医疗费还未报销。还有些地方退休职工的养老金经常不能按时足额发放。这些情况引起了很大的社会矛盾。完善社保体系的问题已经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关系到社会发展、关系到人们多方面需求的相互均衡，而且关系到眼前的经济运行。在应对供大于求的紧缩性失衡研究中，人们已经普遍注意到，很多改革措施不完善的问题已经明显导致了社会对收入和支出的不良预期。这种预期已形成了对社会消费行为的制约。建立、健全和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已经成为调整社会经济预期、促进经济发展和实现稳定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

在任何意义上，小康生活都和安居乐业的状态密切联系。面“安居乐业”不仅和富裕相联系，而且和安全密切联系。在工业化与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在经济生活中面临的各种风险会明显加大。一方面，由于社会的各种资源成本上升，天灾、疾病等自然属性的风险单靠个人的力量已经无法承受；另一方面，失业、养老等社会属性的风险也需要依靠社会化的方式才能抵御。收入、财产、安全保障和环境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国民福利的基本组成部分。全面的小康社会，一定是一个依靠社会化、制度化的力量来抵御各种风险的社会。社会化、制度化的保障体系已经成为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是个发展和改革的问题，对我国来说，还是个制度创新的问题。别以为社会经济发展了，社会保障体系自然就会建立、健全起来。没有那么容易。

社会保障体系是发达国家在其二百余年的工业化历史进程中始终未能解

决好的一个重大制度难题。在工业化进程中，人们创造了很多与大机器生产、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制度文明。比如说企业制度、市场交易制度、财产制度等。可以说，这些制度尽管不尽完善，但总体上还是在一定时期内适应了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也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社会共同约定形式。唯独社会保障体系这个制度，我们可以说，迄今在全世界所有国家中，还没有一个堪称成功的模式。包括发达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大家都还处于教训远多于经验的状况。

可能有人不同意我这个说法，说你看人家发达国家，失业就有失业救济金，养老就有养老金，怎么还说是不成功呢？这是只知其一，未知其二。发达国家的确有比我们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目前这个体系也还都在运作，表面上也还在协调各种社会经济关系上发挥着作用。但这个体系已经累积了巨大的潜在危机。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是在良性运转着。我们把这个情况给大家分析一下。

大家知道欧盟国家一般都是高福利的社会。表面看，那里的福利制度真是令人羡慕。比如说在法国，小孩子从生下来就由政府提供补贴。一直到成年，这个孩子的生活、受教育等费用差不多全是由政府包下来。大家知道法国原来在北非有很多殖民地，所以法国有很多从非洲移民来的非裔法国人。在这种福利制度下，有些黑人妇女就不去工作，连着生个四五个孩子，光是领政府的补贴就够生活了。显然，这是一个有“养懒人”弊端的制度。实际上，欧洲很多国家的社保体系早就为这种“高福利”压得不堪重负，面临入不敷出的支付危机了。

我曾经专门去欧洲考察过那里的社会保障体系。比如，法国的社保是由财政部负责的。法国财政部的官员和我们说，法国的社保基金其实早就存在收不抵支的危机了。如果照现在这个样子继续下去，维持不了多久就会出现大麻烦，但是福利这个东西只能升不能降，降下来就会引发社会不满。现在是靠财政补贴维持着呢。这肯定不是长久之计，但谁也不知道将来怎么办。

欧洲这些国家也不是不想改革。比如为了扭转养老金收不抵支的趋势，法国财政部早就提出一个方案，就是把人们的退休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但这个方案没有一届政府敢采纳。为什么呢？因为政治家不想得罪社会公众，不想丢选票。推迟退休年龄首先就要得罪老人。因为人们享受退休金的年限少了5年，面缴纳社保税的年限增加了5年。人一共才能活几年啊。里外里，人一辈子的福利损失可就很大了。推迟退休年龄还会得罪失业者。本来欧洲大陆过去十余年中就已经为高失业率所困扰。推迟退休年龄，社会的劳动力供给就会又增加一大块儿，那失业问题不是就更严重了吗？你想，哪个政治

家想在自己任期内去惹这个麻烦呢？何况就是在社保范围内，省了退休金，不是还得增加失业救济金吗？所以，这个改革只能年复一年地拖延着无法实施。

日本的情况怎样呢？日本经济迄今已经连续11年在衰退的边缘挣扎了。日本的财政状况在西方七国里是最糟的。财政赤字的情况非常严重。这个财政困境是怎么造成的呢？就和社保体系的问题密切相关。

我国从1998年以来实行了一个叫做“扩大内需”的战略。其实“扩大内需”这个说法是日本人最先提出来的。在日文中叫做“内需扩大”。1987年日本的经济企划厅就明确提出了“从外需依存向内需主导转换战略”。1989年，日本政府更把“内需扩大”作为了应对巨额贸易顺差和防止通货紧缩、维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基本战略。但日本的这个“内需扩大”的战略始终也没取得明显效果。为什么呢？就因为社保负担的拖拽，财政状况使政府无力把“内需扩大”的政策贯彻到底。

1989年时，日本的养老基金面临收支不平衡的严重缺口。为应对“老龄化”社会的福利需求，同时也为缓解社保支出对财政的压力，日本政府想了一招。就是增税。开征“消费税”。开征这个税种的目的就是给养老保障等社保体系筹集资金。但没想到，这个增税政策一实施，一下子把前期扩大需求的政策努力全给抵消了。日本国民经济的年增长率从1990年的5.6%急剧下滑为1993年的0.2%。

日本政府一看，照这样下去不行呀，暂时不能管财政赤字的问题了，先救当前的经济增长吧。于是在1994年时，就实行了一个针对个人所得税的“特别减税”政策。所谓的“特别减税”就是一次性的减税政策。在减税的同时，政府也带头投资。1993年日本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长率达到12.2%。就像我们后来的“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一招还真灵。从1993年到1996年，日本的国民经济增长率从0.2提高到了3.9%。

政策虽然见效，但日本政府及其财政却吃不起这剂“药”了。为了缓解严重的财政赤字压力，1997年初日本政府又推出了“重建财政优先”的政策体系，不仅“特别减税”不减了，而且政府还打算削减养老金数额、推迟退休年龄、削减社保体系负担的医药费份额。政府心想，我现在先管不了那么多了，先管财政增收节支吧。这一反复不要紧，1997年，在亚洲金融危机等内外因素影响下，日本经济增长率从上年的3.9%骤降为－0.6%，出现了战后的第二次负增长。

1998年，防止衰退已经刻不容缓，日本不得不再次放弃财政的“增收节支”，反过来继续实行“内需扩大”。什么措施呢？还得比原来的措施力度更

大。包括削减个人所得税、由政府向老人和儿童发放食品券、冻结原来削减医保报销比例的设想等。但这剂“药”已经吃得太晚，这一年，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仍惯性地下滑为－2.5%。从那时起到今天，日本经济始终还没缓过气来。

经济没缓过气来，财政也没缓过气来。社保和财政，两头儿一边也没顾上。这个过程有多长呢？迄今已经十三年。这十三年的经济发展机遇就在社保资源不足的拖拽下给耽误过去了。80年代末时，日本人很是自我感觉良好。那时日本畅销的一本书是《日本可以说“不”》。后来日本不说这个话了。整个90年代日本在国际竞争中和美国相比显然处于下风头。耽搁了十三年的时间呀，这个教训惨痛不惨痛呢？

美国倒是没有“高福利”的社会保障体系，但美国的情况是另一个极端。美国的大部分保障都得靠个人自己去买商业保险。不仅医疗，还包括养老。政府统筹的养老金是少得可怜的。你得自己去买商业养老保险才能保证老有所养。迄今美国仍有15%的人口享受不到医疗保险。美国的加州伯克利大学是一个和斯坦福大学齐名的世界一流大学，那里有个劳工研究所，专门研究社会主义理论。美国的一流大学研究社会主义理论，你想不到吧？人家研究社会主义不是“供批判用”，而是为了寻找美国现行制度的弊端。那里的教授曾经慷慨激昂地对我说，在一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还有这么多人连最基本的医疗保险都没有，生了病几乎无法获得任何有效的救助，这实在是一个耻辱。

在美国，无法享受基本社会保障的问题还有很多。在那个国家，如果你的车让人追了尾，那是发财的好机会。有些黑人开着一个破车，车屁股后头就贴着一张纸，写着“Hit me, I need money”。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撞我一下吧，我需要钱”。在那里的中文报纸上经常有律师的广告，写着“专打车祸赔偿官司”。你要是被追了尾，打电话给律师，律师的建议一定是让你赶快去医院住院，就说你头疼。而且律师还会告诉您，住进医院就不要出来，不获一大笔赔偿不罢休。但是这种讹人钱的“把戏”有个前提，对方得是买了保险的人。那里的中国留学生都知道，如果你被黑人的车撞了，那你十有八九就只好自认倒霉吧。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根本没钱买保险。他们连保障自身安全的保险都没有，怎么会有钱去买保障别人安全的保险呢？在美国开车不买保险是违法的。但违法又能怎样呢？你就是报警，警察把对方抓起来，你还是获得不了赔偿。

我们举出这些例子是想说明什么呢？是想说明，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真正为市场经济体系最终回答这项制度挑战的任务历史地落在了中

国人头上。我们别指望从谁那里学一个现成的体系回来用。因为没有成功的范例供我们模仿。唯一的出路是我们自己去创新。

社保体系不仅是一项用社会化的统筹方式抵御各种风险的系统工程，而且是实施财富再分配、贯彻社会公平原则的重要手段。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保体系是一项最重要的“公共产品”，是政府弥补市场机制缺陷时最基本的战略与政策输入点。全面的小康社会不仅要让人们“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困有所靠、难有所帮”，而且要实现城乡之间经济关系的充分协调、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的充分协调、效率与公平之间关系的充分协调。实现这些协调，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保体系的完善。在一定意义上说，完善社保体系将是我们全面小康社会建设过程中面临的一项最大的制度创新任务。

当然，我们所要建立和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一个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从目前看，有限的社保资源将重点配置在四个方面。一是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二是健全失业保险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三是发展城乡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事业，四是在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就是在上述目标实现之后，我国的社保体系也仍然是以“有限标准、广泛覆盖”为基本特征的。对此，我们需要保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提问二】：从实践情况看，我们的经济发展和环境的矛盾好像越来越尖锐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过程中，这个问题是不是会更加突出呢？

答：全面小康社会一定是人类经济系统与自然界之间关系趋于协调的社会，惠及子孙后代和长远发展的社会。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具体体现之一，就是要充分实现经济、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和谐相处。

这次SARS疫情给我们的最大警示是，在我们经济发展过程中，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之间的矛盾已经趋于激化了。在过去几年中，我们已经明显感到了自然界向我们发出的警告。长江大水、黄河断流、渤海赤潮、北京沙尘暴以及其他种种的自然变异频繁出现都是这种警告。

疫情也好，长江淮河大水也好，其他自然灾害也好，不能简单地用是好事还是坏事来评判。我们说这些现象叫做“灾害”，那是对人类来说的。对自然界来说，所有这些都是自然过程中合理的、必要的组成部分。当人类活动改变了自然界的某种平衡状态，自然界就要用强制的方法去恢复原有的平衡，或者寻找一种新的平衡。

在我们过去的教科书中，包括经济学教科书和哲学教科书中，都把生产力定义为“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现在看，这个认识是不正确

的。人类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不应当是征服和被征服的关系，而应当是和谐相处的关系。我认为，人类要敬畏自然，尊重自然，努力使自己的行为符合自然规律的要求，而不是藐视、轻视和忽略自然的要求。50年代末期“大跃进”时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后来实践证明，自然规律决不会因为人的胆子大小而有丝毫的改变。

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也好，我们自己经济建设的历史也好，都证明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每当人类和自然界之间关系趋于协调时，人类就从自然界中获取到更多的福利。每当我们违背自然界的意志，企图把人类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自然界的时候，我们无一例外地会受到惩罚。

党的“十六大”报告有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我认为值得引起大家注意，这就是格外强调“和谐”。用和谐的眼光、和谐的态度、和谐的思路和对和谐的追求来看待、处理我们所遇到的各种难题。

这个报告中有六处讲到“和谐”。

在政治上，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

在社会利益矛盾上，强调“对为祖国富强贡献力量的社会各阶层人们都要团结，对他们的创业精神都要鼓励，对他们的合法权益都要保护，对他们中的优秀分子都要表彰，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在发展目标上，我们要建设的是一个“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全面小康社会。

在改革进程中，我们“必须保持长期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在对外交往上，“我们愿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积极促进世界多极化，推动多种力量和谐并存，保持国际社会的稳定；积极促进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实现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趋利避害，使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从中受益”。

在和自然界关系上，我们要走一条“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我们不厌其烦地把这些原文举出来是有重要意义的。在传统理论中，不管是经济理论还是政治上的党建理论，我们强调什么呢？强调“斗”。强调“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现在我们强调什么呢？强调“和”。强调在社会发展中，处理各种利益矛盾的根本办法是

“和”，发展国际关系的准则是“和”，处理和自然界之间关系的基点是“和”。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提法变化。这是一个在认识论上具有哲学意义的重大转变。和谐是一种境界，是一种追求，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我们熟悉的“斗争哲学”正在转变为“和谐相处”的哲学。

我们这个讲座，不是从一开始就讨论什么是社会主义吗？不是从一开始就努力辨明什么是传统的社会主义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别吗？现在我们可以在原有认识上又加一条。什么是社会主义呢？绝大多数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处于和谐状态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充满尖锐的利益对立就不是社会主义。

现在我们回到可持续发展这个问题上来。

在我国，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严峻性比其他国家更大。从历史上看，如果说，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始端于工业文明的出现，那么在我国，人类活动对可持续发展条件的破坏早在农业文明推进过程中就已经大规模开始。在特定生产力条件下，超过土地承载力的人口繁衍造就了几千年来对土地、对环境的过度索取，造就了黄土高原的植被破坏，造就了对长江中下游众多河流、湖泊水系的不断围垦，造就了长江中上游地区人口超高密度聚集和林木资源不断消失，造就了西北地区沙化侵袭的普遍存在。可以说，我们要还的环境“债”可上溯的时间要比世界上其他国家长得多。

从现实看，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一般保持同步。但在我国，城市化进程长期滞后于工业化，建国后的前30余年，工业生产力主要向少数超大型城市聚集；改革开放以来的20余年中，“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政策又造成了大量乡村工业的遍地开花。城市化进程缓慢和城市结构的严重不合理使我国克服工业文明负面影响的难度要比其他工业化国家大得多。大城市工业治理和分布极广的乡村环境治理，我们面临的重点是难度最大的两头。

保护资源，改善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迫切之需。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实现可持续发展，关键要靠技术进步。发达国家在自己的工业化过程中，或者依靠对殖民地的掠夺，或者依靠50年代“石油大发现”的历史机遇，渡过了工业化的高资源指向阶段。正因如此，迄今世界上的汽车动力仍停留在液体燃料的水平上迟迟没有突破。电力和汽车这两种工业化的标志性产品未能实现密切结合，这已为人们公认是工业化阶段遗留的一个重大技术缺憾。现在看，电动汽车的技术突破很可能需要中国人来完成。因为客观事实是，如果不能实现这样一个突破，在13亿人口的国家让“汽车进家庭”是不可能办到的。电动汽车发展的“瓶颈”何在？在动力

电池，说到底，在新材料上。这个新材料就具有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所说，“对经济增长有突破性重大带动作用”的意义。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地强调，“保护环境和保护资源是我们的基本国策”，必须“把可持续发展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因为“全面小康”之路应当是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明发展之路。

【提问三】：现在收入差距拉大是个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全面小康”应当怎样解决公平的问题呢？

答：我们这个讲座，从第一讲开始到今天，在不断交流经济学理论知识的同时，我们一直在强调一个认识论、方法论的问题，这就是辩证法。

自然过程也好，社会发展过程也好，在很多时候，人们经常并不能直接瞄准自己希冀的目标，而需要曲折地向相反方向努力一段。你打算到东边，但先向西方走，反而可以更快地到达东边。“相反相成”，这就是辩证法。我们很多年中极力推行“以粮为纲”，结果是怎么也解决不了全国人民吃饱饭的问题。在长期的短缺时代，老百姓吃饭是要凭粮票定量供应的。出差要是没带粮票，那你肯定要有大麻烦了。因为就是全国人大开会，没粮票也吃不成饭。那时的粮票还分粗粮、细粮，还分米票、面票；计量单位不仅划分到斤，还要划分到两。上海分得更细，还有半两的粮票。后来不搞“以粮为纲”了，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反而是粮食多得过剩。现在人们回想凭粮票吃饭的日子已经恍如隔世。

解决公平问题也具有同样的规律。我们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一大二公”的公有制，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在消费资料的分配上实行按劳分配。这听起来多公平呀？人人都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服。但是，如同后来我们清楚认识到的，“大锅饭”不仅使我们损失了效率，而且也使我们远离了真正的公平。

“大锅饭”公平吗？我们前面说到过，从1953年到1979年的26年间，劳动者的收入只增长了不到1倍。这期间工业固定资产增长了26倍，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9倍。我们说，劳动者不能有效地分享经济发展的好处，不论消费资料的分配怎么平均，那也是最大的不公平。

实际上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早就认识到，平均主义“大锅饭”下多劳不能多得的结果是养了懒人。这本身也是极其不公平的。

要贯彻市场经济下的公平原则，人们的收入就要有差别。有差别好不好呢？有差别本身也是一种公平。能力强、出力多、贡献大的多得，反之少得。这是不是公平呢？

现在人们已经比较接受“机会公平”这个认识了。起点公平、机会公平是我们首先要追求的公平。我们现在还做不到结果公平。那么首先应当让人们有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让社会、让市场来优化选择。上大学为什么要考试呢？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教育资源。资源有限，只能有一部分人上大学。目前的“高考”制度不论多么不完善，有这么一种可以公开衡量的选拔机制比没有要公平得多。所有适龄青年都有机会参与这个选拔，这就是公平。

但是只要有差别，就会有事实上的不公平。只要这种事实上的不公平有助于提高效率，最终受益的还是全社会。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效率提高了，我们才有机会更大程度地去调整事实上的不公平。我们说现在东西部发展差距拉大了，但并不是说西部在过去没有发展。西部在过去一些年中同样也取得了很大发展。如果没有东部的优先发展，我们今天根本就不可能有实力发动目前的“西部大开发”战略。这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要想到东边，可能需要先向西走”的道理。

经济发展过程充满辩证法。在传统理论中，我们经常说“唯物辩证法”或者“辩证唯物主义”。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贯彻辩证法。“以粮为纲”就是不讲辩证法的“形而上”学，用孤立、片面、静止的眼光看问题。

在我们目前的现实社会中，和改革开放之前比，我们是更公平了呢？还是更不公平了呢？我认为，只要是尊重事实地去看待问题，大家都会得出明确的结论。但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有没有新的不公平产生出来呢？不仅有，而且还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大家能坐在这么好的教室里读 EMBA，但有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工可能正在挨饿。有的年轻人可以随意地去巴黎旅游，但年年都有考上大学交不起学费的贫困生。城市里的人享受着空调、电视、计算机等现代文明，但很多农村地区连基本的清洁饮水都得不到。

人们从道德的角度去审视这些不公平，可能会提出了很多质疑。这些质疑是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的。人类在思考这种问题，追求更高境界的过程中才创造出更高层次的制度文明。但我们得明确无误地说，事实上的不公平现象还将长期存在，而且是普遍地长期存在。不论我们在情感、道德层面上是多么不愿意承认这个现实，我们都必须正视的问题是，差别化仍不可避免。差别化造就了种种事实上的不公平，但同时也在给我们积累和提供着实现更大公平的条件。造就不公平的原因可以为实现更大公平提供条件，这就是辩证法。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这就是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个认识清楚地讲明白了我们在全面小康建设过程将怎样处理公平问题。

首先要有效率。没有效率，我们就不会有实现公平的物质基础。怎么才能有效率呢？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放手”的含义不仅是政府不管和少管，而且是让人们有更多机会去自主地追求财富。

放手让人们去追求财富，并非是说社会不需要有一个调整财富配置状态的力量。我们还要兼顾公平。怎么兼顾公平呢？“十六大”报告讲了一个原则。那就是，“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

什么叫初次分配呢？在企业的经济活动中发生的分配，在市场竞争过程中实现的分配都是初次分配。简单说，企业的销售收入中扣除原料、折旧之后的剩余会划分为劳动者的报酬、投资人的利润和国家税收等。这就是初次分配。大家在市场上买东西时和卖方讨价还价，价格高低就决定着买卖双方在交易过程中的利益分割。由此形成的利益分配也是初次分配。在这些初次分配过程中，我们的原则是什么呢？是注重效率。包括劳动者的工资，也不是按照你流汗的多少来分配，而是要按照贡献的大小进行分配。

那什么是“再分配”呢？政府用收取的税赋收入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过程就是再分配。再分配一定要注重公平。

再分配怎么就注重公平了呢？人们从常识可知，公共产品、社会福利并非是按照每个人纳税多少来享用的。例如，不论穷富，每个社会成员都应当有享受社会安全保障的平等权利。另一方面，政府的税收对不同的人是有区别的。比如在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上，几乎所有国家都实行累进税率。富人不仅要一般地比照收入纳税，而且收入越高，适用税率就越高。这就是再分配对公平和财富配置的调整。在全世界，人们都把个人所得税视为是一种公平税。

政府税赋的再分配作用不仅表现为提供国防、社会安全等公共产品方面，而且表现为对弱势群体的救助和提供社会保障方面。例如在我国，我们目前已经在城市中建立起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社会保险制度等。除了这些经常性的制度外，阶段性的措施还有政府补助下的“安居工程”，对发展滞后地区提供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等。这些都很容易为人们所理解。

有人可能会说，我们并不否认政府的这些措施有利于公平，但这些措施并不能防止贫富差距拉大呀？富人即或缴纳更多的个人所得税，他们也还是会比穷人日益更多地占有社会财富呀？

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人们认识到，要抑制、防止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仅仅有上述一般性的调节措施还不够，还需要有很多特殊的社会共同约定才行。什么样的社会共同

约定呢？比如征收遗产税、赠与税、不动产税等就是这样的社会共同约定。你有本事，能够更高效率地支配资源，社会就给你更多支配资源的机会。在你有生之年，你可以尽情地发财挣钱。但是别着急，社会不会放任让财富在不同人群中的不平等配置状态无限地扩大下去。谁能逃脱自然规律而长生不老呢？等你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那时社会再和你算总账。你要把你的财富交给你的儿孙。这没问题，但要先纳税。而且这个税率还不低。遗产越多，税率越高。你说，我在有生之年就把财富转移到儿孙名下。这也没问题，但同样要缴纳赠与税。越是发达国家，这个“算总账”的规矩就越完善。

我国现在还没有开征遗产税等税种。但可以明确地说，或早或晚，我们肯定要开征这一类税种。这是通过“再分配”更大力度地调整公平的一个措施。

实际上，再分配的手段不仅包括政府的税赋，还有很多。

比如，社会保险体系也是再分配和调整公平的一种杠杆。不仅政府主办的社会保险，而且商业化的社会保险也同样具有这种功能。每个购买意外险的人都不会希望自己遇到意外，但谁也不敢保证自己就不会遇到意外。保险的功能是什么呢？就是把大家为保障自己安全的钱集中起来，配置在出险的少数人头上。这公平不公平呢？很公平。因为每个出险的人都有同样的机会享受同样的理赔。

再比如，社会慈善捐赠。这些年我国这种福利性社会捐赠已经比较多见了。对特殊困难的群体，由社会成员自愿地提供援助，这也是一种再分配。我们的“希望工程”就是大家熟知的“爱心工程”。我们现在还有很多零星、自发的社会捐助活动。在有些发达国家，捐助社会慈善机构的钱可以不缴纳所得税。有些富人就想，与其等我死了让政府用遗产税把我的财富白白收走，还不如在我有生之年或者身后捐给社会慈善机构，我还落个好名声。所以在发达国家，慈善捐献并非都是普通老百姓，“大款”、富人们也经常是乐意为之的。1998 年我国大陆闹水灾时，香港的艺人们组织赈灾义演，号召人们当场捐献。有个不愿透露姓名的香港富人让主持人到台前宣布，这个义演不论筹集多少善款，他都再加 1 倍。要知道香港是个富裕的地区，一台“明星荟萃”的义演能够筹集到的钱肯定不是一个小数目。他一个人要和全香港所有人的善举相敌。这可就不是一般的“表示表示”了。我认为，一个文明的社会就应当有这个机制。

还比如，社会成员的互助组织也可以有效地履行再分配的功能。我们知道，下岗职工“再就业服务中心”是上海最先创造出来的。实际上上海在创造出“再就业服务中心”的同时还有一个创造。1997 年我到上海调查时发

现，上海总工会有个举措是非常值得提倡的，这就是职工互助金制度。每个职工可以自愿加入，只需缴纳很少一点钱。这个钱在理论上还是属于你个人的，但你不能随便取用。做什么用呢？如果哪个职工遇到特殊困难了，工会就用这笔资金的收益提供援助。这是一个职工相互救助的体系。其必要性在于，有些特殊困难不是民政系统能够解决的，比如孩子考上大学没学费；有些也不是买保险就能规避的，比如家里的老婆婆病重。有了这个职工互助系统，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可能存在的不安全就得到了更全面的覆盖。

我再举一个再分配的力量。这个力量不直接表现为政府行为，但政府可以通过政策调整。什么力量呢？就是宏观经济运行中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我们前面说过，市场经济下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什么呢？主要调整两个指标。一个是通货膨胀率，一个是失业率。当政府政策故意在一定程度上容忍通货膨胀时，社会利益的分配也会通过就业率上升出现某种有利于劳动者的倾斜。

人们在思考公平问题时很容易把目光集中到怎样抑制高收入的增长上面。抑制富裕群体的收入增长是一个实现公平的重要方面，我们将怎样抑制这部分人群的收入过快增长呢？“十六大”报告指出，一是要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二是要规范分配秩序，合理调节少数垄断性行业的过高收入；三是要取缔非法收入。

但仅仅抑制高收入并不是最积极的措施。更积极的措施是什么呢？是调整社会不同富裕程度的人群构成。我希望大家注意到“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一句话。这句话是，“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中等收入者的比重，这句话是第一次写入党的文件。我认为，让中等收入者阶层成为社会的主体，这是“全面小康社会”最大的公平特征。

【提问四】：当前中国是否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对现实的收入差距应当怎样估计呢？

答：我认为中国现在的确存在着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而且存在着分配不公的问题。但我不赞成说中国现在就已经出现了两极分化，特别是不赞成一些媒体的炒作，说中国现在的两极分化比美国还严重。

分配有差距是合理的，没有差距也是一种不公平。这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但差距过大也不行。承认差距的目的是为了调动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如果社会大多数成员都有严重的不平衡感，这个社会的分配机制就一定存在问题了。大多数人都不满意，这个差距就不仅不能起到调动积极性的作用，反而会抑制人们的积极性。

那么怎么判断这个差距是否合理呢？目前有些媒体喜欢用社会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的比较来说明收入差距是否过大的问题。这个比较很不科学，也很不可取。这种比较没有说明这个最高收入者有多少人，最低收入者又有多少人，在社会中各占多少比重。

社会收入差距是否合理可以有两条标准。一是能否产生足够的激励作用。在管理学上有个理论，收入对人们的激励作用大小不取决于收入水平的高低，而取决于差距的部分。比如说，如果每个人的月薪起码都有1500元的话，那么对人们有激励作用的只是高于这1500元的部分。前1500元几乎不产生激励作用。社会分配也是一样，差距应当大到对大多数人产生激励作用的程度。在全社会中，是否大多数人都有机会分享经济发展的好处，是否大多数人都获得了比较有力的激励。大多数人都在特定差距水平下获得了激励，那么这个差距就是合理的。

再一个标准是需要社会救助的人群，也就是最低收入者群体有多大。如果有相当多的人靠社会救济生活，那么这个社会的分配差距肯定是过大了。

这两个问题最重要。最高收入多少，以及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相差多少倍等指标说明不了多少问题。

现在有个说法，说目前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的80%被20%的人占有了。这个说法被很多媒体反复引用，以此来证明中国现在两极分化已经很严重了。这个似是而非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我们姑且不论这个80%和20%的说法是否有真实的客观依据。比如根据什么样的统计资料或者调查结果等。我们假定这个说法确实存在，姑妄存之，那是否就真的能说明中国两极分化很严重呢？我们现在就算个账。

目前我国的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已经接近10万亿元人民币。这是到2003年第一季度末的数字。为简单起见，我们按10万亿元算好了。10万亿元的80%是多少呢？是8万亿元。对不对？我们还不必按全社会总人口的20%算，那样人数就多了。我们只按城市人口的20%算好不好？2002年末我国城镇居民总人口是5.02亿人。为简便起见，我们就按5亿人算。5亿人的20%恰好是1亿人。

剩下的事情就简单了。8万亿元为1亿人所占有。那么人均是多少呢？8万元。人均8万元，一个三口之家的家庭金融资产存量是24万元。请注意，这个24万元不是年收入，是家庭金融资产存量。也就是老百姓说的“家底”。24万元是个什么水平呢？是在北京五环路以外，政府援助下盖的那个“安居工程”中买半套房子的水平。如果家庭金融资产存量24万元就代表了中国富人阶层的平均财富水平，那么这个平均财富水平能说明中国两极分化很严重

了吗？要知道，美国一个熟练工人的年薪是4.5万到5万美元。那是年薪，是流量。我们中国富人阶层的平均财富水平才只有不到3万美金，就说中国的贫富差距比美国还大了，两极分化已经很严重了。这个说法是不是太可笑了一点呢？

所以说，我们不应高估中国目前收入分配的差距，更不宜没有根据地夸张渲染什么两极分化的问题。中国现在有没有亿万富翁呢？肯定有。亿万富翁、千万富翁都有。但是他们在整个社会人口中所占比重有多大呢？很小。小到远没有形成为一个阶层。加上百万富翁，也许已经有一个群体。但不要夸大这个群体的数量和他们的财富总量。

中国现在存在不存在收入分配不公呢？肯定存在。在2002年3月的“两会”之后，当时朱镕基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也被问到这个问题。我认为朱总理那个回答很好。朱总理说，我们应当警惕两极分化的问题，采取措施调整社会公平。但我不认为中国已经存在两极分化了。当前收入分配差距主要存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城乡收入差距拉大。二是垄断性行业和非垄断性行业的收入差距拉大。三是下岗职工和在岗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我认为朱总理当时的这个判断是很准确的。

党的“十六大”报告在公平和收入分配问题上提出，我们“既要提倡奉献精神，又要落实分配政策；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我认为这就把问题的两个方面都讲清楚了。

【提问五】：您刚才提到，个人所得税是一个公平税。最近媒体上有个说法，说我国的个人所得税主要都是工薪阶层缴纳的。这是不是没有起到调整公平的作用呢？我国的个人所得税会怎样调整呢？

答：个人所得税的问题是个有意思的话题。因为牵扯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人们普遍都比较关注。最近，关于“个税”调整的议论又渐渐多起来了。我对这个税种最后究竟会怎么调整并不了解。这里只是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人们关注调整个人所得税的调整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对社会经济关系及其调整尺度的认知向“税”这种市场经济的杠杆集中，应当说这是改革进程中的一种极大的社会进步。

但值得指出的是，目前一些相关议论中对个人所得税的认识仍颇多似是而非之处。比如说，你刚才说到的工薪阶层成为“个税”纳税主力是否是一种不公平的问题。由此就有必要做点辨析。

首先说，个人所得税确实是一种公平税。这在各国皆然，包括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这个税种的主要作用是调整社会分配结构，维护社会公平。

但在我国，由于社会经济正处于体制转轨时期，我们的“个税”可能还得承担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殊性职能。这就是调整个人与政府之间的经济关系。

在过去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熟悉的观念是“国家养活人民”。那时人们对“涨工资”的通行解释是“国家”拿出了多少钱。其实，这是一种被颠倒了的社会经济关系。

在经济学意义上，“国家”是一个虚拟的概念。国家自身不会创造出任何社会财富，也不可能凭空有给社会成员增加收入的能力。由于在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个人收入中必要的公共开支、社保、扩大再生产等部分已被扣除，又由于在所有制上实行“一大二公”，分配过程的体制性特征掩盖了国家与个人之间的真实经济关系。现在我们应当还这种被颠倒的经济关系以本来面目了。这个本来面目是什么呢？就是“人民养活政府”。

“人民养活政府”，或说“纳税人养活政府”，这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是社会普遍公认的经济准则。但在我国，调整这样一个经济关系仍是当前深化改革、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之一。“个税”就是将“人民养活政府”这样一个基本经济关系直接显现出来的工具。我国的“个税”调整必须从这样一个重大的改革目标出发。

现在回到我们的问题上来。那就是工薪阶层应不应当纳入个人所得税的征缴范围。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中，有相当多的人认为，既然“个税”是公平税，那么以工薪阶层为主的中低收入者就不应当纳入征缴对象的范围。这个认识并不正确。

个人所得税对社会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手段主要体现在两个基本方面。一是规定起征点，或叫免征额，即超过一定收入水平才真正需要缴纳纳款。二是实行累进税率，即收入越高，不仅纳税的绝对额高，而且收入中应税比重也越大。但值得指出的是，这两点不能简化为不对中低收入者征税和只对高收入者征税。事实上，在任何国家，工薪阶层都是大多数。一个显然的道理是，如果把大多数人屏除在纳税范围之外，“人民养活政府”的经济关系是建立不起来的。

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清楚。免征额以下的收入部分不等于不在“个税”征收范围。在个人所得税的本来意义上，任何个人收入都在征缴范围内。起征点、免征额其实都只是一种容易理解的通俗说法，在真正的税赋意义上，所谓“起征点”或“免征额”以下的收入部分并非是不征税，而只是适用税率是零。人们很容易理解，零税率不等于没有税率。一方面，起征点或免征额普遍要比社会救助标准高出一个相当的距离；但另一方面，收入在社会平均

工资水平或偏下一些的人群仍要缴纳个人所得税。

当前很多人指出，“个税”的起征点应当依照纳税者的赡养负担不同而区别对待。这个意见是非常合理的。目前我国在个人所得税征收问题不考虑赡养负担的区别是个明显的缺陷。

说个人所得税是“公平税”，还有个问题需要说明。很多人可能会有个想法，那就是希冀借助个人所得税把社会公平一次调整到位。其实，这种想法是并不符合规律的。

我们前面说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及其差距是调动积极性、提高效率的重要杠杆。从一定意义上说，人们的收入、财富存在差距也是一种公平。社会不可能也不应当通过“个税”把收入差距一把“抹平”。根据国际经验，调整贫富不均这种事实上的不公平应当依靠一个包括所得税、资产税、赠与税、遗产税等在内的税赋体系，而不是单一税种。例如在日本，拥有豪宅的富人要为市场价值巨大的不动产不断支付很高的资产税。此外，各国对事实上的不公平的普遍做法是，在个人所得税上对富人作出较多的退让，而靠遗产税以及赠与税最后“把关”。在我国，调整个人所得税显然也需要与正在酝酿中的遗产税、赠与税联系起来考虑，而不能指望个人所得税一个税种就把公平一次调整到位。

个人所得税作为一种公平税，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在很多时候，“个税”不仅不去“剥夺”富人，反而会“偏袒”富人或较高收入者。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因为政府的税赋除了调整社会公平外，还有一个基本职能，那就是调控经济运行。例如最近美国政府正在试图通过减税政策来刺激经济以抑制可能的衰退。个人所得税也同样兼有调控经济的重要职能。

在履行调控经济的职能时，“个税”经常会体现为对有钱人的“关照”。例如在美国，为了鼓励住房消费，政府长期实行的一项税赋政策是，人们第一次购买住宅时的支出可以从以后“个税”应税收入中抵扣。按照美国的“个税”税率，这实际意味着，如果购买一栋20万美元的中等价格的住宅可获得4万到5万美元的政府补贴。显然，购房越大、越贵，从这项政策中获取的好处就越大。

在发展中国家，由于投资不足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在“个税”征缴上也可体现鼓励私人扩张投资的政策意图。例如政府可规定，私人企业主的个人收入如果用于固定资产再投资可减免“个税”。显然。这也有利于私人财富的更快累积和“富人越富”。

在经济调控过程中，越有钱越减免税，这并非是“个税”的“异化”。在

经济学意义上，富人或较高收入者的收入也是一种资源，政策应当通过一定手段把这种资源更多、更快地动员出来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例如，当经济运行中出现供大于求的普遍失衡时，对国民经济发展最有意义的事就是找到一个能够容纳相对过剩产品的“蓄水池”，以实现社会再生产的良性循环。鼓励富人把他们的金融资产转换为实物资产，承担起这样一个“蓄水池”的职能，这于社会有益无害。何况如前所述，在完善的市场经济格局中，“个税”并非是调整公平的唯一“阀门”。

从我国国民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看，扩张消费和鼓励私人投资已经成为调控经济的当务之急。我们也有必要积极借鉴其他国家灵活运用“个税”调控经济运行的经验。

第8讲

经济体制改革

JINGJITIZHIGAIGE

今天是最后一讲，讲改革问题。实际上我们在过去的几个专题中，始终也没有离开改革问题。第二讲的题目就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这就是最根本的改革方向。

但是，我们的改革并非是只停留在这样一个方向上就能成功的。我们还至少有三个层次的问题需要深入研究。这就是，政府怎么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怎么改革，企业制度怎么改。这三个问题不解决，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就是一个只有躯壳而没有实质、只有形式而没有内容的改革。

在第二讲中，我们着重涉及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部制度问题，也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游戏规则”问题。今天我们要涉及的改革，主要是市场参与者自身的改革问题。

坦率地说，讨论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改革，人们比较容易认同。提高效率、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谁会反对呢？甚至说到发展竞争，大多数人仍会持赞成态度。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我们的改革就是从打破“大锅饭”开始的。打破“大锅饭”就是发展竞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什么会在以前的很长时间内得到社会的普遍赞成呢？因为没有人会认为，“养懒人”的制度是一个合理的制度。那时每个人都觉得我实际上有机会比现在得的更多。只要给我一个自由发挥的余地，我也会成为“先富起来”的那个群体中的一员。那个时候，相当多的人都认为，不能“先富起来”的只会是懒人。

但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则不同。因为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都要触及到一个个社会群体的现实利益。改革改到自己头上了，人们的认同度就大大下降了。每个人都说，其他的部分应当大改特改，我的既得利益不要触动。

我们的改革已经走到了一个最艰难的阶段。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全社会几乎所有群体都可以从改革中普遍受惠的阶段已经过去。在目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中，我们要面对的是一部分人要承担改革代价的问题了。或者说，大家都要在不同方面、程度不等地承担改革代价的问题了。

1. 经济体制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

☆ 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我们面临的迫切之需是“改政府”。

☆ 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物质产品和社会服务都是公共产品。

☆ 公共财政的制度框架意味着政府职能不再以形成国有产权为自己的基本职能。

☆ 我们至今也没完全找到好办法的一个难题是谁来承担经济转轨的代价。

☆ 不能指望正常的扩大再生产投入部分来分担转轨代价。例如不能把“债转股”而来的股权当成股市融资来处置。

【8-1-1】政府该干什么的问题直接涉及到政府的权力和利益。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要求，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就经济职能说，政府应当主要做好四件事。一是建立公共财政框架，二是调控经济运行，三是维护经济运行秩序，四是承担转轨成本与完善社保体系。

1999年末，中美之间就中国入世问题达成双边协议。从那以后，入世的挑战问题就成为了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在这个问题上，有专家曾经尖锐地指出，最大的挑战是对政府的挑战，需要与国际经济接轨的最大问题是政府职能的转变。我认为，这个认识非常到位。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改革也好，应对入世挑战也好，我们面临的一个迫切之需是“改政府”。

“改政府”是个通俗说法。政府要应对加入WTO的挑战，实际上说的是政府要应对市场经济的挑战。WTO的基本原则就是市场经济的原则。与国际经济接轨，就是要彻底地与市场经济接轨。

在过去20余年的改革中，政府尽管从一开始就强调“简政放权”、“松绑让利”，但实际上在很长时期内政府利益是在不断增加的，政府支配资源的能力也是在不断增加的。尽管计划经济已经远去，但在实际经济运行中，各级政府自觉不自觉地并没有放弃对资源配置的支配力。

大家回顾一下，在80年代后期的“拨改贷”中，政府把固定资产投资的任务从财政交给了银行，但却没有放弃对这个投资的支配力，资源配置的权力仍在政府。因为上什么项目并不是银行说了算，而是政府说了算。不仅如此，银行贷款形成的固定资产还得算是政府所有的“国有资产”。

其后，分税制的改革实际上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资源支配权上的一次重新分割。后来的“诸侯割据”局面就是依靠由此而来的地方财力形成的。我们最近三年来在整顿市场经济秩序中发现，影响以致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地方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的盛行和地方政府资源支配权的不断强化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1998年以后，我们已经连续多年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资源支配力得到进一步的增强。政府不仅借助于“发债”大大增强了自己的投资能力，而且在“国企三年脱困”的政策中借助于“债转股”又形成了一大批经营性资产的国有产权。

一直到上世纪的90年代末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企业上市还需要经过政府审批。各地的企业上市还采取分配“名额”的办法。连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权力也被掌握在了政府手中。

近年来，很多地方政府非常热心于“经营城市”。所谓经营城市的最主要内容，就是努力提高政府的土地使用权的出让收益。

还有在过去几年中愈演愈烈的“税外加费”的现象，也是政府利益不断强化的一个重要表现。上届总理朱镕基上任之初就痛斥这种现象导致了“民怨沸腾”，并发誓要推进“费改税”。由于种种原因，一直到政府换届，这项改革也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从最直接的政府利益看，在过去几年中，我国政府的税赋收入增长是非常快的。1999年时我国税收总额突破1万亿元，当时的总理朱镕基亲自写信给税务总局表示祝贺。其后的2001年，我国的税收总额突破了1.5万亿元。2003年，尽管有SARS疫情的影响，税收总额预期将突破2万亿元。也就是说，我国的政府税收在过去4年中翻了一番。这个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同期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社会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

我们不是说政府利益增加和政府对资源的支配力增加就是坏事。政府财力增强是我国综合国力增强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政府财力增强也意味着我国经济抗风险能力的增强，政府调控经济和调整社会公平的能力增强。但既然是讨论改革，我们就需要问，市场经济下的政府究竟该干什么？

讨论政府该干什么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小问题。这个问题直接涉及到政府的权力和利益。我们可以说，这是一项“革命革到政府头上”的改革。

在过去一些年中，媒体、社会舆论、专家和政府都在说，要转变政府职能。怎么转变呢？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要求，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就经济职能说，政府应当主要做好四件事。一是建立公共财政框架，二是调控经济运行，三是维护经济运行秩序，四是承担转轨成本与完善社保体系。

【8－1－2】建立公共财政的制度框架，这其中的改革体现在哪里了呢？体现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建立公共财政的制度框架，就意味着政府不再以投资和形成国有产权为自己的基本职能。这项改革的推进是我们在深层次上与计划经济告别，与市场经济接轨的一个里程碑。

政府该干的第一件事是建立公共财政框架。

什么叫公共财政呢？简单说，就是政府财政的收入和支出主要应当服从于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目标。政府为什么要收税呢？因为政府要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就要有必要的财力。政府的支出应当主要用于什么方面呢？主要应当用于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方面。

这里我们简单介绍一点经济学的基本常识。

什么叫公共产品呢？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物质产品和社会服务都是公共产品。比如国家领土完整、国防安全、社会稳定等都是公共产品。一应必要的政府行政职能都是公共产品。警察、法院等维护各方面社会秩序的国家机器也是公共产品，义务教育也是人们公认的公共产品。这些领域的开支都没有异议地应当由政府提供。常识可知，离开这些必要的公共产品，一个社会要想正常运转显然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些产品是服务于社会公众的，所以依靠市场竞争的力量、谋取收益的利益动机等是不能保证资源向这些领域集中的。不仅如此，为了保证公共产品真正服从全社会的利益而不是只有利于局部利益，通常即或私人愿意出钱提供，社会也不能允许私人生产和提供这些公共产品。例如我们不可能允许私人拥有军队。

要维持这些公共产品充足有效，就得全社会大家凑钱来维持其运转所需的必要经费。怎么凑呢？就是收税。政府为什么要收税呢？第一理由就是要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

公共产品的范围是很大的。其范围并不仅限于上述方面。有些公共产品并不一定和政府的行政职能直接联系，但也是社会公众利益的组成部分，比如环保、维护消费者权益等，这些也属于公共产品，也需要政府提供。

公共产品还有一个特殊方面，它不一定惠及全社会每一个人，可能更多的是惠及一个特定利益群体，但它也是公共产品。这就是社会公平。调整和维护社会公平也是政府应当提供的公共产品。比如对社会特困群体的救助、建立最低生活费保障制度、维护必要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福利制度、救灾防灾等。政府税赋是最重要的“二次分配”形式。我们前面讲过，我国分配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就是“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除了维持公共开支以外，政府税收的另一个职能就是调整社会公平杠杆。通过税赋强制地再分配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源，这种公平职能也是公共产品。

在实际经济运行中，除了惠及全社会利益的公共产品之外，还有一些单纯依靠市场机制也不能得到足够的资源配置，而对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又非常必要的产品，我们称之为准公共产品。比如公共交通、城市基础设施、医疗体系等。还有有益于人民身体健康、提高民族凝聚力的体育事业等。这些也应当由政府提供必要的财力支持。为什么是准公共产品呢？因为这些产品的特点决定，有些是可以依靠市场经济下的交易原则在一定程度上维持自身运转的。

我们举几个例子。

一个是电话等通讯网络。通讯网络在建立之初，在规模尚不充分的阶段是很难赚钱的。但这种基础设施又为社会所必要。所以各国皆然，电话公司的建立之初是需要政府财政给予一定援助的。但是当电话网发展到一定规模以后，它就应当完全按照市场化的原则自行发展。

再一个例子是公共交通。目前我国已经有很多城市提出打算修地铁或者城市轻轨，但也有人反对。其理由是目前全世界还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城市轨道交通形成了成功的盈利模式。这种说法很不科学。公共交通的经济性不是体现在这种交通系统自身的盈利性上，而是体现在节约土地等城市资源、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方面上。由于开通了地铁，整个城市的交通运行效率都提高了，大家的时间都节约了。这就是其经济性。在经济学上，这叫做“外部经济性”。

我专门对巴黎的地铁和公共交通作过调研。巴黎的地铁部门说，他们那里的地铁建设投资全部是政府提供的。地铁自身的运营收入最多只能保证运营本身的开支。建设投资是不可能靠卖地铁票收回来的。加上地铁广告收入、场地的商业化出租也收不回来。这个建设投资就应当由政府出。事实上全世界的大城市中，没有一个城市的公共交通不需要政府补贴。至少需要“暗补”。例如减免税、免除土地征购费用、政府财政贴息等。

公共产品的范围实际上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发展程

度高，全社会可以集中的福利资源多，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就可以范围更广。比如我们在资源专题中讲到过，太平洋小国文莱的居民，不仅不用交税，而且全体居民的教育和医疗全部免费。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还远不充分。例如城市“低保”是一种公共产品，但我们还无力把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村劳动力也纳入城市福利资源的覆盖范围。这公平不公平呢？很不公平。但我们目前还没有那么充分的资源实现这个公平。

有些对社会有益的事，虽然有可能采取市场化的方式获取一定资源，但政府仍需对其发展负责任。最明显的例子是高中以上的教育以及体育事业。

我是支持教育产业化和体育产业化的提法的。很多人反对教育产业化、体育产业化。我认为这个说法不对。以教育为例，从全国平均情况看，我们目前最多就能保障到初中义务教育。高中以上的教育费用确实应当由受教育者自行负担。这个基本的框架没有错。但这不等于说政府就可以不管。政府仍应当在教育事业的发展中提供财政支持。

就是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社会的大学教育资源也有很大一部分是靠政府提供的。除了公立大学由政府出钱办以外，私立大学实际上也很少是单纯依靠自身的学费来维持运转的。这些私立大学很大程度上要依靠社会捐助和政府的“暗补”才能维持生存。

给大家讲个国外大学的故事。19世纪末的时候，有一天，有一对老夫妇走进美国哈佛大学的校长办公室。校长问他们有什么事，这对衣着普通的老夫妇说，他们打算为这个美国最著名的学府捐些钱。哈佛的校长颇有些不屑地说，您知道，哈佛一般只接受数额很大的捐款，一般小额就不劳费心了。这对老夫妇相互一笑，老妇人对老头说，看来我们找错地方了。老头对老妇人说，那我们就自己来干吧。

这对老夫妇是谁呢？就是曾经担任过美国加州州长的铁路大王利兰·斯坦福夫妇。他们在哈佛受辱后决心自己投资办一所和哈佛一样好的大学。这就是今天名扬天下的斯坦福大学。迄今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其年收入仍高居全美所有大学之冠。

我曾经在斯坦福作过一年半的客座研究员。斯坦福大学就是一所私立大学。这个私立大学一年的经费要多少钱呢？要20亿美元。尽管上斯坦福大学的学生以富家子弟为多，连总统布什的女儿也在这个学校就读，但这么一个庞大的预算也是不可能单纯靠收学费来筹集的。那么钱从哪里来呢？除了学费收入之外，还有四个基本来源。一是社会捐款，二是斯坦福家族当初捐赠的资产收入，三是企业等委托的课题经费，四是政府基金。其中政府基金能占到学校预算的三分之一到一半。什么是政府基金呢？就是政府给的委托课

题经费。只不过这个经费不直接给到学校，而是通过竞争招标的方式交给承担课题的教授支配。

我们由此可知，就是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政府始终是要对教育发展承担很大责任的。不应误解的是，教育的产业化并不等于就是教育的完全市场化，也不等于政府不管教育。

体育也是一样。政府发行体育彩票，实际上就是在征缴一种“自愿税”。体育事业无疑是一项有益于社会、有益于全民的事业。这项事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市场配置资源。比如国外的“职业联赛”都是纯粹市场化的体育比赛。但光靠市场不行，还需要有政府的扶持、援助。各国程度不等、方式不同地都有对本国体育事业的政府投入。

建立公共财政的制度框架，听起来好像和计划经济体制没有多少区别呀？这其中的改革体现在哪里了呢？体现在一个非常重要方面。建立公共财政的制度框架，就意味着政府不再以投资和形成国有产权为自己的基本职能。

政府不以发展和壮大公有制、国有经济为第一经济职能，而以提供公共产品为第一职能，这个改革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不夸张地说，这项改革的推进是我们在深层次上与计划经济告别，与市场经济接轨的一个里程碑。

有一个问题很值得辨析一下。我们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如“十六大”所说，“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但这不等于说，要让政府成为“搞建设”的主力军。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政府应当做到的是促进经济建设，而不是自己成为投资“搞建设”的主体。以盈利为目的的建设项目应当尽可能交给市场化的投资主体去做。政府可支配的资源，应当努力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更好地为市场化主体“搞建设”服务。

温家宝总理这一届政府非常重视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的政府职能转变问题。一个最明显的例证就是SARS疫情发生后，中央财政很快宣布了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一些产业实行减免税措施，并且拨出专款对感染人群实行免费救治。这就是典型的公共财政行为。历史上，我国也有过多次减免税政策。例如对特区经济中的外商投资企业实行“两免三减”，在应对通货紧缩趋势中提高出口退税率等。但这些政策都没有这么强烈的公共产品意义。

政府该干的第二件事是调控经济运行。

政府调控经济，调控什么呢？我们在前面有关专题已经讲过，在正常情况下，政府调控经济的最基本职能就是利用“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平衡关系。也就是人们熟悉的，防止出现普遍性的供大于求或者供不应求。经济有可能出现通货膨胀，政府就要采取紧缩的财政或者货币

政策，给经济运行适度降温。经济有可能出现通货紧缩，政策就要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或者货币政策，刺激经济，促使其向高涨方向发展。

在市场经济的一般意义上，政府调控经济就是指政府调整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平衡关系，也就是总量关系。实际上，目前我们的政府经济职能已经在这个方面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其中最重要的例证之一是发行国债的动机。

发行国债是最重要的政府经济行为之一，财政的政策行为之一。在改革开放的初、中期，我国发行国债的主要目的是为经济建设筹集资金。简单说，发债的第一目标是政府向老百姓借钱上项目。那个时候的国债叫做“建设国债”。但从1998年以后，我们在预算投资之外增发国债的第一目标并不是为了上项目，而是为了调控经济，为了调整普遍性供大于求的失衡状况，引导和刺激投资需求。增发国债之所以成为“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就在于这个政策行为是用于调控经济运行的不平衡状态的。发行国债筹集的钱，当然会投资于很多领域，比如农村电网改造、公路及机场基础设施建设等。但发债的目的一定要辨清，第一位是为了调控经济，而不是上项目本身。

我们在前面讲过。就是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政府也必须对经济运行实行调控。过去一些年来，美国的格林斯潘已经在中国成为了名人。因为他领导下的美联储货币委员会通过对利率的反复上调或者下调已经成为美国经济运行的重要杠杆。也恰好是从格林斯潘那里，我们比较清晰地看到了市场经济下政府是怎样利用货币政策调控经济的。

实际上，现在发达国家政府对经济的调控也在从对短期、总量平衡关系的调控转向对长期经济运行、产业结构升级、社会利益构成关系等方面的调控。美国现任的布什总统，从他上台开始就推进“减税”的改革。后来遇到了“9·11事件”和美国对外发动的一系列“反恐”战争，财政开支大大增加。但布什并没有因此而中断“减税”的决心。仍在积极推进。为什么呢？因为美国政府意识到，在新经济和高科技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需要调整政府和企业、社会之间的经济关系，调整社会群体之间的构成关系，美国经济才有可能出现一个长期的繁荣局面。在他那个减税法案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打算取消遗产税，降低中高收入群体的所得税率；还打算提前赎回美国政府以前发行的长期国债。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实际上是短期和中长期兼顾、供求平衡和结构优化兼顾、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兼顾的。比如我国在过去几年中，政府投资的国债项目就包括对很多重要产业提供技改贴息。产业

技术改造是产业政策管的事，但在我国，产业政策已经出现了和短期宏观调控政策密切结合的趋势。

政府应当干的第三件事是维护经济运行秩序。

从2001年起，国务院主抓的一件重点工作就是“整顿市场经济秩序”。关于维护经济运行秩序的问题我们在第二讲中已经专门讲过。在那里我们讨论了什么是市场经济秩序，怎样建立良性的经济秩序以及怎样维护这个秩序的问题。这里不再赘述。

【8－1－3】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没有改革的具体思路。有些问题我们已经想得比较明白了，既知道如何改，也知道改革的方向是什么。但我们面临一个在过去一段时期中人们有意无意地回避，而且至今也没完全找到好办法的一个难题，这就是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转轨成本问题。

政府该作的第四件事是承担转轨成本与完善社保体系。

我国正处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改革过程中。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政府就被赋予了一项特殊性的职能，这就是承担体制改革的转轨成本。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没有改革的具体思路。有些问题我们已经想得比较明白了，既知道如何改，也知道改革的方向是什么。但我们面临一个在过去一段时期中人们有意无意地回避，而且至今也没完全找到好办法的一个难题。这就是我们在前两天中反复提到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转轨成本问题。

什么叫转轨成本呢？我们知道，在正常的经济运行中，各种要素的消耗都需要有一个制度化的补偿方式。也就是说，“收”和“支”都有一个相互稳定的对应关系。如果没有一个规范的补偿方式，社会再生产就不可能维持。但在改革中，原有的各种要素补偿方式被打破了，有些已经支付了代价的要素无法得到正常补偿。这个代价就叫做“转轨代价”。

给大家举个通俗的例子。假如说你是一个政府公务员，当个处长，月薪可能是2000元。这样在你的生活中，每个月的经常性收入是可以满足你过一个体面生活的日常支出的。支付衣、食、住、行的代价都没问题，还可能略有节余。但是现在住房制度改革了，单位要求你把现在住的公房买下来。即使按国家给的优惠价格，买下你现在的住房也得要七八万元。要你从当月或者近期几个月的收入节余里面拿出这笔钱来，那是很难做到的一件事。住房制度改革引起的这笔支出就是你的“转轨成本”。

中国的改革进程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谁来承担经济转轨的代

价。特别应当强调的是，体制改革的转轨成本是不能靠分摊到经常性支出里面来化解的。例如我们不能把“有偿解除劳动合同”的代价摊入企业的经营成本，也不能靠一两年的财政支出满足完善社保体系的需要。我们也不能指望正常的扩大再生产投入部分来分担转轨代价。例如我们不能把“债转股”而来的股权当成股市融资来处置。

我们面临哪些转轨成本呢？至少有以下几个大的方面。

第一，有偿解除劳动合同。在过去20年的改革进程中，我们在物质要素如何与原有体制告别上作出了很多努力。到21世纪初，如何让人的这种要素和旧体制告别，也就是有偿解除劳动合同的问题提上日程。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那些国企经济职工如果不能在劳动关系上退出国有经济系统，国有经济的转轨改造实际上是不可能完成的。因为他们实际占有和支配着这个系统中的所有资源。

如我们在前面讨论过的，有偿解除劳动合同的代价是不可能包括在企业和财政经常性支出的预算项目中的。而在我们的改革安排中对此也还缺乏战略性考虑。在原有体制下，我们一共有多少国有职工呢？有1.2亿人。这意味着，每人有偿解除劳动合同的代价哪怕只是1万元，总量就需要1.2万亿元。

化解这个转轨代价和建立新的产权关系密切相关。常识可知，当你欠人家钱的时候，有钱可以还现钱，没有钱可以还资产。这是产权变革与承担转轨成本问题的一个结合点。

第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职工的福利或者社会保障问题是全部包含在企业成本中的。现在我们要全部外化到社会统筹这样一个符合市场经济制度的方式中去，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谁来把以前扣除的那部分积累补足。这也是一个转轨代价问题，我们需要通过创新的方式来承担这个代价。

第三，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在旧体制下，银行不过是政府的一个出纳部门，旧体制和改革过程中的一些缺陷导致了现在银行大量不良资产的问题。这并不是银行作为一个企业在自身的经营活动中的无能所致，或者说不完全是。例如“拨改贷”形成的不良资产、政府通过种种行政干预让银行发放贷款导致的不良资产等。现在要靠银行通过市场化经营来化解这些不良资产，这实际上办不到。改革就是要寻找一种制度性的安排把这个代价承接下来。

第四，回赎国有资产的支配权。中国的一个特殊性是，国有资产并没有真正掌握在中央政府手里，而是被形形色色的既得利益集团实际支配着。实

际上在我们改革的初始阶段，中国就已经存在着“条条”、“块块”的个别利益，并不是私人部门发育起来之后，我们才有了推进市场经济的个别利益、局部利益。中国在计划体制下表面上是中央集权，实际上中央集权所能管到的只是一个并不庞大的增量部分，也就是每年的投资。所有的存量资产都掌握在那些分散于不同地区或者不同部门的地方政府和实际支配者手中。

我们的改革最终要解决的深层次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要赎回那些名义上归国家所有的，实际上是由地方、部门甚至是为一些“国企老总”实际占有，为他们的局部利益最大化服务的那部分产权。现在看来，要让国有经济真正融入市场体系，我们可能不得不对那些依靠旧体制实际占有着国有资源的利益群体支付一个“回赎”的代价。

我们说承担转轨成本是我国一项特殊性的政府职能，但并不是说，转轨成本问题仅为我国所独有。90年代初期，“两德”统一过程中，德国统一后的新政府是为体制转轨支付了非常巨大的代价的。俄国实际上也是支付了极其沉重的转轨代价的。不过这个代价主要不是由政府承担，而是通过社会经济发展停滞、人民忍受生活水平下降以及所谓的“币值改革”等方式来承担的。我们前面说过，现在有一门新兴的经济学，叫做“转轨经济学”。这门学问的研究对象之一，就是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转轨代价如何支付的问题。

2003年年初以来，新一届国务院就布置中央各主要研究机构要重点研究我国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改造与再振兴问题。温家宝总理在上任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特别强调提出，要把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的任务“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振兴东北的关键何在呢？就在于解决好改革的转轨成本问题。

2.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

☆ 国有资产管理问题，说到底是一个公有制的资源利用效率问题。

☆ 国有经济的基本存在形式将从“国有企业”转变为“国有资本”。

☆ 企业的所有制性质与市场经济下的企业职能并没有必然联系。

☆ 在国有经济改革问题上，今后管资产的政策和管企业的政策将不断分离。

☆ 产权的市场化才能使市场经济原则真正贯彻到社会经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 改革最大的风险是偏重某一方面利益而忽略另一方面利益，由此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

【8－2－1】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最大变化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国有经济的基本存在形式将从“国有企业”转变为“国有资本”。就经营性领域来说，意味着国有资产的基本形态将从实物形态转变为价值形态。

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关键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三点理由。一是现在全社会大量的优质资源的主要占有者仍是国有经济体系。这一部分资源的利用效率实际上决定着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效率。二是国有经济和国有资产的改革涉及到全社会几乎所有人的利益。这个部分的改革能否成功，决定着社会最尖锐的若干利益矛盾能否得到协调，和谐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局面能否实现。三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过程中，产权竞争已经成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主要形式。产权改革已经成为各项改革措施的焦点。

党的“十六大”报告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提出了很多新的思路。简单说，其中创新之处，大致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不能把公有制和非

公经济对立起来。二是中央与地方政府分级履行出资人职能。三是建立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四是政企分开，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

国有资产管理问题，说到底是一个公有制的资源利用效率问题。我们面临的这个问题，是一个世纪性、世界性的难题。

什么叫世纪性、世界性的难题呢？全世界的聪明人想了一百多年都没有想明白的问题就是世纪性、世界性的难题。在过去一百多年中，全世界的人们在几乎所有体制背景下都进行过尝试，但迄今仍未找到解决公有制下资源利用效率的满意答案。

在过去一百多年中，人类进行过哪些尝试呢？

19世纪后期，欧洲曾出现过以法国圣西门、傅立叶，英国的欧文等人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谓“空想社会主义者”并不是找个会议室坐在那里“空想”或者空发表议论的一群人。他们是进行过大规模的社会实验的。这些人曾经筹集大量资金购置土地、兴建工厂，在这些工厂中实行劳动者平等地占有生产资料和按劳分配的经济关系。但是他们的社会实验很快就失败了。为什么失败呢？因为他们所设计的经济制度不能保证效率。后人之所以称他们为“空想社会主义”者，就是因为他们的美好理想不符合客观规律。

在20世纪初期，“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在自己的国家兴建集体农庄、国有企业，长期实行了严格的计划经济。但是到世纪末，这个公有制的尝试最终以前苏联解体而告终。

在20世纪上半叶，法西斯德国在极端反人类的思潮背景下也曾自诩实行的是“公有制”和“社会主义”。

在20世纪中期，有过中国革命胜利后“一大二公”的长期实践。

在60年代前后，一大批在民族解放运动中获得民族独立的亚、非、拉国家曾实行过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建立过很多“公有”、“国有”企业。

70年代时，一些发达国家如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等都曾出现过一段“国有化”的高潮。

在80年代初期，在前南斯拉夫还曾出现过一段“工人自治运动”的短暂尝试。

但是，所有这些尝试最终都失败在同一个问题上，这就是效率。

我们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世界性、世界性的难题。

我们能不能回答好这个问题呢？是否有把握攻克这一制度难关，我们现在还不敢说。但是，在前20余年的改革中，我们的确已经积累了比较充分的经验。在对市场经济的探索中，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些相对成熟的思路。

从目前的认识看，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最大变化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国有经济的基本存在形式将从“国有企业”转变为“国有资本”。

早在1999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文件就指出，我们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推进国有资产的合理流动和重组；要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

很多人以为，国有经济的“有进有退”的主要含义就是指在有些领域要重点发展国有企业，有些领域不再办国有企业，或者说不再办国有独资企业。这个理解，可以说是很浅层次的。目前我国国有经济分布过宽，资源配置不尽合理的状况的确必须着力加以解决。但一个显然的事实是，在有限领域举办国有企业和在所有领域都举办国有企业，原有体制铸就的企业内在矛盾都是同样存在的。仅仅局限于资源配置领域的调整并不能触动这个根本矛盾，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除去必须由国家垄断的特定领域外，从长远看，“有进有退”的内在含义究竟何在？在于国有经济的基本存在形式从国有企业转变为国有资本。

【8－2－2】在我们的传统理论和传统观念中，“国有”是和“资本”相对立的概念。资本是和私有制、和剥削相联系的概念，国有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国有经济所获取的收益仍然是归全社会劳动者所有的财富。国有经济的基本存在形式怎么能是“资本”呢？这个认识已经过时。因为国有资本同样是公有制经济的具体实现形式。

什么是资本？资本首先是一个价值属性的概念。国有经济的基本存在形式从国有企业转变为国有资本，就经营性领域来说，意味着国有资产的基本形态将从实物形态转变为价值形态。

在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中，“进”和“退”的主体是什么？是国有资本，是产权。“有进有退”是价值形态的退出与集中，而不是把实物形态的资产从钢铁领域搬到石化领域，或者从上海市搬到青海省。不是把本属国有的那一部分机器设备从原有领域搬到新的领域中去。这意味着，由国家或政府占有的那一部分国民财富将从实物资产形态转变为价值属性的资本形态。国有资产产权的一般形态将首先表现为可以带来增值的一个价值量的产权，而不是一个个具体企业的产权。具体企业的产权不过是这个资本产权变换自身形态的结果。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战略性调整是怎样完成的呢？是通过在市场上对产权的买卖完成的。可以毫不含糊地说，“退”就是卖。卖掉实物资产的产权，把国有资本从实物形态退还到货币、价值形态。

在资本形态上，国有资产才能完成自身的不断重组和不断优化配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是一个可流动的概念。国有资本同样是一个不断流动着的财富量。在不断让渡、不断交易的流动过程中，一方面，国有资本或则还其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资本本性，或则向真正需要其行使国有经济职能的领域集中。另一方面，企业产权结构，包括现在国有独资的大型企业的产权结构，才能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走向多元化。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值是财富的社会属性。企业的资产价值并非取决于生产这些资产的成本，甚至并非取决于重置这些资产的市场价格，而是取决于企业的盈利能力与产品的市场前景。但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技术工艺更新、产业结构升级等因素影响，没有一个企业是可以长盛不衰的。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关键是要把滞留于产业前景已经黯淡、资源趋近于枯竭、产品老化、规模不经济或要素组合方式不合理的领域中的国有资本从不断折损的状态中解脱出来，投入到成长性更好的领域或真正需要国有资本支持的领域中去。

由于体制性、历史性因素，我国的国有资本中有相当一部分被“套”在了已经难有赢利前景的领域中，“套”在了特定实物资产状态上。在这样的状况下，财富不仅不增殖，反而要在高成本、低效益的亏本买卖中不断折损。这是最大的国有资产流失。

显然的道理是，除去与政府职能相关的政策性领域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一个出资人有义务、有必要专门把自己的资本束缚于注定亏损的领域。不管这个出资人是国家、政府还是企业法人或自然人。

在我们的传统理论和传统观念中，“国有”是和“资本”相对立的概念。资本是和私有制、和剥削相联系的概念，国有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国有经济所获取的收益仍然是归全社会劳动者所有的财富。国有经济的基本存在形式怎么能是“资本”呢？这个认识已经过时。因为国有资本同样是公有制经济的具体实现形式。

在发展与改革过程中，“资本市场”、“资本运营”、“国有资本”等概念越来越多地出现于各种报刊媒介以至党的正式文件中。资本的存在与被承认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资本是什么？资本是用来谋取收益的那一部分财富。国有资本是由国家或政府占有的那一部分国民财富。国有资本的一部分职能是生产社会公共产品，例如国防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等；另一部分职能是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作为一般资本参与谋取利润的经济活动。

国有资本前一职能的公有性质体现在为国民经济提供“外部性”条件上，

这一点我们前面已经提到。后一职能的公有性质体现在收益的归属上。不论哪种职能，国有资本的产权性质都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有资本同样是公有制经济的具体实现形式。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一部分，不仅要求在产权与收益归属上体现公有性质，而且要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但这个主导作用不应体现为原有体制下那种承担政府职能、社会职能上，也不仅仅体现为在企业总数或社会经营性资产中所占比重上，而应通过资源配置的引导、支撑等方面作用着重体现在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实现区域间平衡发展、协调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平抑供求关系、推动科技进步、促进合理竞争、维护社会稳定、调整社会公平尺度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上。

国有经济所能支配的资源也是一个有限的量。唯有在不断流动、不断优化再配置的过程中，这个有限的资源量才能真正不断在国民经济整体的运行过程中起到“呼风唤雨”或“平抑波澜”的主导作用。显然，能够不断流动和不断优化再配置的只能是价值形态的国有资本。

在改革中，一说到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战略性调整，经常被诘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国有企业还要不要”。我们说，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

企业肯定要。市场经济运行的微观主体就是企业，没有企业也就没有了市场竞争的第一级组织。

企业中的国有产权肯定要。那种把国有资产无偿量化给个人的改革思路是不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也不可能为我们所接受。

但是，企业的所有制性质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职能并没有必然联系。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都是企业，出资人的区别并不能成为承担不同职能、享受不同政策待遇的依据。

国有企业的职能并不简单等同于国有经济的职能。就非政策性领域说，什么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企业是以利润最大化为基本职能的微观经济组织。

我们在原有体制下有企业吗？实际上没有。只有工厂，而且是兼负部分政府职能和社会职能的工厂。一方面，所谓“企业”是只负责使用价值生产的“大车间”，几乎完全不必考虑价值运动。另一方面，应当由社会提供的外部条件又都被融进了企业成本。可以说，造成目前国有企业困境的体制性因素概出于此。

我们希望的企业改革目标是什么？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是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是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显然，这个目标和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并没有必然关系。国有企业需要这样一个目标，非国有企业也同样需要

这样一个目标。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盈利性领域说，国有企业，哪怕是百分之百的国有独资企业，其行为同样是出自“经济人”动机。资本的唯一有用性就是以一定的价值量带来更大的价值量，就是价值增殖。国有资本能够找到舍此之外的有用性吗？不能。80年代中期以来，“打破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拨改贷”、“剥离企业社会负担”、“政企分开”、“让企业成为自负盈亏、具有自我发展能力的法人”等种种改革尝试，不论完善和成功与否，我们在沿着一条什么样的轨迹前进？从理论层次上说，我们在沿着一条使资本回归其本性职能的轨迹前进，这个本性职能就是价值增殖。撇开执行特定政策性职能的领域不说，就一般经营性领域说，只要是资本，国有资本与私人资本的根本职能具有共性；它们在参与社会经济活动过程中的运行规则、行为方式并没有区别。

在过去一些年的改革进程中，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基本上是相互独立地发展的。由此，我们的微观经济政策就始终面临一个尴尬。每当我们大力支持国企发展时，相应政策实际上就形成了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每当我们要鼓励民营企业发展时，相应政策又构成为对国企的歧视。现在我们越来越清晰的一个思路是，企业就是企业。由此而生，在国有经济改革问题上，今后管资产的政策和管企业的政策将不断分离。

政府应当有管企业的政策。那就是如何帮助、促进全社会的企业健康、快速发展的政策。这个政策不应当以企业的所有制性质而有所区别。中国所有的企业都应当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所有企业都应当不断发展和提高自己的市场竞争力。不存在哪一类企业应当优先发展的问题。除承担特殊职能的企业外，所有市场经济下的企业都应当按照一个“游戏规则”运行。既然我们要推进国有企业的产权多元化改造，那么我们就不能指望与国有出资人合作的非国有出资人接受就业最大化，或者政府税赋增收最大化的目标。

【8－2－3】市场经济发达与成熟的根本标志是产权作为交易对象加入到交换过程中来，即产权的市场化。产权的市场化才能使市场经济原则真正贯彻到社会经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唯有在产权高度市场化的条件下，资本与投资领域才能充分地实现相互优化选择或重组。

国有经济的基本存在形式将转变为国有资本，与此相应的下一个问题是推进产权的市场化。

从确立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改革目标迄今，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

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

最初，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停留在两个表层层面。一是所有实物产品的交换都通过市场实现，交换过程的价格依照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二是企业的人财物、供产销不再由政府主导，不再由计划决定。从80年代中后期以来，"减政放权"、"价格放开"以及让企业成为"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等改革都是基于这样的认识。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与改革的深化，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仅有产品的市场化还远不能成为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真正确立还需要有要素的市场化。最近两年来，我们不断提出并正在逐步进入操作过程的"两种就业制度并轨"、"实行市场导向下的竞争就业"、"利率市场化"、"实行股票期权制度"等实际上就是在探索劳动力、资金、技术以及管理等要素利用市场机制实现优化配置的途径。

世纪之交，随着改革思路向产权问题的集中，我们终于认识到，市场经济发达与成熟的根本标志是产权作为交易对象加入到交换过程中来，即产权的市场化。产权的市场化才能使市场经济原则真正贯彻到社会经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唯有在产权高度市场化的条件下，资本与投资领域才能充分地实现相互优化选择或重组。

2000年时香港有一个很生动的例证。就是新加坡李光耀的儿子和香港李嘉诚的儿子争购"香港电讯"股份的事件。"二李争购"这个戏剧性事件给我们演示的是一幅近乎直观的市场经济发展与产权市场化的未来运行模式。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发展突破原有出资人资本局限的方式，看到了不同资本集团对有利投资领域的竞争与资本优化再配置的过程，看到了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产权市场的效率。

【8－2－4】在这样的改革方向上，新的人权、事权、资产权"三统一"，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应当管什么呢？最重要的，是把管理的落脚点从"管企业"上转到"管资产"上来。不在于管多少家企业，而在于管多少资产。不在于怎么搞好企业，而在于怎么配置好资产。

在产权高度市场化和产权不断流动的基础上，企业的所有制性质还有特别意义吗。没有。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将不过是阶段性的产权结构特征。事实上，除必须长期由国有资本垄断的领域外，将不再有什么"终身制"的国有企业。通过市场化的产权置换，今天的国有企业，明天就可能成为非国有企业。相反亦然。

在这样的改革方向上，新的人权、事权、资产权“三统一”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应当管什么呢？最重要的，是把管理的落脚点从“管企业”上转到“管资产”上来。不在于管多少家企业，而在于管多少资产。不在于怎么搞好企业，而在于怎么配置好资产。具体说，应当着重作好四件事。

一是国有资产的优化配置。国有资产究竟应当配置在哪些领域中？理由是什么？投入某一领域的国有资产在国有资产总量中占多大比重？在某一领域的总资产中国有部分又占多大比重？什么时候进，什么时候退？应当有一个明确的规划。就像任何一家市场化的投资公司，没有一个投资计划是不可能实现有限资源的优化配置的，而且这种配置还不是一次完成的，还要不断调整、实现资产的不断流动。

二是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则的资产委托代理制度。一方面，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本身就是受托于政府代为管理国有资产的机构。另一方面，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又要通过派出出资人代表，到自己的投资领域、企业去管理产权所对应的资产。解决国有资产“无人负责”的弊端，不是靠建立更多监督体系来实现的，而是靠完善资产委托代理制度来实现的。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探索有效的国有资产经营体制和方式”。这个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有效性关键体现在委托代理制度的有效性上。

三是培养和选拔合格的出资人代表。人的问题仍是管好国有资产的核心环节之一。党的“十六大”提出，中央和地方政府分别履行出资人职能。怎么履行？具体体现就是向所投资的企业派出出资人代表。这个出资人代表就是现代企业制度下的董事。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向所投资的企业委派出资人代表，依据是自己的出资额，而不是政府的行政权力。向企业派出董事，不是委派“干部”，而是委派出资人代表。要管好国有资产，我们需要的不是能做官的“干部”，而是能维护好出资人利益的出资人代表。

四是参与产权竞争并提高国有出资人的竞争力。这个问题前面已经说过。

党的“十六大”之后，对国有资产管理问题的讨论变得异常热烈。人们普遍对国有资产的产权改革表现出强烈的关心。为什么呢？因为这一部分资产的处置、流动和产权重组涉及到我们这个社会很多深层次的利益关系。这就提醒我们，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一定要持非常谨慎的态度。

迄今，相当多的利益群体对国有资产的改革提出了利益要求。

一是社保基金。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在原有体制下，应当用于劳动者社会保障的工资扣除部分被国家挪用作固定资产投资了。所谓的“社保账户空账”问题就是国

家对社保基金的一个隐性负债问题。用国有资产充实社保基金已经是一个全社会都接受的共识。

二是国企职工。

国企职工对国有资产的利益要求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体制身份转换过程中的经济补偿。这个问题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国家收回“终身雇佣”的体制承诺，应当向劳动者支付一个补偿代价。这个代价不付，人这种要素就很难从旧体制下退出。从现实情况看，在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局部区域内，解决好这个问题还是维护社会稳定、区域经济振兴的一个基本前提。

另一个部分是清算国有职工人力资本对积累的贡献。这个问题稍微复杂一点。在原有体制下，劳动者接受长期低工资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工资以外的积累是归劳动者共同占有的。通俗说，就是工资虽低，但资产的累积中每个人都有一份。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有资产中实际上应当有一个部分是劳动者人力资本的贡献。如果这个资产占有关系与就业之间的联系被割断，那么国家就应当将这个产权关系显性化，用产权给予国企职工以必要的补偿。当前，很多国企实行“员工持股”制度，依据的就是这样的道理。

三是企业高管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

建立高管人员股票期权激励制度和实行管理层持股制度，我们现在相当多的国企管理层对这个改革前景抱有很高的期望值。人们抱有这样的期望值并非是没有根据的。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的决定”中已经明确提出，要“建立和健全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十五届五中“关于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再次重申，要“对企业领导人和科技骨干实行年薪制和股权、期权试点”。

高管人员持股，应当说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推进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推进这项改革，也是按照市场经济原则提高国有资产利用效率的基本措施之一。党的“十六大”前后，管理层“买断改制”方式、高管人员融资持股的“MBO”方式等在实践中层出不穷，在网上论坛中也是讨论的热点。

四是银行。

由于历史原因和改革过程中的措施不完善，现有国企整体对银行的负债率很高。也就是说，国有资产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银行的债权形成的。我们的国企改革和金融改革实际上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一段时期来、银行系统对国企产权改革的关注度非常高。在前期“国企三年脱困”的“债转股”中划给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下属的“资产管理公司”的不良债权高达1.4万亿元。

这个不良资产至今还未找到良性的市场化出口。国企产权改造，如果忽略了银行对资产的债权，那么这个改革不可能成功。

五是股票市场上的流通股股东。

迄今我国的上市公司中，大股东几乎都是国有股东。在过去几年中，国有股、法人股流通问题成为了这个市场中的一个敏感话题。一些人士认为，流通股东和非流通股东的股权代价是不对等的，国有股要想获得流通资格，就得把一部分国有股权无偿分配给流通股东才行。

六是外资。

从世纪初以来，外国资本进入中国有了一个新趋势，就是从直接投资形成增量资产转为收购存量资产。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当前汽车领域中的合资合作趋势。事实上在政府行为取向上，各级政府也在积极推进外资收购国有产权。目前，除国家产业政策另有规定的领域外，不仅非上市公司的国有产权向外资转让已经基本放开，上市公司的国有产权向外资转让也已经没有制度性的障碍。外国资本企图通过收购存量资产实现资本输出和支配中国重要产业生产能力的努力在几乎所有产业领域中都可见到。当前除汽车产业外，石油石化、商贸流通、金融、航空、机械等产业都有外资在力图大举进入。

七是民营资本。

在过去几年中，我国的民营资本已经积累起了相当大的力量。其资本投向，已经从开始阶段的独立发展、积累转向为产权并购、资本运营。民营资本参与国有产权并购是推进国企产权制度多元化改革的重要力量之一。这个问题我们在前面也有过专门的讨论。

八是地方政府。

在我国的体制关系中，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利益划分历来是影响政策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在原有国资管理体制下，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主要体现在增量上，就是税赋分成的关系上。存量资产对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影响不大。但在今后的改革中，地方政府将代表国家对部分国有产权行使出资人权利。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资产分割，直接关系到地方政府对资源的支配力。

在这些利益要求中，有哪些利益要求是不合理的吗？应当说，每一个局部的利益要求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合理性。但有这么多方面的利益主体提出利益要求，即使把我们现有的国有资产分割若干次也无法满足所有人的要求。这就是我们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面临的现实难题。

最近，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研究中，有个命题非常有意义。这个命题叫做“国有产权改革过程中的风险问题”。我们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呢？就是

偏重某一方面利益而忽略另一方面利益，由此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大家可以上网看看，上述列举的各项利益要求，几乎每一项都存在着异常尖锐的争论。例如高管人员持股、向外资出让国有产权、民营企业参与国企产权并购等。

我们在前面说过，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我们要实现的发展与改革目标是建立一个各得其所的、和谐的全面小康社会。和谐意味什么？意味着社会矛盾的协调。我认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最大难题其实不是保值增值，而是“摆平”全社会各方面的利益矛盾、利益关系。国有资产是我们推进改革和调整社会经济利益关系中的一个最大“筹码”。怎样用好这个资源，让这个资源的分配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发挥最大的促进作用，这是我们的制度创新、改革创新的关键。

9. 现代企业制度与法人治理结构

☆ 国资委只能依靠“私权力”，就是以所有者的身份来支配归它所有的那部分资产。

☆ 出资人是企业的主人，这个答案不需要含糊也不应当含糊。

☆ 不能把一个局部的劳动者群体说成是归全社会劳动者共同所有的国有资产的主人。

☆ 并没有逻辑上的因果关系说，因为出资人叫做政府，所以这个企业或者这个委托代理关系的效率就一定是低下的。

☆ 董事会负责的是产权市场的竞争，经营班子面对的是产品市场的竞争。

☆ 真正的世界级大企业无一例外地全是靠产权竞争发展成为世界级的。

【8－3－1】出资人是企业的主人，出资人的利益是企业第一位的利益。出资人的利益、职工利益、政府利益、银行利益、上下游利益，还有其他一些相关的外部利益，这些利益都是企业利益构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们得从这样一个利益构成中明确一条，谁的利益是第一位的。

在我国的改革进程中，当前一个重要的内容是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

我们上面讲到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一个需要强调的地方是，所谓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并不是一个政府权力部门。它对国有资产的管理不能依靠政府的行政性权力，因为政府的行政权力是一种“公权力”，是社会赋予政府为全社会谋取公共利益的权力。那国资委怎么管国有资产呢？它只能依靠“私权力”。就是政府对国有资产的所有权来进行管理。就是说，国资委也只能以所有者的身份来支配归它所有的那部分资产和按照公司法以及相应

法律规定的职能、职责、权利来管理、维护它自己的利益。

举个例子说，国资委的产权代表不可以在董事会、股东会上对其他董事、股东说，因为我的老板是政府，所以你们都要听我的。国资委派出的产权代表也只能按照出资多少来发表意见、影响决策。保证这个游戏规则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现代企业制度及其核心——企业法人治理结构。

在过去几年中，人们对现代企业制度、法人治理结构的说法已经耳熟能详了。大概会有人说，现代企业制度，包括法人治理结构，不就是在企业中建立“新三会”吗？就是建一个董事会、监事会、股东代表大会。

这个答案没有错。但如果我们把问题引向深入一步，问一问为什么要建这个“新三会”，恐怕就不一定每个人都解释得出了。

很多人认为，之所以要在企业中建“新三会”，就是为了防止“内部人控制”。从我们国家的具体情况说，就是为了防止国有企业的领导人贪污腐败，防止“59岁现象”。

无需置疑，现代企业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的基本功能之一确是防止“内部人控制”。但这只是法人治理结构的职能之一。我们之所以要大力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并非仅仅是为解决原有体制下国有资产无人负责的弊端，也不仅仅是为了给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多一层监督机制，防止他们贪污、腐败。的确有这个功能，但这不是问题的全部，而且也不是最核心的问题。

企业资产利用效率的提高，以及诚信制度的建立，最终不是靠监管解决问题。离开监管不行，只靠监管也不行。显然的道理，我们没办法在每一个经理人后面派一个监督员。为了防止监督员和经理串通，我们还得在监督员后面再派一个特派监督员。如果依靠这样的体系，那社会的监管成本将沉重到无法承受的地步。实际上这种监管体系也不可能满足效率的要求。

解决效率问题，最终要靠制度约束。这个制度体系既包括监管制度、财务制度、公共资产合理利用的约定制度，也包括各种利益关系的相互制衡、激励制度。监督、利益制衡加上激励，这几个方面加起来，就会使相应的责任人产生理性的行为动机。例如，你想损害企业的利益，但其他人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利益连带受损，就会通过相应的制度出面制止。这就是利益制衡。

现代企业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呢？要在企业这样一个微观经济组织中解决四个方面的重要问题。

第一，建立企业运行的利益动机。

有一个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可能不言而喻，但对我们国家来说，在理论

和实践上都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而且要清楚无误地回答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究竟谁是企业的主人。现代企业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的首要作用就是回答这个问题。这是企业制度改革不容回避的一个问题。

回答“谁是企业的主人”这个问题，实质上就是回答，谁的利益在前，在企业利益中谁的利益是第一位的利益这么一个问题。或者再通俗一点说就是，“企业是为谁而办的”这么一个问题。

现代企业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给出的答案是，出资人是企业的主人，出资人的利益是企业第一位的利益。这个答案不需要含糊也不应当含糊。含糊了我们就建立不起现代企业制度来，就完成不了改革。

没人否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利益是一个多方利益的系统组合，而不是只有一个利益主体。

除了出资人利益外，人们从常识可知，企业利益中还要包括职工利益。

职工利益、劳动者利益在企业利益中的最集中体现就是就业，就是老百姓常说的“饭碗”。在90年代初期的“公司热”中，很多人都热衷于“下海”。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现在的位置很委屈。好像只要辞去现在的工作立刻就能发财。现在人们知道了，保住一个“饭碗”是多么重要。现在很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大门口贴的横幅已经少有政治色彩了。我们经常见到的一条是：“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

显而易见，职工利益是企业利益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如此，很多企业，包括民营企业，现在也都很注重企业的凝聚力，注重研究企业文化。企业凝聚力、企业文化其实都是和企业中的职工利益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次SARS疫情期间，有的大酒楼整天一个客人都没有，但管理者坚持不裁人，而且坚持要求每个员工都着装整齐地按时到岗。这家大酒楼在疫情期间无疑要多付很多的员工工资。但这个企业获得了什么呢？获得了企业的凝聚力，维护了士气。我们相信，一个士气高涨的队伍是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打败它的。反之，忽略劳动者利益、职工利益的企业一定士气低下。士气低下的企业是决不可能够长久的。

企业利益中还包括政府的利益。

政府利益在企业中的体现形式就是税赋。现在很多地方政府都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在很多地方的发展战略、改革战略中都强调一点，叫做“不求所有，但求所在”。就是在企业中有没有国有股份、叫不叫国有企业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企业不能搬走。只要企业留在当地，当地政府就有税赋收益。宁波原来有个著名企业，叫做“宁波杉杉”，现在搬到上海去了，更名叫“杉杉股份”。这一搬家、一更名，对宁波来说是税赋和城市形象的双重损失。最近

一段时期来，东风汽车不断传出信息说要从十堰搬走，搬到武汉去。企业办不办在你这个“一亩三分地”上，已经成为了企业与政府谈判的一个重要筹码。湖南长沙附近有一个县，有个叫做远大空调的民营企业就在那个县。那个县的经济并不发达，但是远大空调是一个现代化程度很高、规模很大的企业，远大空调对这个县经济的影响就至关重要了。如果这家企业搬走，县财政马上就得陷入危机。政府利益是企业利益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在所有国家都一样。

企业利益中还有银行的利益。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一家现代企业能够离开金融资本的支持。如果就是开个小食品店，个体户卖卖饮料什么的，那另说。一般来说，在现代经济中，企业在流动资金或者技术改造、固定资产扩大再生产等方面总离不开银行的支持。由此，企业资产中就总有一个部分实际上是银行的债权形成的。企业经营状况的好坏，直接关系到银行的资产安全。现在我国的商业银行最怕什么？最怕企业借“改制”之名逃废银行债务。银行系统的报纸每天都在大声疾呼，要建立更严格的法律制度来防止企业恶意逃废债务。企业倒闭了，银行的债权就会落空。企业兴旺了，银行的货币生意就有了更大的市场。因为银行通常都是企业最大的债权人。不管用于流动资金周转的短期债务，还是用于固定资产添置的长期债务。所以银行利益也是企业利益的一个组成部分。

除了上述利益之外，企业利益中还包括上下游产业的利益。给你提供原料的企业、要你提供原料的企业都指望你“吃饭”呢。这个利益也是不能忽视的。

出资人的利益、职工利益、政府利益、银行利益、上下游利益，还有其他一些相关的外部利益，这些利益都是企业利益构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们得从这样一个利益构成中明确一条：谁的利益是第一位的。

我们前面说过，出资人的利益是企业利益中第一位的利益。大家想想，所谓“新三会”，就是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是在强化、确立谁对企业资产的支配权、决策权、收益索取权呢？是在强化、确认出资人对企业资产的决策权、支配权和收益索取权。

现代企业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就是要在制度上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出资人是企业的主人，出资人才对企业的资产有支配权、决策权和收益的索取权。

市场经济下的企业，从根本上说，不是为职工就业而办，不是为了政府税赋增收而办，也不是为了给银行挣利息而办，而是为出资人的利益而办。企业行为的根本动机是出资人的利润动机。

企业利益中，第一位的利益是出资人的利益，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微观经济主体组合、企业与外部社会之间打交道的一个基本游戏规则，是一个大家都需要遵守的共同行为规范。没有这个共同的游戏规则，市场经济就无法运行。因为企业如果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微观主体，那一切经济学中对竞争原则、价格规律的认识都得重写。所有要素组合的制度约定，比如股份制、资本市场等都需要重新定义。

举个例子说。假定我们在对外开放中引进外资，或者是西部大开发中引进东部资金，吸引外国老板到上海投资或者上海老板到西部投资。现在我们投资建成了一个项目。项目建成之日市委书记、市长请老板吃饭，说对不起老板，我们这里有个规矩，虽然是您投资兴建的这个企业，但从工厂建成之日起您就不是企业的主人了，职工是企业的主人了。大家想想，这个游戏规则能不能行得通。

显然，当企业都是为追求利润而建，为出资人的利益而建的时候，我们才能建立市场经济下的基本原则，才能确立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在经济学上有个基本假定，就是所谓的“经济人”假定。我们假定每一个企业都是一个“经济人”，都把利润最大化作为基本目标。在这样的假定前提下，我们才能找到企业行为的共同规律和模式。

【8-3-2】劳动者的确是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的主人。但是应当强调的是，不能把一个局部的劳动者群体说成是归全社会劳动者共同所有的国有资产的主人。不能要求归全社会劳动者共同所有的资产为一个局部劳动者的利益服务。那不是在维护国有资产，那是在损害、侵蚀国有资产。

由此连带地就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出资人是企业的主人，那职工还是不是企业的主人？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职工还是不是国有企业的主人？很多人想不通这个问题。其实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困难。劳动者的确是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的主人。但是应当强调的是，全社会的劳动者群体才是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的共同主人。不能把一个局部的劳动者群体说成是归全社会劳动者共同所有的国有资产的主人。不能要求归全社会劳动者共同所有的资产为一个局部劳动者的利益服务。那不是在维护国有资产，那是在损害、侵蚀国有资产。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企业中不应当尊重职工的利益，不等于说不需要协调出资人利益和劳动者利益。前两年，我国修订后的工会法就改得好。其中最大的一个改动是明确提出，工会的职责就是维护职工的利益。

企业中的利益构成要有一个排序，有了明晰的排序才能建立相应的利益制衡。其实在社会经济运行中也是需要利益排序的。不过在企业外部的利益排序与企业内部是不同的。比如企业破产时，资产清偿的收益首先要满足职工的利益，其次是政府税赋的利益，再次是银行等债权人的利益，最后才是出资人的利益。

企业内部的这个利益排序并不是人们主观设计的，而是从客观规律中总结出来的。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文件中明确指出，“所有者对企业拥有最终控制权”。“董事会要维护出资人权益，对股东会负责”。董事会必须维护出资人的利益，其决策的依据首先就是出资人的利益。建立这个企业内部的利益排序，是现代企业制度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

【8－3－3】由于不同出资人的利益获取方式不一样，他们对企业的关心程度也不一样。怎么协调这个复杂的利益关系呢？就要通过现代企业制度、法人治理结构来建立一个相互制衡的出资人关系。迄今我们在独立董事制度上赋予独立董事的职能，已经明显体现出这种努力。

第二，协调出资人之间的利益关系。

确认出资人的利益是企业利益中第一位的利益，这个排序还不能完全说明企业中的利益矛盾。因为企业利益是一个复杂的构成。在这个利益构成中，不仅有出资人与非出资人之间的利益矛盾、冲突和协调的问题，还有出资人之间的利益矛盾问题。常识可知，就是亲兄弟合伙开个饭馆，妯娌之间还互相打架，还会有争执、意见，还有利益矛盾。在社会化、市场化的企业资本构成中，出资人之间的利益矛盾要比这复杂得多。现代企业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协调出资人之间的利益矛盾。

我们以一个上市公司为例。上市公司的产权构成是高度社会化、市场化的。在上市公司的出资人中，可能有自然人，有企业法人。有资本雄厚的机构投资者，也有散户股民。这些出资人的投资目的也不一样。有些出资人是力图通过企业红利获取投资回报的，有些证券市场的投资者只是阶段性的持股者。他们作为一种被动投资者，其利益来源并不是企业的分红，而是资本市场的产权差价。

由于不同出资人的利益获取方式不一样，他们对企业的关心程度也不一样。怎么协调这个复杂的利益关系呢？就要通过现代企业制度、法人治理结构来建立一个相互制衡的出资人关系。在我国的股票市场中，人们熟悉的语

言是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就是协调出资人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们的股票市场在前期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把股票市场说成是为扩大国有经济的支配力而办。由此延伸，市场的目标就从“扩大国有经济的支配力”演变为“帮助国企脱困”。在前期实行上市审批制的过程中，上市的标准成为了谁困难谁上。在很多地方，政府把上市指标、上市机会当成了一种“扶贫”的资源。政府这样认识，那些国企的大股东就自然而然地认为，公众投资者的钱就应当用来为国企解决困难。

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前期在相当大量的上市公司中，大股东的行为动机就发生了异化。许多国有大股东不是把公众投资者的出资和自己的出资合起来、将本求利，通过购入原料、组织生产、扩大销售的过程来取得利润，而是把公众投资者的出资据为己有。这些大股东的利益来源不再是市场，而是其他出资人的本金。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的事件层出不穷。这些大股东的典型做法是，先编个故事说，我有好项目，要公众投资者共同出资。等资金筹集上来以后，大股东就用种种手段把上市公司的钱全部“借”走。有的借光上市公司的资本金还不算，还要上市公司担保，再从银行借一块。最后上市公司自己被掏空不说，还被留下一大笔“或有债务”。以至于一些上市公司的资产成为了“负资产”状态。这种事情接连不断地发生，已经使投资者对市场的信心受到严重挫伤。

现代企业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的基本职能之一，就是要杜绝这种侵害中小出资人利益的做法，协调好大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关系，监督、制约大股东的经济行为，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前不久，证监会在完善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措施中，要求上市公司必须建立独立董事制度。设立独立董事就是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很多人怀疑独立董事制度能否解决好大股东侵害中小股东权益的问题。这个怀疑不能说没有道理。但至少，迄今我们在独立董事制度上赋予独立董事的职能，已经明显体现出这种努力。

按照目前证监会的规定，独立董事是干什么的呢？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主要负责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监督关联交易的公正性。按照证监会的要求，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要分别、独立地对上市公司所涉及的关联交易作出判断。就是说每一位独立董事都要分别表态，对每一件关联交易都要单独表态。这个表态不是说说就完的。独立董事要对这些交易的公正性负法律责任。在这些关联交易

中，一旦发现有损害中小投资者的“猫腻”，独立董事是要被追究相应责任的。

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先天不足，上市公司和大股东之间，上市公司和大股东投资的其他企业之间发生关联交易、业务往来经常是不可避免的。在我国股票市场发育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上市额度是按照地区由国家分配的。由此带来，一个庞大的钢铁企业可能只分到一个较少的上市额度。这个额度不可能满足全部资产上市的要求。怎么办呢？只能拿出部分资产上市。比如说一个车间、一个分厂或一条生产线。大型钢铁厂是一个托拉斯，各个生产环节的关联度很强，要么原料要从关联企业来，要么产品只能供给关联企业使用。在这种情况下，关联交易根本不可避免。不仅如此，哪怕是一个资产完全独立的上市公司，也经常不可避免地要和它的股东发生一些关联交易。

关联交易本身并不违法。但关联交易不能损害相关者的利益。这个相关者包括银行、政府、职工和中小股东。独立董事要对关联交易负有责任。什么责任呢？就是保证这个交易是公平的。如果独立董事和大股东串通，明知关联交易中有损害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地方而没有制止，那么将来被揭露出来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第二件事是对财务报表的真实性负责。独立董事应当独立地审查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按照目前证监会的规定，独立董事如果怀疑财务报表的真实性，有权另行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企业的财务重新进行独立审计。这个审计无需征得董事长或董事会同意。而且独立董事有权将审计的结果直接报给证监会或者交易所。进行这种审计的费用还得由董事会承担，这是有明文规定的。如果该审而没有审，出了问题独立董事就要承担经济以致法律的负责。在我国目前的独立董事制度中明确规定，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中至少有一名应当是懂得财务的专家。

第三件事是对上市公司的薪酬制度发表意见。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等高管人员应当拿多少报酬，其他董事的薪酬应该是多少，不能由他们自己说了算。得由独立董事领导的薪酬委员会说了算。独立董事应当负责对公司的薪酬作出设计。这个薪酬制度，主要指对高管人员的薪酬制度。到年终的时候，各个高管人员对公司的贡献有多大，应该给他们多少奖励等，都要由独立董事领导下的薪酬委员会作出判断。没有这个制度，就会出现一些上市公司现在出的一些问题。一方面公司亏损连连，出资人损失惨重；另一方面公司高管人员的薪酬高得惊人。

独立董事制度仅仅是现代企业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中的一项制度安排。可能我们目前的制度安排、赋予独立董事的权利和职能等还不足以保证实现

出资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充分协调，还不足以维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但我们正在朝这个方面努力。

第三，建立资产委托代理关系。

现代企业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要解决的第三个问题，就是由谁来支配企业的资产。是不是谁出资、谁决策，就是谁来支配资产呢？也不全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要建立起完善的资产委托代理关系。

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在市场经济不断完善过程中，出资人与资产的支配关系经常是分离的。这种分离有时会发展到出资人和他的资产不见面的程度。比如说一个上市公司，除了大股东之外还有成千上万的小股东、市场上的散户投资者。这些投资者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到他投资的企业去看看他的资产是什么样的。但是在经济学意义上，这些投资者确实是老板之一、出资人之一。那谁替他打理这些资产呢？这就需要建立一个规范的资产委托代理关系。

我们说出资人是企业的主人，但这并不是说，每一个股东都要去参加企业的决策。实际上包括企业中的大股东，也不是每一个出资人都派出自己的代表去直接对企业下命令的，如果那样的话企业就乱套了。李嘉诚也不可能对他治下的资产每天、每件事都去亲自决策。那样把他累死也忙不过来。他也得通过委托代理制度来支配其资产。在企业这个层面上，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有效率的资产委托代理关系。这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经理人制度。董事会和总经理之间的关系就是经理人制度下的资产委托代理关系。

实际上在我国，完善资产委托代理关系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那就是国企改革。人们设想，国有资产也完全可以建立起和私有产权完全类似的资产委托代理关系。在这个委托代理关系中，如果被委托人受到的制度约束是一样的，那么委托人是李嘉诚或者别的什么私人，或者是政府，企业资产的运行效率应当是一样。并没有逻辑上的因果关系说，因为出资人叫做政府，所以这个企业或者这个委托代理关系的效率就一定是低下的。

委托代理关系也是一个优胜劣汰的选择过程。出资人并不一定是资产支配效率最高的人。董事会的责任之一就是要找到能够提高资产支配效率的人，委托他们替出资人打理自己的资产。如果管得好就奖励，管得不好就马上换人。如果全社会都这么干，经过不断地筛选，最后使全社会的资产总是保持在最优秀的那一群资产支配者的支配下，我们的企业就有强大的竞争力了，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就快了。我们力图实现的目标是，不论企业的出资人是谁，是自然人还是企业法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是私人还是政府，被委托的经理人受到的制度约束都将是一样的。我们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

度和法人治理结构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找到这样一种制度形式。

【8-3-4】以董事长为首的董事会负责的是产权市场的竞争，而以总经理为首的经营班子面对的是产品市场的竞争。谁才有权力讨论产权方面的问题呢？股东会和股东会选出的董事会。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企业需要不断地调整自己的产权构成。

第四，参与产权竞争。

产权竞争的问题我们已经在前面多个地方提到。现在我们已经清楚地知道，企业作为微观经济主体，实际上面对两个市场。一个是产品市场，另一个是产权市场。由此而来，企业面临的竞争也是两重的。一个是产品竞争，另一个是产权竞争。

迄今，人们对董事长和总经理权限划分的讨论非常多。在实践中，这两个位置的职能划分也是各行其是。实际上，我们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以董事长为首的董事会负责的是产权市场的竞争，而以总经理为首的经营班子面对的是产品市场的竞争。

在企业的经营活动中，产品卖得出去卖不出去、能否取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卖的价钱好不好、利润空间大不大等问题由谁来管呢？由总经理和他的经营班子管。这个班子包括副总经理、总会计师以及总管市场的销售部等。但是总经理不能去主持企业股权结构调整、增资扩股或者出售股权的事。因为资产不是总经理的，而是出资人的。总经理可以负责把产品卖掉，那是他职责范围内的事情，是他受托经营企业的权力范围内的事情。但总经理不能把企业的产权卖掉。因为那不是他的东西。总经理不是企业资产的所有者，他不能把别人的财产卖掉。

谁才有权力讨论产权方面的问题呢？股东会和股东会选出的董事会。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企业需要不断地调整自己的产权构成。例如根据企业的发展需要和出资人利益，决定进行股本扩张还是股本收缩，进行股权与债权之间的合理组合和转换等。企业需要扩大再生产，是用债权方式还是用股权方式融资？这关系到企业出资人在利润分配中的权益，也关系到资产所承担的风险。实际上市场经济下，股转债、债转股都是企业产权构成调整的正常情况。

除了根据企业发展需要和出资人利益主动调整产权构成外，企业还要应对来自内、外部的产权竞争。

多元化的产权结构就存在着一个对资源支配权的竞争。前些年在一些合资企业中，中方一般都占绝对控股地位。例如在股权比重中占有不少于51%

的份额。但是后来我们遇到一个问题。当合资企业发展良好时，外方就会提出，由于市场的前景很大，为了企业长远发展，我们增资扩股吧。这时，中方经常面临的一个尴尬是，没有可用于增资的资金来源。这时外方就会说，没关系，我单方面增资也行，只要按照双方投资额的多少重新调整出资比例就行。调整股权结构的结果就是外方成为了控股股东。这就是产权竞争。前些年，这类事在我国的合资企业中经常遇到。

产权竞争不仅来自共同投资者，更重要的是来自外部的竞争者。最近人们常听说一个词，叫做“资本运营”。资本运营其实就是产权竞争。就是通过产权的不断重新组合扩大自己对资源的支配力。资产并购也是产权竞争。外资收购国有企业也是产权竞争。实际上，世界上没有哪一家大企业是靠利润的不断追加投入发展成为世界级大企业的。真正的世界级大企业无一例外地全是靠产权竞争发展成为世界级的。出资人投资于一个企业，把在这个企业赚的钱又不断地追加到企业中，这只是一个理论化的资本循环过程。世界级大企业总是通过产权竞争，通过资产的收购、兼并、重组等过程发展而成的。这个过程谁来管呢？不是总经理。总经理不能操作企业产权的买卖，因为总经理不是所有者。负责产权竞争的只能是董事长领导下的董事会。

由此我们知道，股东会、董事会不能把自己当成经营班子的监督机构。不能仅仅把眼睛盯在总经理头上，每天看他有没有贪污腐败，有没有把公司的利益输送给其他利益相关者。这不是董事会面对的最重要的事。董事会面对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产权竞争。

现代企业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是一门比较复杂的学问。企业制度的问题迄今在全世界也并未完全解决好。不然就不会有 2002 年以来很多美国大公司爆出的假账丑闻了。以上，我们仅仅是就一些最基本原则作一些分析，和大家进行讨论。

4. 提问与讨论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不是物，同样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经济关系。

☆ 把财富交给民间、交给市场可以获得比政府更高的配置效率。

☆ 过度依赖财政投资的经济增长可能把财政拖入无法退出的困境。

☆ 我们不能把增强企业活力的根本措施寄托于“劳者有其股”上。

☆ 中华民族是个崇真守信的民族。但我们仍然需要倡导一场信用革命。

☆ 在全社会建立起不可以用剥夺或者变相剥夺方式谋取利益的根本约定，这个社会才能真正成为信用社会。

【提问一】：您在关于改革的问题中反复讲到“资本”这个概念。能否对这个概念作些解释？

答：这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说，把这个问题回答好了，回答透彻了，我们的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就讲清楚了。我只能在理论上作些分析。

“理论是灰色的”，这句话据说是歌德说的，我至今不解其意。其实人类总是不断对新鲜、生动的实践进行归纳、抽象以探索其本原与规律的。在这个意义上，应当说“理论之树常绿”。

我们要回答的问题，其实不在于什么叫做“资本”，而在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

我们从第一讲就强调工业化这个概念。资本是什么呢？资本是工业化，是大机器发展的产物。

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与人本身相异的社会经济要素只有劳动工具和自然存在的土地，社会再生产过程无需资本的概念介入其中。在小商

品经济条件下，简单交换导致了货币的产生，但这时的货币只是生产过程结束以后生产者之间相互交换产品的社会工具，主要承当的只是一般等价物的职能而并未转化为资本。

在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在“工业革命”的早期，人们发现，把劳动力聚集在一起，通过分工和使用经过改进的、专门化的劳动工具可以大大提高劳动效率和增加产出。在这个阶段上，人们直接看到的，是劳动力的集聚程度决定着分工的发展程度，专门化劳动工具的使用程度，产出的增加程度和经济规模的扩张程度。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仍无需把“资本”引入自己的视野。这时理论的发展恰恰表现为力图论证财富的增加与人及劳动以外的其他要素无关。

大机器的产生、发展与普遍应用带来了生产率的大规模提高，产出的成倍增长，经济的巨大发展和社会面貌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认为，在大机器这种人手的产物背后一定存在着某种异己的神秘力量，是这种足以左右人和社会的力量使社会产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大量增加、使一部分人一夜暴富而使更多的人不得不放弃传统的生产与生活方式而服从于机器的指挥。这个力量被人们称为了“资本”。拥有资本的人们争辩于资本是社会财富增加的源泉；没有资本的人们感受于自己的命运完全为资本所支配。由此产生了所谓的“资本拜物教”。

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马克思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资本的问题。马克思指出，第一，资本不是物，它不简单等同于货币、资金，土地或其他生产资料。第二，资本是客观存在，它不是人们的主观想象或异己的超自然支配力。

又不是物，又是客观存在，资本是什么？资本是人们在大机器所带来的抗自然能力增强过程中结成的一种社会经济关系。工业化发展过程所必然要求的工厂制度、集中化、专业化、社会普遍分工、要素高度聚集和不断优化重组等必须借助于“资本”这种经济关系才能实现；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必然要求的等价交换原则，必须借助于“资本”这种经济关系才能在工资、利息、地租等范畴内贯彻到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同样必须满足大机器技术属性所决定的一切要求，同样必须满足彻底贯彻价值规律的一切要求。体制改革是什么？体制改革本质上就是调整社会经济关系。从“生产队”、“全民所有制”到“乡镇企业”、“国有企业”，到“现代企业制度”、“打破‘条块’界限的企业集团”、“国有资本”等概念的更替，反映的就是一种新型社会经济关系的建立轨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同样不是物，同样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经济关系。

当前，我们在理论上的一个重大进步是“国有企业”的概念日益为“国有资本”所取代。人们从实践的发展中直观地认识到，“国有”的那一部分国民财富并不一定要锁定在某种特定形态、特定产业上或特定区域中。这就需要回答一个现象背后的深层次问题：“国有”的那一部分国民财富在具体形态变换过程中被保留下来的是什么？换言之，国有资本的实体究竟是什么？是一个价值量。

资本是价值范畴。机器设备、土地、资金、原料等都只是资本的具体存在形式。资本在具体形态的变换过程中被保存下来的是价值。价值才可以使不同具体形态的资产相互比较。只有在价值形态上才能理解和解释“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例如机器台数的保持或增加、土地面积的保持或增加都并不一定意味着资产价值的保持或增加。价值量的保持和增加才是资产的保值和增值。

说资本是一定量的价值，这尽管已经深入到了理论层次，但仍然为人们所容易理解。因为人们从一般商品交换中就可以感受到让渡使用价值而实现价值的关系。但资本是价值范畴的理论含义并不仅如此。一般社会产品被作为商品出卖时，价值和使用价值是高度同一地存在于一个统一体之内的。而资本作为价值范畴，在个别再生产过程中，它需要不断地变换自己的具体形态才能完成自己的职能；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它需要不断对各种具体形态的要素进行集聚和优化重组。就是说，资本是对使用价值不断排斥的价值范畴，是市场经济下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与价值之间矛盾已经高度外化状态下的价值范畴，是已经取得了对使用价值相对独立地位的价值范畴。资本的活力就存在于这种对使用价值相对独立的地位之中。资本只有在这种对使用价值相对独立的地位上才能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演绎出资产租赁、企业兼并、集团化、股份制等等生动的实践形式。

资本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国民财富。地下未经开发的矿藏是国民财富，但并不是资本；沉淀于消费者手中的储藏货币是国民财富，但并不是资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唯有投入社会经济活动中，能够带来价值增殖的价值才是资本。

如果资本的唯一有用性就是价值增殖的命题成立，那么一个相应的命题就是：只要是资本，国有资本与私人资本的根本职能就没有区别；它们在参与社会经济活动过程中的运行规则、行为方式就没有区别。

【提问二】：您提到美国政府也对经济运行采取调控措施，还提到现任总统布什的“减税”政策。美国为什么要“减税”呢？对其经济的影响何在呢？

答：布什就任总统后，第一件事就是在国会推动一项庞大的“减税”法案。无需争议，减税肯定有利于刺激经济增长。涉及增减税也无疑是政府的

财政行为。但美国这项减税计划并非是一项以短期经济增长为目标的财政政策措施。因为布什这项减税计划的实施周期将长达10年，显然这项措施不可能是基于未来10年美国经济将持续趋于衰退的判断。

布什这个减税计划的出台并非偶然，其客观物质基础在此前一段时间中已经具备多时。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联邦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保重持续迅速增长。1998年，美国联邦财政出现了久违的盈余。在2000财年，美国联邦财政盈余达到创记录的2370亿美元，竟比1999年的1244亿美元增长了88%。对美国政府来说，联邦财政连续三年盈余且增长迅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要知道，美国联邦财政连续三年盈余的记录还是在几乎近半个世纪之前的1947～1949年间创下的。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美国始终是以“政府负债规模世界最大，人均负债水平全球最高”而著称于世的。

显而易见，政府财政的大规模盈余为减税铸就了最重要的物质基础。从这一意义上说，实际上美国在1999年到2000年期间就已经具备了实施减税的条件。但当时与经济强劲增长相伴随着的是美国股市中“泡沫”的明显累积，短期调控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抑制“过热”。克林顿任内减税显然不合时宜。2000年后半年，在格林斯潘“软着陆”的货币政策作用下，美国股市的“泡沫”已经明显挤出。进入2001年后，特别是“9·11”事件之后，抑制经济增速放缓趋势的目标成为了短期调控政策的主要指向。布什政府不过是抓住了短期政策与长期战略的作用方向趋于一致的机会，适时地推出了减税计划。可以说，布什政府的减税法案不过是把克林顿没机会涂擦的“粉”抹在了自己的脸上。

美国的减税法案并非仅仅立足于短期的财政盈余。这涉及到当前一个重要的经济学理念变化趋势，即民间和市场比政府配置资源的效率更高。

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中，始终存在着一个将资源尽量多地集中于政府手中的主流思潮。不仅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强调政府集中配置资源的重要性，就是在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在战后实际上奉行的也是政府增收优先的理念。一方面，通过增税或发债把资源更多地集中于政府；另一方面，政府越来越多地承担起了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提高国民福利水平、发展基础设施、调控经济周期以致主导产业结构转换的责任。

美国这次减税法案，一个值得重视的地方就在于在根本理念上扭转了“提高政府调控能力”、“增大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的传统思路。这项减税法案强调，把财富交给民间、交给市场可以获得比政府更高的配置效率。从目前的资料看，布什政府的减税法案可能是基于三方面考虑：一是接受欧

洲高福利政策的教训，认为一方面要避免让政府背上过重的福利“刚性”包袱，另一方面避免高福利下的社会效率损失；二是总结前期货币政策的成功经验，认为可以更多通过不涉及政府与民间之间利益再分配的利率等杠杆性的政策工具来调控经济运行；三是根据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特点，认为减税对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对中小企业的扶持作用比财政转移支付形式更大。

【提问三】：您提到，政府该干的事情之一是调控经济运行。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已经实施多年，最近很多人提出这项政策应当“淡出”。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答：在积极财政政策应否“淡出”的争论中，呼吁“淡出”的学者不无道理。国债规模的连续增长会给长期财政收支平衡带来不利影响，过度依赖财政投资的经济增长可能把财政拖入无法退出的困境，政府持续投入会导致对民间投资和市场化力量的“挤出”效应等。但我认为，问题的核心也许不在于是否应当“淡出”，而在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财政的政策性职能应当有所调整。

我们目前所说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以宏观调控为基本目标的财政政策。目前看，单纯调整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关系的政策可能应当淡出了，但财政的政策性职能不能淡出。政策的着力点应当从财政直接投资引导投资需求增长转变到解决长期性、战略性、体制性难题上来。

从当前看，为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我国的财政政策应当努力实现向以下三个方面的调整。

第一，加快结构调整，对资本退出施以财政援助。在结构调整与升级的过程中，增量投入所能起到的作用总是极其有限的，关键是要依靠存量资源在产业间的流动。市场经济条件下，存量资源的跨产业流动是资本重新优化配置的结果。但中国的情况是缺乏市场化的系统支持资本退出。资本无法从原有配置领域顺畅退出，也就无法重新优化配置，结构调整就难以奏效。

在多元化的社会利益结构中，资本能否顺畅退出，在于资本能否得到必要的补偿。通俗说就是，资本退出的基本前提是能否“捞回本”，至少是部分地“捞回本”。即或在市场经济充分发达的情况下，与结构调整和升级相联系的资本补偿也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人们熟知的“加速折旧”就是政府运用财税手段满足资本补偿要求、促进结构升级的一项重要政策。

财政政策应当在资本退出的补偿援助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国债还应当发，但对过剩生产能力施行政策性收购，施以退出性的政策援助应当成为国债资金新的重点配置领域之一。煤炭“关井”、钢铁“限产”、淘汰不能达到

经济规模的石化装置等都应当提供政策性补偿。农业中的实践已经证明，对“退出”提供补偿实际上是一种代价最低、效率最高的政策。

第二，承担改革成本，改善社会经济预期。中国的改革进程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谁来承担经济转轨的代价的问题。

应当注意到的是，改革成本是一种具有“一次性”特点的支出，不能靠分摊到经济运行过程的经常性支出里面的方式化解。一方面，制度转轨本身就具有“公共产品”性质，这个成本不能也不应当直接分摊到居民部门、企业部门的收入或成本中来；另一方面，中国的转轨代价是和告别“一大二公”的原有体制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些代价，说到底是原有体制下以国家、政府、国有经济名义形成的代价。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成本的主要承担者应当是政府。在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中，“积极”的含义将更多地体现于合理承担改革成本上。

第三，调整区域经济关系，灵活运用财政信用资源。实际上在过去几年中，调整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状态始终是财政政策的重点指向。其中，区域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已经在建立过程中，西部等发展相对滞后地区已成为“国债项目”配置的重点区域。但从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的实践看，仅仅依靠中央财政的直接投入并不能满足西部发展的对增量资源投入的需要。要实现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战略目标，我们还需要探索以较少的财政资源调动更多增量资源向这些地区集中的措施。

西部情况与东南沿海地区不同。简单的税赋减免对引进外部资源尚不充分。在很多地方，要使税赋优惠政策真正发挥作用，尚需在投资的软硬环境上有较大改善。改善相对落后地区的投资环境要中央与地方政府一起上。现在看来，有必要在新的战略发展周期内积极探索“地方发债、中央贴息”的方法。

允许地方政府发债也应当成为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部大开发、老工业基地再振兴、部分区域环境与国土整治等方面，都可以通过发地方债的方式调整资源在区域之间的配置格局。不仅可以在本地发地方政府债，而且可以通过公众化的债市面向全国发地方政府债。其中，对涉及全局战略的地方发展任务可采取地方发债中央财政贴息的办法给予支持。这种与区域发展战略、与资本市场密切结合的财政措施，实际上赋予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中“积极”以新的含义。

【提问四】：员工持股是不是一个调整国有企业产权的好办法？有没有普遍意义？

答：当前在国有经济的改革进程中，“员工持股”思路正在日益引起多方

面的注意。我的看法是，“员工持股”应当搞，而且应当大力推进。但是，“员工持股”不可能解决国有经济改革的根本难题。

“员工持股”的提出并非偶然，从实践过程看，这项改革思路有三方面重要背景。一是在国企改革中，建立健全对经理阶层的激励机制已经迫在眉睫。“管理股”、“技术股”的出现是市场经济下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二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应对加入WTO挑战等方面任务需要有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分配方式。三是我国国有经济布局面临战略性调整，国有资本需要有更多样化的退出途径。

“员工持股”并非仅仅是管理者阶层持股。从实际情况看，一方面是仅靠股市远不能满足国有资本的“退出”需要。“员工持股”有可能为国有资本提供一条更宽阔的“退出”途径。另一方面，在化解金融风险的改革中，间接投资向直接投资的转变已经成为一项重要思路。“员工持股”显然可以为这一转化提供更多现实途径。

在我国目前的改革进程中，“员工持股”的发展动力主要是管理与技术要素的资本化和私人财富的资本化。从长远看，我们需要大力推进这一进程。在我国的要素结构中，目前最稀缺的已经不是资本，而是管理与技术。人们普遍呼吁，要造就真正的“企业家”、“知本家”。这实际上反映的是社会经济发展对管理与技术要素的渴求。推进管理与技术要素的资本化，促进收益分配向管理与技术要素倾斜，这符合现代经济发展的根本方向。

在过去一些年中，我国人民已经积累起了超过即期消费需要的私人财富量。促进这些私人财富的资本化，不仅有利于解决我国宏观经济层面面临的“国有资本退出”以及“发展直接投资”等重要难题，而且有利于真正形成一个对维护社会稳定发挥重要作用的“中产阶级”。

“员工持股”是一项很好的改革措施。但也决不要扩大和“神话”这项改革措施的作用。我们不能把增强企业活力的根本措施寄托于“劳者有其股”上。

很多人以为，“员工持股”将使职工的劳动成果与经济利益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因而会起到调动职工积极性的作用。这个想法的逻辑起点不过是原“人民公社”制度下“工分”分配方式的放大和“全民所有制”下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方式的缩小。“工分”并未由于劳动成果与“分值”之间存在着经济联系而使人们更加关心集体；“全民所有制”也并未因“劳动者共同利益”的存在起到提高效率的作用。这已经为实践所证明。国有企业的活力不足，人的积极性不高，并非是因为劳动者未直接持有本企业股份。恰恰相反，“终身制”的就业制度、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之间过分固化的结合关系是企业冗

员负担和“养懒人”现象的根本原因。这在前期的改革过程中已经看得很清楚。

前期的改革过程中出现过一个十分有害的实践趋向，即一些企业强迫职工“带资就业”，把“上岗”与“入股”联系起来。这些做法不仅束缚了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和要素优化重组，而且是对劳动者利益的极大侵害。劳动者经济利益的基本体现是工资。劳动者作为雇员，不应当承担与其工作努力程度无关的各种风险，例如市场风险。把投资人、经营者所应当承担的风险转嫁给劳动者及劳动报酬，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这都是一种损害劳动者利益的不公平。

在关于“员工持股”的讨论中，潜在地还存在着一种意见，即企图把国有企业在前期形成的不良债务以股权的形式卖给本企业职工，以此来剥离国有企业的债务负担。这不是在促进劳动者成为企业的“主人”，而是企图用劳动者前期的劳动报酬来弥补资本所有者的“负利润”。因为企业债务的本质就是负利润。可以毫不含糊地说，这是明火执仗的资本暴力。这些倾向都是我们解决反对的。

【提问五】：有人说，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这种说法对不对呢？您认为我们离信用经济还有多远？

答：我们在很多专题中都提到过，中国的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个能够让社会所有成员都能从发展中受惠的市场经济。

在任何经济学中，一个无须争议的命题是，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因为没有信用就无法确立分工。显然的道理，如果我要专门生产衣服，我就得首先确信，别人将会生产出我所需要的食品。没有分工也就没有了交换，没有了交换也就没有了市场，也就无所谓市场经济。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中国社会对信用的认同和尊重。中华民族是个崇真守信的民族，但我们仍然需要倡导一场信用革命。

为什么？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信用只存在于一个特定的小群体之间。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自然经济中，人们必须在一个有限的社区中相互依存、相互救助、相互取信才能共同抵抗各种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风险。由此带来，中国传统文化中，只注重对特定小范围的人守信，而不注重对社会、对制度守信。守信的范围取决于对特有群体利益的维护而不是对社会共同约定、对制度的维护。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一是广泛存在于农村的乡村社区信用，二是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在小商小贩、手工业者、运输业者中形成的帮会信用。

由此就引出一个严肃的话题。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怎样的信用制度。

我们要让人们相信，讲求信用不仅是一种美德和义务，而且是一种利己的最好方式。要让人们相信，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信用普遍昭显的制度才能使社会福利实现为最大化，每个人也才能最大程度地享用社会福利资源。

要建立一个真正的信用社会，我们需要一场信用革命。我们可能需要从很多与传统理念完全不同的基础做起。

第一，要确立财富归属权不可侵犯的根本制度。

信用是以社会利益的多元化、社会财富归属的多层次为前提的。经济社会中的所有失信行为，本质上都是在侵犯他人、他属的财富权益。如果没有财富归属权不可侵犯的社会共同约定，我们本来无须借助信用体系。任何社会最基本的信用基础就是，别人的就是别人的，自己的就是自己的。在全社会建立起不可以用剥夺或者变相剥夺方式谋取利益的根本约定，这个社会才能真正成为信用社会。

第二，当务之急是要建立起保障社会经济运行的制度信用。

要让社会成员诚实守信，社会的制度约定首先要有信用。朝令夕改的制度、被机会主义地应用的制度、因人或者因事而变的制度一定是没有信用的制度。制度失信从来都是秩序紊乱的根本原因。国情、功劳、困难群体、特定所有制、道德理念都不应成为制度失信的理由。制度守信，首先是政府守信、法律守信。

第三，要倡导对社会、对制度守信的信用观念。

现代社会信用，最重要的不是对一个共同利益群体守信，而是要对社会守信，对制度守信。我们应当确立一种普遍的社会准则：欠债不还，侵害的不仅是债权人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对制度的一种破坏。失信行为的代价不仅要包括对失信行为所造成损害的赔偿，而且应当包括修补制度的代价。显然的道理，没有对社会、对制度守信的原则，我们就不可能建立起公众化、社会化的资本市场、货币市场、票据市场。

第四，建立信用体系要把资产信用放到首位。

在中国发展消费信贷的过程中，很多银行抱怨个人信用记录的缺乏阻碍了业务的开展。实际上这其中包含着一个很大的误解，即把道德信用当成了个人信用资源的主体。个人诚实守信的品质、以往能够证明其操守的记录以及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其素质的受教育程度等，固然是其信用资源的一部分，但这只涉及道德信用部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最值得开拓、最有价值的信用资源首先并非是道德信用，而是资产信用。让人民有产，并且建立起充分

的资产信用，这是构筑社会信用体系的最根本一环。如果全社会的人都是无产者，每个人都认为破坏制度对自己没有损失，那么社会化的信用体系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

第五，大力发展具有社会公信力的第三者信用机构。

很多人有个误解，以为政府是社会信用的最好维护者。这个认识是不正确的。政府也是一个利益主体。各级政府的税赋利益、资产利益以及政府促进就业、救助贫困人群的特定责任等都可能成为妨碍公正维护信用秩序的因素。现代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一定需要有本身信用足够强大的第三者信用机构的社会体系存在。最明显的理由是，不应由政府自己来评价国债的债信，也不应由政府自己评估国有资产的价格。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社会化的第三方信用机构是市场经济下制度文明的最重要体现形式之一。发育和发展非政府化的第三方信用机构，是我们建立信用社会不可逾越的一个基本环节。

至此我们一共涉及了八个专题。这八个专题是否能够全部涵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这门课程应有的全部内容呢？我想还远不充分。因为时间关系，也因为水平限制，我更多的是提出了一些和大家共同讨论的问题。很难满足大家的信息渴求。但再讲下去，我实在也是“江郎才尽”了。希望我们还有更多的机会交流。

附　录

听陈淮博士谈向温家宝总理汇报*

编者按：最近，温家宝总理召集一些经济学家座谈，了解他们对经济形势的看法。陈淮博士参加了谈话。本报请陈淮博士详细介绍了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从中可以了解到新一届中央领导对经济形势、非典后经济走势的看法。

被访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陈淮博士

访问者：经济参考报记者　徐培英

【提要】我印象最深的是总理说的四句话：第一句是，“我有主心骨，不会动摇”；第二句是，“我每天都关注大学生的签约率”；第三句是，“就是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刻，我们的改革也没有停步”；第四句是，“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重要的机遇期”。

问：据说最近温家宝总理召集一些经济学家了解他们对经济形势的看法，您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答：是的，我参加了6月27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一起参加这次座谈会的专家还有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的樊纲所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的贾康所长、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的陈东琪所长和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刘树成所长。国务院的多位副总理、秘书长等领导出席了这个座谈会。此外还有十几位部长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也都到会。

问：这次座谈会好像很受重视。到会领导很多。

答：是的。我感觉这是一次很重要的座谈会。在SARS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总理即将出访香港、今年即将过半的时候召开这么一个座谈会，总理要在这么一个时候听听专家的意见，我想这本身就能说明一定的问题。

我到得早一点，但很多部长们已经在座。因为有些部委在此前已经陆续

* （文中温家宝总理的引言为个人记录，未经本人审阅）

召开过类似的专家座谈会，所以很多领导都打招呼说“又见面了”。比如劳动部的郑斯林部长，农业部的杜青林部长，国资委的李荣融主任，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铁道部的刘志军部长叫着我的名字和我握手，但我却没认出刘部长，不知道刘部长为什么认识我，真是不好意思。还是刘部长提醒我，说“对你在铁路听证会上的发言印象比较深”。

问：总理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答：给你10次机会你不一定猜得出来总理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第一个问题是大家的年龄。温总理准时到会，和大家握手后坐下就说，没有一点拖泥带水。总理出乎意料的问话让专家们都随便了许多。坐在我右边的樊纲教授说他“年过半百”，坐在我左边的贾康教授说他“年近半百”。其实他们和我一样，都是50岁上下。对他们的回答，总理也笑了，说“在座的差不多都比你们老，干吗老往半百上靠呢”？总理还说，“人一近60，思想就容易保守，所以要接受新知识，新事物。你们还是比较年轻的专家，所以请你们来听听你们的意见”。

问：会议的主题就是判断经济形势，是吗？

答：是的。主题就是分析经济形势，特别是“非典”以后的经济形势，重点是今年。总理先简单介绍了一下目前经济运行的一些基本情况。如同人们熟悉的，数字都在他脑子里。在说到一些比较重大的问题时，总理强调“我有主心骨，不会动摇”。条分缕析地说完，总理说：“我一共用了十四分半钟，下面就请专家说”。真是一个干脆利索。我当时心里就想，总理的主要目的其实不是“求计”，而是“印证”他的一些判断。

问：专家们对“非典”的影响和当前的经济形势怎么看呢？

答：专家们对今年经济增长情况的判断是比较一致的。大家都赞成，即使考虑到“非典”的影响，今年我国经济增长仍有把握能实现预期的7%。至子高子这个预期多少，专家们则有1个百分点上下的不同看法。今年开局，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比较高的，一季度GDP同比增长9.9%。实际上，“非典”影响的是超出预期的增长部分，是可能的潜在增长率。年初的预期不会受到影响。你今天来采访时我们已经看到，昨天温总理在香港已经明确讲：“初步预计，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以上。现在看，实现全年经济增长7%的预定目标是有把握的。”所以我说总理其实心中是有数的，只是请专家们来印证一下这个“数”。

问：“非典”对我们很多产业的影响的确是非常巨大的呀，比如旅游、餐饮、民航、出租车等。为什么经济学家们的判断仍比较乐观呢？您对形势怎么看的呢？

答："非典"给我们造成的损失确实不小。这一点总理和专家们都是有充分的估计的。这些影响在五六月份的经济运行情况中已经有所显现，在今后一段时期还会进一步显现。但现在最重要的，不仅是判断我们受了多少损失，而是在疫情之后，我们的国民经济是受到打击后趋于低迷，还是疫情被控制后转为恢复上升势头。打个形象的比喻就是，我们走路时摔了个跟头，这时我们最需要判断的不光是这一跤耽误了多少时间，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精疲力竭无力向前走了呢，还是仍是精力充沛，只需掸掸土就可以继续快速前行。没有人否认摔一跤会耽误一定时间，关键是站起来后还能不能走得和原来一样快，甚至更快。

问：您的看法是我们这一"跤"没伤筋动骨？

答：不光我这么看。总理说，"我们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胜利"。要是把我们摔得站不起来了还叫胜利吗？

我向总理汇报时谈了一个"四个没有变"的看法。

第一个是中国城市化进程正在加速的趋势没有变。我们的国民经济凭什么过去两年里在世界经济增长格局中保持了"一枝独秀"的地位呢？最重要的支持因素之一是城市化进程明显加速。大家过去两年中如果到各地去过，是不是觉得我们的很多城市面貌变化特别明显呢？我们说，中国经济增长的这个"发动机"的转速依然。而且这个"发动机"不仅将支持今年的经济增长，而且还将支持我们未来20年的经济增长。

第二个是老百姓的收入水平和由这个消费水平决定的消费结构没有变。大家担心旅游、餐饮等产业会一蹶不振。这个担心没必要。为什么呢？因为疫情不可能根本影响我们的人民收入水平。在一个特定收入水平上，人们的消费结构就是一定的。人们的收入中有多大一个比重要花在劳务性产品上，比如旅游、餐饮、娱乐、健身等，不会因为短期的疫情而根本改变。也就是说，这些产业的市场基础、需求基础并没有受到影响。老百姓的口袋里，有多大一个份额要花在这个领域上，这个比例是不会以"非典"的意志为转移的。

第三个是新的产业热点正在形成的趋势没有变。就是在"非典"最严重的时候，我们的车市不是也没有降温吗？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制造中心的这个趋势不会因为疫情而改变。新的产业热点也是我们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发动机"之一。这个"发动机"也是转速依然。

第四个是全球资本流动的基本方向没有变。我在汇报时说，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肯定要大过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但和那次危机相比的一个不同点是，亚洲金融危机在一段时期内极大地改变了全球资本的流向，而SARS

疫情并未改变这个流向。2002年全世界汽车销售量增长了2%，其中绝大部分是中国市场销售增量的贡献。中国的市场前景全球无人可比。资本怎么会因为短期的疫情就不来赚钱了呢？

所以我说，疫情是中国经济处于上升过程中遇到的短期阻碍。这四个“没有变”决定，我国经济运行的基本态势不会受到大的影响。

问：学者们就克服“非典”影响和促进下半年经济发展提出什么政策建议了吗？

答：建议是肯定要提的。专家们的建议着眼点各不相同。就克服“非典”影响的问题上，我的建议主要是两点。一是不要低估市场自身自我平衡和自我补偿的能力。二是政策资源的重点配置领域应当是市场机制力所不及的领域。

我国受疫情影响较重的大都是市场机制力量比较强大的地区和市场机制发育比较充分的产业。我觉得应当强调一个判断，这些产业敏感但不脆弱。餐饮、旅游、旅客交通等业本来就是消费需求弹性非常高的产业。它们对环境高度敏感，收缩非常快但同时膨胀也将非常快。预期下半年这些产业的同比增长，也就是和去年同期相比的增长速度仍会有一个明显的高潮。向总理汇报后的第二天，恰好就是北京“双解除”后的第一个双休日。事实上人们冒着大雨彻夜逛街的情形已经证实了这个判断。

经过20余年的改革，我国的市场力量已经发展得比较强大了。2003年的疫情与1976年的地震灾害相比，最大区别是什么呢？在于不需要由政府“包下来”。克服疫情的政策不宜称为“补偿”性的政策。政策资源不应按照损失大小来配置。而应按照市场机制能否发挥作用来配置。就是说，不是谁受的损失大就补谁。要看市场机制、市场竞争的作用在那个领域是否充分。有的领域市场机制足以导入充分资源，那么这个领域即使受损很大也不需要更多的政策介入。但有的领域光靠市场机制是无法恢复元气的，这个领域就得给予更多政策关照。

还有，疫后重建和公共卫生安全体系的建立也不应包揽在政府身上。要鼓励企业和个人提高风险意识，利用社会化的安全措施自我保护，鼓励全社会更多采取商业化、市场化的避险措施。鼓励保险业开发更多的险种，包括经营收益险等。我也打了个比方。长江抗洪救灾和平时修固堤坝，这个事要靠政府管。但发大水冲了房子冲了庄稼，补偿这个损失要靠推进市场化的保险方式解决。特别要防止那种把公共安全的经济责任全部委之于政府的不良预期。

问：那您认为对这次疫情政府政策还应当做些什么呢？

答：我建议对民航、出租车等交通运输业继续给予一段时期的减免税支持。对民航等资金密集型产业还可动用阶段性的折旧政策支持。什么叫“折旧政策”呢？就是在国家实行减免税的时期内允许这些行业不提或者少提折旧，以后不实行减免税政策时再允许他们多提折旧。这样才能让这些产业真正享受到税负政策的实惠。

我还建议对受到疫情影响的低收入人群和部分行业实行收入补贴。例如城镇中一些低收入群体靠打零工获得的一些“或有收入”没有了，出租车司机等因停业没有了收入。我建议国家动用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和最低工资制度给予政策援助。例如在疫情严重地区阶段性地提高“低保”标准，把最困难群体损失的那部分实际收入补上。比如说，在疫情最严重的若干月份，每月的“低保”标准提高50元。对停业、半停业的出租车等行业也可考虑在疫情严重的月份内，按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或最低工资标准由政府给予补贴。这个政策花钱非常有限，但社会影响和实际扶困作用将非常大。这个建议最初是我在5月初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研究政策时提出来的。这次我再提出这个建议时，总理插话，“北京已经一定程度地实行这个政策了”。可见总理对全国的政策动态是了如指掌的。

问：很多人包括专家认为，疫情对就业的影响不可低估。您对这个判断怎么看？

答：就业的数字和存款余额有类似之处，它只看年底数。这个数字和GDP不一样，它不是按月相加的。随着经济的恢复，用工单位很快就会恢复。今年疫情严重的若干月份中就业人数的下降并不会明显影响到年末就业总人数。我认为今年城镇就业总人数增加800万的目标仍是能够实现的，包括民工就业岗位。就业问题是长期存在的问题，不要把长期问题与短期经济运行的特殊难点混为一谈。对失业的影响主要在于部分人员的短期收益受到了影响。

我在汇报时提出了一个认识。即使是讨论长期的就业形势，我们也不能光看失业人数，更重要的是要看每年新增的就业人数。根据2002年和2003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权威数字，在过去几年中，我们的就业岗位增长速度是不慢的。1999年城镇就业人员总数新增796万人，2000年新增739万人，2001年新增789万人，2002年新增930万人。也就是说，在过去7%～8%的增长区间内，我国城镇就业总人数的增加数稳定保持在每年800万人左右并有逐步增长态势。去年末我国的城镇就业总人数是2.48亿人。只要我们能保持住这样一个增长规模并且略有提高，比如说从800万起每年递增三四十万，那么10年的周期内城镇就业总人数就可以增加1.3亿人。这个数字意味着10

年内可以有两亿农村人口搬进城。那时的城镇就业总人数可达3.8亿人以上。保持住这样一个就业人数增长趋势，我国的就业形势就不会恶化。

我发完言后，樊纲教授在讲到就业问题时也同意我的看法。他说，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经常性地存在一个5%左右的流动性失业人口是很正常的。“5%左右的流动性失业人口”是个什么意思呢？我理解，假如我们现在城镇中有1600万人没有工作，这其中真正构成就业压力的只是超过5%的200多万人。当然这不是说我国的就业形势不严峻。我国就业形势严峻主要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局部地区失业问题严重，例如单一资源型的老工业基地；二是国有职工体制身份转换过程中的体制性矛盾；三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的迫切要求。对这些方面应当有更坚决、更得力的政策措置。

今年有个和“非典”无关的特殊情况，就是大学生就业的问题。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总理的一句话。总理说，“我每天都关注大学生就业的签约率”。尽管我认为，大学生就业问题是一个短期的结构性问题，不是总的就业岗位供求关系更加恶化的标志，我还是为这句话深深感动。我想我们的大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们听到这句话也会感动。我们上下一心地去应对挑战，还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呢？

问：在关于形势的讨论中，专家们有没有对改革问题提出新的见解呢？

答：我们强调在疫后恢复中发挥市场的作用，这就是改革。恢复经济靠改革，继续发展也要靠改革。在提到改革问题时，总理曾郑重说到，“就是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们的改革也没有停步。中央一直在抓紧研究有关的方案。”

在改革问题上，专家们的建议涉及的方面也很多。比如“三农”问题，市场发育问题，国企改革问题、进一步扩大消费的问题等。总理说，“扩大消费对国民经济的增长很重要。”

问：在“三农”问题上专家们有什么新见解吗？

答：“三农”问题是个长期的大问题，不可能在这个讨论短期问题的会上太深入。但我提了一个政策建议。我认为，粮价仍是影响农民收入和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过去几年来对农民收入影响最大的不是自然灾害，而是市场“灾害”。现在的情况是，每当城里人消费便宜的农产品时就是农民吃亏的时候。这种城乡利益关系对立的格局应当尽快扭转。怎么扭转呢？我建议极大地扩张农产品期货市场。这是一个让城市分担农业自然风险的最好办法。如果有一个较大比重的农产品通过“套期保值”、通过期货市场实现交易，我们就把大部分自然灾害的风险转嫁给了市场投资者，调整城乡之间利益关系也就有了强大的市场化手段。我国农业发展要及早考虑更有效的市场化避险手段。靠政府的粮食储备系统是不可能承担起粮食丰歉的市场风险的。

问：今年以来，有声音提出要防止“过热”，专家们对这个怎么看？

答：这个问题的确有不同看法。我的看法是要慎提“过热”，绝不要给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泼冷水。但樊纲教授就提出，还是要警惕投资“过热”的一些趋势，

我认为，解决中国的就业、产业结构升级、扩大对外开放、调整供求失衡、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等诸多重大难题的相交之点就在于城市化发展。我们在城市化发展问题上至少要有15年到20年的预见性。前不久，央行出台了一个收紧房地产业信贷的121号文件。媒体上的讨论已经很热烈了。这个文件可能也是基于防范“过热”的考虑的。

问：不论是促进投资增长还是防范投资“过热”，您在这方面有什么建议吗？

答：我的建议主要有两条。一条是不宜把解决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和城市化联系起来。特别是不宜动用货币政策，例如贷款利率倾斜的政策来解决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我们应当把市场化政策和公共性政策分开。银行是企业，面对的是市场，解决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不是银行该管的事。在这个领域中，我们就要强调和完善市场化的游戏规则，不能把公平的政策取向也加进来。那怎么解决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呢？我建议多用财政政策，如贴息、贴租的政策。例如城镇中人均收入低于某一个水平的家庭购房时由政府贴息。对贴息也买不起的家庭，比如特困家庭怎么办呢？可以采取政府贴租的方式。这样就可以把政策和市场发育分开，不要让调整公平的因素参与到正常的市场交易中来，否则就会扭曲真实的竞争形势。

另一条是建议在“积极的财政政策”中，更多采取与城市化密切结合的地方性财政政策。比如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可上市的“市政债券”。具体操作可为：发30年期甚至50年期的“市政债券”用于修“地铁”、“轻轨”，可由地方政府贴息，通过土地增值收入、投资增长后的税负增收来偿还。这一方面可极大地培育新的投资增长点，另一方面把“积极财政政策”的责任从中央政府延伸到地方政府。我觉得，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潜在威胁是找不到足够大的资本容纳领域。低息下的银行储蓄持续增长说明资本过剩已经开始显现。我建议鼓励而不是限制城市轨道交通发展，这是未来几年带动投资增长的一个关键点。实际上，房地产、钢铁、汽车等产业是不是“过热”取决于城市化的空间是否扩张。

究竟是不是“过热”？总理并没有给专家们的不同看法下结论。但我相信大家都会同意总理的一个重要判断：“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重要的机遇期”。

后 记

这本书的原名叫做《思考经济，对话中国》，是在给上海交通大学2003级EMBA班讲授“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学分课程基础上，根据课堂录音整理而成的，后根据出版社的意见改作现名。

过去多年来一直有个愿望，就是把自己对经济学，对中国发展与改革的思考系统整理一下。但因时间关系一直不能如愿。感谢上海交大给我一个机会，把这个愿望作了一个阶段性的了结。

我所就职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一个专门为决策层领导提供政策咨询意见的研究机构，由此就有机会对我国经济发展过程的很多前沿信息多一些了解。在前不久出差时，我在飞机场看到一本叫做《中国高层智囊》的书，副标题叫“影响中国发展进程的人”，我也被收罗其中。该书的作者可能不了解什么叫“政策建议”的工作。其实“政策建议”就是“不说白不说，说了也很可能是白说”的那些话。“政策建议”与“影响中国发展进程”之间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呢。特别声明，读者千万别指望能从本书中发掘出什么“决策内幕”的信息来。

我是老三届的尾，新三届的头。实实在在不掺假，一个没念多少书，又念过很多年书的人。老三届指“文革”中在校的66、67、68三届中学生。我是68届初中，刚上初一就停课了，以后上山下乡，没念多少书。新三届是指恢复高考后迈进大学校门的77、78、79三届大学生。我是77级，四年本科、三年硕士、三年博士一气念下来，此后又到东洋、西洋喝过一点“洋墨水”。提到这番话的意思是想恭敬地告诉读者，我只有一些囫囵吞枣的“夹生”学问。所以在本书的整理过程中，我想尽量忠实地保持自己的思想原貌，对错由读者评说。

本书的成书过程受益于上海交大安泰管理学院很多领导与老师们的帮助。中国发展出版社的尚元经和李莉编辑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大量心血和劳动。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陈 淮

2003年11月28日